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四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四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PDG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 …………………………………………… (1)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
中国共产党为汉口英国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 …………… (6)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
什么是机会主义 ………………………………… 恽代英 (10)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 ……………………………… (14)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
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 (19)
(一九二七年初)
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 ……………… (22)
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 ………………………… (39)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节选） ………………… 瞿秋白 (42)
(一九二七年二月)
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 ……………………………… 周恩来 (91)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 （102）
——为肃清军阀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问题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
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 …………………………………… （106）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毛泽东（109）
（一九二七年三月）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 郭沫若（136）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 …………………………… 董必武（155）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
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 …………………………………… （161）
——告两党同志书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 ……………………………………… （163）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 …………………………… 周恩来（166）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 毛泽东（167）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 ………………… （170）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
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 ………………………………… （175）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 ……………………………… （176）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土地问题议决案 …………………………………………… (186)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职工运动议决案 …………………………………………… (195)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组织问题议决案 …………………………………………… (207)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 ………………………… (209)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周恩来等关于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 ……………………………………… (212)
（一九二七年四月）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 (214)
（一九二七年五月）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
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 (225)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 ……………………………… 瞿秋白 (229)
（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
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 (238)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议决）
中国共产党对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 ……………………… (241)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
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 ………………………… 瞿秋白 (246)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 ……………………………………… (256)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湖北省委拟，五月二十五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 ………………………………… (258)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议决）

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 …………………… (260)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意义 …………………………………… 任弼时 (263)
（一九二七年五月）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 …………………… (267)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
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 …………………………… (279)
——农运策略
（一九二七年六月初）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 (285)
——关于政局的公开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
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 ……………… 张太雷 (289)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 …………………………… (294)
——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 ………………………… (298)
——农运新规划五项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
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 ………………… 陈独秀 (302)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
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 ………………… 瞿秋白 (309)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
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 …………………………… (313)
——反抗土豪劣绅之武装袭击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

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 …………………………………… (317)
——农运策略的说明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 ……………… (331)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对政局宣言 …………………………………… (333)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
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 (341)
(一九二七年五月)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 …………………………………… (357)
——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 …………………… (363)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 (366)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给前委的信 …………………………………… (375)
——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中央委员宣言 …………………………………………… (377)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 (382)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
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记录 ………………… (385)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 (408)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 …………………………………… (441)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 …………………………………… (444)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 (448)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湖南省工作的决议 ……………… (452)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 ……………………………… (455)
（一九二七年八月）
附：毛泽东提出的湘南运动大纲 ……………………… (456)
（一九二七年八月）
中央通告第一号 ……………………………………… (458)
——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 ……………………………… (462)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给河南省委的信 ……………………………… (465)
——冯玉祥统治下的河南形势与党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 ………………… (469)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
中央通告第三号 ……………………………………… (481)
——建立党内交通网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给南方局转广东省委的信 ……………………… (483)
——对敌人进攻叶贺军队的估计和对策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给湖南省委的信 ……………… (486)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 (488)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
告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全体官兵书 …………… 贺　龙 (493)
(一九二七年八月)
中共中央关于广东武装起义计划给南方局
并转广东省委的指示 …………………………………… (497)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 ………………………………………… (499)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 ………… (507)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给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信 ………………… (509)
——对《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工农军作战方法》
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湖南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 ………………… 任弼时 (512)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向潮汕进军的问题 ……………………………… 周恩来 (516)
(一九二七年九月)
把党改造成为一个伟大的健全的中国
无产阶级的大政党 ……………………………… 蔡和森 (518)
(一九二七年九月)
中共中央给南方局暨广东省委的信 …………………… (525)
(一九二七年九月)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 …………………… (527)
(一九二七年九月)
中共中央对于长江局任务的决议案 …………………… (532)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

中共北方局暴动计划 ……………………………………………… (534)

（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

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 ……………………… 彭公达 (538)

（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于武汉）

中共中央给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信 …………………… (556)

——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工农运动的路线和策略

给江苏省委的指示 ……………………………………………… (559)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九日）

中央通告第十一号 ……………………………………………… (563)

——关于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反对军阀战争宣言 ……………… (565)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给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信 …………………… (571)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 ……………………………………………… (573)

——为叶贺失败事件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农民起义等问题

给浙江省委的信 ………………………………………………… (583)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暴动计划的意见

给北方局的信 …………………………………………………… (586)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工作给山东省委的信 ………………… (588)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 …………………………… (592)
（一九二七年十月）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 (602)
——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
中共北方局关于北方政局及党的任务的决议案 ………… (609)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农民暴动和改组党组织
给陕西省委的信 …………………………………… (614)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 ………………………… (616)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 …………………… (634)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政治纪律决议案 …………………………………… (642)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 …………………… (648)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 ……………………… (650)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 (650)
职工运动决议案 …………………………………… (666)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中共中央给湖南、湖北省委的信 …………………… (678)
——两湖军阀混战形势下党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 ………………………… (681)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 ……………… 瞿秋白 (684)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 …………………………………………… (690)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
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
中央通告第十六号 ………………………………………………… (697)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广东通信） ………………… 张闻天 (702)
——海陆丰工农兵的大暴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山东工作大纲 ……………………………………………………… (713)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通告）
中共中央工作计划 ………………………………………………… (719)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决议）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 ………………………………………………… (722)
——关于党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给闽北闽南两特委的信 ………………………………… (729)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北方工作决议案 …………………………………… (733)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 ………………………………………… (738)
——关于广州暴动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中共中央给江苏省委的信 ………………………………………… (741)
——关于乡村暴动问题的答复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
中共中央复陈独秀函 ……………………………………………… (745)
——关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
附一：陈独秀来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 (748)

附二：陈独秀来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750）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关于党团关系
通告第十九号……………………………………（751）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武装暴动的问题………………………………瞿秋白（756）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763）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广州苏维埃宣言…………………………………（767）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江西工作计划……………………………………（770）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
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
建立苏维埃告民众………………………………（776）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发动武装起义
给湖南省委的信…………………………………（782）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788）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796）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武装起义计划等问题
给浙江省委的信…………………………………（798）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PDG

中共中央关于在柏文蔚部队中筹办学兵团问题
给安徽临委的信 …………………………………… (801)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给陈独秀的复信 ………………………………… (804)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附：陈独秀来信 ………………………………………… (805)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关于第二十五师去湘南发动农民起义
给朱德等的信 ………………………………………… (808)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直隶工作的教训和方针
给蔡和森转直隶省委的信 …………………………… (815)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第二十五师立即脱离范石生
退往北江参加农民起义给朱德的信 ………………… (818)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李立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 (820)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给福建临委的信 ………………………………… (826)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 …………………………………… (830)
——对国民党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长沙暴动未实现原因和当前任务
给湖南省委的信 ……………………………………… (833)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

一、北方奉系内部对于向南用兵，虽有急进派和缓进派之冲突（前派之代表者为张宗昌，后派之代表者为杨宇霆），但最近奉张已依照杨宇霆计划渐趋一致，杨的计划之要点是：

A. 容纳急进派及英帝国主义所企图的继续与北伐军作战，不让北伐军得到一刻休息，养成势力，然而这个战争是要奉军嫡系以外的军队去抵挡，至于奉军仍极力避免现时与北伐军直接的冲突。

B. 他目的是在让他所不满意的别部分反赤军队去牺牲，明知他们单独没有战胜北伐军的可能，无论何方胜败，他仍拥有全国最强的军备，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C. 因此他现在对东南方面是利用孙传芳与张宗昌进攻北伐军，先让这两部分军队去牺牲；对河南方面是极力设法拉拢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寇英杰、米振标等，以抵制党军及国民军，预许靳云鹗以河南地盘，并要靳云鹗组阁以疏通乃弟，奉张自己集中二万精兵，静观变化。

既然奉张现在拥有全国最强的军备，杨宇霆这个计划又不是十分空想，只要他肯决心对南用兵，英帝国主义者会试以最后之努力。则是在奉张对于杨之计划当然是十分同意，惟在河

南方面，恐不能若杨之如意算盘，奉张最恐惧的是国民军与党军联合豫中军队，打成一片，对付奉军，便给奉军以很大威吓，再则阎锡山态度，亦是奉方所当引为顾虑的。

二、国民军受奉军之逼已退出包头，奉军的企图是尚欲取得五原，完全断绝国军械源。国民第一军共有八万人，只有三万人留在五原，五万人已开入陕西及豫东，其二、三、五、六军均在陕西。国民第一军兵士的训练虽好，惜子弹及物质的给养非常缺乏，而且炮队、骑兵都在南口败后丧失，很难抵御奉军充足精利之武器，国军现时是急欲打通一条与国民政府交通的出路，而因与党军及豫中军队的联络尚未十分弄好，且饷弹缺乏，故尚逗留阌乡灵宝一带，未往前进。

三、河南方面，自国民军攻入豫东后，形势非常紧迫，不仅吴佩孚不安，即张作霖也十分焦虑。一面奉军已进至彰德，置重兵于京汉路上，预为防御；一面吴佩孚出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解决动摇倾南之靳云鹗部队。惟吴张终不能整个的拿住河南所有的军队以对付南方，虽迭下总攻击令，而效用甚小。

四、阎锡山在现时战争中的关系十分重要，奉军与北伐军谁取得与阎锡山的同盟，就是谁胜。阎现在特别对国民政府表示亲近，愿意回到 K. M. T. 中来，愿意组织北方国民军反奉。国民政府必须尽力弄好与晋阎的关系，只要在反奉条件之下，可以容纳阎所有的要求，和以前对唐生智的政策一样。并且尊重阎的独立地位，不可强他附属于冯[1]之下；即令阎暂时不愿在国民政府统属之下，而只肯结为反奉的军事同盟，国民政府亦须容许之，将来奉系失败后，阎绝不会跑在国民政府之外去。

五、东南方面，孙传芳已集中所有力量于沪杭路上与党军作最后的一搏，浙军一师陈仪部队因一部分被孙缴械，其余六千人已全数倒向国民政府方面来，孙之总攻击令已于一月五号发下。目前南军应战者尚只是周凤岐及陈仪部队，党军大队由

赣闽两路入浙，全部尚未集中。浙中战事，只要把孟昭月一师主力军攻破，则其余军队均可不战而解决。

张宗昌曾来南京住数日，现已北返，其军队大部分集中徐州江北一带。常之英（张之师长）想到上海，而苏军白宝山、冯绍闵、李宝章联合拒绝。鲁军侵苏常道，常师遂不敢前进。李宝章最忠于孙，白冯则仍有观望倾向。

上海市民自治运动，暂时淹没在孙传芳军事行动的高压中，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虽表现一点恐惧，然大部绅士及工人群众仍在积极的预备着，等待一个军事胜负分明后的暴起。我们对于上海政治问题：A. 认为上海是与帝国主义冲突的最急点，不易应付；B. 奉鲁军队势在必争；C. 目前战事的中心是在京汉线上，当集中势力去应付；D. 所以赞同上海市民自治运动以为北伐军及奉鲁军间之缓冲。

六、国民政府方面：

1. 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运动，的确是已走入革命道上，革命已深入到乡中去，每个小县每个小村中的人民，均感到一种新的映象，充满着新的企图，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在乡村中非常普遍，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数见不鲜。这次中国社会内层的震动较之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更为深刻。惟民众自己尚缺少武装力量，而反动派社会仍极深厚，不仅各地农民运动时受压迫，即 K. M. T. 组织亦时遭他们显明的攻击，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

2. 在军事方面有以下的困难：A. 久战疲劳且缺乏饷项，补充又未完备，故目前作战极难，急须一个相当期间的休养；B. 目前军饷无着，兵心很涣散，在江西之七军、三军均有部分哗变事实，兵士中有因为领饷不得而反对政治宣传者；C. 内部将领间又多冲突。主观情形虽然如此，而客观环境却逼起

非战不可，亦只有积极作战争的布置。

3. 在政治方面，国民政府及 K. M. T. 中央移汉后，合组一临时委员会，维持这个政府，事实上我们不能不赞成此政府，蒋介石暂时亦不反对此政府，惟湖北地方的 K. M. T. 员多站在地方主义的观点上，颇有反对倾向。

4. 广东现时仍是中派政权，近虽极力拉拢右派，招致左派，向 C. P. 及接近 C. P. 的左派进攻，但 C. P. 本身并没有受着什么损失，张静江走后，李济深纵右倾，但李处事比较持重，不致有很大的反动事发生。

5. 国民政府内部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各领袖间的冲突，最致死命的是汪[2]蒋不相容。蒋表面虽赞成迎汪，实际他现时反汪较前更力。我们实际考察，迎汪的人主观并不是倒蒋，而汪回的客观结果，汪蒋冲突势不能免，因为在军饷分配上，在一切用人行政上，只有蒋容忍汪的公平处置，或者汪容忍蒋的专断，才能够相安无事。我们认为弄好汪蒋间及各将领间的关系，比别的问题还更重要。如措置不好，立刻可以使全局崩坏。

七、帝国主义对于国民政府的态度，现时最主要的英日两国，虽已由炮舰政策转变到讨论承认问题，然而他们一方面赞成南北分治，一方面仍积极援助奉张对南进攻。英国二五增税的提案，只是借以和缓欺骗中国民众，实质更多帮助奉张和苏孙的财政收入。最近汉口英兵的枪杀华人便明显的表出英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因英国以二五增税拉拢奉张而妒忌而反对英国提案，一面以南北分治说欺骗南方和缓其向奉张进攻。

八、总括以上的分析，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是：

1. 是军事上继续对奉作战已成为不可免的事实，盖我虽欲休息而奉鲁军与帝国主义者均不容许，在河南在江浙，吴孙溃败

即不免与奉鲁军直接冲突。因此我们在军事上的策略应该是：

A. 积极作战争的准备，特别注意京汉线上。

B. 对浙取攻势，迅速击破孟昭月主力军，以兵临江苏边境影响上海自治市运动。

C. 鄂东九江均取守势以备鲁军之进攻。

D. 上海进行在K.M.T.影响之下的市民自治运动，市内不驻兵，江苏让给白宝山、冯绍闵、李宝章等与鲁张冲突。

E. 国民政府国民军应尽可能的拉住阎锡山联合反奉。

F. 国民军当联络豫中一部分军队与党军结合占住河南（黄河以南），一面抵御奉军南下，一面东向南下的奉鲁军威吓。

2. 是政治上仍极力调解国民政府领袖间的冲突，继续汪蒋合作的口号，要汪回来建立一个左派指导权的政府。至于迎汪实际进行中的困难，只有随时临机解决。

3. 是在民众中积极宣传民众起来拥护国民政府，帮助国民政府解决目前财政上的种种困难，提高兵士的革命热情，促进兵士与民众间亲密的关系，消灭反动派利用群众站在左的方面说话来反对国民政府的阴谋（例如大商买办阶级利用反抗增加负担的口号，鼓动群众反对国民政府）。我们现在只应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剔除中饱”的口号，而不能提出“减轻人民负担”的口号，尤其在反奉战争中。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冯玉祥。

〔2〕指汪精卫。

中国共产党为汉口英国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

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

英国水兵受长官命令，一月三日在汉口英租界枪杀和平讲演的中国市民一事已经引起很重大的事变了。愤怒的民众对英国帝国主义这种进攻和屠杀已经决定相当办法对待，务使其永不会再发生了。武汉工商学群众大会通过一些要求，请国民政府向英国提出。这些要求，根本是在永久取消英国人屠杀并高压中国市民的那种侮辱中国人民之特权，这些要求无疑地是全中国广大民众的要求。这些要求表示，中国工人及一切劳动民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已进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亦即表示从一九二五年“五卅”英国人屠杀上海工人市民开始的中国民族运动进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英国帝国主义者在汉口企图于一月三日以挑拨手段惹起革命群众的骚动，借以为向国民政府进攻的张本，因此，假意退步并迫国民政府来保护他们抵御群众的愤怒。国民政府很了解英国人挑拨手段的凶辣，因此，即刻采取各种办法，防止中国民众和英人及其机关的冲突。国民政府赞助武汉民众的这种举动，即担负维持英租界治安责任并建议英人撤退其武力，是唯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八三期。

一正确的。在英租界的英国武力本负屠杀中国民众责任的，此种武力之驻在不能保证再不会有挑拨手段发生。

英国帝国主义者对此是怎么一种见解呢？他们在愤怒的革命民众前面迫得接受国民政府的建议，但他们以为这种状况是暂时的。他们在中国和伦敦，经过政府官吏和报纸，公开宣称，他们所以接受国民政府以中国警察维持租界治安的建议，是因为他们此时在汉口没有充分的武力，故与国民政府妥协，俾得从容派遣兵舰入扬子江来。英国帝国主义者，不管由兰浦生口中怎样说出愿意开始对华的“新”政策，但事实上没有一分钟放弃其干涉中国的阴谋。差不多与兰浦生赴汉口与国民政府谈判同时，英国帝国主义者却在天津与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一起准备进攻南方的大计划。谁也知道，英国帝国主义者是准备这计划的重要角色，并继续站在北洋军阀背后，从政治上和物质上帮助他们。

现在，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其本国和全世界正在造成干涉中国的舆论。他们在汉口的挑拨手段，就成为他们对于中国解放运动疯狂的攻击之发端，并以此证明帮助北洋军阀武装进攻革命军和国民政府，是对的。

在中国的一切英国报纸，一切英国代表以及一切大资产阶级报纸和半政府机关报纸的通信员，都制造无数虚伪的消息，仿佛以为：

（一）英国人及一切外国人，现在正处生命危险的情况底下，并举出他们所伪造的杀人越货等无稽事实来证明；

（二）汉口一月三——四日的骚乱是少数极左派的煽动家主持的，大多数民众甚至国民党都反对此种骚乱；

（三）在中国，人们准备向一切白种人作战，如拳匪之乱一样。

英国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是十分明显的。为在政治上准备干

涉，他们必须在其本国建立联合战线，如有可能，又须立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间建立联合战线。为着这个，必须把中国形容得像上面所说的一样。

全国民众们！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干涉中国的危险，是没有一刻不恐吓我们的。现在这个危险扩大了，特别是在与最近联合一致的北洋军阀作战的前面。英国帝国主义者任何挑拨手段都做得出来，以帮助中国的反革命，如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并不惜以任何战争的恐怖恢复其在全东方首先在中国所失去的威权。

他们现在正由阿马利与国民政府开“和平的”谈判，这种谈判乃是他延宕时间的阴谋，企图于此时期内在中国集合大势力，如有可能，并与其他帝国主义者建立联合战线。

唯一能够打破英国帝国主义者这种狡猾计划的，只有中国民众本身在本党和国民党领导下的反抗，全国民众对国民政府的拥护，以及中俄的联合。

本党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在目前帝国主义者以英国为首直接危害中国革命这一危险的顷刻，赶紧站立起来，拥护国民政府，在群众会议中、在舆论中、在议决案中，公开表明对于国民政府的赞助并要求英国人承认汉口一月五日群众大会所提出的条件。为取得保证一月三日的挑拨手段不至重演和英国帝国主义者不帮助北方进攻南方起见，我们起来要求撤退英国驻华海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英国租界，撤退一切帝国主义之驻华的军队。

全国民众们！中国革命已经开始，并继续下去了！革命的胜利应该是帝国主义的失败。胜利是靠民众帮助国民政府并自己努力的，而依靠在被压迫民众上面的国民政府也要坚持到底，不对英国帝国主义让步。

前进，向帝国主义和反革命作战！

本党同时并向西方无产阶级提议，在各国举行抗议英国帝国主义者这种挑拨手段及其干涉中国的准备。

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万岁！

中国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万岁！

中俄联合万岁！

打倒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什么是机会主义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恽　代　英

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因为民众普遍而急激的革命化，一定有很多人都愿意加入革命党里面来。在这时，革命党没有理由将许多革命的民众关在党的外面，应当打开大门，欢迎革命的民众入党。但是，有些忠实的革命党员便会踟蹰的说，这样滥收党员，不怕有机会主义者跟着亦混进来了么？

这种忧虑实在是有理由的。在革命运动风头顺利的时候，革命党必须谨防自身的腐化，忠实的革命党员必须随时提防党内发生机会主义的分子。这是关系革命党前途运命很重大的。

不过我尚不以为普通所谓机会主义为可忧虑。普通所谓机会主义，一说是指有些人进革命党不是为来革命，而是为来谋一个升官发财机会的；一说是指有些人看见革命运动风头顺利，幻想以为革命运动从此可以不费力的成功，不预备过艰苦奋斗日子的。这两种人自然是革命党所不能容受的分子，但是这两种人的危险是人人易知易见，所以对于稍为慎重的革命党还不至于发生重大的弊害。

最可以在革命党中发生重大弊害的，是另一种机会主义，即是说，不注意民众基础的工作，希冀在民众自身的团结与奋斗以外，靠机运或某一个或某一部分人完成革命的心理。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不但每每有具这一种心理的混进革命党里面来，便是原来的老党员，亦每易不知不觉的发生这种心理。

这是于革命前途非常危险的。

在极反动的政治局面之下，有革命要求的人，知道他们在任何方面得不着一点帮助，国内外统治阶级是压迫他们的，一般软弱游移的社会上有地位的分子是容易欺骗危害他们的。要想革命成功，只有死心塌地去走到最下层最受压迫的工人农民中间，很慎重的宣传他们，组织他们，只有他们是推动革命运动的力量。

但是到了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情形便不同了。一部分革命势力甚至于已经占据了“在朝”的地位，从前压迫我们的统治阶级都摇动起来了，他们都有伸过手来典我们谋妥协的倾向，稍为接近权力的革命党员都可以用他们个人或朋友的力量多多少少的影响到政治上面去。于是无穷的幻想便都涌现出来了。

有人说，最好是要求国民政府，即刻实行一切革命的政纲，将全中国痛苦的工人农民都解放了出来。

有人说，现在应当督促国民党中央党部，要他用党的权威，立刻扫荡在国民党势力下各地余剩的反动势力，将他们的三民主义的真精神发扬出来。

有人说，我们须使现在的国民革命的领袖认清他们自己的地位与责任，须使他们能够很稳定的站在革命的立脚点上，而且能够和衷共济以努力为民众的利益奋斗到底。

有人说，还是革命军队的工作重要。我们已经用军队的力量打倒了几省的军阀，我们还要继续用他的力量，打倒这几省的其他反动势力，而且要继续用他的力量，将全国统一在革命势力之下。

有人说，能够在革命政府之下，占据一个政治上的地位，或是与政治上有地位的人好生敷衍交结起来，有时可以利用政治势力，铲除农工的仇敌，实现农工的要求，这亦是很有意

义的。

有人说，各种上层阶级分子，如地主，资本家，绅士，学者，乃至于军阀，官僚，帝国主义，现在都应当分别看待。不要得罪了他们，他们有时亦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自然这些幻想并不是没有一点理由的。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与现在的革命领袖，越能够左倾，便越于革命的前途有很大的便利。革命的军队与政治，越能够注意于努力为革命工作，便越可以给民众许多帮助。对付各种上层阶级分子，越能够老练而善于应付，越能够减少民众势力发展的障碍困难。

但是只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与一般革命领袖，只注意革命的军队与政治上的工作，只敷衍交结各种上层阶级分子，这可以希望完成革命的工作吗？

若不是有伟大普遍的农工组织与力量，若不是农工群众有很明确的觉悟与坚实的团结，怎样能保证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与一般革命领袖左倾？怎样能帮助他们与右的倾向奋斗？而且在万一的时候，怎样能对于他们的右倾行为加以民众的制裁？

除此以外，怎样能影响革命的军队，无政治势力，使他们不能不努力为革命工作？怎样使他们的力量能够很有把握的打倒反动势力？除此以外，又怎样使各种上层阶级分子能够不有时像从前一样悍然不顾一切的反动，使他们不至于在革命潮流稍为低落的时候中途卖掉革命的民众？

机会主义使一般青年不注意民众的基础工作，忘了只有民众自己要求解放的力量是革命运动的根本力量。因此，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人人的眼睛都向上面瞧着，他们都想贡献一部分精力给上面的机关或个人，希望上面的机关或个人好生用他的职权为农工谋解放。他们再不注意下面的农工，以为将精

力消耗在农工运动中，是迂阔的，费力多而成功少的。他们不要“基础”，痴心妄想在空中砌筑楼阁。这种人纵然没有为自己升官发财或不预备艰苦奋斗的心理，然而他们对于革命前途的危险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

革命潮流的高涨，确实可给我们工作上许多便利，使我们作民众的基础工作，比从前少许多困难。但是机会主义者在此时，每每将民众的基础工作反轻轻的丢掉了。

所以我们必须反对机会主义，像反对一切革命的仇敌一样。

根据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的
《中国青年》第一五一期刊印。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一日高涨扩大似一日，工人农民的大群众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而争斗，在许多大城市中罢工运动如潮而起。许多省的农民也起来成立他们的争斗组织，和反动势力的地主劣绅争斗。这些革命势力之兴起，无人能止之。工人群众渐渐组织到战斗的工会之内，冲破了以前地方的行业的界限，成为了强有力的统一势力，以领导全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的争斗。农民群众日益卷入革命漩涡，并且工人阶级领导农民争斗这个事实也就要到来。在此革命高潮中，革命的军队也渐渐接近工人农民及被压迫的民众，虽然其首领有些还在动摇中。

由于革命军之胜利，由于工人农民的争斗，并且由于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之进攻，多数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手工业工人都一天一天革命化了。

这些现象都使帝国主义者及其所雇用的一切反动势力见之发抖！

自前年“五卅”到今年“一三”，是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向中国武装的进攻时期，也就是中国国民剧烈的向帝国主义反抗时期。帝国主义者加紧进攻一次，中国革命的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八六期。

工农及一切民众反抗运动更扩大更加强一次。

五卅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国民运动之真正开始，帝国主义者知道不是哪一国的问题，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帝国主义者联合的以武装势力在上海、在汉口、在广州等处向中国民众进攻。五卅运动，被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势力及他们间接的武装势力即奉直军阀镇压下去。不久同情于国民运动的国民军起来反奉，占领了天津，帝国主义者大起恐慌，他们又知道这不是简单的国奉冲突问题，他们知道民众开始与军事势力结合是革命运动发展的表现，国民军如果占住了北方的第一交通大港——天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北部的统治权力将根本动摇；于是他们第二次一面直接用自己的武装势力出兵满洲，封锁大沽口，炮击大沽炮台，复在辛丑条约国名义之下联合的以哀的美敦书威胁国民军，一面间接的用奉直军阀武装势力以讨赤名义向国民军总攻击。

国民军在京津南口苦战了半年，终于为英日帝国主义所雇用的武装打手奉直联军所败，退出南口；可是同时南方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得广大的民众援助，一直攻下长岳武汉，帝国主义者更是惊慌失措，他们更知道北伐军之目的不是简单的南北战争，并且不是单纯的军事势力，而是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反动势力之一种有力的表现，其胜利结果，将使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全部动摇；于是英日帝国主义者分途力助他们所雇用的武装打手奉直军阀，一面在南方使孙传芳攻打北伐军，一面在北方巩固张作霖、张宗昌的势力。

自孙传芳在九江败退，北伐军进到浙江，一直到最近汉口“一三”事变，一切帝国主义者更惊慌得发狂起来，他们都知道“一三”事变不是汉口民众和英国水手冲突这样的简单的问题，乃表现中国国民革命的势力和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势力

直接的决战时期渐渐接近了。于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在英国帝国主义者领导之下，第三次一面直接用自己的武装势力联合的在长江一带示威（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除原有驻华海陆军外，现又由英国帝国主义的提议，成立四国出兵协定，大派海陆军集中上海。英国已由本国派遣第一舰队及水兵一千、陆军八大队，由印度派遣英兵及印兵两大队到上海；法国则增派舰队及安南兵到上海；美国则令亚细亚舰队全部动员集中上海；日本已从佐世保派遣驱逐舰四艘，又巡洋舰一艘载陆战队到上海），一面复间接命令他们所雇用的打手奉直军阀向北伐军及国民军进攻。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其陆军部最近计划：五十日以内将有英兵二万要集中上海。他比法美日本帝国主义者更露出了凶恶的面孔。

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国民运动的势力进攻，不但用直接的和间接的武装势力硬的方法，而且还用软的方法，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和他们妥协，以打击所谓急进派，根本削弱革命势力，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

我们很明白的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此次联合的向中国国民运动进攻，无论在硬的方面，在软的方面，都比前两次联合进攻凶恶而且阴毒。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历史时期！

他们（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雇用的打手奉直军阀，帝国主义者的好友稳健分子温和派）的胜利，即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

什么是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是：收回海关、矿山、航权、路权为国有，一切帝国主义者无条件完全放弃他们对于中国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统治权力，及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雇用的军阀，解除其武装。这个胜利是全国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利益，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需要这个胜利。可是，这个胜利决不是什

么稳健温和方法能够得到的，只有不断的争斗与牺牲可以得到。有些人提议可以用温和稳健方法向帝国主义者收回权利，不取急进的革命行动，这种反革命的说话分明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消灭中国的国民运动。这是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后，许多稳健分子温和派所试探而失败的旧路，现在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去试探了！

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决定革命运动命运的时期已立在我们的面前了！一方面是国民革命运动之高潮日益增涨，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及其雇用的反动势力联合进攻，很明显的表现出中国革命决胜负的决死战之时期日近一日了！我们须立即准备！在此时期中，我们比以前要有更坚苦的战斗！在此时期中，凡是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必须是枪口向着帝国主义的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必须以革命的行动拥护帮助正在和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争斗的国民政府，扩大巩固我们有组织的力量以拥护帮助国民政府！我们因为拥护帮助国民政府革命的发展与胜利，我们对于反帝国主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所可利用的反动势力（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劣绅土豪等）之争斗，一刻也不能休息！

工人们！集中你们的势力于你们的工会！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统一无产阶级的意志. 统一无产阶级的目的，统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帮助国民政府与国民党！

农民们！起来！集中你们的势力于你们革命的农会！推翻地主劣绅的政权，帮助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创造在农会领导之下的乡村政权！你们的争斗和城市中工人的争斗联结起来！

国民政府的领袖们！大半个中国还是国内外的黑暗反动势力统治着，即国民政府统治之内，外而帝国主义的势力，内而买办官僚地主劣绅土豪，仍在横行，国民革命之成功，还须要你们长期的努力争斗。此时帝国主义及其所雇用的奉直军阀联

合的向革命进攻，更是说明你们需要更广大更有组织的民众为后援；农民对于买办官僚地主劣绅土豪的革命爆发，更是为你们肃清所有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所可利用的反动势力，巩固革命政权，更是你们最有力的后援。民众势力高涨起来，正是你们的敌人所恐怖的事，也是一班稳健分子温和派所恐怖的事，而不是革命政府所恐怖的事。你们若因民众势力之高涨而怀疑，而动摇，而有一点反对工农民众，你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所雇用的军阀，立即可以利用之以反对革命。不离开革命，不离开民众，全世界革命的民众都站在你们这边，你们并不是孤立的，大胆前进！我们应该一致高呼：

一、反对英国帝国主义领导的四国对华出兵协定！打倒帝国主义者对华阴谋！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

二、巩固工人农民革命的军队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联合战线！

三、推翻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

四、解除奉直军阀的武装！

五、肃清全国反动的旧势力！

六、在乡村中城市中省会中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召集革命民众的国民会议统一全中国！

七、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八、中国工农运动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一九二七年初）

以前中国革命发展的程度，未能将他的性质与内容，具体的在国际上表现出来；因此，以前国际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提案，不是抽象的指示一点东方民族运动的一般倾向，便是分析中国眼前较琐屑的事象以及目前一些工作方针。最近（去年十二月），国际第七次大会所议决的中国问题提案，则不然了。自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力量伟大的表现出来，又加以北伐胜利及南方工农运动有了普遍的发展，不但促起国际对于中国问题之注意，并且中国革命运动本身，已经发展到略略可以显示他的性质与前途；因此，此次国际扩大会对于中国问题，抓住了要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撇开一切枝叶问题，大刀阔斧的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质，并且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及整个的中国革命之一贯的方针与战略。

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

---

* 本文和附件原载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决议案》。

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

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划分为毫不衔接的两个时期，将要发生什么毛病呢？通常所谓国民革命，包含着很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义，若死守着这个意义来做国民革命，并且以此自画，对于一切有超过这个意义之必要与可能的企图，都等待将来的下次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再来做。若照这样的方针、这样的战略来做国民革命，那末，我们的革命还在将来，现在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

此次国际扩大会的决议案告诉我们：中国的革命前途，在客观上不会是这样，在主观上更不应该是这样。国际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快崩坏、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开始发生的；他的性质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不是纯粹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成分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而不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因此，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即是不断的努力，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

国际这个提案，不是说现在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国民革命，而立刻就要实现无产阶级

革命；不是说现在的国民革命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性；不是说我们离开国民党，不必继续和他们革命的合作；不是说已经不需要民族的联合战线，而由无产阶级孤军独战；不是说要推翻国民政府，而就要实现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苏维埃；而是说要更扩大更强固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仍旧要和国民党合作——和一部分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仍旧在现有的国民政府政权之下，继续发展国民革命，以达到革命的民主独裁制，将国民革命发展到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以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民族解放到工农解放，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看做整个的中国革命。在这整个的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自不免有先后轻重的现象，而且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的将他划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

在此次国际提案中，自然未曾说将来中国不会有第二次无产阶级的革命，或不需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是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准备还有第二次革命，对于现在的革命遂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自限，一步也不肯超越，一切都等待到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再说，这便是我们过去方针和战略上根本错误。革命是活的，不像演剧和做影戏，必须演完这一幕才能开演那一幕。

这是此次国际中国问题提案的根本方针与战略，这个根本方针与战略决定了，其余若加入国民政府，若采用急进的农民政纲，若注意军事工作，都是相因必至的问题，便不要再加以原则上的讨论了。

* * *

中央政治局已经过详细讨论与辩难之后，接受国际这个提

案；并决定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

各区委、各地委、各特支，接到国际此提案，即须召集负责同志详细报告及讨论，随即分派负责同志到各支部讨论。讨论的重要点，首先决定赞否此次国际提案的根本方针与战略，然后再讨论几个特殊问题：（一）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民主独裁制；（三）和民族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四）农民政纲。这些问题，各级党部讨论的结果，都应有一决议案；每个同志如有疑义或意见，都可写寄党报登载，以便共同讨论。甚至于第五次大会后，仍然要继续讨论。因为国际此提案之执行，影响到我们党的政治生命非常之大，不在乎盲目的一致接受，而是要全党同志都能懂得此提案的全部意义。与其由盲目一致而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不一致而得到实际一致！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

一　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

（一）中国革命是破毁资本主义稳定最有力最重要的原素之一。最近两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受了严重的失败，其结果将影响世界资本主义的恐慌，使之更加剧烈。国民革命军北伐

胜利的结果，实际上扫除了帝国主义在半个中国的统治。

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拥护的广东革命军之往后的胜利，将战胜帝国主义，完成中国之独立及革命的统一。这种统一，必能增加反抗帝国主义影响的力量到许多倍。

孙传芳阻挡广东军队前进的失败，使帝国主义列强相信，利用本地军阀做破坏国民革命的工具的传统方法，现已不能完全适合实际了。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之互相竞争，使他们不能联合而实行公开的武力干涉。帝国主义正在找寻适应现在局面的新方法，这种新的政策，就是趋向于承认广东政府。美国帝国主义将为这个政策的发起者，即英日两国，也以为承认广东政府在政治上是可允许的。然而，这不过是外交手段，其幕后还隐藏着帝国主义者反革命的阴谋毒计。

（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本势力，即实际上垄断全国一切财政与工业（垄断盐税，抵押关税；铁路，航路，交通，矿山，重工业——这些多属于外国资本）。倘若帝国主义能够保持这个坚实的基础，帝国主义将在中国获得稳定资本主义的柱石。中国人口之多，使中国成为无尽藏的市场。倘使有投资所必需的政治保障时，中国是投资最有利的场所。巨量的中国原料贮藏，简直没有动过。所以，帝国主义将用拼命的力量，打破那有推倒帝国主义的危险之中国革命。倘若用引起内战的传统方法，或用可能的武力干涉的方法，都不足以消灭革命，则帝国主义将分裂那循着革命道路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

虽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互有冲突，但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外国的干涉，在中国有特别的方式。在现在情形之下，帝国主义者宁取组织内战和接济反革命军队以压迫革命的干涉形式。现在，帝国主义正企图联合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军队，以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前进。这种反革命的联合战线，必在帝国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且得帝国主义的帮助的，这

是很明显的事。中国革命的胜利，给帝国主义者以如此重大的打击，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用尽方法来消灭他。

（三）从中国革命的外面情形的观点上来看，因其有反帝国主义性质，故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利于中国革命之发展及其深入的几个重要情形：

甲、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互相竞争，软弱了国际帝国主义的阵势。

乙、世界资本主义的恐慌。

丙、西欧无产阶级运动之发达。武装的干涉中国，必遭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反对。

丁、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之发展，且因中国革命进展的影响而更剧烈。

戊、苏联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存在，它在地理上又与中国很接近；中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军事政治等重要中心，在地理上却相离较远。

二　中国革命之社会力量及其结合

（四）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非常迅速，参加这个革命运动的各种社会势力之结合方式也很迅速的（并行的）起变化的过程。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于很特殊的环境中，故其现状，较之十九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都不相同。

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另一个特点，表示中国革命异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的，即中国革命发生于世界革命的时期，而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运动中之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一个要素，是决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及参加革命的社会力量之结合的。

中国革命中阶级力量的发展，是在非常落后的中国经济背景里。其原因则为工业资本主义低度之发展，农业经济尚用原始技术，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程度奇特的低微，以及许多半封建制度的残留等。这种半封建制度的余迹，正在被革命军的压力所破坏，而引起城乡劳动群众的斗争。

现时中国经济情形的主要特点，就是中国经济的成分，可比杂色的荷包，从财政资本以至宗法祠族制度的经济关系之余迹，都时时存在，其中占优势的，乃是各种形式的商业资本，及城乡的小手工业和小工业。

这就使中国民众之阶级分化不明显，并使国民革命中之社会政治力量的组织程度不甚高。

同样，亦有重要意义的，即从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中央政府机关的崩败，在近几年日益加甚；国内大部分土地都成为中国军阀之军事政治组织的统治。

中国军阀，代表一种社会政治的力量，现在统治了一大部分的中国。中国军阀之特质，就是他虽系武装组织，而同时他利用半封建性的整个国家制度，而成为中国之资本最初积累的分子之一。中国军阀的国家组织之存在，建筑在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地域的闭塞，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乡村有很多的人口过剩等原因之上。

现时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着重在土地革命之上。中国的乡村经济，就是一幅图画：许多半封建的经济关系之余迹与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原素，互相密切地交缠着。

中国一般经济之非常落后，又细小又分散的土地私有制，很多数量的农民是佃农与半佃农，大小农业经济都用原始技术，多量的农民人口的过剩，同时，农产贸易之发展，以及乡村中阶级分化的进程，如此，愈使乡间情形，更为复杂，形成中国土地革命路上的许多障碍。

中国乡村间的阶级争斗，因客观环境的关系，其发展有以下的倾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军阀，反对大地主的残余，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商业重利的资本，以及部分的反对富农领袖。

（五）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之连续的阶段，可以各种社会力量的改变结合以证之。在第一个阶段里，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力之一，他们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找助手。

第二阶段，革命运动的性质改变了——他的社会基础，亦转变到另一方面的阶级的结合。争斗的方式，发展得更新而更革命。工人阶级在中国斗争场上出现，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原素。

经济罢工发展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于是有世界的历史的重要意义。无产阶级和农民（他们很积极为自己利益而奋斗），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等相结合，这类力量的结合，在政治上的表现，适合国民党和广东政府中所有的结合。现在，革命运动已到了第三阶段之门，正是阶级的新结合之前夜。在这阶段里，发展运动的主动力，将是一个更有革命性的结合——无产阶级、农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结合，而离开一大部分大资产阶级。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整个的资产阶级将要离开民族解放争斗的战场，因为除中小资产阶级以外，甚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某时期里，将和革命同道。

可是，在这个阶段中，革命运动的领袖权（Hegemony），将日渐落在无产阶级身上。

在此时期，是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至新的革命局面，大资产阶级看见反帝国主义战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超过了他的控制，客观上危害他的阶级利益。于是他（大资产阶级）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以达破坏革命之目的。他谋影响革

命运动，以资产阶级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反对阶级斗争的思想。

（六）反革命力量之形成，与革命的阶级力量之结合，同时并进的。这个反革命团结之进程，与帝国主义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并受其影响的；犹之中国革命势力之发展，是与世界革命（苏联与西方无产阶级）有密切关系，并受其影响的一样。

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企图联合他们的力量，以压制胜利的革命运动。这个反革命的团结，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帮助而造成的。大工业资产阶级表现日益动摇，倾向与外国资本协调，而承认其统治。帝国主义看见军阀不能作消灭革命运动的有效工具，于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势力中，找寻他的同盟者。帝国主义者，企图叫醒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战线。并为使民族运动内增加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势力起见，于是那些迄今还站在民族革命斗争之外，或甚至仇视革命的某部分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开始转变到国民政府方面。这种举动的目的，是从革命的联合（无产阶级、农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手中，夺取革命领导权，以阻碍革命的发展。这些反革命举动的主谋者，便是国际帝国主义。

在这过渡时期，历史上必然的，大资产阶级必定日渐离开革命，当此时际，无产阶级应该很广泛的利用现时在事实上还作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的各种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在策略上利用离开革命的各种资产阶级间的冲突，犹如利用各帝国主义间的一切冲突一样；但是决不要忘记无产阶级的主要目的，而要在利用敌人的各种冲突之时，使战术上的应付和策略上的步骤，都能一贯的奔赴这些主要目的。

三 中国革命的前途

（七）从敌我两方的阶级结合的观点上来看，中国革命的前途非常清楚。虽然中国革命发展之现在阶段，从历史上说，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他必然要带着广泛的社会运动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造成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的革命的进程，是在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斗争之一部分。革命国家的结构，将视其阶级基础而定。这个革命国家，不会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权国家，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国家。他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

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革命的前途。否则，倘若资产阶级胜过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则中国实际统治权又将落入在外国帝国主义之手，虽然，这个统治或者是另一新方式的。

（八）中国革命往后的发展及革命之前途：第一须看无产阶级的作用。最近两年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组织斗争的民族革命的战线。只有在无产阶级统率之下，反对外国资本统治的斗争才能胜利。这是决定中国革命的策略的根本原则。

操有中国大部分地域的政权的封建军阀，是代表反动势力，且是帝国主义的经纪人。本地资产阶级，若看作一阶级，则其发展比较少，且幼稚。经济比较强有力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财政资产阶级与买办）在商业上财政上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非常密切，从未参加各种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工业资产阶级曾和民族革命运动同道，至今他还带着纯粹的资产阶级德谟克

拉西的性质。可是在革命初起时，他就要避开或怠工了。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在中国是革命的群众。他们从前演过重要的作用，此后也将如此。但他们不能独立行动的。他们必须或者依靠资产阶级或者依靠无产阶级。当资产阶级离开革命，或进而反对革命时，则被剥削的中等阶级，便将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影响之下。这种情形之下，中国革命在现时阶段中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合，并且在这一联合之中，无产阶级是统率的动力。

四　国民革命与农民

（九）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张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哪个阶级能够毅然攫住这个问题而给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中国现在的环境，只有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唯一的阶级。彻底的土地政策之实行，乃是反帝国主义胜利及革命往前发展的先决条件。

中国军阀的势力，一方面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另方面则靠本地地主阶级的奥援。军阀的统治，建筑在奴隶式的半封建制度之上——军阀官僚的政府机关、地主、劣绅、商业重利资本等的压迫和剥削几万万农民。发生这种制度的原因，因为那些无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他们不得不去受地主及重利盘剥商人等的奴隶待遇，及为城市和军阀供给几百万苦力和士兵。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消灭一切封建社会关系之残余，解放中国民族，国内社会关系之革命的改革，这些事都相互联接着，成为中国革命的整个的责任。

要完全推倒军阀，人口大部分之农民的经济与政治斗争，

必须使之发展，成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以为加紧乡村间的阶级斗争，可以削弱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顾虑，是不对的。过去国民二军之败，并不是反革命力强大，乃为不满意的农民暴动所打败。可见现在摆着这个危险。不去勇敢地接近土地问题，以拥护农民群众客观的一切政治与经济要求，这才是革命的大危机。如果因为犹豫，且误给资本家一阶级单独协作，而怕把革命的土地问题放在民族解放运动政纲的主位上，那便是错误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共产党必须免去这个错误。

（十）现在情况的特质，就是过渡性，此时无产阶级应当选择他自己的将来：或与大部分资产阶级联合，或与农民强固其同盟。倘使无产阶级不能提出农村政纲就不能把农民拉进革命争斗，而失去他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如此则直接或间接在帝国主义影响之下的资产阶级，必将重新起领导的作用。假使这个可能性，在现在情形之下实现，就是加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地位——使帝国主义的稳定。

如果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和农村革命合而为一，则广东国民政府将来不能保持政权，革命将来不能进展至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乡村阶级分化的增长，加紧了农民群众与剥削阶级间之争斗。共产党必须十分注意乡间的阶级分化，及从此而起的剧烈斗争；共产党应为农民运动的指导者，并提出相当的政治经济口号，以助农民运动之发展。

（十一）中国共产党应当承认“土地国有”为无产阶级的农村政纲之基本要求，但在现时，必需按照中国各地的特殊经济政治情形而分别的应用农村策略。

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当努力赞助推倒乡间的劣绅土豪的官僚政权，以革命政府之下级机关代替旧的半封建的官僚政权。这种乡间的革命政权，须是能执行革

命政府的命令，及拥护大多数农民利益的。农民应当参加县政权机关之创造。

在国民党政府管理下的境界内，农村革命的政纲，须有具体的方式。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必须立刻实行下列办法，使农民到革命方面来：

甲、减租至最低限度。

乙、除去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名义的杂税，而代以划一的农业累进税。

丙、对于大多数农民群众所负担的税额，须为之作最高度的整饰和减少。

丁、没收属于反动军阀的寺院地产，及对国民政府作战的买办、地主、劣绅等之土地。

戊、担保佃农永久租借他所耕种的土地，并由农民协会与革命政权的代表决定最高限度的地租。

已、广东政府必须竭力拥护农民的利益，特别保障农民，使不受地主劣绅重利盘剥者的压迫与束缚。

庚、解散民团和其他种种地主的武装队伍。

辛、武装贫农和中农，使乡间一切武装力量，服从革命政府。

壬、政府给与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在内——以最高度的帮助。

癸、组织国家低息借钱的机关，坚决的反对重利盘剥，并帮助这一类的农民组织及其他互助组织。

子、国家帮助协作社及互助机关。

（十二）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广东政府实行上列的办法，亦即是使农村革命进到更发展的阶段的过渡办法。实行这个极重要的任务，必须建设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委员会。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委员会必能获得实行上述各种要求

所必需的威信和力量，并能加紧斗争，提出更彻底的要求。农民委员会就是国民政府与国民军在农村的基础。

在仍被反动军阀所管理和统治的地方，共产党的任务须领导农民作反对封建制度、军阀及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些地方革命的最正确的工作，是使反对军队解体。共产党要利用一切自然发生的农民组织，如红枪会等，须在其中巩固党的影响。

（十三）农民对革命的态度，大都因革命军的行为与表现而决定的。由革命军表现的好坏，农民判断新政权的性质。所以农民对新政权的态度，决定于革命军自己的行动，决定于革命军对农民与对地主的态度，决定于革命军准备帮助农民与否等等。固然，革命军到处受农民热烈的欢迎。但这个热烈程度，不久时间即冷淡，这也是事实。长期的困难的军事行动之要求，在农民身上增重了新负担。倘使领导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与其他革命分子，能够应用正确的彻底的农村政策，去补偿农民暂时的新负担，则农民必将继续热烈的帮助革命军。革命军可比农村革命之导旗，须在农民群众中种根基。

五　共产党与国民党

（十四）获得影响于农民群众的必要，也能决定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及广东政府的关系。国民革命政府的机关，是接近农民很实际的道路。故共产党必须利用这机关。在新得解放的省份里，必将建设如广东政府的国家机关，共产党及其革命同盟者的任务，是加入新政府的机关，使国民革命的农村政纲有实际的表现。这就是利用国家机关，以没收土地，减税，并给农民委员会以实力，如此，在革命政纲的基础上，逐渐进行改良。

（十五）根据上述的及其他许多同样重要的理由，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为着加紧共产党在国民党里的活动，以推进革命运动往前发展起见，共产党应当加入广东政府。自从广东政府成立以来，其实权操在国民党右派之手（六部长中五个是右派）。虽然事实上广东政府若没有工人阶级的拥护不能存在，而工农运动，即在广东省，亦尚须战胜种种阻碍。最近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应当加入广东政府，以帮助左派反对右派之懦弱而动摇的政策。广东政府辖地之广大的伸张，使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比任何时更成为必要。

（十六）中国共产党应使国民党发展成为真正平民的政党——包含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经纪人的被压迫者等之坚实的革命联盟。因此共产党必需照以下几点行动：

甲、有系统的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右派及戴季陶思想，反对他们想把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企图。

乙、形成左派，而与之亲密合作，并不企图以共产党分子代替左派之领导工作。

丙、彻底的批评在左派右派之间摇动、在继续革命或和帝国主义妥协之间摇动的中派。

六　中国革命的责任及革命政府的性质

（十七）列宁曾说：“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时期以前，是总的民权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现在，苏维埃革命已在俄国胜利，世界革命时代已经开始，民族革命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分。”

中国革命之党纲及由此而产生的革命国家的结构，应从这个总意来决定。阶级分化的过程，即随有革命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个总意。广东政府虽然是资产阶级民权性的，但究其根基和客观上，则包含有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等联合的民权独裁制之萌芽。小资产阶级民权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是革命的，因为他是反帝国主义的。广东政府之所以是革命的，第一亦应有此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为中国的革命及由革命而产生的革命政府，第一均是反帝国主义的，故必须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之根基。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尚不足削弱帝国主义之地位。必须从经济上打击帝国主义势力的基础。这个意思，就是革命政府应当逐渐没收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界、工厂、矿山、银行、企业等。如此做法，才能即刻扩充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狭路，而走入到革命独裁的过渡阶段。

因此，以为这个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小资产阶级性的，故中国革命的目前任务，仅限于（一）推翻帝国主义，（二）消灭封建余孽，这是错误的。中国革命若不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不能推倒帝国主义的。在现有条件之下，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指挥之下，消灭封建余孽的运动，必须变为领导农村革命。为了这些特点，中国革命的责任：

甲、铁路与水上交通之国有。

乙、没收外国租借地性质的大企业、银行、矿山等。

丙、由革命政府实行彻底的急进的农村改良政策，以实现土地国有。

七　共产党与无产阶级

（十八）要在革命中占领导的地位，无产阶级必需坚强其

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组织。共产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使他能尽这个历史使命。中国无产阶级数量之少及其幼稚，须以有组织的力量及明确的思想补偿之。

共产党的基础，是现在代表几十万产业工人的全国总工会与铁路总工会及海员总工会。共产党最紧急的任务，是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以强固这些组织。在二年来之国民革命争斗中，工人阶级开展了很大的力量。在实际争斗里，他已获得革命运动的领导。在这些经验及成绩的基础上，工人阶级的组织，应当按照下列各项，以求更强固发展：

甲、创造群众的产业工会，以产业为基础联合一切工会，强固全国总工会；

乙、加紧群众的工作，巩固工会上级指导机关与中国工人群众的关系；职工联合会之中，吸收手工业工人，小企业工人以及文化教育工人等；

丙、更加注意工人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应当变为政治斗争；规划罢工运动的策略，组织互助和罢工基金；帮助和创造协作社等；

丁、作反对改良主义的方法之斗争，以加紧工人群众中的教育工作；

戊、加紧中国职工运动与世界职工运动的关系，对于远东各国的职工运动，特别须密切连络。

（十九）为吸引工人阶级群众到运动里来，并加强他在革命中的地位起见，中国共产党应当宣传下列的要求之实行：

甲、革命的工农组织的活动完全自由。工会公开。颁布最进步的工会法。承认罢工权。

乙、劳工法。八小时制；每星期休息一天；规定最低工资。

丙、社会法。卫生监督及劳动条件，卫生及劳动条件之监

查；改良住房；疾病，衰老，残废，失业等的保险。保护女工童工。禁止女工夜作。禁止雇用十四岁以下儿童做工。

丁、创立监查工厂的机关。

戊、取消罚金及肉刑制度。

已、撤退工厂里各种驻兵及警察等。

庚、救济失业；扩大工会在失业者中的影响；工会中设工人职业介绍所。

（二十）在革命的现在的阶段中，尚有一个很大的后备队，尚未完全利用他们的革命力量，这就是**被帝国主义破产的城市手工业工人群众**，他们是**反对外国资本的**。代表无产阶级先锋的共产党，必须组织并吸引这些群众，使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总潮流。并且共产党应为这些分子获得下列几点：

甲、减轻租税；

乙、组织手工业工会；

丙、组织劳动协作社。

八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责任

（二十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它有领袖，它锻炼出中坚分子，它领导群众。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已经有很广阔的范围及稳固的组织形式。最近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大进了一步，扩充了许多党员，且多为工人分子。

共产党的农人分子不多，但共产党在农民中，现在已经有继续不断的且增涨的工作。

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即是扩大、加紧、改进并增强党内的教育训练工作。

党做了许多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近来增加了数量，并在好多种工作中，亦很活动。青年是中国革命的大的力量。革命的学生，青年工农，倘使他们在共产党的思想和政策影响之下，很能成为促进革命的一种力量。没有人比青年更深切感觉受帝国主义之压迫，也没有人更激烈的知道必须和这些压迫战斗。这些环境，中国共产党应充分注意，应该促起共产党增加对青年中的工作。

党的基本工作之一，是争得党的公开存在。

（二十二）应当发展新党员，应特别注意工业区域。对于新党员的工作：或组织短期训练班，关于党纲和策略问题的专门谈话，使他们参加相当的支部练习日常工作，经过支部，而参加党的一切工作。

党的组织，从中央至工厂支部或街市支部，必须很坚决的实行党的集体指导。往后还须加紧努力，吸引较好的工人同志，使做党的指挥工作。强固和增加党的中坚分子，还是很重要的工作。对于支部书记，群众机关党团的领导者，及省区委员等中坚分子，要特别注意造就和训练。中央与区委要有经常的特派巡行员，这人可以从各地方最好的工作者之中选出来。

为做乡村的工作起见，巡行组织员，也须特别造就。

使党的低级组织，支部及党员大会等，增加活动与独立性。

巩固党团，特别是工会的，农民协会指导机关的及国民党等的，一定要使之加强。对于党团的工作，党须有系统的坚定的指导。

九　帝国主义国内共产党的任务

（二十三）在帝国主义国内的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是用一切方法以拥护中国革命。拥护中国革命的运动要用下面的方式举行：

甲、反对武力干涉中国的煽动。对无产阶级群众解释外国武力干涉中国的危机。帝国主义在中国鼓动内战和给与军阀以经济与武备的帮助之事实，应该揭破。

乙、要求外国海陆军从中国撤退。

丙、在驻华外国海陆军中宣传。

丁、鼓煽立即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国真正的国民政府。

这些要求要在各种集会和反对侵略的示威运动中提出，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与无党者，也要拉他们加入这个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全国工人们及革命的民众们！

全中国工人阶级不避牺牲，率先和黑暗势力奋斗，不只一次了，此次上海工人反抗孙传芳的总罢工，也是这样。

此次上海工人总罢工五日，不但说明了工人阶级的集体势力，并且表现出工人阶级为全民族利益、为全上海市民自由而不畏艰难、不避牺牲、奋勇先进的精神，而且证明了国民革命军是有广大的民众同情与援助，不像军阀只有孤立的横暴武力。所以此次上海的总罢工，在中国革命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最近聚集兵力于上海，在上海各马路列队游行示威，如入无人之境，并且简直是对于国民政府武装谈判。直系军阀余孽孙传芳，因在浙江兵败，犹拟在上海勾结英国作困兽之斗，摧残工会，大捕工人，压迫舆论，甚至勾结帝国主义者在租界逮捕国民主义的新闻记者与商人。全上海的市民，对于这样残暴的统治者——帝国主义的英国及直系军阀孙传芳，无不切齿愤怒，革命阶级的工人群众，已至忍无可忍地位，怎能不不计成败利钝而起来宣告总罢工，以表示对于内外黑暗势力之反抗！

在总罢工五日中，工人学生及其他市民的热血，点点滴滴的洒遍了上海南北市，横在街路上的烈士血尸，到处都可以看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八九期。

见，许多烈士的头颅都挂在电杆上。全上海市民们！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孙传芳的刽子手李宝章之残暴，我们也不能忘记国民党右派（即西山会议派所号召的什么国民本党）教唆李宝章放手屠杀工人及革命民众之狠毒！将来应该再没有人能够拿任何理由反对革命的工人与市民，“以革命的恐怖回答反革命的恐怖”！

全国工人们！全上海的工人们！此次上海的总罢工流血争斗，只是你们全部罢工流血争斗史中之一页，前途正复辽远。即以上海一隅而论，乃各帝国主义者最后根据地，亦即彼等最后奋斗地，同时也是奉直军阀死力争得海关附税和鸦片收入之目的地。这两种内外黑暗势力复相互勾结起来对付革命的民众，以保持彼等在上海之统治地位：李宝章未走，鲁军的毕庶澄又来了；各国海军，也已经公然联合行动，干涉中国海军对于军阀之表示反抗了，各国陆军也侵入华界了；全上海的工人，全上海革命的市民，必须有不断的巨大努力与牺牲，才能够获得最后胜利。

此次总罢工之复工，诚如总工会复工宣言所说“非因退让而复工，乃为准备更大的争斗而复工。”换句话说，即是以宣告复工而开始另一新的形式之争斗，求得最后胜利之争斗。

全上海市民们！工人是革命的市民中最急进的先锋，你们须继续与这最急进的先锋携着手前进。这最急进的先锋，不但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而且是为全市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每个革命的市民，都不可因为国民党右派的造谣而摇动自己的革命意志，而离散革命势力之联合，右派们一向是站在帝国主义及军阀那边而企图离散革命势力的。

全上海革命的市民，应该在上海市民公会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立刻全体动员，

反抗孙传芳的刽子手李宝章！

反抗直鲁联军南下！

反抗外国海陆军和军阀联防干涉中国革命。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则中国的武装市民及将来的北伐军必进入租界，“以武力回答武力”！

工人及一切革命的市民起来夺取武装，响应北伐军，拥护国民政府！

由市民公会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实现国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会议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二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节选）*

（一九二七年二月）

瞿　秋　白

第三章　谁能领导革命？

——中国革命之战术问题

中国革命即使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也非由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不能胜利，因为他根本是农地革命；何况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一部分，革中国地主阶级的命，就等于革世界资产阶级的命，因为中国地主阶级（军阀、官僚买办）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然而中国革命的对外关系里，含着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之意义，因此，中国革命之中确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之可能，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也需要关税自主，需要取消治外法权，需要收回租界。不但如此，民族资产阶级并且要力争革命之领袖权，尤其是最近，从五卅运动经过三月二十日直到现在这一斗争看得非常清楚。民族资产阶级要争这革命领袖权做什么用处呢？他要争得这领袖权，以造成他和帝国主义及地主阶级妥协之资格；民族资产阶级要领袖革命而停止革命，遏制劳动平民的猛烈彻底的革命运动；他停止革命的方法并非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方法一样的——地主买办阶级完全

* 本文写于中共五大召开以前，全文共五章，这里节选第三至五章。

站在帝国主义方面镇压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却要和帝国主义协商改良中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独立国家，就可以领导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所谓“剥夺无产阶级包办反帝国主义运动之权”。中国资产阶级想着：如果帝国主义“以平等待我”，则仍不失为“友邦”；此种政策的结果，是将“独立的中国”仍旧送给世界帝国主义控制，那时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本是非常薄弱，不得不仰望“友邦”的恩惠，而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美国，将要换一种“和平的方式”来侵略中国：表面上中国是独立了，关税自主了，租界取消了，实际上，帝国主义可以投资于中国境内的实业交通，继续支配中国的一切经济最高权，而中国的资本家，中国的经济，完全在这新式侵略之下，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的附庸。那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代替现在的官僚地主阶级“军阀”做帝国主义的“政治买办”——中国革命实际上就要完全失败，世界革命亦要大受打击，因为那时中国将在帝国主义支配之下走上纯粹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就此可以相当的巩固世界资本主义之稳定。

所以现在中国的革命有两个可能的前途：第一，是资产阶级取得领袖权，而使中国的革命毁于民族改良主义之手，其结果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仍旧受帝国主义的支配；第二，是无产阶级取得领袖权，而使中国的革命彻底的实行民族民权的职任，其结果可以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与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结合经济的联盟，继续反抗帝国主义之一切种种侵略，一直到完全推翻他。

第一个前途是否是可能的呢？我们实际上早已答复了这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正确的真正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这是可能的。何以故呢？第一，中国国内市场日益扩大，商业资本在城乡间的发展，客观上还有上升的趋势，自然能发生并扩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第二，五卅运动以来，劳动平民尤

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之巨潮，使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日益形成起来；民族改良主义已经屡次在事实上表现出来，如戴季陶主义的发见，虞和德派的《中国公论报》之“左倾”，都是企图夺取革命领袖权以达破坏革命之目的。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如果革命一直如此发展下去，必然危害他们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要“左倾”，要“积极起来”，要号召“纯粹孙文主义信徒站起来”。第三，帝国主义受革命之攻击，也觉得纯粹凶暴的方法，指使辅助买办地主阶级实行反革命战争的方法，不能消灭中国革命，所以想同时用一种“民族改良政策”——表面上的让步政策，以协助资产阶级之民族改良主义取得革命领袖权（如五卅以来之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租界华董问题，最近之交还租界“自动”放弃特权的通牒，赞助国民党稳健派之外国舆论等）。不但如此，帝国主义还想在经济上生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例如英国看见武汉国民政府有没收外国人大企业的主张，他就提议将开滦煤矿的股票大部分卖给中国人，用这一点小赂，驱使生造出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之神圣而战。第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国民党新右派，正在竭力夺取国民革命军之指导权，而且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在他指导之下；中国环境之下，失地的农民所组织的军队，在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军事式的政治与农民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农民运动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行动之辅助，而农民群众又要求武装自卫及政府军队之保护；如果国民革命军在民族资产阶级之手，则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已经有一半的领导权。

这种形势之下，革命领袖权是否像彭述之所说“天然”在工人阶级之手呢？当然不是的。要工人阶级能争得革命的领袖权，必须工人阶级的政党主观上有正确的战术。然而彭述之的战术是怎样的呢？第一，他力说民族资产阶级“几等于零”，

甚至于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似有实无的“鬼”。第二，他说现时领导革命的是官僚买办阶级（国民党新右派）。第三，他两次说革命前途是比较悲观的（一次在一九二六年二月某某某参加之中央的北京特别会议，一次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初政治局讨论国际议案的会议），北方区委也认为北伐的革命战争将完成国民革命之主张，是“革命躁进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军胜利，买办阶级就混入政府，戴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革命军败退，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便要消灭。”所以照他们的观点，北伐的胜利仿佛亦天然是戴着民族资产阶级假面具的买办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是天然不能胜利的。第四，所以要等北伐军胜利后，再来（如同俄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一样）实行他的“永续革命”。这四层意思合并起来便成为彭述之式的战术：“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只有无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这已经是彭述之自己口头上的修改，三年前他书面上都公开的说‘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但是中国并无民族资产阶级，而只有买办阶级；买办阶级是只能霸占国民革命军的军权，而不能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因此，革命领导权仍旧客观上已经在工人阶级之手。于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现在只要利用一切‘商民’攻击买办阶级的国民党新右派（军政），这就算‘领导国民革命到底’；然而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北伐之胜利，不是革命之胜利，所以另一方面要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永续革命’。那时，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然而然会服从中国工人之纯粹社会主义的政府。”这是何等模糊混淆的观念！这种战术是翻译托洛茨基主义到中国环境里来的很坏的译稿。中国的彭述之主义，比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更坏，更明显的是孟塞维克主义的一种幻化。这有一件最切近的事实为证。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北伐军已近杭州，彭述之的政策是利用上海大商人抵制国民党新右派的军队势力，要在北伐军未到上

海之前，使上海工人和大资本家协商定了“民治”主张，去抵制将到上海之北伐军的“军权”，因为他认为国民党新右派军人是代表买办阶级的，而上海某大商人是代表些须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所以应当利用他们之间的冲突。关于上海的工人群众尚且没有说到，至于大多数上海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他更没有谈起。这样，可见彭述之主义的实际应用，完全是孟塞维克的战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以实行他所谓“引导国民革命到底”，自然是抛弃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军，甚至于抛弃工人群众。这种战术如果完全施行，就等于双手拱送革命领袖权于资产阶级——随后上海革命潮流之中，彭述之虽然形式上已经反对上海中立自治的主张，但是他的战术上之根本原则仍旧存在，仍旧影响党的政策，以至于发生严重的错误。

彭述之战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的根本“理论”。他的根本理论是：（一）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及其势力，因而忽略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既然只有买办阶级，则反对新右派自然亦以反对买办阶级的方法反对之。因为买办阶级根本上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所以彭述之的反对新右派，自然而然只知道痛骂买办阶级，不知道指出虞和德一类的民族改良主义对于革命的危险。（二）他看着革命高涨时买办分子之加入革命队伍，戴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是无足重轻的，他仿佛认为这就等于买办阶级（代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治者阶级）加入了革命队伍——于是他的反对新右派，便不是反对新右派的改良主义（所谓“假面具”），而只是反对他们的买办出身（彭述之在《向导》第一九〇期——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篇文章里，侧重于指出某人某人是买办出身，而并未指出“右倾”妥协对于革命的危险），殊不知道新右派的危险不在于他的买办出身，而在于他的妥协主义，因为妥协主义确能一时的领导小资产阶级。（三）于是彭述之认为

北方政府在买办阶级之手，南方政府亦在买办阶级之手；要反对这种买办阶级的军事专政，无须乎用很大的力量去吸引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因为他们“客观上”、“天然”、“绝对”或“很容易”跟着工人阶级走），要反对买办阶级的军事专政，只须联络大资产阶级的首领好了；于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战术便形成了。（四）但是彭述之自己也觉得这种战术不能战胜；“北伐已经成了事实”，买办阶级的军事势力又很大；我们虽然在未成事实之先，应当反对北伐，主张等三万万中国农民中之大多数受了宣传，组织起来，然后再实行“民众的武装暴动”（参看《向导》——一九二六年八月——第一七〇期彭述之《我们的北伐观》）；然而北伐既成事实，我们未便再行反对（北方区去年七月论北伐的信），那么，怎样办呢？——“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永续革命”罢！请问这是不是自欺欺人的口号！总之彭述之虽然口头上高叫“革命领导权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实际上却是双手拱送领导权于资产阶级；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实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可是和“鬼”联合，其势便会失去“人”的联盟——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因为在现今革命潮高涨的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各派，都有确定的妥协主义的倾向，如果无产阶级还不决然准备和他破裂联合战线，那就势必至于不敢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勇猛前进——无产阶级政党自己要走上孟塞维克的道路，失去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于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其结果是资产阶级得到领导革命之更多的可能！

中国革命中布尔塞维克的战术，不应当是如此的。中国革

命之中，照我们上述的许多分析：（一）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革命的，并且企图完全夺取革命之领袖权；买办地主阶级里的分子，如联省自治派等，亦会搀入革命队伍，但是他们不得不戴起民族资产阶级的假面具，这正是民族资产阶级有力量的一个原因；至于官僚买办阶级是决不会来做革命的领袖的。（二）店东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比民族资产阶级要“左”些，但是他是非常动摇的，有时会做民族资产阶级的附庸。（三）工匠小资产阶级及城市贫民，是参加革命的，他们甚至于反对店东小资产阶级，可是，他们的行会旧习使他们只看见小团体的利益，不能有独立的政治行动，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必须无产阶级之领导。（四）农民——其中雇农、佃农是最彻底革命的分子，一般小农也极端需要推翻官僚买办阶级之统治；失地的农民——兵士与土匪客观上更是需要土地问题和生计问题之特殊形式的解决。（五）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在革命战争中与一般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实际上处于先锋的地位，只有他能彻底实行中国革命中之民族主义的及民权主义的职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并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这些革命力量之中，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愿意资产阶级式的民权革命彻底胜利的，何况这一革命带着些社会主义的性质？民族资产阶级只愿意有利于自己的“民族改良”，他只想和帝国主义及买办地主阶级妥协，而牺牲工人和农民等阶级的利益。所以除无产阶级自身而外，只有中国农民（及兵士）是革命里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因为只有他们的民权主义的要求，是可以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结合的；此外，便是工匠小资产阶级。其余的阶级，到了革命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必然要倾向于妥协，甚至于反动。现在，这种倾向已经暴露出来。如果我们看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认为简直是买办阶级的代表，而不惜抛弃小资产阶级农民的群

众，竟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联合，以反抗其右翼，那么，这种战术计划是根本错误的（何况这所谓左右是很可疑很不确定的）。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必定不能彻底的反对整个儿的民族改良主义，我们便不能不抑低工人、手工业者的革命行动，以保持“联合战线之天经地义”——而实际上革命现在的职任，非仅反对买办，而是要推翻买办，同时已进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阶段。我们在策略上当然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各派之间的冲突（甚至于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的），但是策略尤须适应总的战术计划；如果总的战术计划上实际是采取“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以反抗所谓买办阶级的新右派，那么，策略上无论如何运用得好，其结果，终不免于扶助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总之我们中国布尔塞维克的战术计划，应当指定“劳动等被压迫阶级之革命民权独裁制”为政治上的目的，其内容便是：

无产阶级与农民工匠联盟作为进攻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主力军，同时决不可以忽视民族资产阶级及店东小资产阶级，而要认清店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中的中立势力，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终究是要妥协改良而出卖革命的；必须努力取得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于城市贫民及兵士，不断的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妥协主义的影响，隔离民族资产阶级而使之孤立。如此无产阶级方能争得革命的领袖权。

第四章　如何去争领导？

——中国革命中之策略问题

中国革命的战术计划既然是如此，再进一步，便须适合具体的历史形势，运用革命的策略。革命策略之运用，不论是退

PDG

守，是进攻，是部分的妥协让步，是勇猛的下总攻击令，总应当以战术计划为标准。策略上暂时的让步固然有时是必须的，但是这种让步是为着要更有利于总的推翻治者阶级的进攻，是为着非此不能争取群众——就是要利于在当时进行宣传组织群众之总斗争（而且这所谓宣传及组织，同时指着党的政治行为——“策略”而说，并不限于机械的文字口头宣传及支部、工会、农会之征求会员或党员；譬如党宣称加入国民党或赞助北伐，单是这种事实的本身，已经有组织群众于某一革命行动方向之意义）。

*　　　*　　　*

中国革命到了“五卅”之后，已经开始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现今的北伐的革命战争事实上是五卅运动之直接继续，从群众的反抗示威，抵货罢工，进一步而至于更高的斗争形式——武装的革命战争。工农群众已经要在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更加扩大自己的组织力与团结力，使中国革命勇猛前进，向着与帝国主义和治者阶级决一死战的时机方面去。决不可以像彭述之那样，以为北伐是部分的军阀混战，“真正的”革命还待“三万万农民”大多数组织起来再说，或者以为北伐是吴佩孚讨赤所逼迫出来的不得已的防御战（见其《我们的北伐观》，《向导》第一七〇期）。实际上，五卅运动的一九二五年，中国的革命不但相对的进了新的阶段，并且，开始从远东方面摇动世界资本主义之稳定；等到北伐的革命战争进占了长江，革命的发展就已经日益接近决死的斗争，他负着掀起世界革命之第二次巨潮的责任——继续俄国的十月革命。而且中国的革命方式，融合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由劳农之民权独裁制直达社会主义独裁制的新方式，将要是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群众革命创制，可以成为世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范式（就是革命战争的军事行动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农民革

命的特征，因为尤其是殖民地的农民群众，客观上不能等待彭述之去教他们“科学的革命方法”——先宣传后组织等等，他们需要革命政权自上而下的赞助其自下而上的行动）。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单就国内而论，我们可以看见：（一）绝对大多数的民众在“五卅”之后与帝国主义及治者阶级决然的破裂——反帝国主义军阀的口号已经成为数千万群众的口号；（二）国民政府的北伐已经征取了半个中国，他已经不但是革命的根据地，而且更加成了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中心，已经组成政府形式的革命中心；（三）不但工农无产阶级扩大深入自己的阶级斗争，而且手工工人及农民的斗争都掀起巨大的革命潮流，中国之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日益的成熟起来。在这种革命的具体的历史形势之中，我们要知道：争取无产阶级对于国民革命的领袖权之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了，必须主观上明了这一革命中的战术计划，应当以无产阶级手工工匠及农民的联盟做进攻治者阶级的主力军，并且要征取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丧失其作用（所谓使资产阶级疯瘫化。Palalyzation——而中国资产阶级的确有一个瘫子做他的政治代表呢，一笑）。为要适合这种总的战术计划于如此紧急的革命时机，革命策略的先行条件，便是勇敢，勇敢，再勇敢！

* * *

我在论到现时行动的策略之前，还应当说一说中国国民革命中策略上的组织问题，就是革命政党的“组织策略”。革命进展之中，政党内部的成分随着阶级分化而需要相当改变其结合之方式；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遇着革命怒潮，都会发生这一问题。所谓组织策略，就是是否应当分裂还是合组各派的问题。中国革命不但与俄国一九一七年不同，就是与俄国的一九〇五年也不同。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是为着扫除一切

封建农奴制度的压迫，而解放资产阶级的俄国（注意——并非俄国之资产阶级）。现在中国的革命，却是为着进于世界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并非中国之资产阶级）。何以是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而不是直接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革命呢？因为（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二）无产阶级之大多数群众的组织及觉悟程度（主观条件），使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还不可能；所以革命的最近目的，并非夺取政权实行最大限度的党纲，乃是参加政权实行最小限度的党纲。但是，既然是为着进于世界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那就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不同了。这一农民的资产阶级的中国，在解放之后立刻便与世界资本主义立于对敌的地位，他不得不与世界和苏联的无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战线，也就是必须进于社会主义。所以在革命之前，这一“资产阶级的中国”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已经是以“全民族”对抗列强的侵略。如果有人说，这个是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那简直是大笑话，简直是丝毫不懂得列宁主义的民族革命理论。既如是，我们可以归纳为第一界说：中国革命含有以“全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意义。第二，谁是中国民族的代表呢？资产阶级总是自命为“全民族”的代表，总是以民族的名义禁止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是否应当故意自己隔离，限制自己以“独立的阶级斗争”，以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民族”相对待呢？当然不是的。在中国国民革命之中，无产阶级既要领袖民族革命，实际上是他应当代表民族，是他应当以民族革命的名义，实行阶级斗争，遏止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三，中国资产阶级非常之弱，他还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政党，亦还不能巩固自己的领导权于国民革命的政党之中，所以实际上这一政党的组织非常之松懈，只要我们自己打得破立宪主义和对于章程、法律手续之偶像观念，那么，我们加入这一政党之后，不

但独立的宣传鼓动万分的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宣传创造左派之自由。第四，国民革命的民族性，使我们在国民革命政党之外，很不容易征取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中国革命中共产党的职任，更加不应当限于取得工人群众）。

（一）国 民 党

因此四点，共产党员绝对应当加入国民党，努力发展国民党，使成为中国平民的真正代表民族的党——包含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不应当退出国民党，不应当将工人农民放在国民党之外，放任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放任他“独立”起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党外合作”。这种对于国民革命的组织策略，在现时国民革命的领袖权万分必要的属于无产阶级之时，尤其非切实实行不可，容不得丝毫怠工。

然而五卅之后北伐之前，正是中国革命之伏流昂进的时期，从示威罢工急遽的进于武装暴动之前夜（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方区对于国民党的意见却是：现在（三月二十日之后）早已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由本党领导到一个可以独立活动的时期”；所以北方区认为“可以不发展和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我们自己不应做国民党机关的工作，不必集中中国一切革命势力于国民党，并说不要梦想国民党成为单纯的左派思想的政党。诚然不错，彭述之到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还说：粤区同志不应当责备左派首领如何如何不行，而想自己恢复三月二十日以前的状态（即左派思想占优势，甚至于进了单纯左派的思想）。彭述之主义又表现出来了：在组织上主张宽容非左派的思想留在国民党内——这就是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而且主张共产党员无形退出，不赞助国民党之发展，实即容留戴季陶主义，并使之独占国民党的发展工作——这就是将国民党送给新右派去领导。这种组织上的策略，实际上是对戴季陶主义投降的机会

主义。固然，单纯的理想的纯左派的国民党是暂时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阶级分化急遽而未稳定，所以左派首领可以采取戴季陶主义而右倾；然而我们的职任是：不论姓甚名谁，凡有戴季陶主义倾向者，便须攻之使去其“主义”，使国民党政策（思想）日益单纯的左倾。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组织上发展国民党的左派，使群众的工人农民加入——而且有时必需我们自己担负国民党机关的工作。

以前我们策略上的错误，真正是梦想左派小资产阶级的首领能够独立的干，我们只在背后推动，不肯挺身前导，拖着他们往革命方面去。同时，自己存着一种保守的心理，不以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民族”利益和中国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利益相对待，却以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去和中国民族的利益相对待，仿佛默认资产阶级是民族代表，资产阶级是应当领导国民党的，仿佛中国无产阶级只可以做国民革命中之“在野党最左派”，不应当去领导国民党工作的。这是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

（二）反革命的官僚买办地主阶级

现时革命已到总攻击的时机，对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之策略，当然采猛攻的阵势。帝国主义的列强固然内部有许多冲突，可以随时利用，但是现在的革命阶级中，只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猛烈的宣传，可以破坏他们的联合战线，因为他们在华利益的分量不同，利权较少的一受攻击便要让步，不愿代英日受过。如果宣传上隐蔽避免“较好的”帝国主义，那就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策略。如果甚至于像上海二月政治总同盟罢工时，简直暂时放弃反英帝国主义的口号，那真不成话说了。或者说：“先反对李宝章，再反对帝国主义，分作两阶段”，那么，这不知道和国民党右派之“先除国贼再图富强然后对外”又有多大分别？殊不知道要征调全体民众反对李

宝章，非有反帝国主义的目标不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正在于"民族主义的爱国运动"而来的，"民权"却不敢要了。国民政府固然可以运用外交政策离间列强，然而这也并不是优待某一帝国主义，而仍旧是打击帝国主义一切特权的战略。至于征调民众革命行动的口号，却无论如何不可以放弃的。现时中国革命必须对帝国主义猛攻，利用列强冲突，而得步进步的收回租界海关……。丝毫不要怕"过分"了。即使外交政策上说：国民政府不准备以有组织的军队夺回租界，那亦是指明列强应当拣择：究竟愿意立即承认国民政府，与之谈判而"和平"交还租界呢，还是武装示威逼得民众非以"暴力"收回租界不可？对于官僚买办阶级，当然是和对于帝国主义一样的策略，应当没收他们的财产、田地、银行存款、公司股票……总之，严厉的革命独裁，这亦并不一定要有"民众的德谟克拉西的"形式的，什么法律手续等等。这一洋奴阶级，或者有人以为他亦会跑到"革命党"来，彭述之曾经说北伐到北京时，什么交通系等也会进国民党。我说：不会的！何以故呢？因为只有国民政府采取了彭述之主义的政策，只利用他们内部的冲突，而不下总攻击，就是依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力求与某部分买办阶级妥协，那时，这一"阶级"亦许真会加入"革命"，不但加入革命，他们并且不像彭述之主义派那样客气，还要"包办"国民政府呢（将要有他们的三月二十日）。除此之外，革命对于他们是闭关的。对于地主土豪阶级，亦应当用同样的政策。地主土豪阶级现在已经大致变成官僚买办大地主的附庸。不过其中带有地方色彩的一派，或者商业化的程度较浅，或者当地农民还没有剧烈的斗争，那么，这一派人在经济上是落后的中等商业资本的代表；他们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比较的浅些，甚至于有小买办向洋大人督办督理多争些赏钱的气概，所以在政治上实在是民族资产阶级之最右翼。因此，如江苏的半

研究系的士绅，也会一半赞成革命，以地方自治保境安民及对南北战争中立为政纲（四川、云贵亦是如此）。可是，等到革命稍稍往前一点，他们便反动了。对于这一派人——美国帝国主义暂时所想利用的这一班人，没有多大客气的必要。固然，去年北伐刚刚开始和尚未开始之前，北部中国处于革命伏流昂进之时（三月十八日之反赤屠杀后），革命党的职任是：一方面，督促革命略见顿挫的南方（三月二十日之南方），从速北伐，以开展革命基础，而在群众参加斗争之过程中，与民族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别方面，是在北方"往各阶级去"，征取小资产阶级革命化的群众——所以要切实执行"地方实际问题"的运动，借此暴露民族资产阶级中最右翼的罪恶；同时，就反对当地小军阀的助吴反赤，以地方实际要求，如抗税废捐等的运动，骚乱这些大小军阀的后防。所以当时"地方自治"的口号，是有些革命意义的，因为他和北伐的战略是相应的（尤其是在江浙北方）。然而当时江浙的运动虽做而不得力，北方的，简直是怠工。至于现在——去年十一月武汉、江西都已经被北伐军取得之后，形势便大不同了。当初做"地方运动"的目的，本在于暴露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罪恶，那么，现在必须更进一步急转直下的改变政策，一直到指出最左翼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指出保境安民的不可能，指出要保境便必须先战争，推翻军阀统治，响应北伐军，而建立平民政权。事实上江浙区却想组织资产阶级的"民治气象"的市政府（含有地方自治的性质），以抵制北伐军来后的"军治气象"。所以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第一次暴动，不号召群众参加斗争，而只做军事投机。

（三）民族资产阶级

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正宗"戴季陶派、虞洽卿派，当然

还在革命营垒之内（甚至于有些隐藏在左派面具之下）。可是大概而论，他们的妥协主义已经很明显。我们从“五卅”之后，一直便暴露他们的罪恶，已经使小资产阶级部分的脱离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们似乎被革命吓坏了，重新又去负荆请罪；于是实际上形成这样一种景象（如柳亚子所说）：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奶娘夺到了又不管，反去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这客观上是出卖革命的策略。从“五卅”至“一三”，我们的策略都应该是努力反对民族改良主义，而后能征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一三”之后到现在，尤其重要的是：不仅反对买办阶级的压迫捣乱政策，而还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软化，指出他们以革命为名的政策实际是停止革命，以民族为名的政策实际是背叛民族（不仅是压迫工农而已）。固然，我们不是简单的推翻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我们的战术计划既然是夺取其领导权，则一切策略步骤，当完全以奔赴这一目的为标准。（一）我们更加加紧“赞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出彻底的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之要求，如收回海关，反对中日互惠，收回租界，反对外国资本家参与居留地的市政，取消地皮章程，至少亦须增加千倍于现今的地租等等。我们要攻击民族资产阶级的“自卖”，攻击他“自己的妥协”，同样，对于北伐军之在他们领导之下的，我们不但“欢迎”他们进攻，并且督促他们，尤其要用实力帮助他们，以民众的武装暴动响应他们。（二）我们要眼睛看着群众的工人、农民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不但领导工人农民，并且要领导并赞助反对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甚至于智识阶级和店东小资产阶级。（三）组织国民党左派运动，积极的在适当时机逐步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四）积极在

广泛的群众中进行平民政权的运动，兵民联合的运动，以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之军事独裁制，代以平民群众的独裁制（亦不能免除军事性的）。可是实际上呢，我们至今还在错误的策略中：对帝国主义的政策，我们几乎是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对北伐，我们曾经消极的抵制；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我们不注意；对左派运动我们不坚决的去领导（伍廷康）；对民权政府运动，我们只去接洽首领，各团体领袖，甚至于不到工人群众中去实行选举运动（此处大致是说上海最近的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前后，例如，运动罢市响应北伐时，只和首领谈判，始终不能深入小商人群众）；组织上海临时革命委员会时，只联络大商领袖。后来实际上是南昌政府指派的国民党中央江苏政治分会，照右派意思，是要站在上海市政府之上指挥命令市民代表会议的，其中包含大多数右派分子，如叶楚伧、郭泰祺等，而我们并不号召民众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撤换。上海二月暴动后，国民党“应许”民选政府，他们自定国民党提议的候选人名单；我们不去提出自己的名单，与国民党的名单共同到群众中去宣传，亦不与较左倾的国民政府联络，表示反对上海市政府委员中的右倾的候选人，反而去帮着国民党新右派严守秘密，想在市民代表会议开会时，就此使工人市民赞成通过。这名单之中，有右派郑毓秀女律师等。郑毓秀是参加美国女青年会所召集的泛太平洋妇女会议筹备会的一位太太。不但女工在三八纪念会中说：“这就是资本家要选到上海政府里去的郑毓秀，我们工人代表却没有”，并且一般左派的智识阶级妇女都反对她。然而上海区委竟不反对郑毓秀。女同志已经是为妥协起见，提出共产党女党员杨之华加入名单，以为交换条件。但是，上海区委代表和国民党谈判时，并不受国民党方面的反对，而很驯服的自动的撤回杨之华。为着什么？为着：（一）要保存和国民党的良好关系，不方便反对郑毓秀；（二）要加

入政府必须有些绅士态度，而杨之华太平民了，别的女绅士我们党里又找不出（幸而没有）！总之，与资产阶级破坏一些“良好关系”，至今还被认为万恶不赦之罪。因此，只去找新右派及大商人谈判，自己束缚自己，眼睛不是望着群众，而是望着他们。这是布尔塞维克的策略吗？

（四）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在这种时机，自然是普遍的群众的革命化。但是，小资产阶级尤其是中国的店东小资产阶级，决不能与法国大革命时的小资产阶级相比。他们渴望有一位英雄，来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他们看着一边是帝国主义与军阀买办压榨他们，一边是工场里工匠之中的“赤鬼”。真正是前有猛虎，后有豺狼。于是他们要找一位救主。谁呢？是我们，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于“左倾”的小买办？资产阶级有一个方法取得他们——便是“资本的统一战线”，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强制的仲裁。然而大资产阶级包捐包税等的虐政，同时又使他们难受。所以最上层的小资产阶级一定是动摇犹豫不定。我们应当做一个火车头（上海丝厂某一女工的话），拖着他们往前走，冲破买办官僚阶级的壁垒，使他们离开民族资产阶级；单在后面推他们是推不动的，等他们自动独立的来干，是要等一百年的。店东、工匠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免的，但是有人说：店东小资产阶级自己濒于破产，不能答应工匠的“过分”要求。亦许是这样！可是工匠的生活异常的困苦，我们是否应当劝他们为“民族利益”、为“保持联合战线”起见而多忍耐一下呢？当革命进攻的阶段里，这是不对的策略。店东没有钱，工匠更没有钱，可是大家都要改善地位，这两方面的互争是没有出路的了？但是中国境内，难道没有别的豪富吗？我们只能领导他们加紧向买办阶级猛攻，没收帝国主义及军阀、官僚一切反革

命分子的资产，至少最初先要加以很大的租税。这些革命的殷富捐之用途，应当有一部分用到解决这一问题上来：或者集合因罢工而店东濒于破产的几个工场，合组成市政府或省政府管理监督的企业，并酌量与以津贴，同时严格的执行劳动法及工会所订契约；或者直接津贴手工工匠的工资，但限于超过店东实力以上之数目；或者设立国立或市立工场，收容因罢工而失业的手工工人。详细办法当然此地不能拟议的。总之，店东小资产阶级应当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向买办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作战，反对包捐包税（“打倒捐棍”），主张殷富捐、累进税等，参加民权的市政运动。可是这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是烂河泥，很难扶得起的。我们的主要联盟者，在城市之中始终是工匠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的城市贫民。他们应当加入无产阶级的组织——总工会；各种手工业工会、店员工会，都应当联合在总工会之下；这些手工业工匠的组织应当适合他们的程度，不可勉强以所谓产业工会的死公式去组织他们。并且要很努力的引起这一部分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及民权政府，不要因为他们太无绅士态度，而摈之于政治斗争之外。再则有人主张手工业工会可以和店东订立分红的办法，以避免屡次的罢工，这是不好的。并不单因为这是蒲鲁东主义，如国家工场之类，也是路易白朗主义。这是因为一则蒙蔽手工工匠的阶级意识，二则客观上很难实行——中国手工业在破产过程之中，工匠亲眼见着店东年年所得红利有限，或者亏本，自然不愿意订立这种契约。

再者，小资产阶级之中，还有一部分“独立的”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他们总算侥幸，既不剥削别人的劳动，也不被别人剥削他的劳动。这部分群众，也是应当注意的。至于智识阶级，我上面故意没有分析，他是不成其为阶级的，五卅后阶级分化急遽的过程里，他们都渐渐的“各有其主”，而分属于各

社会阶级了。不过有很多的所谓“智力劳动者”，如中小学教员，各机关职员，很应当注意，他们的地位和工匠小资产阶级有些相像；但是他们的绅士式的生活（“穿长衫的”）和心理（书生主义、投机的政客主义等），我们应当不要忘记。自由职业者，如医生、律师、艺术家等，在中国大部分是很窘的，类似于受人雇佣的智力劳动者。不过最近中国资产阶级生活的发展中，也已发现一种所谓“带白手套”的贵族式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生活很像资产阶级，他们的“主顾”，也许是中国境内境外最有钱的人——帝国主义者及买办等。所以在自由职业之中，我们亦应当注意他们的群众。至于学生，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讲着青年问题再说。

（五）农　　民

关于农民问题，我们上面已经屡次说过。中国革命中的中枢是农民革命。我们对反革命派地主阶级的进攻，是为着农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上而下”影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所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联合战线），应当以不破坏农民中的工作为限度，过此限度，便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分道扬镳的天职；我们与普通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也是为着攻击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自己巩固在农民群众中的势力；我们与工匠小资产阶级联合而引导他，更是为着增厚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保证这农民群众之领袖阶级势力的发展，并且经过工匠而与乡村联结更多的关系。现时的革命策略，应当竭力吸引农民群众加入革命的一切斗争，但是单有机械的宣传组织是决不够的，必须有进取而非保守的策略和口号。对于一般农民，自然是农民委员会的实际政权。“农民委员会”应当是乡民会议未成立之前群众所草创的实际政权，他应当和国民政府联合着，

共同进行目前行动的政纲，如减租、收税、收股富捐、解除民团武装、指挥农民自卫军作战、受政府委托办理种种事务。所以施达林同志说："农民协会应当变成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可以是由农民协会选举出来的权力机关（或者中国话称为"乡民会议筹备处"）。如果当地的政府（县知事）是右倾的，那么，必须经过国民政府各种机关及邻近的一切民众团体和国民党，共同赞助该地农民协会之奋斗，竭力求左倾县政府之实现。这种农民委员会应当力争参与县政府之创造。那么，何以这农民委员会，不直接称做各乡的政府呢，何以不简单提出乡民会议的创造呢？因为（一）则必须和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委派县长的制度暂时的并行合着；（二）则免去我们的立宪主义，使我们不致于认为既是乡民会议之执行委员会，便须按照法律手续程序来选举。总之，这是行动的权力机关——"农民委员会"的口号及组织，必定可以吸引一般农民群众直接积极的加入革命的斗争。对于中农和小农，则迅速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由农民委员会自己经手办理捐税，废除一切陋规包捐包税制度，废除苛捐杂税。对于佃农和半佃农，则耕地农有的基本口号是非常重要的。譬如各乡的反动派寺院等的田产，应当在这一口号之下没收。举例来说，江苏盛宣怀家及张謇家的田地，革命军到应当立即没收，而在江苏农民之中早就可以宣传这一原则。农民佃户亦许自己就要动手占据耕地。这种"暴动"不是革命党人所怕的。当然，我们应当努力去组织这种进攻。总之，要使农民佃户觉得他所耕的田是理应属于他自己的。如果小地主（所谓尚非反革命派的）不肯应允停止纳租，那就是实力斗争才能解决的问题了。——那就农民知道：至少理应永久租借所耕田地，理应由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会同革命政权强制规定田租的最高额。对于失地的农民——主要的是国家颁发田地农具，与以低息借贷等。再则兵士是特种形式的失地的农

民，应当使革命军的兵士群众接近农民群众；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的群众应当和驻在该地的兵士直接发生联络，日常的向他们宣传革命意义和农民政纲。革命军队中由上而下的政治工作，固然非常之重要，但是群众的宣传亦应当开始实行。农民自己的武装现在更成紧急的问题了；这些武装，形式上或者采取一种民警制度，隶属于农民协会及将来各乡的农民政权，间接的隶属于革命的左派的当地正式政府；但是，在这革命斗争急遽的时期，决不可以机械的主张农民自卫军不可有常备军。农民委员会的创造，在国民政府之下，是异常急需的了；非此不能切实的巩固革命的左倾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要有这种深入群众的下层基础，才有切实执行农民问题之行动政纲；农民协会也必须着重于自力创造这种农民委员会，才能直接的逐步执行这些政纲（见《国际议决案》第十一项）。至于反动军阀的地方，农民的革命运动也要在这些口号之下进行，使他们知道“欢迎”北伐军的目的；这些地方的农民协会筹备处，也应当是具体而微的农民委员会；如果我们能渗入旧有的红枪会之类的农民组织，那么，这些红枪会也将要受我们的影响，而相当的执行农民委员会的职任。反动军阀之下，农民群众与反动军队兵士的接近，是非常之必要的工作，例如最近奉军兵士在黄河沿岸攻河南时，自己恐怕败后逃走无路，有许多和驻在地的农民结拜兄弟，收干儿子，拜干爹；可见这种工作的可能。至于土匪，其实其中最坏的，也和反动军队里的兵士或民团中的雇兵，处于同等的地位。国民政府在原则上，应规定肃清全国土匪民团，但是“肃清”的主要方法应当是招抚，当他们是失业的农民看待，而副之以行的方法便是痛剿；换句话说：便是赞助革命者，则以反革命者的财产安插之；赞助反革命者，则以治反革命派之方法处置之——这是应当“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的。对于民团，农民协会亦可以运用这种同样的原则，对

付他们的雇兵，不过地方范围小些罢了。总之："兵民联合杀军阀，青天白日满地红！"

事实上，我们以前对农民问题的政纲和策略，不是如此的。第三次大会只说议租和乡村自治（当然没有像现在农民委员会的解释）。一九二四年五月之中央扩大会议仍旧继续乡村自治的口号，加上了武装农民的号召，但是对佃农反而只有反对苛税的要求，没有田租问题，更不用说耕地农有了。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大会，除重复上次扩大会议之口号外，只有责备国民党不实践应诺农民的改良政策的话，没有切实指导农民的奋斗口号，却有"不宜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之语。一九二五年五卅后的九月中央扩大会议，方才指出耕地农有的标语。然而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一方面指出广东农民要求政权——而那时河南已经有过红枪会竟有形成事实上的政权者之事实——别方面却有抑制农村阶级斗争，防其分化过早的倾向。再则，还规定农民武装，"不可超出自卫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而耕地农有的标语反而模糊了，农民政权的要求也没明了爽快的指定行动的方针。可见我们以前的农民问题政纲，是很大的弱点。彭述之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底，国民政府北伐军已经到了汉口，还说，中国革命难道是农民革命？（远东局与政治局联席会议），他那时说：不应当太忽视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他这句话，在当时自然不是指出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的意思，而是指出除农民外尚须联合资产阶级的意思。既如此，他的意思以为中国革命一定要不破坏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使革命形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之广泛联合的革命。"然而事实上，资产阶级（彭述之现在说他差不多完全是买办阶级了），这"纯粹买办阶级的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反对农民，因而彭湃同志骂他是"死尸"，他对于农民的确是死尸，那又怎样办呢？我们教农民去求救于上海的那位大商

人罢！伍廷康同志则说："现在应在无党农民中让出一大部分给国民党左派"。让给谁？让给顾孟余吗？他说农会是土匪。让给甘乃光吗？他说不要叫耕地农有！总之，结果是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让给资产阶级安然指导革命，而资产阶级对于我们却并不领情，仍旧是要实行反赤的。这种彭述之主义的农民政策，亦许是弱点的根源罢？

最后，我补说雇农。雇农实际上是农场工人，至少和城市中的工匠是相同的。所以我想：固然农民委员会指导之下的乡村政权，甚至于现有的农民协会，都应当包含乡镇上的贫苦小商工匠（虽则他们不是农民），雇农自然更应当加入。但是应否相机组织雇农工会（同时即为农民协会的雇农部），以工会的资格加入附近城市中的总工会呢？这是值得研究的。

（六）无 产 阶 级

无产阶级是党的基础，他要在党领导之下，征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五卅"以来，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执行他的伟大使命，尤其是要进而与农民结合密切的联盟，方才能够恰当的尽他的革命职任。无产阶级不但应当组织自己群众于独立的阶级的经济组织（工会）之中，并且应当团结手工业工匠及雇农于这一组织之中；这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他的发展，就是中国革命的发展，他取得革命领袖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他自然不但要率领一般平民群众向官僚买办地主阶级进攻，并且更加应当自己积极实行猛烈的阶级斗争，无宽恕的反对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斗争固然有伟大的政治上的意义，攻击卖国卖民的民族资产阶级，然而经济的斗争并不因此而削弱，却只有因此而更加重要。民族资产阶级的右倾，并不是经济罢工运动对他让些步所可以挽回的，甚至于大概而论，那店东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也并非工匠要求的减

低所可以挽回的，只有猛烈的进攻资产阶级之时，比较容易领导他去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只有实施强制的劳动法和工会契约于店东小资产阶级之时，比较容易领导他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阶级。我们并用不着反对劳资仲裁，因为这是比“非法”罢工更进一步的胜利；但是我们要再进一步力争劳动法及工会契约实行之保障，因为非此无以为仲裁之标准。军阀政治之下，工人非有罢工不能争得丝毫的改良；国民政府之下，工人总算可以罢工了，并且有时可以无须罢工，只要提出要求和资本家店东谈判，便可以得到某种的改良；如果这种谈判订约称谓“仲裁”，那么，这种仲裁我们是不反对的。然而国民政府至今还没有正式颁布工会法及劳动法，工人自然应当要求，更应当随时要求契约之保障；工人应当要求在劳资仲裁时强制资本家店东不准悔约——这是法律保障的最小限度，如今连这些保障都没有，工人的罢工运动自然要更加猛烈，至于其他行动政纲（见《国际议决案》第十九项），都应当由工人群众的直接行动与左倾的各级各地政府机关，双方并进的去迅速实行。关于失业问题，必须要求政府抽收资本家的特别税捐，而实行国家津贴制度，为执行这些职任起见，应当努力强固扩大职工运动，改正现在的许多错误和弱点，如机械式的死板的组织等。

党的策略永久应当以“能多方的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为原则，对于无产阶级群众，尤其是如此，尤其在于“提高阶级意识”——单是机械的宣传组织是不够的，何况在现今群众革命行动的时候。所以应当认清：不但经济斗争里应当努力提高阶级意识，一步不离阶级斗争的原则，而且步步必须与政治斗争相联结，每一个小罢工都可以引导工人群众，使他们明了参加政权的必要。至今我们在工人中的宣传，只有力争政治自由的口号，没有经常不断有系统的宣传工人参加政权的权利。照理

这在八年前便应当宣传的了（我们党存在了七年。再则，那时当然只是宣传，而不是鼓动工人攫取政权）。谁能给工人以政治自由呢？——北伐军！北伐军已到之地又怎样呢？——组织工会挂招牌！不对！这些旧口号已经不够的了。工人应当力争参加政权，力争民选的政府，力争工人代表参与政府机关的会议（从市民会议一直到执行机关）。工人应当知道：他们理应参与国家的一切立法行政，他们理应参与规定劳动法、工会法之讨论，参与监督这些法律的执行，参与改良市政如建筑工人住宅等的计划……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代表（国民党新右派及“进步”的大商人等），如果有丝毫反对工人的这些权利的表示，不论是公开的言论还是暗室里和共产党代表的谈话，我们都应当使个个工人知道，应当使工人及一般群众起来反对。譬如右派要在上海指派政治分会，要谕派某某团体代表加入市政府（候选人名单），我们在群众之中何以不可以宣传呢？为着保存和国民党的良好关系！为什么只有首领之间的谈判，而没有工人群众的宣传和选举运动，为什么不号召工人群众干涉国民党政治分会（江苏）的人选呢？为着不方便干预“人家的”家务！这难道是征取群众的策略，难道是提高工人阶级意识的策略，难道“客观上”工人阶级已经是革命领袖的策略?！固然，在某种特定条件之下，我们或者应当对民族资产阶级做某一种些小的让步，而便利我们别方面的大进攻。但是，工人群众应当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让步，不是共产党某一代表替他们让的步；工人群众应当看得见这一让步之中他们得着了什么，得着了何种的便利进攻的形势。

再则，工人阶级对于友军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不是单纯的机械的阶级意识的问题，他应当联合工匠、农民、兵士的群众。所以他经过国民党联合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这里的问题，便不仅是怎样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资产

阶级分离独立，并且还要知道怎样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与国内一切平民群众联合，并取得其领导权。何以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就等于国民革命；何以这对于工人是一件物事的两方面，而不是两个互相独立互相对待甚至不能并立的东西呢？因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可以和工匠、农民、兵士等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联结的，这种联结的利益的确可以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因此，工人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具体的运用这一原则，就从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国民党开始（一九二三年夏第三次大会的规定固然比较的模糊，但是我在大会上主张这一说法的；当年九月我做的一篇《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便是以“主干和中心”解释国民党问题的）。工人阶级要负起解放中国民族的责任，而不能“独立”的只求解放自己阶级；工人阶级自己的解放，必须与农民联盟，这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却不必妄自尊大的说共产党是革命中心，而革命胜利后农民自然会服从工人政府（这便是杜洛茨基主义）。何以必须在中国造成左派的国民党，何以必须工人加入国民党，而不自己简单的联合农民革命呢？第一，因为中国是所谓“无人之地”（Nomansland）——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犯不着工人去用放弃国民党的手段，让资产阶级达到攫取国民党的目的。中国资产阶级有没有夺取国民党之可能呢？有的。他固然不能充分的巩固自己对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影响，固然不能抓住多数的农民，但是他能够夺着政权而巩固自己与店东小资产阶级的资本统一战线，能够经过政权而联结地主土豪及富农。他怎么能取得政权呢？于是第二，中国革命中的根本特性发见了。就是中国革命早已组成政府的形式，建立在失地的农民所组成的军队身上——最初是在地主土豪及小资产阶级领袖之下（一九二四

年以前之杨希闵、刘震寰、许崇智等——孙中山)。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很弱，又遇见帝国主义压迫工农而惹起民众革命运动。这真正讨厌极了。他立刻积极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之引起革命；但是他没有别的力量，只有设法征取革命方面的军队；他有了军队便可以攻打官僚买办阶级，组成自己的中国政府。于是他一方面，将要有这种资格去和帝国主义妥协，而且一定实行“帝国立宪主义”(Constitutionism under the imperialism——例如海关自主、修改不平等条约等)，以平民愤而消弭革命；别方面，他将要有这种能力来压迫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实行资产阶级独裁制（资产阶级的新式军阀主义，与现在代表买办阶级的军阀不相同的），以拥护神圣的私有财产。民族资产阶级征取军队，拿住兵士群众而驱使屠杀工农，这件事是可能的，而且三月二十日以来，屡见而不一见的。如今说明白了——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四年，早已存在如此之多的军队（军阀的除外）客观上的确是在革命，尤其是广州政府。无产阶级的开始奋斗，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请问我们的政策应当怎样？如果认为南方军队和北方军阀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应当进行破坏一般国家军队的工作，自然也要推翻广州政府，如彭述之的办法“劝”中山离开广州。这在客观上是反革命的政策，至少是书生式的政策。如果在国民党外慢慢宣传组织群众，实行种种民间的工农运动，以至于民间的武装暴动，这就是单纯的自下而上的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就算是国民革命，也不对！)，那么，这明明是将革命领导权双手恭送给资产阶级。因为我们在干工农运动，资产阶级就要慌得“积极”起来，他就要征取南方的军队，而实行他的“革命”计划。这种资产阶级与地主土豪联合战线的所谓“革命”（陈炯明式的联省自治)，固然是不能成功。然而无产阶级是孤立的了；至少，不能得到革命的领导权；至少，是将破产失业的农民——兵

匪，永久放在官僚买办阶级、地主土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土匪头儿等等的支配之下，混杀一阵；同时，我们却要做“纯粹共产主义式的科学的革命方法”。请问：这是不是等帝国主义从容不迫的拿稳中国的市场，以增加世界资本主义之稳定，而延长世界社会革命的难产呢？仅仅“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大概要等所谓“客观条件”来促成的了——第二国际应当说：彭述之同志是我们在远东的人物！

总之，革命军队应当由工人阶级去努力争取，因为只有这个方法最利于造成“自上而下”的协助农民运动之发展（而不是“科学的革命方法”）。中国之无产阶级工匠和农民，可以由正当策略的群众运动口号，日益组织起来；中国既有的许多革命军队很早便在国民党或准国民党手里，其中的失地的农民，却必须经过国民党而后能和无产阶级联合。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使中国革命组织之形式，不能不以国民党为中心；只有努力改造原有的国民党，集合无产阶级、工匠、农民与失地农民之兵匪群众，而造成政府形式的革命中心——国民政府；只有这种过程中，工人阶级能够取得革命的领导权，率领一般平民群众，如城市小资产阶级等，推翻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统治，而建立工农平民之革命民权的独裁制。至于革命发展到现时的阶段，工人阶级征取革命军队是尤其紧急而重要的责任了。现今工人阶级应当率领一般城市平民，努力创造与左派联合的民权的反帝国主义的各地地方政府，拥护武汉的国民政府，赞助乡村中的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与之密切的联合。同时，应当百倍于现今的进行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协同左派领导左派，去巩固革命势力于兵士群众之中；不但如此，还要和农民对于驻在地军队一样，使工人群众（不仅只是工会）与各城市驻在的军队兵士发生密切的关系，实行经常的有系统的群众政治宣传。军队是民族资产阶级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劳农平民决

不能放任他永久的握住这些武力，劳农平民应当取得这些武力，然后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独裁制。至于工人自己的武装，也已经非常之需要，这些武装不但应当是工会的纠察队，而且应当是保护各城市中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治安”）之民警署（militia），直隶于市政府的。这当然是常备的组织——中国的革命时代还长得很呢，经常的和平的“宪政时期”还远得很呢！至于说怕流氓混入，那么，中国的革命党人仿佛和这种恐惧是不可并存的。中国城市中流氓之多，为万国所无；除反动派拿得住的一部分以为反革命工具之外，我们革命党人是不是应当征取他们的群众（其中较好的分子），训练他们，逐渐征服他们的流氓主义，另外巧妙的应付他们之中的中立分子呢？总之，革命是不是应当“自卫”（赤色恐怖）呢？最后，关于北方军阀之下，工人破坏其军队，宣传（不仅是“运动”）其兵士的职任，是非常之明显的，我也不必多说了。

（七）现时的总策略

“五卅”之后，尤其是吴佩孚反赤战争开始失败之时，中国革命已经提出新的口号了，因为他进于新的阶段了。以前的中心口号是：取消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这是五卅运动所涌出来的；固然北京冯玉祥政变，孙中山第一次北伐之时，已经提出这两个口号，已经普遍到全国——这是中国革命第一步（宣传）的进展（然而彭述之是反对这种进展的，因为北伐不是科学的方法）。可是这两个口号，是到五卅运动群众的潮流似的斗争发展之后，再深入群众的，当时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风起云涌，波及于穷乡僻壤妇人孺子之间（这并不是彭述之去预先组织的），各地涌出实际的斗争机关，如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广州工农兵商学联合会之类的机关，成立广州第一届的国

民政府（甚至于间接的引起北方红枪会，江联——江阴佃农合作社等的运动）——这是中国革命第二步（组织）的进展。五卅运动深入广出的发展，形成北伐的革命战争（并不是彭述之去武装他的），各地的农民、小商人、工人都热烈欢迎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于对官僚买办阶级“失恋的”地主土豪阶级，也都有所期望于他；他以武装势力为后盾，收回了汉口、九江的租界，公开了许多工会、农民协会，这从某一方面说来，的确是特种形式的武装暴动，这是中国革命第三步的进展。

革命进展到这阶段，有很快而进到第四步的趋势——劳农平民的革命民权独裁制。现在，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是不够的了，因为不但民族资产阶级都采取了他，甚至于美国、日本帝国主义都声明愿意改订条约，甚至于英国帝国主义“愿意”交还租界（天津等等）；现在应当说：继续革命战争——革命军队与民众武装结合，肃清全国反革命势力，彻底剥夺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只有革命战争完全胜利，才能真正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亦不够的了，因为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他，甚至于答应地方的“民选政府”（右派指定的民选政府），而张作霖也发表政纲，要召集绅董（名流）会议，说什么“发展民治”。现在应当说：巩固国民政府——工农代表参加国民政府，各地方实行公开的选举运动产生出来的民选政府，剥夺反革命派的一切公权，没收其一切财产，肃清国民党内、国民政府内的妥协派（不仅是“买办出身”的反革命派）；只有工农代表参加的国民政府，能够实行革命战争而得到胜利，能够有召集国民会议之权，才能执行目前革命的行动政纲。总之，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完成革命战争（和民众暴动相结合），及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各地民众直接选举民权的地方政府），要努力创造纯粹左派政策的国民政府，进行革命战争到底。这两个主要的口号，应当给群众以极大的吸引

力，团结群众往前进攻。

但是，我恐怕现在党的政策仍旧是动摇，虽然已经提出这两个口号，然而有些运用的方法，客观上是停滞革命运动的。武装暴动与革命战争之中，我们眼睛应当望着群众，注意怎样引进更广泛更广泛的群众，那么，即使去进行利用敌人冲突的工作（如联络河南、苏皖的小军阀等），也会有利于革命。否则像彭述之一样，他从反对中山北伐的政见失败之后，不但不能公开认识自己的错误，而且机械的“改正”这种错误，矫枉过正的，只注意政客式的耍弄小军阀；于是二月上海暴动之前夜，他要等待钮惕生[1]接洽好李宝章部下之后，再决定准备武装暴动。巩固国民政府和创立地方的民选政府，尤其应当站在群众的基础之上，引进群众自动的积极参加。不但参加政府者要受党的严格的监督和指导，并且应当是真正能代表群众而不与政府内之妥协派妥协的人。地方民选政府的创造，必须是群众参加的，共产党可以和国民党（左派）协商候选人名单，但是必须共产党、国民党共同署名，公开的做选举运动。有必要时，共产党应当单独提出候选名单。固然，亦许有时应与国民党右派协商（如驻在地军队之首领为右派），亦许应暂时容纳右倾少数分子。但是，这种协商不应当束缚我们，使我们背着群众以求得参加政府之可能。再则，即使不是以选举手续加入，也应当用种种方法间接使群众参加。这些具体方法，是应当适应各地当时的情形而决定的——亦许因此不免在各地方有许多不同的过渡形式。最后，更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可能，应当立即号召紧急的创立市民会议、县民会议等，应当认定这是行动的权力机关，应当使市民、乡民、兵士、工人之群众直接参加（不仅是工会等首领），应当注重群众的创造力，不应当被国民党的训政态度所恐吓，更不应当被我们自己的宪法观念所束缚。总之，我们应当认定：要用“劳工阶级的方法实行

国民革命”（瞿秋白：《自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一九二三年九月）——以苏维埃的方法创造国民会议制度的平民共和国。

第五章 领导的人怎样？

——中国革命中之共产党党内问题

国际议决案说：“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至工厂支部或街市支部，必须很坚决的实行党的集体的（Collective）指导。”凡是布尔塞维克的党都应当如此的。何以国际这次特别在中国革命问题的议决案里提出来呢？难道中国共产党以前不是集体的指导？

我们已经论过：中国从辛亥以来，一直是在革命状态之中，中国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率领农民的中国“民族”，革那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命，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领导着中国无产阶级革那世界资产阶级的命；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到胜利的道路上去；无产阶级应当首先联合工匠、农民、兵士的小资产阶级，领着一般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那妥协卖民的民族资产阶级，以此正确的策略日益组织团结更广泛的群众——这样去领袖中国的革命。而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袖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那么，这应当领导中国革命的人又怎样呢，他们的健康怎么样呢？

——老实不客气说：他有一点儿病，亦许不止一点儿罢！

去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便决定开放国民革命问题的讨论，最近中央政治局又通告讨论国际的议决案，说：“与其由盲目的一致而弄到实际不一致，不如由意见的不一致而求得实际的一致！”因此，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的说出来。我肯定的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

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如果有人说：“党内发生派别了”，那么“大家”一定说：“照列宁主义的规定，共产党是不应当有派别的，因此中国之党既名为共产党，便决不会有派别。你这小子造谣惑众，应当按照列宁主义的纪律第一千零一条，推出辕门斩首：看刀……！”是的，斩首是中国皇帝的东方文化，是中国的家常便饭。

但是我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Bogdyhanism）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中国杜洛茨基主义式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主义之雏形。

第一节　策略问题

关于策略之错误，我已经说过许多，此地再指一指历史事实罢了。但是，我首先要说一句总话。有人以为：如果我们早知道中国只要一次革命，不要两次革命，那么，我们以前的策略就不会这样错误。这样说，仿佛我们认定第一次革命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我们以前的策略是适应资产阶级革命的。我们以前的策略对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不错的。这句话亦不对。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我们以前的策略亦不对。如果我们是资产阶级最左翼最急进的党，我们以前的策略亦不对。我们而且是无产阶级的党，所以以前的策略更不对。

“五卅”以前“五四”以后，是革命进展的时期，但是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党的战术方针，应当是以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勉力做主干，形成并巩固国民党之中心，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扩大联合战线，准备工农的主力军以攻击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统治。但是实际上在这一时期，我们的政策处处只有本能的“自我保存”，没有进取的，

只像小孩子似的和当时的左派赌气，站在旁边批评，以保持所谓“独立”而不积极领导左派，造成左派群众。只要偷些自由，不提出工人参加政权目标。难道纯粹民权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应当如此么？那时应当往“各阶级去”，“不是单做工会书记，而要做平民先锋”——如列宁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所说的。然而我们不肯去，恐怕堕落了，恐怕被人沾污了无产阶级的清白。或者简直放弃职工运动的工作，甚至说出“只问政治，不问面包”的话。那又变成民族资产阶级对待工人的策略。

“五卅”以后，中国革命之进展，已经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不过因为中国革命的正式军队担负了一大半武装暴动的作用，形式上隐蔽了些。此时期有新的战术计划，其策略上的口号，当然是革命战争和革命政府之巩固。然而党内“大多数”的意见，以为这是革命的躁进说。正在这个时候，反对单纯左派国民党之创造，反对共产党积极赞助左派在组织上政治上发展并领导国民党。于是策略上的总原则是：惟恐新右派生气，惟恐联合战线之中没有了新右派，惟恐新右派不能参加政府及国民党之指导机关。难道民权主义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是应当如此么？在这种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日屠杀之后，竟有人提出“反对继续战争”、“团结西南”的口号；伍廷康同志也反对北伐。就是“人民团体参加北伐战争”、“以人民团体专政为目的而北伐”的口号，虽然形式上由中央通告各地，不但各地（尤其是北方区）怠工而不宣传，甚至中央也不继续有系统的执行这一口号，没有组织民众为民权而战的革命情绪。甚至于在这期间，有人说广东政府并不是唯一的革命基础。总之，是在革命将近总攻击的时候，竭力反对造成革命的中心。固然，每一发展阶段之中，革命中心往往移易其人物或地点，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革命没有中心，是不能组织对于反

革命的总攻击的。

现在，我很简略的说一说历史的事实：

（一）一九二三年夏决定加入国民党——这是进一步；但是没有根本明了自己的政策，仍旧保存“研究会”时代的小团体心理，不知道加入是为着争领导权。

（二）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改组，共产党员加入工作——这是又进一步；但是，当年五月中央扩大会议，又决定产业工人尽可能的不加入国民党，决定不要在组织上帮助国民党发展，而只要宣传国民革命，这又是退一步。

（三）一九二四年九月广州商团变叛时——正在买办阶级进攻中山政府的当口，中央局决定要猛攻中山一派的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不主张对他们稍稍让步，以集中势力攻击买办派（反对国民党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为是束缚共产党）——这又是退一步（那时彭述之虽非中央委员，然而已经“坐”在中央了）。

（四）一九二四年十月中山第一次北伐，随后即北上时，中央反对北伐，认为是逃避陈炯明和商团之斗争，而主张“绝对抛弃军事行动”；同时，反对北上，认为是简单的与段祺瑞妥协——这更是退一步。

（五）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大会时，“规定”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是无产阶级的，并且规定产业工人可以加入国民党——这总算是又进一步；但是，仍旧保留着国民党军力不到之地，我们不替他发展国民党之心理，而且“规定”领导权之议决案上，实际上只有防御国民党吞灭我们的消极方法，是“解释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不同”，而不是“以阶级斗争领导国民革命”。总之，实际只是竭力斗争想避免国民革命领导工人阶级而已，而并不是积极去力争领导国民革命。于是“规定”领导权，不过多添些小孩子似的虚矫自欺罢了。

（六）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党得着极大的发展，在革命中的地位客观上骤然提高，领导权之斗争日益有利于无产阶级了——这是非常之大的进步；但是，同时广州廖案发生，中央反对严厉处置胡汉民和许崇智，恐怕联合战线太破裂了。固然那时同志之中幼稚的研究会主义仍旧很多，一种宗派式的誓死不调和的"气概"处处坏事；但是，地主土豪阶级破裂出联合战线已是必然之事，阶级斗争和分化日益急进起来，我们如果采温和政策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个退步。

（七）一九二五年九月中央扩大会议时，看出党内已经因为高潮渐落，便在工人的斗争里侧重于经济斗争，而隐晦政治斗争的危险；规定努力的发展党——这是一个进步；但是，看见民族资产阶级的戴季陶主义的兴起，不指明积极反对他的职任，而消极的要"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之好的方式"；这好的方式是什么？是不束缚无产阶级的。并且只规定"力求我们的党公开"，使与国民党并行。而没有讲明白：我们应当怎样在国民党束缚资产阶级。

（八）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海谈判——那时戴季陶派有几个人偶然不敢出西山会议，故意不出席；就只这一件事，便使中央能和他们妥协谈判，邀他们到广州国民党大会。谈判条件如何，实在无关重要。单是共产党中央为戴季陶派优容，由我们方面"准许"他们回粤，这件事给广州左派政府一个很大的打击，而民族资产阶级最终的抓住广州军队，便有我们的"助力"在内了——这又是退一步。

（九）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我们根本继续让步政策，虽左派已因发慌而暗中分裂，急进派邀请我们多担工作，而我们以因对右派让步，而拒绝左派。

（十）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日，此时实际上是民族资产阶级以武力推翻左派政府。左派与共产党立时反攻

的形势万不可能，因此采让步政策是对的，但是，此后即认定无须准备与新右派破裂联合战线之政策，同时，又要做在野党领导群众进攻。回答这个矛盾的政策之唯一答案，便是“退出国民党”。彭述之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接受这一答复，说要“研究研究”。实际上此时正需左派稍进攻稍坚定，其唯一方法，亦为“退出国民党”之恐吓，使他们在与我们联合战线中不仅仰望我们的援手，而较积极，使他们明了共产党的让步之必要，使他们觉得此让步是我们与他们共同决定的。然而彭述之不肯决定贻误时机。

（十一）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时，决定了“和左派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再造左派指导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然而当时会中大多数的心理，仍是要“促进资产阶级的革命化”。自然，到了九月彭述之仍回原路说：“粤区同志绝对不可存恢复三月二十日前之状态”的心理。这就是说：不准想建立单独左派政策的国民党中央及政府。中央政策一直动摇到最近二月间——这是一大退步（北伐开始后之全国情势，无疑的是伟大的革命化；这种情势之下，资产阶级愈妥协愈反动，则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也愈容易，而我们的政策却偏重于拉住资产阶级——而且是以让步的政策想去拉住他）。

（十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夏超倒戈时，仍旧继续已经陈旧的地方自治口号，加以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根本策略，于是，决定要在上海拥护大资产阶级，成立市政府，以抵制已经“是买办的”北伐军右派（此策略继续到二月暴动之前夜）。

（十三）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特别会议时，决定了一个杂凑的政策：一方面还要造成左派，别方面又认为现在已有“非理想”的左派（伍廷康），总之，没有决定我们挺身领导。并且认为政府右倾，群众左倾，所以主张同时拉住些群众使之略

略右倾，又要推动些政府，使之略略左倾。没有下攻打右派之决心。

（十四）一九二七年二月上海暴动。总之，保持与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而无领导一般群众革命之决心（此时《国际议决案》已经讨论过，而上海区代表大会在彭述之报告此议决案后，决议说："买办阶级亦有革命的，资产阶级亦有绝对反革命的"！就只没有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改良妥协的。因此客观上的政策结论是：凡是革命的，不论买办或资产阶级，都要联合，利用他们的冲突"自取其利"。并无怎样对付改良派的民族资产阶级之具体明确的观念。小资产阶级呢？群众呢？这是二月暴动政策错误隐伏的根源。当时我曾正式要求自己担任区代表大会之报告。但是中央秘书处（王若飞）复信讥笑我自告奋勇，说道：你"病"，不准你去了。）

（十五）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曾有一通告，说明此后政策，应当"自己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去和左派合作，我们自己不可躲在背后——这是非常之大的进步，改变了汉口会议之杂凑政策了。但是可惜未曾明显的说以前原则上事实上的错误，使同志警惕而陡改前态。于是二月暴动时彭述之仍回原路要等小资产阶级（左派）罢市，甚至要等钮惕生（右派）运动好军队，有了把握之后，无产阶级才可以准备暴动；同时又不去领导左派群众，而只重在谈判。

（十六）一九二七年上海二月暴动失败后的市政府问题——共产党代表在"暗室"中与人家商量政府委员名单（应许之权执在右派手中），而不肯向群众宣传，做公开的选举运动。左派妇女群众赞助杨之华加入委员名单，左派领袖（市党部的）亦然，甚至右派领袖也不反对，而共产党代表主张可以撤消，以保存与国民党之良好关系，并且不主张做反对右派妇女委员郑毓秀加入政府之运动，亦是为了保持"良好关系"。

二月暴动失败之教训，并未丝毫见效。仍旧是“对右让步抛弃左派群众”之老策略——上海市政府中有无妇女委员，虽并无十分重要；然而放任右派的不去攻击，又不以自己的去抵制，总之，对于国民党左右的态度，在策略的原则上是很坏的。女同志违背某种手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未曾经过区委，确有组织上的错误；而区委对外代表的错误却是政治上的。

（十七）一九二七年三月初，中央又发一通告，决定“向右进攻”，这是非常之大非常之大的进步。只是反右的宣传纲要中，缺少一层重要意思：没有指出右派之妥协（和奉联日），对于全国革命，全国民族利益，是如何危险，没有指出这种妥协并不能得到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保境安民”，并不能得着日本的善意让步（单是指明他们的买办出身或压迫农工或违背中山政策等等——只有左派和我们自己的人容易懂得）。然而如果这一通告，真正将要成功全党党员新的“胜利”，那便是我们党空前的大进步——因为他指明湖南区委的错误：“轻视自己，依赖左派，怕惹起右派反动”，如果全党能针对这个心理改正，那就是革命胜利的第一步保障了。

我们将这些事实一一胪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这种“化学分析”的结果，是不是有孟塞维克的第二国际的原素在内呢！历史已经将我们放在世界上第二次的“十月”之前（虽然还不是无产阶级的十月）。但是我们不觉得自己是有何等伟大的力量！“五卅”以来，我们党的胜利，我们党的成绩之巨大，如果用比例法来和俄国革命进展的速度比较一比较，恐怕有过之无不及。中国从陈独秀同志的《新青年》（民国五年）之文学革命算起，到今年的上海的暴动，只有十年。这十年之中的历史阶段，都包含着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嘉腊摩晴的文学改革）到一九〇五年的类似的过程：资产阶级的

启蒙运动，民粹派运动，无产阶级罢工运动，工人阶级政党之组织……学生运动的分化，颓废派的发现，工贼反赤暴行的组织（俄国那时有反犹太的黑白队，中国现在已有国家主义派的圣道会宣传队）……我们的十年抵俄国七十年呢！我们党的成绩和胜利，说不尽的。但是，我想在大会上必定有人说，我不能再麻烦读者了（大概说，那些成绩是群众推着我们去得到的居多，我们自己主观上力争而得的太少）。我来说说“坏话”，虽然“不吉利”，然而良药苦口利于病呵！

我们党是有病，病的名词叫做彭述之主义，随便称呼也不要紧，他的实质是从我们实际工作和策略，零零碎碎汇合起来，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隐隐约约的系统。可以说并非彭述之一人的独创，亦许彭述之自己将要反对彭述之主义了。然而彭述之主义者还是很多。我们必须指出这彭述之主义，实在是孟塞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化身，因为群众和革命如此教训我们：如果再不明白的公开的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革命的胜利！

彭述之主义的策略是什么呢？

书生式的革命观与政客式的政变观——开始是“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暴动”死公式。好像画着图样造房子似的。他们（彭述之主义派）认为不是如此纯粹“特别改良”西洋式的革命，便不算真革命，而只是“畸形混沌”的中国货。因此，看轻中国革命中之“土匪头儿的南方军阀”之作用。这又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自以为是“教师”，可以教一切人以“科学的革命方法”。于是日常工作之中，不论是在何种人之中：国民党、军队、商人、学生、工人……他们都以教师面孔对人。开会有一定公式……睡觉有一定姿势，上毛厕有一定步骤。如果人家不大懂得他们“所教的书”，他们便说：你不懂科学的

革命方法，你是反革命。他们几乎要说："广东军队中某某军官不姓杜洛茨基，所以他决不是革命军，而是土匪头儿的南方军阀。"他们觉得中国的事处处不合他们的公式。但是等到军事运动的作用超过了他们的头，他们大惊奇之后，"恍然大悟"了：原来在中国运动小军阀，很可以革命，于是专心致志想着怎样使靳云鹗、叶开鑫……倒戈，使阎锡山改变态度……而自己不做群众工作。从书生式的革命观又渗杂着政客式的兵变观。此其一。

彭述之主义的革命组织方略怎样呢？

第二节　孟塞维克的独立观

无产阶级要独立的斗争，不能受资产阶级的恶化，要有独立的政党，独立的阶级意识。这自然是马克斯主义的真理。然而彭述之主义机械的了解这些真理。最初只要做劳动运动，不要国民革命；进而要做国民革命，可是不要加入国民党，进而自己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工人不要加入，南方可以加入国民党，北方不可以加入；进而产业工人不要加入；进而加入了不要做军事行动，还要教中山停止这种运动；进而自己只要独立政治主张，给别人看看我们比国民党好些，只要批评国民党，只要分辩我们不是只做国民革命，还在准备第二次革命；进而主张戴季陶有些理由，小资产阶级可以独立，我们也可以独立，两相方便最好；进而主张让国民党左派右派多做些事，我们不要引起他们共同的嫉妒，落得来做自己的事；最后进而竭力劝告忠告新右派领袖左倾些，我们自己右倾些，大家将就将就。这是一条路：从"本能的自我保存"走起，不知怎么样越走越不对，走到几乎要将革命的命运交给右派资产阶级！总之，是惟恐自己堕落在"民族陷阱"里忘了阶级，目光只注在怎样保存"阶级"，而没有注到怎样使这阶级领导得起民

族——因为自己心上以为工人阶级天然是领导者。孟塞维克反对列宁之加入“临时政府”的主张时，也说恐怕工人阶级加入民权政府要恶化，要晦蔽阶级意识，不能做“清高的”在野党极左派了。

因为自己以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革命方法”好，所以以为自己天然是指导者，故意与人立异——你只知道军事行动，我却知道宣传组织；随后军事行动“已成事实，不便反对”，那就索性说：你会军事行动，我也会军事行动；广东国民党会做革命中心，我们北京共产党也会做中心。何苦如此呢？——因为我们无产阶级是独立的呵！阶级应当和中国民族对立的呵！

如此，共产党内自己的组织纪律又怎样呢？

第三节　官僚式的纪律观与流氓式的纪律观

亦是公式！“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这不可移易的步骤；那么，区归区，地方归地方，农委归农委，工委归工委，妇女归妇女，小孩子归小孩子。一层层，“秩序井然”的公式放好在头脑里。这亦是不可移易的。按公式，一切服从党，党即区委，区委即书记，书记即……。按公式，某机关服从某机关，某级工会归某级党部管理，例如，如果某一工会在杭州有重要的活的作用，应加入杭州总工会，然而在组织系统上应属于江浙区委，并应加入铁总，那末，怎样办？——自然是服从区委，否则“破坏组织系统”或“违背党”。按公式，讨论某种事务，应经某某手续，如果为革命策略应付起见，忽略了这一手续，那亦不问有利于革命与否，一概推翻，“推出辕门斩首”。总之，不知道活用，于是根源于书生主义而发生官僚式的纪律观。党的“命令”自然是很尊严的。但是何以常常不解释理由，而只是军事式的命令呢？因为下级

人员不应当问“为什么”。这仿佛是为秘密起见。下级人员不准讨论政治问题：某种机关只准讨论某种问题，这也是公式的。于是群众同志习惯如此，便缺少建议力，甚至缺少革命意志：他自视如一兵士，要人家一拨一动的，他如何敢积极？何以如此？仿佛我可以找着一个经典：布哈林曰：“国家者阶级的也，故政治者，阶级专政也，阶级者服从党之指导者也，故阶级专政即党的专政也，党者党部指导者也，故即党部专政也，党部者由某委书记负责者也，故即书记专政也。”这亦是死公式。推演这种公式于党外群众，所以会在罢工之后颁布如此之纪律，“工人不准……不准……不准”。这仿佛是流氓团体出布告：“一切游民乞丐人等不准在此滋扰。”这种流氓式的纪律，是除为资产阶级保护神圣的私有财产外，别无他用。我们用于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之下，却也有些用处！

总之，没有积极的纪律，而只有消极的纪律。没有“不准不做某事，不准不讨论，不准不提议，不准不反问上级命令的理由”，却只有“不准说，不准问，不准讨论……”。再则，只有组织手续上的纪律，而没有政治上的纪律。区委对地委责备是常有的，但是真正纪律，政治上的纪律差不多没有。区委违背中央命令，违背政治议案而对之怠工，对于这些同志，却无所谓纪律。即使无命令无通告，如果负政治责任的同志有不好的倾向，有不适当的策略，也应当指出，使同志甚至于群众知道，然而这在中国，大半为保存面子起见，不宣布不直说的。殊不知道真能保存威信，并且使党前进的，正是自我批评。“家丑不可外扬”和“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办法，如今行不通了，宗法社会已经崩坏了。

其次，宣传教育又怎样呢？

第四节　童子师式的宣传教育方法

我们的对内教育，大半是注入的，而不是启发的，本来"好为人师"的书生，一则喜欢打人家手心，二则喜欢充博学。所以如果有人捉他的白字，他一定要反脸的。小学生问三问四，尤其是他所讨厌的。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公式：譬如说："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那么"小学生们，拿这公式去读熟，快来背罢"！如果学生问他："为什么，怎么样……那是什么，这是什么？"那么，他必定再摇头晃膀子，大背其他的公式，甚至于所答非所问。最后他说，这是列宁说的，"我即列宁，我难道会错吗？"这种教育当然不能使群众迎受下去。至于对外宣传，也是看轻群众。"群众只要简单的口号。不好一次太多了，分着几个阶段来。"这种公式，第一是不能指示前途，而只是逐段应付环境，群众反易拘泥；第二是不切事实——工人群众尤其在革命行动时，他们的问题多着呢。五卅时我看见小沙渡工人站着读墙上贴着的《商报》长篇大论的记载；他们心上要知道："咱们的工友打伤几个，怎样打死的，如今怎样了……商人怎样办法，工会怎样办法，'学生先生'怎样办法。英国要不要再开枪，再开枪怎样的对付，不开枪又怎样对付。"我们却说他们简单。如果我们还是这样看轻群众，我们的鼓动是收效很少的，这不是提高他们阶级意识的办法。再则，中央机关报上的政治鼓动，却也太"复杂"了。其实也不"复杂"。不过总是多"分析"、"研究"，而没有鼓动性。例如"分析"靳云鹗怎样要倒戈，怎样暂时不能倒；研究北洋军阀官僚出身是山东、直隶、安徽人居多，而南方军人、政学系、联省自治派之地主土豪代表，都是湖南人居多，革命党人都是广东人居多等。总之，偏重于多闻多见学博才高之表现居多，而鼓动群众，激刺群众太少！或是忠告右派的口气太多，

而激刺一般右派群众的太少。至于理论宣传，简直不必谈起。除译书外，主观上没有真正分析中国实际状况而宣传主义的意志；根本上不愿意适合一般文化程度，而自己用真正中国文来宣传主义于一般能读些书的群众之中。为什么？因为“我即列宁，我即主义，我已经懂了，放在肚子里，逐段的抽出来，按公式教导党部下级人员及群众，以至于孙中山，如此这般，革命自然成功。至于他们那些人，没有功夫来懂得全部理论和主义。”至于工人群众中宣传主义，简直大家默认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智识很浅；再则，工人只要实际行动中生出阶级觉悟来好了！

第五节　妇 女 问 题

我们党内看轻妇女运动，不分配相当的人力财力给他，不指导他，不想着他（自然，除出说“笑话”的时候）。而中国妇女问题是很重要的，宗法社会制度急遽的崩坏，有许多妇女群众，因为多感觉着一层压迫，往往比男子都要更容易革命些：男子有家累，女子“逃走”便没有“家累”了。北伐之中，有许多妇女自请从军的新闻，这总算是偶然的；然而所谓“女职员问题”，在现在社会之中，智识妇女大都有这个要求，并不一定是她们想做官，而是社会生活发展的结果，这种群众，是很有些用处的。况且即便无用，共产主义者决不应当等待右派做妇女利益的保护者（如雇用女职员——所谓男女职业平等），我们自己却怠工，我们不去抓住她们（而左右派妇女运动之分裂总是不可免的了！）女工群众尤其是重要的农妇亦应注意。这都不必说。不注意妇女，是党的程度之测量表。如今女同志幼稚，亦许要派几个男同志管理指导，这是应该的。

第六节　青年问题

我们党内不注意青年，也和对于妇女一样，不屑和他们讨论政治，不予以真正政治上的指导。施达林同志的报告已经说得很明白：青年是最容易感觉到一切压迫的。青年工人，实际上是我们党内工友同志中最有力的一部分。青年工人利益、童工利益、女工利益，都应当加十倍注意；各地职工运动中往往忽视，这是不可讳的事实。并且还要引起他们过问政治，参加政治斗争。至于学生青年，固然，我们要知道，智识阶级确在阶级分化之中；但是，学生不比成年人，他们思想未稳定，生活未独立（即没有确定的阶级利益），其中大半是可左可右的。右派根基较深之地，则学生较右。然而大多数学生，如今又在革命潮之中了。“三一八”前后，是北方暂时的反动局面，右派暂时得势的时候，所以学生群众之中，右派居然能得到些势力。如今右派衰落的趋势已见，学生运动之中有左派得势之前途。总之，这是智识阶级中最游动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趁此时机协同左派力争，否则，右派看着他们是最好基础呢。党必须同团努力加紧青年中的工作。

第七节　民族问题

我此地不说这问题之政治上的总意义。只说他亦是党的程度之测量表。北方内蒙古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之中，竟有人对待蒙古人以“天朝”身分的态度！上海韩国同志十余人请求编入中国党部，而区委始终置之不理，如此者几及半年（似已有八个月以上?）至今如此。韩人中亦许有不好分子；然而始终不应当这样忽视，况且他们还可以做些事。

*　　　　*　　　　*

现在我说完了。总说起来：我们党的主观上的程度，很不

能与客观职任相称，现在决不是历数“家珍”以自慰藉的时候，我们应当严格的执行政治纪律，暴一暴“家丑”，以极紧张极积极的努力，迅速的改正我们的错误，至少使个个同志知道“为什么”这是错的，然后能够增高党的斗争力，然后能够保持党在群众的威信，尽我们伟大的使命。那彭述之主义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中，表面上只求工人阶级的独立，甚至于高叫领导权天然在工人阶级手里，同时又说还要准备第二次的“永续革命”，实际上是忽视农民、兵士及革命军之作用，抛弃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势不得不与民族资产阶级妥协，而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时，又误认他是买办阶级，因此不能辨明军阀卖国主义与民族改良主义之区别，只知道谁不向我进攻，即认为革命派而与之联合，其结果纯为与资产阶级联盟之战术计划，于是一切策略错误随之而来，直到卖阶级卖革命而后止。至于党内官僚主义、书生主义之组织上宣传上的缺点，尤其是政客主义的投机与流氓主义的纪律，皆含有蔑视群众畏惧群众之心理，抑制实际斗争中之自动创造力，利用落后分子之盲从，凡此一切，皆与彼孟塞维克主义式的战术相发明，而形成似无实有之一种主义。”彭述之亦许应当研究一研究自己的主义，然后再能明了其“实成其为”一种主义。其余的彭述之主义派，或者各自取他的一部分，或今天如此明天如彼，虽然同取之于一个主义，而可以前后矛盾。这是因为彭述之主义，本是唯心主义的多元论的敷衍涂砌的实验主义的；他可以今天说：“这人没有，已经成鬼”，明天又说，“这人确有，然仅系其思想存在。”——如此合成其有鬼论。既如此，他的害处，比马尔托夫公开的孟塞维克主义更大。因为人人于无意之中不自觉的中他的毒。片断的看来，仿佛亦是马克思主义，不觉得他可怕。其实合拢在一个线索上，不但是非马克思主义，并且客观上简直是卖阶级。所以我们的党，必须毅然决然和这彭述之主义奋

斗。如今病还浅，革命时机紧迫，赶快医治，还可以治好！为医治起见，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我们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

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第二半国际早已因同病而死了，第二国际因为中国革命反对其主人，虽同主义而不敢要，第四国际也许因为我们得苏联之助而反对。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罢！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注 释

〔1〕即钮永建。

PDG

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周　恩　来

对最近的罢工和起义，很难说事先作了哪些准备工作。可以说，这是在事先根本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在军事上没有准备，从全党来说也没有准备。的确，在最近一次上海起义前夕，我们有约六百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员，但是对举行起义来说，这太少了。何况，起义前我们都知道，上海的军事委员会还弱小，在军事上，从武器和其他储备来说，是没有准备的。虽然我们以前把上海比作列宁格勒，是中国的心脏，但是从起义的准备方面来看，根本不能和当年的列宁格勒同日而语。没有任何准备的这种情况是全党性的，不仅从上海最近发生的事变说是这样，也不仅在上海是这样。在这些事变以前，在上海和中央工作的所有同志只是有一个很一般的感觉，觉得前次起义（十月二十三日）很可笑，有很多缺点，一定要努力改进。但这毕竟只是一个一般感觉，事实上还是没有什么准备。所以，最近这次起义固然不能同前次相比，但终究应当承认也是没有任何准备的。

就全党范围内都没有准备这一点我要谈几句。在接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以前，全党甚至没有夺取政权的想法

---

* 这是周恩来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的节选。

和打算。这种想法、这种打算，党和全体同志都是没有的。目前，我们的工作充其量只是帮助国民政府和帮助国民党而已。所以，关于民主专政、关于夺取领导权的打算，实际上是没有的，党一直采取了不提出夺取政权问题的立场。党不掌握政权，也就意味着在上面统治的是别人，我们只是在下面做工作，想的只是怎么得解放，再没有更多的想法——这就是党的立场。这里的情况当然比西方共产党的复杂，它们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夺取政权。我们在接到共产国际的提纲之前没有任何取得政权的想法。当然，这也不能责怪党是有意识地采取不正确的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过去党是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的，特别是在一九二五年的五月事件中，共产国际也没有给过我们像现在这样的提纲。既然全党从前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它在国民革命时期也就成了一种似乎是辅助的力量，而这对党的军事工作是很有影响的。例如，当我们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时候，党往往只是要我们去帮助某某将军，巩固军队，提高它的战斗力，吸引他参加国民革命，但绝不可把问题搞复杂了等等。在工人中间进行工作也是这样。工人想夺取武器，但是党没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如果工人有了武器，许多问题就会复杂化，工人就会去战斗，所以没有给工人武器。既然党只是起一种辅助的作用，军事工作也被看作是一种次要的工作，工人又没有武装起来，因此遇到像现在这样需要独立行动的场合就做不到，因为自己没有力量，没有准备。这一点在上海暴露得特别明显，因为在上海的工人区，党有很大的独立性，党在这里应当加紧工作，党的状况对这里的各个方面都会发生影响。例如，一接到共产国际的提纲，中央就进行了讨论，随后将提纲交给了上海地委。上海地委召开的代表会议，也进行了讨论。正在讨论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北伐军已到了杭州，占领了浙江。这个重大事件影响了上海，出现了罢

工。党只是在说，而形势却促成着罢工。

党的一般状况就是这样，对起义没有准备的最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后来，中央和上海地委对罢工都作了决定，认为罢工是必要的，但是几乎没有具体的策略和具体行动要求。也就是说，罢工的方式、方法、原因、目的都没有，只是通过了一个决定，认为罢工是必要的。北伐军的确已到来，这已不是传闻而是事实了。当北伐军到达杭州时，党和很多同志的状况就是仅仅一般感觉到要尽快采取些什么行动，使上海工人掌握一部分权力。这仅仅是一般感觉而已。所以中央决定，北伐军一到松江，就要举行罢工。而这只是一个决定，并没有具体的策略——关于民主政权及如何取得政权、关于总罢工（它必然会导致起义）等等，对这些都没有考虑，也没有考虑吸收广大居民参加。只是一般感觉到，为了在北伐军到来时上海工人能掌握政权，需要做些什么，因此才决定举行罢工，但是并没有具体的计划。而且，你们知道，总罢工的命令是总工会下的，而党并不知道。

中央通过关于必须举行罢工的决定是在二月十七日。第二天我就到你们这里来谈了这个问题。后来，我回到老头子[1]那里，刚刚开始考虑政权将是什么形式，第二天早晨罢工就发生了。就是说，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现在要问，罢工怎么可能发生呢？这当然很简单，因为革命的浪潮从五月事件起至今几乎没有停顿过，特别是在上海。所以，当工人知道北伐军来了时，就都起来了，第一天罢工的有十万人，第二天即有二十万人。由此可见，罢工主要是靠工人群策群力而不是靠党的力量进行的。

现在谈谈事变本身。

关于罢工和起义，中央没有明确的决议，这也是因为中央委员中间的意见也不一致。问题在于，罢工宣布太早，而起义

不是过早就是过晚。由于中央目前尚无明确的看法，所以我谈的只是个人意见。

我认为，罢工开始得太早，而起义则晚了。现在说明一下。这一次既然是总罢工，又发生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它当然不是经济性的，而是政治性的。但是首先，罢工缺乏政治准备。党只是刚刚讨论了或者还正在讨论要为取得领导权而斗争，要为政权而斗争。它只是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还没有什么具体的策略，没有需要做些什么的具体计划，因此，没有什么政治准备，特别是在群众中间。党有争取领导权、夺取政权这样的意见，而群众暂时还不了解这一点。当然，工人阶级从阶级本能来说是要这样做的，但是上海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这种打算，需要使它们表现出来，而党还没有做这项工作。

罢工前，没有宣传鼓动，没有散发传单，没有向工厂支部传达任务，没有开过群众大会或会议；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市委、区委都没有进行任何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更没有为这次总罢工而设的军事组织。那时并不知道，敌人有多少兵马、应怎样武装工人等等。至于罢工后要不要举行起义，如果要，将采取何种方式，我们能够夺取哪些力量等问题，从来没讨论过。

因此，可以说，这次罢工没有任何准备，实际上是没有党的领导的。

然而，罢工毕竟发生了。既然我们未曾准备，为何又产生这种情况呢？事情很简单：这是因为，当前整个形势对我们是极其有利的。最近，这里的革命浪潮非常高涨；正是在这里，军阀制度的解体和革命浪潮的高涨以及和帝国主义的冲突都交织在一起。在这样极其有利的形势下，这样的罢工才成为可能；而且，尽管它失败了，工人的情绪仍然很高。假如我们曾经做过某些政治、组织和军事准备的话，那么目前的力量对比可能完全两样。因此，下一步我们应该怎样走，要不要发动起

义，党和差不多全体同志都惘然若失，不知所措。更有甚者，在下令要工人罢工时，又责令他们不得闹事，不许暴动，总之不许有所作为。这正如老头子所说："那么只好让工人回家去吧。"不言而喻，既然这种罢工会导致起义，特别是在上海，这种罢工的目的是支持北伐军和改变政权，它必然是一次政治罢工。所以，必须承认，领导机构摇摆不定，不知所措，罢工就不可能转变为起义。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准备很差，但是又不得不进行起义。结果，我们的起义好似一种赌博：能胜则胜，不胜则罢，没有任何打算和计划。这样，在我们这里，竟然能够停止起义，这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可笑的；但是事实的确如此。更有甚者，在起义后，工人仍然莫名其妙，有些工人同志还问：为什么罢工？为什么起义？回答是：我们起义是因为蒋介石要来了。许多同志说，工人一无所知，真不好。我则认为，不是工人不好，而是我们党不好。工人罢了两天工，当局镇压很厉害，捕人杀人；但在两天之后，我们下令要起义，他们还是起义了。这样严守纪律的同志，这样好的群众，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只有在革命高潮、伟大的反帝运动和军阀分崩离析的局势下，工人才能保持这样的情绪。在罢工开始之后，党又犯了错误：犹豫不决，无所作为，只从事空谈，讨论要不要起义，如果要起义，我们有哪种力量、有什么把握等等。这些作法当然都是不对的。既然没有任何准备，还谈得上什么胜利的信心，还谈得上什么力量的估计呢？当然都谈不上。因此，不应该来谈西论东，而应该和群众中所有的力量在一起，立即采取行动。所以，在罢工发生后，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而我们却号召工人回家，这是不应该的。

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两个明确的打算或想法：第一，召开代表会议；第二，进行武装起义及夺取政权的斗争。党已基本上明确地认识到：这两种打算必须通过起义、通过武装自己来

同时实现。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政治志向，当然就谈不上什么起义；没有起义，也就谈不上代表会议的胜利。而且，这两项工作必须同时进行。现在就要召开代表会议，而决不是在起义后才召开。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特别是某些工作人员在这次起义中并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两种打算，因而在他们工作过程中，起义和罢工的领导者始终摇摆不定。既然认识不清，对起义当然就不可能抱有必要的信心，而对于召开代表会议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特别是关于这次代表会议，不仅一般市民不理解，连工人也不知不晓。我们以前对于召开代表会议并未考虑过，并没有为它作准备，所以群众对之相当冷淡，很不理解，觉得它并不是非要不可。群众开玩笑说：这好像谈恋爱，男女相爱上了，并且进行得不错，而父母却插手进来，要他们按着旧式婚姻去做；而未婚夫和未婚妻都认为，这是多余的。这次事变也是这样。事变发生了，而我们却加上自己的一套。所以许多群众觉得，这本来是不必要的，然而如果发生，那也只好算了。

在群众起义的时候，他们是怎样想的呢？他们想得很简单：为的是对北伐军表示热烈的欢迎。这就是唯一的目的。后来发现，北伐军并没有到来，而蒋介石离得很远，因而就谈不上什么胜利了。我们不仅对事变的发生没有准备，而且在事变发生了的时候还对群众说：罢工为的是支援北伐军。结果是，领导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向下级解释，而下级又这样传达给下属工作人员，层层下达。然而工作人员或者是一知半解，或者完全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再由他们向群众讲或者完全忘记讲，当然群众莫名其妙，或者在想：得啦，好吧，反正对我们没有害处。

虽然俄国同志很焦急，来了几封信，中央也着急，但是因为事前没有任何明确的建议和准备，所以在事变发生的时候，

就不免造成这种局面。事变既然扩大了，党本来应该坚决地行动起来，煽起风潮来争取群众、来促进他们夺取政权的愿望。而党却放任自流，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所以，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在这五天里，党动摇不定。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罢工不可能胜利，起义更不可能胜利，因为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对召开代表会议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在事变前既无准备，在事变中又开始动摇，所以群众的情绪日见低落，工人逐渐复工。在此情况下，中央认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所以决定停止起义。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要退却，同时为新的尝试作准备。从起义到今天，差不多八天过去了。在这八天里，我们加紧地进行工作，来改正在这次事变中所有的缺点，特别要使群众清楚认识召开代表会议这个政治口号。为此，正在加紧地进行鼓动、组织，特别是军事工作。但是，因为事变刚过了不久，而且群众对北伐军到来的希望没有实现，加之我们停止了起义，所以召开代表会议和武装起义的思想没能够在这八天里深入到群众中去。可以说，我们走了第一步；但还不能断定，群众是否了解了我们。群众知道，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他们知道这一点比知道召开代表会议更清楚些。为此，日内将散发传单，召开各种会议——党的、工会的，特别是军事的会议，全力以赴，在组织和其他方面为起义作准备。

除了军事系统的工作，在侦察系统、宣传系统以及其他有关方面，也进行了工作。目前，尽管加强了侦察系统的工作，情况较起义前要好些，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仍然不够充分。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条件的影响。以利用常熟农村的农民做工作为例，党在当地农民中间未做很多工作，农民还不习惯于承担风险，这一点不同于广

东的农民。因此，要他们去做侦察工作，困难较多。在广东就好办得多，这是由于党和农民有较密切的联系。当我们派常熟的农民去前线了解情况时，他们就有恐惧心理。我们对他们说，一天要走一百二十里路程，他们认为很可笑。可是，这对广东人来说，只是普通的行程，而且还要翻山越岭。因此，在侦察方面能取得多大成效，还是一个问题。我们能否确切地知道，北伐军何时到达了何处，还很难说。

再就是宣传工作。应当说，目前的状况是：李宝章的队伍和孙传芳的队伍都处于瓦解之中。他们一方面惧怕广东军队到来，想逃回家乡，卖掉枪支等；另一方面，这些部队里有南方人，由于他们是南方人，总想同广东军队联系上。这样，他们就在寻找我们，而我们也想在他们中间做宣传工作。这些队伍很不巩固，所以才出现这种情绪。但是，既要举行武装起义，而工人又武装得不充分，那么，尽管部队同我们取得了联系，尽管我们在他们中间做了宣传，情况还是不妙的。因为，这样的起义，到头来只会有利于他们，而不会是使军队的行动有利于我们。当然，钮永建很需要这些队伍。钮永建想把李宝章的部队拉过来，变成自己的队伍。很明显，我们不是替钮永建做工作。这些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假如工人的力量薄弱，这只会有利于他人，反之亦然。

现在谈一谈同警察、商警等的关系。商警们对军阀是不满的。他们目前在说工人的许多好话，这当然是虚伪的。但是，工人一旦强大起来，工人一旦采取行动，他们显然是不会阻挠的。警察也同样，他们正在寻求接近工人，想同我们取得联系，答应协助我们。他们说不会给我们制造麻烦，等等。甚至中国的流氓无产者也在寻找我们。我们的任务是，把商警争取过来，使他们站到革命政府的一边。对于警察，则准备再次进

行外交式谈判，最终解除他们的武装。至于流氓无产者，我们打算了解他们的处境，使他们不和右派建立联系，将来不至成为右派手中的武器来破坏工人组织。

现在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何时举行总罢工，何时举行起义。是否在北伐军占领松江、苏州和常州的时刻举行，这要看我们能做到何种程度的技术准备，要看我们拥有多少时间。我们想，总罢工是会成功的，起义也是会成功的，至少一千名工人武装纠察队还是能够建立起来的。我们过去对这里的事变了解不够，也许是了解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北伐军事实上已经到达或者没有到达某个地区，我们多少是获得一些消息的。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北伐军到达龙华，而我们事后才得知这一消息，这也是不好的。要举行罢工和起义，过早或过迟都不好。这里必须努力克服客观上的困难，也必须努力克服主观上的困难。例如，应该怎样搞好侦察工作，以便获得及时可靠的消息，以改善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还有武器的问题。关于武器，中央昨天提出一个意见，今天传达给你们。中央认为现在就应当购买武器。你们目前能否筹借二万元的一笔款项，将来由从汉口得到的五万元中归还。国民政府已决定拨给上海五万元，那时你们可以从中取回二万元。

在组织方面，可以说近几天内我们只是恢复了那些在罢工期间遭到破坏的组织。为了准备起义，军事组织刚刚开始巩固和扩大。在政治方面，现在应当把召开代表会议的思想深入到群众中去，使工人们知道它、理解它。应当使资产阶级、军队和农民也拥护这个思想。没有准备地举行罢工，无疑是荒谬可笑的。当然，我们有六百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员，但在这之前他们没有作起义的准备。他们只是编入了工人武装纠察队的行列，只是进行了训练而已，况且训练也是不充分的。因此，罢工一开始，尤其是又颁布了一道什么也不要做的命令，结果就

连这六百名武装纠察队员我们也很难找到。虽然有些人参加了斗争，但总的来说是很难召集在一起的。因此，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军事组织也没有作起义的准备，当暴风雨刚一来临，他们就不知所措了。

现在谈谈关于武器的问题。部分武器在上次起义时丢失了，有的损坏了，更糟糕的是由于我们对这次起义没有准备，因而武器堆放在一个地方。这些武器以前我们没有试用过，没有擦过，也没有把它们分配到各个区，因此，不得不在起义的当天发下去，结果有些同志得到的是不能用的武器或者是得到了武器不知道如何使用。另外，武器又很不够。所以装备很不足，也没有吸收干部参加。总之，所有这些作为武装起义的基础，由于我们措手不及而没有进行准备。

当然，这次起义还是必要的，我们坚持了并举行了这次起义。这次起义甚至有这样的目的：通过起义吸收一些群众参加，使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因而，尽管这次起义存在着缺点，但仍然具有很大的意义。海军还是举行了起义，我们迫使他们执行了我们的命令，他们开了炮，而为什么开炮，开炮的根据是什么，他们也不明白。我们要他们开炮，他们就开了炮。工人们在许多地方也行动起来了。他们的起义计划非常简单。例如，指定多少工人，哪个分队应当袭击哪个地段，再没有别的了。

这次起义毕竟同上次不同。上次（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不是名副其实的起义，而这次则是。因为它是一次武装行动，而且，在许多地方工人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开了枪，工人遭到了逮捕，尤其是经过这次起义工人们懂得了很多。

现在罢工已经被镇压下去了，武装起义目前也停止了。应当把这次起义看作是为将来的起义做准备。这次起义是小规模的、初步的，将来还会有更大规模的起义。有关这方面的情

况，我们内部已经谈了很多。现在正在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在六百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员中，我们也加强了工作。他们现在知道，我们号召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参加工人武装纠察队，而是为了举行武装起义。大部分的武装纠察队员是工厂的工人，小部分是失业者。

至于纠察队，计划召集五千人，有领导，也有计划。但要想达到这个数目（不要说更多），也是很困难的，实际上至多只有两三千人。现在在各个区里，在军事方面提出了一些口号，例如：(1) 准备夺取武器；(2) 研究本地区的军事地形；(3) 制定斗争方法；(4) 改善组织联络。应该说，通过这次起义，群众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即陈独秀。

PDG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为肃清军阀势力及团结革命势力问题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鉴：

中国国民革命之主要目的，自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统治及其在中国的基本势力，即实际上垄断全中国一切财政工业及交通机关。而肃清帝国主义所用以统治中国之工具——军阀官僚势力，以间接打击帝国主义，亦为达到此主要目的所必需的手段。

贵党自改组以来，与本党密切合作，共同领导全国革命民众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一切反动派作战，经过五卅运动，尤其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来，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全国革命高潮，已摇动了帝国主义及军阀官僚之统治中国的地位。

帝国主义鉴于中国革命高潮中，革命的武力与革命的民众已结成不可侮之势力，彼等对于统治中国之全部优越权利虽尚未根本放弃，而对关税及租界之特权，已不得不表示相当让步。军阀方面，直系之吴孙[1]相继破灭，孤立之奉鲁军阀亦已在苏皖豫晋一大弧线包围之危险的环境中，首尾不相顾，旦夕即有溃败之势，榆关以内，肃清军阀势力，以成革命的统一之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二期。

盛业，已非理想而近于事实了。

在这样情况之下，帝国主义已经懂得其利用本地军阀做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工具之传统方法，现已不完全实际适合了。于是帝国主义者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日本，指挥其工具奉天军阀，以“南北妥协”、“南北合作”、“驱除赤化分子”、“压迫共产派”、“驱逐左派”、“共同反赤”等口号勾引其所谓南方稳健分子，这分明是欲用“以赤制赤”之妙计，以离散南方革命势力之团结，以破坏革命，以重新巩固其濒于崩溃之地位。倘使此类流言仅属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片面宣传，吾人固可一笑置之；奈一月以来，“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声浪喧腾于中外报章（详细另纸抄录奉阅），最近日本帝国主义的《顺天时报》，且有“蒋介石……现正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甚积极，已请人提出条件”之说，介石同志对于此等流言，不但不曾有一语声辩，而且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中，竟谩骂武汉的左派为败类，要制裁左派，要制裁共产党，预言共产党将要失败，自称有干涉和制裁共产党的责任及其权力，这似乎是表示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的提议，因此英日帝国主义的报纸，都一致极口称赞他这篇演讲。

在北方将领纷纷脱离讨赤的安国军归附国民政府之时，而国民政府之最高军事领袖反有“以反赤名义与北方携手”之流言，则不独使革命的民众，对于国民政府怀疑，即新附之北方将领亦觉进退失据。此事若系介石同志个人行动，一经贵党最高权力机关明白制裁，则介石同志当未便一意孤行，将见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倘系贵党多数之意思，则事态便十分严重了，本党为革命前途成败计，不得不具函请教于贵党者一也。

复次，本党自与贵党合作以来，在政治宣传上，在前敌作战上，无时不严责同志为国民革命努力工作，其结果在北京、

天津、保定、大连、青岛、济南、开封、郑州、武昌、九江、南昌、上海、南京、蚌埠、杭州等处，牢狱中无不有共派的囚徒，刑场上无不有共派之血迹，武昌、南昌、浔阳决战中，无不有共派之惨壮的牺牲，自问于国民革命虽无殊勋，亦无大过。在党务工作上，湖南一省，纯粹国民党发展到七万人以上，共派不及其半，他省亦称是，而右派却有“亡党”之谰言。并且我们认识三民主义的革命的国民党，非他国纯资产阶级的落后的国民党可比，尤其是带社会主义性的民生主义，实有与本党长久合作之可能，不图贵党右倾分子时有两党分离之运动。

此次介石同志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中，一则曰纠正共产党，再则曰制裁共产党；本党乃代表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匪独不受他党之纠正与制裁，并不愿受他党之扶助，亦不曾受他党之扶助。介石同志所称纠正与制裁之理由，谓共产党党员对待国民党党员加以排挤压迫。使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中果有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之事实，不独国民党得据党纪加以纠正与制裁，即本党最高机关亦应加以处分，然而事实恰正相反。试问本党对于贵党的党务整理案有过异议没有？事实上有违反过此案的决定没有？不但事实上未曾违反过此案所决定，而且为避免纠纷有超过此案所决定以上的退让。中央委员，共派本来不及全数三分之一，新近广东及江西省党部之改选，经贵党中央之圈定，广东十五委员中共派只三人，江西九委员中共派只一人，这是谁排挤谁，谁压迫谁？介石同志自己也说：“譬如中央有一个决议，有一个命令，或委一个干事，有许多同志来问这个决议，这个命令，这个干事，究竟是哪一个执行委员提出的？这个执行委员究竟是跨党分子不是？”这又是谁排挤谁，谁压迫谁呢？

在本党的立场，只知随事随时努力工作，对于一切职务分

配，一向不愿争持；而在贵党的立场，在革命工作的立场，一切职务之分配，似应以工作能力为标准，不应以跨党与否为前提，倘不以革命工作为前提，而专以防闲跨党分子任职是务，是则只愿共派分子在国民党为挂名党员，还有何合作意义？介石同志为贵党负责领袖之一，对于腐败官僚投机分子方尽量容纳，而于他自己也承认是革命分子的共产党员，却防闲之，排挤之，且一再声言制裁之，这究竟是出于何项动机？贵党最高机关若听任此种状况继续下去，是否有碍合作之精神？本党为两党共同进行革命工作计，不得不具函请教于贵党者又一也。

以上二事，一则关于肃清军阀势力问题，一则关于团结革命势力问题，对于革命前途均有重大意义，故敢于坦率直陈，希即一一赐教是幸。专此，谨致革命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三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吴佩孚、孙传芳。

PDG

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全中国工人同志们：

三月二十一日从今成了中国革命史上最有价值的一个纪念日。此次上海八十万工人就在这一日举行总同盟罢工并暴动起来反对直鲁军阀的统治。整整经过二日一夜的巷战，工人终于解除直鲁军的武装并自己武装起来了。正因工人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始不经战斗安全占领全上海，而上海各界民众亦得避免数千直鲁军抢劫之惨剧。

上海工人阶级此次英勇的胜利的斗争，真可为全国工人阶级之模范。上海本来是全国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工人阶级本来是全国工人阶级中，数量最多组织最好奋斗历史最长久的一部分。

轰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就是由上海工人首先发难的。自从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工人时时刻刻都站在最急进的地位，为全国工人阶级之先驱，因此更为全国革命运动之先驱。

此次武装暴动起来并胜利以后，上海工人就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三期。

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

可是，上海工人此次的奋斗及其胜利，却惹起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官僚、土豪、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大大的恐慌。他们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发抖，他们认识了工人阶级是他们的劲敌，尤其是数量最多组织最好行动最革命的上海工人阶级，尤其是现在暴动胜利并自己武装起来的上海工人阶级。所以他们尽力注定目标向上海工人进攻。他们除直接的公开的用尽种种方法进攻工人之外，又用挑拨离间之诡计，诱惑国民革命中右倾的势力，他们以此诡计使本同在一战线上的革命武装势力之一部分，怀疑更进而敌视工人阶级。革命战线之分裂正是反革命的利益啊！所以上海工人现在虽然驱逐了直鲁军阀，虽然一部分武装起来，虽然联合各被压迫阶级建立了革命民主的上海市政权之基础；然而这些革命的胜利品时时刻刻都在危险状态，时时刻刻都有被内部妥协分子葬送即被敌人夺回之可能。而上海革命势力失败，上海工人牺牲白费，即足以摇动全中国的革命潮流，全国工人的势力自然因之受重大的打击。所以全中国工人同志应该崛起，视上海工人暴动的胜利即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亦即是国民革命的胜利；应该自信工人阶级的力量能够解除军阀的武装，并建立新的政权，上海工人的武装就是国民革命胜利之保证。起来！

学习上海工人暴动巷战的教训！

拥护上海工人的武装——总工会纠察队！

拥护上海革命民主的新政权——上海市民代表政府！

拥护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并扩大革命的争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

毛　泽　东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

---

* 本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篇报告。

PDG

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 织 起 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

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

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

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 命 先 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了。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

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

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

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

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颤。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

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

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

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减，囤积居奇的绝迹。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后，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许退佃，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减息。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他县亦有减息的事。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债的事。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债。旧债不仅减息，连老本也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

还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支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支，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

投降，例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支。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支、五六万支、三四万支不等。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

他拒绝。上头所说农会说话飞灵，是在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出席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的代表们。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的县政府，形式和实质，都已经是颇民主的了。达到这种形势，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这才开始巴结民众团体，变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承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

（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豢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

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

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第九件　农 民 诸 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　　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运动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是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

会吗？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　废　苛　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十二件　文 化 运 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

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

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PDG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郭　沫　若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他的罪恶书不胜书，我现在只把他三月二十三日在安庆屠杀党员、屠杀民众的最近的逆迹向我们的同志及各界民众公布。

我们是三月十六离开南昌的，他比我们早一天到达九江。九江的“三一七”惨杀已经在我们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污点，但我们那时候对于惨杀的暗幕还不曾明了，主持这场惨杀的究竟是甚么人我们还不曾知道。我们对于他虽然不免已有几分怀疑，但我们还以为他总不会是主使的人，主使的人一定是段锡朋、周利生等等背叛民众的党棍和走狗。及到“三二三”的惨案发生，我们才知道了这个阴贼险狠的大叛徒——这个万恶滔天的蒋介石！

“三一七”惨案发生后，第二天他就命令我们到安庆去。我们是在十九号到达安庆的，他比我们迟到一天，安庆的民众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十日出版的《革命生活》日刊。

在省市党部的指导之下所表示的欢迎他的热诚，可以说是空前所未有。安庆在“青天白日”的旗帜（国民党的党旗）之下复活了起来，安徽省党部正在召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准备组织正式省党部以推行国民党的主张。代表大会本是预定三月十号开幕的，听说蒋介石要移驻安庆，便专为他延期到三月二十二日。安徽省的党员同志对于他所表示的拥戴的热诚，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但就是这个过于迁就的表示早伏下了无穷的危机，我早就忧虑到大会的进行恐不能够顺利地开幕。不料我所怀抱的忧虑竟成了显然的现实——而且是很残酷的现实。

三月二十二日代表大会开幕，就在开幕的那一天，便发生了惨案的痕迹了。

先是安庆城内有四个总工会，一个是在省党部指导之下成立的，其他三个都是投机分子们的非法的组织，三个之中比较纯正的两个，已经由省党部和政治部把他们合并了起来，只剩下鲁班阁的伪总工会，完全是由劣绅土豪收买流氓地痞所组织的。每人出洋四元，入会后不纳会费，并赠送一个银质的徽章。如此重价收买，也才仅仅得了一二百名的会员。这个伪总工会无论怎样是不能够听他存在的，所以党部早就有命令叫他们解散。我们总政治部到后，也就在二十二的那一天，下了一道命令去叫他们停止职权，听候审查。但他们所借口的是说奉了总司令的命令组织的。在当初我们还以为是他们的梦呓，所以我们也就没有顾虑。不料就在二十二的那一天下午二时的光景，刚刚把代表大会的开幕典礼举行完毕，他们伪总工会的暴徒们便簇拥至设在省长公署的总司令行营前面。他们举了代表去要求见蒋介石，蒋介石也出来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说是他们受了压迫，本总司令是要秉公办理的，务要使他们不受压迫，望他们安心。

总政治部是设在第一中学的，那时候我也没有在总司令

部，我因为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典礼，弄得一身都是汗，我便偷了一点机会去洗澡。当我洗澡还未完毕，便有人来报告我，我便赶到总部行营，看见暴徒们还聚集未散，总司令部特务处的副处长温建刚在那儿指挥，我向他询问一切的情势，他才把蒋介石的一段话告诉了我。我还听说是省党部的常务委员光明甫同志在总部行营前已经受了暴徒的殴打。我没有再事羁延，便一直跑到内里的总司令室里面去。

蒋介石的居屋是平列的两进房间，第一进是会客室，第二进才是他的寝室。我走进第一进的时候，看见光明甫同志坐在那儿，他把他扯坏了的衣裳和抓破的颈部指示给我看。我看了又走进了第二进去，蒋介石正坐在书案的旁边，他立起来叫我坐，我也就坐了——这是他对于我的惯用的礼貌，别的部员见了他的时候，总是用立正的姿势来向他对话的。

他说："今天的事情你晓得么?"

我说："我到总部里面来才晓得的。"

他问我究竟是怎么的一个起因。我便把伪总工会的构成和我们对于他的态度说了。

他说："你以后对于民众团体的态度总要不偏不袒才好。你去调查一下，把他们合并起来，把他们调和起来好了。"

我说："只要有调和的余地，我们当然要替他们调和。不过恐怕事实上很难，总司令是看见的，他们在总部面前便实行用武力打人。"

他说："好啦，好啦，你去调查一下好啦，唵，唵，你去调查一下好啦。"

不得要领的说了一番话，我便退了出来，他也跟着我出来。我们又同光明甫同志会谈。光明甫同志请求他对于当日的暴动要加以相当的制裁。他只口口声声的说："好啦，好啦，调查好啦，让政治部调查好啦"。

明甫同志说："今天的事情可以无须乎调查，他们是在总司令部的面前行凶，总司令是亲眼看见的。我这伤痕，我这衣服，便是真实的证据。总要请总司令立刻查办一下，我们做党的工作的人才能得到一种保障。不然，我们党部同志个人的生命不足惜，我们的党是永远立不住脚的。"

明甫同志很像是一位直爽的人，他又受了侮辱，他的神气已经有几分激昂，而他的语气更不免带了几分愤意。

蒋介石也不客气的用批评的态度说道："其实你们做指导工作的人没有做好，你们不免有些偏袒，所以才激成了这样的事变。我已经叫总政治部去调查了，我看最好是把两个工会合并起来才好。"

明甫同志说："工会是一回事，暴动是一回事，工会的合并由总政治部去调查，只要认为可以合并就合并起来，只是今日的暴动要请总司令惩办一下。"

我在旁边也帮助明甫说了一遍，逼得他没法，只得借口的说道："好啦，好啦，我警戒他们一下好啦，唵，唵。"

就这样不得要领地又谈了一番话，明甫先走了。蒋介石对我说："安徽的事情是顶难办的，顶扯烂污的是安徽人，在革命党中扯烂污的多是安徽的同志，你不信，你看，他们还要打呢，还要打呢。"

做一个总司令的人，自认为最能够革命，是革命党的领袖的人，竟说出这样无聊的话。他明知道他们还要打，而他全不加以丝毫制裁，这是甚么道理？我当时心里不免有这样的愤恨，我相信读者读到这儿也不免会有这样的愤恨，但是不忙，且看下文便可以知道他的葫芦中卖的是甚么药了。

二十二日的晚上反动团体送了一张请单来。请单的上面是这样写的：

安徽省农民协会
安徽省总工会
安庆市商民协会　　各筹备处谨择三月二十三日
安徽省学联会
安徽省妇女协会
休业一天，于上午九时在白日青天开市民欢迎大会。

安庆市民大会敬订

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已经在二十号举行过一次，由省市两党部共同召集的。现在又要来举行，他们反动团体的阴谋是很显著的。我预算着他们是定会有一番大规模的暴动，当晚我就派人出去调查，没有得到甚么结果。第二天清早又继续调查，并得着第三十三军政治部的报告，晓得他们组织了一百名的敢死队，是出钱买来的流氓，每人四元，并且还有一种赏格，便是负轻伤者一百元，负重伤者五百元，丧命者一千五百元。暗中主使的是总司令部的某某人我们也知道了。我当时便派人出去通知市党部及各种合法的民众团体，叫他们先作准备。一方面我又亲自跑去见蒋介石。

二十三日的一天是大雨，我们还以为反动分子的集会或者会延期，但是走到街上各家店铺多已贴出一种红纸墨字的印刷的标贴，写着“本日欢迎蒋总司令，一体停市一日，安庆市民大会订”等字样，可见他们的阴谋是很有准备、很有组织的了。我走到总部行营门口的时候，看见特务处长杨虎、副处长温建刚、总部参议刘文明、前总部秘书现充独立第五师党代表姚觉吾、第四十军党代表李因等，全身雨衣雨帽，神色惚惚的由总部走出，大有如临大敌的光景。我一直走进总司令室的门前，门是由里面反扣了的。我问侍从副官，说是在会客，我便退入西侧——总参谋长室。该室与总司令室对称，中间隔了一

个小小的中堂。室中也分二进，总参谋长朱一民也在第一进里会客，我便退在一旁。我隔着门帘看见第二进的寝室里有许多长袍短褂的人，在总部里素来是没有看见过的。那些人都站着好像在等待甚么，又好像在开会的光景。少时杨虎和姚觉吾先后进来，和我略略应酬了一下。又走进内室里去了。我坐了一会，又来了一位安庆电报局长，这是一位矮小半胖的人，大概有四十三四岁的光景，脸色是带青灰色的，左眼有点斜视，矮子的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他来和我寒暄，问我认不认识谢慧生（谢持），认不认识杨庶堪，我都答道认识。又问我从前在上海住在甚么地方，我说是环龙路四十四号。他大约相信我是西山会议派的一个分子了罢，便把声音放低，便对我说出许多秘密的话来。我把他招到屋隅，两人并坐在一张长藤椅上说话。

他说："我们这一次的工作做得还算不差，我们在三个礼拜以前便把各种行帮的工头买贿好了，我们立刻就把总工会组织了起来。其他农会、妇女协会、商民协会我们都组织好了，所以我们党部的捣乱分子，走来就插不住脚。"

我称赞了他们一番，又说："好是好，但只是一个空头的团体，他们捣乱分子依然还是要捣乱的，我们总要有一种武力来制裁他们才好。"

他听见我说，便很得意的说道："有的，有的，我们昨天打了一次你是晓得的，我们今天还要打呢。"

又另外说了些闲话，我问他安庆的青红帮有多少人。他说："不少，不少。"

我说："青红帮我们和他们总要有联络才好。"

他说："是呢，是呢，我们早联络好了，九江、安庆、芜湖、南京、上海一带，我们都和我们的'老头子'联络好了，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

我说："我们的杨处长杨大哥，他这一次的功劳很不小。"

"嗳！就全靠他老哥子！"

你矮胖的斜眼局长！我真多谢你这一句话，所有一切的内幕我已经知道了一半了。在二月初头的时候，蒋介石委任了四个上海的大流氓为驻沪特务员，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用意之所在。那时候我和总政治部铁罗尼顾问谈起，铁顾问问我是何用意，不消说我是没有话来回答，我记得我只回答了一句笑话，"大约这就是他的所谓下层工作罢"。但是现在我明了了，我得到明确的答案了。我们的总司令是勾结青红帮来和我们革命的民众作战的英雄！你看我们国民革命军三色识别带不是变成了青红带了吗？这就是说我们革命军的总司令已经成了青红帮的老头子了。我们是何等的光荣呵，三民主义已经被流氓主义代替了，猗欤休哉！

我和斜眼局长谈话的时候，杨虎、姚觉吾诸人惶惶然如将赴猎的鹰犬，时出时入，并不断注视我，我也不便再行多谈，并且我也恨我的听觉不幸得了慢性的中耳炎，斜眼局长告诉我的秘密，我至多只听到了三成，然而我也算达到目的了。

我推诿着要去见总司令，便把谈话中止，走出室来。总司令室的房门依然是反扣着的。我告诉了侍从副官，说我到交通处去了，请你随后来关照我。

我一直走出来，走向交通处长陆福庭的房里去。走过第二进的大堂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的反动团体的打手鹄立在那儿，有刘文明、李因、温建刚诸位豪杰在那儿指挥。我走过身去见了陆福庭。

福庭他号叫心亘，是从"恒"字拆开的，取的是"人贵有恒"的意思。他是一位忠厚长者，在总部里面我最喜欢他这一个人，他也很能和我要好，但我现在要把他告诉我的一番话实写出来。心亘呵！我知道你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你是具有革命

热诚的人，万一我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于你的地位，乃至于你的生命有甚么危险的时候，我请你不要怨恨我。

我见了福庭，他也不免带了几分愁容在他的古铜色的罗汉模样的脸上。他开口便向我说："安徽的事情弄得这样糟，你是政治部主任，你应该怎样办呢？"

我说："我能够怎么办呢？总司令不要我办，你叫我怎样办呢？我今天就是要去向总司令请示办法的。"

"你见过他没有呢？"

"他还在会客。"

"昨天打架的事情你晓得不晓得？"

"我怎么不晓得呢，今天还要打呢。"

"是啊，是啊，要闹得一塌糊涂。"

我说："你怎么不去向他说呢？"

"我怎么能够向他说呢？"

我说："你是安徽人，你又是一位忠厚长者，老总待你也不薄。你看见老总一天一天和民众脱离，你看见安徽的民众一天一天的更要受深厚的痛苦，你应该救救你们的乡梓，应该救救老总才行。你的话老总一定能够相信的，你赶快向他忠告一下罢。"

他抱着手只是摇头。他叹了一口气说："哎，我敢说一句话，总部里面的安徽人除开我而外哪一个不是王八蛋！他们只顾自己的升官发财，天天去包围老总，把老总弄得个莫名其妙。我一个人孤掌难鸣，所以我也只好装聋装瞎装哑，看见的当着不看见，听见的当着不听见，假使张治中还在这儿，我也没有这样孤单，我也可以说两句话。"

他说的时候，两眼圆睁着分外的发光，全部的面孔都涨红了。这正是他的诚恳的人格的表现，我在他的面前总觉得自己这样不好，我不该假意的做出了许多表情来逗引他说出比我更

知道得详细的秘密。

我说："假使老总不给我一个办法时，我要向他辞职，你看怎么样?"

他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到了南京再说。"

我说："陆大哥，你要替我想一条出路呢!"

他只是说到了南京的时候再说。他停了一下又说："到了南京一定是要大流血的，你看吗，你看吗，老总一定是要拿人!"

"你看他拿人的时候会不会先拿我!"

他略略停顿了一下说："不会吧!"

我又激励着他说："你究竟还是应该先向他忠告一下的好。"

他说："我是不好说的。"

我故意的激昂起来，我说："你不敢说，那我要去说，我今天是决了心来的，他要枪毙我，我也要向他说，像他这样和民众脱离，我不忍心见他走到绝路。"

福庭沉默了一晌。他说："你晓得他们打架，在暗中主持的是甚么人?"

我说："我怎么不晓得呢，就是杨虎他们连络起青红帮干的好事。"

"对，你晓得了，你还说甚么!"

我说："惟其是晓得，我定要去说。他们这些人不消说也是忠于老总的，但他们所用的方法只是送葬老总的。我不忍心看见他被他们包围。"

他又叹了一口气说："哎，我看你还是不去说的好吧。"他把声音放低，又向我的耳边说道："你晓得吗，杨虎是老总命令他来干的!"

说了，他把眼睛向外放出一段白光看着我，他的面孔还带

着一个“你晓得吗?”的神气。

我又沉默了一下，又问他：“你怎么晓得?”

他说：“是小波（杨虎的号）亲口对我说的。”

两人从此沉默了。啊！我已经知道了这场黑幕的全部了。陈赞贤的惨案为什么他批准了对于倪弼的免职查办时又叫我不要打电报到赣州去？段锡朋、周利生等为甚么敢那样坚决地解决南昌市党部？九江的“三一七”惨杀为甚么发生得那样离奇？这一切的背景我是完全知道了。在这儿让我来补叙一下以往的历史罢。

赣州事件的起初是在正月尾间，那时蒋介石在庐山，总部的事情是由张群一手包办，他当时接到倪弼捏造的电报，便把新编第一师第二团团党代表段喆人免职查办了。不久蒋介石回了南昌，才将赣州事件的全案交政治部查办。我当时便拟了一个办法呈报给他，请他将倪弼调开，然后赣州的事情才有办法，但他没有批发下来。后来我又当面向他说过两次，两次他都答应了我要把倪弼调开，但总不见他实行。最后倪弼更加刁恶了起来，终竟把陈赞贤杀害了。省政府当时来了一个公函请政治部严办。三月十二日的清早，就是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我拿着公函夫向他请示。他说：“免职查办吧。”我说：”那末请总司令亲笔批示。”他说：“好的。”便提起笔来想了一下，批了“免职查办”四字。我又问如何查办法，命令如何下？他说：“你用我的名字拿去登报好了，但不忙打电报到赣州去。”他这岂不是欺骗的行为，只是略略用些伎俩欺骗民众吗？

就是段锡朋、周利生等的行为我也当面向他说过几次。就在他临走的十五号的晚上，我听说省党部有解决市党部的消息，我又向他说，他当时便写了一封信给段锡朋，说“江西党务以后事事须与总政治部接洽，对于市党部事宜缓和为是”等

语。我当时觉得非常的满足，以为可以免去一场纠纷以静待中央的命令。但是当晚他走了，第二天我们也奉命出发了，段锡朋、周利生辈终竟把市党部强制解散了。俟后南昌总部、省政府、省党部打成一片，背叛中央，收买流氓伤兵几次想大肆屠杀，幸亏第三军第七师深能负责，保护地方的治安，他们的阴谋也就没有方法暴露出来。最近听说总部已向赣州调新编第一师来南昌，这是显然要把屠杀赣州的手段在南昌重演一次，这些假说没有蒋介石的命令，总部留守的张群，他有这样的狗胆吗？

三月十六我们到了九江，第二天他就命令我上庐山去视察阵亡将士墓的工程。我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回九江，刚刚遇到暴徒们把九江市党部打完了的时候。暴徒们手拿武器在街上游行，长矛大刀等等不一，尤有一种特别的武器形如连枷，上面纵横都是尖刀，也有的是竹头的尖钉。我走到总工会门首的时候，看见一位工友被打得头破血流，一身都是血渍，我才知道已经打伤了好几个市党部的执行委员，还打死了好几个。那时街上有些店铺已经罢起市来，我便跑到审判厅的总部行营里面去见蒋介石。门首正簇拥着无数暴徒，参谋长朱一民正在代表蒋介石向暴徒们演说。所说的话刚好和蒋介石向安徽伪总工会所说的一样。

我去见蒋介石，把外边的情形报告给他，请他派兵去赶快把暴徒弹压着，首先要解除他们的武装。不一会朱一民进来，报告他代表答话的情形，说他们送了六个人来，如何处置。蒋问有名单没有？朱一民交出了一张名单。蒋说把他们接受起来。我又催促派兵弹压。我说假使不赶快弹压，九江会要罢市，全体的工人也会要罢工，情势是很严重的。他当时便命令朱一民派兵，我也就退了出来，因为他叫我们十八号出发。但他派兵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暴徒们暴动后，工友们愤激起来，

顿时召集了纠察队来要求解除暴民的武装。他派了他的卫士大队去一方面弹压工人，一方面掩护暴民出市，同时借保护为名竟把市党部、总工会占领了。工友们愤不欲生，开会讨论对策，全场只是痛哭，那种凄怆的情境真是惨不忍见、惨不忍闻。工友们要求“三一八”全体总罢工，后来又举出代表向总部请愿，算把六位打得半死的同志打救了回来，但因为念到军事时期，南京尚未克复，正是输运军队的时候，大家都忍气吞声，没有把罢工的事情实现。但是蒋介石对于罢工的策略，却早已决定好了，他当晚就任命第六军的留守唐蟒为戒严司令官，叫他要禁止工人罢工，同时又密令初开到九江的警卫团，假如“三一八”有工人罢工，便立行拘捕。

他对待民众就是这样的态度！一方面雇用流氓地痞来强奸民意，把革命的民众打得一个落花流水了，他又实行用武力来镇压一切。这就是他对于我们民众的态度！他自称是总理的信徒，实则他的手段比袁世凯、段祺瑞还要凶狠。他走一路打一路，真好威风。他之所谓赴前线督师作战就是督流氓地痞之师来和我们民众作战！赣州、南昌、九江的事变都是出于他的指使，但我们还找不出他指使的真凭实据来。我们还替他原谅，就是说或者不是出于他的本心，只因为他的环境不良，他是被他周围的群小误了。国民党内的人们可以说大多数都在这样的替他原谅，总要想出方法来救他。但是现在我把他的假面具揭穿了。在安庆“三二三”之变我看出了他的真相来，他不是为群小所误，他根本是一个小人！他的环境是他自己制造成的，并不是环境把他逼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听了斜眼局长那番话，谁个还有方法来替他辩护呢？现在还有人来替他辩护，那就是国贼，那就是民众的叛徒，我们要尽力的打倒他！

我在陆福庭房里谈了一番话后，蒋介石的侍从副官来了，

我便走进去见他，照例是那几位豪杰杨虎、朱一民、温建刚、姚觉吾、刘文明、李因等等正在提刀上马准备和暴徒们出去杀民。朱一民是代表蒋介石出席大会的，他是今天的暴徒们的代理总司令了。

我去见了蒋介石，他带着一种栖遑不定的神气。

我说："今天又要开会了。"

他说："他们那么样子干，我是不出席的。"——看，他这岂不是不打自招吗？他刚才反闭着房门在和甚么人密议些甚么，我们是很可以想象得出的了。

我也老着面皮向他讲："我们可不可以派点兵去保护省市党部呢？"

他说："你去向参谋长讲罢。"

我反说："像现在这样军事紧急的时期，这种捣乱的集会，我看总司令可以下一道命令去解散。"

他说："好吗，你去向陈调元讲罢。"他还要解释一句说："他是维护这儿治安的。"

我平生最感趣味的，无过于这一段对话。他以为我是全不知情，在把我当成了小孩子一样欺骗呵。蒋介石，你要掩盖些甚么，你的肺肝我已经看得透明，你真可谓心劳口拙了。

我又只好退了出来，朱一民一面好像忘了甚么东西又回转到他的参谋长室，我也把派兵的话说了一遍。他马马虎虎的答应了，也没有说派，也没有说不派。他走出去，我也跟着他走出去。那一群豪杰杨虎、刘文明、温建刚、李因、姚觉吾等等指挥着流氓把朱一民簇拥起去了。我从流氓群中赶回总政治部，又派人往四处通报消息，叫他们没有准备就赶快回避。还算好，待我第三次派人出去回来报告，说省党部及各种合法的民众团体统统都被捣毁了，打伤了六个人，重要的人物都避开了。

这打伤了的六个人里面有两个是七军政治部的人，有一个是省党部的干事，有三个是外县来赴会的代表。三个代表有一个是从旅馆拉出来的，有两个是一位男同志和一位女同志，他们到省党部去开会，适逢着暴徒们，便被擒着。暴徒们把他们的外衣剥了，只剩着一件衬衫，打得半死之后拉着他们游街，说他们在省党部白昼宣淫，这就是共产公妻的赤化分子榜样。暴徒们沿途高呼口号，甚么“新军阀神圣万岁”啦，甚么“蒋总司令万岁”啦，甚么“打倒赤化分子”啦，真是叫得恰如其量。他们确是捧出了一个“新军阀”来，他们确是捧出了一个“实行讨赤的新五省联军总司令”来了。暴徒们把打伤了的人拖到总司令部的门前便一哄而散了。这就是蒋中正的群众，这就是蒋中正的忠实的同志，这就是蒋中正的纯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也就是他所认为可以候补文天祥、陆秀夫、岳武穆[1]的材料了。真真是新军阀神圣万岁啦！讨赤联军总司令万岁啦！猗欤休哉！猗欤休哉！

写到此地我也可以不必再写了，但是还有一点余谈。

那天暴动了之后，李德邻[2]军长曾去见蒋介石，问他有甚么办法。他说：“是民众打了的，我有甚么办法呢？”

我当天晚上也冒着险去会他，他仍然是那种老调子：“好啦，你去调查一下好啦，唵，唵。”他最后还向我说：“你去把他们各项的执行委员找出来罢，我们好保护他们。”我心里倒忍不着要笑了，好保护他们？哼，找出来好让你一网打尽吗？

这是我和他的最后的一次谈话。他第二天清早便乘着军舰出发了，我们以为他到了芜湖必定又有一场杀伐，但是南京克复就在他痛打安庆民众的这一天，他大约是在途中得到这个消息，所以就赶到上海去了。他日夜梦想的就是在克复南京，好实现他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春梦！但不幸克复南京的是富有革

命性的程颂云[3]军长所指挥的第六军。在第六军未克复南京之前他使程颂云军长孤军奋斗，不给以充分的接济，不给以充分的后援，想和程军长攻入南昌城一样再加以一次打击。然而勇敢善战的第六军终竟把南京克复了，从浙江入江苏的第二军也和第六军会集了起来，这是我们革命势力的最大的一个屏障。他现在新发表了一个作战计划，就是要把第六军、第二军调赴徐州，把何应钦和白崇禧所领率的他的直属部队来镇守南京，他的阴谋是十二分地显著的。他现在想解决第六军、第二军，同时还想解决第七军、第三军，他和陈调元、王普、叶开鑫等深深勾结起来，陈王的军队现驻在芜湖，本来是应赴皖北的江左军（第七军）只有一营人驻在安庆，他也把他调到了芜湖，这就是他一方面想借陈王的军队来断绝六、二军的后路，一方也想来解决七军的一营。他取的是零碎击破的策略，这个策略在对第三军的手段上更为明显。他把第三军第九师调到当涂，名义上归程颂云军长指挥，把第三军的第一师驻扎安庆，名义上给李德邻军长指挥，驻扎南昌的第七师他仍然在不断的零碎调遣，他这样使第三军已经不得成军，而他在江两方面不久正要为所欲为。目前所有的交通机关都握在他的手里，电信、邮局可被他严密的检查，前后方的消息完全隔绝，他防备近友比防备敌人还要厉害。我们从安庆拍发的通电全被扣留，比如安庆“三二三”的惨案，九江、南昌的同志，竟连丝毫的信息也不曾得到，拍到各地方的电报也被扣留了。中央已发表以李德邻军长为安徽政务委员会主席，被他扣勒着没有发表，另外擅行委任了一批二十八名的政务委员，去掉几位洁身自好绝对不会服从他的伪命令的同志之外，都是些败残的军阀，安福系、西山会议派的余孽、流氓痞棍的头目，此如青红帮上的杨虎、李因，著名的大刀会匪的首领刘文明都是榜上有名的人物，而以陈调元为主席。现在安庆城内完全为白色的恐怖所支配，党

部的同志除少数已赴武汉传达消息之外，都坚持着住在城内以与恶势力作殊死战。到了黄花冈节（三月二十九日）一定有冲突的，因为两方面都有准备，现在还没有消息传来，不知道又流了多少同志们的鲜血了。

但是这场奋斗是最有意义的。蒋介石叛党叛国叛民众的罪恶如此显著，我们是再不能姑息了。他在国民党内比党外的敌人还要危险。他第一步勾结流氓地痞，第二步勾结奉系军阀，第三步勾结帝国主义者，现在他差不多步步都已经做到了，他已经加入反共的联合战线，他不是我们孙总理的继承者，他是孙传芳的继承者了！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罢！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罢！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现在我们中央已经一天一天的巩固起来，新改组的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已经正式成立，武汉已经真真正正的成为了革命的新都！单从军事的指挥上来说，现在有了军事委员会，已经用不着再有蒋介石这个“总司令”了。所以消灭这个总司令，在军事的指挥上只是有好的影响，并没有坏的影响。

或者有人说：现在奉系军阀还没有打倒，我们便自相残杀起来，这于革命有很大的危险。我敢说这完全是一种杞忧，而且是蒋介石派反宣传的一种策略。他天天都在残杀我们内部，而他偏偏说“你们不要残杀”。“不要残杀”，就是说“我打你，你不要还手，好让我来独霸!”这是一种反宣传，我们千万不要中他们的毒计!

至于未打倒奉系军阀的话，我还敢说一句：未打倒奉系军

阀，先要打倒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已经成了张作霖的爪牙。张作霖的命令他已经早早奉行了。张作霖说：“你把左派排开，你把赤化分子除掉，我就和你合作。”蒋介石早就拼命的排斥左派，拼命的讨伐赤化了。我们根本的作战计划本来是决定北上与西北国民革命军连成一气，先去打倒张作霖的。蒋介石因为想实现他的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春梦，他因为妒嫉冯焕章[4]，怕冯焕章夺了他的首功，所以他题外生枝，要来解决长江下游。他对于冯焕章不肯加以接济，使他久陷在西北边地，不能早日东出会师中原；他甚至连武汉方面的党军也不肯加以充分的接济，使西路军不能早入河南。他把张作霖的势力养得非常雄厚，而自己摧残自己，他这还是我们的友人、还是我们的同志吗？他这不是比我们的敌人还要厉害吗？同志们，我们学他一句话：“你看他该杀不该杀！”

现在幸亏我们前敌将士的奋勇和民众的努力，我们已经把长江下游肃清了。河南方面靳云鹗司令所率领的军队也深明大义克复了郑州，使敌将于珍战死。西北国民革命军经过长久的苦战奋斗已经到了洛阳。我们可以说消灭奉系军并不是困难的事情。我们当前的敌人就是我们内部的国贼！国贼不除，我们的内部只有崩溃下去的，民众一天一天和我们脱离，勇敢有为的同志一天一天被他们排挤，不要等奉系军阀、帝国主义者来攻击我们，我们自己就会败亡的。所以我们未打倒张作霖，先要打倒蒋介石！

或者有人说：他是劳苦功高，我们不能因为他一时错误便抹煞他以往的功绩。这是骗人的话！他劳苦甚么？深居高拱，食前方丈，比古时候的南面王所过的生活还要优渥。他劳苦甚么？前呼后拥的被无数的手提机关枪、驳壳枪簇拥着，偶尔上上战线看察，这是哪个干不来的事体？至于说到功高，那更是封建时代的废话。大凡一种事业决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

的，任何个人不能独居其功，即使有功——就是说把一件事业做好了——这也是应分的事体，并不能以此自矜。蒋介石以往的军事并不是他一个人所手创的，都是同志们为革命为国家努力的结晶，同志们为革命为国家努力，这是十二万分应该的，这有甚么功？而他个人的功又高在哪里？我们只有革命事业，只有国家，没有个人。同志们努力的结晶，便结成革命的光荣历史，这是永远不能磨灭的，有人想要来磨灭它，毁灭它，这就是革命叛徒！这种人我们对他不应该有甚么姑息，不应该有什么迷恋，不应该有甚么顾虑的。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为尊重我们革命先烈所遗留下来的光荣历史，我们要保存这种历史，我们要继续着这种历史的创造，所以我们尤须急于的要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

我想说的话也大抵说完了。我是三月二十八由安庆动身的，本是奉了中央的命令要赴上海工作，但因种种关系先折转到了南昌来。前天我到九江的时候，听说中央已经免了蒋介石的职。今天是三月三十一日，我在南昌草写这篇檄文，愿我忠实的革命同志，愿我一切革命的民众迅速起来，拥护中央，迅速起来反蒋！

最后让我们高呼：

打倒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蒋介石！

铲除一切国贼！

惩办各地惨杀事变的凶手！

以革命的手段向白色恐怖复仇！

拥护武汉的新都！

拥护中央最近全体会议的一切决议案！

拥护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根据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刊印。

注 释

〔1〕即岳飞。
〔2〕即李宗仁。
〔3〕即程潜。
〔4〕即冯玉祥。

PDG

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

董　必　武

各位同志，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国际间的重大变化，同时因国民党内被封建势力把持，引起了国民革命的危机。我们怎样应付国际间的重大变化，我们怎样排除封建势力，这是我们每个同志应该注意的，而且是我们每个同志马上就要来工作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研究这个问题。虽然在形式上这是两个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反抗帝国主义，就要排除妥协分子；我们要排除妥协分子，就要反抗帝国主义。这个互相联系的地方，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第一点要报告的，就是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被打击的状况。从远一点说，自从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它们还能忍受，还能支持。从近一点说，自从一三惨案和收回汉口、九江租界以来，反帝的力量一天一天强大而且巩固起来。英帝国主义此时看到这个不可侮的革命势力无法抵抗，只好退却；同时它却在暗中准备实施它的最后的武力政策。现在上海已经被我们革命的势力占领了。上海不仅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而且是帝国主义掠夺远东殖民地的大本营。倘若上海能够完全由革命的

* 这是董必武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召开的孙中山纪念周会上作的演讲，原载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六日汉口《民国日报》。

势力统一起来，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而且会使世界革命更进展一步。所以帝国主义是决不放弃它的侵略策源地——上海的。它认为九江可以放弃，汉口可以放弃，而上海则绝对不能放弃。假若它放弃上海，不啻是放弃了它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同时就是放弃帝国主义的尾闾——远东的殖民地，尤其是中国。这是它绝对不肯的啊！

中国的革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不仅在理论上如此，而且在事实上亦系如此。所以目前上海的斗争，决不是中国人和某国人局部的斗争，而是世界上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斗争，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这就是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的国际间的紧急形势。

第二点要报告的，就是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及其表现。英帝国主义将要贯彻它的武力政策，在目前从几件事可以看出来：

一、开始屠杀中国的民众及到处捣乱。如在惠阳、重庆、宜昌等处，都有武力干涉中国的事实。

二、作广大的反动宣传。南京事件本是三月二十三日午后我军入城之际，孙传芳、张宗昌所部退却时乱兵所做的事，而英帝国主义者偏说这是革命军的行为，这是义和团的表现。其实这是它所蓄养的走狗所为，这是它要负责任的。它何以要这样做，就是它想使各国间都来怀疑中国的革命运动，造成一个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来压迫中国的革命势力。同时它要把这个责任，归到苏联身上，想来压迫世界的革命势力。所以它向苏联提出质问，大有虎视眈眈之象。

第三点要报告的，就是对国际形势的推测。英帝国主义这样的行动究竟是要如何呢？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目前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三个趋势来：

一、是世界大战的开始。自从英国预备武力干涉中国以来，它是时时刻刻准备着向苏联及中国进攻的。又因为汉口事

件发生后，日本处处得利，而它处处失败，现在觉得“舍我其谁?”非做反革命的领导者不可，所以它现在也不怕为戎首了。我们可以预料，只要它的兵舰一到上海备战，同时也必向苏联进攻。在这个时间，说不定日本含了投机性质，加入反英战争。而美国在中国虽然只注意经济的侵略，没有注意武力的侵略，但也不能不加入斗争。于是大家所预料的世界第二次大战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推测。

二、英国以保护侨民为口实，占领扬子江流域，实行武力干涉，保护张作霖南征。这一招也是非常厉害的。它以重大的海军由上海溯江而上，直至重庆。一方面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同时又为张作霖保镖，使其南征有利。而各国可以同样来华，这就形成了一个反革命联盟用武力干涉中国的形势，此系抄袭美国对尼加拉瓜的老例。这是第二个推测。

三、英国对我实行经济封锁政策。现在我们调查英国在汉口的公司，已经廉价卖货，预备收束，使中国的经济停滞。日本似已同情此种办法。所以上海各处已有三数工厂停工。而英国更趁此时以兵力霸占广州、上海、天津，封锁中国沿海海口，以钳制中国经济命脉。这是第三个推测。

究竟是哪一个推测实现我们不敢预料，然而情势迫切，这是无容讳言了。

我们试看，英国对我已不是考虑和平的态度，而是要采用武力干涉的办法了。它令各地侨民离开中国以及各地的收束状况，都是证明它的野心。这些侨民在中国，并不感觉危险，它不过利用侨民的退去，而作一次大的反动宣传，同时也就是开战的预备。真是好毒辣的英帝国主义啊!

第四点要报告的，就是各国间及各国被压迫民众的态度。上面已经讲过，日本对于打击英国这一点，是非常愿意的。美国是不必以武力侵略中国的。法国痛恨英国借款五百万于意大

利与它争夺殖民地，是尤其不愿意加入英国武力侵略的。所以他们反革命联合战线，也不容易建立起来。再看各国被压迫的民众，也极力反抗这种侵略，就以英国政府军费案被否决一点看来，也就可想而知。此外各国民众援助中国革命运动，更是不可胜计，我们也不必详细来报告了。这是就国外情形看来，英帝国主义不敢公然贯彻武力政策的最大原因。

第五点要报告的，就是英帝国主义何以在从前不敢恐吓中国，而在现在又敢恐吓呢？这就是国民党内一部分妥协分子所造成的结果。这些妥协分子的代表是谁？就是蒋介石。英帝国主义在革命的高潮时期，就拉拢比较温和的一部分，而使之排除革命比较彻底的一部分，以软化革命势力。我们看见蒋介石一方面压迫农工运动，枪杀工人领袖；一方面公开演讲只希望帝国主义放弃侵略政策，而不必打倒，还指使白崇禧对外国驻上海领事表示愿尊重不平等条约等等。就都是证明他温和的表现，证明他软化的表现。于是帝国主义口中也向蒋介石发出温和的口号来了，张作霖也表示与蒋介石合作了，只希望蒋介石打击革命的彻底派，打击农工群众，同时保留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并且帮助帝国主义打击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而蒋介石也竟这样说起来、做起来了。他做一件事，帝国主义及军阀就鼓掌赞成一件，同时便替他在国际间反动宣传一次。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的方法，与利用张作霖、孙传芳是一样的；而蒋介石甘愿受帝国主义的利用，也与张作霖、孙传芳是一样的。这就是国民党妥协分子所造成的帝国主义进攻的形势啊！

第六点要报告的，就是我们目前怎样应付妥协分子呢？我曾经说过，要打倒帝国主义必先排除妥协分子。现在我们就要以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来决定谁是妥协分子。只要他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就承认他是革命的；倘若他徘徊歧路，与帝国主义妥协，就认为他是反革命的，我们是丝毫不必迁就的。

有人说，我们在进攻帝国主义的时候，要建立联合战线。诚然不错。但是这种联合战线，是联合革命的势力，是联合彻底的革命同志，不是联合反革命势力，不是联合妥协的分子。正因为要联合革命的势力，要联合彻底的革命同志，就要打倒反革命的势力，排除妥协的分子。

因此，中央对于蒋介石下了一个命令，要他离开上海。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免得他在上海妨碍革命势力，如解散纠察队及不承认市民会之类。二是希望挽救他，不忍他变成一个反革命，叫他离开上海，免得妥协。

蒋介石如果是革命的，如果是不妥协的，如果是尊重党权的，我们预料他是要离开上海的。如其不然，他甘愿与帝国主义妥协，甘愿妨碍革命势力，甘愿不尊重党权，那我们也就爱莫能助了！也就只有顾及革命的利益，而排除妥协分子了！

最后，要把前面报告归纳成为两点，就是：一、反抗帝国主义；二、排除妥协分子。这两点是为了一个目的的两个工作。再明白说，就是一件事。我们不能说做乙就放弃甲，更不能说做甲就放弃乙，我们要同时并进啊！

现在说到目前的工作，主要有五点：

第一，我们要不间断地作广大宣传，使国际上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真相。

第二，在英国将有武力干涉的行动之前，要一致切实反抗它，使它有所畏而不敢实施。帝国主义如果采取经济封锁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用经济的武器来对待它。

第三，各级党部，各地民众，要经常不断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第四，我们要预作万一大战开始的准备，所以要党员武装化，民众武装化。我们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

第五，我们在此时应严厉制裁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的反

动分子。甚至于蒋介石，如不悔悟，我们也要一样制裁他。

这是我们目前工作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还有许多详细的口号及办法，想来大家也是了解的。

各位同志！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很严重的时期，不但是国际间的危险，而且是国内的危险，更使我们痛心的就是党的危险。各位同志如果要想免除这种危险，要想保持革命性，我们要一律总动员呀！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董必武选集》刊印。

PDG

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

——告两党同志书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

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至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　陈独秀

十六年四月五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申报》刊印。

PDG

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

上海无产阶级在中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下发动起义，协助国民革命军占领了这个城市。作为这次群众革命行动的结果，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形势已经成熟。蒋介石的反动将领白崇禧率领的国民革命军从一开始就出卖了群众。当时，蒋介石及其将领采取了破坏革命群众运动的措施（镇压市民会议，解除纠察队武装等等）。这样，国民运动内部的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同各被压迫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因蒋介石占领了上海而尖锐化起来。反动资产阶级不但在谋求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在行动上表明，他们在极端仇视革命群众这一点上，同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之类的军阀没有多大区别。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革命危机中，当人民大众各种力量联合在无产阶级周围进行争取民主和民族自由的决定性战斗的时候，所有各种反动势力（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大资产阶级等等）就会形成一个反革命联盟。上海起义就遇到了这样一个虽非正式出现但已客观形成的联盟的反抗。

无产阶级想通过建立一个完全由国民政府控制的革命民主政权来使上海摆脱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所做努力的失败，其原因之一，是由于缺乏坚定、敏锐和有阶级觉悟的领导。上海出现目前局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不懂得大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了反革命。急于想同大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情绪导致低估小

资产阶级民主群众。起义失败在上海无产阶级中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随之而来的是沮丧和消沉。整个运动迷失了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立即采取措施加强上海无产阶级的领导。

事实说明，反动派已经暂时占有了上海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由无产阶级充当领导者来进行一次决定性的革命斗争，才能使上海从蒋介石新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的当前任务是使无产阶级为这场不可避免的斗争作好准备；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革命力量，使他们聚集在无产阶级周围和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

反对蒋介石新军阀统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立即发动正面攻击，那将招致毁灭性后果。如果那样做，无产阶级将被蒋介石、北方军阀（他们正在重新向上海推进）和集中了强大兵力的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粉碎。斗争的发展必须是有阶段的。当前的任务是要保存上海无产阶级的实力和审慎地指导他们对反动派进行斗争。

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以一个载有明确要求的政纲去开展群众鼓动工作。这个政纲将迫使蒋介石一步一步地暴露真面目。这样就会使小资产阶级群众，甚至一部分自由派资产阶级摆脱在对蒋介石本性的认识上的某种错觉。

宣传鼓动必须按下列要求进行：

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民革命运动的最高当局。

2. 建立统一的民族主义政权。

3. 一切权力属于选举产生的市民代表会议政府，它是上海市民的权力机关。

4. 实行在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军事统一。

5. 财政和外交必须集中。

6. 反对同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

7. 保护一切工人组织。
8. 成立工人自卫队（纠察队）。
9. 保护共产党。

除了这些一般的要求以外，还必须加上能吸引工人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江苏和浙江的农民以及对反动联盟进行战斗的士兵的特殊经济要求，从而扩大国民革命阵线。当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阵线中成为领导力量时，这种策略是绝对必要的。

所有这些要求现在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但是，会遭到蒋介石的反对。现在除了最后一条，他会假装同意其他各条。他的这种伪善行为欺骗了很多的人。我们的任务是逼迫他对这些要求切实照办。他是不会干的，因此，他将被迫公开以他真正的反革命面目出现。这种鼓动工作的结果将使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进行决定性的斗争；追随蒋介石的各种力量将会分化瓦解，而一切人民大众的力量将团结为一个由无产阶级掌握实际领导权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

我们在军队中进行鼓动的目的是要使真正的国民党队伍从蒋介石将领的军队中分化出来。必须使他们看清：蒋介石已经背叛了国民党，他本人已经变成一个反动军阀。关于侵吞军费的事实，我们在军队中进行鼓动时要加以利用。

鉴于上海无产阶级面临着一个对反革命联盟进行严峻革命斗争的阶段，它的组织形式必须改进，以适应新的形势。在进行群众鼓动的时候，必须建立秘密组织，以期在反动派实行突然袭击时，不致使整个运动遭到破坏或瓦解。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周　恩　来

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

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甚至影响到武汉与国际都趋于和缓。尤其是汪精卫来后，他也受我们影响，态度也就和缓，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以上错误，沪区完全承认，并要把此意告诉武汉方面。

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自己完全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方面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 这是周恩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

毛　泽　东

一

政权问题，不过是形式的问题。我们切实实现本党的决议已经够了，即是能够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则农民的政权是不成问题的。我关于土地问题有点意见，我以为这个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即：

（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我们确定这个意义之后，须加以大力的宣传。

（二）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土地有何标准，如何分配土地，此点实为问题的中心问题。

（三）农民的政权与土地问题，即用什么机关来没收和分配。

（四）土地没收了，耕者有其田了，是否禁止买卖？所以发生了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

（五）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此问题亦甚复杂。

---

* 这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农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等问题时的五次发言。

PDG

二

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有：（一）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实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据俄同志[1]调查，我国土地生产力日见衰落，全国生产力已到了一个大危机，此危机不解决，必起绝大的饥荒。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必至日减。故第二个意义为增加生产。（三）保护革命。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即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这三点是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

三

现在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可再加三项：（一）废除封建制；（二）发展中国工业；（三）提高文化。

四

我很赞成主席的意思[2]。我以为国民政府农政部应即设乡村自治委员会，专门管理乡村自治机关的事项。至于农民政权有两个阶段：（一）农民协会时代。在农村革命的时候，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二）革命过后，乡村政府应在国民政府一

个系统之下。农民协会与政府本来不同一个系统的，并且此种农民政权的行使，各省需要几个中心的县份做榜样。湖南已经颁布过区乡村自治条例，湖北亦可开始，广东则在例外。这些条例，最重要的须规定某种人不能加入自治机关之内。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

五

（一）农民政权问题可以另成一问题。

（二）增加土地分配之机关一项，加入上面解决土地问题纲要之内。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苏联土地问题专家岳尔克和达哈诺夫。

〔2〕指邓演达在会上讲的以下意见："农民政权问题，宜经下层着眼：（一）消极方面，应消灭封建势力。（二）积极方面，应建设农民自治机关。但乡村自治、区自治、县自治，均须顾到农民武力的保障，故解决农民武装问题极关重要。故第一步宜讨论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法；第二步要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的党和政府应设法给武装与农民，我们应作一决议，请中央由兵工厂出品中交百分之五或十与农民；第三步由农政部根据决议案，制定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法令公布出来。"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定。

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现在决不能容许他再留在国民革命的党内了，决不能再信托他当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了。他反叛国民政府，他谋推翻国民政府，这个革命的叛徒值得国民政府最严厉处分的。工人阶级是极端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肃清内部一切反动分子和战胜国民革命的敌人的。

国民党内部的冲突，结果采取了这种严厉而且必须的对付蒋介石的行动，这是有很深刻的社会意义的。这不是一个人违叛党国，违叛革命。蒋介石与他的党羽是代表国民党内与党外一种社会成分。国民党自从改组后，成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的革命党。可是资产阶级甚至反动的封建分子仍然留在党内。直到如今，这些分子总是设法使国民党脱离革命的道路。于是发生了内部斗争，这斗争趋向于解决以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民党应该变为一个阶级的党或者是一个人民党——就是，国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四期。

民党的政纲与政策应该依照上层阶级（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分子）的利益而决定，或者依照被压迫剥削的大多数的民众而决定。这就是随着北伐发展后，国民党内严重危机的社会背景。

上年三月二十号的政变，国民党内资产阶级与封建分子推翻了广州革命的民主政权。他们得到政权后，于是计划依照他们阶级的利益去领导革命。为着要巩固他们的政权，于是破坏拥护国民党革命派的群众组织（进攻工农运动，解散党部等等）。

群众拥护北伐，为北伐而牺牲，以求发展革命，资产阶级与封建分子却认为是夺得更大权力的道路。但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进展，发动了伟大的革命势力，使国民党之资产阶级与封建派发生恐慌。很显然的，北伐的胜利有取消三月二十号政变的危险。群众反抗封建与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拥护三月二十号被推翻的国民党中的革命派。于是国民党内封建资产阶级的右派与革命民主的左派之斗争遂厉害起来了。

国民革命军达到长江流域后，已经危害及帝国主义的基础。很明显的，帝国主义是不能不用公开武装斗争而根本让步的。帝国主义一方面与国民政府协商租界问题，一方面准备武装干涉。国民政府要能够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军阀之联合势力，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自觉的起来拥护，只有他们的力量的牺牲是革命唯一的保障。换句话说，民族主义的中国必须建设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个意思就是国民革命应该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

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若不经过农民革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政权是不能够建设的。法国农民拥护拿破仑二十年，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对于农民给了一个改善的办法。在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各省，农民运动如野火一般的散布起来。如果国民政府能根本改革农民数千年来所受之奴隶境遇与痛苦，国民

革命就有了真正的保障——国民革命军将更成为不可抵御的势力。法国农民帮助拿破仑战胜封建的欧洲。中国的农民将拥护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统治。

农民革命是与国民革命不可分开的。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情形之下，农民革命是与封建分子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仇视的。农业既为中国之基本产业，农民既为主要的生产阶级，因此农民便成为一切剥削的目的物——封建、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的剥削。所以国民革命再进向前发展便需要一个农民革命，这种事实已经是很明显的。国民党内的革命派承认这个必要，而国民党内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却感觉他们的地位动摇了。他们企图领导革命向别一条道路走去，结果必致与反动势力妥协，向帝国主义投降。他们宁可出卖党的主义，污辱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出卖整个的国家，而不愿减损他们的阶级利益。蒋介石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内之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之反革命的倾向。自从三月二十号以后，他就举起这些分子的旗帜，等到他不能够将整个的国民党变为封建资产阶级之反动的工具时，他就与国民党宣战了。如果民族运动不照着这个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资产阶级所企图的那条路走，他们就不迟疑的要分裂他，叛逆他，不犹豫的与军阀帝国主义勾结以镇压他。蒋介石便代表国民党党内外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做出了这些事实。

国民党决议将蒋介石免职、开除党籍、拿办，这个意义就是国民党宣布在他的行伍中之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反叛革命，应该公认为敌人，为国民革命之完成与最后胜利计，必须战胜这些敌人。这个决议案是表现随着革命之发展而发展的阶级分化之一个时期，共产党坚决的拥护这个决议，因为无产阶级坚决的要巩固革命的民主政权，而且是民主革命政权的主干。

蒋介石与封建资产阶级已向国民党宣战，他拿工人阶级做

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极凶恶的向江西、浙江、安徽、南京、上海、广东、福建的工农大肆屠杀。共产党成为他最仇恨的目标，蒋介石知道，除非破坏工人阶级组织的力量，左派的政权是推不翻的，民族运动是不能作为封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无产阶级方面也明白蒋介石不过是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刽子手。消灭蒋介石须要战胜国民党内外之封建资产阶级，假使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的社会力量一日不消灭，那末打倒一个蒋介石之后，难免不有更残忍更流血的蒋介石之继起。

封建资产阶级分子以前勉强的同着国民革命走，现在已经跑到反革命的营垒里去了。蒋介石新军阀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国民革命的新工具。封建资产阶级抢不着民族运动的领导权，遂想分裂国民革命党，设立一个对抗的党部与政府，用民族主义的假面具来出卖党出卖革命，勾结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妥协。单是开除蒋介石，但还没有根本取消这个危险。他还是要想设立一个对立的国民政府。不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他仍然还是带领很多军事势力。他想欺骗民主主义的民族分子，散布反对武汉的谣言，说国民党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工具。他以及他所代表的阶级已经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他还想用阴险的造谣手段，来混乱这个情形。

开除蒋介石党籍之后，蒋介石主义的根芽还可以在所有国民政府领土内找得着。这就是反动的社会阶级——地主土豪劣绅等，只有国民革命用激进的农民改革政策，才能消灭这些势力，使蒋介石主义衰弱下去。从前封建资产阶级分子跟着国民革命走，所以策略上尚须有步骤的发展阶级斗争。现在他们已经采白色恐怖屠杀政策宣布阶级战争了，那末任何策略上的顾虑都不能阻止向反动的阶级的进攻了。这是推翻新军阀蒋介石，破坏他设立对抗的“国民政府”的企图，形成一个巩固的

革命民主主义的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的联合势力之最有效力的唯一方法。

打倒蒋介石——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代表，帝国主义的工具！

打倒军事专政！

革命民主主义的联合万岁！

无产阶级农民与中等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汉口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因为国际决议案中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规定，都适合于现在革命阶段中之客观的环境。第五次大会认为现在革命阶段的特质是需要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只有这个政权，以无产阶级作领导，才能解决现在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

第五次大会必定使全党研究与明了，并按照国际决议案所指示的，努力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1. 从上次本党大会以来，革命发展得很快，党的长大也同样的快。从第四次全国大会到现在，党员自九百余人增至五万余。党的政治影响比数量的增加更快。本党无疑的成为全国工农的领袖；领导无产阶级经过两年的不断的斗争，斗争中包含好几次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武装暴动。在党的领导之下，四年短期之内，二百八十余万工人与九百余万农民已经组织起来。本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

自“五卅”起，上海无产阶级的斗争，香港罢工，汉口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都是中国革命史中重要的事件。在过去的二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站在最主要的地位上。如今他已取得斗争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这样的地位，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

2. 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符合第七次国际扩大会议决议案所指出的道路。民族革命之发展加紧了阶级斗争。国民党内的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想领导革命，以与本国反动派及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然而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则反对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于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发现了危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看见不能依了他们的阶级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

利益而领导革命，他们就把国民党分裂了。他们不但离开了国民革命的斗争，并且转而反对之。他们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上海无产阶级，做了两次英勇的暴动以欢迎革命军，他们在反抗北方反动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南军占领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在上海下命令屠杀工人。

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

3. 革命运动发展，无产阶级势力增加，同时，反革命的势力也渐渐形成。反革命势力的形成，有下列的表演：(A) 帝国主义列强之联合的直接武力干涉；(B) 反动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同盟反对国民革命。帝国主义者看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政权，足以给帝国主义者及其同盟军以最后的打击，他们便想用武力恐吓手段强逼革命的国民政府采用妥协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帮助并鼓励军阀与大资产阶级建立反革命的同盟。革命运动中第三阶段之初期，就遇到了帝国主义军阀与大资产阶级联盟的这种威吓。但是，革命运动正要在坚决反抗这反革命联盟的斗争中，更加向前进展。革命势力定能巩固集合民众的精力，巩固一切革命力量，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以反抗并破坏反革命的同盟。

4. 从“五卅”起，无产阶级开始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领导权而斗争。这个斗争建立了广州革命的国民政府，获得暂时的成功。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看见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将走得太远，客观上危害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于是他们也开始用全力使民族解放运动移转到他们的指挥之下。当时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

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互争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第一个表现就是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

三月二十日事变，开了争夺领导权的第二阶段。在此时期，资产阶级占了上风。他们利用他们在广东的胜利，而想把他们的权力扩大至于全国。在这时间本党没有正确的政策。固然，资产阶级一天留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我们就一天须与他们结合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资产阶级将来的作用，在三月二十日之后，已经更加清楚了。然而本党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为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反动时期中，要立刻倒蒋。本党的任务是继续的去争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这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客观上是必将出卖革命。这个任务并不与联合战线不两立。

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无产阶级要提出急进的土地改良之要求，以巩固与农民之团结，向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动奋斗。本党没有实行这个任务以领导无产阶级。联合战线做得太广泛了，甚至乡村中的封建宗法的反动分子也联合在内。在本党领导之下的广东农民运动，除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与减租外，没有更急进的要求。当时封建分子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已经准备使革命妥协，至于消灭，而本党没有认明，应当在乡村之中攻打他们的根基。实则只有进攻这种封建分子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才可使革命的社会基础更加深入。这件事没有做，为了这个原故，广东便很容易地失掉了。

5. 北伐之主观上的动机，是资产阶级想扩大他的权力。但是客观上北伐是发展革命的方法，所以帮助北伐的政策是对的。但在此革命地盘扩大之时，本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这种疏忽，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过分估量了大资产阶级的作用。那时的策略，是先帮助资产阶级完成其革命的第一阶段（扩大），然后再来做第二阶段的深入。因为有这错误政策，所以不能征调全国革命的民权派的力量，以限制封建分子资产阶级想利用军事胜利之帮助，而加强其势力之企图。最后封建及资产阶级分子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于是他们公开宣告包办整个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实行其分裂革命之政策。因为对于联合战线的见解错误，所以在革命军所占据的地域中，一切反动的社会基础，仍任其存在。因此，到蒋介石叛党的时候，不能使他孤立，封建的资产阶级分子，居然带着很大的力量，从民族革命中分裂出去。倘能及早在城市与乡村中（特别是乡村中）加紧阶级斗争，那末，早就可以摇动反动势力的地位——例如广东之失，也就不会这样容易的了。

6. 对大资产阶级估量不确，甚至于过分，于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估量就过小。小资产阶级不会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当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反动势力联合而预备使革命势力妥协之时，无产阶级应非常注意小资产阶级，否则，他将与资产阶级一路走。上海暴动之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

蒋介石并不是在四月十二日突然变成反革命，而命令在上海的街道上屠杀工人的。从三月二十日起，他已经是革命的仇敌了。但党没有指出蒋介石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他要消灭革命，因此，也就未能充分号召城市中民权派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以防止蒋介石能够在上海建立其新军阀的独裁。

7. 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上海无产阶级的二月暴动是太早熟了，在那时候的革命热情中，党不能有计划的指挥群众，建立苏维埃式的市民政府的尝试，更是太早熟了。

大资产阶级一开始时便没有帮助这个运动；白色恐怖起来，小资产阶级也吓退了，于是无产阶级陷于孤立。二月暴动失败后至三月暴动之间的时期，是很可以利用之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亲密联盟，以为革命的民权政府的基础。但是因为第一次早熟运动的失败，使党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而忽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本党的另一错误，是于不自觉之中把上海运动做成是一种独立的、而未顾及全国民族运动的联系。

8. 第五次大会认识上海无产阶级在本党领导之下英勇斗争的历史意义。大会认为：虽然上海事件有许多失败与错误，但不失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之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在这时期中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权联盟，已经成为革命的唯一的社会基础。上海无产阶级仍为革命的柱石，上海仍是斗争的重要中心之一。上海无产阶级从“五卅”以来就继续不断的在本党领导之下做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他的斗争必能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将来一定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

9. 第五次大会坚决的认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叛离，不足以削弱革命。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在这时期里无产阶级成为争斗的原动力，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当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留在民族运动中的时候，他们阻碍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政纲的实现，因此，群众的革命力量是被遏制的。现在革命的民权派力量之自由发展的障碍已经减轻，所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的运动可以加强起来。

革命基础之地域，需要很快的扩张，但是同时在这地域之中要把革命的社会基础使之深入。广东之失去，表现出革命只扩大而不深入的危险。这个时期里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要做这件事，必需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

10. 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帝国主义的干涉更加严重。于是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想要将革命根椐地从帝国主义威胁之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应当反对这种无根据的失败主义的趋向。帝国主义的干涉，确实存在。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工农群众从坚决的斗争中，保护革命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要巩固革命于中国的中部及南部，并不是忽视扩大革命地域之可能与必要。但中国共产党必定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始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之创造，那么，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以帮助帝国主义。东南诸省是经济上最先进最富饶的地方，我们不能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否则，这就是使帝国主义更加强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太弱，不能独立的生存）。如果这样，中国将要走进一个时期，在帝国主义财政资本的领导权之下，发展经济，使世界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稳定。中国将继续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虽然统治方式上或者略有改变，然而实质上这就等于消灭革命。

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必须领导劳苦群众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等的反动派，以巩固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根据地一定要在那种省份里巩固起来，那边要有久经战斗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农

民组织，以及高度发展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不能想出一个更天然可靠的基础，如上海无产阶级，广州工人阶级，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的革命农民。第五次大会丝毫不减少扩大革命地盘与打倒张作霖的需要，同时也以为党有一个目前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的与反动势力作战。这个任务的完成，其意义是在很大的地域上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地域在社会情形及经济上都是合宜的。这样可以铲除封建资产阶级消灭革命的企图。客观上的条件（国内的与国际的），都利于中国革命发展到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个革命前途不仅是国际议决案所指示的，而且是由事实所产生的。如果对于这种前途有分歧的政策，那就是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其意义就是消灭革命。

11. 四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两种条件之下，加入中国国民党，（A）保持组织的独立，（B）有批评的自由，以执行其拥护工人阶级利益之政治的主张。在此合作中本党曾很坚决的反对右派，因右派系主张限制本党的独立组织者。但是本党在国民党中，以前只有离开国民党而求所谓“独立”的政策，而实际上并未能将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之政策执行起来。主要的原因就是本党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未能正确的认识。在现时这一革命的阶段之中，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影响，应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政治上很明显的很坚决的表现出来。

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共产党一定要使一切革命政策，政纲与策略之决定中，都考虑到工农的利益。共产党不能做国民党的旁观者或

反对者。这革命的联盟，必定要立在一个共同的国民革命的政纲上。

共产党的加入国民政府与省政府，以及由联席会议讨论革命的实际问题之新方法，都已表现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在这新的情况之下，党团工作变成非常重要。要经过党团使政权与党的机关影响群众。第五次大会警告全党：决不可以因为我们与国民党关系的新方式而发生取消派的倾向。要知道一个革命的联盟并不就等于一个党。

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这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土地革命），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工人阶级领导着这个革命。第五次大会不赞成“共产党是工党，国民党是农党”的机械理论。土地革命就是推翻封建宗法的革命；这种革命当然要当代最革命的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是现在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他应当领导农民去实行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

12. 现时的革命阶段的主要特质，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之中取得领导权。然而必须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有了保证，他才能完全实现这个政治上的功用而行使其革命的领导权。须有英勇的革命斗争，才能获得光明的政治发展。工资低微，营养恶劣，衣服褴褛受尽剥削的工人，决不能负担这个责任；所以要领导工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第一条件，就是共产党要很坚决的为提高工人生活程度而奋斗。第五次大会认为：为实现工人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起见，应当为工人力争下列的要求之实行：（一）八小时工作，（二）足够供给生活的工资，（三）劳动保护法，（四）救济失业，并为失业者觅得工作，（五）劳动保险及恤老金，（六）保护女工与童工。

13. 现时大资产阶级对于国民政府仇视，组织一个很显著的反革命大联盟，会同着帝国主义的干涉及经济封锁，来威吓

国民政府，于是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感觉很大的困难。如果财政困难不能解决，那么，革命的斗争便不能继续进行，军队便不能改造，将要发展而成民权独裁制的政府机关，也不能建设。共产党应坚决的反对增加劳苦群众经济负担的企图，因为这不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而恰巧相反，这种企图却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基础。第五次大会认为：对于财政困难唯一的稳当的解决方法，便是农民革命。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向来交付给地主的地租，便可以有一部分以地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使国家增加了一大批财富。现在暂时解决财政的方法还有两点：（A）征收很重的财产税，（B）发行革命战争的公债，而把公债的担负加于不劳而获的阶级身上（资产阶级和地主）。

14. 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中国的青年们有很大的作用。在各种斗争中，青年们在 C. Y. 指导之下，总是站在前线上，而给党以很大的帮助。在现在时期中，当革命运动要深入和扩大之时，青年的革命意义格外增加了。党对于青年之革命的意义须加以严重的注意，从前党对于青年运动，未尝加以充分的注意。将来党对于 C. Y. 必须建立一种亲密的联合，必须积极的领导 C. Y.，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帮助。C. Y. 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一部分，C. Y. 是一条运河，党须经过这条运河，而影响到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我们现在如果把 C. Y. 的数量上的增加和 C. Y. 应负的任务比较起来，就可以看见现时 C. Y. 组织上的发展是很不够的；这是因为以前在各种斗争中，C. Y. 的群众工作太薄弱，或者 C. Y. 不能在他的组织下面巩固他的政治影响。C. Y. 将来的工作，一定要很注意于群众运动的发展，要利用一切的机会，在工人之中以及乡村和军队之中去发展青年的群众运动。党盼望 C. Y. 的第四次大会能根据这个精神去进行他的工作。

15. 党对于被剥削的妇女群众的工作，必须较之从前更加

注意的去做。在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之中，被剥削的妇女们，一定无疑的是很重要的因子。妇女是人民中最受压迫的一部分，她们在革命队伍之中也是最为热心于革命的。

16. 去年的经验，已经认明了一切无党的普通群众组织，特别是济难会，在革命战线上，对于革命群众，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以后对于这些组织也必须加以重大的注意，为的是经过这些组织，而在工农和知识分子之中扩大和巩固党的影响。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土地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1. 土地问题意义

一、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大半尚建筑在封建的关系之上。大部分的田地（约百分之六十六）为收租的大地主所占有。佃农及半佃农耕种田地，而没有享有田地的权利。田租的方式既不确定，租佃权也不能永久享有。田租大抵要占农民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五十，除此而外，农民对于地主阶级以及握有政治的军阀统治者，还要交纳种种苛捐杂税。

中国田地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属于农民。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的农业，固然除北方各省如山东、满洲外，几乎无有。然寺庙、祠堂等所属之地，占有耕地之数目，亦实有可观。井田之制，久已消灭，惟所谓公有田产之管理制度，尚遗留于乡村间，作为乡村中宗法社会政权之基础。此等田地的主有权，已为乡绅所篡夺，耕田者反而失却享有的权利，乡绅等得变为地主，更利用此种权利，以行使其宗法社会的威权及统治。

军阀的统治，就建筑在这种土地关系之上，因为地主阶级的权力，实使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农村之中，仍旧保持其为经济政治组织及行使制度之重要特质。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

二、同时，初期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亦已深入于农村经济之中。所以中国农民实在同时受两种剥削：一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即封建制度式的）剥削，一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其结果，中国农民日就穷困，国民经济制度特别落后。

地主阶级所提取的田租特别的高，致使耕者反无剩余的收获。他们所得的，不能供给日常的需要。此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在此剥削下，不许农民改善其生产方法，结果中国农业依然保持其原始状态。实际上就等于奴隶制度。农民只为消费而生产，其剩余都为地主所占有。

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也在这种封建式的关系上建立起来，地主所收的佃租多属谷类（这又是封建制度的遗留），农产品的剩余，多归他们手里。但是地主得因此而变成商业资本家。不过他们的原始的封建性阻碍那充分的资本主义化的趋向，他们以原始式的剥削手段而积聚起来的财产，并未变成生产的资本，仍用到购置田地及重利盘剥等的投机事业。

经济的落后，阻止了新式交通工具的建设。同时全国经济形成了破碎不连的现象，将全国区分为多数孤立的商场，此等商场即为掠夺剩余农产品的地主所操纵。在此情形下，地主阶级便能强行抬高物价；如此不仅剥削农民，而且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亦在被掠夺之列。工资极低的无产阶级，却要出高价换得食物；就是小商人，也变成了地主阶级垄断的投机事业之牺牲品。

重利盘剥制度，即在此复杂的原始的剥削形式之下，很快的发展起来。此是唯一的交易制度，唯一的资本主义式的积累方法。然而重利盘剥者的资本，并不能促进商业或产业，依然用到土地投机事业上去。残酷的田租征收以及其他封建式的压逼，重利盘剥等的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再加上军阀机关的榨取，致使农民陷于永久的饥饿之中。

军阀在多数省份中占据着最高的政权，其统治机关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下，剥削一般农民，以下即为其中最厉害的：

A. 正税与苛税（预征钱粮）；

B. 军事给养（米粮、靴鞋、马匹等）；

C. 战时苛酷的征收；

D. 拉夫（运输军用品）；

E. 滥发无价值的纸币（军用票）；

F. 厘金征收。

三、帝国主义的统治，阻止中国经济的进展；于是中国产业特别落后，形成农村人口的过剩；而农村人口过剩的现象，实足以延长军阀封建式的剥削制度之生存。可见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农民问题有极密切的联系。

帝国主义因欲为其本国的产业找到贱价的原料，为其商品找到市场，于是力求殖民地的扩张。劳动力是最可宝贵的材料，殖民地半殖民地充满了贱价的劳动后备军，当然是帝国主义国家中之产业的凭借。结果帝国主义的统治造成了殖民地产业的落后，而殖民地永久停滞于原始农业生产的状态。因此新式产业的发展，农村中的劳动力，不能充分向城市中转移。这样的退步现象，造成农村居民过剩，维持了封建经济的生命；否则，新式生产的发展，早将他们打破了。

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农村人口的过剩，延长了封建制度及其剥削。破产农民继续不断的增加军队的数量，致使劳动者的工资，落到最低限度，帝国主义的根基，因之更形巩固。综起这许多原因，造成了农民中极端的贫困与荒芜。失业的农民，既无处施用其生产的劳动力，于是变成为土匪与雇佣的兵士。中国的军阀，确是一个奇特的社会征象，其形成在乎国家经济的不完整不统一。军阀是封建势力剧烈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军阀会同买办及地主、乡绅、重利盘剥者，组成一个

极大的机器，混合封建反动式的剥削与初期资本主义式的剥削于一炉而冶之，炼成压榨农民的铁钢。这一个机器吮吸了农民的血汗，破坏国家的经济组织。在此背景上，帝国主义进行其最完备的资本主义的掠夺。

经济的破产，驱使农民于重利盘剥者的铁腕中，利率渐渐增高，致使农民永不能脱离债务的负担，以致出卖或抵押其土地，土地遂集中于高利盘剥者之手。再则帝国主义者买办及土豪等还要借此以垄断原料，如预先放债给农民，使他们不得不以贱价将原料抵债等；这亦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很苛酷的剥削。同时，帝国主义者，如基督教教会及农业公司，还有直接以贱价勒买田地的；这种剥削方式便更加是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的表演。

四、中国的军阀吮吸全国的膏髓，外国帝国主义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两者的根据地都是农村中的封建组织。所以中国民众欲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目的，基本的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封建势力的残余及宗法社会式的政权。急剧的变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非然者，为真正民权的自由战争，将停滞而不能前进；欲消除上层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组织，必须破坏他的根基。

五、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农民的精力，必能贡献于国民革命，如果农民的剥削机关能彻底解除。农民革命——打破封建制度——是建立民权制度的革命所不能离的。在通常社会的发展中，资产阶级能为农民破除封建的锁链。但是此种通常的社会进化，在中国已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扰乱。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一个反封建势力的成分。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因为是从地主阶级产生出来的，依然同地主阶级保持亲密的结合，甚而至于变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众的工具

（如买办）。在这两个情形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剥削农民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不能作农民革命的战士。中国资产阶级仇视农民革命，他不但不能为民权自由而奋斗，反而作民权自由的敌人（蒋介石的分离革命即其一例）。

农民将要受无产阶级的赞助（并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为助手），而从事于历史的战争，消灭封建势力及其党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系反对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是保持乡村中封建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关系亲密；虽与他们阶级有利，他们也不能完成土地革命以促进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六、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剥削之影响于经济者，为食料价格的增高，商业的停滞。此两种影响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共同感觉到的。所以这两个阶级都是反对剥削农民的，农村的急剧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不但农民本身获得利益，全部人民都蒙其益。农民群众生活程度的提高，商业因之而大发展。设若耕者能享用其自己生产的剩余，债主的铁腕将失掉其作用，农民可用由农产得来的资本，从事于改良耕种的方法及工具。结果全国农业产额必为发生自由的市场，可使物价降低。最终，因封建式佃租的取消，国家税收可以得到新的源泉。

七、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实现。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之田产的管理权。为保证农村急剧改革的实行，农民必须握得乡村中的政权，乡村中之武装势力，必须由绅士手里，夺回来交给农民。失业的农民既然得到土地或能从事于生产工作之后，军阀的祸患，将不复存在于中国。重利盘剥的现象，也因为他的经济根基既行取消，势必消灭。国有农业银行的建设，信用合作等的设立，必使重利剥削

者完全丧失作用，这种打倒重利盘剥的斗争，亦是农村革命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有相互的关系，不能分离解决的；唯有从事这些工作，使农民群众从封建宗法的剥削下解放出来，国民革命的成功才有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

2. 中国农民运动之趋势

一、中国农民运动，依粤、湘、鄂等省的经验，大半都是以贫农（佃农、半佃农、雇农及地少的自耕农）为中枢。农民运动的这种社会基础，很明显的指示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最迫切的现时的运动趋势，已经是铲除宗法封建的政权，而建立农民的政权。自然在这种斗争中农民武装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总的趋势中，有些地方已经进一步而到了实际开始解决土地问题。

二、各省农民运动发展之阶段，现在还有许多参差。北方各省在军阀残暴的压迫剥削之下，农民协会尚在秘密组织之中，没有很大的发展。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农民运动在胚胎之中，减租抗税的斗争，反对重利盘剥及土豪乡绅的斗争都已经开始。但是他们遇见蒋介石反动的压迫。广东农民运动发展最早，但是，客观上虽然农民群众早已从减租的口号进而要求政权，要求武装，甚至于土地，然而我们党在广东农民两年艰苦的剧烈的斗争过程中，没有确定的一贯的政策去指导。李济深的反动，使广东农民现在处于非常之大的压迫之

下，土豪劣绅的反攻更加残暴起来。江西、湖南、湖北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江西农民虽然已经开始减租等的初步斗争，但是大致说来还在组织集中力量的时期，这是因为江西久处于蒋介石势力之下，经过左右派政权两次转移的斗争。现在农民运动发展的阶段之中，要算两湖的为最高，尤其是湖南。湖南不但实际上农民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至少已经动摇他们的权力，而且要自己起来建立政权，有些地方，并且参加县政权。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

三、中国农民运动，大部分都在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不得无产阶级的领导，他的发展不能有正确的革命的道路。但是如红枪会、硬肚会等运动，也是农民运动的一种方式，他们是中世纪式的组织和斗争方法，这在阶级分化不甚清晰的地方，如河南等处，往往以地主土豪为领袖，有一部分甚至会受反革命派的利用。然而这种运动，当他们反抗军阀，代表小农利益而抗捐抗税，反对县官的时候，确是革命的。

四、农民运动发展的时候，封建宗法的反动政权（所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自然竭力压迫。他们勾结军阀，利用自己的武装（民团、团防等）以及土匪，来进攻农民，屠杀农民，要想镇压农民运动。然而国民政府的革命政权之下，农民运动至少得到相当的自由。所以农民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形成伟大的势力之时，土豪乡绅的势力大大削弱，他们就实行消极抵抗，阴谋破坏，如运米出境，拒绝借款等，或者自己冒充农民，组织假农民协会。蒋介石派的反动势力之下，差不多只有这种土豪乡绅组织的所谓农民协会，才能存在。就是国民政府之下，土豪乡绅亦在联合军队中封建分子，时时刻刻在那里力谋反攻农民。所以现时农村中的斗争，实在是非常之剧烈的。

五、农民的斗争大致初起总是减租、抗税、减息等等及反抗土豪乡绅的压迫，但是随后的发展，往往立刻便要进到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进到夺取武装，以至于武装冲突。而在革命战争的军事时期，农民斗争一开始便是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治势力，这是因为不但取得土地，就是实行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所以农民斗争必然要经过一个猛攻宗法封建势力的时期。这种猛攻的革命斗争中，总是以贫农为中坚。农民的革命政权，实际上不能不以贫农为领导者。这种推翻封建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的运动，客观上是以开始解决土地问题为目的，中国农民，尤其是贫农，他们很深切的感觉土地之缺乏，田租杂捐的剥削。他们实行革命斗争的目的，是要自己拿住政权，是要推翻土豪乡绅包办税捐的制度，而自己来管理，是要取得土地，而夺回地主等剥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由减租直到耕地农有，平均耕地。

六、现在革命的阶段之中，农民运动——乡村中农民反抗豪绅地主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他的发展阶段很有参差，但是大致的趋势，已经是摧毁封建宗法政权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现时的新阶段之主要的特点。现在乡村中阶级斗争的开展，及农民革命的深入，不但要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而且就是严重的打击反动的封建分子及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的势力无所凭借而组织反革命运动，这就是说：现在革命的趋势，是要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

3. 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

按照上面的分析，农民运动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力量都已

经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决议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中，为农民问题之解决，须要以下的策略：

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此等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种者的农民，皆由土地委员会决定之。

二、（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丙）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丁）革命军兵士中没有土地者，于革命战役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

三、耕种已没收的土地之农民，除缴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未没收的土地之租率，应减至与累进的田税相当的程度。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

四、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农村各被压迫阶级所组织的乡民会议负责。农民协会并当参加民权的县政府之创造。

五、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

六、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

七、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限制重利盘剥，规定最高限度的利率。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职工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一）职工运动两年来的发展及现在的形势

本党第四次全国大会时，正是职工运动复兴时期的开始，两年以来，经过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反奉战争中河南、天津、唐山职工运动的勃兴，铁路工会的恢复与发展，北伐后湘、鄂、赣、皖、苏、浙的发展，以至上海三次暴动，虽然有此仆彼兴、时起时伏的现象，然整个的形势，都是在不断的争斗继续高涨中。在政治上已经推进了国民革命的发展，给帝国主义以莫大的打击。从争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一直到参加政权的实现，充分的表现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经济上，劳动条件已有很显著的改善，从要求待遇的改善、团体契约权之获得，直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管理的实现。群众生活的水平线，已有很显著的提高。在组织上，工会的权力，已渐次集中。纵的方面，从零碎的行会的组合，发展到统一的产业组合（虽然现在还是很弱小的）。横的方面，各地方总工会，更具有最高的权力。工会会员数量上，由五十四万增到二百八十万。所以这两年来猛勇争斗的结果，的确有很显著的急速的进步。

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结果，使资产阶级受了莫大的威吓，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

渐次背叛革命（蒋介石叛变），不惜与帝国主义妥协，专力来打击工人阶级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帝国主义因见旧有工具军阀系统的崩溃，亦欲在中国找到新的工具，因此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亲和力，互相吸引，因此资产阶级将渐次变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新工具。

资产阶级在这个新的企图之下，遂尽力打击工人阶级。一方面组织法西斯蒂，来屠杀工人领袖，破坏工会；现在苏、浙、闽、广、皖、赣、川等处，已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另一方面，又欲以改良主义来欺骗工人阶级，如蒋介石颁布的工会条例，几乎全抄上海总工会提出的上海工人的经济总要求。并企图组织御用的黄色工会。在武汉的资产阶级亦欲以改良主义，来缓和工人阶级的进攻，如提倡分红利制度，甚至要工会来代管生产，以红利的大部分分给工人等。虽然我们在经济的分析上，看不出中国资产阶级有实行改良主义与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化的可能；但资产阶级在他的政权区域内，为欲巩固他的政权，与在工人阶级参加政权的区域内，欲缓和工人的进攻，的确有企图采用改良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加紧工人阶级的团结，组织工人阶级的武装来抵抗法西斯蒂，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权。同时要极力提高工人的要求，发展经济罢工，揭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假面具。

（二）职工运动的新方针

在党的政治议决案上，已指明“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中国革命将要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之下，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在党的总的政策之下，职工运动自然应该定出新的方针。其主要点：

第一，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

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

第二，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使国有产业能向非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不致官僚化。

第三，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使工人生活水平线，能随时提高。这些工作都应该是劳工部主要的工作，并须设立监察机关，保障这些法令的实施。

第四，要求社会保险之实施，救济失业工人，同时要建立工人宿舍、公共食堂等。

第五，要求设立国家商店，公卖一切日需品（食粮、燃料等），并发展合作社等等的组织。

第六，各地总工会应该随时提出工人的行动总纲，为各地工人阶级奋斗的目标。

第七，发展全国一致的政治的经济的总的争斗，各全国产业总工会应即提出总的经济要求。

上面七项是职工运动方针之骨干，在国民政府管辖之区域内，应该加紧争斗，使能加速的实现。在蒋介石政权之下（资产阶级政权），北方军阀政权之下亦须极力宣传，各级工会提出之要求总纲中，都应该尽可能的提出（自然要特别注意当地工人阶级当前的最迫切的要求）。必须如此，才能兴奋工人阶级革命的勇气，抵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侵入。必须如此才可以保障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三）经济斗争

过去有些地方（如反奉战争中北京、天津、唐山等处）偏重于政治斗争，不注意工人的经济斗争，结果反减了工人对政

治斗争的认识和勇气，并影响到组织的发展，这是我们很可宝贵的经验。所以在第四次大会的决议案中所说的，只有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才能兴奋工人政治斗争的勇气，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经济斗争是工会的日常生活，必须如此才能吸引广大的群众，加紧群众的组织。这是以后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在蒋介石统治之下，有组织黄色工会实行改良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极力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尽量发展经济斗争，攻击这些黄色工会的组织，才能使工人不致受改良主义的欺骗，而扩大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北方军阀统治之下，自然没有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可能，但我们应该注意工人日常的迫切的生活痛苦，发展工人部分的零碎斗争，在可能时，仍须举行大的斗争，使工人群众在这些争斗中团结起来。但是在宣传上仍须提出总的经济要求来吸引群众。在武汉工人群众已经普遍的经过一次经济争斗，但是资本家随时将物价提高，使工人生活几乎毫无改良，甚至挨饿，因此一部分群众发现对政治斗争的消极。这是职工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挽救这个危机的方法，只有一面提高工人的经济要求，继续争斗，另一方面要求政府限制物价，或设立国家商店，公卖一切日需品。还有一种危机就是用革命危急的恐吓，来限制工人的斗争。这样可使工人阶级成为其他阶级的工具，我们应该极力与这种主张奋斗。

自经济罢工发展后，而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者倡为“罢工循环”之说，其用意则在打击工人阶级，就是国民党左派中亦往往有人因此学说而动摇。要知一般物价之增加决非因罢工所致，而有其根本原因，即供给与需要的关系及种种政治战争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尽力根据事实作广大的宣传，与此类学说奋斗。

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的争斗，成为目前很重大的问题，许多人以为欲保证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须绝对停止争斗，这句

话未免矫枉过正。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和领导小资产阶级，决不单是消极的方面让步可以得到的，而是要在积极的方面加紧反帝国主义运动，加紧反大资产阶级的争斗，不断的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扩大一般市民的要求等。所以我们对手工工厂工人和店员的争斗，仍是要积极的拥护，才可以取得这些群众。第一，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太少，必须使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完全团结在产业工人的周围，力量才能伟大；第二，手工工厂工人与大部分店员生活极为痛苦，只有发展经济争斗，才能组织起来；第三，手工工厂工人与大部分店员的劳动关系，多半是一种封建式的主奴关系，不经过争斗，不能打破封建势力的束缚。尤其是非产业的区域（各县、市、镇），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就是地方的无产阶级的代理人。应该是这些地方政治上的领导势力。但这些是他们被小资产阶级利用封建思想与权力所束缚，我们要使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政治斗争的领导力量。自然，在手工工厂与店员的争斗中，要注意资本家的经济能力，提出的要求不可超过他的能力之外，对于团体契约权的争斗，也应就客观的形势而相当的让步。[1]

在工会参加管理的国有产业中，将有一种反对经济争斗的倾向发生。这种倾向发生的根源，一方面将是政府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分子要使这些国有产业能按照他的利益发展，而限制工人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将有人误认这些国有产业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工人阶级自己的产业）。这种倾向不单是要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线低降，并且要影响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发展，我们应该极力的与这个倾向奋斗。只有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线能随国有产业的发展而随时提高，才能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所以在这些国有产业下的工会，应该注意这些产业的发展，随时提出进步工人经济要求而争斗。

在劳动保护法已经颁布以后，监督这个法令之实施将成为

工会主要责任之一。工会应该注意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欺骗，随时代工人向监察机关提出抗议，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真能得这些法令的保障而提高。

（四）组织问题

现在工会组织有几个重大的缺点：第一，无论在纵的方面（产业组合）横的方面（地方组合）还是很零乱散漫，直到现在全国产业总工会，只有海员、铁路、邮政建立起来，并且没有力量。中华全国总工会完全没有尽他对于下级工会指导的责任，甚至毫无关系。各地总工会，虽然权力比较集中，但是所属各工会的组织，亦是非常散漫。所以目前职工运动在组织上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强固中华全国总工会，强固并建立各产业总工会。合并许多小工会成为有力的产业的大工会。第二，许多工会还带很深的行会主义的色彩，甚至仅将行会组织改了一面工会的招牌，所以我们要极力与这种行会主义的工会组织奋斗，要限制手工工厂厂主、店东、包头等加入工会。第三，为准备参加生产管理，须组织强固的工厂委员会。过去虽然在许多地方的工会，有类似工厂委员会之组织（每工厂一委员会），但实际上仅仅做了一些工会的日常工作。以后的工厂委员会，除了工会的日常工作，还要注意本工厂的一切的经济情形的调查和统计，然后将来才可以尽他的监督生产的责任。第四，在广东、上海……等处，已经有黄色工会的组织，我们要使这些工会统一起来，只有在这些工会下面的群众中去发展我们的影响和极力提高工人经济的要求。决不可以专与他们的几个首领联欢，希冀一种上层的统一。第五，手工业工人与店员的组织（尤其是在各县市中），许多地方都以一种产业的方法去组织他。这是不可能的。这些工人，我们应按照他的职业和

他过去组织的习惯，来做组织的原则。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即刻颁布一种关于手工业工人与店员工会的组织大纲，来做各地的标准。第六，铁路工人运动本为本党最早的工作，而且曾有伟大的斗争，因本党年来政策之极端与对此运动之轻视，到现在几乎完全放弃了，这是本党莫大的错误。以后应特别注意铁路工人，把铁总强大起来，在各铁路组织秘密工会，须由铁总派特派员到各路工作，以建立铁路工会的系统性，同时须在各地党部指挥之下，以建立党与工会的亲密关系。第七，第四次大会后，海员转变到本党指导之下，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本党应该继续加紧海员中的工作。惟海员运动，虽渐次在各轮船推行支部的组织，特别以省港轮船组织为最有成绩，但是宁波籍海员仍未完全组织在海员工会之下，内河轮船分会有放弃轮船而只组织木船划子的倾向，都是应该纠正的。第八，矿工运动在此二年内仅唐山曾有一度之发展，但党对于矿工甚为漠视，如北方及关外矿域最多，而我们只注意了城市的工人运动，未注意矿工，此后对于抚顺、开滦、山西、山东、焦作各矿工，本党应积极去做，以树立矿工运动之基础。第九，重工业，过去对于重工业工人很少注意，如上海轻工业同志达数千人，而重工业如某一造船厂仅只几个同志，可以证明，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重工业工人，在职工运动上应占重要的地位，在全部的数量上亦复不少，如我们不有计划的加紧在矿工工人中去工作，则重工业工人已经有广东机器工会之影响，不难为黄色派所取去。

工人领袖官僚化之危险，是目前的严重问题，其原因广大的工人群众缺乏健全的组织和充分的训练，工会干部人才太少，我们党的发展赶不上工人运动的发展，以致工会多为少数领袖包办，脱离群众的监督或党的指导，而趋于官僚化。救济这个危险，应该切实执行“工会民主化”的工作，工会的工作

应该且必须要经过工人群众大会、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各种会议中决定工会的工作，要在这些工作中去健全工会组织，训练工人群众，培植工人运动人才，产出工人运动领袖，必须如此，才能挽救这个官僚化的危险。

国民党应该是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之政党，因此应无限制的引导工人阶级加入国民党，充实其内容，才能实现领导之作用。

（五）失业问题

现在全国各处都有广大的失业工人，尤其是被帝国主义封锁的武汉，差不多有十万以上的失业，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如果我们不为失业的恐慌而争斗，可以影响整个的职工运动。第一，在武汉政府之下，应即刻要求社会保险制度之实施，救济失业工人，同时须加速大产业国有及国营的经济政策的实现，才可以挽救失业的恐慌。第二，应该使失业工人完全在工会组织之下去争斗，在可能的地方，应该在工会内设立职业介绍所及互济会等组织，总之无论如何要使失业工人不离开工会的影响，而为资本家或其他反动派所利用。

（六）童工与女工

童工与女工问题，在党的过去议决案上，都有很详细的规定，但到现在各地还未能正确的执行。各级工会均少注意童工与女工的利益，不引导童工、女工参加工会工作，以致童工、女工不了解工会的意义，不积极的拥护工会，或另外成立组织，形成如另一工会的形势，这是很危险的现象。以后各地工会要积极的拥护童工、女工的利益，每次经济罢工均须提出童

工、女工的要求，引导童工、女工参加工会工作（工会的各级机关均须有童工、女工参加），才能挽救这个危险。

现在劳动童子团的组织，超越了他的教育宣传的意义，差不多变成了一种童工工会，以致与工会常常发生冲突。这是由于工会未能注意童工，和在童子团工作的同志不了解童子团组织的性质和意义的原因。以后各工会均须设立童工委员会（或学徒运动委员会）。童子团在组织上应该隶属于工会组织系统之下。尤其要注意童子团的童子化。

（七）宣传与教育工作

宣传工作在职工运动上占很重要的地位，过去很少注意，以后在各工会应极力发展宣传队的组织，各地方总工会至少须有一周刊和会报的发行（尤其要注意群众化），中华全国总工会已有发行日报的需要，务在最近期间实现。各种小册子的编辑，亦极为重要。

过去工会的教育工作，在提高工人阶级文化程度上多未注意，此项工作，极为重要，在各地方总工会均须有教育委员会的组织，并须极力利用各级政府的教育经费来发展工人教育。在教材的方面，要多注意政治的教育，并须编制劳动教科书，供各地工会应用。

（八）工人纠察队与武装

工人纠察队，不管公开或秘密的地方皆须有普遍的发展。工人有武装在最初仅止自卫（对付工贼流氓等），维持秩序，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而认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所以只要有工会的地方，不管是

秘密的或公开的，都应该有这样的组织。其注意点：（一）要是真正工人的组织，不可让流氓混迹其中，失业工人也不可过多。（二）纠察队应采用征兵制，使全体工人有受军事训练之机会。（三）纠察队可有相当之常备队。（四）中华全国总工会应公布工人纠察队统一的编制法及设立一部以管理之。

现在的军队，多半是游民无产阶级的分子，很难使他革命化，所以我们要使军队革命化，和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的工人去当兵。因此到军队中去、拿枪去的口号，应该很广大的在工人群众中去宣传，打破一般不愿意当兵的观念！

（九）工农关系

现在资本家借口工人工资的增加，任意提高物价，使一般农民对工人不满，因此在许多地方都发生工农冲突的事。这是可以影响到整个的革命前途的。要使工农关系更加亲密起来，自然要把工人生活的痛苦，及物价增高的原因（完全是市场需要与供给的消长），完全是资本家的罪恶，尽量的宣布出来。但是仅只这样的消极的宣传是不够的，一定要各地工会能够与农民发生亲密的关系，帮助农民的组织，拥护农民的争斗，直到帮助农民取得土地。这样才能使农民了解只有工人是他真正的朋友，不受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派的挑拨和利用。

（十）与各国工会建立亲密的关系

中国革命的完成，一定要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所以中国工会应该与各国工会发生经常的亲密的关系，把中国

工人的痛苦及斗争的情形尽量的向各国工人群众中宣传，以取得各国工人的深切的同情与拥护。尤其是在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只有中国工会比较进步，所以太平洋劳动大会，无论如何要在最短的期间召集，并须由此建立经常的宣传通信机关。

（十一）党与工会的关系

党与工会，在过去仍未能有正确的关系，不是使工会成了党的附属的机关，即是工会完全脱离了党的指导。其实工会的斗争应当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同时不能使工会失了他独立的性质。具体的说，就是党对于工会的指导，第一，应该是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起作用，使群众完全受党的影响；第二，在工会的机关中，应该有党团的组织，使党的意志去影响工会的一切工作。这样自然可使工会的机关和群众，都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了。同时，党在每个时期的政策（如宣言、主张等）应尽可能的使公开的在工会中讨论，增加群众对于党的认识。

中央工委过去几乎完全停顿，因此党对于全国职工的运动的方针与策略，完全缺乏指导。以后应该极力将工委强健起来，使能充分的工作。以前许多区委工委都很懦弱，甚至无工委的组织（如北方），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应该积极的纠正过来。

现在各处工会，无论是上层领袖或下层的干部人才，都极缺乏，这也是可以阻碍职工运动发展的。要训练人才，第一，要使工人群众多参加工会的工作，使在许多斗争中，增高他们的经验和工作能力。特别要注意工人代表会的建立和训练。第二，在各地总工会都要设立短期的职工运动训练班。党应该选

择很好的工人同志，办一高等职工运动学校，养成高级的干部人才。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据莫斯科中山大学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五大决议》，在这段之后还有："还有一种以为店员是小资产阶级，店员与店东的争斗，是小资产阶级内部的争斗，我们不必为店员的利益，而失掉了整个的小资产阶级。这也是一个错误。固然大部分的店员在思想上有很深刻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根本上是一种雇佣劳动者，且在全国的数量看来很可惊人，尤其是各县市镇有很伟大的力量，决不能够漠视他。自然在产业区域，手工工厂工人与店员的地位，远不及产业工人的重要。"

PDG

组织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本党最近一年半以来，已变成了真正群众的党，有五万人以上的党员。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本党有更加发达的增大的可能性。革命之深入，在本党面前提出了迫切的任务，即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建立这些阶级的民主独裁制政权。

为要完尽这种任务，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波尔札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

然而，本党迅速的发展，党的干部人才缺乏而幼稚，我们的党部自然没有完备的组织和巩固之可能。在这里隐藏着很大的危险。

第五次大会认定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之指示是完全正确的，特训令新的中央须将党的一切组织工作，建立在共产国际此种指示之上，并须特别注意底下几点：

（一）努力扩大党的数量，并吸收产业工人，进步农民，和革命的智识分子到党的队伍中来，同时党应该尽可能迅速实行党的教育，训练新党员，用通俗的书报方法和实际党的工作方法。全党的积极工作，乃是党真确的发展和增长之最好之方法。

---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

（二）中央应该尽力使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并使所有大工厂铁路码头等都有我们的以支部为基础的组织，积极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做政治工作，这才是真正领导工人群众。

（三）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指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的应用。要解决上述二种任务，其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吸引工人到所有党部的指导机关来。

（四）在党面前，将来又有一个问题，即集中各方面的指导，在工会，在农会，在国民党及其他团体。为着这个，必须明显组织党团，严密服从党的指导。

（五）党应该严重注意在党外劳动群众的工作，在他们中发生影响，并指导他们。这些任务，经过济难会运动、妇女协会运动、学生会运动及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团体运动，是能够做到的。吸收劳动群众到国民党来，乃是本党解决这些任务之一种方法。

根据本党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党员数量激增这一事实，并根据本党目前的任务，第五次大会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

一、C. Y. 是党指导下的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组织，其任务在扩大共产党主义的宣传与共产党的意识和政策的影响到广大的革命青年群众中去，吸收他们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各种斗争。中国青年大多数都深切的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别人能比他们更激烈的与这压迫奋斗。因此，C. Y. 应当特别注意反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的斗争，扩大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反对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及拥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并领导青年无产阶级参加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及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政权的争斗。

二、C. Y. 夺取广大青年群众的唯一条件要注意他们日常的需要与争斗，用部分的要求具体的口号才能将革命的青年群众团结在 C. Y. 的周围。C. Y. 必须领导青年工人全体加入工会，在工会内组织青工或学徒委员会，注意青工、童工和学徒经济斗争工作，改善他们的生活。在工会中做青年工作的 C. Y. 团员须组织团组，受工会内的党团及团的执行机关的指挥。在工会工作的同志须向一般工人宣传青工利益与成工及整个工人阶级利益之相关，而打破旧的行会的保守习惯或拒绝青工、童工、学徒的利益和要求。C. Y. 须要组织青年在农民协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

会之下，参加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政权的争斗，并发展农村中教育文化工作，在农民协会中设立青年工作部及团组。童子团在数量上已有发展，必须要继续争得童子团的领导，使广大的劳动儿童在共产主义的影响之下组织起来，教育成为无产阶级争斗的后备军。国民革命军大都是失业的青年农民，这种军队实为革命重要力量，C. Y. 应在 C. P. 指导之下注意在兵士中努力发展工作，改造这种军队，社会成分扩大并深入下层兵士群众的宣传，使成为真正民众军队革命军队。C. Y. 的工作要努力向青年化的方向走去，才能获得广大革命群众。

三、C. Y. 在革命学生中与青年工农中的影响，自 C. Y. 第三次大会以后有相当的进步，但是在组织上的发展颇为迟缓，落在党的后面，这是 C. Y. 工作最大的缺点。今后须要注意在广大的青年工人、青年农人、青年军人、店员、学徒与革命学生中积极发展组织，团结广大的青年于其周围，努力做到团的群众化。过去 C. Y. 的教育工作等常缺乏，团员对主义与政策之认识均甚幼稚，没有在工作中注意培养新的干部人才，党必须处处帮助 C. Y. 改进并加紧内部教育训练工作，提高团的政治兴趣，不断的培养新的工作人员，吸收好的工人同志在各级机关中工作，以巩固 C. Y. 各级机关的组织，特别是中央指导机关。

四、过去 C. Y. 与 C. P. 的关系不甚密切与完好，重要原因是因党没有注意予团的工作斗争以帮助，甚有些妨害团的工作（如调动 C. Y. 工作人员过频），这是很大的缺点。今后党应处处积极指导团的工作，精神物质以与团帮助。团在政治上受党的指导，但团有讨论政治问题、提高团员对于政治的认识与兴趣的责任。为工作的便利及团能迅速执行党的决议并培养青工人才起见，中央及各级党部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均应经

常的有 C. Y. 代表参加。C. Y. 应随时供给党以新的工作人才，但党调用 C. Y. 工作人员时须要顾及 C. Y. 工作，使不致受妨碍。为使党团分化及工作发展的对象识别起见，团员最高的年龄应减低到二十一岁。党须要帮助团在青年群众中发展，应继续注意 C. Y. 本身青年化的工作，即是说将共产主义的政治工作使做到青年群众中去。C. Y. 应以习青年本身利益的争斗和文化体育等运动着手，引导青年群众参加党领导的一切政治争斗，这就是青年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教育。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周恩来等关于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

（一九二七年四月）

郭沫若来，道及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纯由蒋氏直接指挥。近日宁波、杭州、南京及上海之大屠杀与捕杀共产党，死伤者近四百人；封闭党部、工会，解散市政府，强缴工人武装，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组织租界包探、流氓专司暗杀，成立工贼工会，压迫工人，引诱资产阶级，巩固政权，控制财源，更得以动摇左倾而穷苦之军队。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广东屠杀现又开始。粤沪每月一千五百万之收入将源源不绝。蒋氏现已赶走薛岳、严重及所有左派军官，撤销、拘捕一切政治工作人员，左倾军队日益惶惧。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反之，政府苟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则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仅四团，且在前敌不易调回。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

* 在这个意见书上署名的还有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

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扬州，大隤。二十六军、十四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又，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也。如何，望与左派同志切实商复为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七年五月）

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们：

过去二年之间，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伟大迅速的发展。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用压迫、剥削、抢掠、攻袭的手段以获得并巩固其势力，如今这些势力已经发生摇动了。当此革命胜利的斗争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确是主要的动力。因为劳动群众的拥护，国民革命运动曾在广东得到过巩固的基础；因有工农群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曾使革命的领域扩张至长江流域。当帝国主义者实行以武力侵占上海镇压革命军时，首先立身于帝国主义炮火之前者，就是英勇的无产阶级。促成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削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之势力的，也是革命的民众势力。在过去，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已经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了，革命的前途也要依他们的战斗意志而前进，以他们的决心而胜利！

在这严重的革命进展的阶段中，国民革命战线内的阶级分化确系一个重要的现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反对大资本家及封建势力的剥削之斗争与之相伴而进，是决不能发展的。阶级的斗争和国民革命的斗争，势必同时进展。现在国民革命阵线之中，因为大资产阶级的背叛而日益冲突，最终结果，乃至分裂。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并非新的发现。自帝国主义建立其统治以来，早已有这种斗争的发生。过去革命运动（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庚子之役），都是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情绪之原始的表现，然而一般反动派称他们是排外运动。

帝国主义之统治在中国的形成，由于两个方式：第一，帝国主义兽性的武力侵略；第二，国内满清皇族及封建官吏的贪婪腐败。第一种是在帝国主义侵入时期的主要方法；第二种能促成帝国主义统治的巩固。过去的革命运动，都为列强的新式武器和中国的封建军阀的政权所镇压下去了。此后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渐见民权主义的色彩，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遂推翻满清统治的皇朝。所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推翻封建势力以及其他反民权分子的斗争，总是同时并举的；这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现象，乃是近百年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共同的主要原素。中国革命运动愈进展，民权和封建势力之剧战，也愈显著。

中国辛亥的革命虽说将贪淫的满洲皇帝推翻了，但未曾将民权主义实现于全国。其原因就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太狭隘。当时参加革命的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的智识分子，他们的力量决不敌帝国主义所卵翼的反动势力。所以第一次的共和终归夭亡，革命运动亦遂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所保护的帝制运动（袁世凯），只因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嫉忌，方被扫除。

欧战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获得了广大的民权派的社会基础。在反对巴黎和约口号之下，恢复民权运动的生命。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的主力，就是城市的民权派，当时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式的智识界，特别是学生。但在这个时期，群众运动的社会基础并不深远。无产阶级尚未引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抵制仇货的运动确实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并没有提出扫除封建势力及一切反动分子之要求，以表露此次革命运动之民权主义的特质——而封建势力和其他反动分

子，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实基础。

而且排货运动有他的限度。要想使排货运动达到严重打击帝国主义的程度，就不能不妨害本国贩卖洋货的商人。这种内部冲突，确实是五四运动的弱点。不过我们决不要忘记：五四运动是后来有广大社会基础的真正革命运动之发端。五四运动的确对于那些无确定阶级的知识分子给了一个有价值的革命课程，使他们的视线移转到劳苦的群众，使他们认识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势力的后备军。

近五六年来从事工农运动的先锋，大都是由五四运动后逐渐训练出来的。这个事实，指明在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之过程中，社会的关系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现在的革命，需要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合作，所以五四运动的先例，很值得我们回忆。城市的民权派（小企业家，小商人，技师，知识分子，雇员），在政治经济上都居于被压迫的地位。他们要求政权和经济的发展。他们因为不满意于现状，所以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但是，不求得他们的切身的阶级利益，他们是不能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发展至如何深远的程度的。然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不免有暂时阻滞商业的影响，这不仅麻烦了大资产阶级（如银行家，买办，批发外国货者），同时也妨害了些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城市的民权派作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为内部的冲突，不能有深远的发展。就是政权的斗争也不能举行，因为经济的冲突不加紧，政权的斗争不能紧张。五四运动就是一个明证。此时小资产阶级中的最进步分子（阶级性不确定者），恐怕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因内部的冲突而停滞。于是中国革命不得不另找斗争的出路——这个出路就在工人阶级奋斗之中找到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有和无产阶级联合向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军（封建势力和军阀）同时攻击，才能达到他们经济的利益，获得民治的政权。

小资产阶级经济之所以不能开展，并非帝国主义统治之直接的结果。反之，现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存在，乃是自由的繁荣的外国商业所赐与。真正能妨害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者，乃是国民经济的封建性，和循环的军阀战争。这两种形式和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这却是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果了。封建式的经济阻滞了内地商场的开展。中国封建形式的统治机关，采用多种方式（苛税和厘金等），以阻碍自由的贸易。军阀以重税压迫商人，实际上就能破坏商业。封建军阀的专制，将中等阶级的权利完全剥夺。所有这些现象统统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于工农更不用说了。城市民权派的反帝国主义情绪，是不自觉的，虽说他们反抗压迫，但不认识敌人的所在。如果直接反抗帝国主义呢，登时他们又觉着妨害着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在失望之中，就将此斗争放弃了。欲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根本铲除直接压迫他们的势力（就是妨害商场，破坏贸易，并侵害知识分子、雇员之经济利益的军阀、士绅。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自身不能找到革命的路径以图自救。只有和无产阶级联盟，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才得到解放。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建树，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不是自觉的），趋向于无产阶级去了。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之五卅运动，证实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形成了伟大的群众运动。在此运动之前，曾有一个组织工人群众的时期。此时所提出的要求，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国民会议，亦并非纸上谈兵，此种要求之后，的确代表广大群众的意志，而得其拥护。群众的意旨发生群众的行动。上海无产阶级及城市民权派的革命行动，虽然陷于血泊之中，但是他的影响普遍全国，变更了帝国主义的态度。

上海工人的经济罢工，加上了革命的政治色彩之后，那些

和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大资产阶级，立刻起来消灭这个运动。结果，他们破坏了革命的战线，帮助了帝国主义。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并非帝国主义者为报答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勋劳而开的，乃是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用革命的行动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所强夺来的。

中国革命民众的觉醒，还有其他的证明，就是以前的海员罢工和“五卅”时之粤港罢工。“五卅”时之粤港罢工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永放光明。那时无产阶级的行动，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社会基础，并将国民政府形成了反帝国主义及民权自由运动的中心机关。

民权的势力及广东国民政府，因有无产阶级的帮助，将英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反革命势力，打的体无完肤。买办阶级企谋推翻国民政府，无产阶级毅然拥护着他。所以，捍卫广东，反抗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攻击，并以一年余的经济封锁，削弱帝国主义的商业者，更是中国的无产阶级。

以上和其他可记忆的事件，都表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基础，已经扩大起来。伟大的革命运动亦已卷进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过这一运动的原动力，仍旧是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的势力在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亲密的同盟。然而，在这国民革命运动的组织中，阶级的冲突决不能全部泯灭。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设非和阶级斗争同时发展，决不能按革命的路程前进。国民革命的职任不仅是反抗帝国主义，并且同时便要肃清阻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封建宗法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

国民革命运动性质的更变，不仅吓怕了帝国主义，同时惊醒了大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运动进展的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发觉了与他们利益有妨害的事实。他们希望无产阶级和民权派

只为他们的革命而牺牲，同时不要妨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革命运动客观的性质，决不能因大资产阶级主观的欲望而削弱。

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独占相冲突；所以，过去资产阶级不但参加革命，并且在初期曾经领导革命。虽然，中国民众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非常之深刻。中国各阶级同时反对帝国主义，而各阶级的目标却各不相同：资产阶级想和帝国主义谋妥协，而无产阶级则需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势力。中国资产阶级之中，除买办阶级外，和帝国主义固无好感，但是他们自己却希望能够自由行使其剥削。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必须破坏封建式的资本主义之一切剥削——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基。换言之，就是完全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加紧阶级斗争；此种前途便恐吓了资产阶级。

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不能阻滞无产阶级和民权势力所推动的国民革命运动，终竟破坏了革命的联合战线。三月二十日事变后，资产阶级恢复了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且努力缩小革命运动的路程，使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结果因中国的客观环境关系，势必走到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纲，是想用军事的胜利统一中国，然后与帝国主义谋妥协，使中国大多数民众仍被剥削。

当资产阶级反抗军阀的时候，客观上带些反帝国主义性，所以无产阶级和他们在初期建立联合战线，集合工农的力量赞助北伐，以反抗北洋军阀。设非工农的帮助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决不是那样容易。资产阶级却要想从军事的胜利中，只保护他们一阶级的私利；然而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以客观条件的规定，不能只按照某一部分人的私利而进展。中国全体民众的利益，是要求扫除封建势力，建立民权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国民革命军胜利后，适于民众运动发展的

环境已经造成，反对封建势力，攻击帝国主义及建立民权政府的斗争，因而加紧。结果，北伐的胜利，一方面固然强健了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亦削弱了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力量，打破了蒋介石以军事独裁控制国民革命，并单独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企图。但是资产阶级确实强大起来了，他竟领导着一部力量脱离革命的战线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虽说勉强戴着国民革命的面具，他们确实变成军阀的友军和帝国主义的工具了。

蒋介石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未正式脱离国民革命战线之前，已经有反革命的行动了。蒋介石在江西屠杀工人领袖，就是他仇视工农运动的表现。上海无产阶级发起武装暴动帮助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却故意下令阻止军队不使前进。蒋介石峻拒了上海无产阶级伟大的、友谊的援助，并且坐视孙传芳屠杀工人，不为之稍动。蒋介石既到上海之后，接受帝国主义的怂恿，用暴力压迫为欢迎国民革命军而兴起的工人阶级。

蒋介石打击工人运动，极力仇视共产党，终竟揭破了他的国民革命的假面具。在这个革命阶段之中，工农群众更是国民革命的发动力了。惟有他们斗争，才能保证反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以反对劳苦群众的革命行动，破坏工农的组织者，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国民革命的敌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行动，自三月以后都是反对国民革命的，他们的行动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国民革命军在长江流域的胜利，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恐怖了帝国主义。中国的内河充集了外国炮舰，在上海（帝国主义的根据地）实行武装警戒，以防御国民革命军的侵袭。但是帝国主义究竟不敢以直接行动反抗革命军。他们企图插入革命的战线，以腐化革命分子。帝国主义认清了中国资产阶级在反革

命上是他们客观上的同盟军。所以他们一面表示对于革命的一般的敌意，一面却表示：如果资产阶级反对革命，他们可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看到了帝国主义这种政策，于是下决心反叛革命。

资产阶级的反叛，兴奋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拟利用革命战线的破裂，决定实行武装干涉。帝国主义因对武汉革命政府采用了侵略的政策，精神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和他们戴着国民革命假面具的南京政府。

阶级的分化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是现时革命阶段里的显著的特性。如果不明了阶级分化的意义和教训，那就决不容易战胜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阶级的斗争更加紧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不能和阶级斗争分开了。在过去，资产阶级能间接反抗帝国主义时，无产阶级也努力和他们保持联合战线。现在资产阶级公然放弃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回头向工人阶级宣战了。资产阶级的背后，就是封建的反动势力，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们这些成分已经联合了一个反革命的大同盟，来镇压国民革命。所以革命势力的职任，是反抗以至歼灭这个反革命的联盟。

中国的工人们和农民们！强健起你们的组织来，和城市民权势力建立革命的同盟，拥护革命的政府，使他永远立于不败的地位。

革命运动定要向前进行，应在各地摧毁反动势力的根株，以冲破反革命的同盟，消除军阀，推翻帝国主义。革命的基础，一定要使它深入。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和城市民权势力，既然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革命的发展必须能保障他们的利益，扑灭他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除非有中国工具的帮助，是不能向革命势力宣战的，过去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在现在的阶段中，我们必须破坏这些工具，才能削弱帝国主义的基础。反叛

的资产阶级拟集合所有在国民政府领域内的反动势力于他们的周围，至于在广东、上海、南京、广西、四川已经建立了一个反革命的环形，逐渐向前进展，以达到禁闭国民政府的目的。反革命的势力自然借助于封建宗法的成分。革命的国民政府，欲战胜反革命的阴谋，必须要在自己领域内消灭反革命的根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必须拥护政府完成这个职任。在现在的革命阶段中，国民革命必须和农民革命吻合一致。

大地主的田地必须没收。民团、团防必须解除武装，绅士的政权必须消除，乡村自治政府，必须以乡村民权势力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障革命。“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永立于不败之地。

国民政府治下的农民革命必能引起其他省份农民群众的同情与援助。这样可以扑灭军阀的势力。国民革命必为各地的农民所欢迎，如同欢迎他们的解放者；军阀的势力，必定消灭于外部革命军的攻击和内部农民的暴动两个烈火之间。

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封建势力的束缚贸易，以及近年来的战争，妨害了小资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必须和工农群众建立同盟，以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和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定要领导无产阶级保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的政权，小商人必须脱离苛税的压迫。

无产阶级是民权同盟的先锋。只有在保护他们自己阶级利益之下，才能完成他们的使命。生活程度的提高可以增加他们的战斗力。在领导农民进攻封建势力，保障小资产阶级利益之下，无产阶级不能削弱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更进一层，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所以能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因为他们占有了中国的重工业银行以及铁路，无产阶级一定要求将这些生产金融机关收归国有。无产阶级保障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小资产阶级赞助无产

阶级反抗资本主义。惟有在这个互助的关系之上，农工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才能建立起来。

国民党自从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脱离之后，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主要的职任。革命的民权同盟，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为着强健这个同盟，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行使领导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得政权。所以这样，是为的巩固革命分子的结合，保障革命的发展。

欲战胜帝国主义干涉及反革命同盟阴谋之急切的危险，必须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依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本性，国民革命的政体应当是民权的，可是对其他阶级必须是独裁的。凡是不和革命站在一起，并且反对我们的，都应当以无情的手段对付他，这是国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则。

现在是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实在是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中国国民革命才发展到了这个阶段。

大资产阶级的脱离，使国民革命运动解脱了内部冲突和不协调的原因，使整个的运动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进行。因有阶级的分化，使这运动有深入他的社会基础的必要。因此广大的群众可以吸引到在这个斗争之中，促成革命运动的伟大的发展。

国际情况也是同样的顺利。帝国主义者尝试造成共同的反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但是世界资本主义普遍衰落时期，各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加增。对于积极的武力干涉中国，他们不能一致。就是在一国内的同一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有些主张采用侵略的策略以保护已得的权利，有些主张依和平的条件以进行贸易。这个情形减轻了各国

即时共同干涉中国的危险。如果反叛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那就可以给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一个新工具。

另外还有一种势力使武力干涉不易实现者，就是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用几只兵舰、数百水兵威吓中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如果实行武力干涉中国，结果就是长期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一定很决绝的反对殖民地的战争。这个方法恐不能应用了。再者，如果对中国宣战，参加战争的各帝国主义国内，一定要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另一方面，全世界表同情或帮助中国的革命的实在有伟大的群众。所有世界上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和为自由而战的中国民众站在一起。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们！

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需要更多的牺牲，更勇敢的决心的时期了。不只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世界革命的发展也全靠你们了。你们决无表示灰心的理由，革命的胜利已经在最近的将来了！

你们一定要战斗，你们一定要胜利，你们一定要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

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于汉口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中国的工人和一切被压迫的民众！

一九二七年的“五一”到了！今年的“五一”不单是中国无产阶级检阅自己的革命队伍的日子。今年的“五一”正是中国革命急剧进展的时机，也正是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四面围攻中国革命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历来当国民革命的急先锋，他的目的，是要反抗中外大资本家的剥削及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是要推翻军阀地主买办的政权，而创造革命平民的政权。他现在已经引导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奋斗，而使革命的胜利扩大到了半个中国，他的勇猛牺牲的精神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没有见过前例的，他在事实上证明自己是唯一能解放中国民族及一般民众的阶级；非他做中国革命的领袖阶级中国革命是决不能彻底胜利的。

现时革命的进展，正向着彻底胜利的道路上走去。今年中国工人阶级的“五一”运动——每日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决不仅是宣传示威而已，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要力争自己阶级利益的保障，要用自己的力量保障革命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他要求在最短期间确定劳动法，亲自参与监督劳动法的

* 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原载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四期。

实施，如工作时间、工厂卫生、最低工资、女工童工的保护等——设立劳工检查院。因为只有革命能如此的逐步深入，才能摧毁帝国主义军阀大资产阶级土豪劣绅等的反革命势力，而后国民革命的胜利方能巩固。

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他要剥削工人和农民，要剥削小商人及一般民众，但是工人阶级要领导着革命来解放一般民众，拥护一般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于是资产阶级看见革命的真正发展，危害他的私利，所以他宁可接受帝国主义的命令而开始屠杀工人，摧残共产党和革命的国民党，压迫一般民众——跑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蒋介石派就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公然屠杀民众，反对国民政府，中途破坏革命，在上海、南京、广东、江西、安徽、四川等处不断的实行反革命的屠杀政策——都是大资产阶级只顾自己阶级的私利而背叛国民革命的表演。他现在和帝国主义共同进攻无产阶级，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是革命中的主力军，如果无产阶级势力不被摧残，他是无从破坏革命的。如果革命破坏而中途停止，那末，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都要受着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的更加严厉残暴的压迫。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现在要联合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反抗军阀和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要联合农民实行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并没收大地主土地；要联合革命军人及兵士，实行革命战争，改善革命的兵士生活；要联合一般民众参加并巩固革命政权，废除苛捐杂税，实现民主政权的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一方面摧残军阀及反动派的根基，别方面巩固并发展革命。今年的“五一”纪念正要表示工农商学兵等一切被压迫民众的革命团结，去镇压反动，歼灭军阀。

帝国主义呢，也因为中国革命急剧的进展，除利用军阀及反动的资产阶级之外，还在实行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并且

开始以武力直接干涉中国革命（如南京、惠阳及汉口四三的事件）。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都应当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去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结合更密切的联盟，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现在成为世界革命主要的势力之一。今年世界无产阶级的“五一”纪念，可以称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示威运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应当做世界的“五一”运动中的主要队伍。中国工人及被压迫民众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在今年的“五一”纪念中，真正表示他的现实的意义。这一件大的革命的世界联合，终竟要打破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稳定，而得到最终的胜利！

我们今年“五一”的标语是：

工农商学兵一致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武力与民众一致动员打倒奉鲁军阀！

撤退外国军舰！

收回一切租界！

革命民众组织义勇队武装保卫革命根据地！

镇压反革命派！

颁布劳动法！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保护女工童工！

肃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建立乡村民主政权！

用革命的恐怖制止反革命的恐怖！

拥护国民政府！

救济失业工人！

反对帝国主义武力干涉！

打倒反动的资产阶级！

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拥护中华全国总工会政纲！

反对法西斯蒂的恐怖！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万岁！

争得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前途！

耕者有其田！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

（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

瞿　秋　白

中国革命最近进了新的阶段。从前对于买办军阀帝国主义，相当的站在对抗派地位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如上海的虞洽卿等类的东西），现在已经公然反动，几乎把一切假面具都抛弃了。从前对于直吴奉张的朝廷，打着孙中山国民党的旗号北伐的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及李济深等类的地主土豪），现在也已经赤裸裸的实行反革命，屠杀工农，摧残民权，压迫小商人及一般平民。中国国民革命的队伍之中，从今以后已经没有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立足之余地。国民革命的战线，因为大资产阶级的决然破裂，而改变了新的方式。何以会这样的呢？因为中国大资产阶级虽然曾经参加革命，虽然恨帝国主义和买办军阀，但是他们并不是为着要彻底革命而反抗帝国主义和买办军阀的；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和买办军阀的统治，足以激起一般民众的革命巨潮，而这种民众的彻底的国民革命，客观上必然要危害到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大资产阶级争先恐后的抢夺革命的领导权，想要领导“革命”而停止革命运动。如今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已经领导着革命向前发展，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虽然霸占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权位，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国民政府的外交、财政等等，仍旧是不能遏止无产阶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五期。

级及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于是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便狗急跳墙而实行反动了。他们反动之后，却还想冒着国民党的名，自称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蒋介石在南京组织了一个自己的国民政府，声言武汉的国民党是共产主义的，说共产党吞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蒋介石派的新军阀屠杀工农，摧残民权，但是，他们自己说：这是救党救国肃清共产分子。实际上是不是如此的呢？完全是一派诳话！现在武汉国民政府及革命的国民党之内，有极伟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军队，他们难道都是共产党的吗？当然不是。他们能很坚决的与共产党合作，正因为他们是真正孙中山主义的革命党。孙中山主义的国民党，要实行国民革命，要解放中国民族，要实现平民的民权，要改善平民的生计。所以，他们就应当明白国民革命的目标。至于国民党的右派（蒋介石等），实际上是中国之卑怯无耻、叛国卖民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他们虽然参加革命，然而等到革命进展，真正要侵犯帝国主义的特权（一三事变中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真正要推翻封建军阀及乡村豪绅的政权（湖南、湖北农民运动的大发展），真正要进一步改善劳动平民的生活（劳动法的拟议，尤其是土地问题的开始解决），等到革命发展到如此的阶段，他们，国民党右派，便立刻背叛革命，分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屠杀工农，摧残民权。这显然是背叛三民主义，显然帮着帝国主义买办军阀来镇压革命。他们难道真正是为着反共产而救党救国？他们是为着自己阶级的私利，即亡党亡国亦所不惜的！

国民革命的目标，凡是真正革命的国民党都应当知道的。国民革命的目标是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将中国解放出来。帝国主义经过军阀买办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剥削压迫中国。但是，军阀买办之统治的根基还深远得很呢。军阀的割据地盘，篡窃督军、省长的权位，而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不仅仅靠着自己的

兵力。乡村之中的土豪乡绅，实际上是乡村里的小政府：一省的督军是一省的军阀，一村的乡绅便是一村的军阀，这些土豪乡绅在农村之中包揽一切地方公务，霸占祠族庙宇及所谓慈善团体、公益团体的田地财产，欺压乡民，剥削佃农，作威作福，俨然是乡里的小诸侯；军阀的政权自然是经过他们而剥削农民的，他们替军阀、县官包办捐税，勒索种种苛例；他们可以自己逮捕农民，私刑敲打，甚至于任意杀戮，如活埋、烧死等等惨剧，都是他们的惯技。军阀所用以统治农民的力量，正在于有土豪乡绅的封建宗法政权做他们的根基。而且土豪乡绅，除军阀的军队以外，还有自己的武装，例如广东的民团，湖南的团防，以及其他各省的所谓保卫团、保甲，名目虽然繁多，实际上都是地主土豪的乡村军队，往往以防御土匪为名，而事实上是压迫农民的武器。有的时候，民团等类东西甚至于和土匪联合起来蹂躏农民。这些所谓土豪乡绅是谁？就是大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经过买办而剥削中国，而买办又经过中国农村中的大地主阶级而剥削中国的农民群众。地主土豪阶级的商业化，就是代替帝国主义者买办在农民身上剥削他们的汗血；地主阶级要积累资本，便拼命的增高租额，重利盘剥（钱庄、当铺等），并且垄断原料，兼并田产。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本来已使大多数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破产，军阀的战争和压榨，更使农民的生活陷于极端悲惨的地位。自然农民的收入连养家活口都不够，佃农的数目日益增多，一般农民的窘迫日益厉害，致使任何高的田租，任何重的利率，农民都不得不忍受。农民付纳田租或苛捐杂税之外，所余的数目，不及自己收获的百分之四十。这种剥削不但对于乡村中的农民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对于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也有间接的影响：农产品的出售于城市商场，差不多完全要经过地主土豪的手，于是地主土豪一方面以垄断的手段贱价收买或勒索之于农

民，别方面亦可以垄断手段高价出售于城市。因此，城市平民的生活程度日高，即贫困的情形便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同时失业破产的农民日益众多，不但使兵匪蔓延，而且使工资低落。这些情形，都使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和剥削得以维持。农民处于如此剥削之下，自然首先所感觉的，只是减租减息及减税的要求；但是，实际上农民，尤其一般贫农（自耕农、佃农），是受缺少田地的痛苦。当农民只能享受自己收获之百分之四十的时候，地主阶级和军阀官僚实际上已经剥夺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耕地农有的要求，是中国革命客观上的结论。所以孙中山先生说："耕者有其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剥削，其主要的根基，便是耕地已非农有，地主阶级得以尽量压榨农民，经过买办阶级而供献中国人民的汗血于世界资产阶级。

所以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对于中国的统治和剥削，便必须彻底改变现存的土地制度，为此，亦就更加要彻底扫除封建宗法式的土豪乡绅在农村中的政权。必定要农民得有享用土地的权利，保证农村经济的自由发展，必定要农民能够组织自己的政权，拥护劳动平民的权利，筑成平民政权的巩固的基础，然后国民革命方能成功。换句话说，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

固然不错，中国农村中的剥削，大半还是封建式的剥削，这对于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市场的发展），也是巨大的障碍。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之薄弱，一则他是买办性的成分居多，二则他是商业资本里刚刚生长出来的雏儿，他自己是地主土豪阶级的化身，他自己大半还靠经过地主土豪剥削农民以求利（如收买原料），三则他和封建宗法社会的关联还很密切，一切流氓投机主义及无耻卑劣的恶浊分子，都是他的附庸。因此种种，他虽然要和大买办阶级竞争，虽然要和军

阀政治对抗，然而不能和农民联盟，而形成反封建的一种革命势力，却只能和地主土豪的封建分子联盟。况且中国资产阶级当此世界资本主义衰落的时候，他的政治经济利益根本上和无产阶级是冲突的。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实行土地革命，也决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民权主义的责任。

北伐胜利以来的种种事实，完全证明了这种情形。当北伐军出发之后，蒋介石带着三月二十日的威风，要想借口北伐，不但加重剥削广东的工农，而且要阻遏一般工农运动，以及国民会议的民权运动。蒋介石以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实行军事独裁，镇压革命民众，这对于资产阶级是再要好也没有的了：资产阶级只要利用工农的民众，造成自己的武装势力，取得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的资格，同时，也便是压迫民众的武器。然而湖南、湖北的农民，以及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凡是革命军经过的地方，农民都努力起来参加帮助，各城市的工人也是如此。他们帮助北伐，难道是为着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吗？革命军的一般将士在战场上牺牲性命，拼死作战，难道也是为着造成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妥协的资格吗？当然不是的！革命的民众和革命的将士努力于革命战争是为着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换句话说，是为着要解放中国民族，要实现平民的政权，要改善平民的生活——要三民主义的实现。但是，等到赵恒惕、吴佩孚、孙传芳的政权倒了，蒋介石派便不肯再革命了；那时，革命的军人、兵士，革命的工人、农民，以及一般劳苦的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等平民，却都需要巩固这一革命的胜利，事实上便是再深一层而铲除乡村中的豪绅地主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买办军阀等反革命派的田产，而使大多数农民得到土地，减租到能使佃农实际享用自己的收获——等到这种时候，蒋介石，以前满口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蒋介石等，立刻翻过脸来屠杀工农，分裂国民运动；虞

洽卿，以前狂叫关税自主，民族独立的虞洽卿等，也立刻手忙脚乱，筹拨一千五百万元给蒋介石，作为屠杀工农的犒赏费！如此看来，中国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的叛离革命，完全是因为革命的发达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危害了他们的私利，地主土豪对于农民的剥削和统治，在中国现时的资产阶级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中国资产阶级想造成新式的军阀统治，他们需要地主土豪替他们包办捐税，中国的资产阶级想保持对于原料收刮的强抢勒索的制度，他们需要地主、土豪替他们继续造成贱价的劳动力。所以革命发展到现今的阶段：湖南、湖北的农民攻打地主土豪的政权，上海工人领导小资产阶级创造平民的民主政权——革命转入了新的时期，亦可以说是革命进一步的实现三民主义要求的时候，蒋介石等便叛离了，反动了，与帝国主义妥协，而宁可去做帝国主义的新式走狗了。所以蒋介石等现在反对武汉国民政府，而自己另外建立南京政府，摧残国民党革命派的党部，而自己另组织反动派的所谓国民党，凡是这些行动，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仿佛是为着保持纯粹三民主义的政党，肃清共产分子等等，恰好相反，他们的叛变，是表示他们反对三民主义的初步实行，反对国民革命的进展。

如今蒋介石等从江西赣州屠杀工农领袖起，经过安徽、上海、广州、重庆等处的屠杀，直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共产党、工人农民的领袖，实行其残暴不堪的屠杀；非刑敲打，腰斩，强奸……都是为着要和帝国主义军阀妥协，保存帝国主义军阀统治中国的制度之封建宗法社会的根基：大地主的剥削和豪绅官僚的政权。

但是，革命的怒潮已经将蒋介石等的企图打破了。北伐军赶走了赵恒惕和吴佩孚；农民群众说："这还是第一步；那些帮助赵恒惕、吴佩孚剥削压迫我们的人怎样？"——他们自己积极的起来，遵从国民党的政纲，进一步而推翻土豪乡绅的政

权，湖北、湖南的乡村里，农民已经实行征取自己的政权。他们动摇了土豪乡绅的威权，立刻便觉到：要达到减租减税的目的，必须自己拿住政权，必须造成自己的国家。他们也感觉到土地的缺乏，他们已经明了大部分贪官污吏、大地主所掠夺去的租税，不但不能使国家财政增加收入，以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实际上都被大地主等所吞没，或者就用他们身上所搜括去的钱，买了杀人的武器，诱骗兵士的群众，组织民团等的武装来压迫屠杀他们自己。所以农民很明白的提出没收大地主田地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铲除反动军阀及蒋介石等的经济基础；只有这样，农民参加革命才有真正的意义。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要领导农民去彻底发展这种斗争，因为这种斗争方能建筑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巩固的基础，因为农民政权及土地的运动，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巩固自己胜利的最伟大的力量；和劳动法的制定及实施，同样的是国民政府与民众“化合为一”的过程之表演。

现时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不仅在于反动的资产阶级之叛离，而使工农小资产阶级之联盟得以更自由、更开展的向前进攻，而且还要认清：革命扫除了表面的军阀统治于湘、鄂、赣，如果还要继续发展这种胜利于全国（即是北伐的革命战争），便必须有坚决的更进一步的铲除军阀统治及买办剥削之经济根基的政策：就是使国民政府的政权之基础，实现于更深更广的民众；换句话说：便是建立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如果不能如此，那么，国民政府在四围反动势力的压迫之下，不能得到工农群众的更积极的赞助，又不能铲除张作霖、蒋介石之奸细于广州的农村之中，则国民政府的地位是非常之危险的。农民群众应当赶快起来，积极奋斗，赞助国民政府，巩固国民政府，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建立农民的政权，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使一般农民或因租额的大大减少，或因累进的

统一的田税的实施，得到真正享用土地的权利；如此，则军阀统治根本可以铲除，反动资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友军也就受着严重的打击，国民政府的社会基础可以大大的巩固，革命的北伐战争可以吸引极广大的农民群众来参加。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在农民政权及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将要战胜一切反动势力，将要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将要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国民革命之农民政纲是：

（1）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产，以及祠堂、寺庙、教堂、学校、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所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此种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种者，皆由土地委员会决定之。

（2）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

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

丙、革命军长官现时已有土地可不没收。

丁、革命军兵士之无土地者，于革命战争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

（3）耕种已没收之土地的农民，除缴纳累进的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

未没收的土地之租率，应减至与累进的田税相当的程度。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田租，不纳任何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

（4）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

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农村中各被压迫阶级所组织之乡民会议负责。

（5）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

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乡村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

（6）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

（7）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限制重利盘剥，规定最高度的利率。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刊印。

PDG

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议决）

本党第五次大会所规定的普通原则足以范围国共两党的关系。我们在此革命阶段中和国民党合作的目的是健强并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向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依然加入国民党内，因为在此时期的社会成分上说，国民党代表一个革命的同盟，此政治同盟将领导德谟克拉西的革命破坏封建制度，消除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共产党根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政纲政策的基本原则，系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领导其阶级的斗争向最终的目标——社会主义实现方面前进。工人阶级利益的实现需要革命的发展。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就是发展革命的一个条件。所以强健并造成此同盟是无产阶级的职任。

因为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是最革命的一个阶级，他就是巩固那个政治同盟并推动这个同盟遵守一个坚决的不变的革命政策向前进行。然而在此革命的阶段中，无产阶级并非占有革命全部的指导。他只是保证左派国民党，按照环境的要求进行革命。

国共两党的关系，在此阶段中，建筑在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领导权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他合作，强健左派，帮助他

领导革命，可是同时不要失掉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并为无产阶级利益而行动的政治独立的性质。无产阶级决不在牺牲阶级独立性条件之下，加入左派的国民党。无产阶级只有借用他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执行巩固国民党和推动国民党逐渐前进。

无产阶级因为要保证革命的前途，必定加入左派的国民党，共产党的策略一定要兼顾到同盟中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利益。第五次大会关于如何保证城市小资产阶级乡村企业者和无产阶级的协调，已经有了明白的规定。现时革命的发展，使本党对于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上，亦有规定明确政策的必要。

遵照第五次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提出下列的实施办法俾国共两党的关系（特别关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之可能的困难，消灭下去。

（一）劳工部下设立仲裁厅解决雇主和店员间的冲突。

（二）劳工部颁布劳动法，包括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恤金，保险，劳动条例，店员工作条例，更须注意。

（三）调和店员过分的要求，规定营业管理权，保证店员不干预营业。由总工会代表，劳工部，商民协会，店员总会组织委员会考查店员提出的条件，并按照物价比例规定合理的限制。

（四）现时对帝国主义的商业不禁止，不阻扰。

（五）除发现有反革命的活动，或有反革命的嫌疑者，商民得享有政治和公民的权利。

然而影响国共两党关系的小资产阶级之不满意，并不能因此条件之实施，而和缓起来。城市小资产阶级经济的苦痛，系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在国民政府领域内实行经济封锁的结果，至于连年军阀的战争，苛税（厘金等）的征收，也是造成小资产阶级痛苦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必须帮助小资产阶级去反抗此种压迫，除非打破经济的封锁，小资产阶级的情况并不能

改善。欲打破经济封锁，只有革命的胜利才作得到。所以在反抗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中，无产阶级同时就保障着小商人及手工业生产者的利益。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对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

夏斗寅的叛变，是表现目下反动分子假充革命党的事实依然存在。这些反动分子虽说站在革命战线里，他们却时时想利用机会反对革命破坏革命。但是革命的运动已经强大起来，消灭革命已非易事。革命的势力是建筑在大多数工农群众之上，工农已有为革命而战斗的意志，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革命的运动未曾因蒋介石的叛变而削弱，革命的势力现已立于不败的地位。故对于夏斗寅及其同类定能以必要的手段应付之。

像夏斗寅一类的反动派，以反共产为借口，实行反革命反国民政府的阴谋。他们想联合在城乡的各种中等阶级（如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的小生产者、知识分子等）于反革命旗帜之下，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又制造共产党将破坏中等阶级的谣言，以引起社会的恐慌。

处此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关于与中等阶级的关系上，有详细说明的必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如果是破坏中等阶级的，他便不用亦不能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而且使自己的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所以实际上，共产党对中等阶级的态度，以这个事实作证明，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正式决定，工农小资产阶级之革命民权的同盟，是中国国民革命将来的发展和最后的成功的唯一保证。这三种阶级长期的攻守同盟，除非在互相保障条件之下决不能形成。无产阶级决不能

一面和中等阶级互相同盟，又一面破坏这个同盟军。反动派藏在“共产党运动过火”的假招牌之下，滥造谣言。我们不用很多的申辩，就可以知道，他们实际是想破坏国民革命，分裂反帝国主义的民权的联合战线。

在宣言、决议、告民众书上，中国共产党对于中等阶级的态度，已经剀切说明。现在我们总起来叙述如下：

中国共产党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

中国共产党主张在城市减轻压迫小商人的苛税苛捐。年来军阀内争，封建式的苛捐如厘金等破坏商民的经济，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经济封锁，同时也给经济金融以很大的打击。共产党因为反抗军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于商人的利益同工农的利益一般的拥护，所以主张除反革命者外，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

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夏斗寅等类反动派的宣传，完全是谣言。帝国主义痛恨共产党，张作霖绞杀共产党，孙传芳以反共产为口实，用暴力压迫响应革命军的上海工人，蒋介石屠杀工人，捕拿共产党，李济深残杀共产党，那些杀戮共产党者之为人及其目的，是尽人皆知的。他们是反革命者，他们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现在夏斗寅也拿着“反共产救中国”之“鲜明”的政纲，举兵叛乱了。但是他实际所要求的是什么？他的要求和其他反共产的英雄的要求是一样的。他不是想救中国，他是想保障帝国主义、军阀和反动的封建势力，使革命不能达到根本铲除这些东西。

夏斗寅等类的军阀，吮吸劳苦群众的膏血，当然要痛恨共产党，恐惧共产党，要共产党的头颅，作他们“拥护”国民政

府的代价（国民政府当然认为这是一个可疑的反叛的拥护），但是民权的中等阶级决不要被他们所迷惑。封建军阀势力在国民政府治下的复兴，不但不能帮助商业的发展，反倒要蹂躏中小商人的利益。夏斗寅是想拿口头帮助中等阶级谋利益的圈套，来昏迷中等阶级的观察，使中等阶级能帮助他叛变的军事行动。

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边发生不安。夏斗寅欲利用军队中不安的情形，以达到他的反革命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小地主的政纲已明白规定，农民幼稚的行为，决非共产党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在一面消除这些不幸的幼稚情形之外，同时将其客观的原因述说一下。消灭这些客观的原因，可以挽救现状，消灭反动派的借口。

农民群众热烈的欢迎北伐军到来，希望能将他们从多年压迫奴役之下拯救出来。当中国国民党农民政纲颁布的时候，正是久经践踏的劳苦农民开始为新生命斗争的时候。他们见到农民的政纲，满腔燃烧着热望，于是自然表现出来一个革命运动。不过政纲实行的时期确实太延搁久了，农民焦急的等待着。在这个情景之下，急促不谨慎的行为，实行上恐不能免。如果国民党能照着自己的农民政纲，按部就班的实现农民的要求，那么，农民运动中这些不幸的事实，或者不致于发生。

革命答应过要给农民土地及自由，这些事件实现的愈快，社会的情况愈好。中国共产党严格遵照国民革命的进程，领导农民反对封建的剥削及宗法的压迫。乡村之中，农民和封建宗法的统治已经起了斗争，共产党的政策，如上边所说，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推翻封建宗法的专制，建立乡村民主的政权。共产党更拟于特殊情况之下，要求

政府允许小地主抽到某种规定的佃租。乡村封建宗法统治的破坏，不仅有利于农民，乡村和城市的经商阶级都能得到经济的进展。农民经济情况的改善可以促进商业。封建统治的衰灭，可以扫除商业发展上的束缚。如果小地主对于国民政府所保证的某种租率认为满意，对于革命柱石的农民运动不加反对，农民对他们一定不加妨害。

所以想防止自由发展的农民运动，不能免之幼稚现象，惟有将中国国民党所规定的农民政纲从速施行出来。这可以巩固革命的基础，使农民群众集合于国民政府的周围。至于夏斗寅等类的叛变，只要以迅速的坚决手段消灭之。

中国共产党决定向以反对共产党的过火行为、保障中等阶级利益为借口的夏斗寅正式宣战，号召工农群众随于国民政府之后削平夏斗寅的反叛！城乡中等阶级为夏斗寅等反动派所蒙蔽，他们势将违背自己的利益。中等阶级的真实利益，必从国民革命的胜利（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势力）中得到，万勿受夏逆斗寅的玩弄，在反共产口实之下反叛革命。并且应当急速起来和工农携手，共同保障革命，反对反叛的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誓竭诚与国民政府协同共进，并郑重声明维持与中等阶级的联盟，保障中等阶级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确信夏斗寅的造谣，在国民革命军和中等阶级中，决得不到轻微的影响，此次的叛变指日肃清，夏逆不久定要成擒，依反革命罪案尽法惩办。无产阶级将武装起来枕戈以待，保障革命，赞助国民政府，实施国民党的农民政纲。

打倒反动派罪魁——夏斗寅！

打倒反国民革命的一切封建军阀！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的大同盟万岁！

国民革命的领袖国民党万岁！

国民政府万岁！

中国共产党

五月十八日汉口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瞿 秋 白

中国事变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对这些事变愤恨欲死，全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每一胜利都抱着无限的欢慰。中国劳动者的斗争成为一切注意的中心，是当然的事。中国解放运动之发展的速度，真正是空前的，暴风疾雨似的，但是在最近几年来中国革命虽得到许多的胜利，而距成功之期，实在还远得很。中国革命不过才发源，它将继续发展下去。但它愈扩大和深入向前发展，则一切困难也随之而加多，这些困难能否解决，实在足以决定革命的结果。本篇将提出威胁中国革命的几个主要危险问题来讨论之：

主要危险有下列三类：（一）外部的危险；（二）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有获得革命领导权的可能的危险；（三）无产阶级对于革命领导权作用没有准备的危险。现在逐条讨论之。

先从外部的危险说起。我们革命的国际环境不能认为是好的。第一，我们须与全副武装的强有力的敌人争斗——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在这点上，俄国革命就与中国不同，在俄国没有帝国主义这样直接统治的威胁。我们斗争的结果将改变全世界的局面，我们革命一开始就震撼世界资本的根本利益。很显然的，不经过残酷的斗争，全世界的剥削者是不会放弃他们的优越特权和剥削制度的。第二，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是根本一致反对我们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条件就要好些，俄国十月革命

的爆发恰当主要的帝国主义各国正忙于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互相尽力屠杀，以致没有力量去干涉俄国的事情；这一条件对于俄国革命是有极大影响的。可是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就不同了，这就使我们有注意外部危险的必要，这一危险或者使革命在资本的铁蹄之下压迫下去，或者可以使革命运动延长时期。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因这种危险而停止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放下我们反帝国主义的武器。恰恰相反，我们的党应当在事实上证明它是反帝国主义最坚强最彻底的战士。问题的本身仅仅是我们如何去消灭对于中国革命不利的国际条件，按照什么方针来进行我们的国际政策。这些问题关系于我们革命的成功或失败。我以为对我们革命的国际政策应按照下列五种方针：

（一）我们应当应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分裂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应当煽动和加紧他们相互间的争斗而削弱他们的力量。我们不应当一下子对所有帝国主义者下总攻击，我们应当对准他们的创口处和在他们最不利的机会中向他们进攻，我们应该避免单个地方的躐等行为（例如禁止所有外人在湖南经商等），当运动还未十分发展，当革命后备军还未移动前进的时候，这种左倾幼稚行动并不能得到什么实际的结果，而只是使于我们不利的时候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公开直接的战争。

（二）在我们分裂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政策中，我们不应忘记对某一帝国主义国家临时妥协或让步，以便易于抵御别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如俄国在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中，为取得休养和组织自己力量的时期，还甚至于割地议和与德国缔结临时条约（一九一八白莱斯德和议条约[1]）。现在谁也明白了，这个让步是临时的，在这个协定中得到的最终胜利的，是革命的俄国。我们不应当犯左倾幼稚的毛病，不应当为很小的挑拨所诱惑，我们应当按照我们的策略，巩固和扩大革命的胜利，不

过讨论此问题，又免不了有许多新困难。当俄国与德国帝国主义订立协定的时候，俄国已有无产阶级独裁作保障，因此这协定不是向外国资本的投降。我们没有这种保障，因此我们应当十分注意使与外国的协定不超过了革命的要求之外，同时，更毫不客气的和一切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倾向奋斗。

（三）我们应当尽量的使我们的对外政策与苏联的对外政策相联系，在国际问题中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应当是统一的。现在我们仅仅重述孙中山联俄的遗嘱已经不够了，我们现在已占有国家的地位，现在已有好几省在左派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之下，我们应当用国家的实际政策，实现孙中山遗嘱到事实上去。这样就可更加巩固革命的阵地。

（四）我们应更加坚决的继续加紧我们的反对封建制度及军阀的争斗，这样即是动摇和消灭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如果我们以为帝国主义仅是外面的敌人，那就非常错误了，其实外国资本在我们内地有它的地位，如果军阀是外国军事势力扩大的向导者，则其余各种封建的地主、土豪、乡绅、重利盘剥者、买办阶级等，便是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扩张的向导者。外国资本剥削我们的系统，是建筑在这些反动成分的基础上面，所以破坏这个剥削系统，捣毁这部剥削的机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激进的解决土地问题，继续北伐战争，消灭一切新旧军阀，就是给帝国主义阵地以严重的打击，就是破坏它在中国之政治经济的统治。

（五）我们应该与国际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更亲密的结合，我们这种工作应当隔离第二国际，因为它是帝国主义者剥削制度的走狗。我们应使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劳苦群众正确的了解我们斗争的情形，使他们用最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共同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

这是我对于第一个问题的意见。

现在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有取得领导权的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并不亚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革命的国际环境之困难），这是毫无疑义的。如果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则将保证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过程中的一切任务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同时，更保证这一革命能直接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假使资产阶级抓住领导权，则完全不同了，资产阶级所趋向的胜利，不是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而仅是改变这一统治的形式。我们试一看过去各种情形，就可看出中国革命直到现在还表现有两种趋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为领导权而斗争之趋向。不过就阶级的意识看来，在革命开始发展的时候，其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性质，资产阶级不免的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因为民族革命很快的发展，同时使国内的劳动群众很快的组织起来，这样广大的空前的群众运动的发展，造成无产阶级在竞争中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我们的革命一直到现在就在这种互辩的矛盾中间发展，一直到现在这两个趋向（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是共同存在着。现在因为革命势力占据了扬子江流域，占据了主要的经济区域，收回来汉口、九江等地的租界，无产阶级暴动占领了上海，激进的解决土地问题，消灭封建余孽，群众运动继续发展，结果必定动摇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这两个趋向已达到不可并存的程度，已达到某一个必须消灭别一个的时候了。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当中，已完全表现出酝酿已久的破绽，就是革命或者坚决的依靠群众与帝国主义斗争，或者从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少许的让步而即与之妥协，并掉转头来限制、束缚以至于消灭群众运动。资产阶级的阶级性使它一方面参加民族革命，同时又选择第二条道路走。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是好玩的参加革命，所以它们必选择第一个道路。民族革命之统一战线急剧的分裂了。这两个趋向首先是隐潜的准备的形

式，到了现在这两个旧同盟军开始了公开的斗争。

资产阶级的变节，脱离革命的战线，我们不能认为（有些同志都认为是这样）已把两个趋向竞争问题解决了，已经没有资产阶级争得革命领导权的危险了。但事实决不是这样简单，资产阶级（这里讲的当然不是那部分纯粹外资走狗的买办阶级，而是那部分曾经握武器打过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现在虽然脱离革命，但是还不是急转直下的完全变成反革命，而加入帝国主义的营垒中去，在某一定期间内，它还表面上保存自己独立的力量；虽然它是逐渐的走进买办封建军阀的公开结合中去，但它决不一下就放弃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尝试和按照自己目的去解决革命问题的企图。在最近的时期，我们国内显然分成三个营垒：第一个营垒——公开的反动的营垒；第二营垒——革命的营垒，建筑在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之上的；第三营垒——民族改良主义的营垒，这是中间的营垒，它是渐渐地要并入反革命的营垒公开的反革命的。这最后一营垒对于革命的危险决不下于第一个营垒，这个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危险，不在它公开的反革命，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它还挂出假革命的招牌。

因此，如果谁以为资产阶级现在已脱离了政治舞台，那是非常之不正确的，资产阶级还正在争取领导权，它还正在寻觅和选择社会各阶级中自己的同盟者，上海与广东的状况便是最好的榜样，那里改良派的资产阶级利用改良派的工人、民团、手工业者、军队来反对革命的力量，分离一部分工人反对别一部分工人，利用一些农民反对别一些农民，利用民族主义来愚弄和蒙蔽人民的思想与觉悟，特别是利用之以争取小资产阶级群众。谁胜的问题——民族改良主义或是真正革命的营垒，带法西斯蒂形式的资产阶级的趋向胜利或是无产阶级的趋向胜利，是还没有解决的。领导权的斗争是继续着，资产阶级有夺

取领导权的危险依旧存在。在这个领导权斗争的新环境之中，我们应执行下列的任务：

（一）最主要的任务——隔绝改良派的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影响，同时用全力巩固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实在可以这样肯定的说："谁获得小资产阶级谁就胜利。"如果我们抓不住他们，则革命的发展将延迟下去。但我们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方法不但是防止店员学徒干涉营业内部的事和禁止无故捕人等等无政府行动，并且应当提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实际政纲，例如裁减苛税杂捐，组织商品出卖所，组织廉价收买原料与生产消费品、小手工业者的协作社，组织雇佣、借贷机关……等等。工商业委员会应当很机警的应付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们以为吸引城市小资产阶级到革命联合战线中来是可能的事，但那部分上层的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中产阶级，并且与封建制度对农民剥削有密切关系的当然除外。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并不须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交换的代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改善的要求，并未加以不可调和的障碍。

（二）我们应当尽力分裂新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营垒，这一任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一、这个营垒就阶级观点看来，并非由一个阶级属性的成分所构成的，如果李济深是依靠在广东的地主阶级上面，而白崇禧与上海买办阶级勾结，蒋介石则打算找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做靠山。二、这个联合中不仅有地主、资产阶级流氓的成分，同时还有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例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一部分被改良主义所麻醉的不觉悟的工人及一部分军队。我们应当用我们的联合去抵抗这个联合，我们应将这联合中与我们接近的社会成分牵引出来走向我们的营垒，并使那些难与我们接近并走到我们方面来的军队守中立。

（三）我们不应当让民族改良主义统治下的省份之反动政权趋于稳定，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去扰乱它的后防，我们应当揭穿它改良主义假革命的面具，应当扩大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煽起农民运动，我们应当准备力量，不仅由外部并且由内部去消灭这个民族革命背叛者的政权。

（四）在国民政府下的省份，我们应当更扩大深入的去发展群众运动，由原始的变到自觉的政治运动，共产党应当在政治上巩固和加紧去指导群众运动，我们应当更勇敢的去解决土地问题，建设民权主义的政权。我们应当达到武装工农，以保障革命的胜利，聚集我们的力量实行社会的改造，反对民族改良主义与军阀。

（五）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这个问题虽在最后，但其意义可不是最后的）。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以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分继续由真正忠于革命的成分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

这是我对于第二个问题的意见。

现在来看第三种危险，这里所要讲的是中国无产阶级。拿中国无产阶级在大的政治经济中心的数量与集中看来，它足以实现革命领导权作用。但主观的力量如何呢？它的革命意志是否充分发达？在某种政治影响之下它是否不坚强而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西欧的工人运动给我们不少的经验，虽然客观上革命的情绪很充足，但因为工人阶级主观力量的缺乏准备，以致革命未能胜利。这个问题在中国现在是不可轻视的，这问题已不仅是在理论上成为有兴趣的问题了。我们要知道中国工人

阶级内部可以发生那些危险，然后才可以与这些危险斗争。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机会主义有四种形式，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争取无产阶级之思想与政策。这四种东西就是改良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孟塞维克主义。中国工人运动中有没有发展这些政治趋向的基础呢？试分别言之：改良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产物，那里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额外利润的一部收买少数上层工人，有时更及于很大的一部分工人；如果中国不变成帝国主义的国家，则中国便没有这种改良主义的基础，这种危险可以说没有的。但从别方面看：一、在中国本地有得很高工资的工人；二、这部分工人使改良主义、黄色职工国际与第二国际在中国找到他们帮手的机会。因此，我们可以得个结论说，如果中国工会发生改良主义的趋向，则是由于受国外改良派的影响。然而外来的改良主义或者可以抓取一小部分工人，但广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危险不十分可怕。再看第二种——工团主义的危险，这一主义是发生在工人阶级经济组织比政治组织发展较早的地方，并且因政党的时常变节，使无产阶级对它失掉信仰，以致认为政治斗争是无用的。中国的环境很有些像俄国，经济组织是由政治的组织产生的，我们党指导自己所产生的组织不致发生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错误观念，因为中国在外国资本的统治之下，所以无产阶级一发生经济斗争时便不能不联贯到政治斗争，也如同在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不能不转变到反对俄皇的斗争一样。这种工团主义的危险在中国比较更少可怕的成分，除非共产党政策犯了极大的错误或者反动派得着胜利，才能够使工团主义得到发展。但是即使反动派得着胜利，他们很长期的压迫工人的政治积极性，也是不可能的。第三种危险——无政府主义，在无产阶级本身大家都知道是没有这种思想的基础的，它的基础是游民无产阶级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

成分，但因为无产阶级与这些社会成分有关系和受他们思想上的影响，所以在无产阶级中也有发生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可能。若从这个观点看来，则不能认为中国的情形是好的，因为中国有广大的游民无产阶级群众，有好几百万的小手工者，中国无产阶级与这些成分及破产农民有很长期的关系。假如中国没有帝国主义者这样强力的统治与反对这种统治的各种政治运动，则中国工人中或真不免有受无政府主义熏染的可能。帝国主义在这方面又促进了它的敌人的团结，因为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但无产阶级本身须有最大强度的组织性，并且须组织全民族中被压迫与破产的各成分，使能共同拥护无产阶级作战的方针。

以上是分析敌视我们的三种机会主义。至于第四种孟塞维克主义则较复杂。孟塞维克主义在俄国曾得到过完全特殊的发展，孟塞维克派不明白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之间的区别，不明白无产阶级之奋起，成为革命主要动力，有使革命性质变化的可能。这些思想客观上是表示资产阶级要实行它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的尝试。在这方面，当然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中国情形很有许多与俄国相像的地方，孟塞维克在中国有发展的基础，当然是毫无疑义的。虽然因为苏联存在的事实，胜利的布尔塞维克主义经验的指示，对于这种危险成分可以减少，但这种危险总是存在着的，并且在中国工人运动的某一时期中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最近几年来把自己总是看作“在野党”的趋向，不求参加革命政府的趋向，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倾向，以致逐渐的消失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并且迟钝了它的斗争，这都不是偶然的现象。否认这些错误是不赦的罪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的所以有布尔塞维克化的伟大意义，就是在于它用无产阶级的光明态度指出过去的错误，中国工人阶级斗争最痛苦的结核，当以孟塞维克的染毒为最。

因此，我们必须用在俄国战胜孟塞维克的思想——列宁主义的思想，注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的先锋，以预防孟塞维克的毒素。在列宁的旗帜之下我们取得胜利！

五月二十日于武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即布列斯特和约。

PDG

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湖北省委拟，
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一、武装纠察队指挥问题

A. 大队调动——如总工会调动须得卫戍司令部同意，如卫戍司令调动须得总工会同意。（理由）因武装纠查一方面为军队性，一方面是工会的纠查，故调遣时，须得双方同意。

B. 保卫工会之小队调遣——如守卫等事总工会应有调派之权，事事须得卫戍司令允许，双方都感繁困。

C. 无枪纠查完全归总工会指挥。

二、停 工 问 题

A. 政治停工必须得总工会命令，总工会应极慎重，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决不下停工令。

B. 五一节全国及鄂省总工会代表大会开幕日应全体停工一天。

C. 各产业工会成立改选等代表大会开会日，该产业工会停工一天。

D. 商店停市，非得政府命令不得行之。

E. 店员分会开成立或改选会停工半天。

三、司　法　权

A. 工会无政府命令不得拘捕非工人。

B. 工会得拘捕工贼及反革命条例之工人。

C. 对于工贼及违反革命纪律，工人有审判权，但不得审判非工人，如因误会而拘捕非工人，应立即送往政府相当机关。

D. 对于工贼及违反革命纪律者，在未审判前及审判后，判定不到一星期拘留之罪，有拘留权，一星期以上之徒刑，即须交政府适当机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议决）

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土地、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

这些纠纷已引起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解决此目前严重的问题之态度是：（一）城市中工运问题，应该迅速执行已决定的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决议案及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而解决。（二）乡村中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动，立须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已没收之军人产业一概发还（其曾愿捐助者得不在此例）。（三）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根本放弃第五次大会所决定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1）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2）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

固然湖南农民运动之发展有些地方，其势非事实上进向没收大地主之土地不可，这种趋势，是一部分劳苦贫农要求所必然发生的，而且局部的在各省实行是可能的，可是必须在两个条件之下：（一）能使革命军官中立，（二）能与左派群众及领

袖共同行动。固然如此，但是现时农民革命运动之主要点，还是巩固革命已得之胜利，即是建立乡村政权（乡民会议直至县政权），以政府形式继续深入农民反土豪劣绅之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反动的军阀分子已开始向工农运动实行公开进攻。在长沙和湖南全省对工人纠察队实行缴械、逮捕和枪毙，并且解散工会和农会，这表明了当前军事和政治形势的严重性。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准备进行推翻反动分子的斗争——这是我们党的迫切任务。

五月二十一日的长沙事变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的政变十分相似。这两次事件的不同之点是，广州政变虽然是由一个有全国影响的人物指挥的，其规模却没有像长沙事变这样大。从三月二十日以后所犯错误中取得的教训，将帮助我们党找到正确的策略。正如在三月二十日之后一样，今天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立即推翻敌人或者我们彻底投降，这里有一条中间道路，必须找出这条中间道路。在各种军事力量的当前这种相互关系下，冒立即同敌人发生武装冲突之险，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不可取的。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时间，保存自己的力量，为不可避免的战斗作准备。

党必须同左派国民党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必须向左派领导人说明局势的危险性。必须使他们相信，这次进攻不仅是针对工人和农民，而且是针对一切革命分子。如果不打垮反动封建军阀分子的政权，连国民党本身的存在也将处于危急之中。

当前的形势将迫使国民党内部发生阶级分化。共产党必须加速这一过程，并且把小资产阶级左派争取过来。保护和加强左派国民党，是革命发展的条件。能够而且必须用“保卫革命的国民政府”的口号去准备反对军阀反动势力的公开武装斗争。在左派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旗帜下，可以把最广大的民主群众动员起来，去进行反对军阀反动势力的政权的斗争。

必须千方百计地保卫党的合法地位。我们的同志将不退出政府。

鉴于这些考虑，政治局决定：

(1) 接受唐生智在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的电报中所提出的纲领，即：一、支持国民政府；二、联合苏联；三、支持工会和农会；四、把被收缴的武器归还给工人和农民的纠察队；五、反对蒋介石和张作霖；六、继续进行第二次北伐。

(2) 在上述条件下承认湖南的省政府。

(3) 同左派国民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同汪精卫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便结成一个联盟去反对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党内的军阀反动势力。

(4) 争取左派国民党，支持如下的要求，即：有进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自由；把被收缴的武器归还给工人和农民的纠察队。

(5) 保卫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利用以这种策略手段争取到的时间，来为同国民政府势力范围的军阀反动势力的不可避免的战斗做准备。做到这一点的基本条件，就是彻底改变把革命的未来的宝压在所谓的“左派军阀”身上的老政策。当前的局势就是这一错误政策造成的，这种政策必须废除。在充分利用各个“左派军阀”领袖之间的矛盾的同时，革命必须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把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并且把士兵争取到革命方面来——这是党在以上述策

略手段所争取到的时间内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政治局决定：

（1）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

（2）把工人和农民组织所拥有的武器隐藏起来。

（3）弄到大量的武器，并且把它们分发到各战略地点。

（4）用派我们自己人参军的办法来扩大叶挺和陈嘉佑（Chen Cha－Yo）领导的部队，在六个月之内把他们的几个师扩大为几个军。

（5）利用第二军、第六军同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之间的矛盾。用派遣大量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进去的办法，把第二和第六军掌握到我们手中。

（6）为收复广东进行鼓动。一俟占领郑州，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必须转过头去收复南方，此点不容忽视。

政治局还决定派一位政治局委员去湖南重新组织党在该省的活动。

将本决议立即通知鲍罗廷和谭平山同志，让他们按此路线行事。未经政治局批准，他们不得执行在原则上不同于本决议的路线。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

（一九二七年五月）

任　弼　时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于五月十六日在武汉闭幕了。这次大会所讨论的重要问题，都是根据去年十一月共产国际和少年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及中国共产党今年五月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而决定的。

当大会开幕的时候，正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断然脱离民族革命联合战线，屠杀工农领袖和共产主义者，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武装干涉，经济封锁武汉，军阀向革命民众示威，绞死李守常[1]等二十人的时期。换言之，就是帝国主义、军阀、反动资产阶级联合向革命民众进攻的时期。

虽然大会的四周充满了反动的空气，会议时，每天得到各地电信，报告我们最勇敢忠实的同志被新旧军阀张作霖、张宗昌、蒋介石、李济深枪毙、腰斩、火烧的消息，但是这不独没有引起大会的恐慌心理，反而使各地代表在悲愤之后更加团集精神，解决各种重要议程。所以这次大会第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表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这最严重时期，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估计过去革命的经验，按照现在革命的要求，规定今后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一六三、一六四期合刊。

斗争方针，为的是要继续完成已死同志未竟的事业，以答复新旧军阀的白色恐怖和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

当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它还是一个组织很小，影响极微，带了很浓厚的学生色彩的青年团体。在这两年来的斗争中，虽然受了不少的损失（被新旧军阀与帝国主义杀戮的同志总数在五百人以上，被囚禁者二百余人），然而它的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接近了广大工人的青年群众，已经走向渐次变成无产阶级青年群众革命组织的道路。但是过去因为资产阶级混在革命的联合战线以内，和没有明确的革命前途，因此一切工作都受许多客观的牵制，并且免不了有许多的错误。这次大会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应争得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达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指出团的任务是应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实现其民主独裁的政权，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领导工农青年在工会、农协之内去做改良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因此这次大会的第二个重要意义，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确定了中国革命的远景和团的工作新方针。这必定更能提高劳动民众为远大目的而积极奋斗的精神，促进国际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援助中国革命的努力。

“五四”以后，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者是知识阶级的青年学生，斗争的目标是思想上的革新和反对日本的压迫。当时劳动青年群众几乎完全没有参加这一运动。一直到“五卅”的前夜，都是如此。因此青年运动并没有深入群众。“五卅”以后，青年工人随着工人阶级而跃入中国革命运动的舞台。因为轻工业为中国产业的中心，所以占轻工业工人主要成分的青年工人变成了中国革命运动中极重要的动力。此时中国青年的领导渐

次转移到劳动青年的身上。自北伐胜利以后，中国南部农民运动有了惊人的发展，而思想天真的农村青年更变成农民运动的中坚。因此中国青年运动有了更广大的下层基础，并且这一运动的领导，完全由知识阶级的青年学生转交于中国的劳动青年群众了。所以这次大会指出，今后中国学生群众在革命运动中已不能有以前同样的作用，但是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仍是具有参加工农运动，到工农群众中服务，以谋革命完成及学生自身解放之伟大使命。因此这次大会的第三个重要意义，就是指明中国青年运动趋势，并且更加确定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应当消除团内知识阶级的习性，而完全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青年的群众组织，努力在工农群众中去扩大自己的队伍与影响，由此而加重中国劳动青年和其先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中的责任与使命。

过去青年运动因为中国革命突飞的发展，多偏重于一般政治上的活动与斗争，很少注意到青年本身生活和利益的改善。这是中国青年运动虽然有了很好的下层基础而未能使其深入的根本原因。近年以来，因为战争和天灾的影响，大小工业与农村经济均成破产之象，生活程度较几年前高涨数倍以上。工人不独工资与工时状况毫无改善，而且常有失业的恐慌。农民不独缺少耕地，并且不能安居乐业，日受军阀、官僚、土豪、劣绅、高利贷者的剥削与压迫，常有被迫而流为兵匪。学生因家庭经济之破产，政府教育经费提作军用，校舍变为兵房，而致求学无门，有些流为失学游民。手工业因与帝国主义工厂生产竞争以图生存，对于手工业工人遭受的压迫，更是无以复加。这些行业中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和学徒的生活更是不堪言状了，他们几乎牛马犹不如，常为军阀炮火的肉塞和帝国主义榨压血汗的源泉。若是他们得不到生活上的改善，便不能使他们为革命有更多的努力与牺牲并保障革命已得的胜利，甚至将趋于消极。

因此这次大会特别指出领导青年为其本身利益而争斗的重要意义，反对任何阶级调和和妥协的理论，尤其是要注意青年工人、学徒的经济斗争。这是这次大会的第四个重要意义和精神。

总括起来，当中国资产阶级脱离革命联合战线，联络一切反动势力而来与无产阶级以武力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严重时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自然就可以看出这次大会意义的重要。而这次大会确能根据它七年以来斗争经验，决定了中国青年运动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我们并且可以相信，大会的决议是非常正确而适合中国青年群众的客观要求与需要。在过去很短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旅程中，已大半为青年无产阶级死战的尸骸和血迹所铺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之新的决议案和作战计划，将成为全国青年群众争自由、杀敌人之新的标志。每一热血的青年战士，都应齐向此标志奋勇前进。

我们不独希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接受大会的决议而努力按照去执行，并且希望能得到广大青年群众对于大会决议的拥护，努力站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旗帜之下，使中国青年运动更加发展和深入。如此，中国青年乃真不愧为中国革命的少年先锋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注　释

〔1〕即李大钊。

PDG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　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党员一人之介绍，经过支部干事会之审查，支部会议之通过，市委员会或县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正式党员或候补党员。

第三条　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兵士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智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之候补期三个月，但市委员会或县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

第四条　候补党员参加支部会议时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遇必要时得由市或县委员会决定允许其参加市或县党员大会，但无表决权。

第五条　凡经中央委员会或省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市或县委员会，非劳动者亦须经过候补期。

第六条　凡党员移转国外，须得中央之同意及第三国际之介绍，始得为所在国共产党党员。

第七条　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

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

第八条 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凡年龄在二十岁以内而愿入党者，必须经过青年团，但青年军人不在此例。

第九条 凡党员由一地党部转到另一地党部，须在该地党部登记成为该地党员。凡党员在省内移转须得省委员会同意，省外的移转须得中央的同意，但遇有特别情形（如在秘密工作情形之下）得酌量通融。

第十条 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所在地之市或县委员会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反时由市或县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第十一条 凡开除党员须经隶属之支部大会及省监察委员会决议及得省委员会之批准方能生效，并将其开除的理由刊布在党的刊物，在省委未批准以前得停止其一切权利及工作。

第二章 党的建设

第十二条 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第十三条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

党部之执行机关概以党员大会或其代表大会选举，上级机关批准为原则，但特殊情形之下，上级机关得指定之。

第十四条 地方党部对于地方部分的问题有自行解决的权利。

第十五条 各级党部最高的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及代表大会。

第十六条 全体党员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委员会。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为该级党部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并

指导党务及政策。

第十七条 党的组织系统为：

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

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

市或县——市或县代表大会——市或县委员会

区——区代表大会——区委员会

生产单位——支部党员全体大会——支部干事会

第十八条 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的报告及提议，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有所命令及指导，均须按照党的系统手续。

第十九条 为党的各种专门工作各级党部得设立各部管理之（如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等）。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均隶属于各级党部。各级党部之下的各部组织制度均须得中央之命令或同意。

第二十条 区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区委员会之批准与市或县委员会的追认，市或县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市或县委员会之批准，省委员会之下的党部须得省委员会之批准，省委员会之组织须得中央委员会的批准。

各级党部之执行机关（自省委至支分部干事会或书记）之选定及撤换须得上级机关之批准。

第三章 党的中央机关

第二十一条 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一次；中央认为必要时或有三分之一党员及三分之一省的党部之请求得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中央已经决定或三分之一的党员及三分之一省的党部请求之临时代表大会，中央须在两个月内实现之。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之召集与大会之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须在大会前一个半月公布；

全国代表大会须有代表全体党员之过半数方为合法，代表人数百分率由中央委员会规定之。

第二十二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工作为：

1. 讨论与批准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报告。

2. 审察与修改党纲及党章。

3. 决定一切重要问题政策的方针。

4. 改选中央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及其他等等。

第二十三条 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由大会规定，遇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监察委员离职时由候补委员按次递补。

第二十四条 中央委员会得代表党与其他政党及机关发生关系，得组织党的各种机关并指导其行动，得指导与监督中央机关报并指定党的中央机关报的主任，得分配党的人才及支配党的经费。

第二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经过党团指示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

第二十六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须每三个月召集一次，遇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中央委员会议或扩大中央委员会议。候补中央委员得参加中央委员会议及扩大中央委员会议，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但中央委员缺席时，候补委员临时依次递补，则取得表决权。

第二十七条 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并选正式中央执行委员若干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时，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正式政治局委员离职时候补政治局委员依次递补。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得改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

务委员会（Secretariat）处理党的日常事务。

第二十八条　中央委员会至少每两月须给省委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书面的报告。

第四章　省 的 组 织

第二十九条　各省有两个市或县委员会以上，中央委员会认为有组织省委员会之必要时，即派员到该省召集省代表大会，由该代表大会选举省委员会（简称省委）。

第三十条　省委员会正式委员人数及候补委员人数由省代表大会决定，但须得中央委员会之同意。如正式委员缺席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三十一条　省之范围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三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市委员会暂代省委员会之职权。

第三十三条　凡不能成立省委员会之党部，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其附属于邻近之省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中央委员会。

第三十四条　省委员会可推举省委员若干人组织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

第三十五条　省委员会得指导省委之下各种机关，得指导与监督省委机关报及指定省委机关报主任，得分配工作人才，得分配省委经费，得经过党团指导省政府及其他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

第三十六条　省委员会每六个月召集一次省代表大会报告省委员会工作，及改选省委员会。

第三十七条　省委员会每月须向中央委员会作省委员会及县或市委员会工作书面的报告。

第五章 市及县的组织

第三十八条 各市或县有两个区委员会以上或有五个支部以上，经省委员会之认可，并派员至该市或县召集市或县代表大会，由该代表大会选举市或县委员会（简称市委或县委）。

第三十九条 市或县委员会均隶属于省委员会。

第四十条 省委员会所在之市，该市不另组织市委员会，该市之区委员会，直接隶属于省委员会。

第四十一条 市或县委员会正式委员人数及候补委员人数由市或县代表大会决定，但须得省委员会之同意；正式委员缺席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四十二条 凡不能成立市或县委员会之地，该市或县之党部则由省委员会决定隶属于邻近之市或县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省委员会。

第四十三条 市或县委员会可互推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常务会议，处决临时事务。

第四十四条 市及县委员会得指导市或县执行委员会下之各种机关，得指导与监督市或县机关报，得指定市或县委员会机关报主任，得经过党团指示市或县政府及社会团体之工作方针，得分配工作人才及支配市或县委员会的经费。

第四十五条 市及县委员会每三个月召集市或县代表大会或全体党员大会一次，报告市或县委员会工作及改选市或县委员会。

第四十六条 市或县的划分，由省执行委员会决定之。

第六章　区 的 组 织

第四十七条　凡在一区内有两个支部以上，市或县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派员赴该区召集党员大会，由该大会选举区委员会（简称区委）。

第四十八条　区委员会人数，由党员大会决定之，但须经市或县委员会之同意。

第四十九条　凡不能成立区委员会区域内之支部，由区委员会或市或县委员会，决定其附属邻近之区委员会，或直接隶属于市或县委员会。

第五十条　区的划分，由市或县委员会决定之。

第五十一条　区委员会每三个月改选一次。

第七章　党 的 支 部

第五十二条　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农村、各兵营、各学校、各街道及其各机关内或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支部，但须得区或市或县委员会之批准。

第五十三条　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支部的任务是：

（一）积极在各该工厂等之内活动，领导该处群众之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影响；

（二）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于群众中；

（三）吸收新的党员；

（四）服从地方党部从事组织与宣传的工作；

（五）积极参加地方政治经济的斗争；

PDG

（六）尽可能讨论党的重要问题。

第五十四条　每个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公推三人组织支部干事会，隶属于区委员会，无区委员会之地，则直接隶属于县或市委员会。

第五十五条　在多量党员产业生产部门中，可组织支分部，支分部亦可组织干事会，不能组织支分部之党员多的支部，得组织小组，支分部之下亦得组织小组，小组公推小组组长一人，直隶属于支部干事会，或支分部干事会。

第五十六条　党员不满三人之处，则设一通讯员，属于最近之区委员会，或市县委员会。

第五十七条　支部干事会，每两星期中，至少召集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报告支部干事会的工作，及讨论支部所在之机关或区域内的一切实际政治及经济争斗的问题。

第五十八条　支部干事会每三个月改选一次。

第五十九条　军队中支部，直归军事部管理，关于政治宣传及教育训练工作，则由宣传部及组织部经过军事部执行之。

第六十条　支部书记之撤换，须经过支部全体党员大会之通过及得区或县市委员会之同意。

第八章　监察委员会

第六十一条　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

第六十二条　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

第六十三条　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

各种会议。

第六十四条　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同时，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

第九章　纪　　律

第六十五条　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但对于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决定以前，得完全自由讨论之。

第六十六条　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及其他破坏党的行为，即认为违背党的共同意志而处罚之。处罚之方式如下：

A. 对于整个的党部则加以警告，改组或举行总的重新登记（解散组织）。

B. 对党员个人，则加以警告，在党内公开的警告，临时取消其党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及其他的工作。留党察看，及开除党籍。

第六十七条　党的一切决议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党员及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决议不同意时，得各该党部过半数党员的同意，得对于上级机关提出抗议，但在抗议时期内，未解决以前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六十八条　党员不经党的许可，不得加入一切政治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党的许可，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六十九条　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

第七十条　对于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须经党的委员会、党员大会或监察委员会，依合法手续审查之。

第十章　党　　团

第七十一条　在所有一切非党群众会议及执行的机关（国民党、国民政府、工会、农民协会等等）中，有党员三人以上，均须组织党团。党团的目的，是在各方面加紧党的影响，而实行党的政策于非党的群众中。

第七十二条　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中，讨论与某个党团有关系之问题时，该党团得派代表参加讨论，但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第七十三条　为实行党团的日常工作，当指定党团干事会或党团书记处理党团的日常事务。

第七十四条　各级党团均隶属各级党的委员会，党团对于党已有决议之各种问题，应严守与正确执行之。党的委员会得添派或撤回党团的分子，但须向党团说明其理由。

第七十五条　党团对于其本身之日常问题得自由解决之，党团与党的委员会有不同意见时，党的委员会应召集党团全体会议重新讨论之，并决定最后的办法，在党团方面对于最后之决定须敏捷执行之。

第七十六条　在党团所在之机关或组织中的重要位置的候补人选，党团须与所隶属之党部机关共同商定之。对于工作位置的调换，亦须用上列方法。

第七十七条　党团所讨论之事项，有关于含有政治性的问题时，党部机关须派代表参加。

第七十八条　在非党群众及组织中，遇有解决重要问题时，党团须在党团会议或党团干事会中事先讨论与决定。

第七十九条　在非党组织中，对于每一个问题的决定，当在该非党的组织会议中付表决时，在该会议中之全体党员（即党团分子）如有违反党的决议，则按党的纪律处罚。

第十一章　经　费

第八十条　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列各项：

（一）党费　党员每月收入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二角。凡无收入及月薪不满二十元者，得由市或县委斟酌情形核定减免之。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八十元者，缴百分之三；八十元以外者特别征收之；失业工人及在狱或在 C. Y. 的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义务捐，由各地党的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

（三）党外协助。

第八十一条　军队中党员党费，由所在地军部征收，转交党部会计科。

第八十二条　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委员会支配之。

第十二章　与青年团的关系

第八十三条　青年团中央应派代表出席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各级团部亦应派代表参加各级党部机关之常务委员会议，此等团部之出席代表应有表决权。

第八十四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应派中央委员任青年团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各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应为当地党的委员会委员。

第八十五条 各级党部机关应派代表出席各级团部机关之会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

——农运策略

（一九二七年六月初）

各省省委员会及各级农民协会党团：

兹将政治局（六月一日）第□次会议通过之农民运动策略大纲通告如下，务必迅速令农民部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

国民政府下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

一、最近的时期中，贫农与地主间发生空前的急剧的冲突，革命的农民运动突然的飞展。因此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问题，也便爆发了，这是革命的当然的现象，并非所谓“过火”，但是，更加剧烈的冲突之继续发展，则对于全国革命的形势与暂时的联合战线的关系，实在含着很大的危险。本党应当预察这种危险而给农民运动以正确的指导。

二、现时国民革命军的军官，还是革命军队中的重要核心。但是，同时他们皆是地主阶级出身，大多数自己是小地主。贫农力争改革土地制度的斗争，打击了军官的利益，因此，军官的政治态度便要改变。如今还没有靠得住的军官，也没有阶级觉悟的军队。如果现时在军队中的军官，完全离开革命，那就足以使整个革命运动发生很大的崩裂，甚至于破灭。

三、各级党部应当迅速执行第五次大会的农民政纲——就是不没收军官家属的土地同财产。这种策略现时非常的必要。但是并不是说：这种策略便可以完全在政治上取得地主同情的军官，使与工农结合永远的同盟——一切私有地产者的阶级关系，是很确定的。这样的策略，仅只是延宕与革命军官剧烈冲突的时间，求得整顿工农运动的组织力量之可能。我们运用这种策略，可以得到充足的时间，来组织革命的工农群众的武装，而且我们的影响，应该深入军队之中，一方面是逐渐改良军官的成分，另一方面是提高军队的阶级觉悟，使反革命者难于利用兵士来做反工农的工具。

四、现在应当特别注意小地主之间甚至自耕农及半自耕农之间，虽可寻出界限，然而他们的经济，都建筑在私有制度之上。所以不正确的政策，真可以使自耕农的群众，都落于地主阶级的政治影响之下（如平均田地甚至于平均佃权，以及均分财产，强迫捣毁祖宗牌，没收兵士邮寄回家之款等，都是不正当的政策）。

均分田地的口号，现在尚不能提出（至于均分财产，则根本上不应当宣传）。均分田地，非先给土地国有不可。各级党部应当对于农民协会的指导者，详细解释均分田地口号之危险。这一口号可趋使小地主甚至于富裕的佃农，都站到地主方面去。

五、农民协会的基础，应当从无地的农民移转到大多数的佃农自耕农。同时对于无地农民的迫切要求，应当有具体暂时解决的办法。至于根本政策如屯垦荒地，亦应当急速公布。“无田地者应当得到田地”这一口号是应当提出的，同时，要对于无地的农民解释：以国家财力实行屯垦政策来解决无地贫农的问题，以及实行均分田地，都要革命完成之后，方能实现。无地的贫农，实在是革命的先锋，现时他们应当加入革命的武装势力以至于直接到革命军队之中去。

六、关于土地的斗争，应当有极明显的政纲——就是没收

大地主。不论国民政府的态度怎样，没收大地主的田地是要实行的。这一要求的实现，不能单靠国民政府的命令，还要农民自己的力量。但是，为着策略上的原因，对于大地主田地之没收，应当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然后才能实行。没收大地主田地是农民运动现时的职任，要在最近秋收期间开始执行。

最近几月以来，革命的农民运动之发展过程里，发现许多无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普通的罚款，禁止米出境……往往殃及小地主。此等无组织的行动，自然要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着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实行反对革命的行动。甚至于农民协会之内也发生纷扰，一部分私有田地的农民自己与农民协会相冲突。有些地方还实行禁烟禁酒等的“道德运动”，于是亦用强迫手段，如铲除烟叶等的办法。至于一般“平产”式的没收财物，罚款式的写捐，更使农民自己相斗，使小商人亦起反感，至于怠工罢业，因而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地主豪绅之金融经济的封锁政策反而容易领导小资产阶级，同向农民协会攻击——因为农村之中的经济日益停滞，以至于牵及国民政府领域内之一般经济商业生活。这种无组织的斗争方法，都带着中国原始的贫民暴动之性质，一概都要努力避免而予以正确的指导。

七、然而那些无组织的行动，客观上是革命初起时之风暴时期的必然现象。这些现象，表现土豪劣绅威权与政治力量堕落而动摇。实际上正需要直接建立农民政权，由风暴时期进于巩固革命胜利——农民政权的时期。国民政府对于乡村自治的政策，过于迟缓的实行，而对于肃清土豪乡绅的封建政权至今没有决心。因此我们的党应当执行下列的职任：

须以农民群众为首干，联合农村中一般被压迫的人民，彻底的推翻豪绅的封建政权之势力，而建立乡村自治，进行没收

反革命及大地主的田地，满足贫农目前的要求，并使农民在各地的斗争，与国民政府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总斗争相联结，替国民政府建筑更深的社会基础。总之现在主要的职任是以农民为领导建立乡村自治的革命的农民政权，用一切可能的适当的方法，以政府的形式继续反土豪乡绅大地主之斗争。

这种新的农民运动之策略，其意义是：注重农民政权的斗争，这是实行土地革命所最必要的，并使国民革命军之军官与中小地主中立；亦就是要推动左派国民党，使他们和我们共同赞助农民自己进行没收大地主田地的初步土地革命。

这种策略，并非降低农民运动的，而是对于农民运动，更加加以觉悟的无产阶级正确指导，引导农民作更进一步巩固革命胜利之斗争。

八、所以目前农民运动的根本任务及我们党指导农民运动的任务如下：

（1）农民协会，不但要团结无地的农民，而且要凡是不剥削别人的各级农民都要团结，以建立革命的联盟。而且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学教师等，都应在联盟之内。

（2）按照着农政部所颁布的条例，以及本党所决定的方针，进行乡村自治的运动，组织革命的农民政权。

（3）解除土豪乡绅的武装，使农民夺取其武装，组织并巩固农民的武装势力（农民自卫军），自卫军的队员，应以农民协会会员充当。当乡村自治政权稳固后农民自卫军当为唯一的乡村中政府军队（或将称为保安队），以征兵的制度，使个个革命农民受着武装训练。

（4）进行改革土地制度的预备工作，调查大地主的限度，搜集必需的材料。引进国民党党部及其群众参加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在农民群众及一般民众中解释宣传这个问题。

（5）指导改良贫农生活状况的斗争。更加注意减轻佃农剥

削之斗争。实行减少捐税的运动，宣传并要求统一的累进农业税之实行。研究改良雇农生活的办法。实行建设消费借贷生产的合作社。

(6) 引进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参加指导的工作。真正农民不但要多多参加乡区农民协会的机关，而且要参加县省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农民协会的机关中，应多量加耕种田地的贫农，使他们成为协会之中心。

九、农民协会现时最危险的病相，便是本党在许多时机中，欠缺党的指导。

各级党部对于各地斗争的形势，农民协会组织的成分、农协机关的成分，都缺乏精确的考查；对于各阶级农民的趋向，亦没有明晰的观察；对于农民协会会员的数目，武装农民的数目，亦不能够详细知道。任何地方都没有正确的整理材料。

十、农民协会内部的情形，亦是不大好，省县乡区的各级协会之间，尚未发生密切的关系。有些指导农民运动的负责人员，往往惯于虚报农民组织的数目，夸大农民斗争的事实——这简直难于有正确的实际的指导，而且妨碍政治方针之确定。农民运动之指导机关里，缺少真正农民和非同志的参加，这是很大的缺点。省县农民协会指导员的成分里往往只有不知乡村情形之知识分子。

十一、因此我们党对于农民运动之组织上的责任是：

(1) 必须检查农民协会机关之成分，而且要开设非党员的及真正农民的训练班，以求一般农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的工作，使党的指导深入乡村群众，各省农民协会应当积极注意实行这件事。

(2) 引进革命的国民党员参加农民运动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如果国民党不参加农民协会的运动，那么非但国民党脱离了农民协会，而且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也会跟着脱离农民运动的同盟。因此，同时必须发展国民党组织于农民之中，扩大

并强固国民党左派在农村中之基础。

（3）必须努力整顿共产党党团的工作，农民协会中之党团与党部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达到密切的关系。各级党部机关应时常注意讨论农民运动，尤其是省县党部之农民部与各级农民协会中的党团。如此，方能准备正确的指导。尤其主要的，是要努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于农民之中，并且必须强固党的支部工作。党对于群众的指导必须切实建立——要征取向来在旧式秘密结社（如哥老会、青红帮等）指导之下的群众。

*　　　　*　　　　*

各级党部尤其是湘鄂赣，接到这一个大纲，必须加以详细的研究，迅速规定具体办法，来执行这一新的策略，并且将运用此策略于各该地的具体的情形的计划，即报告中央，至要至要。

中央常务委员会　安中原[1]

中 央 农 民 部　宗容民[2]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的代号。

〔2〕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

PDG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关于政局的公开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

亲爱的同志！

中国革命正在经过一个危急的阶段，在这阶段中，革命必定遇到许多难关，并且要克服许多困难问题。目前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满足已醒觉的农民群众之正当要求，而达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国民党革命的农民政策已经促起农民群众之奋起，实施这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他的历史上的职任，就是实行他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中国革命的将来，中国人民的命运，全靠贵党在此时期之坚决的行动。

土地改革刚才开始，就促进了反动分子之反革命行动。代表不劳而获的大地主阶级之封建军阀，已经起来实行用武力反抗农民。他们威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欲加以破坏——如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依然忠实于他们革命的主义，依然领导农民从事历史上的反封建势力之斗争。

军队中有些分子反对土地改革确是事实。不过整个的国民革命军并非——亦不能——反对农民的解放。兵士们大都是无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七期。

地或贫苦的农民，他们不会很自觉的反对农民运动。如果兵士们对土地改革表示敌意，就是他们还没有觉悟他们仍在受军队中反动分子的剥削。以兵士论，革命军在客观上应当是一个土地革命的军队。大多数的下级军官也是从中等阶级招募来的，他们也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国民革命并妨害不着他们的财产，他们必不以行动来保护豪绅大地主的政权和利益。现在把持一切政权和特殊权利的是豪绅和大地主。他们消灭之后，经济的关系和政治的权利一定要民权化。所以土地改革，不但不妨害城乡的中等阶级，并且可以解除他们的经济的停滞，给他们以政权。如果将这一点给他们说明白，革命军中之下级军官一定很忠实的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民权的土地改革政策。再者国民革命军的将领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革命领袖，对于土地改革定能拥护。

国民革命军的组织如此，整个的革命军决不能敌视土地改革。其绝大部分（兵士、下级军官、上级首领）定能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那么，最少数的反动分子处于孤立的地位，如果他们有反革命的行动，不难一鼓荡平之。

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土地的改革是到革命之道路。反动军阀所取者是反革命的路。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反动的军阀已经公开的反叛革命（夏斗寅的叛变，长沙的政变可十足的表明这一点）。他们已经向工农运动宣战了。他们的屠杀工农群众，和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蒋介石、李济深一模一样。他们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以赚得大地主和劣绅的爱戴。他们侮蔑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威权。长沙政变发生后，湖南省党部即被解散，并未得国民党中央的批准，擅自成立省党部（及所谓救党委员会）。打毁党校，劫夺前方购买军米之款项，国民政府所派遣之特别委员团中途被阻不得到长沙，并且自由派军队到各

县屠杀农民工人学生妇女。

这是明白的反革命行动。少数反动军阀，背叛了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高级军事长官，而在湖南篡夺了政权。国民党的责任到此情形之下，非常明显，宜立即下令讨灭此少数叛徒，以维系其最高权威，还是和他们妥协？国民党如果采用第二种办法，国民党的历史，国民党的主义，国民党的政纲，都将推翻，将在国民党政治的生命发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湖南的反革命必须讨灭，迅速的行动已经十二分必要了。犹豫不决，必遗后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采用以下的行动，削平湖南的反革命：

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

二、解散叛徒的委员会另委合法的省政府。

三、火速派兵讨伐叛乱，与唐[1]总指挥以派兵之权削平之。

四、取消叛徒窃据之省党部，另由国民党中央下令改选新省党部行使职权。

五、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得享完全的自由。

六、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

以此行动处置反革命，不仅湖南一省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发生坚强的信仰，全国各地的工农，定要遥瞻国民革命的旗帜，认识国民党的党徽，为他们自由之标志。他们必定自己起来向国民政府之敌作战！

当大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和他们的军阀代表向国民革命反抗时，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一定要和民权主义的群众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促醒他们革命的觉悟，并领导着他们大胆的

向反革命进攻。当反动分子以公开的反叛行动集合他们的力量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倘不果决的领导劳苦群众向反革命势力作殊死的革命战斗，则一切反革命势力得有更多机会放胆集合发展其势力向革命进攻，革命前途将陷于危险！谨致

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　陈独秀

六月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唐生智。

PDG

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张　太　雷

帝国主义真厉害！先是几十条兵舰几千大兵，帝国主义要用武力压迫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武汉，后来因为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及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结果未能实行；但是是否帝国主义破坏武汉革命根据地的阴谋和缓了呢？没有，非特没有，更外加厉了呵！帝国主义采用了更厉害的策略——经济封锁武汉的策略。他不仅是把他们在武汉的银行关闭，不接受中央银行钞票，不与武汉做买卖，并且勾结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停止沪汉的汇兑，断绝长江的交通，串通武汉奸商破坏金融，停闭工厂商店，蒋介石组织土匪，勾结军队，造谣恐吓——闹得武汉社会鸡犬不宁，风声鹤唳，市面萧条，财政困难；湖南有许克祥之变，湖北有夏斗寅、杨森、于学忠、张联升及鄂东土匪的蜂起。尤可怕者，革命的内部发生了摇动。我所以说：帝国主义真厉害！

但是一般革命者不是完全明了我们现在两湖的厄运是帝国主义勾结了中国大资产阶级所给予我们的；有很多革命同志虽然很反对反革命，但是不自觉地很听信他们的话，说：现在两湖的厄运，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是我们革命基本势力——工农运动所造成的。以前我们听见反革命说我们的工农运动是地痞流氓运动，我们反驳他攻击他，但是我们现在自己亦承认目前两湖的厄运是因为地痞流氓运动！蒋介石脱离革命，据说是因

为工农运动的幼稚病及革命运动的进展太快了；现在我们自己亦是口口声声骂工农的幼稚与过火，把现在武汉政府一切困难却推在工农运动身上。几乎大家认为：假使没有工农运动，许克祥与夏斗寅是不会反的，政府的财政是不会困难的，甚至以为国民革命就可安安稳稳成功的。这话当然说得似乎“过火”一点，但是试问现在是不是有这一种的空气。敌人向我们的进攻，我们是不怕的，我们最怕的是：我们把应对着敌人的枪口来对着我们自己的基本势力示威。这是在目前敌人压迫我们的时候最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件事。

假使我们能了解：现在我们的厄运是反革命给我们的；现在是反革命四面八方来压迫及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的局面；因为敌人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来进攻我们，而我们自己是无组织的抵抗，因此我们现在落在很困难的地位。那末，我们现在应付的方针，就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

工农群众一旦感觉到帝国主义军阀及封建势力的压迫一松，他们马上就如怒潮汹涌地谋自己的解放，他们在这种初期解放运动中因客观的情形，不免是一种缺乏组织的状态，苟能有大批的干部人才及上面的正确领导，亦能有很多的补助，但是事实上，这两种主观的条件是缺乏了的。群众这种初期的猛烈谋解放的一种欠缺组织的运动之阶段，在无论哪一个革命中所不可免的，自法国大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如此，就是中国以前各朝代更换的时候，所谓真命天子出世，亦不免有一个时期的混乱，何况是一个革命——一件砖头瓦片大翻身的事件呢？

这种欠缺组织的初期状态，当然不应永久让他继续下去。为什么不能让他继续下去呢？因为初期的解放运动把反革命打

了一下，反革命因为没有准备而暂时溃退，但是反革命不是那样容易扑灭的，他受了一次挫折后，必然是卷土重来，这时的反革命不是以前那样无组织的无准备的，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反攻，革命势力为应付此种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敌人，非自己亦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抵抗不可，不然革命是要失败的。所以跟着这初期的欠缺组织的解放运动的时期，即应该使民众运动更有组织更有纪律及更有计划。

这次在反革命有组织进攻时，我们很不能制胜，因此要稍退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没有及早以政府力量巩固革命的胜利，没有使民众运动更进一步而有组织，庶几反革命来反攻时能有充分的抵抗力，或者使反革命虽欲反攻而不能。所以现时我们在反革命有准备的进攻而我们没有准备的抵抗时，我们要退却一步以便整顿我们队伍使有纪律有组织以谋最后的胜利。同时国民政府赞助民众而镇压反动之职任，格外严重了。假使我们现时看见反革命势力浩大及革命势力无组织，我们就忘记了抵抗反革命，或竟转而撤散自己队伍，长反动派之气焰，在客观上便是满足敌人的欲望，这便是革命的危机。

因此，本着以上的理由，我们对于湖北省现时应做的事件列举如下：

一、革命纪律是巩固民众运动，而不应是压制民众的。省总工会好久以前就颁布了工人革命的纪律，最近又有工商联席会议的议决，苟能切实执行，非特是工人运动更有组织，即城市中等阶级亦不能表示不满。不应不履行自己同意于前的劳资契约。否则社会上之纠纷，是不能由工人负责的。农民方面因为人数之多与散居地域之广，更需要实行革命纪律，使省农协会能依照一般革命的需要指导农民群众。但是此种革命纪律对民众的实施决不是几道机械式的命令所可做到的，应该有一个广泛的宣传运动及积极的指示。对革命的民众固然要有革命的

纪律，但对反革命尤其要有严格的镇压反革命的纪律，如对奸商操纵金融粮食，贪官污吏勒索行贿，及劣绅土豪的屠杀良民，必加以更严重之处罚，至于许克祥等类之叛变，更须以革命的军律处治。

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地位之提高并巩固其下级党部。党部一定要能依照党的政策与领导民众，而不应与民众团体站对立的地位，党的领导地位决非以命令式的办法所能做到的。第一，要使党不是少数机关上人的党而能群众化；第二，要党有正确的政策去影响民众。下级党部因在和平时代发展的多投机分子，所以应改组的要无所顾忌地改组之，并使下级党部要绝对听省党部之指挥，如此省党部的威权自可树立。省党部权力既已树立，再加上中央党部时常有正确的指导给予省党部，那时一切本省政务党务必多能上正轨。仅仅嫌恶之而不加以指导与改正，此非求党改善之道也。

三、给农民政治上经济上正当的出路。现在乡村中有些地方还是开始或正在与劣绅土豪斗争，除非我们改变不革命，不然我们一定要帮助农民来铲除此种封建势力。所以继续进行打倒劣绅土豪的运动，是必需的。如果省农民协会及党部能实际领导，那末有少许流弊当然可免去。有些地方劣绅土豪势力已大致消灭，农民已确实把有乡村的政权，此地乡村自治就应当立刻实现，给农民政权以法律上的保障。苟一方面农民已握乡村政权而一方面政府又不以实力赞助农民铲除土豪劣绅之政治势力，而切实实行乡村自治，使农民能依导施行，因此而发生法律上的纠纷，其咎当不能归之于农民。农村经济因劣绅土豪之封锁经济，贫者无处借贷，金融停滞；当然我们不能采取压迫农民再使当铺老板或高利盘剥者回复吸血式的放债政策，所以我们一定想一种新的乡村金融方法，农民银行的设立及合作社之推行，是目前绝对必要的。现在鄂西鄂北是在反动军阀蹂

躏之下，鄂东鄂南土匪如毛，罗田、黄安、麻城、崇阳、通山、蕲水等处不是遭了屠杀的，就是马上要受屠杀的，我们不能单单注意到几个土豪劣绅被农民枪杀的事实，而痛骂农民该杀。我们更应打听一打听农民被屠杀之事实，全省农民被反革命所屠杀者总有数千，这总不能说他们是该杀的罢！所以在此种乡村反革命势力进攻中，政府应派军队剿匪并帮助农民武装起来以自卫。对农民运动单单是消极的禁止，或下令解散是不够的，是应该有积极的领导与给农民以正当的出路。

湖北问题整个儿的解决，当然不能只在求本省的整顿就可解决的，还要靠北伐的成功，与长江下游蒋介石势力的打倒，及湖南问题的解决——这样湖北的财政与经济因交通的舒展，而能得到解决，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封锁政策才能打破，革命的战线才能巩固，革命的后方才能稳定，湖北的革命基础才能深入与强固，以推动全国革命运动之进展。

六月六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出版的
《向导》第一九七期刊印。

PDG

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

——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各省省委鉴：

六月一日政治局通过的国民政府下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已由农字第五号通告，通告各省省委员会及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此种策略关系农民运动前途，亦即整个革命运动之前途，异常重大，尤其对于湘鄂赣各省农民部必须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无得怠忽！此策略大纲所指出之最主要者为农民政策建立之运动，然分析要点有三：（一）土地革命之开始，如没收大地主及土豪劣绅之田产等，并非过火，仅为现时革命阶段之策略起见，指明不没抄小地主及革命军官之重大意义。（二）指明均分田地甚至财产，则确为对于现在之不正当的政策。（三）指明其他政策，虽有本系正当的，然因本党指导力之弱及农协执委成分之缺少农民，致令永久以无组织的行动出之——此等无组织行动固为革命初期所难免或且必需，然长此以往未能及时加以组织指导，使已得之革命胜利得以巩固，而进展于新的时期，则其流弊甚大，此等无组织之行动，如下列各事，目前尤当绝对迅速纠正！

（一）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吃排家饭等行动，往往殃及小地主，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都在大地主政治影响之下，实行反对

革命运动。现时农协本身必须使此种行动不殃及小地主及革命军官。至于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现时不但不能停止，而且正在他们反攻时期，必须更加坚决的进行。但是，在现在政局之下，必须在每次斗争中设法尽量的搜集此等土豪劣绅之罪状及证据，不能再用原始的方法；此等真凭实据即可交给政府机关办理的工具，宜切实注意。

（二）禁米出境，勒写捐款，铲除烟草，禁止酿酒等事，足以使商业停滞，妨碍城市与乡村之交通，引起中小商人之反动，更可以使政府借阻止军米妨碍税收的口实，实行压迫农民运动，以后亦当绝对停止。关于阻谷问题，农协需精密计算乡村之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或多量供给军用。农协捐款，除巨绅土豪之罚款外，其他均须指定用途，例如协作社之建设，本应与捐主以某种权利，似此方能收充裕经费联合小商之实效。否则农协在本乡的写捐，往往使小商人恐惧怨恨，而实际并未收得此款。此等行动宜立即纠正，反正收不着的，宜立即公布取消。至于农协向外来采办货物之商人捐款，则亦非办法——农协应有组织的规定适当的物价，勿使奸商垄断而剥削农民，却决不可过于恐骇外来商人，使农村经济与城市商业断绝关系。关于不必禁止谷米出境，亦是同样的情形和理由。

（三）反对旧礼教、拜祖教及一切迷信菩萨等束缚农民的恶俗，改革男女关系的运动等，自然都有进行的必要，但是这些都是文化运动，只能用宣传而不能用鼓动方法，更不能用强迫方法。农协并非共产党，实际上是农民政权之雏形，对于宗教尚且必须以信仰自由为原则，而由国共两党党部去耐心解释宣传——可以没收庙产，而不可以强迫捣毁其神像祖宗牌等。至于宗法迷信尚深的农村中，甚至于反对这些陈腐东西，都必须以谨慎出之。

关于组织问题。各级农民协会，均须尽可能的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尽可能的实行改选，一方更须使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尽量参加各级农协之执行委员会。整个农民协会必须以耕田的佃雇自耕农等贫苦农民为中心，而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各级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学教师等，建立革命联盟。此种改选运动（代表大会）应以巩固农协实行新政策为号召；一方面可以略举无组织行动之各该地的具体事实加以匡正（通过相当的议决案），别方面关于乡村自治运动之要求应极热烈的宣传，由各区各乡农协向政府请愿。再则对于没收大地主反革命派亦须对一般人宣传，各级农协应标明不没收小地主，使农民群众及其他阶级皆能了然。最后，此种改选运动中尤须注意揭露豪绅反攻之凶恶于全社会，议定抵御镇压之具体实行方法。此种各级区乡县以至省的农协代表大会，如因剧烈之武装斗争而难于开会时，则现有农协委员会必须举行上书□事，组织确不健全者，必须改组。

各级农民协会，对全国农民协会必须发生亲密的关系。全国农民协会已发布之临字第一号训令，及将发布的临字第二号训令，各级农民协会尤其是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必须通电拥护，一方面表示各级农民协会已有实行新策略之决心，他方面亦可以提高全国农民协会之政治地位。

各级农民部，须知农民运动已至极严重的时期，我们如果不能切实执行党的政策，以改正过去的错误，万难挽救目前的危机。换言之，即将使整个农民运动，受致命的打击，亦即使整个革命运动受极大的创伤。所以，各级农民部，务须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严厉执行，至要！至要！

安　中　原[1]

宗　容　明[2]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的代号。

〔2〕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

PDG

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

——农运新规划五项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

为令遵事，前此蒋夏[1]诸逆，相继叛变，均以反对农工运动为旗帜，最近许克祥在长沙谋乱，亦以农工运动过火为号召。此虽反革命派一贯之口号，而非农工运动本身真有所谓过火与否之问题；但一方面因革命潮流飞涨，初期农民运动之原始现象，未能完全免除；他方面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中国农民运动，已进到一个新时期，必须采取新政策，始能适应新环境，已由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中明白指出。现为使此新时期之新政策，更能顺利执行起见，再指出下列五事，务望各省农民协会，立转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照办理：

（一）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　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因为发展甚速，难免不有土豪劣绅等不良分子乘机混入，以遂其破坏农民运动之企图。他们每每假借农民协会名义，作出种种妨害大多数农民利益及农民协会名誉之事实。现欲改正此种不良事件，必须多数农民积极参加各级农民协会；各乡区农民协会，更当尽可能的随时召集代表大会，审查过去工作，监督会员行动。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二十七期。

厉制裁！并为执行新政策起见，各级农民协会，应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增选新职员，增加新的指导工作人员。同时使耕田的贫农、佃农、雇农及自耕农，成为农民协会之坚固的社会基础。

（二）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　农村中的小商人为流通金融之主要分子，并为农民同立于被压迫的地位，农民协会应即领导农民，与之建立亲切的革命联盟。煮酒熬糖，以及其他商业品，虽为商人之利益，同时亦与农村经济有关，农民协会必须予以保护。农村谷米，在乡村自治机关未成立时，应由农协计算农村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农不致感受不便，而军米亦得充分的供给。农村中之其他重要出产品，亦宜与城市商业，发生良好的经常关系，使中小商人之贸易，得以无障碍地发展。以前有些地方，因为抽捐派款及其他原因，遂使城市商业与农村之关系，日益恶化。今后对于此种情形，亟宜纠正；并当有组织的扶助商业之发展，以防奸商过度之剥削。对于革命军人之家属及财产，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已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指导农民，予以切实保护。此项工作，目前尤须与慰劳救护革命军人之运动，一致加紧进行。

（三）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　乡间禁酒席，禁斋果香烛，反对一切迷信及宗法社会之旧习，改良乡间妇女之地位等运动，因为打破封建社会恶习之必要的行为，但必经过长期间的宣传，使一般民众，俱能了解；社会文化亦已提高，方可行之而无碍。倘必操切从事，则不惟得不到良好效果，反使反动分子利用落后思想，造谣煽惑，向进步的农民运动进攻，以破坏乡村的革命联盟。

（四）开始乡村建设事业　乡村自治机关之建立，为镇压反动封建势力，巩固农民已得胜利，消灭乡村无政府状态，而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新环境之重要工作。已由本会呈请国

民政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各级农民协会，应即联络乡村革命平民，努力进行，务于最短期间，使乡村自治机关，完全建立起来。农民银行，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及其他建设事业，各级农民协会，亦应与其他革命平民，共事建设。

（五）加紧宣传工作　农民运动一有相当发展，土豪劣绅等反动封建势力，除一面集中力量残杀农民外，一面复收买走狗，捏词诬陷，造谣煽惑。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对于组织农民协会，既无经验，幼稚行动，万难全免。土豪劣绅更复小题大做，以耸听闻，夏逆叛变以后，其行动尤为猖獗。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对于宣传工作，非常懈怠，土豪劣绅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之宣传，遂得以充满于乡村及城市，甚至革命同志，亦受其影响而怀疑农民运动。以后各级农民协会，不但要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呈露于革命同志革命民众之前，用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并须真实将农运详细情形，尽量发表出来，使上级农协得以随时指导其工作，纠正其错误。对于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更须作一度很普遍的宣传，使一般农民俱能彻底明了，农民运动的新方向，而积极按照本会所示途径，努力工作。

凡此五端，均为巩固革命联盟，促进国民革命之要务，各省农民协会必须领导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行。倘有奉行不力或阳奉阴违者，本会必当绳以革命纪律，立予改组！其有反动派假借农协名义，滋生事端，或捏词诬陷者，各级农民协会亦须报告上级农民协会，转请政府，立予扑灭，毋使滋蔓！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

谭延闿　谭平山　邓演达

毛泽东　陆　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夏斗寅。

PDG

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

陈 独 秀

我们现在用不着拿许多很坏的话来攻击蒋介石，因为他自己有许多行为已经足够说明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了。并且他的罪状已经国民党国民政府逐条宣布，更不需我们来重说。

我们也许可以说，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年三月二十到今年四月十二始终迁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之一个原因。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在去年三月二十之前，东征陈林[1]胜利时，蒋介石成了著名的革命人物，帝国主义者甚至于攻击他或者恭维他是中国红军首领；然而那时就有一位同志批评蒋介石是一个危险人物，未必始终忠于革命。我曾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蒋氏此时言论固然很革命，即行动也向着革命路上走；惟隐微中时时表露其个人英雄主义，表露其个人之权与力超于党之上，离开党的个人英雄主义，没有党的制裁，便会走到反革命，中外历史上这种英雄很多，恐怕蒋介石也是一个。现在看起来，这些话可算是对于蒋介石之终身的刻骨批评！

在讨伐陈林和讨伐刘杨[2]战争中，蒋介石很尊信共产党人，因为他们能苦战奋斗；即去年三月二十以后一直到今年三月七日他在南昌演讲，还时常说共产党是革命的，他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须合作。他时常肯定共产党是革命的，共产党人当然很感谢他；可惜他不是说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也是革命的，二者必须合作。他只说他也是革命的，共产党应和他合作，共产党听了总觉得很奇怪。蒋介石时时刻刻表示他自己的意思，而忘记了国民党，这是共产党终和他发生冲突之一个很重要原因。共产党承认国共两党都是革命的，所以必须合作（不但国民革命中破坏工作可以合作，即国民革命中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也希望可以合作）。因此，共产党立在革命工作的观点上，对于国民党中任何革命领袖，无论新旧都愿竭诚与之合作，决不肯立在私人的感情上，帮助哪一个领袖打倒哪一个领袖；即使那一个领袖背叛了革命，例如陈炯明、杨希闵、蒋介石，共产党也只是立在革命的观点上，帮助国民党去打倒这班反革命者，而不是什么拥孙倒陈，拥蒋倒杨，拥汪倒蒋。蒋介石始终不明白这个道理，始终只知道他个人而不知道有党，始终要求共产党以助蒋拒汪为合作条件，两次派人到上海和我们谈判，以哀的美敦式的态度，要求共产党停止迎汪复职运动。我们答以在革命进展的观点上，在国民党团结的观点上，共产党只是主张汪蒋合作，而不是拥汪倒蒋，却没有理由可以违反中国革命的需要，以及国民党党员群众的心理，而反对迎汪复职。这样合理的答复，当然使蒋介石失望，使蒋介石感觉得共产党到底不能做他的工具，像孙文主义学会那样，于是在他的二月二十一南昌演讲中，便喊出“纠正共产党”、“制裁共产党”等口号了。蒋介石所举要纠正及制裁共产党之理，是因为共产党党员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以排挤压迫，可是他在此次演讲之前，两次派人到上海和我们谈判时，没有一字提出共

产党党员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之事，而只说不满意我们附和迎汪复职运动，或者在他的见解，迎汪复职就是排挤压迫国民党党员。

去年三月二十事变之后，蒋介石极力声辩不是对付共产党，他对黄埔学生演说，痛陈领袖争权之事，分明是指汪精卫；最近张静江致汪精卫书，却说："岂知弟三月二十二日在长堤登岸，先二日介兄已向共产党行断然之手段……以为共产党之阴险，或有击而不中之虞，不告谷季（精卫别号），将失败时介自负之，季仍可自收其残局，各有其分义，弟亦何言，弟到之时，介兄仍欲彻底解决，断此亡党之毒腕，以慰总理之灵。"这样看起来，好像蒋张之言大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因为三月二十之变，反共排汪，本是二者并行。排汪之经过事实，精卫先生自知之，近亦向我详言之，不但三月二十排汪必欲其去职离粤，并且自从三月二十，一直到汪回，蒋张无时无事不与主张迎汪复职者为敌，试问这可是何种分义？蒋介石之反共，导源于戴季陶的小册子，这不仅是表面上简单的戴蒋等个人思想问题，乃是整个的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之反映。关于中国革命之前途，有两种理论与政策：一是无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一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无产阶级的理论政策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对内推翻封建势力军阀、地主、土豪劣绅等的统治，建立革命的民主独裁制，行向社会主义的建设，以达到全民族政治的经济的完全解放。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是：资产阶级与买办官僚地主豪绅甚至一部分反动军阀结合起来，建立保护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军事独裁制，以压迫工农运动及反共反俄，求得帝国主义的谅解及些小让步，在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政策之下，根本停止民众的一切革命运动，发展并稳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权。中国革命之前途，只有这两

条路，找不出第三条路。也许戴季陶、蒋介石自以为可以找出第三条路，不过事实上他们所走的分明还是第二条路，并未曾发明第三条路。所谓第三条路，只是不肯走第一条路，而又不愿显然自承走第二条路之名，其实第三条路不通行，还只有走第二条路。戴季陶以为可以一面反共派，一面反右派，其结果他和右派走上一条路；蒋介石、张静江以为可以一面反共派反工农运动，一面反西山会议派，其结果他们和西山会议派走上了一条路；现在又有人以为可以一面反共反工农运动，一面反蒋，其结果也必然和蒋介石走上一条路；这都是因为他们想找第三条路，其实本来不会有第三条路，所谓第三条路，即第二条路之别名。自从戴季陶发行他的小册子，中间经过三月二十，一直到今年四月十二，都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者国民党右派首领戴季陶、蒋介石、张静江等，在寻找第三条路的口实之下，为实行走他们的第二条路而工作。

第二条路即资产阶级的路。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然要抑制工农运动，不许他们强盛起来，更不用说是过火，只有时有利益于资产阶级的工农运动（如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示威与庆祝追悼等），他们或者可以恩准，否则便是受了共产党煽惑操纵，只好用四月十二的办法。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然不愿意无产阶级的政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特别是和他们的理论与政策不一致的时候（帮助他们对付他们的政敌之时，当然要暂时利用一下），所以戴季陶自始至终都主张共产党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最近《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中又说："我在总理死后很辛苦地坚持着非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则救国的责任决负不起"。诚然，他们很辛苦地屠杀了共产党之后，很得意地向全国国民宣告中国国民党纯粹独立，这想必就是戴季陶先生发挥他们资产阶级的"仁爱性"。如果共产党也这样宣告

独立，不知资产阶级的学者要怎样大疾声呼的咒骂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残暴无仁爱性！戴季陶或者可以回答说：四月十二之事确如白崇禧、陈群所说只是“工人互轰”（六月三日陈群在所谓上海工会统一委员会还这样说），随后搜捕枪毙之共产党，或者那是许克祥所谓“暴徒分子”，而非真共产党，至于朱培德欢送共产党出境，更是仁爱之至。可是吴稚晖曾大呼“杀尽共产党”，李石曾说四月十二事变是革命，并且是最后的革命，从此再用不着革命了；诚然，共产党杀尽了，无产阶级压服下去了，资产阶级已经革了无产阶级的命，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纯粹国民党，从此得安然，和英日帝国主义及奉天军阀携手统治中国，还有什么革命！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联俄政策自然不大适用；蒋介石、吴稚晖、戴季陶都一致采用西山会议的意见，联俄原以平等待我为条件，言外之意就是苏俄现已不以平等待我了，联俄政策当然要抛弃。吴稚晖说：“有人说俄国已铲除不平等条约，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奥，皆已铲除不平等条约，依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止能认为最惠国，联合则平等未完全，显生问题，所以德奥可认为最惠国，尚未联合也。”戴季陶说：“俄国既然说是同情于中国的革命，援助国民政府，而两年当中，既没有和国民政府定过相互的平等条约，也没有和国民政府交换过正式的代表……俄国既没有正式承认我们的国民政府，我们就无从承认俄国对我们的革命有正确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苏俄和国民党关系，至今和中山先生在世时无殊，何以现在忽然登现了没有正式承认和没有定过条约交换代表，联俄显生问题？其实这都是鬼话。吴稚晖说：“遂使帝国主义之国及国内军阀，谋倾本党者，借赤化为口实，混乱世之众听。”这几句话才真是他们抛弃联俄政策之隐衷！

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自不得

不将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放弃了。他们分明走的是第二条路，还厚颜说是第三条路，自以为虽然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而仍然是革命的，不知道他们的所谓革命作何解释?

汪精卫先生曾说："要革命的向左边来!"现在蒋党的人说："要革命的向右边来!"这句话虽然滑稽，可是也证明了他们已认识没有中间的第三条路!

向右是他们自己承认的，但是不是革命的呢?

三月二十的行动是革命的吗?

北伐总司令一就职，国民政府便无形取消了，这是革命的吗?

派李石曾向张作霖、杨宇霆谋南北妥协，这是革命的吗?

四月十二的行动是革命的吗?

收买青红帮打毁沿江各省的党部及工会农会，屠杀工农群众，这是革命的吗?

搜捕枪杀各军政治工作人员，这是革命的吗?

正当北伐军在河南和奉军血战之时，勾结于学忠、张联升、刘湘、杨森、夏斗寅乘虚袭击武汉国民政府，这是革命的吗?

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使田中的代表松井到武汉诱胁国民政府的领袖潜赴南京，这是革命的吗?

如果这些行为是革命的，那么，只有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与政策是这样。如果这样也算是革命，难怪张勋复辟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也自称是革命!

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不是一件小小事体；因为这不只是蒋介石个人的问题，他所代表的是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这是全国革命的民众和革命的领袖都应该认识的。他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所以

一切不容于革命势力的许多反动派如国家主义者、研究系、安福系等，一向反对国民党，现在都跑到蒋介石旗帜之下，帮着他摇旗呐喊，向革命势力进攻。至于一些反动的大小军阀，自然有与蒋介石结合之可能，刘湘、杨森、于学忠、张联升、夏斗寅、许克祥等，不用说了；蒋介石、阎锡山、杨宇霆的三角同盟，不久也会实现。

安徽的蒋党，竟揭出“拥护新军阀”的标语，重庆的蒋党，竟揭出“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的标语，这是何等新奇的事！

一切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不但要依附假革命的蒋介石之名义以保存其反革命的实力，而且还要强奸三民主义一下，这是革命运动中最可耻的危险！

蒋介石已成了全国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

我们所要敬告国民政府之领袖及军事长官的是：应为革命而讨蒋，不应为讨蒋而讨蒋；换句话说，即是不但讨蒋介石个人，而且要讨伐蒋介石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若讨蒋者，在革命的理论与政策上，在对民众态度上，一切仍蒋之旧，即令讨蒋胜利，亦与革命无涉，而且不足以服蒋之心！

六月十一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八期刊印。

注　释

〔1〕指陈炯明、林虎。

〔2〕指刘震寰、杨希闵。

PDG

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

瞿　秋　白

国民政府之武汉方面与西北方面的国民革命军，已经会师河南，革命的北伐战争开辟了一个新局面。但是，国民政府的危机，也正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国民革命的危机，开始于蒋介石的叛变；自从南京政府僭窃的成立以来，这种新军阀，事实上已经代替旧军阀而形成一切反动势力的中心。现时革命政府的职任，便是集中势力进攻新军阀旧军阀，而尤其重要的是击毁那反动势力之中心，巩固扩大革命的领域。这就必须彻底扫除反动封建的余孽，以及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制造革命危机的工具——必须实行建立民权主义的平民自治，开始土地革命没收大地主，保障工人阶级的权利；如此，方能巩固深入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领导其他中等阶级，如小地主等，猛攻新旧军阀而肃清之，达到国民革命的成功。

蒋介石的叛变，其意义正在于要毁灭革命的民权联盟——推翻工农联共联俄之三大政策。武汉国民政府之所以下令讨伐蒋介石，也正因为武汉国民政府应当保持这革命联盟，而且要加以发展。武汉与南京之争，是革命领导权之争。南京政府，以反动的中国资产阶级为领导，联合封建的豪绅官僚军阀，而摧残工农小商，谋与帝国主义妥协而出卖革命。武汉的国民政府，应当以工农联共联俄三大革命政策为领导——无产阶级领

导农民小资产阶级，而彻底实行推翻封建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为什么武汉政府下令讨伐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企图摧毁工农的革命主力军而出卖革命。因此而武汉的国民政府是革命的。双方斗争的胜败，足以决定中国革命的命运，足以决定中国是否能肃清军阀统治、解放中国民族而完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派的新军阀，很明白这层道理。他们用全力进攻武汉：武力干涉，经济封锁，离间挑拨，捣乱后方，使武汉欲求肃清奉鲁军阀而不得。蒋介石的反动的南京政府不消灭，不但肃清北方军阀不可能，而且武汉政府破灭于蒋派的反动之手，也说不定！

国民政府的危机现在紧迫到万分了——蒋派反动的阴谋，不仅在于勾结杨森、夏斗寅、于学忠、张联升叛乱于湖北腹心之地，使许克祥辈捣乱于湖南，而且尽力煽惑，离间国民革命军的内部，组织反动团体，率领土豪巨绅贪官污吏反攻，使在国民政府领域之内，也发现摧残党部，屠杀工农及共产党的事实。这就是摧毁革命的国民政府的社会基础——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些蒋介石派的目的，是使湘鄂赣民众亲身体验武汉领域之内，也有与南京政府共同的政纲之实行家，因而不致于努力赞助武汉政府。他们要使武汉国民政府消失其革命的意义，即与之同化，向之乞降，或者被他们这些蒋介石奸细的捣乱所推翻！

请看最近的国民政府之下的危机：

一、湖南　许克祥叛乱，解散省政府省党部，实行所谓救党，屠杀工农并解散其团体，以及纠察队自卫军，违抗中央及省政府主席之命令，实行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独立。这种屠杀，一直从蔓延到全省，各县土豪巨绅实行反革命的残杀。湖南事实上的政权，已在许（克祥）、仇（鳌）、萧（翼鲲）、彭（国

钧）四凶之手，纯粹是右派的土豪巨绅的反革命的政权。

二、江西　南昌城内外早已发现秘密贴布之标语：“打倒共产党，欢迎蒋总司令。”公安局某队长被暗杀；万年县的豪绅雇用流氓捣毁农民协会，以煤油焚毙其委员长；都昌、永修、东乡、贵溪、遂川、宜丰等县，都发生同等的事实，而且大都连国民党党部及委员都在被摧残屠杀之列，甚至逮捕县长（如宜丰）；鄱阳更有摧残工会的事实。最近，甚至发见所谓“欢送”共产党的事，其实是驱逐党部工农团体及军队政治部之革命职员（左派亦在其内）。

三、湖北　杨森、夏斗寅、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军所到之县份，如江陵、嘉鱼、武昌乡区、通山、鄂城、大冶、天门、公安、枣阳、沔阳、宜都，以至鄂西一带，土豪巨绅，都相率反攻，党部农工团体都被捣毁，民众惨遭残杀；其他叛军并未到达之地，如钟祥、麻城、随县、罗田、黄安，土豪巨绅贪官污吏，亦蜂起反动，勾结土匪，摧残党部、工农以至商民；湖北受屠民众现已不下数千，叛军战祸所死，还没有计算在内。

最近蒋介石派种种奸细，利用工农民众运动的几件无组织行动，大呼其“工农运动过火”。革命的政党对于民众运动的指导，固然是应当加以组织集中巩固。但是，决不应当因此而放纵反革命！这些蒋介石派事实上的奸细——土豪巨绅贪官污吏及右派的凶顽，却敢以“过火”为借口，大施屠杀。他们背叛政府而独立，解散工农团体及其自卫的武装，残杀革命党员或加以驱逐，残刑惨杀：洋油焚身，活剐千刀，砂石磨死，炮烙烤毙，挖眼断舌……甚至迫令妇女裸体游街，刀穿其双乳，以绳系其孔而牵之。这些难道还不过火，其他乡村间经济金融封锁等的反攻，还不曾说在内。他们还敢借口国民党中央训令，捏造事实诬告民众，颠倒黑白的施其反动伎俩。

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居然发生这样的事实。如果革命政府不立即加以严厉的镇压，还有什么联合战线可言——工、农、小商以至国民政府，在此种恐怖之下，都要被反革命派所摧残颠覆了。

武汉既是革命的国民政府，就必须坚决的执行革命政策，团结工农及一切革命平民于自己旗帜之下，战胜这种严重万分的危机。

国民政府必不能和蒋介石及其奸细妥协，必须严惩一切屠杀工农捣乱后方的反动派，明令保护工农团体及其纠察队自卫军，而以实力执行之；切实实行国民党三大政策，保障国民党党部工农共产党等革命团体之自由。因此，对于湖南，应当立即严惩许仇萧彭四凶，恢复省政府的政权，启封被许等所封闭之一切革命团体，恢复各县被捣毁的民众团体。对于江西，应当明令制止其驱逐共产党及左派之行动，严惩各地屠杀民众之豪绅反动派。对于湖北，则须尽力来肃清逆军土匪，以及一切反动的土豪巨绅；尤其要严惩造谣离间的蒋介石奸细，巩固武汉之革命基础。这些不但是政府，而且是民众的迫切任务。

革命的民众与政府，必须如此努力斗争，方能战胜革命之危机，同时团结全国一切革命势力，巩固工农商学兵的革命联盟，实行讨伐蒋介石，击毁反革命中心之南京政府，肃清危害国民政府之一切反动势力，使革命得到真正的胜利。只有这样，武汉政府才能保持其革命的意义，方能歼灭蒋介石以至张作霖，完成国民革命。

一九二七、六、一三晨三时

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向导》第一九八期刊印。

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

——反抗土豪劣绅之武装袭击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

为令遵事，农民运动过去因为发展甚速，组织上未能健全。加以土豪劣绅猛力反攻，遂使乡村斗争日趋急剧，上级机关之指导偶有不周，即不免发生无组织之行动。已经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及第二号训令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极力纠正。务使各地农民，俱在农民协会指挥之下，有组织有计划的继续与一切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斗争，以尽我农民在革命过程中推翻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及军阀统治的政治基础之职责。并指出各地农民目前的斗争目标，应为建立乡村自治而奋斗。现据各方报告，在湘鄂赣三省中，土豪劣绅进攻农民，非常猛烈。在江西六月五日当局遣散党务政治工作人员后，各地土豪劣绅，纷纷乘机蠢动，吉水劣绅则勾结流氓，进攻农民协会，下乡捉人；南昌一区，劣绅则拘捕执行委员；新建土豪劣绅则逮捕农协会员，牵去农民耕牛；铜鼓革命团体，均被捣毁；弋阳反动军队，更大行残杀农协职员；泰和四区农协，不但为反动派所捣毁，并被捕去执委二人。在湖南五月二十一号事变日，许克祥即屠杀省农协、省工会、工人运动讲习所、党校等处同志及农民工友共三十余人。事变以后，更派兵袭击湘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十七日汉口《民国日报》。

潭常德各县民众，而农民死伤枕藉者，将及万人，并将湘潭总工会委员长斩决而以脚踢其头，并用洋油注其腹内而焚之；旁观民众，莫不愤怒万状。在湖北尤为凶猛，湖北各县土豪劣绅不但勾结土匪及会党的腐败领袖，惨杀农民，如阳新土豪劣绅用洋油烧死农民九人；沔阳土劣勾结硬肚会惨杀农民五十余人；天门土劣勾结土匪惨杀农友二十余人；钟祥土豪劣绅勾结硬肚会惨杀农友十余人；汉川土豪劣绅勾结流氓杀伤农友十余人；麻城土豪劣绅勾结红枪会、黑枪会、白枪会残杀农友百余人，烧毁民房数十村皆是。他们更利用反动军队力量，以图根本扑灭农运，因以动摇革命根据地。夏杨许张于[1]诸逆相继叛变，每到一处，即将在押土豪劣绅释放，使之率领逆军到处屠杀。嘉鱼杀死农民三十余人；咸宁武昌均杀五十余人；天门烧农民房屋三百余间，杀二十余人；公安烙死数十人；枣阳残杀五百余人；沔阳残杀二十余人；宜都残杀数十人；麻城沿乡捕杀，烧毁房屋，奸淫妇女，共杀死五百余人；随县前后杀死一千人以上；罗田惨杀六十余人；黄安惨杀一百余人；钟祥劣绅王恕堂更占领县城，挨户搜索，惨杀二百余人。其他夏口、黄冈、应山、应城、蕲春、江陵等县的豪绅，亦莫不闻风兴起向农民进攻。挖眼拔舌，刳肠斩首，刀割沙磨，洋油焚烧，红铁火烙，均为豪绅对待革命农民的残酷刑罚。对待妇女，则以绳穿贯其乳而驱其裸体游行，或零碎割死。农民之死难者，已达四五千人，而荆门、松滋、宜昌等县，仍在继续屠杀中；即国民政府首都武汉，仅距汉阳县城十余里之地，亦不免发生土豪劣绅围杀农民之事实，湖北全省完全为白色恐怖所笼罩。总计湘鄂赣三省党员农民工人之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其挑拨革命军人与农民感情之毒计，亦正积极进行，往往捏造事实，指鹿为马，故甚其辞，希冀军人向民众团体发生剧烈之冲突，

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予以推翻党国，虽人民痛苦，亡国灭种，亦所不惜。同时贪官污吏起而与土豪劣绅，互相响应，共同捏辞诬蔑农民，以图离间政府与人民之关系，如黄冈农民协会本无铲挖烟苗事项，而贪官污吏，竟蒙呈中央予以解散即其著例。现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因已明悉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买办洋奴以及一切反动派，乘我军北伐与奉军战斗剧烈之际，向我国民政府联合进攻之毒计，而训令全体武装同志，对于指鹿为马，过甚其辞之传言，谨慎调查毋堕反动派之阴谋。然日来各地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溃军屠杀农民事实仍有愈演愈烈之势，贪官污吏离间政府与人民之阴谋，亦复屡出不穷。各机关近来接得诬控农民之状纸，每日不下数起。在此种严重情形之下，各级农民协会极应一致请求国民政府：（一）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并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使工会农会共产党等革命组织，享有完全自由，团结革命势力，实行讨伐蒋介石。（二）肃清湖北各县勾结逆军土匪屠杀农民工人之土豪劣绅，严惩造谣离间的蒋介石奸细及一切反动分子以巩固武汉。（三）明令惩办许克祥、仇鳌、彭国钧、萧翼鲲，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恢复湖南省政府省党部省工会省农协及一切被摧残之革命团体，接受湖南请愿代表团之请愿，并令湖南省政府唐[2]主席从速镇压湖南之反革命派。（四）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并严惩屠杀民众之反动派。农民协会之本身，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因为土豪劣绅之气焰不灭，则创设乡村自治建立民主政权，终属不可能之事，经济上之建设，更无从可以实现，而国民政府之基础，亦末由巩固

也，此令。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谭延闿　谭平山　邓演达

毛泽东　陆　沉

六月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夏斗寅、杨森、许克祥、张联升、于学忠。

〔2〕指唐生智。

PDG

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

——农运策略的说明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

各省委、特委、临委鉴：

现在中国革命已发展到了以农村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我们同志尤其是农运负责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各方面必须有深切的了解与明确的认识，并须根据第五次大会之土地问题议决案，而具体的运用，然后可以使党切实领导农民运动，以推进革命势力的进展。因此各同志对于这个通告，务须特别注意，并且切实执行。上次农字第五号通告，是关于国民政府治下农运之新策略的政治局议决案，然而各地都应注意参考，这是湘鄂农运的经验，本次通告则为一般全国农运策略之说明，仍是根据那议决案的原则。

（一）政 权 问 题

农民运动的中心问题，固然是土地革命，但是土地革命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现在阶段主要特点是农民政权之争斗。（一）自耕贫农众多而尚受新旧军阀压迫的地方，非有建立农民之革命民权的目标，不能使此等贫农形成斗争中的领导者，而联合一般人民去开始反对军阀豪绅的运动，亦不能使他们真正明了革命战争（北伐、东伐或西伐）的目的和意义。此

种政权的斗争方能促起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二）新旧军阀之下佃农及失业民众多的地方（尤其是广东）亦须立此目标以指挥暴动，虽则此处的主要特点仿佛已经是没收大地主，其实没有争政权的目标，单纯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够的，此等地方的主要口号是为土地而争政权。（三）国民政府之下，农民事实上取得政权的县份及区乡，曾经有许多地方（至今还保存着几县呢），可是以前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任令农会孤军独战，现在的新政策是事实上帮助农军反攻。如今豪绅的反攻在湖南、湖北、江西都演成剧烈的危机，民已得之胜利（事实上的民权）几乎全被摧残，此时农民政权之斗争所以更加要加紧，要对于豪绅的进攻，组织极坚决猛烈的反攻。在这斗争过程中便要开始没收大地主，就是要以行动去领导小资产阶级左派，一面对他们让步（见上两次通告），别方面就挟持他们去共同反对劣绅土豪，自然必须以建立民权为目标。第一，农民群众有势力的地方，立即成立自治筹备处，吸引小资产阶级参加，标明除劣绅大地主反革命（已被没收者）外，一切小地主享有公民权、选举权；农民群众势力尚小的地方，亦宜以此政权斗争为目标。而实行武装斗争时便是为乡村自治而战，为镇压乡村反自治者而没收其土地。各级农协，应群起要求政府颁布自治。第三[1]，农政部与农协发生亲密关系，双方互相响应，农政部从上而下的帮助农协之政权斗争，农协自下而上的拥护农政部之政策，通电控诉豪绅、请愿、派代表等运动都可以增加这农政部的威信。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对于政权问题之决议案

我们知道农民运动中贫农最革命的，中农也来参加革命了，其结果引起其他一般被压迫的民众都积极起来根本上推翻封建

政权。农民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为确定农民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农民政权应当由贫农与中农掌握，但贫农应当是这个政权中的领导者，否则农民政权不能巩固。贫农领导政权应当指导吸引一般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封建势力的分子，代表农民及其他乡村一般被压迫的民众的利益的特别是贫农利益的，向土豪劣绅地主封建势力给以严厉的镇压。同时乡村农民运动及农民政权，必须在城市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赞助并巩固革命的国民政府。

封建地主阶级乃几千年来压迫剥削农民最厉害的一个阶级。不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政权，则农民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从做起。所以农民运动的初期，必须领导农民用种种革命手段实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权力，标明为民权的政治而斗争的目标，必造成很紧张的革命空气，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是十分必要的。一般人对于农民运动认为过火的批评实际就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上面企图消灭农村的斗争。我们必须严厉的加以纠正。非如此不能根本摇动乡村封建政治，使一切斗争得到胜利，农民政权确实地建设起来。

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封建地主的时候，农民协会应成为乡村中唯一的权力机关，完全指挥这斗争，使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一切政治组织（如民团，团□，团防局等）完全消灭。在这个过程中应即建设民主的区乡自治制度，以保障农民战胜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

农民不特要取得乡村政权，而且要参加县政治、省政治、全国政治，参加县政治的方法是：一面使县政问题皆由县长与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的民众的团体开会议解决，一面促县政府改民选委员制。

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他们要求国政府、省政府赞助农民争政权之争斗，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农民协会的政治地位应当尽量的提高。

（二）经济斗争

经济斗争之进行，在阶级分化没有明显的地方，减税运动可与富农小地主等共同作战；在阶级已有明显分化的地方，减税运动以及实行统一的农业累进税之要求，仍是各种农民作战的共同目标，就是反对高利贷，也不特为佃农之问题，应即竭力领导他们努力斗争。至于减租运动，则尤为重要，这实是没收大地主运动之第一步。在经济斗争中，更当注意青年农民的利益，但不能与整个经济斗争脱离。对于雇农手工业者，在目前情况之下，不宜另有独立的组织，惟农协对于他们的利益，应该切实拥护。如雇农人数太多，农民经济斗争扩大则农协内可以组织雇农部（手工业部亦是如此），但对于农村的联合战线，亦须注意巩固。因此一方面要使雇农要求得到满足，他方面为防止会内的冲突计，应使雇主及一般群众了解雇农改良生活的必要，有必要时农民协会应为小农雇主及雇农冲突时之仲裁机关（青年雇农、牧童亦在此例）。经济斗争之进行，各地的宣传亦有不同，张作霖治下则减租减税没收大地主，三种斗争宜看各省农民经济状况而定。注意之点主要是要引导这种经济斗争，收得到最广大的群众，而且能立刻转变到政治斗争以至军事行动。蒋介石治下亦是一样的，但是广东应当特别注意更须明确的以农民政权及没收大地主为暴动之标志。在湘鄂赣三省则除根据情形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尤须注意的有两件事：（一）是经济斗争在程度剧烈的地方，必须转入农民协会自己开始经济的建设事业，如借钱的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等。（二）至于减少苛捐杂税的运动必须各地方调查实情向政府提出具体的要求，田税的问题与土地问题应联合在一块进行，并须指出非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之趋

势，至没收后之土地则须征收农业累进税。

土地问题确为不能不解决之重要问题，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不但是佃农贫农，即失地之农民及短期之雇农亦有迫切的要求，就是苛捐杂税等等压迫之下的自耕农也大多数感觉土地之缺乏，并且农民运动的根本目的，即为改变现在的土地制度，使耕地农有实现而进于国有。我们即使在阶级分化未明的地方亦须宣传第五次大会之政纲，使农民及一般人民了解解决土地问题之必要与策略。土地问题应与经济斗争之发展合而为一，应使农民了解减税减租并不能彻底求得解放，必须进到没收大地主土地的阶段方能开始解放农民的土地革命。

对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则必须使之中立，使农民得和国民党左派及一般被压迫民众结合进攻土豪劣绅大地主。我们的党在目前必须用很大的力量进行这个工作。实际上小地主与富农不一定是土豪劣绅，不可使他们落于土豪劣绅大地主领导之下因而巩固反动的政权。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小地主及中等阶级一方面虽然可以反对土豪劣绅，他方面客观上也是农民的剥削者，所以对于他们要求减租是不没收其土地财产之交换条件。全国的减租运动都须注意这一点，并须宣传国民政府之佃农保护法，国民政府治下，则须要求此法之严格的实行。

分地运动是贫农要求解决生计问题的迫切表现，其起原则在减租减税的运动，但我们党不能放任他们自由做去。分地虽然是必不可免的阶段，但在将来革命已有新的发展，已与小资产阶级建立了巩固的联合战线时，可由没收而均分，然后再走上土地国有的道路，然后国家开办屯垦，方能解决失地农民及兵士之土地问题。至于现时的联合战线，还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真正联合战线，国民政府及其军官之中还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于大地主的少数分子也在内。现在减租减税的运动和解决一部分贫农的生计问题（利用合作社，加入军队，兴办

工程等方法）都是将来解决土地问题之准备而已。所以客观上如果有紧迫的必要，一方面固然可以由农民协会，最好是乡村自治政府设土地委员会，设法分配若干土地与此等贫农，但只是将没收之公产、庙产、大地主荒地、官地来分配，而不是均分，别方面必不可过早的提出均分土地的口号，尤其是均分财产的口号。

阻卖问题是乡村中荒歉或因剧烈斗争而经济破坏的时候所必然发生的。农民协会以及将来自治机关，必须注意这种斗争，不使过于延长，随时筹算本地所需米粮，如已有多余，即需竭力流通，这不但对于保持与国民党左派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是必要的（如供给军米问题），而且为农村经济本身的利益，亦是必要的。

（三）武装问题

农民政权的斗争与土地的斗争，直接要求本党十二分注意农民武装的问题，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武装，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略相适应。农民运动，往往一开始便急转直下进于武装的冲突的，各省军部须派有军事工作能力及经验的同志训练农民自卫军，使其有野战与迅速集中的能力。在北方各省，则须取得红枪会的实力与群众，使之脱离土豪乡绅的影响而置于我们的指导之下。成立乡村自治机关的保安队，并须实行民兵制，使每个农民都能获得军事训练，并使有一批复一批的武装训练与补充，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各省军部及农民部，均须积极切实准备，同时必须号召农民加入军队。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对于武装问题之决议案

1. 各省应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

2. 武器种类除枪外，应使每一个农民协会会员都置备鸟枪、梭标、大刀、木棍等武器一件。

3. 对付旧有地主阶级的武装如团防、民团、保卫团等分为三种办法：(一) 使政府下令各省均限于组织农民自卫。旧有之地主阶级武装团体须一律解散，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二) 只要为政治环境所许，能以农民力量强夺其武装的即行强夺。(三) 不能实行以上两种办法的地方，则用改选其办事人方法，使在土豪劣绅手中的武器，移转与农民协会接近的绅士及其他进步分子手中。我们必须在此种移转的过程中参加活动，在团丁中设法施行政治宣传，使之减少为地主阶级利用敌对农民的思想并表同情于农民协会，渐次归到农民协会手中。

4. 全国农协会提出农民自卫军组织法，请国民政府颁布。

5. 应使国民政府照各省农民自卫军状况领取或廉价购买枪弹。

6. 各级农民协会，应一律设置健全的农民自卫军部。

7. 中央及各省的军委（未组织军部的应即组织），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军委讨论农民自卫军问题时应与农委开联席会。

8. 应有计划的经常的宣传□□□□□□□□□□武装之残暴无理，农民应即建设自己的武装，以保障农村革命的胜利。

(四) 组 织 问 题

农民协会之组织，一开始便含有与乡村中旧政权对抗之第

二政权的性质——这一层意思，应当十二分的注意。农民协会在运动始起的时候，不论是减租减税或减息，不论是武装的争斗，总之都是反对豪绅大地主的斗争——亦就是反对军阀的斗争。固然阶级分化不胜清楚的地方，小的豪绅会联合在协会或红枪会之内，共同反抗军阀及当地巨绅。但斗争稍稍发生，小的豪绅便要反动，便要转到一般农民联合乡村中小商人、小学教师等而反抗豪绅大地主的阵势。一般农民之中自然是贫农，和地少的自耕农，无地的佃农雇农，以及游民群众，占中坚的地位。所以农协的组织，应当以贫农为中心。但是又不可以游民为唯一的基础。而应以佣农等耕种田地的贫农为其基础。经济落后的地方，小工业及小商业并非与农业有明显的分化，那就同时要吸收这种分子到农协之中，至于中农富农也不用排拒——斗争的过程往往使他们自愿加入农协——只须农协机关（执委会）里巩固贫农的领导地位。应竭力引导本地真正农民参加农协机关，愈多愈好。农协会在自治政府未成立之前他是乡村中的第二政权，亦就是乡村中革命分子的团结。乡村政府建立之过程中他居于领导地位。乡村自治政府既成立之后他是政府的中坚。事实上等于指导政府的组织。共产党因民党之党团经过农民协会而指导乡村政府——农民协会便成了更扩大的国民党，他在中国之政治的民权化的过程中占着非常之重要的地位。

（五）联合战线问题

乡村中之联合战线，当以贫农为中心，领导□□□□富农并吸收小商人、手工业者、小学教师、进步的知识分子；同时，对小地主革命军官让步。农民协会对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须尽量拥护，领导他们向大地主土豪劣绅斗争。在北方

的工作，须特别注意于领导富农及知识分子（小学教师等）一同努力作反军阀的运动。在蒋介石统治之下，小商人及智识分子均有暂时被蒋介石诱惑的可能，宜尽量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以暴露蒋介石欺骗民众的罪恶，以强固农民斗争的联合战线。在湘鄂赣三省亦须联合小商人及知识分子，使其坚决的站在农民方面。再须宣传土地问题之解决，不但对贫农有利而且有利于乡村中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也只有他们和贫农联合攻击豪绅大地主，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保障他们的利益。

当富农小地主对农村革命尚持怀疑，甚至恐惧的时候，农村革命之中心势力的贫农，固不可不去推动他们，以实行的行动去领导他们，使他们一同尽力于农村革命，但要注意他们的利益，决不可以使他们站在反革命的方面去。北方各省的初期运动尤宜注意于此。

农民必须与城市工人结合密切联合战线，具体的发生密切关系，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帮助，如经常的互派代表，遇事互相报告，互相以实相助，指明工人的敌人与农民的敌人是互相勾结的。他们双方常常各造谣言，离间工农，实则他们是共同剥削压迫农工的。

（六）会党问题

会党（哥老会等类组织）原来是被压迫阶级起来反抗压迫的组织，他们有很严格的组织，勇敢的精神，很有对于共同奋斗的义气。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机械的纪律）及其游民的性质使他们往往为豪绅所利用，他们的组织在农民之中往往很有发展，他们久受压迫，他们因农协起来在政治上也得到了自由，故他们对农民协会的组织的感情很好。农协应

取得他们的群众，这是非常必要的，假若农协排拒他们，则他们在旧式的首领指导之下是有被地主利用成为法西斯蒂的可能。我们对他们应该有积极的很好的宣传与训练，同时须有具体的部分解决乡村游民目前迫切要求的方法，以及国民革命对于他们的政纲，使他们能明了本党能代表贫苦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农协中不应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会党。可介绍会党分子加入国民党，会党中有阶级觉悟的应介绍加入本党。凡会党的行动与农协冲突时，应设法调和，纵使证实其为受人利用而反动，也应只惩处其首领，不要傍及群众，以防遇此被压迫之贫穷群众都无路可走更形反动。就是攻击其首领，也不宜操之过激，只宜以具体事实暴露其首领不能彻底为农民谋利益的罪恶。不能放任他们使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领袖之下，更不能放任他们游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来指导农协的运动。对红枪会问题亦是如是。

（七）国民党问题

从前农民对于国民党往往不愿意加入，土豪乡绅又往往利用国民党党部的组织，以打击农民。以后对于国民党由乡村直到城市的党部，都应领导农民群众加入。我们党经过国民党乡村党部之党团作用去指挥农协及自治机关的工作。乡村农民的国民党党部应成为国民党左派的基础，在政治主张及策略上，都应当从下而上的给上级党部的左派以建议而督促之实行。至于国民党的农民部，第一，应站在党的地位给予农民运动物质经济的帮助；第二，在形式上予农民运动以指导，在农村中宣传国民党之革命的农民政纲。国民党农民部对于农协并非统属的关系，须使农民协会的整个系统，俱置于全国农协之下。但

如国民党，欲以上级机关的态度命令农民协会则亦不宜加以直接反对，而应辨别其政策之革命与否，加以纠正或敦促。农民加入国民党后应注意向其宣传国民党政策及左右派之分别，使农民的政治观念进步，这样，才不致如现在有许多地方农民反对国民党，又有许多地的农民以为凡有国民党的名号便都是革命的。

（八）共产党的发展问题

第一，应在贫农中间努力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第二，要用党团指挥各种农民团体，对于农运工作尤须有精密的计划。例如每级农民部，对于该县农运工作至乡应有每半月的计划，而省委农民部则至少应有每一月的计划——应根据第五次大会决议案及中央之政策，加紧努力地为土地革命农民政权而奋斗，自然应当有系统有组织的逐步筹划。

（九）青 年 工 作

C. Y. 中央最近已有具体的决定，曾经 C. P. 中央农委的审核，兹从略。

（十）协 作 社

协作社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现时已是非常之重要。所谓协作社，不必一定照着“西洋学院”的组织而要实现其主要的意义，帮助贫农脱离重利盘剥及奸商之垄断居奇等种剥削。所以各地可以就原有的组织，或农民自己的习惯为改良之形式，不必尽同。必须造成协作社的人才，研究各地农民自己的经济，

从速创办协作社以补助农民的经济斗争——尤其是信用合作社。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关于协作社之决议草案

1. 在一国城市中任何生产权力均在工人阶级手中时，那合作社的组织可容易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2. 在一国城市中任何生产权力，均在资产阶级手中时，那末合作社在经济方面可以说完全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了。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可以利用他来作改良派的宣传，以愚弄小资产阶级，他们用合作社的机关为借口说凡此便可消灭资本主义，以取消工人阶级的奋斗政策及其阶级斗争。

3. 国民革命的发展，使目前中国的近状到了介乎一、二之间的一种情形了。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末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如此方法，才能帮助农民消灭在农业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可以使农民于乡村阶级分化时减少压迫。

在目前中国民主革命尚未完全得着胜利保障之时，合作社之工作应该采如下之方式：（一）利用合作社为强有力的经济武器以反抗奸商重利盘剥者的压迫，此种经济的武器可以成为改良贫农一部分生活的工具。（二）合作社应当形成一种引导农民加入农协使其参加乡村斗争的组织形式。（三）合作社应用全力以帮助农协的发展，合作社成为一组织各种农民的形式，乡村有许多手工业者，他们本身的利益自觉农协尚不能把他代表出来，但利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则可引导之参加农协。

4. 在组织许多大规模合作社之前，应向农民宣传合作社

的意义与其重要，同时并须作提高农村文化的宣传，所以协作社可起首组织的地方必须在那有强有力的农协组织的地方，因该地之群众有合作社之要求。换句话说，合作社是要跟着农协的发展而发展，同时须受农协之领导。

5. 在阶级的地位上，我们收集合作社的会员应采取与农协收集会员的相同标准，如此才能抵制和操纵合作社乡村的资产阶级及压迫者之影响，同时合作社社员虽应采用农协收集会员的标准，但并非只有农协会员方可入合作社，反而言之，合作社必须成为引导中农、贫农加入农协之一工具。

6. 当北伐军继续向北方军阀进攻，帝国主义者向华侵掠（如英国集中实力于上海等）时，合作社只能得着政府很少的帮助。因此，合作社的经济，需自己独立，只有向乡村募集的方法，所以在乡村各公款内，农协应当拨一部分作为合作社的基金。在目前情形之下，我们所要组织的合作社当一方面要费少许的经费，另一方面又要成效很快，这种的合作社即为消费合作社。在那个有农产品输出的乡区（棉花、丝、茶等）我们可以组织交易合作社。在目前最困难组织的为农民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合作社，需要多数的金钱、机器与较高的文化。在乡村所有的修地筑堤的旧式社会，农协应当使之根据合作社的意义改良。在乡村手工业区，应当组织为他们组织购买原料、分卖出品的合作社；此最后的两种合作社的程式可说为达到生产合作社一种最近的组织。

7. 组织合作社的方法，应当在城市或省会之地建立中心的合作社，以便在较便宜的市场，购买生产品以帮助农民。所以应在有二三十小合作社组织的乡区组织一中心，成为较大的合作社，省会亦然。

安　中　原[2]

宗　容　明[3]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缺“第二”。
〔2〕中共中央的代号。
〔3〕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

PDG

中国共产党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亲爱的同志们：

自“二七”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和本党携手奋斗，已经四年多了，这四年当中，中国工人阶级和本党同志为革命奋斗而为帝国主义军阀及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所屠杀者，遍于全中国南北各省，积尸可以成山。尤其是最近封建资产阶级的代表新军阀蒋介石及其党徒白崇禧、李济深、夏斗寅、许克祥等在南方之屠杀，旧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在北方之屠杀，更为残酷。本党李大钊等同志们在北京之死难，汪寿华等同志们在上海之死难，邓培、李森、刘尔崧等同志们在广州之死难，杨昭植等同志们在湖南之死难，其惨烈当为中国工人阶级及本党永远不忘之事。

中国革命愈向前进展，帝国主义愈惊恐发狂地教唆其走狗向中国革命的工人阶级及本党横施屠杀；帝国主义愈惊恐发狂，教唆其走狗之范围愈扩大，不独旧军阀受其教唆，即曾经投机混入革命之新军阀及一切游疑中立分子，亦受其教唆，转过头来，戴着革命的假面具，向工人阶级及本党毫无顾忌的摧残。

工友同志们！现在和革命势力不相容的，不只是帝国主义及其老走狗张作霖，也不只是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蒋介石，凡是被革命高潮所吓退而接受帝国主义教唆的人，都会自觉的或不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二〇〇期。

自觉地走到反革命那边去；所以中国革命成功的担保，即中国民族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剥削而解放的担保，乃是工人阶级及本党同志的血。

现当革命的高潮中，反革命的恶潮亦日益增涨，造成中国革命运动之一大危机，革命的工人阶级正在此危机中召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有非常严重意义的。

工友同志们！我们在第四次大会时的力量固然比前几次大会时的力量增加了，但是敌人的力量也同时增加了；因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不但是老军阀，现在又加上了大资产阶级及大地主的代表新军阀。我们今后向他们作战的力量，不但要集中工人阶级自己的势力，而且要领导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结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向共同的敌人作战；因为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样是受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及大资产阶级之压迫者，这三个阶级都是中国革命的势力。所以此次大会之中心口号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工友同志们！今后革命的争斗将愈加艰难困苦，我们须愈加努力。本党庆祝大会之成功，同是预祝大会后全国工友们和本党携着手奋斗到底，以获得我们的最后胜利！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万岁！

全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万岁：

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万岁！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对政局宣言*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全国的工人农民及一般革命平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革命之危急存亡的时候，对于你们发表宣言，意思是要解释明白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以及本党为保持民众之革命胜利而奋斗的政策。

一年以前，国民党的政权还不过在广东一省，而在此之前，甚至广东省内还有许多区域，和中国其他各地一样，都在反动军阀的掌握之中——这些反动军阀，继续不断的自相攻战，极其残酷的压迫平民，将我们中国零星分割而出卖于外国帝国主义，维持着垂死的封建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使几万万民众永久的处于奴隶地位，永久的穷困饥饿。然而从国民党改组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指导之下，造成了广东的革命基础；从广东向北发展，得着全国各地革命平民的响应，居然将许多巨大的军阀逐一的打倒——这些大军阀的武装力量其实比国民革命军要利害得多呢。吴佩孚的势力被歼灭于两湖，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也被打败，最近张作霖又在河南败绩。中国之大部分，已经脱离旧时军阀的统治，民众应当可以自由的组织起来，以求自己及中国之最后解放。革命运动的力量，已经有伟大的表演，甚至于列强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向群众的猛进让步：例如英国在汉口、九江的租界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二〇一期。

竟不能不交还中国，并且始终不敢公开的实行其久已准备的武装干涉。这种革命胜利的原因何在呢？何以军阀帝国主义不能不对于革命民众的进攻而退却呢？

革命胜利的原因，当然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亦不在某某领袖的善于外交，而在于革命得着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中国革命之伟大领袖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明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之进行当在此三大政策领导之下的时候，国民革命日见其巩固发展，而成为革命敌人所震骇失措的伟大力量。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内军阀的压迫，已经几十百年，如今走上了自由解放独立的道路，眼见得可以得着经济发展的前途；所以中国的农民，本是几百千年受豪绅地主的压迫；中国的工人，本是在囚徒牛马似的条件之下工作；中国的贫苦市民、手工工人以及小商人，本是异常的贫困，日趋于破产——他们这些极大多数的中国平民，在这一时期之中都奋起斗争，力求自己的解放。民众在三大政策之下得以勇猛前进，捶碎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之锁链，而锻炼解放中国的武器，以力争极大多数人民之民权，以解除中国之束缚，以消灭中国经济发展之障碍。

然而一方面固然逐步的得着胜利，中国劳动民众固然警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争，而别方面，平民之明的暗的仇敌，也就觉察得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他们的手段和方法有许多种。外国帝国主义者派遣军舰军队到中国，驱使他们的爪牙北方军阀作战，并且挑拨离间国民革命军的长官。以前军阀是公开的反对国民党的，后来看见不能够反对革命的伟大旗帜，于是假意归顺革命，戴起国民党的假面具，想在国民党内部来从事破坏革命。至于豪绅地

主，贪官污吏，买办阶级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更是用尽方法压迫工农运动，或是公开的用武力来摧残，或是秘密的用挑拨离间造谣诬告的手段来破坏。资产阶级呢，他以前是和群众运动同路的，随后看见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吓退了，于是宁可跑到革命的敌人方面去，只要能够镇压工农运动——可见中国资产阶级，宁可心甘情愿的替帝国主义者当奴才，婢膝奴颜的求他们谅解，却不肯牺牲一个大钱来改善工农的生活！

再则，国民革命军中本来有许多长官，冒着国民党的招牌而自己扩充武力，搜括金钱；到后来，他们看见民众的胜利将近实现，各种各式的军阀制度都要完全灭亡——就公开的背叛革命，同着资产阶级共同积聚力量，以攫取国民革命的指挥权，压迫工农，而与人民的仇敌妥协。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的叛变，便是这种阴谋的第一步，然而没有完全成功。这是因为北伐的胜利解放了中部中国，民众运动积极的自动的发展，表现伟大的新的力量，足以打击军事独裁的暴力。然而蒋介石的野心不死，他到今年三月间，便公开的叛离国民政府，夺取东南诸省，自江西至上海沿途屠杀工农，而把持国民党于自己掌握之中。

这就是对于国民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打击。

当时国民党的领袖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对于这种阶级分化的现象，持甚么样的态度呢？那时国民党指导机关的革命性还没有用尽，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也还有些前进的勇气。今年三月间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就足以表示国民党的指导机关，还能够依据于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以抵抗反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完全赞助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使他易于团结大多数人民而与封建资产阶级及反动潮流相奋斗，并且中国共产党决定自己的党员应加入国民政府，以分负武汉国民党在此艰巨时期的重任。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许多议决

案，形成我们联盟的政纲。这些决议是：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实行乡村自治召集省民会议以实现国家政权之民主化；为赞助工农经济状况之改善而设立农政部、劳工部，以便制定改良社会之法则，而实行之；坚决的赞助工农群众运动，以及其他。

所以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足以悉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决心抵抗反动进攻，而且愿意广大的发展工农运动以保障国民革命之向前进展。

国民党既然有这种决心，共产党自然更加要与国民党巩固的联合，而为双方共同的任务奋斗。共产党派遣自己的党员加入国民政府，同时当然认定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将要很诚意的履行自己第三次全体会议所规定的责任，当能和本党党员之参加政府者共同努力于革命斗争之进展。

然而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

正因为人民相信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那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反抗封建余孽列强侵略的工农运动，乃有如此迅速和广大的规模。两湖农民有好几百万都奋起斗争，反抗封建阶级的统治，反对豪绅地主贪官污吏及军阀，要求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标语之实现，要求平民政权之建立。城市中的工人，也努力的起来推翻残酷的牛马似的劳动条件。如果国民党中央真能依据民众运动，那么千余万有组织的农民，二百八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必定要成为国民革命之极巩固的基础。那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必定要受着致命的打击，而不能复活。然而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不愿意如此！国民党中央与垂死的封建阶级及

资产阶级的关系，却比他与中国新兴的革命力量的关系更加密切些；因此，国民党的许多领袖消极动摇犹豫得不堪言状，其结果，领导权又落在反动军人之手。

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草案，当然更不说实行了。而劳动法的制定与公布更遇到许多阻碍。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照理应当注意中国平民之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手工工人的呼声，但是他却不是如此，他专听豪绅地主出身的反动军官——这些反动的军官是时时反对农民运动的。今年四五月间，正是应当实行社会改良以扫除城乡封建关系之根株，而与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的时候，正是应当武装工农以抵抗反革命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国民党领袖及国民政府反而发出许多训令宣言，专以限制工农运动，更使动摇犹豫的分子转移于反动派方面去，并放任反动派使能自由的准备进攻革命。反动军官利用这些犹豫动摇的政策，而公开的反攻民众运动。反动的恶浪陆续继起：蒋介石走狗的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夏斗寅进窥武昌，许克祥实行政变于湖南，以及最近冯玉祥表明反对工农群众运动及共产党。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

现在早已到了国民党中央应当选择正道的最后时机：究竟是同着革命前进还是同着反动后退！直到最近，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仍旧是不肯决然的同着革命前进，仍旧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动不受任何惩罚。对于湖南的反革命政变，没有任何的处置；国民政府反而默认这些政变而加以掩护，与以合法的根据，使反动派得以完全摧残工农运动。湖北夏斗寅的反动势力并未歼灭，其实很有充足的军力足以办到。而湖北各县的反动派，却摧灭了许多的农民协会。国民政府不但绝无肃清反动的办法，反而事实上帮助反动派的进

攻——因为政府的政策是解散或改组工农团体，这些工农团体的罪状，就是努力牺牲以反抗封建制度而已！

这种情形是国民党中央多数领袖公开的赞助反革命军官，一般都是动摇妥协的政策，其结果，使反革命在武汉首都，也筑下巩固的基础。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

本党的观察，认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多数领袖的这种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可使宰割中国的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及其他军阀的旧统治，仍旧一变而为瓜分中国的蒋介石、冯玉祥、许克祥等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中国仍将继续受着残酷的剥削，革命将受普遍的摧残，民众将更受无限痛苦，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将要高奏凯旋，帝国主义的统治更加可以稳定。中国共产党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中国共产党反对这种政策，因为对于他，民众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几千共产党员，在革命军进攻武昌、南昌的时候，在攻打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时候，在广东的田间，上海、广州的街市反抗蒋介石派叛徒的时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动军官的时候——战死的战死，被残杀的被残杀，凡此一切已足证明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就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抛弃劳动民众的时候，亦是如此。

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一切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革命平民，不论是国民党员或共产党员，都可以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与你们共同奋斗到底的，必定能够引导民众经过革命的一切艰苦时期，去达到最后的胜利，国民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必将努力奋斗，反

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及资产阶级完全攫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他们这种阴谋和暴行是使革命破产，实在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因为抛弃土地革命，就是抛弃消灭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而封建制度不消灭，帝国主义的压迫是决不能推翻的。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力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实行关税自主，解放中国。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的统一，建立地方及中央的民权主义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将要反对一切封建余孽，力求革命之完全胜利，以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发展。

中国共产党将要更加努力，以实现并巩固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及苏联之真正联盟。

中国共产党更将继续进增工人利益的斗争：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的严格确定，改良劳动条件，救济失业工人，保护女工童工，力争工人罢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及工人之武装自卫。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解放农民之斗争：地主的田地无代价的交与耕种的农民，保护小田主的田地享有权，不没收的田地当实行极大限度的减租，废除苛捐杂税陋规苛约，改良雇农之待遇增加其工资，解除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之武装，推翻其政权，力争农民武装自卫之权，建立乡村自治，限制高利盘剥，设立农民合作社，要求国家以充分的经济辅助农业，并实行拨款借贷于农民。

中国共产党亦将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废除一切直接间接的苛捐杂税，制定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反对新旧军阀阻碍商业交通，保护本国工商业以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

迫，反对买办高利盘剥者之剥削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更将为兵士的利益而斗争，要求兵饷按时发给，反对克扣兵饷，要求改良兵士的待遇及生活条件，反对新旧军阀牺牲兵士的生命而从事于争权夺利的私战，主张兵士退伍后应由国家发给土地或予以工作，使得从事于和平的生产事业，对于归入革命营垒的所谓土匪游民亦应当如此。

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如果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真能实行这种革命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制度及反动派的阴谋，那么，中国共产党必以全力赞助这种真正革命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永久认为革命的利益、民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较之保存某种政治联盟领袖结合高出十倍。中国共产党不能放任背叛革命的军人以及犹豫骑墙的政治家，冒充国民党假借孙中山先生的旗号以自文饰。中国共产党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民族解放、民权政治、民生改善的三民主义，联俄、联共、赞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之遗训。所以中国共产党，必定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

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光荣的旗帜永久是在革命的民众，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群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中国几万万的民众始终要认得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始终知道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民众的力量始终要战胜一切反动叛徒的野心，而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

（一）中国革命之意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最近事变完全是证明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之观点，更明显的证明了列宁对于中国革命的国际作用之预言。

伟大的中国革命将更成为意义重大之动力，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之全部组织及其最重要的国际的中心。

因此，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之政策，是掩没中国革命意义之政策，是蒙混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意义之政策，是毫无内容的口号，和平主义的半截行径之政策，直接为压迫中国革命的屠杀战争作辩护（陶姆士 Thomas，麦克唐诺 Macdonald 之徒）——是帝国主义者的直接帮凶。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革命之重大的国际意义还要加大，正因为帝国主义要实行压迫中国民众之反革命的强盗战争，帝国主义军队已经集中中国（外国军舰，外国步兵，日本事实上霸占满洲，英美等国事实上占据各重要通商口岸等），他们这种政策与他们向苏联挑衅的政策同时并进的。

因此，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领袖对于中国革命之具体态度——就是积极在思想上准备大战，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掩饰其社会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以为，一切政党及其他组织，凡自命为工人政党

工人组织者，如不坚决反对干涉中国，仅仅鼓吹消极的态度，以麻醉工人阶级之注意力，则客观上（也有主观上的）是帮助帝国主义。这不仅是帮助帝国主义去绞杀中国工农，同时巩固帝国主义制度，而且是帮助帝国主义去准备压迫苏联的战争并普遍的准备新的世界大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用最积极的手段拥护中国革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反抗，以阻止军队军械之输送，最积极的与干涉中国奋斗，是一切支部的义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向无产阶级及劳动广大群众，解释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与作用，解释反革命的干涉中国与准备新战争间，特别是准备反苏联的战争间之关联，以及与帝国主义在本国内进攻工人阶级（英国的反工会法，法国的军事法，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恐怖等）之关系，这是一切支部的义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百折不屈的揭破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之勾当，揭破他们步步和帝国主义勾结，对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捣乱行径，这个工作也必须同时进行。

（二）民族革命运动的危机与中国的新形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中国革命中事变的进展，证实了共产国际最后（第七次）扩大会议之革命动力的估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尤其认定事变的经过，完全证实了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于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联合战线转到反革命方面的诊案。

这个过程的表现是蒋介石及其他军事领袖的反革命政变，是右派离开国民党后组织南京政府，假借国民党组织，成立他们自己反革命的组织。

蒋介石政变，爆发了中国一种普遍的新政局，产生了主要

阶级力量之新离合。蒋介石所掀起的政变是各阶级重大的联合转变，因此共产国际的策略也要从这新形势中出发。

企图与蒋介石或国民党右派妥协之任何尝试，必会变成直接投降蒋介石，显然背叛中国革命的利益。

资产阶级与其军事领袖背叛革命之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工农群众运动之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之胜利，他方面在于帝国主义联合压力之加大。民族资产阶级看见群众运动发展，看见那革命的阶级要求与口号，必然要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不愿革命继续进展——他也真这样做了。这样一来，民族资产阶级便离开了民族战线，跳到反革命的营垒去。革命虽有部分的失败，虽受了蒋贼之徒的叛变，但是走进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的联合分裂了，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同时加大。

在中国革命的进展中，那已告终结的阶段的特征，在乎两个营垒对峙：一方面是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与买办阶级——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营垒，另一方面是民族革命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的营垒。这个阶段有由两营垒对峙变为三营垒鼎立之趋势，划去资产阶级，使之与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农民之“左派联合”相抗。

目前的局面，正以此三派鼎立为其特征。蒋介石屠杀工农，但仍反对北方军阀。

然而战斗的全般逻辑，仍将变三派为两派，为新式的两派，因为蒋介石、白崇禧等所领导的大资产阶级必然日与封建反动的领袖及外国帝国主义接近，以促成这个过程。

中国革命的危机与社会阶级力量目前的组合说明并证实，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革命属之，只有这样，才可说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只有在反对已经反革命的

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彻底的民族自由斗争不仅与发展工农群众运动或土地革命的要求毫无冲突，而且要直接以下层广大民众奋起推翻帝国主义之革命运动的扩大为前提。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在革命的过去阶段中，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完全是正确的。仅拿北伐战争来说，他遍处扩大了工农群众运动，工会、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已可为这个策略在历史上的辩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认为，主席团同时指令揭破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机关中战略上最重要的地位，以孤立国民党右派之势，而集中视线于群众等，这样做的是对的。

同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主席团在蒋介石事变后所即刻发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内，对于蒋介石叛变所持的态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复提明，蒋介石政变及其表现的剧烈的阶级转合，是将来全盘策略之出发点，资产阶级既背叛了民族革命运动，成了反革命的积极势力，不能再与他统一、妥协或联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内部问题之路线，是直接由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在华政策的态度演出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口头上是赞成上海工人的，实际上，把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间划条鸿沟，反对中国工人的先锋——共产党人，反对民族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此他们是赞成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联合的胜利的。正统社会民主党与黄色职工国际愈趋于拥护蒋介石之途，联合黄色“工人组织”，希图以反革命的工会代替革命的工会。国际少数主义诬蔑共产党人，不说他们分裂了中国革命运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这样说），便说他们拥护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不力（这种中伤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发出

的），而实际上，他自己不仅成了帝国主义的盟友，而且是他那中国通信社人的把兄弟——南京那伙工人阶级刽子手的把兄弟。

（三）中国革命的部分失败与反革命的主要力量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政变（上海、南京、广州等处），是中国革命的部分失败，相当的加强了反革命的联合。

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若说这个失败便决定了革命的全部命运，这是错误的见解。

这见解之所以不正确，仅举一端便可明了。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大敌，而置帝国主义势力与资产阶级间之关系不顾，且同时看轻了劳动群众伟大的无间的运动。要晓得帝国主义用尽手段向革命进攻，在民族革命战线中，一切动摇分子中间，布满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反革命的策源地不得国际帝国主义的保障，蒋介石的全副力量早被胜利的革命军打得粉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一切支部的必要任务，是向工人阶级及农民说明事实的本相，要知帝国主义的军队事实上占据了全中国的工业区域，正是中国反革命的主要力量。

那比较弱小的中国资产阶级，若不直接间接受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拥护，必不会成中国革命之大患。外国武装干涉者集中战斗力，封锁海港，困围革命的中心，接济反革命的军队，离间破坏革命的武力，用尽外交上的压迫手腕。在革命政府下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势力，驱策外国和土著资产阶级组织生产上、商业上、金融上种种怠工封锁的政策。

至于帝国主义之狂暴猖獗，以扑杀工人，扑杀共产党，压

迫农民运动，孤困苏联，尤须特别提明。

但是革命虽有部分的失败，而另一方面，过渡于更高阶段的发展，更有力的动员群众之发轫，农民运动之扩大，暴动武装队之组织，此项与日俱增的组织武力屡次战胜了叛军，虽然反革命的恐怖猖獗万分，而工人阶级的组织继续保存，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之增大无已——凡此种种，都是中国革命继长增高之主要征象。

武汉国民政府及左派国民党，就其主要的趋势看来，是城乡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之表现。虽然某个军官某派军官以及国民党“左派”某个政治领袖某派政治领袖有继续叛变之可能——而且必然不可免——但是阶级斗争的进展，必将调动群众；此群众运动正是将来胜利之担保。

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取消派意见根本错误，这派意见竟以为中国革命目前的危机是胜负已决的失败，必然造成一种国际的局面。这种显然错误的意见，只会成为破坏无产阶级队伍的工具；在这共产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特别必要的现在，这种破坏组织尤其危险。

（四）组织工农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中国革命中艰巨的困难，尤其是因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武装干涉或他种干涉，以及中国国内动摇的社会成分叛卖革命投降敌方所生的困难，造成了目前斗争的条件；为战胜这种困难计，必须广大劳动群众加入斗争始可。只有这些群众参加积极斗争，才能造成一种政权，打退内部的反革命及帝国主义的干涉，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造成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上之先决条件。

要想引导群众加入斗争，只有在乡村实现土地革命，在城

市满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才有可能。毅然取消缴纳富豪之佃租，重新分配土地，没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等之一切田产，禁止高利契约，取消贫农受重利盘剥之债务，大减赋税，课税摊派于富豪之家等等——这些口号必须在全国，特别在武汉政府统制区域内实现出来；必须拿这些口号推动群众，使之反对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北方军阀。

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使千百万农民从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站在前线，指导这个运动，在目前最为重要。同时共产党必须在政府内努力，使政府促进土地革命之暴发扩大。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在目前发展的阶段中成为实际上工农革命的组织政治中心，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机关。另一方面，只有在这种从上面和下面协同实现土地革命的政治之原则上，才能在坚固的革命的基础上，造成真正可靠的武力，改编一切旧有的军队。

在城市中，必须设法提高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改善工人在工厂内在社会上的法律地位。其钳制工人成为毫无权利的"等级"之一切法律，须一律废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承认工人组织之权利等等。

同时必须迅速、大胆、果决的实施武装工农群众之政策。最先武装那已经有组织的觉悟的部分。此政策务须以全力使之实现。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力量，直接的，间接的，以及联同国民党左派，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在工人中极力发展党员，在城乡劳动群众中极力为国民党发展党员，必须使国民党以最大的速度成为最广大的组织——这是目前中国共产党之主要任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中国共产党极力注意一切工农群众组织须各方面的加强与扩大之必要，如职工会，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工人自卫团等，以及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乡村工人组织，农民自卫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小手工业工人，家庭工业工人组织等等。在这一切组织中，必须宣传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工人阶级之强大的群众组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否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任务，可以和民族革命之任务相互对峙。他以为，像那欧洲极左派和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这种对峙说法，没有别的作用，只有使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放弃领导权，名义上是为保护那所谓“无产阶级的”行会精神，其实这种行会精神，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变相，因此，这不过是使无产阶级成为民主派的附属品而已。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转入反革命的营垒以后，无产阶级却逐渐成为整个民族革命运动中可公认的领导者。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的中国革命，如不提高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使之成为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则必不能继续发展与最后胜利。

（五）共产党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要想把他肩上的任务完成，只有保有自己工人阶级先锋的政治面目，和那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面目划分清楚才行。

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共产党不许融解于别个政治组织之内，他必须成为独立的力量，他是一特殊阶级的组织，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是全国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的组织。因此，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政见时，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群众时，不能为外力

所阻，对于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不定，尤不能放弃批评的权利。恰恰相反，须知只有这种批评，才可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向左，才可在革命斗争中，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不可解作是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尤其是与农民断绝关系。从这点出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坚决的反对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反对那根本上必然弄到退出国民党的态度。目前提出，“即刻勿须退出国民党”，与提出“退出国民党”两个口号，一般荒唐，因为在目前的瞬间，无产阶级的政党恰要在国民党内，确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固有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在目前的情形下，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如果看轻国民党这个革命运动的特殊组织形式，实际上便是助成右派攫得国民党的旗帜，正因为国民党的旗帜是国内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因子，所以蒋介石引着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千方百计，要打起国民党的大旗前进。共产党的策略，万不可为蒋介石的机变作保障（退出国民党路线，便不能免这种结果），而要揭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是民族革命的叛贼，是国民党的叛贼，是中山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叛贼，是投奔帝国主义者的降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说民族（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阶级革命已经“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在蒋介石政变之后，便是广大的群众也明了了民族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继续进展。正因为这样，所以不能把国民党的旗帜，不能把民族自由斗争的旗帜让给民族自由斗争的叛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既要大胆的坚决的

扩大群众运动，也必要一般大胆的坚决的努力变国民党为真正的群众组织，使他包纳城乡劳动民众才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为完成其自身任务，须使其组织形式能相当适应。赶快改组，尽量接近群众，实为必要；其次，要在工农手工业者中间大征党员，容纳工农兵士手工业者之整个组织入党（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行会、军队组织、农民游击队如“红枪会”等，惟须肃清其反革命分子，以及工人自卫团等等）；国民党的地方及中央指导机关厉行选举等。

只有把定这个坚决的路线：国民党发展为真正广大的、群众的、革命民主的组织，指导机关真正是由选举产生——才能为中国民主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发展，造下先决条件。

只有把定这个路线，才能为防止那国民党左派某个动摇部分之可能的而且必然的退伍（如广州的事实），为防止那某个动摇军官及其他军事领袖之叛变，造成制裁手段。应时的揭破一切勾结蒋介石或帝国主义之动摇趋向，并在宣传煽动上采用具体办法，或竟用组织上的制裁手段，这是共产党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除维持且扩大自己党组织外，尤须极力影响国民党的行动。要想实现这种任务，必须先完全了解自己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彻底把定自己思想的政治的路线，加强巩固自己的组织，使工人同志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在工农群众中加强党的影响和党的威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在中国共产党中，恰恰对于这点有无数动摇存在；党在批评国民党的领导时，不能常常表现充分的坚决，而且在党内对于发展群众运动表现相当的畏怯，尤其是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没收土地，驱逐豪绅地主等问题上，可以看出。这些动摇，在目前阶段中特别有害于革命，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内同志，并非人人都能充分了解共

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大规模的说明中国共产党同志内上述的错误和动摇，是必要的；不然，则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相当的动摇之危险便加高了。

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工人阶级的政党站在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之前端，要最无情的和遏制此运动高涨之一切企图奋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信，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发展极速，已经做下了革命的英勇的模范，必能很快的改正这些错误，须知这些错误是由事变的异常复杂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幼稚中发生的。

（六）武汉政府，政权问题，军队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看轻武汉政府的意义，因此实际上否认他极伟大的革命作用，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就其阶级成分而言，不仅代表工农及手工业者，亦代表一部中产阶级。所以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他已经走到工农专政的路上；在阶级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赶去了那些跟着资产阶级跑的人们，战胜了无数叛变之后，则武汉政府便必然发展到这个专政的方向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武汉“临时革命政府”的活动，是必要的。那个不主张参加，或对于此问题抱一种不定的怀疑的态度，他形式上很是“激进革命”，但在实际上是重演一九〇五年俄国少数党的错误；俄国少数党那时以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不可能的，宁愿组织“极端左派的在野党”，但是实际上跟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后，摇尾乞怜。

少数党的态度的特点，正因为他反对参加革命的政府，而

参加反革命的混合政府。

参加武汉革命政府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党的混合政府，并无丝毫相同之处，因为武汉政府的确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封建制度，现在更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之大部。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同时，对于自己最亲密的盟友之不十分坚决，也要加以批评，并确定政府的政策之正确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中国党特别注意，革命政府与民众间的亲密联合，在目前实在是空前的必要。只有靠着这种亲密的联合——这种联合是特别要国民帮助才能做到的——只有坚决的打条走向群众的路线，才能永久加强革命政府的威信和地位，使政府成为革命的组织中心。

为武汉政府划定这条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实现此项任务，不扩大群众运动，没有农民革命，不坚决改善工人阶级地位，不变国民党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的伟大的组织，不继续加强职工会，扩大共产党，不造成武汉政府与群众间之最密切的联络，则胜利的完成革命是不可得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共产党人参加政府，仅仅可用这项策略辩护。不是这样，则参加政府将成为领袖结合政客勾结的戏剧，受了实际生活的冲刷，受了伟大的阶级斗争之进展，必至烟消云散。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桩任务，便要把政府中的活动和群众中的活动联结一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在目前的条件下，扩大国民党内民主化，收容最广大的群众，迅速发展各种工农的群众组织，最合革命的需要。中国发展中的特点，像革命的国民党这样特殊的组织，可以直接决定政府的成分，是绝不可忽略过去的。用国民党收容广大民众，使群众选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经过这些在选举制的基础上建设的组织，成立民族革命的政

府——这是劳动群众和革命的国家政权间联合的特殊形式，此形式适合中国革命的目前阶段。因为武汉政府统治下各省状况之不同，则地方政权的组织，在最初时期，必然采取种种色色的形式（在乡村间，“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政权以及国民党委员会政权等等）。共产党人在组织地方政权时的主要任务，便是领导广大劳动群众，领导千百万工农参加组织，组织成后，参加工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在目前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宜的；这个口号没有别的意思（在武汉政府统治区域内），只可作为布告苏维埃政权解释。

在中国革命进展目前的阶段中，即刻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必然被认为是两个政府，是推翻武汉政府的路线，是越过国民党这个群众的组织及国家的政权，直接拿苏维埃政权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但在革命的继续发展，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已经开始，则成立工农兵代表委员会即成必要，这时，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便成了党的中心口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以为，改编军队的问题，编制绝对委身于革命的队伍，军队与工农组织间之联络，建立军队中干部，改编佣兵为革命之常备军……在目前特别需要。至于武装革命的工农，编成绝对可靠的队伍，在军队内确立共产党及坚确不拔的国民党左派之影响，肃清军队中反革命分子，组织工团军，尤须特别注意。

（七）目前中国革命政策之几个策略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站在极端复杂的任务前面。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斗争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之并进，帝国主义大批军队之驻华，实际上中国之分裂为三部，经济状况及政治状况之综

错万分，帝国主义之统一战线与此统一战线内之冲突，中国各部革命成熟程度之极端参差，革命之特殊的“军事”形式，以及国民党左派内及军队内部之种种矛盾……凡此种种，都使革命在进展中，发生无数非常的困难。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武汉政府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纵横捭阖的策略，根本上是完全可用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那借口“国家政权既是非无产阶级的性质，根本上便不能用纵横捭阖的‘布列斯特’策略”的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这项意见是建筑在疏忽的理论的和政治的错误上面。

在无产阶级革命日形成熟的条件下，如果无产阶级的政党站在革命的反对派，与政府对峙，他照例是反对战争的，是赞成推翻现政府的，是绝不救济现政府的困难的。

在中国目下现有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是赞成武汉政府所进行的战争的；他既参加武汉政府，则他对于武汉政府所行的政策，是负责的；他是要尽量救济武汉政府的困难的。所以，共产党不能“根本上”反对纵横的策略。负责武汉政府政策的共产党，如果永远而且在一切条件下，反对妥协的策略，这就是说，共产党要无条件的同时向各方作战，这明是大愚特愚。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这个问题必须最具体的，拿各种具体条件去解决；这些具体条件不能够事前看到，因为交战各种势力的比例不能事前精确看到，不能绝对精确估计的原故。

这纵横策略的可用性也必须适用于政府的经济政策。政府绝不能无条件的即刻没收一切外国企业。在这里，妥协也是根本上可以应用的。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民族及外国资产阶

级在各种企业内（工业、商业、银行业）怠工破坏，产生失业，希图制造经济之紊乱与破产，政府便须没收，国有这些企业。民族革命政府不能姑息革命的敌人任意破坏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面乡政府必须采用严厉手段，改用自己的机关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帮助，经营此项企业。

何时应该妥协，何时必须转守为攻，这要就具体条件决定。共产国际特别以为，有些同志在蒋介石上海政变时建议实行暴动的策略，十分谬误。这项策略的究竟，非以暴动进攻帝国主义及蒋介石作先发制人之计，便须广布阵线，用武装力量和他们斗争。须知暴动的策略乃是暴动既发，便要采取攻势。所以有了相当胜利的希望存在，才可着手暴动。暴动是“玩”不得的。“无论如何都要暴动”的策略，不是列宁主义的策略。假使上海工人发起了广大的武装行动，则必被蒋介石帝国主义联合武力扑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鲜血，在一个毫无胜利之望的战争中，便会平白洒尽。

在中国目前一般形势看来，共产党须采用如下之一军事政治的战略：共产党拥护向北发展之军事计划，而同时无条件的加深武汉政府统治全区内之农民革命，极力破坏蒋介石之后方与军队，以图扑灭此贼，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也不该以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须知“向着群众”之足以克敌，在内战中亦然。加以政策正确，革命之胜利，是靠得住的。

共产党必须尽力从各方面加强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战线。除以全力扩大农民革命外，尤宜同时保障小资阶级劳动财产不受侵犯，并助其反抗高利资本等等之斗争。除这样去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的真正革命势力之联合，并以全力团结这些阶级力量在武汉政府管区内组成强有力之组织外，在反革命的区域内，共产党也必须站在群众运动的前端。

自觉组织到农民协会，建设强大之秘密组织，组织且领导

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准备群众行动，以及兵士中的工作，这些统是党的最重要的任务。

（八）共产国际之各国支部与中国革命

从中国革命之一般意义作用出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

一、国际大部分支部未曾充分了解这个意义，在拥护中国革命的工作内，表现积极之缺乏；

二、参加“反帝国主义同盟”之共产党人同样表现积极之缺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加速纠正此项错误，极为重要，因此建议于各支部，种种方案宜在下列各项严厉执行：

甲、报纸上的煽动和宣传；

乙、职工会内及其他工人群众组织内之工作；

丙、在各国殖民地内及依附其宗主国之各国内的工作；

丁、预备派往中国之军队内的工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各党部注意，必须加十分严重的准备，不仅口头上，要实际上阻止军队军械运往中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令各支部担起这项任务，在帝国主义军队中最积极的活动，并宣传这些军队直接转到中国民众革命军队方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令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制成上项之各种具体方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支部以弟兄的敬礼，誓以全力拥护他伟大的革命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

——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

（一）近年农民运动的进展，已表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这一革命在中国目前已经受了一个挫折，其原因：（1）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不强健，换言之，即无产阶级主观上的组织力尚不能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这一革命联盟；（2）工农武装没有建设；（3）我们党动摇不定政策的错误；（4）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所谓革命军的阶级性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不能担任一新的历史的使命——土地革命，他们由限制工农运动而进到反对、屠杀工农的整个的反革命，这种叛变是历史的必然，证明了革命的深入，丝毫不足惊奇。我们党的责任只有坚决的与这种新的反革命奋斗，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这是目前革命的客观情势，要求我们一个新的策略上的答复。

（二）现在全国农民，整个的在新旧军阀之下喘吁地活着，十几年新旧军阀战争的负担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最大部分架在穷苦农民身上。在北方，苛捐苛税的繁重已经迫使大多数的农民抛弃土地，得不着生活；南方各省，农民的痛苦与北方无异，屡经奋斗所得的些许自由，又重新完全被剥削。无论南

北大多数遭受过度的压迫的穷苦农民（佃农，半自耕农，雇农，失业农民以及大部分自耕农），他们已经觉悟起来，到处和他们的敌人奋斗，尤其在南方自李济深、唐生智之屠杀以来，农民之反抗奋斗更加英勇而坚决。同时新旧军阀因为他们彼此间的冲突和内部矛盾，不仅不能建设一个统一的反动政权，反而一个一个很迅速的正在继续崩溃下去。因此全国的革命潮流，表面上虽似一时的低落，实际却是继续往上涨。目前的反动局面只是革命转到解决土地问题这一阶段时阶级冲突的反应。我们的党只有坚决的站在这个土地革命的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怎样开发土地革命的潮流呢？只有敏捷的认清客观情势，抓住每一个机会，提出适当的口号，领导广大的群众继续不断的争斗才能达到此目的。此时，“不缴苛捐苛税”，“不缴预征钱粮”，“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取消高利贷”，“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没收祠堂庙宇等及一切公共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新旧军阀”，“实现革命民权”，“实现乡村农会政权”，“民选县政府”，“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恢复农民协会”，“实行农民武装”，“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抗租抗税之自由”等口号，应当是开发土地革命的总的动力。

（三）在北方各省如直鲁晋豫等，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多数，他们苦于繁重的税捐日益破产，流为土匪或逃亡他省。在这里，我们要以自耕农、贫农、佃农、雇农为中心，联合一切农村穷苦民众及小地主结成斗争的联盟，反抗一切苛捐苛税，及预征钱粮，反抗一切战时的征发，实行减租“二五”，同时从这种斗争的发展进行夺取乡村政权，夺取武装以至于没收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宇庙等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及地主[1]。

在南方湘鄂赣粤等省则佃农占多数，次之为自耕农半自耕

农，佃农受地主重租的剥削，同时自耕农小地主则受军阀税捐的剥削极为繁重。我们应立即于实行“二五”减租，反抗苛捐苛税预征钱粮的口号之下实行罢租罢税，一面借以揭破武汉南京政府减租减税的伪善面具，一面以佃农自耕农贫农为中心，团结一切农村穷苦民众以至于小地主，进行严重的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夺取乡村政权武装于农民协会之下，以至于没收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的土地，以开展土地革命。这是我们现在应用全力宣传聚集农民群众力量而实现之的口号。

无论在什么地方反对超过年利百分之二十的高利贷的争斗应彻底进行，因为这是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共同要求。

（四）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政权争斗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必有夺取政权的争斗，才能推翻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才能促进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在南方各省如广东湖南，虽则农民运动的主要特点已经进到没收大地主，其实农民如果没有取得政权，单纯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依湘粤的经验，这个分析是丝毫没有错的。

所谓政权的争斗，就是要建设农民的革命民权，换言之即农会政权之建设。在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农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的政治联盟，因为农民协会事实上不仅团结了一般农民（耕地的或失业的），包括了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脱离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同情之小地主也经联合在农民协会之内。所以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穷苦农民联合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会政权。这是乡村政权的一个正确的形式，要开始在各地实现起来。

（五）根据两湖农民运动的经验，应当指出在农民协会组织上要特别注意的几点：

（1）每一省农民运动要把我们的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

或交通占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宁可为求这些区域的深入而暂缓扩大，万不可只求扩大而忘记了中心基础工作。

（2）农民协会既团结了一般农民群众，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小商人，并且在一定条件之下，小地主也包括在内，则农协各级领导机关的成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大概小地主一般的不吸取在领导机关内，此外在区分执委内佃农、自耕贫农、失业农民至少各占五分之一，在区执委内小学教师的当选是有必要的。

（3）各级农协设立妇女部及青年部，乡村儿童运动及儿童团体完全受农协青年部之指挥，农妇概加入农协，不另组织女界团体。

（六）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但是现在所谓革命军实际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军官领导之下，到处屠杀农民，武装冲突已成为农民运动中极普通的现象，因此在现时阶段中农民运动确是最严重而紧迫的问题，每一个农民运动者如果没有十二分注意这个问题而谋给予正确的答复，便等于没有准备农民革命得到胜利。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今指出几项大要的办法如左：

（1）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武装农民。

（2）勇敢的有训练的农协会员有组织的投到军队中接受军事训练，并用种种方法时时进行破坏其组织夺取其武装的工作。

（3）对团防局保卫团等地主阶级的武装，在不能即刻夺取其武装时亦采用上项的办法。

（4）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

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之下存在：A. 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B. 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C. 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5）在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万不可一开始便去攻击其反动领袖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破除迷信，这种机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众拥护的。同时如过去只知联络其领袖或借军事领袖的招牌去号召也是不能收效的。

在南方一般以“劫富济贫”为标语的会匪，在农民革命的高潮中又输入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同时他们的行动也能与农民协会接近甚至团结了在农协之下。本来他们多半是失业农民或将近破产的农民，他们的经济口号如“劫富济贫”就和“没收大地主土地”接近，他们自然是地主阶级的仇人，是城市反动军队的对敌者（在没有被他们的反动领袖拍卖以前），假使能领导他们上正确的革命的轨道，一定可以成为土地革命之有力的帮助者。但是他们的生活和环境是异常之恶劣的，他们的领袖多半是带有候补军阀的性质。因此他们得不到正确的政治的领导走上革命正轨为一定的目标而奋斗，而以“打家劫舍”为惯常生活，其行动与思想完全随其领袖为转移。因此我们要懂得会匪在农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一面又要明白他们走向反动的可能性，我们的目的便是要增进他们革命性和革命训练，使之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而成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帮助者，其方法与上项大体相同。

（七）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过去是没有能够相当的尽其领导责任的，许多地虽然能有十万几十万的农民群众的争斗，但每每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活动，而不是党的组织在那里尽其领

导职任，有些地方虽然有党的组织，但没有深入群众（都只在区协没有到了乡协），或者虽有组织而不起作用，或者便是农运负责同志忽视党的集体的领导而习于个人的活动，因此，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每每感觉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概。党在平时既不能尽其组织上积极的责任，□□时，自然更不能希望其成为唯一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如果本党的领导能□□确的在农民中建立起来，那末，第一，要使党的支部能够深入到乡农协，并真正成为群众争斗的核心。第二，党对农民的指导必须经过党团（改正过去□□领袖的错误），党团要绝对服从党的指导。第三，各省党部的农民部要□□的建立起来，对一省的农民运动每次定出一月或两月的计划，督促并□□各级党部切实执行。

安　中　原[2]

宗　容　明[3]

一九二七、七、二〇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疑有误。

〔2〕中共中央的代号。

〔3〕中共中央农民部的代号。

中共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国民党领导机关，因为湖南农民运动，实际表现国民革命是要实现土地革命，而把一切封建势力的基础摧毁，于是发生恐慌与摇动，又因为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封锁武汉，唐生智军队的反动与二六军右倾，及冯玉祥的公开背叛武汉，于是完全屈服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军阀、豪绅地主等。国民党的政策，始而动摇，对于许克祥不加惩罚，对于夏斗寅不加扑灭，既而嘉奖许克祥及夏斗寅所领导之豪绅土匪屠杀工农、摧残党部及人民团体，并且政府自己亦下令解散党部及人民团体。最近受反动军队之要挟，国民党中央居然于七月十五日开常务委员会（C. P. 未到）决定：（1）一月内召集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解决 C. P. 问题；（2）在未开会以前对于有违反国民党主义及政策，加以严厉处罚；（3）派代表到莫京商议合作办法；（4）对于工农团体及共产党员之自由，用训令加以保护。但在国民党中央除孙夫人[1]及于右任、彭泽民、陈友仁、邓演达等数人外，余均实行反动，宁愿做军阀的秘书，不愿做革命的群众领袖。汪精卫派之虚伪主义现已完全揭破。汪将国际向他提议国民党应组织两万 C. P.，五万工农分子军队之电报，做一种煽动分家之材料及投降蒋介石、唐生智之掩饰。国民政府一面下令保护工农及 C. P.，但反动军队一面摧残党部民众。中央对于此已发表宣言，攻击武汉政府之反动，声明共产党参加政权之条件已消灭，命令谭苏[2]退出政

府，但仍留在国民党内与一切革命分子团结奋斗。谭苏二同志已示威的退出国民政府。民众对此更形愤怒，即将国际电报公布在《中央日报》上每日登载。我们已发表对此电报之答复。孙夫人发表宣言不满于现中央之政策而避住上海，邓演达因不满汪等亦早已离汉他去，左派下层领袖除一部分受买外，现拟择一地点集会以求团结左派在党内反抗反动的与虚伪的领袖。中央对于现时武汉反动之策略如下：

1. 认武汉中央政府已完全反动，武汉不再为革命中心而为反革命中心。故我们应攻击其反动行为，披露其虚伪，不可再事拥护其罪恶。对国民政府固然不应再说拥护，对汪精卫亦须历数其改变三大政策曲解三民主义之罪恶。

2. 与国民政府合作之条件基础既已消灭，当然应立即召回国府内之党员。惟仍须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者即国民党员，所以我们与其他革命分子是真正党员，汪精卫等已不是真正信徒。我们要团结下层左派分子在国民党内组织在野反对派，反对中央的反动政策。

3. 我们现在要积极宣传反对武汉中央的反动政策，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拥护孙夫人及邓演达的宣言。

4. 要根据答复《容共政策经过》之一文，宣传汪精卫等借该电报以文饰其反动。

5. 要根据现武汉中央之虚伪欺骗政策，指出武汉政府一方面颁布保护工农及“二五”减租，一方面任由军人摧残屠杀工农占据捣毁工会农会。在两湖，应积极领导工农要求工农会的自由，立即惩办摧残工农占领工农会的武人，如此以揭破武汉政府之假面具而使工农认识其真面目。当政府不能接受民众要求时，总罢工与抗税是必要的。

6. 要积极领导两湖工人，反抗资本家之进攻及毁约，并应要求增加工资补偿因票价低落及物价增高之损失。武汉的失

业工人在十万以上，我们要领导他们向政府要求工作及救济，并向资本家要求失业救济金，如此我们一方面能使他们成为反抗反动政府的一支有力军队，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成为工会的拥护者，以反抗反动派之分裂工会政策。

7. 在国民政府领土内今年秋收时，积极做广大的减租抗租运动以鼓励农民悉起夺取乡村政权，实行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向土豪劣绅反攻，残忍地推翻其乡村政权而建立农会政权。

8. 领导城市贫苦居民做要求平低物价，纸票兑现，收回国库券之运动。

9. 我党要准备全国秘密工作，办法另详组织部通告。

安　中　原[3]

七、二四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即宋庆龄。
〔2〕指谭平山、苏兆征。
〔3〕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国民党革命同志鉴：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你们这封信，是在国民党最严重的生死存亡的危急时期，革命同志领袖对于革命的主义政策实行叛变，居然压迫工农运动与共产党分裂，这种叛变可以使国民党变成反动派工具和反革命军人的傀儡。四个月以前国民党的中央指导机关，还有勇气力量和蒋介石破裂，不使其反动的军事独裁得以摧残党权，那时，国民党中央还想和革命的工农共同前进。现在呢，背叛国民党的领袖，已经对于摧残工农运动，压迫共产党，投降封建势力，取消民众革命胜利等类行动，公开地颂扬和赞助了。

武汉政府本来是反对蒋介石之反动的革命斗争的中心，如今却是在反动军人及其政治领袖的淫威之下，变成军阀政府；中国之内，这种军阀结合的地域本有许多，现在的武汉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武汉政府现和蒋介石等类革命之公敌，实际上毫无差异，每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首先便是工农兵士以及一般忠实党员，凡愿努力继续孙中山先生四十年来伟大的奋斗事业，立志为国家民族谋解放，而牺牲的战士，都应当详细的明白：几千几万的中国同胞已经在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之中，英勇的牺牲了，他们誓死而争斗的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却发生如此现象？为什么领袖之中发生叛变的行动？以后革命的党员对于国民党的新任务是什么？

现在的领袖对于国民党的革命政策，实行怪异的改纂，却想借口于六月间发现的所谓“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之秘密文件，来解释他们自己篡改孙中山先生政策的理由。但是谁亦不能欺骗的，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可以知道这是企图懦怯无耻的巧自文饰，国民党指导机关对于国民党主义政策之叛变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很远的，决不是单单因为那所谓秘密文件而发生的。国民党现时领袖之叛变，实际是因为他们甘心代表封建资产阶级，以及市侩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市侩豪绅的代表，遇见革命的决死争斗，正是开始的时候，革命的劳动民众，正在奋起与封建势力搏战——他们却怕丧失了自己的政权，对于民众运动的广大发展异常惊惶，因此宁可背叛革命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和四个月前蒋介石之背叛革命是一样的。如今武汉的领袖实际上是投降了蒋介石！

国民党现时领袖的叛变，断非是偶然的和出人意外的事变。这种叛变实在反映中国革命中间有许多种资产阶级成分的骑墙派，而实际上终竟是反动的态度——这些资产阶级经过买办阶级而与帝国主义联络，经过地产制度而与封建势力勾结，经过军官领袖而与军阀制度相勾连。因为他们剥削工农，所以必须反对工农运动，因此种种，他们不能执行真正的民众革命，此等社会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伪国民党领袖，和民众是相隔离的。所以只想用民众运动以满足国内几部分资产阶级的私利，而使各种劳动阶级仍旧处于无权利穷困不堪的地位，他们只想利用群众做自己的工具，想踏着革命的民众兵士和党员的尸骨，去造成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不愿意劳动民众得有真正的解放，和真正的民权，他们宁可重新和世界帝国主义妥协，和封建豪绅结合，只要能镇压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之争斗，而使之俯首帖耳的服从自己，他们甚至于已经不能够继续单纯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要有反帝国主义的战争，非有

广大的群众不可，而他们——例如蒋介石、唐生智，宁可去请日本顾问，却不肯依工农运动的力量，以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情形，就足以解释国民党领袖以前动摇犹豫及现在决然叛变。

三月二十日事变是国民运动中封建资产阶级派第一次攫取国民党党权的尝试，那时伪左派的领袖就不能组织革命分子及一切力量以抗御此种反动，却任令反动势力笼罩广东，这种左派遁逃国外，不战而走。其意若曰："民众自己将会对付新军阀，我辈但须坐待成功，归来即可高居领袖地位"。三月二十日之后八个月到今年一月间，蒋介石又想用迁都南昌的手段实行政变，那时的伪左派领袖又不能立刻勇敢地决定号召民众起来和他奋斗，他们动摇犹豫迟徊不决者整整的两个月，蒋介石却正好利用这两个月的工夫，组织团结反动的势力，一直弄到屠杀上海工人而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伪左派的领袖，不肯决然的根据工农群众运动的力量和蒋介石奋斗，他们是在研究军事投机的方法，直到看见可以依赖唐生智、谭延闿等新军阀的偶然结合之势力，方才与蒋介石破裂，同时这种依赖唐生智、谭延闿的计划对于伪左派是可以预藏着一种反对工农民众的武器，以备工农民众真正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积极奋斗之时，他们可以有恃而无恐，可以转过来便压迫民众。因汪精卫等之动摇犹疑，而蒋介石得以镇压东南各省的工农运动，与李济深等相勾结，以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汪精卫等类的伪左派领袖到现在已经暴露自己的正面目了，然他们时常以空口应承，说要民众，说为民众而奋斗以及其他种种革命的空谈，巧自文饰，以掩藏其骑墙政策及其与蒋介石奋斗之不彻底。今年三月间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面上的决议案是很革命的，但是伪左派的革命领袖不肯实行这些决议案，明明规定要实行土地改革，劳动立法，平民自治等等，然而等到群众真正起来

跟着第三次全体会议所提出来的口号而勇敢奋斗的时候，这些所谓左派领袖却不仅不肯起来为民众运动之领袖，连同自己所有的政治法律的权力，以助工农运动，铲除封建余孽，反而仇视并破坏这些民众运动。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实行土地革命，等到湖南被压迫的农民与封建势力决死抗争之时，伪左派领袖便动辄以“过火”咒骂农民运动，说农民协会尽属流氓土匪，不但不协助农民之艰苦的争斗，并且奖励反动军官压迫农民。城市中工人店员斗争，也遇到他们的仇视。他们不但不惩罚阴谋破坏金融经济实行反革命的买办奸商以及蒋介石的奸细，反而在工人店员努力赞助革命而与这些反动买办奋斗的时候，迭次的对于工友店员施以抑制，放纵反革命的买办豪绅。劳动法的命运，也和乡村自治条例及土地法令一样，始终不得公布；即许有所谓保护工农的命令，也始终不能见诸实行。任令贪官污吏军事长官摧残民众，买办奸商进攻工人。总之国民党中央第三次会议虽有许多的革命的决议案，而事实上国民党领袖并未施行分毫政治法律的权力而解决工农小商人的痛苦，一面反而只以国民政府的政治法律的权力压迫工农。当这个时候，有些所谓左派领袖如顾孟余等，已经和反动的领袖（刘佐龙）阴谋举行反革命的暴乱，准备驱杀共产党员及国民党的革命分子，密藏军火于汉口日租界，并在军官中实行反革命的宣传。后来杨森叛乱，于学忠等扰乱湖北的西北境，夏斗寅进逼武昌城，许克祥屠杀湖南工农，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阴谋推翻国民政府，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国民党革命同志出江西——此等反革命举动，陆续继起，不可胜数，而国民党中央不但不征调一切力量以裁制反革命军人，却迭发反对工农运动的训令、命令、宣言、文告以助长新军阀的反动，文饰他们的反革命。这种政策一直继续到现在——七月中旬。实际上这些伪左派领袖，放任夏斗寅的叛军，使能巩固其势力而摧残十

余县的工农团体，他们承认朱培德“停止”江西的工农运动，他们自己默认许克祥的长沙政变，便能畅心如意的屠杀湖南人民，摧残工农运动，他们自己下令解散湖北好多县的农民协会。这些伪左派领袖不但不要民众，并且不要一切革命党部及党员，不论其为共产党与否？反动军人当然不但反对工农，并且反对民权主义的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江西各县党部曾被迫而停止工作，湖南省党部县党部都被解散。国民党中央对于这种事件，不但不反对，而且自己也帮着实行（如解散黄冈等县党部），这些领袖既摧残工农，又摧残自己的党部及党员群众，岂非背叛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六月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徐州会议的时候，冯玉祥公开的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等到这个时候，国民党领袖必须决定选择一条道路！或者同着革命的民众前进，或者同着反革命的军人反动。这时候，冯玉祥对国民政府提出反动要求，唐生智赴湘后，亦来两电，要求“改组”工农运动，实际上便是要求镇压工农运动，并且要求排斥共产党（如何健对于军队的排共令）。这些领袖，在群众运动有力量时候，放纵反动军人去压迫他，到了群众运动已受历次的摧残削弱之后，当然更加要站到反动军人方面去，因此，这些国民党的领袖，完全接受反动军人之排斥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等新要求。

这些情形本是最近六月底至七月半武汉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篡改国民党的革命政策的真相，而决非借口于所谓共产党的秘密决议案所能掩饰的。最近国民党领袖在冯玉祥、唐生智系的反动军官淫威之下最后的决定压迫工农运动，本此目的而与共产党破裂。现在他们要掩饰这种反动政策，反而归罪于共产党对国民党之不忠实。然而，譬如孙科，他在五月间对美国新闻记者谈话，就说：国民党要共产党员当国民政府的部长完全是为着容易对付工农运动起见，汪精卫等亦是如此见解。这算

是对于共产党的忠实态度吗？这实在是要利用共产党做压迫工农运动的工具，共产党决不肯被人如此利用，国民党的这些领袖，都正因为共产党不肯帮助他们压迫工农运动，而宁可与共产党员破裂，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工农运动政策是不肯背叛的。国民党领袖既得政权，实际上早已有了实行这种政策的可能，应当尽力进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标语及其他革命的口号。事实上，弄成了国民党领袖不肯自上而下进行这些政策和口号，却任令民众是孙中山先生主义之最好的实行家，比实际上背叛孙中山先生政策之领袖高明万倍，国民党领袖既有政权，他们早有实行改组军队的可能，使军队真能拥护民众利益。然而他们不但不进行这种“使军队成为民众武力”的政策，不但不遵循孙中山先生向来认为军阀并非革命可靠的同盟之遗训；反而痛骂共产党要增加工农分子于军队之中，并肃清背叛革命的军官，为一种罪恶。国民党的这些领袖们，既然不能了解这种革命的根本职任，既然不能代表国民群众的这种迫切的希望和要求，他们就不配僭称国民党的领袖。他们是篡窃权位，是镇压国民党革命意志的政客罢了。现在的时候，既然国民党的领袖将国民党拱手让之于反动将领专恣的掌握之中，那末要求国民党组织的民权化，使其多数党员推举革命的领袖——实在是最近理最切要的要求。

国民党指导机关之现状是如此，国民党中央已成反动军官掌股上之玩物。犹豫徘徊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使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变成反动的实行者，参与反动的行为。武汉领域之内，如今也和蒋介石的领域一样，工农运动都受很大的压迫。无论国民党中央发表许多虚假的欺人的空论，决不能掩盖许多铁一般的事实，武汉已有二十五个工会被封，湖北许多县的农民协会已经捣毁，湖南的工农运动已经被摧残，江西也曾被暂时“停止”，国民党中央已经允许唐生智及

其他将领任意驱逐共产党，国民党中央现时的政策显然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进行工农政策而实行压迫工农运动，不联合共产党而与共产党破裂，不联俄而在机关报上宣传反俄，汪精卫所领导的一切领袖也放弃了污秽了国民党的旗帜，背叛中山先生的遗训。

即使现在为满足唐生智、蒋介石的私战，对于民众这种战争丝毫都没有益处，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现在已经变成了政客的俱乐部。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称国民党领袖的资格，他们已是革命的国民党的叛徒，如果国民党不能脱离这种指导机关，这是国民党的亡党。国民党的一切同志都应当和孙夫人〔1〕、邓演达及其他革命领袖一样的明白！

如今只有决然的完全和背叛革命与党的少数领袖决裂，而团结广大国民党员群众于革命的政纲之下才能救党，使国民党的旗帜不要变成反动的旗帜。革命的国民党的政纲是什么呢？

（一）首先便要进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政纲，以其三大政策为方法，反对所谓一民主义二民主义的叛徒，反对实际上抛弃三大政策而空言三民主义的政客，实行扶助工农、联共、联俄政策。

（二）反对背叛革命的汪精卫一派的人——他们是甘心做反动将领的工具了。努力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便能担当得起国民党的光荣的旗帜——孙中山先生的旗帜。

（三）决然的推翻封建制度的壁垒及其一切余孽。最主要的封建壁垒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地主豪绅军阀贪官污吏重利盘剥者对于农民的剥削掠夺制度，只有实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才能肃清封建制度的关系，要实行这种口号只有农民自己起来力争土地，从豪绅手中夺回政权。

（四）消灭城市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牛马奴隶们的劳动条件。只有满足他们要求方能造成解放劳动民众的前提，要

工农组织之完全自由，对于工农运动予以切实赞助。

（五）力争真正民主政权的建立，便能代表中国广大的群众及劳动群众。推翻压迫剥削民众背叛革命之官僚军阀的政权。

（六）取消一切军阀性的军队，造成真正人民的军队，由革命的将校指挥而不用封建性的军阀。实行武装工农。

（七）无妥协的实行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与苏联亲密的联盟，与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及工人阶级结合巩固的联合战线。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力争中国的解放与统一，反对买办阶级的影响及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

（八）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力争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及工资的增加，实行救济失业工人，要恢复一切工农组织及工会的权利——这是几年来革命运动胜利的成绩。

（九）力争一般革命群众工农团体的一切政治自由，拥护真正革命的民权的国民党，反对背叛革命的篡窃国民党旗帜的假国民党。

国民革命的胜利，真正民众的胜利，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制度，都只有站在这种纯粹的遵照中山先生学说的政纲之上方有可能，只有实行这种政纲方能辟开发展革命的道路，使大多数中国人民得到利益而不仅为各种封建资产阶级中少数高等华人博取权利。孙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真正革命的党人，应当团结起来开始为这个政纲而奋斗。

我们共产党员决心和这种中山先生的真正忠实的信徒，共同工作，同生同死决一死战。我们决不服从现在这种伪国民党中央之开除共产党分子的决议，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权僭称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他们已经违背国民党的主义政纲及中山先生的遗训。

一切国民党的革命同盟，都应当团结起来，努力救党，自

然不要放弃任何公开的可能，但是要准备着这些伪国民党领袖会竭力迫逐国民党的革命同志使丧失一切自由，而处于秘密地位。所以要准备着在无论何等环境无论何等条件之下，我们大家都应当继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伟业，努力为解放中国广大的劳动民众而奋斗，而牺牲，力求革命之最后胜利，毋使国党竟亡于封建资产阶级反动联盟之手！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即宋庆龄。

PDG

中共中央给前委的信

——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前委[1]：

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在此原则之下，中央曾训令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同时决定由前敌分兵一团或二团交由郭亮处，希率领到湘南占据郴宜汝一带，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受前方革命委员会的指挥，并供给相当的饷弹。党内由泽东[2]、郭亮、夏曦、卓宣[3]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委发生关系。除派泽东克日动身往湘南工作，望兄处即遵照此信抽调兵力，交郭亮即日率领前往目的地为要。

中　原[4]

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注　释

〔1〕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南昌成立，成员为：周恩来（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

〔2〕即毛泽东。

〔3〕即任卓宣。

〔4〕即安中原，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中央委员宣言*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急时期，幸能无大陨越。今者党国危机，更甚于昔日，故同人等不得不将最近事态之真相，与全国同志唯一之奋斗途径，掬诚敬告我全国同志。溯自去年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来，具见革命进程中仍不免有少数拥有武力之野心家，企图勾结反革命势力，以逞其借党自重之私意。当其时也，同人等顾念革命大局之利益，冀能促成北伐发展广大民众势力，则必能裁制野心家之阴谋于一日，故一年之间不惜降志辱身以与蒋中正等相周旋，未敢稍自离弃全国同志，置革命前途于不顾，一走了事自鸣清高。迄至今年春间，蒋逆中正始则欲移党部政府于南昌以遂其反动独裁之私，继则公然叛变，割据东南，勾结军阀买办，残害同志，屠杀民众。如是全国同志为党国存亡计，始发动恢复党权之运动，而第三次全体中央会议，亦于是举行，通过各项巩固革命势力之决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危而复安者，间不容发。惟此恢复党权运动，全赖全国同志之一致努力，始能与蒋逆中正以重大之打击，重振革命之前途。但唐生智等武人亦起而投机，借口拥护此种运动，以遂其倒蒋而自增势力之私，同

* 这是南昌起义当天由国民党部分中央委员发表的，署名者有些当时不在南昌。

人等明知此等武人对于革命毫无诚意，将来难免不危害党国，然亦只有根据总理遗训，使本党获得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始能巩固革命之基础。故对于两湖广大农民运动之发展，以及农民群众进于为解决土地问题及建立乡村自治之革命行动，认为不但不应加以压抑，抑且认为系本党“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渐得广大农民之认识。广大农民有此认识与运动，方能摧毁封建之残余势力，以为本党革命势力及民治民有民享之新中国取得切实之保障。不图第二次北伐出师以后，唐生智部将何键即开始谋叛，嗾使夏斗寅等潜袭武昌，暗令许克祥等发难长沙。当此危急时机，武人之与勾结者抗兵坐视不肯协力剿办。中央党部少数软弱领袖，震于反动之声势，不免动摇软化，对叛逆武人不敢毅然加以相当之惩治。同时，江西朱培德因谋与蒋氏妥协，有驱除革命分子、停止工农运动之事。此少数领袖，亦曲于优容，视为当然。冯玉祥入豫以后，更公然赴徐州与蒋逆会议，致电威胁中央罢免军队中一切政治工作人员。此少数领袖亦无裁制能力，且不能不虚与委蛇，以自乱其步趋。中央党部在此少数软弱领袖指导之下，威信完全坠失，但知仰武人鼻息，以中央神圣之决议徇其私利。于是武人之气焰大张，党与政府完全成为武人之一种工具。唐生智回湘，更任意改组省政府、省党部，并将屠杀政策推行不已，全湘忠实能奋斗之党员与农民断脰折躯者数以万计，全鄂以五千计。而武汉中央对此数万同志之被害，一则曰此为共产分子；再则曰彼辈不服从中央命令，自由行动；三则曰“耕者有其田”“应以政治与法律来解决”。今则事实显然，无可掩饰。两湖之被害者，其一部分为加入本党忠实革命之共产党员外，未加入他党之本党党员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此万数党员，均系根据本党农工决议、总理遗训，在农工群众中艰苦工作，今为反动武人如此残杀，武汉中央则加以违背中央命令之罪，其卖党卖同志，一致于

此！总理遗训谓不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今武汉中央则以政治法律保障唐生智等屠杀党员及工农，亦即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屠杀农民问题，此是总理之本意？唐生智、何键等复在武汉首都横行无忌，包围中央党部，占据民众团体，劫掠中央银行，逮捕中央委员，搜查总理夫人宋庆龄同志、外交部长陈友仁同志住宅。中央党部复在此种反动武人威胁之下提出分共之议，欲借此排斥一切忠实党员，以便于武人反革命之企图，卖党无耻，如斯其极！分共之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未能通过，彼等仍欲号召八月十五日之中央全体会议。同时在武汉及一切在彼等权力以下之各机关，已开始捏造曲解种种事实，大为反共之宣传，企图强迫中央委员通过彼等所提出之议案，以掩饰其非法谋叛之逆迹。同人等目睹此等情形，知武汉少数领袖已甘心受武人挟持，卖党鬻身。若犹隐忍不与奋斗，助成其叛逆之计划，将何以对全国同志托付之重，何以对总理与本党先烈；是以决意先后离汉。为革命与本党前途，将尽力所能及，以领导全国同志为保持本党革命的正统而奋斗。尤可痛者，汪精卫同志向居本党领袖地位，此次竟以模棱两可致受群小包围，终屈服于军阀武力之下；屈服以后，犹复巧鼓簧舌，淆乱听闻，言辞矛盾，举止反常。凡其所为，与其回国之初，迥若两人。总理临逝世时，虑党中领袖或不免受敌人软化。总理逝世不及三年，党中旧日领袖竟大半为敌人软化以去。言念及此，痛心何极！同人等顾念总理四十年造党之艰难，与全国百万革命同志期望之远大，不能坐视本党荣誉之历史为此等少数旧领袖所断送，兹特郑重申明，近日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名义所发布之一切训令决议，同人等概未同意，不能负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与陈炯明、杨希闵、冯自由、谢持、邹鲁之辈

实殊途而同归。北伐之牺牲，必须能达本党总理之遗志，拯救民众疾苦，解放工农，以发展革命势力。倘若今日新旧军阀相缘为奸，以屠杀工农，压迫民众，则不仅北伐之牺牲为无代价，其结果必仍旧造成军阀割据之局，使中国战乱循环起伏，永无止境。同人等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决不敢有所瞻徇，以贻误革命大局。全国同志在此时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尤望在本党指导之下的忠实将士，能一本总理百折不回之勇气，使一兵一卒皆能不受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之所利用，为本党真正之革命主张奋斗到底。凡我同志，丁此时艰，务宜团结一致，以为下列之主张奋斗：

（一）反对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所发布之训令决议。

（二）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

（三）共同努力为革命获一新根据地以便在新旧军阀势力之外，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

（四）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各省党部代表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

（五）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弱态度，须正确而勇猛的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召天下，唤起民众。

（六）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秕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的主张。

（七）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与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

以上种种，同人等认为皆目前急务，惟有全党一致坚决为此等主张奋斗，然后中国革命运动才有成功之望，凡我同志幸鉴察之。

孙宋庆龄　邓演达　谭平山　彭泽民
林祖涵[1]　吴玉章　于树德　恽代英
恩克巴图　杨匏安　柳亚子　高语罕
谢　晋　白云梯　毛泽东　董用威[2]
江　浩　韩麟符　夏　曦　许甦魂
邓颖超　屈　武

根据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民国日报》刊印。

注　释

〔1〕即林伯渠。
〔2〕即董必武。

PDG

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

（一）根据中央最近农民斗争之议决案，决定这个行动大纲，准备在湘粤鄂赣四省实现。

（二）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土地革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在这里党的政策需要新的变更，革命的社会势力需要新的聚集和训练。现时反动的统治始终没有稳定，农民群众满心期望秋收胜利，因为新遭了挫折，正在寻找他们新的奋斗的方略，"秋收暴动"是对于这个客观情势的适当的答案。这次抗租抗税的暴动是土地革命急剧发展之新阶段，他至少要动摇反动的新旧军阀的政权，在湘粤则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的前途。

（三）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具体的表现便是强农民建设与小地主联盟的乡村自治，及五次大会后对于国民党种种限制农民革命的训令不加反抗，反在实际上指令下级党部执行国民党之反动训令。这个错误是由党对小资产阶级的整个政策来的，现在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联合小资产阶级，这一个新的指示证明过去湖南农民实行农会专政反对乡村自治是对的，对小地主不可免的打击所谓"幼稚"、"过火"的现象不足害怕而应当积极的去领导的。明白了这个才能

不自陷于矛盾的狭巷中，而可以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

（四）暴动的战略：

（1）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

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对各地的暴动及革命的政权尽可能的联络，向反革命势力进攻。

（2）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的标准。

（3）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

（4）实行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税捐，并实行对于反革命势力的经济封锁如阻禁拒卖军米等。

（5）自耕农土地不没收，自耕农及已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应对其革命政权（农会）交纳田税，税额由农民协会决定之。

（6）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之分配。

兹将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每省具体工作抄一份于下：

鄂：湖北暴动大纲政治上给现统治者一个扰乱，使其不能稳定，牵制其对江西压迫；经济上实行四抗（租，税，捐，粮）。

其他可根据大纲拟一具体的计划。

湘：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权独立指

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

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1]（书记泽东）。

赣：1. 马上夺取乡县政权；2. 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3. 尽量杀戮土豪劣绅与反革命派；4. 积极参加革命军对反革命派的军事战争。

粤：革命军所占地方，原则与江西相同，军力暂未达到地方即起来暴动响应，夺取乡村政权，建设农会威力并实行土地革命政纲；如有可能立即夺取县政权，因此引导革命政权夺取全省。

安　中　原[2]

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即毛泽东、任卓宣。

〔2〕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记录*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迈[1]：宣布开会。在七月四日（十二?）[2]以后国民党政府背叛以前，常委之组成为特恩立迈大[3]五人，后特、恩、立到前方，现留的仅迈、大二人。在国际代表未来以前，国际曾有一训令，对中央提出许多错误，指明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并要中党开一紧急会议，指出此倾向并改组中央。后国际代表[4]到，对此亦谈得很多，并决定召集紧急会议。此会议原定七月二十八开，后因种种关系不果，直至今日才实现。今天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不过半数。此会议是一紧急会议，议程有三：

1. 国际代表报告——指出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

2. 常委代表报告——将来工作方针，过去我们与国际代表对于各种问题讨论得很多，并已提出草案。常委报告人已推

*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又称“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中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以及纽曼、洛蜀莫娃。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定秋白[5]。

3. 改组中央政治局。

今天的会只能开一天，发言请扼要。

（一）国际代表报告，并讨论此报告

在未开始报告之先，我以国际名义向大家致一敬礼。此敬礼非平常的敬礼。国际要中国共产党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将不成其为C.P.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已经很深了，非召集此会不可。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党的指导与国际的指导及群众要求差得如此之远，是非常奇怪的。

在国际中央看到的在现在中国环境中召集此会是非常困难而且是非常困难的。假使反动的国民政府知道我们在此开会，必定要将我们一网打尽的。但因非召集此会不能改正过去的错误，所以仍坚决的召集一些与群众比较接近的领导者来开此会。我们要指出过去的错误，并须使此错误为大家所认识。因为过去不但中央的指导者错误，而且各地方的指导者也错误。所以如果不将此错误使大家都知道都认识，仅有几个领袖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

国际中央决议认为，此次紧急会议不仅是讨论过去错误，还应实行改组指导机关。现在的问题，是否此会有改组指导机关（中央）的权力。因为中央与各地的隔离，今天的会仅有两个地方的代表参加。但因现处于秘密环境中，故可叫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此临时中央政治局有权通告全党，指出过去的错误及将来方针，并有权可以召集代表大会代临时代表大会。

此临时中央政治局要得到国际的同意后，方能正式成立。

在今天的会议中我们要估计过去的工作。关于此点，常委已提出一个很详细的告同志书，同时又因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报告中，只能指出重要的错误。

在未批评之先，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党过去的指导是照多数主义及国际决议做去的，则现在的情势决不如此。这并非看过主观的力量而是客观的事实。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少、经验小，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其他任何阶级却都不能及他的力量之大。中国资产阶级是非常薄弱的，如无国际资本的帮助，则他久已倒了。中国的资本多在外人手中，外国资本组织了中国无产阶级。故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小。至于农民、小资产阶级虽多，但事实上已经证明了他们不能领导革命。这般农民、小资产阶级不是跟着无产阶级走便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在现在的阶级争斗中，中国无产阶级是以阶级的力量来反对中外资产阶级了，其他任何阶级都不及他有力量。

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中国革命到另一新的阶段，虽然，我们仍要指出中国农民仍不能有独立的阶级的政策，他不跟无产阶级走即跟资产阶级走。中国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中他是革命的，现在已经反动了。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农民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中国共产党两年来领导无产阶级已有许多争斗的经验，如果中央能够正确的不动摇的来领导无产阶级，则中国阶级间的关系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局面：不仅武汉即其他地方亦不会有此反动的局面。

要考察过去党的指导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四月一直到七月底，党的指导都是照着改良主义去决定他的策略。他不但对小资产阶级即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也有很大的让步，对国民党的让步，甚至失掉了我们党自己的独立性。到现在他们要赶跑我

们了，在街上杀戮我们了。我们的党为要阻止农民的运动，结果使农民运动遭了大的摧残，农民群众遭了大的屠杀。我们的党为要使工人让步，结果使工人运动大大失败。一直让步到党不能公开的成立。直到八月初南昌事变起，于是才开始有一坚决的转机，如此，我们可以断定以后的情形一定与过去不同了，这是因为我们能坚决照革命路线上走。此次事变，我们多少有点武器。因此，我们如果实行坚决的革命策略，现时的环境一定与从前不同。

拿中央的理论及实际来看，他简直是少数派的，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党，这是我们根据中国党决定各种问题而得到的结论。中国少数主义的基础是没有的，因为少数主义是建筑在工人贵族的基础上。如照中国党中央的路线上走则可说无C. P. 了。好在中国工人阶级无工人贵族的基础，故无此危机，这从上海、广东、湖北的争斗我们可以看出，从武汉工人革命性之充分可以看出。他们的行为要不是照中央的指示而是自然的表现。好在中国党中央尚无集权的指导群众的力量，这实是过去的幸事。如此会是随便召集的，或群众与指导机关的意识是一样的，那召集此会为无意义。正因为群众与中央的指导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希望很快的得到党的指导之错误改换过来。

在那封信里（告同志书）指出之主要的有中国革命之性质及在革命中各个阶级的作用。这种作用过去中央的认识可说是纯粹的少数主义的。他认为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战线中必然要有资产阶级，不知资产阶级当工人运动发展的时候必然退出此战线，这是在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明明白白指出的。现在有两条路：一是仍然维持此民族统一战线而反工农利益；一是为工农利益而反此民族统一战线，这两条路线我们要来找。我们应很坚决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中央过去造出一些少数派的理论，以为

阶级争斗与国民革命是冲突的，这我们根据上月中央给上海党部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此信中说要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可以不需要坚决的阶级争斗，并应号召第二次“五卅”。这无异乎是要拿工人去牺牲。实则工运愈发展打击资产阶级愈利害，阶级斗争愈剧烈，也就愈能打击帝国主义。

关于此问题不但对于过去即对于将来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我们要问：以后是否还应维持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中国资产阶级总想戴些假面具，蒋介石一面与日美勾结，一面又要做反日运动。现在武汉政府现尚未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虽然我们明知他将来必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现在我们应问：我们是否应帮助武汉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其实，如果 C. P. 党员来帮助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则 C. P. 党员的身份必失去。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在经济上虽有问题，但在政治上是一致的。现在他们虽与帝国主义有纠纷，但此纠纷是逐渐减少的。他们怕工人阶级比怕帝国主义厉害得多。他们不惜如何与帝国主义妥协来压迫无产阶级。所以我们不应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在利用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来揭破他们的阴谋，来达到反资产阶级的目的。我们须知道，只有资产阶级打倒后帝国主义才能打倒。

民族解放斗争还要继续下去，此重担仍是无产阶级担负。“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仍要存在，这些口号也是用来反资产阶级的。

过去党的策略是反工农的，是可耻的。比如说中央不要工人运动有过分的要求而要为反帝国主义来牺牲，并要与国民党组织强迫仲裁来制止罢工。对农民运动的策略也可说是变节的，在湖南的运动的指导可说是改良的。

现在又说关于国民党的策略问题。国民党与其他政党不同的地方是他是多阶级的联合。蒋介石四月以前的国民党的指导

作用是在资产阶级手中。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夺取资产阶级的指导，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都赶出去。此任务在国民党下层的同志都实现了，但中央的策略却不能巩固此任务，将我们独立的政策及批评国民党的权限取消。比如联席会议中的决议说：联席会议的决议不能以联席会议名义公布，只能经过国民党公布。又如说：民族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并且还有教我们在报馆中的同志不要根据我们的主义来作文章的事实。甚而至于工农运动也要国民党来做。这是非常错误的方法。在联合战线中我们应有独立存在及坚决的批评的自由。中央的主张恰与此相反。湖南则不同，他能用联席会议的名义公布决议案。列宁说：如果在联合战线中不能独立的存在不能有批评的自由，则等于出卖阶级的利益。过去我们仅依靠与国民党几个上层的领袖的联合，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一个取消本党甚至国民党的好法子。

在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有些同志说：要与国民党联合，必不能很自由的革命。好了，现在南昌独立了，我们可以独立的自由的革命了。这个结论也是同样错误的。主张退出国民党的有俄国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中的谭平山也要组织第三党来消灭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谓第三党即是少数党。甚而独秀[6]同志也说：如要留在国民党则不能有充分的表示；要有充分的表示则必退出国民党。这些都是非常不对的，至少现时不对。

南昌这次政策是对的。我们的政策不要依靠到几个国民党的领袖上，而要依靠到国民党的群众上面。现在不应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要在国民革命成功社会革命时才能提出。现既有一新的联合，我们有了过去的经验，我们要坚决的批评。只有照革命的路线不怕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然后才能巩固革命。

再讲一讲中国党中央对国际的关系和错误的责任问题。有

些同志说这些错误，国际方面应当负责任的。关于这方面，我们要问一问国际有无一指令与现在的方向不同的。无论关于哪一方面我都可以坚决的声明：国际无一天不打算将中国党的路线引上正轨的。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中央未将国际的指导传达到群众中去，比如第八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主要决议案尚未译出，许多中央委员都还不知道。即第七次大会的决议都未传达到群众中去讨论。中央委员即知道了也不过仅口头上的承认，甚至不接受。所以国际要唤起其所有的各国支部及中国全体党员来批评此错误。国际有时自然也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相信他有许多争斗的经验，我们应诚意接受他的指令，不然必遭失败。过去在西欧的党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国际有许多的经验，我们应当相信，接受他的指导，不然我们将会走到非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

至于过去错误的责任问题，中央的领袖独秀同志有许多问题，虽然决议后，他仍要以个人的意思来改变此决议。但此责任应政治局大家来负。比如对工农下层领袖的说话以为不足听，所以指导党的工农分子是很少的。因此党发生许多奇怪的理论。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得正确。

以后我们党的指导要集体化，不要族长化。党的问题要使群众知道。现在一定有人以为他自己是在党之上的，或者他要非难我们今天选出的临时政治局。我们对此应用党的纪律去与之实行坚决的斗争，然后党的指导才能巩固起来。至于其他问题因时间关系不能多说。

迈：国际代表的报告已完，他报告中包括几个重要问题：1. 阶级争斗与国民革命。2. 工人问题。3. 农民问题。4. 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5. 对国际的关系问题。此报告常委已经

接受。现在各同志可以发言，但要简单。

（休息半小时食饮食）

东[7]：国际代表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甚可怪的，唐军还仅承认只有八处军官家庭被毁，我党反似乎承认不知有多少军官家庭被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8]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中[9]：国际代表起草的信和今日的报告完全是对的。过去也有许多同志感觉到中央的指导不好，现在再拿事实去看更见明确。机会主义发生不自今日始，已早有由来。为什么现在才表现出来呢？这是因为阶级斗争加剧的关系。阶级争斗与国民革命大家在理论上亦颇认识，但在实行上却大不同了，误解了阶级争斗与国民革命的理论。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中有两点：1. 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2. 土地革命，使同志发生问题。大家对这两点未认清。以前我们将小资产阶级看得太低，第五次大会又把小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这样还说什么土地革命呢?！中央对国际决议并未了解，以致将小资产阶级看得比土地革命更重。我们的党自从成立一直到现在可说都是些小资产阶级，其中还夹着有些封建关系，和政客概念。每对一问题总是喜欢用手腕，利用某来打某，并非由于阶级出发点来决定一切问题。同时我们党的书生气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犹豫动摇，发生机会主义了。产业工人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工作说了好几年了，但未实行，大家总以为工人的政治观点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识分子那样开口数万言。但我们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比中央要高百倍。荷波[10]是个工人，他虽现已近乎知识分子化了，但他仍未脱离工人的意识。他曾对我说了好几次：他以为现在用不着这样看重小资产阶级，只要我们有力量，小资产阶级自然要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过去失掉了好多机会，所以我对国际代表的报告是

完全同意的。

和[11]：完全同意国际代表的报告及国际决议。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直到现在，此错误我们实不能宽恕。现在已经很显然的是机会主义，我们现在不能仍然说国际也有错误，应由政治局负担，不然便是文饰自己的错误。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我应负此错误的责任。五次大会后的错误主要的是未实行五次大会的决议：1. 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成立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中央不实行而且相反。2. 五次大会以前的失败完全由于退守，南京如此广东亦如此，五次大会即指明此点，但大会后仍照此方针。第一个决议即是要向小资产阶级让步，所以完全受了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反对一切“过火”的运动。当时政治局以为小资产阶级动摇，我们孤立了，实则农民已经跟我们来，我们何尝孤立。小资产阶级是全体的动摇吗？还是几个上层的领袖呢？政治局没有看清楚，所以当时政局的呼声便是要对小资产阶级让步。3. 素来党的指导即未建筑在群众方面，以致中央完全成了普通的政治团体，非阶级的指导。直到以后，政治局的指导简直与国民党一样，并且还以小资产阶级几个上层领袖的意识为转移。这当然，不是国际的错误。我们应承认过去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正过去的错误。自国际训令来，党的上层有一个恐慌，以为这样旧的指导人必完全去掉，必有组织上的恐慌，这并不是群众的忧虑而是上层的忧虑，我以为这是不足恐慌的。因为要改变党的指导必换新的指导人不可，过去党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政党只要有政治的路线组织上则不成问题，我们应将此点向群众解释。最后，我说的是：过去的党的错误未达到群众中去，这次的错误要传达到群众中去，使群众都认识此错误，然后党才能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权。

达[12]：完全同意国际代表的报告。1. 过去中央完全是一个和平的、不革命的党，不是一个争斗的党。乡村农民已经起来夺取政权了，党反而阻挡，党对农民运动完全与顾孟余一样的见解。党以为农民暴动是原始的，这是逃避群众的争斗，完全走到不革命反革命的路上去。2. 国际是无错误的，错的责任全在政治局。政治局完全带着国民党几个领袖的意识来成立党的决议，五次大会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决议政治局完全抛弃了。3. 过去党的指导不好，有绅士的气概。过去曾有群众愤怒欲杀上层同志的事实，如湖南有许多同志要杀夏曦，把夏曦也当一个劣绅看待。党对这些现象不能解决，只能当书生坐在屋中决定策略。

亦[13]：中央对于各种运动无一坚定的策略。我时常有这样一个感觉：中国共产党无一坚决夺取政权的决心，我意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出发于此。第五次大会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大会时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得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看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做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中国共产党需要有不郎基主义的精神，在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来工作。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的批评国际：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之坏。既认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魏金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魏金斯基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才加入党，我们在上海要暴动时他要反对，并且不帮助。至于罗易谁也知道是国际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人，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听说这次国际代表很有革命的经验，我们自然满意，并希望国际代表能将此点转告国际。此外我还有一点意见，在告同志书中应加一点：指出过去党是

不能争斗的，这是在组织上的错误。还有一问题，即是党的指导的问题。五次大会时还是一些元老来指导这是大错的。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说：要将群众意识来作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来作领导这是很对的。

弼[14]：接受国际代表的报告及国际决议。1. 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我们仅仅作了上层的工作而忽视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比如五次大会后第一问题是北伐问题，国际代表罗易主张深入，鲍罗廷主张扩大，结果深入扩大并进。武汉政府的封建势力为要扩张其势力是需要北伐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北伐，但要借此机会来抓住群众。结果不然，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争斗。北伐结果，唐等势更大，其影响汪[15]等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遭致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2. 土地革命问题。在国际电报告说C. P. 与C. Y. 意见冲突，主要的就是土地革命问题。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党不但无土地革命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3. 党怕群众，如对学生代表大会不召集是因为孙科反对。劳动大会如此，工纠之解散也是如此。因此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独立的作用。4. 关于组织问题。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作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

芬[16]：1. 过去党的错误问题。党的指导的意识不是建筑在阶级及群众之上的。五次大会是群众意识之表现，成立了许多正确的决议。但五次大会后，党不发展群众运动。但群众运动仍然发展上去，党连尾巴都跟不上了。特立[17]说：土地革

命无法做，如做，则不但国民党反对，即党内的群众也必有三分之二反对，这是非常错误的说法。2. 第二农民问题，秋收暴动问题，同志有以为要秋收暴动则须解决武装问题，忘记了农民武装要在农民暴动过程中来创造。我们也不是定要在此次暴动来得到政权，而是要以此暴动提高乡村中的争斗。3. 过去党对青年问题，党的指导机关忽视了，五次大会独秀对 C. Y. 说了许多消极的话，他对 C. Y. 并且有家长的态度表现出来。以后应积极的指导 C. Y. 工作。

秋[18]：以为草案中应加增几点：1.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态度说得不详细。应加说明党过去只看见上面的小资产阶级领袖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如前之态度。2. 中央政策与国际政策中加说我们党团太无作用。3. 对国民党中应加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并攻击平山[19]的第三党的主张。4. C. P. 对于政权的性质为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的国民党的旗帜为号召。这几点已与国际代表商议，现在只是文字的修改。

和：还加一点，关于土地革命的解释。老鲍[20]的解释与国际的解释不同。中央政治局过去渐渐采取了老鲍的意见，现应加入说明此点。

迈：国际代表提议停止讨论。我意：1. 过去党的指导错误问题大家同意；2. 指导机关改选大家也是同意。所以可以停止讨论，由国际代表作结论。

D[21]：大家都同意，结论自无甚说的。亦、和说：鲍罗庭、罗易、魏金斯基之错误，鲍的理论自然是错的，土地革命不是能在学校中可以训练得出来的。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有错误的。不管罗魏等的路线如何，总比我们中央有错不改要好些。不管国际代表有无错误，主要的还是中共中央机关之健全。只要我们是革命的机关，纵然国际

代表有错也是不十分严重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

至于指导成分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同志来作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从事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新政治局提出正式七人，候补五人。

至目前状况的估计：现在又是一种情形：农工都遭了摧残，反动势力高涨，革命遭了一严重的打击和损失，但革命并未停止。现在仍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革命，但由民权革命的发展中而发展的阶级冲突仍未消灭。

民族革命中有五矛盾：1. 上面说过我们仍要反帝国主义，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此第一矛盾仍然存在；2. 生产力不发达的矛盾，土地革命便是解决此矛盾之最好的方法；3. 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之改良仍未实行，因此，必然要号召工人反对资产阶级；4. 工农城市贫民必然起来反抗一切压迫夺取政权；5. 统一中国现在不但未做到，而且更加分裂了。所有德谟克拉西的五个任务我们未实现一个。现在的问题是革命的浪潮何时爆发？反动势力能维持到何时？这只有在革命中才可看出。现在我们的党应尽力号召坚决的斗争。我们先要有一正确的策略然后才能作此争斗。如还有人主张第三党，我们要很坚决的处以党的纪律。

最后，关于告同志书，提议在原则上付一表决，文字上则可推出三人组织一小委员会去修改。

迈：照国际代表提议付表决：

决：

1. 全体通过在原则上同意告同志书的草案。

2. 以秋、迈、兆[22]三人组织委员会修改文字。

（二）秋 报 告

在未报告之先我要说两点：1. 在中国革命中中国资产阶级是否与封建阶级斗争？我们要知道此是一重要问题。蒋介石等拿着政权不但得帝国主义帮助，还得封建阶级的帮助。可见中国资产阶级是与封建阶级无大冲突的。说明了此点，可以去掉以为中国革命分两阶段的幻想。此幻想可以容许我们党外合作，实则此幻想是错误的。中国资产阶级一点民权性也没有。现在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两条路。2. 革命的指导机关犯了绅士的毛病。我们的党缺乏平民的精神。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了。我们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的。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中曾有向国民党提出条件退出国民党的倾向。过去当我们能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又不允许我们包办，现在想包办又不可能了。过去我们觉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过去也是有效的，但现在已经不适宜了。七月十三日我党的宣言是党的新政策之开始，中央政治局与国民党反脸的宣言的内容是很坚决的。汪之反脸，其主因不是ROY[23]给电报他看，ROY给电报与汪看自然是错误的，给了汪以反脸的口实。在汪接到冯[24]不反蒋的电报时非常震怒，于是他更加力宣传反蒋。唐等于是以反共挟之，在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汪表示被人强奸，并表示不能在武汉立足。恰好，此时得到了ROY给他的电报，得到了新的出路，于是将此电报来作为他反脸投降唐等的工具，于是公然主张反共。此后，汪的主要敌人便是张发奎部下的共产分子了。张此时亦有点动摇，曾有叶[25]暂时退出C.P.的要求，我们党内当时也有人有此感觉但结果并未成为事实。同时孙邓[26]宣言之发出，所以

我们党的宣言比较坚决。这次南昌的行动，至少是无意识的走到新的方针。七月十五以前，我们参加政府还有由上面来帮助发展下层工作的条件，现已全国反动，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

叶贺[27]发动之后，张非常慌张和震怒，于是马上带了几百卫队坐火车去阻挡自己的部队。他自以为是为党工作，所有的旧部仍应归其指挥。结果自己身边的一支枪都被缴去，这也许是客气了一点。张第二次的讨伐命令是非常软弱的，是相机发展。由此可知张已无进攻之能力。朱培德的力量亦很薄弱，两师皆不能作战。今日报载我们已离开南昌，据我推测这一定是前方胜利了。从前中央曾有一命令去前委，大概他们已照此命令进行。现在我们的主要敌军是三十五、三十六两军，但唐决不肯用此力量来为张出力而要用来夺取江苏的。第三派势力在此次事变前已有酝酿，由白崇禧、李宗仁担保南京和平，朱培德担保武汉，以汪为领袖，并由白李要蒋下野。第三派与唐有冲突，但现不会马上暴露，因尚要共同反共产军。

将来的局面与以前不同，以前有大的领袖，如奉张[28]、宁蒋、吴佩孚等，以后则分为许多小军阀，进到很紊乱的时期。这证明封建阶级之倒台，资产阶级之软弱。这一堆反革命的冲突是非常厉害的，这是革命前途之一优点，因为他们内部极不稳定。

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叶挺已如此，在相当时期，北方之张兆丰也应如此。这是一定有胜利的机会的。

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

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

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1. 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戴了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汪便是此派之代表。所以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是汪。列宁过去也非常注意打击这种人。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策略。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2. 我们要纠正过去错误，要注意群众，要由下而上，谁赞成我们，就是左派。3. 现在的目的，并不是与政府绝缘，我们对政府有三个阶段：a. 不参加政府；b. 参加政府，但发生许多错误，失掉了参加政府的作用；c. 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但我们要占多数，成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乡村中要农会政权。我们要坚决的干，我们要告诉群众，武汉、南京、北京政府都是反革命的。打倒汪精卫是不容[29]的，我们必须努力做，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针。

因各种要求，常委及国际代表起草了三种决议，提出今天讨论。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问题：1. 如何做国民党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我们已发表了一个告国民党同志书，此书应为左派政纲。2. 军队中及兵士中工作，现在也很重要，我已与一飞[30]商议要作此工作，临时政治局应注意此工作。3. 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纲要追认。

A. 工运决议案之讨论。

迈：现在提出“工人运动决议案”讨论（由秋念草案全文）。

沉[31]：1. 反叛的人对于工运第一步是反对；第二步是组织工会参加工会。在第一步时我们即应作很大的反对的宣传，向工人指出第二步的危险。如此，则能使他不能实行第二步。2. 国民党派人组织的假工会，必不能代表工人本身的利益和要求。我们在这些假工会中则可多多提出要求予此假工会以非难，使他在工人群众中失去信仰。3. 他们一面组织工会一面

压制工人的要求，我们则应提出政治的要求实行政治斗争。4. 各级党部工人部不取消，同时在工人部之下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全体常委参加。5. 应提出店员及手工业者在争斗中的态度。

弼：1. 手工业工人以后的经济斗争应保障其胜利；2. 只有现在秘密工会不够，还应组织一些争斗团体。

秋：结论：沉的意见之1. 是临时的应付，意思好但可不加；2. 可以加上；3. 已有可以不加；4. 仍以取消为好；5. 可以加入经济斗争条文内。弼的意见之1. 可另一条；2. 应具体一点。

B. 农民运动决议案之讨论。

迈：现在提出农民运动决议案来讨论。（由秋读草案，附全文）此决议草案农民部已根据之拟定四省秋暴计划。

东：1. 大中地主标准一定要定，不定则不知何为大地主中地主。我意以为可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2. 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3. 自耕农问题，富农中农的地权不同。农民要向富农进攻了，所以要确定方向。4. 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一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

秋：土地问题党无一致的意见。东之1、2两项有点冲突。五次大会讨论此问题，决定“耕者有其田”，此五大字什么问题都可包括了。当时要没收小地主土地。革命政府可以在土地革命中得着生命。现在应重新审定五次大会对农民问题的决

议案。

达：1. 对土地问题以为无大小地主之分。标准是无法可以定的，只有完全取消地主制。农民自然要解决小地主土地的。在没收地主土地后富农必定动摇起来。2. 对会党，没收地主土地后分配自然不成问题，不分配则定有问题。应组土地委员会来分配。3. 乡村完全应为“农会专政”，不要什么乡村自治。

D：关于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这非有一个工农德谟克拉西的政权是无法解决的。此决议的目的是最近要叫起农村的扰乱暴动。我以为条文可仍照旧，谁是大小中地主，是无法确定的，且带地方性。此问题应由农协自己来决定，一切权力属于农协。我们要使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立。如开始即要没收一切土地，则必使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来反对我们。我们的口号一出去，马上即会引起小地主的动摇，要紧的是我们不要怕干下去甚或惊慌起来，因此，不必争论，至于东提出的会党问题，我们不但不利用，并且还应确定其经济地位。

东：现在是往下去的问题。湖南三四月已达到一个从新分配的时期，广东已将达到此时期。我们一定要对此问题有个明确的回答和规定。在得着政权的地方，应当全般计划此问题。我的标准也是指这些地方说的。

D：如我们有政权，我们的政纲很明显的是土地国有化。

沉：对农民运动的策略，党始终无定见的，最近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应加详细的说明，这是全体的要求。决议案应马上发出去，而且应答复各地的问题。现在至少要提出以杀戮暴动来对付土豪劣绅军阀等的杀戮暴动。应领导农民反抗国民政府。对伪农协也要使群众认识其并非代表农民利益的。平民法庭可以不要，因为政权即归农协，当然应由农协来审判一切

案件。

D：同意沉的意见。取消平民法庭的组织，土匪问题可另列一条。

芬：关于小地主问题，同意决议草案上意见。

迈：还有国际代表没有答复的问题请答复。

D：对于富农，同意东意见，但可不写出。

秋：1. 要号召农民暴动。2. 过去所以有不同的意见是无农民问题的党纲。五次会之拒绝讨论此党纲是错误的。第六次大会无论如何应讨论并决定一个农民问题的党纲。

C. 组织问题决议案之讨论。

迈：现在提出组织问题决议案讨论，请大家发表意见。(由秋读草案原文，另录)。

亦：以为北方局可以不成立。

迈：同意。

东：在草案第七条应加一农字，即应以工农参加指导。

弼：1. 交通要弄好；2. 恢复乡村组织；3. 对 C. Y. 关系亦应加入。

东：交通问题是一贯的问题，不单是中央与省的交通问题，应在全国组成交通网。

D：提议：1. 各级党部应有 C. Y. 代表。2. 北方应派人去作报告。

迈：1. 交通可加上一条。2. 恢复组织是对的。3. 党与团的关系前已有决定，仅是执行问题。4、局的制度我怀疑，我意只要交通组织好，北方可不组织局，南方因有特别情形可以组织。请国际代表答复。

D：对北方政治局分局无定见。

善[32]：以为北方有需要，因北方有许多省委不健全。

秋：如有人才是可以的，但实际不可能。且北方现无南方

那样需要，只要与中央交通接头就够了。但需要一人去北方考察一下。

决：北方不组织政治分局。

迈：三决议文字修改权交谁?

和：秋今日的报告，无法讨论。中央应确定秋提出之问题发布全党。又南昌军队何以离赣去粤亦应讨论。

大：过去是决定去广东。

决：1. 三决议案文字修改权交临时政治局。

2. 政治局应根据今日决议讨论新的政策发布各地。

（三）D. 改组新政治局问题

D：提议政治局委员 7 人，候补 7 人。

提出名单为，正式：特，秋，兆，迈，弼，亦，中。候补：立，恩，湃[33]，大，顺[34]，忠[35]，和。

和：要求不加入自己，因：1. 过去错误；2. 已决定去湖南，正式名单去张加入东、沉、达。因要吸收新的分子。

东：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

迈：赞成加入东取消自己。

东：不同意迈的提议，自己非外面去做工不可。

沉：主东加入，沉、达都不加入。

达：不能担任此工作。

顺：自己适宜做下层工作，不要挂一虚名。

秋：现在不是法律问题是工作问题事实的问题，大家不能如此。

D：可将名单提出付表决。

决：1. 临时政治局委员为正式九人，候补七人。

2. 推出政治局委员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

1. 兆 20 票；2. 忠 20 票；3. 秋 19 票；

4. 亦 18 票；5. 顺 17 票；6. 荷 17 票；

7. 维 17 票；8. 湃 16 票；9. 弼 14 票。

候补委员

1. 中 13 票；2. 恩 12 票；3. 东 12 票；

4. 达 11 票；5. 大 11 票；6. 特 9 票；

7. 立 7 票。

根据《中央档案馆丛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刊印。

注释

〔1〕即李维汉。

〔2〕原记为七月十二日，又改为四日。应在六日到十二日之间。

〔3〕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

〔4〕指罗米那兹。

〔5〕即瞿秋白。

〔6〕即陈独秀。

〔7〕即毛泽东。

〔8〕即孙中山。

〔9〕即邓中夏。

〔10〕即王荷波。

〔11〕即蔡和森。

〔12〕即彭公达。

〔13〕即罗亦农。

〔14〕即任弼时。

〔15〕指汪精卫。

〔16〕即李子芬。

〔17〕即张国焘。

〔18〕即瞿秋白。

〔19〕即谭平山。

〔20〕即鲍罗廷。

〔21〕即罗米那兹。

〔22〕即苏兆征。

PDG

〔23〕指罗易。
〔24〕指冯玉祥。
〔25〕指叶挺。
〔26〕指宋庆龄、邓演达。
〔27〕指贺龙。
〔28〕指张作霖。
〔29〕原文如此。
〔30〕即王一飞。
〔31〕即陆沉。
〔32〕即杨善南。
〔33〕即彭湃。
〔34〕即顾顺章。
〔35〕即向忠发。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鉴：

（一）绪　　言

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于全体同志的时候，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见了极艰巨的折磨。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三个月以前，武汉政府曾经宣布蒋介石是革命叛徒，现在呢！他自己也学了蒋介石的榜样。反革命如今冒国民党之名，甚至于冒“左派”国民党之名，来摧残工农运动。在武汉领域之内如蒋介石之治下是一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农民运动的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将领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益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工会机关之中到处只见军阀豪绅指派来的走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通过的，原载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一期。

狗，压迫受得尤其严重的便是我们的党。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从反革命的军阀一直到被革命吓慌了的小资产阶级。然而他们现在不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却称共产党为人民之公敌。国民党现在的领袖汪精卫等，卑劣无耻的叛背了国民党的主义及其习性，接受军阀的命令而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中央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因为反革命派要想完全消灭我们，反革命暂时的得着了胜利，正拿着武装来对付劳动阶级。如果现在所有的工会还没有捣毁净尽，如果工农运动的革命的指导者还没有完全被杀，如果政府还在宣言保护工农团体，那末，这不过是因为反革命的军阀和国民党的领袖还没有完全集中团聚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知道，如果群众运动不能够起来坚决的反抗，那末，最近期间白色恐怖决不会减弱，只有越发厉害。我们对于国民政府的“尊重”工农，没有丝毫的幻想！这所谓国民政府是什么？他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现时还有些用处，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没有完全镇压下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用国民党的这些叛徒，好暂时冒充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的招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其实已经背叛了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

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汪精卫、孙科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既已走到反动方面去，自然不是国民党的代表和领袖，所以一切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最近期间白色恐怖要在汪精卫等叛徒的旗帜之下而实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

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

现在的情势是反革命派屠杀工农群众，压迫群众运动，捣乱工农团体，所以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告诉你们的，便是你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从群众运动里发展成了伟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期，他的作用是绝对的伟大的，现在我们党的作用是更加要大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历次决议，都说党的政策及党的指导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过去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半与本党政策有关系的。将来革命的命运在形势变更之后，更加要靠我们党的政策正确，要看我们党对于形势变更之后的职任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评这些错误而纠正他们。这些错误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艰巨职任。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各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我们党如果不能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末，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

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等共产党的敌人幸灾乐祸好了！让他们去乱叫共产党崩坏好了！这种攻击，是吓不了我们的，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使然，而且因为有群众之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作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上说："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广大的党员群众，艰苦牺牲的在社会下层工农城市贫民之中，实行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却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经常的摇动和犹豫，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假的非共产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论，还有更加不革命的行为，这些情形，不但绝对的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矛盾，并且和我们党员群众工作相反。

譬如说：上海、广东、湖南本党普通党员群众都有过伟大的奋斗，屡次光荣的总同盟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动——最后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胜利。这些都是光荣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史上有无上的光荣，而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如此。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是上海共产党——无产阶级所写的。

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员指导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革命性、阶级意识的坚决和政治意识的高度，甚至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国里的工人革命运动，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历史呢。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上海的共产党群众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蒋介石屠杀之后，虽然受着闻所未闻的压迫，许多最好的指导者（如陈延年、赵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杀，一切运动都压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旧继续着斗争，表现不可摧折的伟大力量。广东的共产党员，领导了铁路

工人的暴动以反抗李济深，领导农民群众的武装暴动，能在五县地方继续抗争至两月之久，真正像勇敢坚决牺牲的革命党人，奋斗到最后一点一滴的可能——这些共产党员真可以做革命形势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榜样。湖南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国历史的一页。农民协会实际上的政权，是共产党员领导而农民协会所创造的，自动没收大地主，分配土地于乡村贫民，解除豪绅团防的武装，创立武装的农民军，严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规模，而且会和国民党下层群众结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联盟——最后，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长沙的反动政权，（这次暴动如果不是中央党部机关在紧急的关头采取可耻的退让政策，无疑的是胜利的。）——这都是湖南共产党员的努力成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产党员群众，亦是如此。党员群众的行动真正是英勇彻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党的群众没有怕牺牲的。中国革命之中，他们的奋斗，使我们的党取得伟大的光荣和作用。党的群众是我们的力量之源泉，有他们的帮助，党的指导机关之错误无论如何大，都是很容易纠正的。固然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摇动犹豫，没有坚决行动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大有损失，然而本党有上海、广东、湖南的经验，决不会因指导机关的错误而陷于败亡。本党一定有这个力量，保证今后有正确的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二）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正确些说，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布尔塞维克的马克斯

主义的了解。党的指导每当解决这些革命之根本问题的时候，时常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及列宁对中国革命的估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陷于最庸俗的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时，他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时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之争斗，这种奴隶制度正是帝国主义依据中国封建关系以建立其统治之基础。

如果以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那么，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国际向来反对这一类的观点，认为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反对以国民革命的职任与阶级斗争的职任相对立的观点，这一类的观点，在西欧各国的极左派及社会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实这是抛弃中国民权革命中之无产阶级领导权，抛弃领导权而争所谓'劳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实际上要使无产阶级变成'民主营垒'的尾巴"。中国革命中各种社会阶级的作用是怎样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部分是依据于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遗毒，是外国资本无限的剥削中国民众之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着地主豪绅及封建式的行政机关，封建阶级又在维持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所以非常之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制度破坏，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加以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

地革命的方法。农民反对地主豪绅及强盗式的政府机关之阶级斗争，是民族的解放运动之必要条件和不可分离的成分。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严厉——则国民运动的规模愈广大，国民运动的胜利愈巩固。

从别一方面观察，外国资本在经济上勾结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买办）。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之保存与扩大。

至于所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那末，他们是受外国资本的竞争而为其所排挤的一部分中国资本，因此，他们被逼对于帝国主义实行经济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的革命，甚至于有一时期曾经做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的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改，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今年四月间既受革命运动伟大的规模之恐吓，就要去和帝国主义妥协，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大地主相像，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

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免的使他与帝国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足以掘断帝国主义经济力量之根源。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闻所未闻，这种情形保证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非常之高的利润。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

中国民族解放之最彻底最坚决最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中国无产阶级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可是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之争斗的发展，就是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议决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承认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杀之后已经开始了别一种工农的阶级革命——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离合的现势，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彻底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不会和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群众运动。

谁要民族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并扩大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于小资产阶级，则除去少数的反动成分，与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相勾结的成分，其余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亦因自己客观状况的关系都利于革命的阶级运动之胜利，利于城市工人乡村农民之胜利，自然更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然而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动摇犹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阶级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这种犹豫与动摇，往往对于革命斗争的出路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但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犹豫的程度，大部分由于革命阶级运动的力量而决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

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革命，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而左倾，愈能站到革命战线上来，反之，如果革命的阶级及共产党自己也表现动摇不彻底不坚定，则小资产阶级愈加倾向于有产阶级的营垒，反革命的营垒。无产阶级的先锋，除自己的坚定与果决外，没有更真实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方法。

列宁屡次的说过："谁要帮助摇动犹豫的人，他自己便应当开始就不摇动不犹豫"。我们应当记着：社会之中既然发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便无论如何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政策；他或者和资产阶级同道，或者和无产阶级同道。无产阶级应当明了小资产阶级的摇动是不可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己应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当前的问题。

凡此一切，都是对于中国革命中各种动力的估量，足以确定共产党的革命的策略的。然而我们党的指导，在理论上，尤其是实际上，刚刚对于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力量之估量，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这就预定了党的指导之机会主义的动摇犹豫政策。中央完全像孟塞维克派似的，将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仿佛认为阶级斗争的开展，足以破坏国民革命，而要想叫全党及工人阶级农民都自己来限制阶级的要求，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地主不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中央在六月十九日的发给上海的信，对于上海斗争的指令说："中国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国主义……现在几月忽略反帝工作"。仿佛专注意于进攻封建制度，而得不到好的结果。中央骂共产党员走得太远了，要叫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农民往后退。这一指令里又说："一方面反帝国主义运动消沉下去，别方面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单调的去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等口号，使小资产阶级怀疑C. P. 快要革国民党的命，要进行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

命”。这样，中央那时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事，国民革命又是一事。这一通信里还说：“小资产阶级看不见没收土地是国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为只有共产党要没收土地，实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农的力量。因此，小资产阶级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不能不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甚至于与共产党破裂。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呢？如果这样，那就是取消我们的力量，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投降蒋介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呢？这个结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灭革命的根据地。如果我们不能用相当的方法渡过这种困难，那就是资产阶级胜利。我们应不应当抛弃没收土地武装工农的政策呢？这当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许[1]的问题，我们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么，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就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找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渡过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一指令的结论是：中央叫上海的党部“不要看着国民党运动完全是工人问题”，而要到各阶级中去宣传反对帝国主义；这是说去宣传上海资产阶级，就是实行蒋介石四月十二屠杀的资产阶级，转向帝国主义求妥协的资产阶级。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不革命的非共产主义的方针，足见中央指导机关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见解都是错误的。

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整个儿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央的这种方针，完全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决议不符，完全和党员群众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农民之斗争不符。

谁要替这种机会主义辩护，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

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离别了！

（三）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就是无产阶级中最先进、最革命、阶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永久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发出，要求以革命的方法变更全社会的组织。共产党既然以工人阶级利益为最重要的前提，同时，亦要提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时期中客观上可能解决的要求，在这一革命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轨道上去的时期中，都是如此。共产党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他们的斗争，坚决的力争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得绝无束缚的工人组织及阶级的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无所限制的罢工权，努力反抗以至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隶状况。

这种要求工人阶级都可以在民权革命之中提出，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独立斗争。共产党应当发展扩大并激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应当每次领导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屡次命令中国共产党，要我们力争增进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坚决的要求改良工厂生活，提高工人的社会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认识自己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同时共产国际指出必须迅速勇敢坚决的实行武装工人农民，首先是其中最觉悟最有组织的成分。这一政策国际是认为万分必要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和各地工业区工人群众自己的斗争是相应的，和本党党员群众的斗争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党指导机关却是走的别条路。他只在阻止缓和阶级斗争及工人的革命行动。中央不去开展推动罢工运动，却同着国民党领袖规定强制的仲裁办法，而且最

终决定之权属于政府。在各阶级联盟的政府之下，起先一时期，这一政府而且正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却定出如此的策略，这在客观上不是为工人的利益，实是为资本家的利益，实在大大的阻碍了工人运动。那时国民党中央有禁止不得政府同意之外国企业中之罢工之决议，又有要工会不为工人要求而斗争，却要守劳动纪律的决议，我们中央并没有反对。中央那时以为限制些工人运动，可以保存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没有懂得我们不坚决的拥护工人利益，只有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右倾。中央想尽方法限制工人的经济斗争，限制他们直接的为自己阶级利益而斗争，其实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便永世也说不到工农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中央那时规定这种策略，实是因为对于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观念是错误的，对于国民革命之利益的观念也是错误的。自然爆发而发展的工人运动，自下而上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完全在共产党员影响之下，并且发生了武装工人纠察队，及广大的劳动童子团等等。工人阶级自己觉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来反抗资本家，而资本家早已反革命，对于生产则怠工，故意造成工业的危机金融的紊乱。只要工会逮捕几个厂主店东，一般资产阶级便大叫其“过火”，于是不但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跟着乱叫，而且那时本党中央也跟着这样承认。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坚决说“过火”怎样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说给工人听，不应当占领工厂，即使工厂主的故意闭厂，也不应当；说不可以封店，即使店东故意抬高物价，也不可以；又说决不该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显然是反革命党，也是不该。

潮流似的，工人阶级向着真正工农民权独裁制进行，中央却尽力阻止工人运动走上这条革命的路。

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他反而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小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

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

国民党下命令叫工人严守革命纪律，还要工会去执行，违法者交政府管理。工会只准处罚工人。我们中央对于这个命令，一句话也没有提出抗议，湖北省总工会接受这个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认。中央对于工人阶级表现的独立性，每次都说是"过火"或"幼稚"，没有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实在是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话。

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策略，不但是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上是如此，而且关于工人的政治行动，亦是如此。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是有很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这不但不是经过党的指导机关而实行的，并且中央在事后还说这是不对的。最近中央曾经倾向于自动取消上海秘密工会，而使他们加入蒋介石的黄色工会。对于群众的惧怕，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在党内问题里也是如此。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智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的要求之后，方才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阶级。当要办党校的时候，中央非常坚决的要使工人分子减少些，说中国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识不发达不觉悟。然而事实上譬如上海工人，其政治意识比党的指导机关高得多。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

（四）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的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

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亦就是继续以前的指示，这一决议说："要引进群众来斗争，只有在农村中依据土地革命，城市中依据工人阶级需要之满足及其政治权利的保障，坚决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没收地主官僚寺院等一切土地，禁止苛约，取消贫农所欠重利盘剥者的债务，坚决的要求减税，而使富人多负税捐的责任；这些要求应当实行之于全中国，首先是武汉政府领域之内。这些要求应当可以引起群众反对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及于北方军阀。""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现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指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之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己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将现时政府变成工农运动的组织上政治上的中心；变成工农独裁的机关。"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提示指令的，乃是违背中央的指示指令而做出来的。总之，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和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刻刻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他向后转。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五次大会之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汉口开中央特别会议，提都没有提及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虽然这一会议是北伐胜利后决定党的任务的重要会议。各省历次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本党亦没有规定自己对于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二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

会）；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当第五次大会时，虽然土地问题的议决案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山为领袖的共产党员在这委员会里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四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求立即实行解决，等到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抗议的。

共产党湖南省（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甚至于决定：凡田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减租——这个时候，正是湖南农民开始积极的斗争，甚至于已经实行分地的时候！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认某几种错误，然而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我们党实际上是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尽力的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

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是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甚至于有一种论调，说武汉境内的过火行为，是蒋介石奸细所做的——这简直是跟着武汉军阀说话，因为他们也说这些过火行为是蒋介石的奸细做的，共产党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替压迫农民运动的人辩护。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说：“蒋介石及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农民侵犯军人家属的事，专事挑拨离间。他们故为左倾之宣传，而后再从而压迫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负责指导者之一曾经说：“有些过火行动，亦许是反革命派

故意挑拨出来的”。他还说：“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发颤不安，他们觉得仿佛国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们这种感想，必须使之消灭”。

如此说来，伟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地主军阀，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导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牺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贵。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农民政权问题，中央的政策也是非常之机会主义的，不去考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引出相当的结论来，却想只靠着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的系统表——既不合实际生活，又有害于革命。其实自然的潮流已经将革命政权交付了农民协会，发动了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及减租的运动，解除民团豪绅的武装，惩治乡村中的反革命派。

党的中央不去赞助并发展这一革命政权的方式，反而同着国民党中央提出死板的组织乡村自治。这乡村自治的意识是怎样呢？只要看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是怎样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训令上说：“建立乡村自治以巩固农民之胜利而**消灭乡村中之无政府状态**”。

中央坚决反对分地，反对均分财产，自由罚款及逮捕土豪。五月二十五日中央便说：“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中央虽不敢公开反对没收土地，然而实行上却是取消这一口号。五月二十五日的决议上说：“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根本放弃第五次大会所决定的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的宣传时期，并且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是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如果将这一决议和中央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并且坚决反对分地之事

实并在一块儿看，那么，中央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针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种策略对于湖南政变中本党的行动，有异常之恶劣的影响。长沙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员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犹豫的阻滞，那么，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再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二大队偶然没有接到这一命令，居然扑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众寡不敌而退却。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是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日全省的大反动。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争斗的决心，简直是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要看五月二十六日的决议案："现时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时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时机。长沙事变时，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的地方，只要看当时决定赞助唐生智来电的主张。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志愿的。中央虽然有时在口头上提出对于长沙摧残工农团体的抗议，并要求惩办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实行上的动摇犹豫，完全帮了湖南政

变的反革命派巩固政权。

这种败亡的失策，应当给我们以严重的教训。中央对于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竟如此之深远，甚至于弄到所有紧急关头的指导与指示，都带着有背叛群众运动的性质。

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谭平山的行为，亦是如此之可耻，农政部坚决的拒绝赞助土地革命，想使农民运动就范，走上资产阶级式改良主义的道路。农政部五月里出了一个布告说："必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佚出轨范而侵害多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须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的行为，最足以表现本党当时对于土地问题之不革命的妥协方针。如果全党都照着这种方针的精神去行动，那么，我们的党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党员群众下级党部的实际工作，完全和中央这种方针相反，所以虽然上面竭力在那里阻滞这些工作，我们党始终能保证对于农民群众有正确的指导。

（五）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指导政策亦是遭了同样妥协主义错误铁链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理论与实际决不如共产国际之指示及党的下层机关之活动相似。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应取的态度，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上有详细的规定，但在此决议中的那些指令早已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以前给过中国共产党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之观点，曾经向中国共产党有过完善的通知，但我们中央在实际上的动作恰与国际的方针相背，这

是证明党的指导如何深远的在那里执行自己的妥协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有底下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要能担负起他的任务，只有他自己能做工人阶级的先锋，保有自己的政治面貌，就与最左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的政治面貌都要有区别。

共产党在任何政治环境中不能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相混同。他应是独立的力量，他是一国之内的特别阶级，即无产阶级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组织。因此，共产党对于宣传自己的观点，在自己旗帜下动员群众的工作，决不能自己束缚起来；他不应当放弃批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民权派的动摇不定的权利。只有这种批评才能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左倾，并巩固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之领导权。

在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共产国际执委认为，由勇敢的坚决的发展群众运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应当勇敢的坚决的去变国民党为真正包含城市与农村劳动群众的组织。

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国民党当前的任务，须要有适合他们的组织形式。必须更向多与群众接近的路线上去，尽可能的赶快改组，使广大的工农与手工业者到国民党的队伍中来，工农兵士与手工业者的组织，**实行团体的加入**（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的储蓄组织，兵士的组织，农军，红枪会——除去反革命成分——工人纠察队等），国民党地方与中央机关应完全实行选举制等等。

只有此等坚决的去发展国民党，使他成为真正广大的、真正选举的、真正群众的、真正德谟克拉西的组织，才能创造发

展中国民权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前途。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对抗国民党左派一部动摇分子之不可免的可能的退出（譬如广东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反对那些背叛的军官。共产党应即时暴露与蒋介石或帝国主义妥协的种种动摇政策，并即定出适当的宣传煽动及组织的具体办法。

中国共产党应保持与发展自己党的组织，增加对于国民党工作的影响。他要能担负起此等任务，则必须完全认识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自己政治思想之固定，自己组织之努力与巩固，并吸收工人党员参加党的指导，提高党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并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威权”。

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的活动，简直和国际议决案上明明白白指出来的路线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对于那些革命的主要问题，如工人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对资产阶级关系问题及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所取的立场，实际上说既如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一样，则他当然不能保障共产党自己独立的面貌之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亦与国民党的指导犯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以至于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假使说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则是因为他自己的下层组织与党的群众的功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方面，可算尽可能的做了与国民党“左派”指导完全同化的工作。

在大多数省份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国民党中达到领导的影响，而中央却反对这些组织。在中央五月通过的关于国民党联席会议的议决案（国民党工作大纲）上说：“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应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党的最大要求，而应

注意到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从这个中央的决议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共产党的最大要求”，与民族运动发展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不相容，互相冲突的两方面。二、共产党的“具体建议”不应当建筑在他的“最大要求”，就是说在革命的现阶段上不适用共产党的政纲、策略与一般的政治路线。三、民族革命运动与国民党左派，只有在共产党放弃自己的“最大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共产党对于国民党运动的正确策略之篡改，恐莫此为甚罢！

在此议决案上又说：“在国民党报馆服务的党员，不应当使此等报纸变为共产党的报纸，而应照国民党决议的精神去工作”。这岂不是放弃共产党独立政策与政治路线之表示，岂不是完全服从国民党的指导！

共产党的这种“服从作用”甚至于他的领袖正式承认，还以为这是很正确很适合革命利益的呢。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团作用（如联席会议之上）实际上已经被国民党的指导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国共中央联席会议上，汪精卫说：只有国民党中央有认可与公布通过的议决案之权，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答复，竟同意于这种办法。共产党领袖亦有这样说的：一方面固然共产党员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但在别方面则又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百的独立，因为我们现在还须与国民党联合。有了这种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数主义策略基础的妥协办法，还要装出庄然的样子说，这是实际的“共产主义”的政策。共产党的领袖简直没有想过政治上的独立，那么，对于国民党的动摇不彻底半途而废的骑墙政策，实际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批评。共产国际所要求的彻底激烈的公开的批评，当然更不用说了。对此最明显的，就是中央在党整个公开的时期中，都没有打算出版一份党的日报（虽国际之多次的督促）。中央关心的不是这些

事，而是怎样使共产党员不在国民党报上发表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看见国民党群众，永远没有打算过与他们接近，而只看见领袖。

对于领袖作用的估计过分而估计群众作用太不足的流弊，可以从党对于许多主要问题的估量看得出来。总是想着应当看某某领袖对此的态度如何，应当使其中立，但不是说工人农民群众，对此的态度如何。譬如为要使李济深在广东中立，所以把改选国民党市党部的口号取消；为要使汪精卫中立，所以把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四月）对于土地问题的建议取消；为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也不坚决的去反对湖南的叛徒；为要使朱培德中立，所以当他驱逐共产党的时候，亦不提出免他的职的口号。所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由“左派”领袖之愿欲来确定的，而“左派”领袖之愿欲，就是武汉军阀的要求。因为“左派”要求共产党人到东部去工作，而中央要停开第五次大会，或如中央一向赞成北伐，但当“左派”决定东征，则中央也马上通过那样的议决，虽然以前中央坚决的反对国际代表不主张向北去的建议。在其他许多的重要问题，都是如此。

这个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系于一个总的理论。最近几月来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特别在夏斗寅叛变起）就是所谓现时必须退让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确信，并且还要使全党及受我党指导的群众也确信下列的理论：共产党及跟他革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让步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当土地革命刚刚开始发展，当工农的群众运动刚刚走入大道，并且群众自己想到武装自卫的组织，正需要共产党的积极参加，使革命前进并巩固与国民党群众之实际联合，筑下坚固的革命基础的时期，而共产党的指导只是说要退步，要退步，以为这样就可以营救自己在国民党的

状况，创造了整个退让的理论。但可惜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而且还要步步实现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日常工作：拒绝土地革命，为着所谓“过火”，赞成成批的解散工农的组织，以同样的口实去解散劳动童子团。在湖南问题的胆怯政策与最后好听的自动解除武汉的纠察队，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几月内中央所指导的整个的退让投降政策之一部分。

这条退让投降的道路集大成于七月三号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现在抽几条出来看看：

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五、国民党中的C.P.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C.P.党员资格参加，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会议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多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时参加政府工作之C.P.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及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国民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该依据党的议决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国民党党义得武装工农，但工农武装队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如因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减少或编入军队。

八、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市街等事。

九、店员工会应即由党部会同省总工会派员改组，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店东的经济能力以上，工会不得干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能侮辱店东如逮捕罚款戴高帽子等事。

十、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

禁止。

这已不仅是机会主义与妥协了，这简直客观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把所有的群众运动完全交给国民党资产阶级领袖去监督，并且是自动的交出来，还要说这是“照例”。——这不是客观上对于群众运动出卖，对于革命变节是甚么呢？

共产党领袖所认识的与国民党联合的方法是这样的！这种认识是毫无半点共产主义政策的意味，列宁认为共产党员可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协商，但只在保持共产党的宣传、煽动与政治活动之完全自由的必要条件之下才可以的。列宁说：没有这种条件自然不能与之联合，否则便是变叛。客观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的策略是对革命与共产主义变节的，列宁对于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时常说：“要注意‘友军’如同注意敌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则认为应当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交给工农运动很明显的敌人！

党应当在过去指导的错误中学习。党应当明了，他的力量与他的将来，建筑在工农群众的身上，在他们的力量与他们的组织上面。党应当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的下层群众，与他的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的下层的组织联合，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谁能公开的反对此中央是国民党的叛徒，这些叛徒之中谁配称国民党的左派！最后，与我们联盟的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之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们党依据于武装工农组织等的实现力量如何，并且要我们自己党的政策停止动摇，而领导群众去督促其领袖，方能确定。所谓与左派联盟，实是与革命小资产阶级联盟，我们党应当首先注目于下层群众，如智识阶级，手工工人，店员等，赞助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而时时记着一切和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联络，大都是

靠不住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六）共产党员之参加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政策之不正确，与违背共产主义，在其参加政府委员的同志行动上与党对于参加政府的整个方针中，充分的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立场，亦如其他许多革命的主要问题一样的，和国际的方针及初步的共产主义政策，都发生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共产党员参加武汉政府的决议是这样说的："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共产党应当很坚决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中工作，同时要批评自己的同盟者之不坚决，就是最接近的同盟者，也要批评；并且要保证政府政策之正确。

共产国际执委特别叫中国共产党注意：现时革命政府与民众之密切的联系是十二分必要，只有在这种密切联系的基础上，才能经过国民党而实行这一政策，只有建筑在群众上的方针，才能渐渐的巩固革命政府的政权，及其为革命之组织中心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巩固武汉政府的这种影响。不能实现这种任务，不能发展群众运动，没有土地革命及坚决改善工人阶级的要求，没有使国民党变为真正劳动群众的广大组织，没有继续的巩固工会与发展共产党，武汉政府没有与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那就不能使中国革命得到胜利的实现。

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只有这种政策才能证实共产党员之参加政府。若无此条件而参加，则就带有上层的勾结，与政客的结交性质，而他们必须为实际的生活与伟大的阶级斗争之进展所摈弃。要时常的使政府工作与群众中的工作相联系，实是中国

共产党必要的任务”。

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政府问题向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党员的总长做了些什么？看事实：

共产党员在得到委命后两月才开始组织自己的部务。农政部长谭平山（共产党员）就职典礼时的演说，除批评他是可耻的外，没有别的话说；他对于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消灭豪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政权，都默然无一言；他却说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良农村状况”，反对“过火”的话。谭平山就职后，马上就发表对农民的训令，禁止农民反对豪绅的“妄动”，违反之则“严罚”。

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此数月内，他们并没有公布一个减轻工农痛苦状况的法律。没有一个改变城市与乡村中剥削的法律及改良经济关系的法案是公布的（劳动法草案、减租草案、农村自治法等），有些并且没有预备向政府提出。这些总长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照国际的决议案应是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与群众联系，来维持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则成了最滥的资产阶级官僚的统治，只是在群众面前消失共产党的面貌。我们没有一个革命的建议，对于武汉政府包庇反革命之种种错误也没有一点批评。特别是农政部长的政策，除了说他是反对农民的政策孟塞维克的政策，简直没有别的合适的名称。土地问题应是农政部顶主要的问题，但是完全把他忘却，甚至农政部发到各省的调查表，竟无一关于土地关系的问题。谭平山同志上任后，第一件事实，就要打算“镇压”湖南的农民运动。对此，中央是赞成的，并且还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领袖，实行恢复“秩序”的任务。这次出征已经成行，但尚未至目的地，而长沙已发生反革命的叛变，这些叛变很敏捷的很彻底的实现了谭平山同志所领袖的出征之任务。

当谭平山同志结束他那不光荣的总长任务时，还来个长期

请假的退出，重新又丢党的脸一次。当反革命渐渐在武汉国民政府境域内巩固，当国民党内正在酝酿了不要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趋向，如此才可自由的完全压迫工农运动而与蒋介石及反革命军官妥协；谭平山同志却很愿意去迎合反动军官与胆怯的国民党领袖之希望。他脱身的办法是借口于理想的病症，来实行他的长假。并且他的请假是事先与汪精卫商量，然后再与中央讨论，但中央不仅不反对这种行动，而反完全同意这种计划。因为在七月三号中央会议上通过的十一条中有说：为“避免纠纷”，同意于临时退出，这是所谓革命的政策！

谭平山既因“病”而请了长假，但还不够，还要说“因政局困难，不能纳农运于正轨”。共产党总长在最负责任的时期中，由战场上逃脱还不够，而且重新还要向农民进攻一次。每人都应当问一问，从这几句话里得到些什么结论：一、农民运动是走上不正的路了；二、只有武力能纠正他，因为共产党员的总长有了共产党的群众组织的完全威权，尚还不能“纳入正轨”呢！这是直接承认许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动作；这简直是直接号召反革命！他的代表毫不受处罚的在政府内做了这些玩意，莫非这还不是共产党的耻辱？但是中央对于谭平山的声明，没有发表过一句话。本来他亦无从反对起，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政策。

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政府，是为要更左的去推动此政府到革命的路上去，是为要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成分，并经过坚决的实际的革命斗争去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助，变武汉政府为工农民权独裁。中央对此问题的革命提案，完全不了解，他变共产党参加政府为资产阶级改良的总长主义。这与多数派主张共产党员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一九〇五年）的见解，相去不知多远！在一九〇五年，当时俄国亦是同样的民权革命的任务，亦有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革命政府之要求——亦是

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列宁对此，在其《两个策略》的小册子中说：

“我们应当指出此政府的行动政纲，适合过渡的历史时期之客观条件与无产阶级之德谟克拉西的任务。这个政纲就是本党的最低限度的全部党纲，是在现有的社会经济的关系之基础上，最近尽可实行的政治经济改造的政纲，这是一方面；别方面就为往下的进行到实现社会主义……

可以有人反对说：临时政府，因为他是临时的，所以他不能执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同意的积极政纲；可是这种论调，只有反动的诡辩派及帝制党才会提出来反对我们。因为如果不执行什么政纲，那就是让腐败的封建专制的农奴制度继续存在。对于这种制度，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叛徒政府才能容忍。无论如何我们应当由下的去影响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为要求由下的来实行督促政府，就应武装起来……武装督促的目的——是为保持巩固并发展革命的‘胜利’，这些胜利，从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上看来，是在**实现我们最低限度党纲之内**的。

临时革命政府是为革命赶快得到胜利的斗争机关，是为赶快的揭发反革命的企图，而并不是实现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之机关……

这种胜利就将是专政，就是他必须要依靠武力武装的群众暴动，而不是那些由和平方法得来的‘公开’机关。因为要实现无产阶级及农民所赶快急需的改革，必定引起地主与大资产阶级之残酷的抵抗，所以只有用专政来对付……没有专政便不能破坏此抵抗与击破反革命之企图”。

武汉政府现在亦变为专政的机关，但不是工农的专政，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之机会主义政策，却正是客观上帮助这种专政实现的！

（七）武装问题与对于军队之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于武汉政府军队及武装工农的问题之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足以证明我们党对于革命之中这种非常重要的问题，亦有在原则上极不正确的趋向。

人人都知道武汉政府之中极大多数（除少数共产党员率领的部队及党所号召进去的工农），都是雇佣军队，和中国其他军阀的军队是一样的。人人都知道这些军队的将领极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只能暂时和革命相伴，都希望借此升官发财。对付这种军队的方针自然应当是：完全注重兵士的群众，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革命的将领，要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使军队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观念及行动，恰恰如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士之中没有任何工作，并且也并没有丝毫尝试。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个月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

可是和将领谈话办外交，却有很多的时间。对于唐生智、朱培德类的反动派，中央那时的政策亦是非常之可耻的。湖南政变及其后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的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他到后来正式予以合法的承认。然而中央所决定的湘赣事件宣传大纲上说："湖南政变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赞助湖南民权运动，并表示好意于被压迫的农民"。（六月十四日）那时湖南的情形是很明显的了。

湖南每个工人每个农民每个共产党员，听见了这种宣传，岂不要冷笑？然而中央还不限于这种口头上的话，甚至于组织总示威反抗长沙事件的时候，同时还去欢迎北伐凯旋的北伐将

领。这种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实，居然在武汉实现——难怪汪精卫说共产党勾结军人。

关于朱培德的事也是如此。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出江西，我们自然要反对这种政策和他的主谋。然而中央始则等待犹豫，继则决定：开始总的反对江西之反动，不提朱培德的姓名，仿佛是说，朱培德总算是比人好些，如果他也离开我们，反动更要厉害。这样说来，朱培德还不是江西反革命的领袖，而是我们的保镖的，所以应当对他要包容些。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就使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聚集那零星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成为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以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地取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络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候，中央忽然“积极”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及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

（八）党内问题与对国际的关系

中央所以陷于机会主义如此之深，而能绝不受警戒的去执行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向群众报告，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总应当认为是必须

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无条件的每次都是对的。这种条件之下，党内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甚至于党有极大公开工作的地方，所谓党内民权主义完全是形式上的：没有党内的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众对于指导者的督促。自然在这种党内情况之下，中央得以放开手去实行自己的机会主义，所以他自己也不求真正实行党内的民权主义。

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非常之奇异，共产国际的历史上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形：在如此危机严重的时候，居然坚决拒绝共产国际最高指导机关的命令和决议。这已经不算是简单的破坏纪律问题，而是直接对于中国的及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要知道中国革命不但有全国的意义，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中国革命的命运，大部分足以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呢。中国共产党不但执行极不正确的政策，使革命陷于失败的政策，自动的取消革命而投降，并且很坚决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服从国际的指导。不但如此，还要故意破坏国际的责任与纪律，甚至认为可以不把国际议决案通知全党，使党员得以研究而说出自己的意见。

因此，共产国际最近不得不公开的批评我们中央的政策，而且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及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

（九）结　　论

共产国际严厉的批评我们党的中央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承认这一批评完全是应该的，并且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政策是对的。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最近的指示，给我们以发现这种过去指导的错误之可能，救了我们的党，这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很坚决的承认过去中央的指

导有机会主义的不革命的政策，必须根据这种过去的教训根本改变方针。在这封信里，我们已经在正确的共产主义观点上，分析过去的错误，我们坚决的站在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理论上来分析的。应当要使全党及每个党员，极注意的研究这些问题。应当使全党党员详细的讨论过去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七月□日的）以及这封信，便是讨论的根据。党若不能受着过去的教训，便不能向前进，不能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

讨论之中当求得相当的结论。应当不但批评过去党的指导，而除去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分，而且必须将全党工作，都依照共产主义的革命性查一过；应当事实上转移群众工作的方向；应当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能够做他们的领袖，而引导他们取得胜利。

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应当与青年团建立密切的关系，加多的帮助他的工作。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青年团这次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向党的中央要求实行。但是党的中央指导者，真是觉得这是有害于那种机会主义政策的，所以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上。党应当承认青年团的工作有政治上的重要，应当和他有密切的关系。最后，虽然政治压迫非常之严重，也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指导。并且，必须尽量设法保持党的组织，勿使为反动势力所破获。要建立壁垒深严的秘密组织，但是，同时要是能斗争的秘密的党的机关。

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

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党必定有充分的力量以坚决的革命性渡过这个变革的关键。我们号召全体党员，积极的来帮助党做这件事；我们深信同志们奋斗的坚决性及对于革命的忠实，必能使我们战胜一切困难，而坚决的使党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许克祥。

PDG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农民的革命运动在国民政府的境域内有了广大的发展（主要的在湖南）现在却遇见暂时的失败。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成分依据军队的武力与国民政府的机关联合着进攻，给农民运动以很大的打击。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当认为是共产党方面对于农民的群众暴动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这是由于党的指导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带有机会主义的犹豫及摇动政策。

共产党对于农民运动指导的摇动不定（由地方机关直至党的中央）是反映小资产阶级之动摇，客观上弄到破坏农民暴动。共产党应当转变过去的方向，坚决的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如果对此问题还要继续的动摇，就有使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变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危险。

虽农民革命运动有暂时的失败与紊乱，但在最近期间不仅客观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这种重新高涨是不可免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组织之捣毁，农村中的白色恐怖之盛行，随之而经济压迫之增加等等，都只是加紧农村中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必然准备着新的革命爆发，比前次的规模和力量更要超越。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通过的，原载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

农民运动不得无产阶级政党有系统的革命指导，很容易无组织的、凌乱的、自然的爆发，反动军阀可以不费力量把他镇压下去，因之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在最近的期间，农民暴动的口号应当是：

一、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

二、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

三、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民的生活。

四、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

五、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

六、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

七、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与苛约。

八、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而武装农民。

九、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等）。

十、对于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的筹措基金救济之，并与以工作（如协作社等类办法）。

十一、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

国民政府所下的减租二五的命令，很明显的是现在国民党领袖之一种欺骗手段，因之，我们党对于国民政府之决议，应

揭破他的虚伪阴谋。因为这种减租不能实现，所以必须提出实行完全抗租的口号以答复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这一骗人的决议案和命令。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现在已和对于新旧军阀的政府一样，本党必须引导农民反对他。对于每次摧残农民都要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尤其要经常的反对一切豪绅军阀御用的假农民协会。

最近开始暴动的口号之中，本党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但是，并不是说是农民运动不免要起而反对出租田地的小田主的时候，共产党可以认为这种事情是过火的是反革命的。共产党应当力求农民运动之中能有最大的组织性，但是共产党决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咒骂“无政府行为”所吓退——不论自然爆发的农民运动走得如何远，都应当如此。因为本党之农民革命问题上的行动政纲，在这一整个的时期中本是“耕者有其田”这一极通俗的口号，足以引起农民革命运动，一直发展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

再则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应当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应当明显的定出收取富豪财产以救济贫民之政策。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我们革命已经到了最严重而向新的方向进展的时期，必须有新的策略去领导劳动群众起来，发展伟大的组织，猛往直前的奋斗，方能使无产阶级真正获得领导权，而求达工农独裁之实现，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联合并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完成民权革命，而进于社会革命。

此种总的任务之下，职工运动目前的重要点，就是真工会与假工会之战。现在南京、武汉政府，已经都是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仍旧打着国民党是革命的假招牌，还要说保护工农，维持工农等的欺人的空话。因此，他们尽着想法把持伪工会机关——其实这种骗术，多已暴露无遗。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的领导工农群众反对这些政府，反对北方军阀的政府，对于他们摧残工会或所谓改组工会，都应当立刻坚决的号召群众起来反对。

职工运动中之现时所应特别注意的便是：

（一）工会应当是真正工人阶级的组织，群众的组织，从一般工会机关直到全国总工会，都是在本党指导之下，由群众所选举出来。现在各地如上海、南京、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等省，以及最近湖北省总工会机关都被反革命派所占领或改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通过的，原载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

组，全国总工会也遭同样的摧残。蒋介石、李济深、唐生智、汪精卫、陈公博等，派出御用走狗，把各地工会机关占领，这种冒牌的假工会、工贼工会，我们要尽力去反对他。各工会都要发宣言、示威、罢工及经常的广大宣传，否认这些假工会，使个个工人都了解真假，并来拥护共产党所领导的原有的真正工会。

（二）工会须由工人做领袖，反对一切反革命御用走狗侵入我们真正工会。因为这些走狗受了帝国主义资本家直接间接的指使，正在用各种方法来欺骗压迫工人：法西斯蒂改良主义同时并进。我们应当派少数得力同志参加假工会之中，做破坏的工作，拆散他们的团体，打倒他们的一切信用，遇有伪工会到群众之中活动的时候，便对他们提出工人的要求，以揭露其真相。

（三）本党应当领导群众力争真正工会之公开，实行工人结社、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之政治斗争，再则工人阶级目前最急切的要求，便是经济问题，因为不但工人受着一般的经济金融恐慌及资本家的加紧剥削，而且反动潮流之下资本家必定向工人店员进攻，悔弃旧约，取消工人已得之胜利。本党应当领导工人努力于反抗这种反攻及一切剥削的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不但以改良工人生活为目的，而且可以增进工人的革命化，并强固其战斗力，决用不着怕工人只顾经济斗争而忘却政治，将来成为经济主义。现在中国情况之下，每次经济斗争，只要有共产党的指导，必然增进政治斗争的剧烈，经济斗争是政治胜利的必要条件。

（四）经济斗争之目前要求是：

一、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及店员至多不得超过十小时，童工女工至多不得超过八小时，并不做夜工。

二、失业的救济，应由国家及资产阶级担负（须将失业工

人组织为有力量的团体）。

三、妇女产前产后应有八个星期（五十六天）的休息照发工资。

四、同样工作，须有同样工资。

五、劳动保险及工厂工人住宅之卫生设备。

六、增加工资，并按照物质高涨照加工资。

七、工资须发现金，不得以信用低落的钞票或国库券等代替。

（五）现在职工运动在严重的压迫之中，各工会应有秘密的组织，以防反革命的摧残，而保存我们的实力；各地工运同志，党团支部，更须加以严密的防护，并绝对服从党的指挥，不能有丝毫疏忽。

（六）现时的严重压迫之下，工人更应当有自卫的秘密组织，然不要重视个人的暗杀政策，当注意组织群众的斗争。

（七）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

（八）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如果反革命的资本家闭厂怠工实行经济封锁，则工会应领导工人实行占领某工厂交于当地革命政府管理。

（九）应选有觉悟的工人到农村间去做农民运动，并可轮流派工人到乡间工作，使工农关系在实际上密切起来。

（十）职工运动中手工工人店员的斗争占极重要的位置——中国大多数小城市中，甚至只有手工工人及店员。本党必须坚决的领导他们斗争，组织他们的职业工会，力争改良他们的生活及政治社会地位。

（十一）职工运动中以后要更加多注意产业工人，特别是：铁路、海员、电报、水电、电话、邮政、运输、兵工厂等工

人……他们不仅是我们的主要基础，并且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中他们是打破封建势力及在城市中的大本营之伟大力量。

（十二）职工运动是本党的基本工作，应改正以前把他看做部分工作之错误，应以整个的党来指导他，所以各级党部之工人部应即取消，另设职工运动委员会，经过党部委员会直接指导职工运动中的党团。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之临时政治局，以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组织之。

（二）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职权。

（三）中央所在地最近数月内仍在武汉。同时须组织南方局于广东，至少须有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三人加入。

（四）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而传播之于全国。机关报之党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任之。政治局之下应设一特别的出版委员会，专掌传播党的机关报及中央一切宣传品的责任。北方顺直省委（或北方局）、南方局以至上海省委之下，亦应设立出版机关及传播秘密宣传品传单等工作。

（五）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

---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通过的，原载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

PDG

（六）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各级党部委员会、省委、市委、县委、区委都应当在最近期间改造成下列的方式：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中，分出三人至八人之常务委员会——为指导机关，由其上级党部机关批准；此等常务委员会即应执行各该党部委员会之一切职权。每一党部都应严格的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极秘密的联系。极严格的秘密规律，是秘密状态中党的工作之基本条件。虽极小的破坏秘密规律，都应予以严厉的处分（一直到开除）。各级党部都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如组织各式各种的学生团体、小商人团体、妇女团体、俱乐部等类之组织，利用尚未被封之工会等等，在这些组织之中组织党团，受党的严密的指导，各种伪国民党的下级党部之下，也是如此）。但是即使在最公开的条件之下亦应有秘密组织及工作，这是现时环境中最主要的职任。

（七）秘密状态之中，保存工会的组织亦是最重要的职任之一。一切工会中应当速建立起党团来，人数不要超过五人至七人，须完全服从相当的党的委员会之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工会机关的指导，应由各级党部从速审查，换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同志担任这种指导。

（八）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的服从，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停止职务、开除党籍等等）。

（九）一切支部应当立刻进行秘密工作，并即按照此种目的而改造。每一支部都应当分成五人至八人的若干小组，每组有一组长（并应有候补者），以与支部干事会联络（如支部之下尚有按生产部门的“分部”，则与“分部”干事会或书记联

络）。各小组尽可能的每星期集会一次，进行一切党的基本工作，经过这些小组进行各该企业中（工厂等）的工作。

（十）每一支部之中，须挑出最可靠的同志——负责同志；支部干事会与负责同志应有特别的联络——应按期召集负责同志开会，或全部的集会，或代表的集会。

（十一）每一区的党部亦是如此，在小城市或村镇，则可由全体党部之中挑选负责同志，直接与市委或县委联络，经过这些负责同志，党部委员会即易指导该地全体的党部。

（十二）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下，现时须即组织审查委员会（各省委就是监查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之党员有否不可靠的分子。这种审查不应带有清党的性质，而只是去掉对于党部不可靠的分子，以及可疑的分子。我们党应当在此过渡于秘密状态之际，极力保存多量的党员，要使每个党员都不与党部脱离关系。

（十三）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武汉党部转入秘密状态的关键，因为此处有好几千党员而大半都是没有经过秘密状态的，中央应当帮助湖北省委进行这种改组的工作而直接的督促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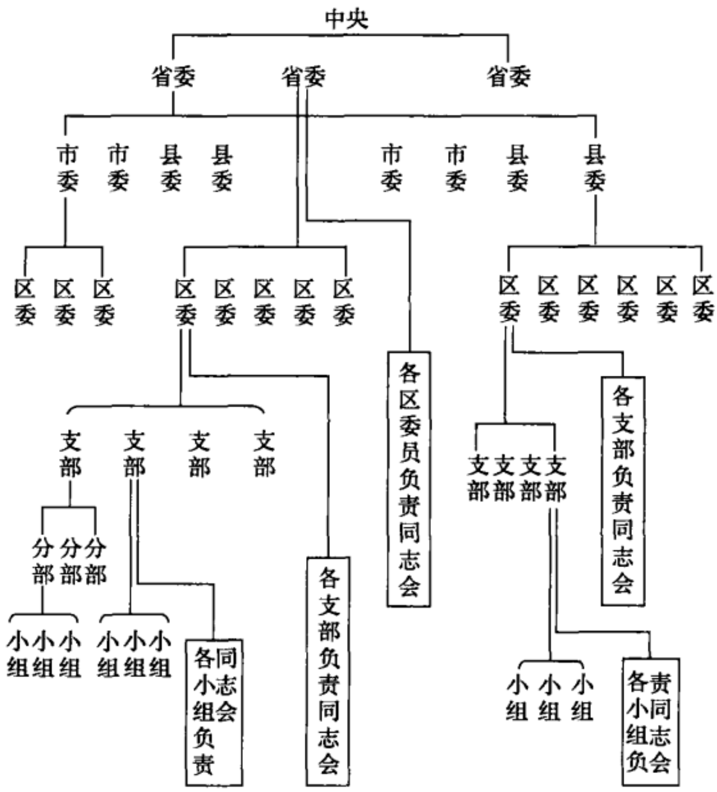
（十四）自省委以下各级党部委员会之成分，都应经过上级机关重新审查，使能更新而巩固。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而肃清其中曾经在最近几月表现机会主义的分子。

（十五）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但是集权制度不应当变成消灭党内的民权主义。最近党所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需要彻底的讨论，付在群众之中加以审查，并根据之以审查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因此，不论如何严重的压迫，必须在本次会议后，设法极慎密的进行党内的讨论：先由支部讨论，然后在各省之区、县、市、省开秘密会议，详细讨

论党的政策问题，而根据这种讨论，改造各级党部的机关。

（十六）党对于青年团的关系，须有极严格的变更。须切实实现各级党部与团互派代表的原则——团部代表有表决权，并引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参加党的政策问题之讨论。

附表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关于湖南省工作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

湖南省委：

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对于湘省工作有以下的决议，请查照执行：

中央前次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其意义是要我们党坚决的去领导四省农民革命高潮，发动土地革命的暴动，推翻四省反动统治，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农会政权；在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前是指导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民左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至于口号上则为“民选革命政府”，“真正平民的民权政治”，故宣传上可说：“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当召集工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民权政府。”而实际上何时可以组织这种民权政府，则应看当地革命委员会权力巩固后再定）。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四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

根据马也尔及你们的报告，对于南昌暴动有两个意向：一个是南昌军事由闽转粤；一个是由湘南编军一师与南昌军力共

同取粤，前一个意见是要南昌军力避免斗争离开四省暴动，后一个意见是重回粤军事看轻湘省暴动，不免本末倒置。中央认为都是错误的。实际湘省如真正集全力发动本省暴动便是给南昌暴动以根本上的有力的响应。总之，你们要明白南昌事变要与四省秋收暴动联为一贯，在这一个原则之下去决定实际工作计划。

中央又决定从南昌暴动的军事力量中抽调一团或二团交湘南特别委员会指挥，集合湘南现有的工农军等，夺取郴宜汝一带，设立革命委员会，帮助全省农民暴动规复全省政权。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但这里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中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

湘南工农会中在马变以来旧的领袖最大部分被压迫去了或被枪毙，此刻只有赶紧的坚决的提取在这几月斗争中表现的积极的“暴徒分子”到各工会领导机关做领袖，同时我们党便也要坚决的赶紧的大批吸收这些“暴徒分子”入党，以建立党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就是会匪之富于革命性的，也要多多介绍加入。必如此，党在国际指导之下新的路线方能实现，秋收暴动才能胜利，要毫不犹疑的执行。

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十五万到二十万的左派党员及其组织曾在我们指导之下奋斗到现在，我们党更要坚决的从组织上取得这些组织，从政治上去领导他们，使他们成为秋收暴动的重要力量。不要单靠凌炳、谢觉斋[1]的秘密委员会去领导，因这种委员会只能号召而不能实际去领导的。现在全靠我们下级党部去拿住相当的左派党部共同争斗，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尽可介绍入党。

湘省委组织没有工农分子参加，中央认为应当改组，兹决

改组的办法如下：

1. 由泽东、公达负责与湘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

2. 新省委以九人组织之，九人不限定都在长沙。九人中至少要有三个工农分子，三个工农运动的负责同志。

3. 中央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特此通知。

吴世荣[2]（安中原[3]改）

八月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即谢觉哉。

〔2〕中共中央的代号。

〔3〕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八月）

湖南省委：

一、寄上湘南工作计划一份，此计划系由泽东提出已经常委通过者。

二、全湘农民暴动的指导、计划、分派工作人员的责任仍归省委。

三、以后关于军事调动委托前敌委员会决定，决定后呈报中央，转知湘委。

四、二德里十五号已非中央交通处了。

五、黄咸夷系新闻记者，湘省同学，现已大反动，并受民中宣传部命令，携款数万元回湘活动，请兄处注意。

六、汉口二德里十五号已不能用，请以后勿寄信或介绍人至该处，中央交通处及接头处俟定妥后即行通知。

七、湘南特委委员为泽东、郭亮、夏曦、卓宣[1]，以泽东为书记，特此通知。

安　中　原[2]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附：毛泽东提出的湘南运动大纲

（一九二七年八月）

一、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3]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

（一）使唐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

（二）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

（三）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

二、军力方面：

（一）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

（二）浏平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

（三）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

右三部分共兵力约一师，以革命军一团做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

三、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挥，革命的粤政府成立，则受粤政府指挥，并供给其需要。中央应命令江西方面执行此计划。

四、党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即任卓宣。
〔2〕中共中央的代号。
〔3〕指唐生智。

PDG

中央通告第一号*

——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

（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后，中央通告重新编号，且以后各部通告，统由中央常委发出，特此附白）

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是国际代表根据国际电令所召集的，这次会议并且改选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倾向，给全党以新的精神，并且定出新的政策。各地党部务必要将这次会议的决议（告全党同志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的议决案，以及组织问题的议决案）给一般党员详细讨论，使得切实的了解并切实的去实行。八七会议的意义之大要如下：

（一）过去党的指导机关（自中央以及地方）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第五次大会以前由于不能了解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已经做了些错误；第五次大会以后，又因为不能了解对付小资产阶级的策略，而更加错误。总以为既要联合国民党，便必须要一种让步政策，如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不免泯灭了。其实布尔塞维克的革命策略，在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中，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一期。

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勇猛的进攻封建势力军阀及帝国主义，以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必须有这种独立的革命斗争，然后方能取得革命之领导权，然后方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及农民。固然让步退却有时是必须的，但是以前中央的政策客观上不仅是让步，却是放弃领导权——因为客观上是处处等待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去“独立”斗争，于是他们动摇犹豫之时，中央自己也不免动摇而犹豫了。过去党的指导机关，还有一种倾向，便是注重于领袖的接洽——民党、军队甚至于红枪会土匪等工作，都是如此。而对于群众的斗争，不能加以充分的领导，客观上往往反而加以阻滞。没有“平民式的”精神，而偏于上层领袖的结合联络。这种不依据群众斗争的力量方法及精神，而注目于上层领袖的政策——自然处处要迁就那些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领袖，而专采用让步政策，自己认错承认幼稚等等。各省党部的政策亦多采用这条路线，最显明的例子如陕西、河南，当冯玉祥反动时极力退缩以图换得冯之中立。顺直省委迭次政治报告都主张向武汉“左派”让步，以免促其右倾，并主张有决心实行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发布对中等阶级的政纲等。

（二）客观上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土地革命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剧烈的改革，彻底的铲除封建制度，这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表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决不能领导这种革命，他已掉过枪来了反对这一革命，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买办豪绅相联系的反动成分，也决不能和这土地革命的发展同道。何况当时武汉政府及军队中尚有直接代表地主豪绅的分子。如果土地革命已经由群众剧烈的发展，则组织这些群众的力量而独立领导工农城市贫民的联盟进攻，便是当然的结论。但是，当时中央机关及指导的同志对于土地革命问题有许多歧见，结果，是一个总退却的指示。工会（店员等）的斗争之中亦是如此。这样，客观上便

是党与正在奋斗的群众脱离了。

（三）再则，以前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职任，始终没有明了的观念。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之中是唯一能引导民权革命到底的阶级。现在农民的土地革命及农会的政权革命，既是民权革命最高形式的表演，无产阶级自然应当和农民群众建立真正的斗争同盟，领导他们去打倒土地革命之一切障碍：新旧军阀、豪绅地主、反动的资产阶级以及虚伪的"左派"。"谁不赞成土地革命及真正的民权革命（农会政权）谁便是假左派，谁便不是左派"。因此，早应有建立纯左派政府的决心，亦即建立共产党所领导的真左派的国民政府的决心——否则永无所谓工农民权独裁制。但是事实上当时对于武汉政府的观察，确有偏重于承认他已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独裁的意思，因为当时并没有力求刷除其中豪绅资产阶级的分子，却在保存这一联盟政府。

因此种种，当时中央政策之客观上的理论是：缓和些阶级斗争，以保存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五次大会的政策和方针并没有实行，却是抛弃了。如今中央紧急会议接受国际的批评，必须使党员群众完全了解这种批评的意义，造成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指导，因此，必须将这些紧急会议的决议，极普遍的发到各支部之中，使党员群众都能够研究而实行；使党员群众的意见得以督促各级党部机关。党的政策问题，都要使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讨论，以实现真正革命意义的党内民权主义，党的群众正在努力斗争，依据他们的力量，是纠正机会主义错误最主要的方法。

*　　　　*　　　　*

各地党部接此通告及八七紧急会议议决案后，务必从速翻印传递下级党部，开始讨论，并立即遵照这些议案改正或实行党的组织、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国民党运动之新方针。附上

八七紧急会议议案一册，项目如下：一、告全党党员书；二、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三、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四、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五、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吴　世　荣[1]

八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

陕西省委：

□□同志来报告陕西工作情形，中央有下列的决议，特为通知，望根据执行：

陕西省委对冯政策，与河南省委有同样的错误，就是想要以让步减少冯之反动程度，殊不知当冯开始反动时，我们不向他进攻便是帮助他的反动统治稳定。冯在河南环境非常险恶，因此，他的统治亦非常动摇，不能稳定，他想拿住陕西做根据地，所以极力排除如于右任、史可轩等，然据□□同志的报告，则冯在陕西的统治亦是动摇不定。两月以来，冯在政治立场上已显然的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成为工农阶级的敌人，我们对他应毫不游移的取进攻的政策。可以成为推翻冯玉祥的真实力量的，不是邓宝珊，更不是岳西峰[1]或其他部军队，我们过去有一沿袭的错误政策，当我们要打倒某一军阀时，总是去找寻另一个弱小的军阀做工具来帮助他，我们已经遭受了许多苦的教训，对这一错误政策，要根本改变过来。真实的力量只有工农阶级和一般穷苦民众，我们的政治路线要坚决的靠在群众的基础上，而不是靠上层的政治上、军事上的周旋。我们在陕西要推倒冯玉祥，我们只有坚决的去组织工农穷苦民众，率领他们向敌人进攻。“抗捐”、“抗税”、“抗粮”、“流通券兑现”、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三期。

PDG

"兵饷发现"、"取消高利贷"是我们号召民众来斗争的主要口号，除了应用这些口号组织民众公开的斗争外，对于敌人施以秘密的破坏（如破坏交通军事机关、税收机关等），亦是必要的。工农自然是斗争中的主要力量和领导者，同时红枪会和土匪亦应当把他们看做工农的弟兄一般去联合，使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来。对于二三军的反冯部队，当然可以利用他们与冯的冲突，然必须认清他们的反动性质，必须先有民众的基础，才足以利用他们。工农阶级不能把自己当做客体，只是去帮助人家得到政权，而要自己有决心准备夺取政权到自己手里。所以工农阶级在革命中始终要自居主人的地位指挥一切。

陕西主要的革命力量自然是农民。最近的过去，农民也有相当的斗争。但是我们党对于农民斗争，却采取了书生的态度，决定没有力量时，不斗争，或斗争到可以得到胜利时，即稳住脚不再进。据□□同志说，事实上的要求恰与此相反，群众每每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农民有了组织，当然就有了力量，但是力量必然要从继续不断的斗争中才能发展，要等到有了力量才来斗争，斗争开始发展又把他拉向后，这如何能领导他们革命呢？这一种态度以后根本去掉，在全省农民中要提出"耕者有其田"、"乡村政权交农会"、"取消高利贷"、"武装农民"、"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口号，在陕南陕北并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口号，关中道虽然据说没有大地主，但在政治上，此地政权亦在土豪劣绅及重利盘剥者手里，所以我们领导群众的口号仍是"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没收豪绅官僚军阀财产救济贫民"、"耕者有其田"。

对红枪会工作，要注意抓住他们群众，不可只去联络领袖。对土匪不要怕他们，而要积极去联络他们，他们多半是失业农民，他们的出路只有土地问题的解决，"劫富济贫"与"没收大地主"的口号有同一性质，我们真能够领导红枪会和

土匪的群众，是农民运动的一大成功。陕西省委应根据以前中央农字通告第九号所指示的策略定出适当的工作计划。

对于大城市手工业工人，应当组织他们，率领他们，做加薪改良待遇等经济斗争。

国民党的工作仍要继续秘密的做，我们的目的是在造成许多左派群众的党部在我们的政纲之下成为革命的工具，而不可只联络几个似是而非的所谓左派领袖，反而使国民党成为这些假左派的工具。因此国民党不须要参加工农的斗争，对于右倾分子断然的排斥他们出党。

党的组织要根据紧急会议的组织决议案，改组各级党部，有农民基础的地方及淮南等县，应提取农民同志加入县委工作。现在党员成分，智识分子太多竟占了百分之八十多，而工农不及百分之二十，以后应当增加工农成分，要立即大批的吸收农民加入党……（下略）

中　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岳维峻。

PDG

中共中央给河南省委的信*

——冯玉祥统治下的河南形势与党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

□□□同志来，得他报告一切，中央对兄处工作有以下之决议，特为通知。

冯玉祥在河南的统治看下面几个危机：（一）北进不仅不能消灭奉军，还要受阎锡山的牵制，而且奉军又有反攻的可能；（二）黄河以南异系军队如方振武、高桂滋、樊钟秀、靳云鹗等，都有团结一致反冯的酝酿；（三）枪弹缺乏；（四）财政没有办法，纯靠严刑峻法下之流通券（只抵二角余）及苛捐苛税维持，因此一般人民从工农穷苦民众以至中小商人无不怨声载道；（五）嫡系军队内上级将领互相冲突并不满意于冯，兵士因生活过苦对冯信仰渐失；（六）工人群众特别是路工因几个月一文不发，愤而罢工；河以南之红枪会及河北之天门会，其下层群众经过数年战争的教训，有运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夺取政权的倾向。这些危险证明冯玉祥在河南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都没有出路，而民众方面从工农小资产阶级以至中小商人中小地主，革命的情绪日益高涨，特别是工农的暴动有一触即发的势力。假使我们党有相当的力量和正确的策略去领导他们，冯玉祥的统治是可以推倒的。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三期。

可是当冯玉祥开始反动时，我们党对于估量冯之量力，采取一种妥协退让政策，工农运动和国民党工作一切遵照冯令停止活动，连民怨沸腾之苛捐苛税亦放任不反对，铁路工人几个月不发饷至穷到一天吃两黄瓜，亦只带领他们请愿式的要求发薪，红枪会则采取“消灭改编”的政策（见他们七月农运计划），想要以这种让步妥协换得冯玉祥之中立，殊不知这种让步妥协，一方面帮助了冯玉祥及反动统治的稳定，一方面使工农群众离开我们的党，使党走上灭亡的道路。

实际呢，河南的工农群众以至大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情绪是非常高涨的，只等待我们的领导。中央认为现时我们领导在这一革命潮流中，正确的政策应当如下面的规定：

（一）聚集革命潮流中一切革命力量之重要成分，如铁路工人农民、河北之天门会、河南之红枪会、兵士、其他土匪、受苛捐苛税纸币压迫的一般穷苦民众以至小商人。党的策略是要以工农为中坚，积极的勇敢的领导其他成分向前斗争，经济的斗争汇合起来以至推翻整个的冯玉祥统治为止。我们的党必须全体动员坚决的去领导这一斗争，一直到最后胜利，才足以把党从过去的错误中救出来，才足以领导现在的革命潮流。

（二）发动并且领导这一斗争的主要口号如下：

一、实行耕者有其田；

二、抗捐抗税抗粮抗租；

三、不使用不兑现的纸币；

四、工饷发现；

五、兵饷发现；

六、没收高利盘剥者的财产交给贫民；

七、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穷者农民和兵士；

八、反对没收红枪会、天门会的枪支，武装工农；

九、一切农民红枪、天门等会友起来组织真正的农民协会；

十、乡村中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

十一、教育经费发现；

十二、保护工会农会及一切民众团体；

十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

十四、打倒反革命的冯玉祥；

十五、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势力；

（三）对工人运动尤其是铁路工人，要开始经济斗争，请愿固全无意义，仅仅怠工也是消极没有益处，现在应当实行罢工，只有罢工才能得到工饷的发现，才能坚定阶级的意识，重新提起阶级的力量，成为全省斗争的领导者。

（四）农民运动要求耕者有其田，乡村中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没收高利盘剥者之财产，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之土地财产，武装农民及反抗的口号之下发生广大的斗争；同时我们要提出一切农民、红枪会、天门会等会友都起来组织农民协会，使红枪会、天门会的群众感觉“乡村中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是为他们本身提出的，免得他们与农协的冲突。但农民斗争，我们党必须有决心的采用种种方法，从农民与红枪会、天门会及土匪的群众（当然不是指领袖）联合一气，在一条战线上决战。

（五）红枪会群众经过连年之战争，有两种新的表现：一是反对其领袖受编，一是反对帮助某个军事领袖作战的方法，感觉失望，这就是表示他们有自决的觉悟，我们应断然抛弃过去之消极政策，打进去领导他们。河北天门会在北伐战争中自动的铲除土豪劣绅，向封建阶级进攻，并组织了许多民众团体（如儿童团……），政治觉悟和斗争力量都比红枪会强，占据一县或数县，已不算奇事，无论张作霖或冯玉祥都不敢加害他

们，可惜我们党没有去领导他们。因此，他们到了不能占据一县的时候，他们的首领就走入歧途而与土豪劣绅妥协起来。有这样好的武装势力，我们党不去领导他让他走上错误的路这是何等的可惜！中央认为河南省委应该马上分配人力到河北去领导他们实行夺取政权、建设政府。这斗争的发展，足以鼓动全省工农的暴动，提高他们夺取政权的决心和勇气。

（六）对于国民政府工作也应当改变我们消极的态度，河南决无右派的组织，从前在我们及左派中的党部应当秘密的继续活动，我们党要毫不客气的去在组织上政治上领导他们。在组织上排除一切右倾分子吸收左派群众，在政治上要领导这些秘密党部做反冯反唐[1]反汪[2]反奉反鲁的宣传，指出真正的国民党应是工农平民的党，否则不要国民党。

（七）对于高桂滋、方振武、樊钟秀等一切反冯的军队，我们应促进他，可以利用他们反冯。我们党对于他是否帮助呢？那要以他们拥护民众利益为条件，并且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始终是只有靠在民众的基础上，这就是说：他们每一次侵犯民众利益时，我们必然是领导民众反对他们……

（八）党的组织应当根据紧急会议组织决议案改组各级党部，省委应提取工农分子参加。全省组织状况和统计，应赶快做一报告寄来，以便指导。

中　央
八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唐生智。
〔2〕指汪精卫。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

（一）

中国革命，现时正在自己发展之中，经过极危急极剧烈的转变关键。这一转变关键，即是各种阶级力量剧烈的变更其结合之形势；各阶级力量之变更其结合形势，实在早已开始，而以四月十二的上海屠杀至七月十五的武汉政变为其结局。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初期，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现在呢，这一阶级的各种成分，甚至其中最急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而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革命营垒中，阶级分化，已经表演完结。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并已与反动的封建军阀联盟。蒋介石的四月十二屠杀以前，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营垒之中，有两个倾向并存着：一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一是急进的革命主义的倾向，这两个倾向一直互斗到现在。现在呢，已经是两个完全独立互相仇视而不可调和的营垒相抗衡：一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营垒；一是工农的革命营垒。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任务，现在已经完全放到工农运动身上，只有工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二期。

农的民权独裁，才能履行这一任务；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与国际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直接斗争——“民族”资产阶级亦在其中——如此，方能履行这一任务。

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运动之间的联盟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固然日益趋于不可避免的破裂，然而并不一定要像现在这样的破裂形势。工农民权独裁的胜利，亦是各种阶级力量之急剧的变更其结合形式；可是这种胜利，只能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达到。各阶级力量之急剧的变更其结合形式，如果要达到工农运动方面的胜利，那就必须是民权革命的急剧的前进与高涨。然而实际上现在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着了胜利，这当然是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严重的失败。这一失败的责任，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指导之机会主义政策，阻碍了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放任资产阶级的行动。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居然能吸引几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到自己方面去（尤其是知识分子及与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的一部分反动分子）。这种反动的胜利，其规模很大；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前，尤其是四月以后，不执行那种屈服的取消群众运动的方针，而能切切实实行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那么反动的胜利，不能如此之大的规模。现在中国革命经过极厉害的危机，其原因便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之失败——以前中国共产党指导群众运动的方向，完全是错误的不革命的。战胜这一危机的基本条件之一，便是中国共产党之正确的革命的策略，要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力解决革命斗争中每一阶段中客观上可以解决的一切任务。

（二）

中国革命还没有能解决其许多任务之中的任何一个任务，

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先变成了反动的力量。中国革命在现时这一阶段之中，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不但反对封建制度的余孽，并且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而且革命已经造成一种力量，足以来解决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在这两年来，已经发展得非常之伟大。然而正因为这种力量之发展，便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到反动的营垒之中，而革命却还没有能使中国之国际地位，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得有任何重要的变更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着了暂时的胜利，这种情形使中国革命之两个前途的问题变成目前紧迫的问题——已经是中国平民的一般斗争的中心问题了。

如果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和国际帝国主义妥协成功（而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力求这种协定的成立），如果他竟能在全国范围的实现与封建势力的反动联盟，如果封建资产阶级的联盟能够完全镇压工农的群众运动，最后，如果国际资本政治上经济上确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帮助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巩固起来——那么在这些条件之下，中国的发展就会走上长期的迁延的使几千百万工农受着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灾祸的道路——以资本主义来排斥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经济关系。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如果得有巩固的胜利，并有外国的赞助，则中国将要进于“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不过比较前一世纪的普鲁士更加要受阻碍，更加要多受痛苦，因为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及中国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与野蛮性，实在是一切进步中之巨大阻碍。即使对于向着资本主义前途之进展，亦是极大的阻碍，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必然的不可免的与世界帝国主义加重其对于中国之殖民地政策的剥削互相联结。

至于别一种的发展道路，则必须革命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而建立工农的民权独裁制，方才得有保证。革命在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阶段上，其客观的内容是：一、完全

解放中国于外国资本压迫之下（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的特权，取消外债，关税自主，外国人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交通机关收归国有等等）；二、建立全国的国外市场——没有在政治上统一中国，没有消灭军阀的割据，没有集权的中央政府，这是不可能的；三、肃清一切阻碍中国发展的封建遗毒（取消地主豪绅的私有田地，土地国有，重新分配土地，自上而下坚决的摧毁一切国家机关，而代之以革命的民权的新政府，歼灭土豪乡绅官僚军阀等）；四、急剧的改良工人阶级之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地位，坚决的取消工人之无权无利穷困不堪的现状——这是外国资本在中国之经济力量之主要根源之一。

这些任务，只有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制，才能够实行。然而中国现状的特性，更在于这种自无产阶级农民来实行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反抗中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当直接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及农民，为着完成民权主义的革命及中国之民族解放，也不能不进而没收一切外国工业及一般反革命党财产，这就要超过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如果无产阶级及农民，怕超过资本主义式的关系，怕进于社会主义式的道路，那么，就是民权革命也不能得到胜利的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将以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与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并且要靠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方面的帮助。然而这一转变始终将要是一个无间断的过程。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性，以及无产阶级独裁胜利之存在，就是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之客观的保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认清的主要的目的。

至于这两种前途中，究竟哪一种前途得以实现，那就只有斗争可以决定。为要有正确的指导起见，必须要很清楚的分析一般的客观形势以及每一时期各种力量之相对关系。

（三）

据一般的客观形势看来，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其胜利是极不巩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张发奎军队之中共产党员在南昌起义，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就可以算得这种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先声。如果革命之重新高涨客观上的前提不具备，则南昌起义的暴动也就不可能的了。这些主要的客观前提是：

（一）中国现在任何稳定都不能有——因为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政变，其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本是如此。中国的革命，本来是由于这封建制度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内，因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集聚了许多种的国际国内的矛盾，日益增长激厉所致。革命还没有能解决其中任何一个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格外剧烈起来，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就可见，为什么现在发展全国的大危机，这种危机的急遽，正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之后。极紧迫的经济危机（财政、商业、工业都是如此），和政治军事的危机互相联结着（国民革命军的崩坏，军阀的分裂和互斗，蒋介石下野，武汉政府内不可免的纠纷分裂割据的大扰乱，表面上虽然南京和武汉政府要统一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最后，国民党也在崩坏），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不能够继续力争中国的民族利益，不能够保障中国国家的统一，不能够解决工人问题、土地问题，不能够预防经济的大崩坏，资产阶级军阀自己的营垒里，土崩瓦解的倾向非常利害。这种全国的大危机的出路，只有民权革命彻底的胜利，否则，便要使民众受着无限的痛苦，中国的政治经济经过极大的崩坏，中国因此而大大的退步，由此而准备“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

（二）工农之革命的群众运动，虽然受着失败，然而还没有大破坏，还没有因为受了镇压简直不能够重新高涨。共产党员的积极，工人区域中秘密工会的奋斗，就足以证明，虽然白色恐怖非常利害，然而群众的积极仍在日益增长。广东、湖南、湖北、陕西、河南等省，虽然有极残酷的反革命的压迫，然而农民运动的革命基础仍旧存在，革命已经引进极广大的工农群众，他们的生活状况，在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简直是日益恶化而没有出路。所以这种群众独立的自然爆发的斗争，不能为任何恐怖政策所完全镇服。

（三）中国的国际状况没有经过任何的变更，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以巩固，民族资产阶级力求与外国资本妥协，然而同时，他至少在口头上不得不代表中国的民族利益而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政策，自然又使企图完全统治中国的外国资本离开他，使外国资本和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发生困难。别方面呢？帝国主义列强自己之间有冲突，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联盟之内，亦有冲突——互相争权夺利的抢地盘主义是他们的天性。这种情形，也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的阻碍。最后苏联及国际的革命运动，又是加强中国群众革命斗争的绝有力的动力。

有了这些客观条件之后，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之组织和正确的政策，便是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决定胜负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保存了自己的战斗队伍，不怕反动的缉捕压迫，而且能够改正过去指导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凡此一切，总合起来，便使中国共产党负着极大的任务，就要在一切客观上有可能的地方，都立刻准备组织革命的暴动，认清自己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军阀的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权独裁制。

（四）

因为中国各省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没有集权的政府，所以中国共产党不能预定一个时期举行全国的暴动，以推翻中央政府来决定暴动的胜负。现在本党总方针应当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现时便趁秋收时期而实行抗租抗税，在这一样的时期之中，各省暴动的时日，只能看当地情形及一般情形去决定。中国共产党应当认真的明了并且应用马克思、昂格斯、列宁的暴动学说——暴动是一种艺术，不是可以耍着玩的，要极精细的在技术上、组织上、政治上准备好，既然决定暴动，便决不可以中途抛弃这一种计划，一定要引导暴动到底，应当坚决的绝不回头的勇猛的行动，永久要由自己方面发动，而立刻采取进攻的形势。应当记着：在紧急关头采取防御的战略和动摇犹豫的态度，必然陷暴动于败亡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要破坏动摇我们阶级之武装力量。因此，本党应当极快的征调最大限度的力量，到新旧军阀的军队中去工作，组织并发展我们的支部。这一任务，是现时非常紧迫刻不容缓的任务，本党以前差不多完全没有注意到。

民众工农暴动的胜利，势必引起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及一切反动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残酷的反攻，从经济怠工，直到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的准备镇压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实行猛烈的革命战争。必须准备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企业工厂，采用极严厉的镇压政策——实行革命的独裁。

（五）暴动之方式

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

下。这有以下的几个理由：

（一）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所集垒生长出来的，国民党的领袖已经被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所利用，以为反动政策之工具，不但背叛了国民党党纲主义中的一切革命的进步的成分，而且葬送了国民党，使他要丧失政党的资格。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能使国民党形成资产阶级的领导政党，这种政党必定要在与现时国民党不同的社会政治基础上方能发生。要恢复国民党，便只能恢复革命的国民党，或是简直不能恢复。汪精卫、唐生智的所谓党权三民主义等等，完全是冒充国民党的假招牌，以掩饰其反动的政变——这次政变其实是国民党亡党的政变。

（二）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形成了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本党过去指导的机会主义，固然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变成了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但是在下级党部之中，党员群众的行动，是以纠正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共产党下级党部群众的行动与宣传，使中国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业群众之中，已经很有革命的威信。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

（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这些分子，本是左派国民党的主要群众。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胜利，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动摇分崩。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被反革命派所吸引去了，他们的群众政治上是崩坏了，无所适从了，中有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还留在革命的道路上。本党现在和他们合作而组织秘密的革命的国民党。但是革命斗争之不可免的重新高涨，又要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的群众运动方面

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本党应当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不但应当加入秘密的国民党党部，而且要保证自己的指导作用。同时共产党应当极谨慎的避免过去指导之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保障本党的自己的完全的政治独立，保持本党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之摇动犹豫之无限制自由（参看中央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尤其重要的：是使革命的国民党民权主义化，凡是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暴动而胜利的地方，工农群众团体，应当用团体加入的方法，加入这种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群众团体联合的党，使反动分子不能假借国民党党部名义，来实际上做阻滞革命的工作。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结构，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涨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过渡更容易些，更没有流弊些。

（六）政　　权

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本党认为照现在的形势，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而且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完全只要看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所以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

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

败，同时，革命又确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如果组织革命的国民党的计划能够成功（如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还来不及完全消灭国民党），那末，本党就应当在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时，使苏维埃制度得以从新的革命政权之中生长出来——这种新的革命政权，现在就要着手组织，依照最广泛的各种革命阶级选举的最民权主义的代表制度。

（七）政　权[1]

为指导各地暴动起见，应当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暴动成功之后，这些革命委员会之中加入左派国民党人（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革命委员会之中的指导权），革命委员会就变成临时的革命政府之性质，全省范围之内，应当称为某省临时革命政府。乡村中之暴动成功之后，革命委员会立刻应当组织农民协会而以一切政权交给他，农民协会秘密存在的地方，必须在准备暴动的时候就使农民协会的指导者加入革命委员会。

城市之中的革命委员会或则某省的临时革命政府在暴动胜利之后，就要着手组织新的政权，应用下列的形式：平民代表会议，由各工厂工人，各职业工会的手工业工人或店员，学生会学生，小商人团体的小商人，军队的兵士等以职业选举团体选举的方法（不以区域为选举原则），以人数为标准，公选代表组织之。由选举平民代表会议，选出某县某市的革命执行委员会，城市之中的政权便完全交给他。全省的政权应当由各县平民代表大会选出。各县革命委员会及各省临时革命政府，应当定出召集这种城市平民代表会议或全省平民代表大会的日

期，这种日期依暴动之后的形势如何而定，如果组织新政权尚须很大的政治上的准备，则召集代表会议的日期，可以略为迁延。

资产阶级及封建军阀等类的阶级，不应当叫他们参加革命的政治机关。

本党现在提出下列口号——乡村之中是“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之中是“革命的民选的政权万岁”！（民选革命政府）

（八）军　　队

除去彻底的反对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阶级斗争以外，民权革命是决不能胜利的。这种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军阀如今很容易的利用雇佣军队来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证据。因此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本这个目的，本党应当努力的改组现时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同时应当想种种方法武装工农（如某市工军，某县农军的地方性质的武装，不用旧的纠察自卫的名称），无论如何不能解散他们。从这些工农武装，是造成新的革命军队之中心势力。

（九）对帝国主义的策略

民众暴动胜利的地方，如果可以遇见与资本主义列强直接的接触（例如广东以及其他有海口的地方），那么，本党应当

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应付的策略，使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不至于过早的发动。本党应当继续不断的增加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宣传，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领导经济的斗争（如抵制外货等），同时如果与帝国主义的直接冲突可以根本牺牲新兴的尚未巩固的革命政权——当这种工农阶级民权独裁制还只有很小的地盘的时候——那末本党应当暂时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夺回租界，没收外国工业使为国有等等）。应当记着——帝国主义在中国各种反动势力的赞助之下（从张作霖一直到汪精卫），必定时时刻刻来挑衅，想借口来屠杀，来镇压真正革命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平民政权。本党应当预先看见这种危险，在不利于新的革命政权之时机，不要接受帝国主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赞助之下，等到对于革命最有利的时机，然后要领导中国工农民众去直接的与帝国主义斗争。

（十）

最近期间本党对于农民运动，工会运动，以及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已经有八七紧急会议各个议决案，并且有中央紧急会议的告全国同志书，这里不再复述。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六、七两项标题重复，疑原文有误。

中央通告第三号

——建立党内交通网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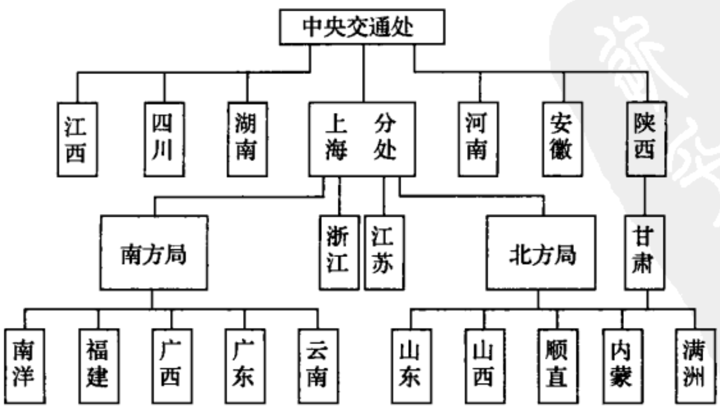
南方局、北方局，各省委、临委：

八七紧急会议议决中央须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此交通网的职任有二：

一、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

二、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

中央因为经费困难，暂于中央所在地设立中央交通处，于上海设立交通分处，为中央与南北局及江浙间交通之总枢纽，暂时北方局所辖各省交通由北方局办理，南方所辖各省由南方局办理，江浙则由上海分处办理，其余各地由中央交通处直接办理。全国交通组织系统表如下：



交通员到达各地时，不得在当地逗留二日以上，免妨碍交通。如因当地党部特别原故不得已延至二日以上者，须由当地党部给予证明书并供其延留期间之用费，各地党部于接到交通员带到之物件时须立即给予回条，所有交给交通员递送之件必须尽可能使之轻便易带。望特别注意为要。

吴　世　荣[1]

八月二十一号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中共中央给南方局转广东省委的信

——对敌人进攻叶贺军队的估计和对策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南方局转广东省委：

前次送来广东农运暴动计划，太雷[1]兄又带来紧急会议报告并中央对广东工作的策略（均系口头的），谅已达到。但迄今未得兄方报告，不知南方局是否已组织？兄处对暴动的工作是否已经准备到可以即时发动？中央对此悬念甚切。

蒋介石因为津浦线上大受挫折，李、白[2]动摇，武汉方面又实行出兵东下，军事、政治、财政均无办法，宣布下野。武汉方面对此表面上高唱党权胜利，实际只是进一步向南京投降。然武汉与南京间，实际并不能因此而即时妥协一致，以至于促成反动局面之稳定。对武汉与南京间局势之变化，中央已有告民众书寄往各地，望兄处广为散布，并根据此宣言之意义，搜集当地材料，用省委名义发一宣言。

蒋介石因客观的逼迫下野，委李、白等军队于前线，精疲力竭不堪再战，因有南回之意。武汉方面对此有二派主张：唐生智主张继续东征，意在使谭（十三军）、程、张[3]军队当先对李、白……等部，从则使当奉鲁军前敌，继续挡炮口，不从则沿途缴械而自己坐收渔人之利；但汪精卫则有意委奉鲁敌军于唐生智，而让李、黄、朱[4]、张等部南伐，此乃代表李、黄、张等意见所谓第三派的企图。现汪、唐、谭等都已麇集九

江，必在彼有一度军事会议以决定此问题。依现在主客观形势，南伐颇有可能（所谓南伐即是去解决叶、贺[5]），而叶、贺离南昌后之情形此间完全未得到报告，不知能否顺利达到目的地，中央对此有下列的决定：

一、叶、贺之师须迅速到达目的地占领东江，迟则恐被李（济深）、张、朱等联合围击，如能早拿住东江两个星期，则反客为主可以进击敌军夺取广州。

二、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内应。

三、为牵制李、黄[6]军队起见，对西江及南路亦须立即有军事的动作和农民暴动。

四、省委须立即派出原路交通（步哨）与贺、叶通消息并为之作向导。

总之，我们要假定在南伐的可能之下敌人对我们的围攻，而以敏捷的进取的战略消灭敌人。望兄处特别注意。此外中央已加紧督促两湖暴动的实现。湘鄂暴动的实现，一方面即是对广东的声援。兹将湖北暴动实际计划及中央致湘省委信附来，可查阅。

中央上海交通处与汕头的交通望兄处迅速建立。对于前敌消息及全省暴动工作，请立即做一报告来，以后并盼每三日有一报告寄来。

吴　世　荣[7]

八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张太雷。

〔2〕指李宗仁、白崇禧。

PDG

〔3〕指谭延闿、程潜、张发奎。
〔4〕指李福林、黄琪翔、朱培德。
〔5〕指叶挺、贺龙。
〔6〕指李济深、黄绍竑。
〔7〕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中共中央关于武装起义问题给湖南省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湖南省委：

子任、公达[1]回湘后，未得兄只字报告，不知暴动工作准备到如何程度？见否可以即时发动，甚以为念。

蒋介石因被客观逼迫下野，但武汉与南京之间的大小军阀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妥协，使反动局面至于稳定。现在唐生智主张继续东征，意在使别人当敌而自己收渔人之利，汪[2]则代表李、白、朱、张[3]等企图南伐（消灭叶、贺[4]取得广东）而委敌于唐。另一方面，武汉三镇米粮绝市，店歇业者百分之七十以上。同时冯玉祥被逼无论[5]有南下武汉之图，刘佐龙、魏益三等小军阀扰乱于肘腋之间，武汉经济从上至下到了异常摇动的时候，民众的革命情绪亦异常激昂。在湖南所有宋许之扰乱，和黔军入湘西之警耗，东军大举东下而回部如此摇动，实是土地革命暴动的好机会。中央对于武汉、南京间之变化已发表宣言和通告，兄处可以查照执行。对于广东亦另有决定。对两湖暴动认为应即时开始。一则为以精进的手段，牵制南伐敌人而消灭之；一则为抓住两湖境内反动统治摇动的机会，均应即时开始，并且要取一种相应的动作。兹将湖北准备情形另抄寄来，其中关于鄂南计划因与湘省之平、浏、岳联络一致，因此，中央对于兄处有以下之决定：

1. 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

2. 平、浏、岳一带设立特委于平江，直接与鄂南联络一致动作。

3. 暴动中尽可能利用反唐军军事势力以打击唐，但这绝不是说可以因这种利用而摇动我们暴动的根本原则。

4. 省委每三日送一报告到中央，以便随时指导，并在可能范围内计划湘、鄂动作之互相呼应。

请即调佑魁[6]兄来中央工作。

吴 世 荣[7]

八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毛泽东、彭公达。

〔2〕指汪精卫。

〔3〕指李宗仁、白崇禧、朱培德、张发奎。

〔4〕指叶挺、贺龙。

〔5〕原文如此。

〔6〕即陈佑魁。

〔7〕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

一、目前两湖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

二、两湖的暴动尚未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这是犹豫不决与不相信农民的群众力量的结果，如此便要丧失革命。

三、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许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之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这样领导暴动，暴动无疑义的要归于失败。这不是暴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

四、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因为两湖的环境不同，两湖应各有其中心区域，应各创成一种独立的暴动局面以发展暴动，但总的政治目标口号与行动须一致。

五、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一为湘南各县，郴州、宜章、汝城、永兴及衡阳、耒阳、衡山两路，准备须于九月六号开始暴动，夺取衡阳，暴动成功后，会合潭醴之师合取长沙。第二区为湘中、湘东各县，为安源、醴陵、湘潭、湘乡一路，

---

* 这个文件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四期。

浏阳、平江一路，宁乡、益阳、安化一路，湘阴、岳阳、长沙与其近郊一路，各路以长沙为中心作准备，于九月十日开始总的暴动。各区暴动成功之后，除留一部分力量维持本区之秩序外，即应迅速调遣大部力量攻长沙。长沙于九月十二、三号，应有一暴动，实行取得政权，推翻湖南省政府。湘西分临澧、安乡一路及常桃汉一路，常德为中心，准备于九月十号开始爆发，夺取常德为长沙声援。此外湘中之宝庆一带，及湘西之澧县一带，亦须有准备于九月十日左右发动，以为各路主力之声援。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

六、湖北暴动应划成下列各区：

1. 鄂南区即武长铁路区，为通城、崇阳、通山、蒲圻、嘉鱼、咸宁、武昌（近郊不在内）七县。

2. 鄂中区为沔阳、潜江、汉川、天门、京山、应城、监利七县。

3. 鄂西区为江陵、公安、石首、荆门、当阳、宜昌、宜都、松滋八县。

4. 襄枣区为襄阳、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县。

5. 京汉路区为黄陂、孝感、应城、应山等县。

6. 鄂东区为黄冈、鄂城、大冶、蕲春、黄梅、广济、阳新等县。

7. 武汉区为武汉三镇与四郊。这许多暴动区域，应从鄂南开始（九月十号），鄂南开始之日，鄂中、鄂西即须大暴动，与鄂南联络创成一独立局面，威吓武汉，或从鄂南攻岳州威吓长沙。襄枣的暴动如主客观有可能，张兆丰的军队又到，九月十号之前即开始，至迟十号与十号后一、二日即行动作。如鄂中、鄂西暴动胜利，张兆丰军队须速调至暴动的区域，完成暴

动直攻武汉。武汉此时须有一大暴动，至少亦应有一大的骚扰（如主观力量暴动不可能时）。鄂西、鄂中暴动如不能成功，则张兆丰的军队，须用各种方法，调往湖南或留在襄枣。鄂南、鄂中、鄂西、襄枣暴动开始之后，鄂东区、京汉路区须尽量响应。

七、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某农民暴动区域军事的指导用某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同时仍保存地方军队性质的工军与农军，执行各境当地警卫，以之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础。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前，应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自卫军即应改称农民革命军。

八、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

对于反唐[1]的杂色军队（许克祥除外），如能对于暴动取中立的态度，则可利用其中立以便迅速发展暴动，并须设法与其兵士接近宣传他们。暴动成功后，对于此种部队斟量予以解散或改编。但这决不是说要牺牲我们的根本主张以换取他们的中立。在暴动中对于有反暴动倾向的杂色军队和土匪，虽然他们是反唐的，也要立刻解决他们。

九、暴动为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即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事实的结果是全部），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与没收其财产，实行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民选革命政府，消灭一切非农民非工人革命的武装。

十、暴动之前须极端注意兵士中的宣传，鼓动他们起来杀戮反革命的军官；一有可能，便应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这种

组织应是广泛的群众的。暴动之中要吸引兵士参加。这种革命兵士的组织可以做改编新革命军的成分。

十一、暴动的口号：暴动打倒武汉政府，暴动杀尽土豪劣绅反革命的大地主及一切反动派，暴动为死难民众复仇，暴动没收地主的土地，暴动实行耕者有其田，暴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暴动恢复一切革命民众团体，暴动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暴动实行民选革命政府，暴动打倒叛国叛党的汪精卫，暴动打倒残杀两湖人民的新军阀唐生智，暴动组织革命军，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平民和兵士的革命联合万岁，农民革命胜利万岁，革命委员会万岁！

十二、各区的暴动在未发动之先，在离城较远一点的乡村即应杀戮土豪劣绅反动的大地主，提高农民革命的热情，举行各区农民群众大会，多作群众的政治宣传（按照上列的口号加上实际的事实），如发传单、讲演、壁报、告示等。在暴动方开始，首先即须征集所有的力量攻打某乡区的中心城市，屠杀政府的官吏，宣布革命委员会政权，然后才能发展普遍的暴动。

十三、暴动方开始即须掘断铁路，破坏水陆交通，占领破坏邮政机关，割断所有的电线，造成敌人的绝端恐慌的状态，然后才可便于暴动的发展。但因交通机关的破坏，同时影响于我们自己的联络，各暴动区域应当想出特别传递消息的方法，切不可因此而迟延等待某区的暴动，即令暴动发生后各方关系断绝，亦应按照预定的未成功与已成功的地点猛烈的进攻，绝不可犹豫，犹豫便是破坏暴动的胜利。

十四、暴动胜利的地方，应无情的镇压肃清反革命。对于买办及反动的资本家，如果他们经济怠工或封闭工厂，则工会应当占领工厂，以之交给革命政权管理。至于反革命的豪绅则应坚决的没收其财产。但必须注意应用正式革命政权机关实行

这种收没，严禁私人的抢掠侵吞。

十五、长沙、武汉两湖省委，应有一特别的暴动计划。

十六、各区的暴动内部的指挥为各区的特别委员会，直接归省委指挥。[2]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唐生智。

〔2〕据《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的引述，此句之后还有："武长铁路如发生指挥上的不方便时，两湖省委的特别委员会即应联合组织，归中央直接指挥，同时受两省指挥"。

PDG

告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全体官兵书

（一九二七年八月）

贺　龙

本方面军全体官兵同志：

八一南昌举义，本方面军多数同志都能鼓其勇气，对于革命的行动及意义，深深谅解，不过经过这十几天的行军，依我的观察和见闻，还有一些同志，不甚明了，为此兄弟不惮烦劳，特为我全体同志一略言之：

（一）这次南昌举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是真正拥护总理的主义和政策的革命行动。因为我们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北伐，变成了蒋介石个人的胜利。今年三月间的党权运动，又被唐生智利用。第二次北伐，也变成冯玉祥、唐生智的胜利。南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是蒋介石个人的工具，而吴稚晖、蔡孑民[1]一辈人，做了他的装饰品；所谓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原来还有三分人气，大家所公认的领袖汪精卫，初回国时，志气甚豪，劈头告诉我们道："中国不解决土地问题，国民革命绝无成功希望"。他又起草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肥田五十亩、瘠田百亩以上一律没收"。但是他听见唐生智、何键那些野蛮的武人哼了一声，便骇得魂不附体，把他所起草的决议案，藏在荷包里，不敢发表。许克祥以一个团长，在长沙等处，杀了一万数千工农群众及各级党部服

务同志，汪精卫所领导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竟以记过了之，不久许克祥却又升了师长，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奖励军阀做反革命、反农工叛党叛国的勾当吗？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这样的领袖，要他何用！所以我们为保持孙总理的主义政策，拥护革命的胜利，不能不毅然决然地服从多数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各省党部负责同志所组织的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在南昌举义是吾党革命同志及全国有志之士倡导。这种行动，完全是站在党的观点上的行动，绝不是我贺龙和叶挺军长想谋叛长官，希图权位。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一件事。

（二）有人怀疑道："我们现在离开了党，离开了政府，又离开了政治领袖——汪精卫，离开了军事领袖张发奎，我们将何所依据？"像这样小孩子离了娘似的可怜状态和怯懦心理，我们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武装同志是万不应该有的。我们自然要个革命的党，革命的政府，革命的领袖来领导我们，但是所谓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所谓汪精卫，已经成了失灵之木偶，已经变成了唐生智、何键一班新军阀的工具。我们要他作甚！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是孙总理在日应付商团事变的非常组织；此次在南昌各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党部负责同志秉承总理遗教，恢复此种制度，以救党国的危机，汇集党务政治军事各大端于一处，以应非常之变。只有革命委员会才是我们革命党的指导机关，只有革命委员会，才是我们革命政权所寄托的地方，只有革命委员会的各委员、各主席，才是我们革命同志的领袖。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二件事。

（三）中国的国民革命，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所谓武汉中央党部，既然欺骗民众，违背中央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案，献媚军阀。我们革命委员会却下了决心，首先，实现第三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完成土地革命。我们的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同志，十有八九都是贫苦的

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既是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奋斗，那末我们吃苦，我们牺牲，我们忍饥受暑，都是应该的。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三件事。

（四）在这个炎天烈日之下做长途的行军，各位同志一定会有些病的，甚至于因病而死的，我和叶军长自然抱着不安。但是这种痛苦，都是谁给我们的呢？第一就是唐生智、何键。因为他们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抢劫中央银行现金，使中央纸币一落千丈。第二就是朱培德，他把江西银行现金二百万强行提出，饱其私囊，致江西纸币价格陡跌，至民间拒绝使用。我们第二方面军得不着现金，所领饷银全系纸币，不能采办粮秣，致使我辛苦百战之武装同志，当疲惫之余，无以疗饥过活，而汪精卫还在那儿天天要蛊惑张发奎拆散我们第二方面军整个的革命军队，以快唐生智之心，而苟延其无耻的政治生命，致使我第二方面军分崩离析，颠沛流离。我们感受到痛苦，便会想到使我们痛苦之敌人是唐生智、何键、朱培德、汪精卫，我们便要鼓起勇气杀到广东去。到了广东，方可以保存我们真正革命的力量，发展我们真正革命的力量，建设革命的新根据地。我们到广东，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不是送广东同志回家乡，是集中各省革命同志，准备第三次北伐，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实行总理的三民主义，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及卖党苟活的汪精卫等等。这是各位同志应该知道的第四件事。

（五）我们既然明白我们是为自己革命，为自己牺牲，我们对于民众尤其是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不然，我们便不是革命党，我们进行的便是和新旧军阀一样的战争了，便是同蒋介石、唐生智以及其他攘夺地盘的战争了，这是反革命的行动，其结果是违反人民的利益。这是同志应该明白的第

五件事。

本总指挥治军素来不喜多言，但是说了，必定要做，彼此同受党纪军纪的约束。以上五事，我们革命同志必须遵照执行，革命成功，定在不远，愿与诸同志共勉之。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贺龙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即蔡元培。

PDG

中共中央关于广东武装起义计划给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指示*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

八月二十二日的报告收到。

中央对于你们的暴动计划均大致同意，惟须立即开始，不要等待贺、叶[1]军到来，技术上并可参照两湖暴动计划，省委名单亦照你们提出的批准，惟尚有以下几点请留意：

（一）此间多传张发奎仍欲与我们妥协，据江西报告，黄琪翔的军队在赣南公开的呼出"打倒叛党叛国的唐生智"、"打倒分赃式的汉宁合作"等口号，亦可以证明此倾向。中央八月三十一日致你们的信中，即已指明张发奎到我们军队中来的危险性以及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坚决的与他绝缘。张发奎已经是南昌事变的反叛者，已经是我们公开的敌人，我们与他已毫无妥协之可能，兹特再行郑重声明：前委应坚决的不犹豫的执行中央的策略，同时我们势力所及之地执行中央政治任务决议案，不能对这些政策及决议案发生不同的意见，南方局应迅速的将中央意见转知前委。

（二）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中有不少因一时利害关系而来与我们合作的分子，如我们在肃委中同志的态度不坚定，不但不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五期。

能够影响他们，甚至还要受他们的影响，因此中央对于你们暂时（在革委未到以前）利用肃委的意见虽予以同意，但要你们坚决的在各方面照着中央的政策做去，不能有丝毫让步或妥协的心理。一到我们军队达到目的地，农民暴动得到胜利时，即应提拔在斗争中表现的非常积极的工农分子到临时革命政府中来。

（三）你们在目前斗争的口号中，提出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及分配没收的土地的口号是对的，但何以又同时提出“佃租最多不过百分之三十”的口号呢？中央认为广东的暴动必然要实行达到没收地主的土地。我们无所谓减租不减租，我们根本就不交租，一开始即提出抗租的口号，由抗租而进到没收地主土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在目前的口号还应加上“打倒蒋介石”、“打倒投降蒋介石的汪精卫”、“打倒残杀工农的李济深”等口号。

由上海拨交南方局转给南方局所属各省八月经费是否收到，广东省委应速将各方报告寄来。

中　央

九月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贺龙、叶挺。

PDG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

在武汉方面得的消息太少，各地亦无报告，因此今天的报告无多的材料，自己无完全的观念，只能作一简单的报告。这个报告可从宁汉妥协后说起。

自宁汉妥协后，我党发表《为汉宁妥协告民众书》。我们在此告民众书中说明汉宁妥协之意义，说明从张作霖一直到汪精卫都是我们的敌人，更说明第三派不过是反动的桥梁而已。第三派第一步的主张是“联共反蒋”；第二步是“反共反蒋”；第三步是“只反共不反蒋”。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八月半，蒋介石下野，武汉方面则大叫其蒋倒是党权的胜利，但汪一到南京马上即改口说蒋是先知先觉，自己承认过去只知反对反革命不知反对共产党，并且还到上海预备去迎蒋介石出来。总一句说，从八月十五到现在，汪精卫等已完全投降了蒋介石一直到西山派了。这一月可说是此种形式的过程。

现在的中国南部已经是清一色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无论这种清一色的政权之内部有许多冲突，然而他们对于民众仍然是一样的东西，莫有二致。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固然不能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尤不能与军阀作斗争，因其本身即系军阀。他完完全全是工农的敌人，在我们的告民众书中亦曾说明此点。党的紧急会议亦采取了此精神。

---

* 这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PDG

八七党的紧急会议的政策即是暴动政策，此政策决定后我们的工作可分三部分：一、贺叶[1]南昌起义及广东的农民暴动；二、湖南的农民暴动；三、湖北的农民暴动。在客观上革命的潮流是否仍在高涨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回答：是在高涨的，工农是要求暴动的。武汉反动之后，到处在改组工会、农会，并停止工会、农会的行动，这自然是在向工农进攻。而资本家向工人进攻的形势也是很明显的。自政府命令将所有工会解散之后，资本家即大大的开除工人，实际上因钞票的关系，工资一天一天的减少，武昌几个纱厂并延长工作时间，京汉、粤汉路工人有欠薪至九、十月者。凡此一切，都是现时武汉的所谓国民党之工会改组会帮助资本家的政策，欺骗工人，蒙蔽工人，同时还要乱叫“三民主义”、“非资本主义前途”……政府可说完全是代表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开辟向工人进攻的道路的。无论他们一天说许多空话都是无用的。如汉口中交银行近来开除许多雇员，国民党党部（工人部）及工会改组会等，曾经假意去函向该行要求恢复这些工人的工作，该行竟答复不行，国民党部亦无如之何，反而由党部及工会改组会替银行方面设法，介绍被开除工人以别项工作。由此可见，武汉资本家正需要这种所谓工人运动，好帮着他们压迫工人。今天报载有一粤汉工人廖某被捕，假工会去函要求卫戍司令部释放，而卫戍司令部亦回信不允，并说廖某提出了要求发现洋的口号，有共产党的嫌疑（以他们所搜得的共产党职工运动议决案的条文为证据）。如此，工人实无出路。武汉如此，其他各地亦是如此，这也是可以从外地报纸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的工人，只有自己起来，实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暴动推倒军阀的统治，建设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然后才有出路。说到此处，我们还要注明的是：工人不及农民的斗争情绪那样高，这是因为工人在反动局面之下受了一个大的打击之后，找

不着头脑，不知要如何的办法才好，而我党又没有去领导他们，以致于此，而比较安定一点的工人则更呈畏缩的状态。最近听见有洋车夫说：过去共产党的工会不好，要收会费，还要叫我们去游街；现在的国民党工会算是也不游街了，但也不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还是要发国库券。这种群众无出路的心理，我们是要特别注意的。据上海报载：上海工会统一会最近到各厂去得非常之多，有一点事即去，他们这种积极的干去，如果共产党不能正确的领导工人去斗争，那么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也可以在这种工人无出路的形势之下，替工人解决解决一些小问题，得到一点基础。最近上海省委欲在蒋介石下台的时候作一示威运动，结果未成功。现时工人群众，尤其是武汉，没有积极斗争的形势，这是由于受了我们过去党的退让政策的影响，群众已非全为我们所有了。现在各处的工人都无出路，已经在那里要求我党去领导他们斗争，我们目前也在如此做去，但武汉方面则已迟了许多，这是不可讳言的。

农民在广东、两湖是已经开始暴动了，河南、直隶、山东等地的农民也有不断的骚扰，中国革命已到土地革命的阶段，要由无产阶级坚决的领导农民，完全肃清土豪劣绅，推翻军阀地主制度，建设新的平民政权。说到农民暴动的具体形式，在鄂南农民的“实力”本来并不大，但也居然能够大干起来，湖南也有许多地方干起来了。据湖南省委的报告看来，湘省的暴动还有多少胜利的可能，也可说湖南农民算是最有希望的，因为他们是最先进的。过去在湖南完全表现两个政府：一为唐生智的军阀政府，一为农民的农会政权。说到此处，我们回想到帝国主义之聪明，当省港罢工的时候，帝国主义即说罢工委员会是第二政府，当湖南农民协会力量大的时候，帝国主义又说农协是第二政府，当武汉民众势力非常之大的时候，帝国主义又说湖北省总工会是第二政府。帝国主义对于此第二政府之危

险性是看得很清楚的。国民党领袖本站在此两政府的挑选的地位：那时的形势是，或者国民党站到这第二政府方面来，真正领袖革命，或者站到新军阀（豪绅资产阶级）方面去，使国民政府完全变成他们的政府，实行其领袖反革命。可是他们挑选的结果，并不说此第二政府是最民权的，反而要站在新军阀方面来消灭此第二政府——这正是帝国主义所要求的。现时这第二政府是暂时消灭了，可是他要重新起来，变成唯一的政府，这就是暴动的意义。目前我们两湖暴动的计划是在鄂南胜利即向岳州进攻，同时集合湖南各地的农民力量合取长沙，拿得湖南的政权。这个计划并不是空想的。贺叶公开与反革命分裂，一到广东即可引起农民的暴动，但粤省委仍应以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只有如此，然后才能使贺叶的军队更见改变其性质，更成为革命的军队。如果广东、两湖三省的农民暴动都起来了，全国即可改变一个形势，进到土地革命的新时期。据报载，香港九月九日的电说：各县农民"土匪"相继起事，并非贺叶已到该地；又一消息说贺叶并未到淞口，乃共产农团自动起事。由这些消息我们可以看出，广东工农并不等待贺叶来到才开始暴动。但不知党在这些暴动中的指导作用如何？从报上看来，汕头暴动都是很有计划的——汕头在九月七日一日之内发现十九次炸弹案，如果党不在那里指导，这样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斗争中，我们的力量有四种：一、工人的力量。工人在现在的资本进攻的压迫之下实在没有出路，只有实行斗争之一途，而且现时的经济斗争，都必然有急转直下变成很明显的政治斗争——一直引导工人的意识到非暴动建立自己的政权不可；二、农民的力量。在目前反动政权之下，农民也无出路，抗租抗税的口号可以适用于一般的农民；三、我们党的力量。这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党应很有计划的去领导工农实行斗争；四、贺叶的军队力量。这个力量在新的阶段中亦

有很大的作用，过去在历史上有许多的农民暴动，一起即被压服，那时还是揭竿而起的时候都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敌人已经有了很厉害的枪炮，已与揭竿而起的时代不同了，所以在现在的争斗中，军事力量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对兵士的工作尤为重要。过去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仅仅是为国民党军队当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或者站在外面为国民党的军队宣传，或者为某将军运动收编扩充队伍等工作，这些工作现在对于我们一点益处也没有的。现在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应该是要作兵士的工作，即在贺叶军队中也应如此。如果照我们过去在军队中工作的方式，我们那时虽有十万军队在手，亦未必不与国民党军队一样，各样各色的坏分子都包括在内，绝不能实行土地革命。我们必须与工农群众与兵士群众联合起来，要使敌人的枪杆子变成革命工农的枪杆子，如果我们能够将工农兵士的力量在党的指导之下集合拢来，胜利是可期盼的。

据今天的消息看来，两湖暴动的情形仍然是很好的，固然，亦许集中不成功，取不到湖南的省政权，因此而只变成各地义军蜂起的零碎斗争，但是最近的消息仍是证明工农暴动有一击而中取得两湖一部分政权之可能——因为治者阶级的统治非常动摇。

客观的情形表现给我们看出：现在全国已在一个经济危机的状况中，无一个地方不闹财政的恐慌及租税问题，这种恐慌使反动政权无法巩固。小资产阶级在这种恐慌之下也无出路，或者他们也有依附汪精卫式的政治路线走到反动之一途，但其结果仍然是受骗。现在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问：中国现在的政权是否完全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呢？我们可以回答：中国资产阶级并没得着全国的政权。汪精卫等在反动的开始还想利用资产阶级的口号来欺骗民众，但不久他们即用不着了，完全投降土豪劣绅了。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现在也觉得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形

成他们自己的势力和政权。广东古应芬强迫商人出捐的时候，上海商界竟通电反对，这种情形已与他们处在北京政府之下的情形不同了。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已在那里自己形成一力量。现在的政府决非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因为中国根本上没有民权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与豪绅阶级非常之密切的联系着，在政治上是“最卑劣残酷野蛮的资产阶级”。这亦证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落后，他并不能有全国规模的政治领袖及政纲，他的封建性非常之重，他们内部有许多矛盾冲突，同各省各县的豪绅互相之间的矛盾冲突联系着。

在目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所表现的是：一、拿他们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的形式来引诱一般小资产阶级，这是于新军阀有利益的；二、豪绅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日甚厉害，使他们的政权不能稳定。唐冯李白[2]部下的冲突都可以说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一得政权，内部的冲突即表现得非常厉害，以致不能稳定其政权，这是于我们非常重要的。因为很明显的，现在的前途有两个：一是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一是工农的政权。

宁汉妥协后仿佛国民党统一了，可以去打北京了，但此统一一开始即马上发生了许多的冲突：第三派与蒋介石有冲突，与唐生智也有冲突，唐蒋、唐冯、靳[3]冯都有很大的冲突，汪等知因不愿当一派势力的小老婆，所以又要请蒋介石回来。传说蒋已回，如蒋一回，很明显的马上会引起极大的纠纷，其结果，汪精卫等第三派的政治领袖，将要被各方面所厌弃，明显的露出蒋介石主义的大胜利。今天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就开幕了，唐生智是未开会之先即不去，宁方的人都反对他，唐冯已干起来，靳冯也干起来，并闻唐最近的战略是用的远交近攻的方法，要与张作霖、孙传芳讲交情了。从他们内部的冲突看出军阀政权之不巩固，同时我们要明了的，所有他们的战争通通是军阀的战争。

在现在状况之下，实际上说来，国民党已经解体了，无革命的力量了，帝国主义可以进攻了。当工农还与武汉政府在一块儿的时候，帝国主义是非常之害怕的，现在国民党既已无革命的力量，帝国主义当然可以乘势进攻了。帝国主义进攻的方式可分几种：一、用老的方法在中国施侵略，如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向奉张要求实行二十一条，引起满洲的反日怒潮即是；二、向南京政府进攻，以便挑选新的工具——帝国主义也要在新军阀的冲突当中来挑选他的新工具，但他挑选的方法是采取的进攻的方式，看谁能最听他们命令他们养谁为其新的工具。南京政府早已无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如上海的对日大同盟已公开借口山东的日本兵已撤去，而发启事自行取消！这可证明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而武汉报纸上亦已承认关税自主不能实行了，即此可以证明国民党叛徒已非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而为障碍革命发展的力量了。而汉宁两个叛徒政府之合在一起，完全维持了土豪劣绅的政权，帝国主义现在已间接利用这一工具，在将来还要格外进攻，从进攻之中挑选这些新军阀中的工具；三、帝国主义对于工农的革命力量，或将取直接自己用兵干涉的进攻形式。最近广东惠阳地方，英国人已经直接“剿匪”，他们的香港报纸宣传李济深决不能抵敌贺叶，这亦许是他们准备直接出兵广东的表示。

最后讲到党的问题：一、目前我们的政策是暴动政策，主要的是要引导工农民众的暴动，即工人作经济斗争的时候也要以暴动为目标。我们应坚决的实行紧急会议的决议，但现在机会主义的余波尚非常之多，我们应以很大的力量来与之奋斗。在组织上，我们应当督促各省党部作报告，看他们是否依照紧急会议的决议在那里执行，是否提拔了新的积极分子起来作党的工作。二、要注意秘密的工作，各地近来之机关破坏，都是由于自己不小心，秘密工作做得不好，这是要很注意的一件

事。三、我们党内的智识分子，在目前整个革命潮流中或者完全消极，或者公开叛变，放出消灭 C.P. 的理论，这自然是革命发展的结果，也是与机会主义有关系的，我们相信革命潮流继续发展下去，还有许多智识分子都有这个危险，现在我们党只有坚决的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一下决心重新造党。四、党内有许多智识分子，在党内作技术工作的同志，完全靠党来供养他们，如果有时党发给他到某处的路费少了一点时，他即发生许多的怪论出来，这种现象非常之坏。在此新的时期中，应将党再造起来，在技术方面都要变更。党的成分应当是：一、绝对无法在外面谋生活的而必须在党中负重要责任的"革命职业家"；二、工农分子（本不受党的供养）；三、智识分子，这些分子应当有自己的职业。务要达到每个同志都有牺牲自己的力量和金钱来帮助党的精神，不要存依赖党的心理。

总起来说，在现有形势之下，党负了很大的责任，一定要党内在政治上有坚定的统一的意识，才能负起这个很大的责任，同时也只有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才能挽救党的危机。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贺龙、叶挺。
〔2〕指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
〔3〕指靳云鹗。

PDG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

最近几月的经验（包括南昌军队中的暴动与两湖广东革命的农民暴动的爆发）指示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已经很快的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形式上国民党现在正经过分化堕落的过程，由其腐烂的尸体中产生出赤裸裸的军阀专政。所有共产党员的努力，打算创造秘密的革命国民党的组织，或稍为团结左派分子，一直到现在尚无成绩之可言。在别一方面呢，以前国民党在群众中的革命威信，已因资产阶级军阀之到处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实行流血屠杀、恐怖与压迫而消灭了。这是毫无疑义的。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可见土地革命的急剧的发展，已经使一切动摇犹豫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战线。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假设在国民党中有这些单独的、革命的、“对抗派”的成分发现时，我们应当赞助他，推动他到继续革命斗争的道路，使他完全与国民党的反革命上层分子断绝关系；但同时应当知道，这种工

* 这个文件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六期。

作比起党的主要任务（组织暴动）是占次要的意义。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即使以后在自然的群众运动基础上，或许另有发现国民党组织之可能（现在还不是这种现象），则我们应当知道这种力量不是主要的决定成败的力量，而是革命之临时的，不可靠的，不坚决的同道者罢了。总之，此后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主要的原则有两点：一、对于宁汉各派的国民党领袖机关及政府，积极的反对，定出明显的推翻他们的目标，因为他们都已成革命的叛徒，民众的仇敌；二、对于零星散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只认为是革命的暂时的同道者，可以在每次斗争中，使他们来赞助我们及革命的民众。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左派问题既有不同，则对于八月中央决议案中的苏维埃的问题自然亦有异点。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但中央同时又预先防止那种急忙的与真正革命高潮不相连贯的成立苏维埃。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当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当这些中心地点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换句话说，在小城市里的政权仍旧必须照中央原来的决议去组织（除去对国民党的左派问题），在农村中最近期间“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仍完全有效。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中共中央给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信*

——对《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工农军作战方法》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

你们的《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工农军作战方法》及《告广东闽南民众书》都已收到。中央对你们有以下的意见，请你们查照：

一、关于《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中央认为有几点很重要的可以妨碍革命发展的：第一是你们保留一部分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中央前信已经告诉你们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至于没收土地之后对于老幼废疾的救济，是革命政府之下的另一工作，不能因为这个便保留一部分地主制度。第二是你们肯定小商人的选举权利，并且规定县革命政府选举代表小商等要占百分之二十[1]。其实，以两湖暴动的经验，大小城市的小商人，大部分自己是地主或与地主有深厚的关系，至于大城市的小商人则更有与买办阶级有密切关系的。这些分子在土地革命激剧的发展中，必然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六期。

走到反革命的方面，所以我们不能肯定他们有一定的选举权，完全要看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而定。况且在大城市中暴动胜利后，应组织苏维埃，更不容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小商人代表（见国民党工作及苏维埃决议）。第三是你们肯定“不没收工厂作坊”，这也是不正确的。在中央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中，已指出对于反革命的工厂作坊是有没收的必要的。我们固然不决定没收工厂作坊，但是对于反革命的工厂作坊必一定要没收。不然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政权，保障革命的发展。总之，我们对于社会各阶级的态度，要以不妨碍革命的发展及工农的利益为原则，不可事先作法以自限。这是要你们特别注意的。第四是关于国民党的工作。中央对此另有新的决议，随信寄上，请你们查照执行为是。

二、关于《工农军作战方法》的。第一，在整个的计划中，你们有胆小、怕牺牲、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弱点。例如你们肯定：“工农军与有训练和有组织的军队作战，要想取得胜利是很难能的”，因此你们便断定工农军作战必须要“避免正面战斗”，要在战前“示意各级指导人员以败后收容地点及方法。”你们在计划上这样胆怯的暗示，必然会影响到群众不能坚决的作战，并且处处避免正面的战斗，势必只能在乡村中迂回作战，而不能去夺取城市。实际，如果我们真正把暴动的主力建立在农民群众的身上，而不是靠单纯的工农军的军事行动，则我们枪支虽少，不难扑灭有数倍枪支的敌军（这是两湖的经验）。这里，所需要的是我们的指导者和群众的坚决的勇气。我们何可在事先自己就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第二，你们肯定“城市要实行暴动，必须要有得力农军的帮助”，这无异说没有农军的帮助，城市中即不要暴动，更具体的说，即是城市的暴动要等待农民的军事行动。你们的理由是说“现在城市的工人大多数没有枪支”。这样的决定，实在太书生了。假

设在乡村中农民暴动很激烈，城市已经很恐慌，而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又很高涨的时候，我们无论有多少枪支，都应立即举行暴动，不能等待“得力农军的帮助”。换言之，便是不要等待直接的军事力量，否则便是军事投机。总而言之，农民暴动，要以农民为主，军力副之。要鼓动广大农民革命情绪和革命行动（大批杀土豪劣绅政府官吏及一切反革命派，抗租抗税，分配土地）。如此发展广大农民的坚决斗争，暴动才能胜利。断不能有等待军事的心理。

三、叶贺〔2〕军队不知已达到什么地方？此时广东全省应不等待叶贺之达到，即行发展普遍的暴动，对于这点前已有两次信给你们，现在执行的程度如何，你们应随时作详细的报告来。

中　央

九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中共广东省委《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原文为：“百分之十小商人及贫苦知识分子”。

〔2〕指叶挺、贺龙。

PDG

湖南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任　弼　时

中央：

我于二十日由汉动身，九月二十二到长沙，二十三早会到马也尔，此时他与省委已音信不通。二十五方见彭公达，二十六会见夏明翰，二十七日开省委常委会议一次。

这次湖南暴动预定计划是十日发动安源、平江、浏阳、湘潭等处，农民同时暴动，十五日会合长沙。

十号长武、株萍铁路也前后破坏……安源矿警及王新亚部（系江西的农军）五百余人会同工人炸弹队、宣传队将近二千人于十一号清晨进攻萍乡不遂，乃弃萍攻老关，十二号破醴陵城……并缴得敌人枪支七八十。此时株洲暴动发动，并夺敌人枪十二支，随即失败，敌调大军围攻醴陵，我军不支退出醴陵，复经老关转攻浏阳。十五号占浏城，十六号晚被敌包围，冲锋出城，是役失去枪支三百余，捉去农军百一十余人，余众向东南退走，一部分已散。在此次战斗中，安源工人表现极勇敢，惟矿警甚畏缩云。

长沙四郊暴动开始于十日，在万寿乡一带解散团防局四处，在某乡解散团防一处，共获得枪支八十余杆。湘潭暴动无力量，但杀三五劣绅而已。其他宁乡、常德、岳州、湘南各处及长沙城内均无动静，这是这次暴动经过大概情形，详细由公达面告。

在十二三号，当铁路停滞，安源军队进攻醴陵、株洲暴动，苏、余[1]等尚向平浏进展时，长沙城内的空气非常紧张，此时实为暴动的极好时机。但因省委与暴动区域交通不灵便，且事前未决定十三号暴动，故未发动，实为可惜。十六号浏阳尚在我们手握，长沙亦有发动的可能，但省委改变了暴动时期。当与省委讨论停止十六号暴动时，省委承认未定十三号发动是错误，而不承认停止十六号的错误。关于此一问题只好留在将来中央从长解决好了。错过了时机固然是长沙暴动未能成功的原因，但是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如鄂南农民一样，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据明翰同志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当我军到浏阳召集农民群众会议时，没有多少农民参加……据我看来，农民群众没有起来，固然马夜事变的打击有影响，但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行军所到之地，没有替农民做出一点没收土地、屠杀豪绅的事实。如鄂南那样杀土豪劣绅、没收土地等，在平浏一带这次做得非常之少。以致不能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实有极大的关系。其他湘西湘南没有起来，不能分散敌人力量，不能指挥工人行动（……工人未能罢工等），没有多做士兵工作，缺少宣传等，当然也是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央政治局根据马也尔的报告所决定的湖南工作方针，是要苏、余继续向长沙进攻，长沙立时举行暴动。但至我抵长沙时，株萍路方面完全失败。平浏已不在我们手握……并驻有重兵。长沙城内据省委报告有敌军九千余人，约六千五百余支枪，且军队布置非常严密，四郊农民又未发动，城内我们只有千余炸弹（因三分之二已用去炸铁路），且只半数能用（其他因使用不便，现正改造），另盒子炮二十支，能起来参加暴动

的群众连同志共计只有千人左右（所谓三千战士，二千还须靠四郊农民暴动起来时方能起来）。湘西株萍农民一时不能发动，湘东在初失败之后亦难立时反攻。此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因此，我与马也尔商量结果是：长沙暂不举行暴动，铁路破坏亦暂停止，目前须加紧城内及四郊暴动和铁路上破坏工作的准备，在湘西、湘南发展农民斗争，组织带游击性质的农民军，捕杀土豪劣绅，抗税等，以鼓起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夺取土地与政权的暴动行动。湘东余苏（据报载苏已阵亡，但我们尚未接到报告，恐不确）尽量去平浏附近保留，并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就地实现土地革命的政纲，稍事整顿仍向平浏进攻。各方面准备第二次攻取长沙并在长沙暴动。按此原则，我与马也尔拟定一工作计划，今日在常委会通过（附后）。

今日省委常委会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通过工作计划，除关于批评停止十六号暴动是错误一条当须从长讨论外，余均通过。省委组织因明翰、礼容[2]为当局秘密通缉，且党内亦发生奸细，使他们完全不能行动，没有多大作用，事实上仅公达一人向外接洽，于工作非常不便。因此，今天省委决定派明翰到常德主持湘西暴动，礼容到衡阳主持湘南暴动（因此二处均预备组织特别委员会）。改组省委结果，书记仍旧，军事部由前军部秘书李子骥担任，农民部由前任湘潭书记向××担任，组织林××，工人部李××（工人），宣传罗××。但罗表示非常不支于工作，曾几次要求离开湖南，他是否适宜此项工作尚不得知。改组后省委各人的性质上虽较前稍差，但是都能行动，或将比以前有力量些。此外宝庆加王××，安源加派潘××，前安源书记蔡××调省委担任秘书长。

湖南今后工作计划的原则还是进攻的，并且应当是有广大群众的暴动，但是一定要相当时期为准备与工作，方能鼓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暴动。因此，总暴动的时期不能此时规定（因为

规定得太近是无异乎自欺），不知你们对于这个工作方针有何意见，望速告。

弼　时

九月二十七日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苏先俊、余洒度。

〔2〕即易礼容。

PDG

向潮汕进军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九月）

周　恩　来

中原[1]兄：

一、八月五日在南昌送汉之报告，收阅否？自此遂无法传递消息。报中所载多属造谣，兄等自亦无从取信。

二、现革会及十一、二十两军均抵汀州、瑞金之线。八月二十六日，在瑞金城外三十里与钱大钧部二十师战，获全胜。三十日，在会昌城外与钱大钧率领之全部共九团人战，击溃其全军。九月二日，七军黄旭初、伍廷飏、华某三部共五团来攻会昌，复击退之。总瑞金、会昌两役，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极多。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

三、军情除报载（确否难断）外，余亦无所闻矣。只知钱大钧败后集其残部向寻乌、武平一带遁去，与我军由汀、杭入粤者成平行线。七军战败之五团或亦将追钱大钧之踵而入粤。汕头闻何辑五手中只一团一营，而何应钦则助以两团由甬开汕。此外，李济深可用至东江之兵力不出两师，再多恐亦抽调不动。近闻黄琪翔有率兵回粤消息，报载已至吉安，不知确否？

四、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否则，在潮、汕须一月余之整

顿。子弹兵员之补充乃是最急。

五、政治上革会之组织已见报纸，其分部办事行军期中亦未停止。

六、我们现向中兄要求数事：

1. 我军如已取得潮、汕，望即由上海派一得力人来接头。

2. 革会至汕头后，当以国民政府名义办事，外交缺人，请派太雷[2]前来主持。

3. 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

4. 兵员之补充，需大量招募费，请向国际商借香港票或沪票四十万，此款如借得，请先集中于上海为要。

5. 如汕头攻下，请派得力人员尤其是军事人员前来工作为要。

6. 望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7. 去人陈宝符，已发来往川资，望即以回信交其带来为要。

周 恩 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即安中原，中共中央的代号。

〔2〕即张太雷。

PDG

把党改造成为一个伟大的健全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大政党*

（一九二七年九月）

蔡　和　森

我们的党虽然犯了以上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然我党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而不可磨灭的。

“五四”以前，中国虽有工人，但还没有形成一阶级，广东、香港虽然有工会，但还没有阶级的自觉，自有中国共产党产生，才有阶级觉悟的工会之组织，才有阶级觉悟罢工之发展，中国工人才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

“五四”以前，中国工人及苦力虽然也曾多次被小资产阶级政党利用来参加过革命斗争，然完全没有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要求，屡次都是徒被利用，一无所得。自从第三国际命令我们加入国民党以来，我们在广东获得广大工农组织势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一年以后，即有“五卅”的革命高潮，“五卅”之后，不及一年，又有北伐的革命高潮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 C. P. 领导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领导者，同时跑上了世界革命的最前线。民国十三年以来，中国革命之旗帜，名义上是国民党孙中山，而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和 C. P. 。这几年中，名义上虽是做民族革命工作，而实际上发展了最深

* 这是蔡和森著《党的机会主义史》的第四部分，原载一九二七年《顺直通讯》第二期。

刻最广大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组织势力发展到五百万以上，农民到千几百万以上。百战不停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经验，已经使广东几十万工农群众于革命三次挫败之后，还能奋起建立广州及东江琼崖各县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年龄不过八岁，而其领导工人由组织工会、参加民族革命、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超过西欧两世纪以上的历史。以这样幼稚的党领导这样伟大的迅速的争斗，错误是必然难免的。

从三月二十日以至贺叶[1]失败的机会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是事实；同时从民国十三年加入国民党以至民国十六年七月与国民党决裂，在此三年中，积聚和发展了广大的工农革命势力与经验也是事实。宽恕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所发生的机会主义错误固属不对，同时因为武汉的叛逆和决裂而认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本错误更属不对。

托洛茨基国际反对派借口中国革命的失败，攻击第三国际及俄国 C.P. 中央，他们欲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于俄国 C.P. 中央，他们以为三月二十日应即与国民党决裂，不应帮助北伐和武汉政府……。这些都是反对派借口攻击的政治作用，事实不是如此的。三月二十事变像我们中央所采取之退让态度，甚至停止阶级斗争，这是错误的；但若说这个时候我们便可与资产阶级完全决裂也是错误，因为彼时我们的力量还未成熟。我们从三月二十事变以至北伐以后的错误，不在不立即与资产阶级决裂，而在不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实现。这仍是机会主义的错误。这错误不在国际而在中国党中央。就事实说，北伐对于工农势力的发展是异常伟大的。假若我们能运用这种伟大的力量去对付将要叛逆的资产阶级（蒋介石为其代表），结果我们是可由三大政策一直领导革命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失掉的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而获得的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

制。所以北伐政策根本是对的。

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权独裁制根本也是对的，在此原则之下去帮助与改造武汉政府也是对的。假若我们能坚决的在两湖实行土地革命，坚决的实行国际及五次大会的决议，坚决的制胜夏斗寅、唐生智、许克祥的反革命及阴谋，武汉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完全可在我们的势力之下去改组，所以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后来两湖的失败绝对不是这个原则的责任，而是逃避土地革命的西北学说和阿附小资产阶级的退让政策之责任。

有人以为“八七”以后的暴动政策是国际对付反对派的作法。这种观点是根本不对的。“八七”以后的暴动，是马日事变后湖南工农的需要，是夏斗寅及七月十五事变后湖北工农的需要，四月事变后，江苏、广东工农亦有此需要。

说到组织问题：党内群众的政治讨论，素来是没有的，指导机关内工农成分也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有最革命的工农阶级，和最精华的工农党员群众，他们的倾向和意见从未在党内起作用。质言之，他们在中国革命上起了很伟大的作用，而在领导革命的自己的党内反没有起丝毫作用。这便是过去机会主义之组织方面的来源，所以组织问题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最近三年以来，党的组织像暴发户一样的发展：一九二五年以前是不满五百人的知识分子小团体，一九二五年以后，却发展至五万人以上的大党。

一九二五年以前，党的指导机关没有工人分子参加，是必然难免的；一九二五年以后，党即开始成为群众的，而指导机关仍然没有群众化，且渐渐养成一种轻视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众的习惯；加以民族革命的高潮发展，从上至下的指导机关，无形中逐渐小资产阶级化或民族资产阶级化。这些便是机

会主义来源。

从一九二五以至北伐的革命高潮中，已经锻炼出广大的工农群众的革命势力，同时更锻炼出无数工农群众的领袖；然而我党的组织全未反映这种伟大的进步，指导机关始终未相当地吸收这些群众的斗争的领袖进去。另一方面，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甚至上级党部不准下级党部自发口号，自发宣言，自定当地斗争之政策，务使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员完全是听从号令的兵士。这样的组织状况，形式上是很整齐严肃的，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面的危机是很大的。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始终不能自发自动发展其创造能力，始终只是命令一下动作一下的士兵，而不是很自觉很自动的作战单位和战斗员。因此养成的习惯是：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和是非。下级党部及群众对于上级机关如果发生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时，上级机关便要认为大逆不道，采取高压。由此养成“怕群众”的习惯，党内事情怕群众知道，以为如此，将发生异见，动摇指导机关的威信；因此指导机关也愈怕群众的代表来参加。指导机关与群众的关系很不良，不仅隔断，甚至背道而驰，群众完全离开党，党的指导机关完全抛弃群众，在天高皇帝远的深宫之中，做那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的酋长时代的工作。愈做愈没有党，愈没有群众，愈没有工作，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刑具，而上级指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之一切自由，最后这一现象在直隶是特别明显的。这便形成了组织上的系统的机会主义。彭述之同志不能不算是这一机会主义的代表。

这一机会主义是完全违反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对于无产阶级共产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样的组织和纪律，不能成功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列宁主

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组织方面的显明区别，亦即是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之区别。可是述之和亦农[2]同志在东方大学所发明的组织教育系统，是全与列宁主义相反，表面上是穿凿附会列宁的口号，实际上是酋长宗法的知识阶级的把戏。

我们要铲除政治方面机会主义的系统，同时亦要铲除组织方面的机会主义系统。我们现在应改造真正成为列宁主义的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这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不是削弱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的自觉自动与创造精神的，不是弛缓党的纪律和组织，乃是强固党的纪律和组织，铲除那种旧军队式的组织毛病而改造为自觉自动的群众党的组织，铲除那种机械的宗法的纪律而代之以真正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同时由下而上的党内讨论尽可能的发展，由下而上的选举制度尽可能的采用，工农同志应尽可能的参加指导机关，党内事情应尽可能的使党员群众知道，这些都是改造组织的重要任务。但这些施行到什么程度什么界限呢？以不妨害集中制和革命行动的需要为界限。超越此界限的极端民主的要求亦是不能容许的。

现在党的改造是整个全盘的改造，而不是什么派别的改造。我们要在国际新方针之下，重新团结党的队伍，强调党的凝结性和统一性，我们所有工农党员群众及好的知识分子党员群众是完全可能团结于此新方针之下，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因为全中国的工农群众莫不有欢迎新方针的，他们的先进分子更不待说。国际新方针初到时，有人以为将有引起党的分裂之危险，其实此危险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就是在主观上我们亦要防止这危险。第一，最好几个为群众所不满的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必须在相当时间停止其指导工作；第二，一切指导机关尽可能由群众选其相信之人负责；第三，过去一切错误和是非尽可能交给群众讨论判断，尽可能发展党内讨论；第四，严

防机会主义者企图团结一部分党员阻碍党的改组；第五，严厉防止第三党之企图动摇或分裂党的队伍，更应严厉反对“让小资产阶级和腐化分子到第三党去”之说；第六，绝对相信群众来改造党，不应只相信上级机关或已经为群众所不满的中坚分子来改造党；第七，在此改造时期，上级机关绝对不应袒护群众所不满的少数分子而忽视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群众之意见；第八，在此改造时期不应让少数一二系统的机会主义者有凭借党的机关，抑制群众及其意见之可能，即使群众意见是错误的，也应在其发表之后再予纠正，万不能采取国民党中央“停止”这个“停止”那个的办法；第九，应极力于全党之改造，而不应组织什么“左”派；第十，反对述之一类人利用“制造派别”、“分工学界限”的罪名来阻挠党的改造；第十一，反对抛弃或开除所谓大批“腐化”的下层群众，即使一部分群众有腐化或消极之表现，亦应去找出所以使之腐化或消极的来源；第十二，除最少几个为群众所不满的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外，一切活动分子皆应尽可能的分配工作，万不应站在一种非政治的考虑之上，排斥或送出大批活动分子于工作或国境之外。

所以在此改造时期，党的机关所要注意的是：不要怕群众，不要怕讨论或批评。党员群众所要注意的是：不要笼统的反对知识分子，不要笼统的反对一切过去的负责工作同志；并不是一切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者，也不是一切旧的负责工作同志都是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凡属一切不压制群众意见，不妨害党的改造的分子，都应尽可能的利用到工作上来。

党不是要改造成为狭隘的小团体，乃是要改造成为一个伟大的健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政党。我们并不是要把一切犯过错误的人都送上断头台，我们亦不是要把一切机会主义的分子都送上断头台，我们只要指导机关打开门户由群众选举，由群众监督，相当的能受群众正确的影响，而不是一味违反群

众的意见与趋向。

另一方面，党的改造不是换几个上级机关便了事；更不是由知识分子换成工人，由旧的分子换成新的分子便算了事；根本是要从小的支部起，实行改造过来；根本是要肃清一切政治上和组织上机会主义的遗毒，要改变过去机会主义时期之畸形的党内生活、教育、训练以及一切不正确的工作方法。我们要由此次的改组，获得八年以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

我们的党，现在是开始到了这样伟大的改造时期，我们全体党员同志应共同起来完成此伟大的历史使命。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刊印。

注 释

〔1〕指贺龙、叶挺。
〔2〕即彭述之，罗亦农。

PDG

中共中央给南方局暨广东省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九月）

南方局暨广东省委：

（中央正在迁徙中，尚未完全到沪。）

得你们二日的信，潮汕失去之后的形势，此间尚不能十分明了。这次失败是非常奇怪。我们想主要的原因是：只想在汕头就成立政府，并且没有充分发展全省农民暴动，以至于黄绍竑等的兵得以从容集中，四面包围我们。现在潮汕失后，究竟尚有多少部队到海陆丰？报载海陆丰已为农军占领，其他地方是否尚有农民暴动？现时应采的策略，据此间所得消息，只能大略规定如下：

（一）极广泛的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夺取民团、驻军的枪械，在乡间成立农民协会。政府占领县城，即成立工农贫民代表会议。无情的歼灭豪绅，没收土地，一直到均分田地，以"耕者有其田"为主要口号，绝对不交租。此等暴动农军应取积极的进攻策略——东江固然重要，而南北亦须起来，以围攻广州为主要目标。

（二）叶、贺[1]军应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沿途不能濡滞观望，此时再一犹豫，势必完全消灭。应以尽量多余枪械，沿途武装农民，扩大军队，一直杀去。

（三）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勇猛的号召工人、手工工人、一般贫民起来，夺取驻军、警察武装，以建立工农平民代表会议的政府为主要口号。广州附近的农民尤须注意。

（四）如取得广州，应当召集各路暴动的农民、工人团体代表（能到多少是多少），开一革命会议，选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广州市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实即苏维埃——应为政府之主干）。政府之中不必设委员，如来信所云谭平山为委员长是不行的。只须由革命代表选出（多多加入工农分子）之政府中，设一常务委员会（应选进仲甫、兆征、恩来[2]等为主要干部），此处可略加沫若[3]及其他左派分子，以保证本党绝对领导权为原则。

上述的农民暴动的大爆发，即使贺、叶完全败退（如报载回闽消息），也须积极进行。

太雷[4]既随军，黄平又冒险去汕，非常之不应该。中央俟维汉[5]到后，当决定派人来。

常　蔚[6]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广州起义资料》（上）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2〕即陈独秀、苏兆征、周恩来。
〔3〕即郭沫若。
〔4〕即张太雷。
〔5〕即李维汉。
〔6〕指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

PDG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

（一九二七年九月）

中国革命运动早已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从过去湘粤鄂赣各省农民斗争的许多事实中更得到确切的证明。因此，国民党一般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大起恐慌，不惜公开的背叛革命，多方限制并压迫农民运动，解散农民协会，停止农协的活动。那时，本党为顾全两党合作，亦屡次让步，未能坚决的单独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是本党过去极严重的错误，致使中国革命受了极重大的损失，这种错误一直到“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始纠正过来。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决定湘粤鄂赣豫等省农民乘秋收之时，举行大规模的暴动，并就各省农运情形决定暴动的方式。

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的决议，并斟酌各县的情形拟定秋暴计划如下：

（1）江西农运过去无坚实的基础，而且发展未能普遍各县，所以只能部分的零碎的暴动，决不能实现全省总的大规模的暴动。

（2）秋暴的意义不是毫无目的的骚动，而是要由此更实际的进行土地革命，并深入而且扩大农村的阶级斗争，建立乡村农民政权，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肃清乡村的反动势力，并借此揭破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省政府压迫民众的罪恶，进而推翻他们的统治。

（3）江西是李烈钧的老巢、朱培德的新殖民地，朱、李纯

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物，故江西豪绅地主的统治较其他各省较为巩固。因此秋暴的工作，在江西是最为迫切需要的。

（4）“七卅一”事件[1]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最光荣的一页。但江西民众，对此次事件毫无认识，甚至与今年二月间南昌兵变一样看待。在此次秋暴运动中，应一面痛斥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暨分赃式的宁汉合作，揭破他们的假面具，指出他们反革命的事实与民众看，同时更须努力宣传“七卅一”事件的意义，并可用革命委员会分会的名义发布政纲宣言，使民众得到正确的认识与倾向。

（5）在秋暴中我们不要忘记了发展组织的工作。本党的组织、农民本身的组织、左派国民党的组织以及各种民众的组织，都要在此次秋暴中积极的发展并健全起来，万不能稍存机会主义的心理，只注意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而忽略了基本工作。

（6）省委应马上通告各县，说明秋暴的意义及进行的方法，并普遍发一煽动纲要，令各县做广大的煽动工作。煽动的材料应是“反对各项苛税杂捐”、“反对重租重息”、“要求江钞兑现”、“反对改组各种民众团体”、“要求农民武装”、“反对物价昂贵”、“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绝对自由”、“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要求没收大地主土地”、“反对省政府加税”等等——最好要提出具体的关于民众切身利害的口号，尤其要注意各地方的特殊事项，甚至很小的事亦可。

（7）秋暴的主要力量，自然是农民群众，但我们切不可使农民处于孤立的地位与其他群众绝缘。我们必须事先在宣传上兼顾及其他群众的利益（自然地主豪绅等除外），在组织上与其他群众亲密的联络，最要者为下述各种群众：

（a）城市工人虽不及农民数量之多，其影响政治的力量较大而速，我们在秋暴的预备工作中应使工农的关系十分密切。

农民暴动一开始，工人能即起来一致行动，合力夺取县政，破坏交通的通信，工人更较易进行。

(b) 会匪是失业农民另一种的生活形式，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即是土地革命的精神。我们进行暴动工作，须与当地会匪联络，派人到他们中去工作，向他们说明土地革命的意义是劫富济贫更彻底的办法，并指示他们只有参加暴动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才能得到土地。在此应特别注意两点：一、我们要会匪与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们来帮助，而是要他们与农民一样为暴动的主体；二、我们联络会匪要拉住群众，不要仅拉他们的领袖。

(c) 小商人的痛苦与农民差不多，如果我们取的策略适当，他们也可变为暴动中的助手，尤其是赣江一带的行商。他们受厘税与江钞的痛苦极大，我们应当向他们宣传，提出适合他们要求的口号，指出他们的出路，使他们来参加暴动。

(d) 革命的智识分子，在乡村中大半都有相当的地位和信仰，他们如果参加暴动，是有不小的力量的。我们应注意联络他们，说明暴动的意义及中国革命的前途，使他们得到正确的了解，诚意来致力于暴动工作。

(8) 如上所述，江西虽然不能实现总的、大规模的暴动，然而我们也应尽可能使各县互相影响，比如甲县有了暴动，我们应设法使此暴动能扩大影响到邻近各县。如此，则不但暴动的势力更大，暴动的效果也增加，暴动的意义更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各县应当特别注意，不但已暴动的县份应影响邻县，尚未暴动的县份更要注意使邻县的暴动影响到本县来。总之，彼此不要失掉了互相影响的机会。

(9) 为指挥与联络的便利，应规定暴动的起点，这起点必须是政治经济地位较重要，而农运较有基础或已有农军势力的地方。兹拟定赣北以修水为起点，影响邻近各县与各县取联

络，赣西以永新为起点，赣东以临川为起点（附图及说明）。

（10）在上述暴动起点的各县，省委应派得力的同志或临时组织，前往准备暴动工作并指挥邻近各县的暴动工作。同时须与省委发生密切关系（设专员交通，约密码电信）。

（11）各起点的邻近各县较重要的，省委亦应指定或选派专人前往负秋暴指挥之责，各专员应与其邻近起点县份的负责同志或组织发生密切关系。

（12）指定准备暴动之各县委或区委特支，必须马上党内全体动员，切实分配所有同志到乡村中作煽动与组织工作，如有左派国民党部亦须与之联络进行。

（13）各县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除煽动组织及与各方联络外，并须切实进行各项调查，迅速报告来省，以便按照各县实际情形指挥工作。应调查事项如下：县政府倾向，农民组织及武力，反动武装，农民痛苦及要求，有会匪没有，大中小地主调查，豪绅姓名及罪状，苛税杂捐名目及数目、租率，反动分子等。

（14）各县在暴动的准备工作，应设法置备枪支（或买或抢），秘密收藏，至准备成熟时取出应用。其原有农军组织的地方应加紧农军的军事与政治训练，有会匪的县份，应联合会匪的武装，或以会匪的武装收缴政府或反动的武装。

（15）在农军势力统治的县份，如修水、铜鼓等应即马上实行捕杀豪绅及反动派，没收大地主土地，建立农民政权，占据财政及交通机关，无限制的扩充兵力，解除反动武装，用革命委员会分会的名义发布政纲宣言，废除苛税杂捐及一切陋政，通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省政府祸国殃民的罪状，建立左派国民党部、各级农协及民众团体，并作广大的宣传，影响邻近各县以至全省，与湘鄂邻近各县暴动势力联合。

（16）在农军有相当力量的县份，如宁冈、安福、莲花等

县须设法秘密集中实力，收缴政府及所属各种反动武装，驱逐或捕杀反动官吏，解散或捕杀反动的国民党部、伪农协及其他反动团体。余同（15）。

（17）在过去农运略有基础或有会匪的县份，如星子、德安、永修、余干、永新、万安、临川、乐安等县须进行部分的骚扰捕杀豪绅反动派，抢夺政府或反动派枪支，暗杀官吏及反动的党部或各团体负责人。总之，在这些县份虽不能如（15）、（16）做夺取县政权的总暴动，但我们必须举行零碎的前仆后继、彼伏此起的暴动。如无新式武装，可用刀矛或者徒手暴动，即如鼓动群众一时的热情处决某个豪绅反动派，包围县政府，打击伪党部伪农协，殴打征收吏或催租人，都是群众暴动的表现，都是打破封建势力统治的工作。

（18）煽动工作我们应普遍到全省各县，创造暴动的机会，即不能每县实现有组织的暴动。如果能打杀一个豪绅，赶跑一个官吏，群众一点钟的骚动都是有意义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八一南昌起义。

PDG

中共中央对于长江局任务的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

（一）广东的胜利，革命运动之猛烈发展，使中央不能不迁居于革命的中心区域，指挥这一革命运动。在事实上中央将与长江各省隔绝关系，故有长江局之设。

（二）长江局所辖范围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

（三）长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讯机关而是代行中央职权，指挥上列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上列七省的党务须纯全受长江局的指挥，但长江局须随时将所处理之工作与决定报告中央，受中央的指导。

（四）两湖与广东为中国土地革命的中心区域，长江局的第一个最大任务便是坚决的发展土地革命。两湖的土地革命如一时不能发展到最大的限度——消灭唐生智统治，取得两湖政权，则须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依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以发展各地的农民暴动。长江局必须领导所属党部坚决的执行这次工作，同时，并须特别努力建立与发展这次工作。河南也为农民运动比较发展的区域，长江局须同样注意河南农民运动之发展。至于安徽、四川、江西、陕西的农民运动亦不可忽略。

（五）长江局第二个大的任务便是发展所属范围内之职工运动（特别是武汉三镇）。目前主要的工作为：发展经济斗争，

建立秘密工会与工农革命夺取政权之宣传。

（六）长江局第三个最大任务便是改造所属各级党部。因现有各级党部多不能领导各地的革命运动，长江局负责同志须不断的巡行各地，实际指导各地工作。在党的内部工作须特别注意党内干部之培养与从党员群众中提拔负责同志工作。

（七）为增加各级党部的指导与党中干部之培养，长江局须不断的刊发政治通讯，至于对外的宣传，最好由各省党部独立的出一种政治刊物，如技术上不能铅印至少须用油印办法。

沈　保　和[1]

一九二七、十、一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中共中央的代号。

中共北方局暴动计划

（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

此次奉晋之战突然爆发，此次军阀之战，无论谁胜谁败，本党部应有独立的动作。战争开始之时，北局即决在三特区[1]、南口、京津、唐山、京东六处准备暴动，现在奉军日溃，时机已迫，各级党部应迅速准备如次：

暴动的性质——土地革命的群众大暴动，而不是单纯的军事的冒险。必须发起北方广大的工农群众，在客观上早革命化，现在加以北方军阀战争的屠杀、掳掠，强征人力车马，强占民房住宅，工农群众处于恐怖危迫之境，煽动他们暴动完全是可能的。此次：

暴动的旗帜与口号——是土地革命，而暴动的政权的形式，在城市为革命委员会，在乡村为农民协会。主要口号为：

一、暴动打倒张、阎、冯[2]！

二、暴动建立人民革命政府！

三、暴动响应南方的土地革命！

四、暴动铲除工农兵一切痛苦！

五、没收一切大地主、军阀、官僚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与兵士！

六、暴动铲除一切苛捐杂税！

七、暴动铲除工农兵的一切敌人！

八、杀军阀！

九、杀反动的长官！

PDG

十、杀国民党新旧右派及一切反革命的叛徒！

十一、杀工贼！

十二、农民起来没收土地！

十三、工人起来管理生产事业！

十四、兵士拿着枪回到工农的队伍里来！

十五、工农兵联合起来大暴动！

此外还可酌加口号，大旗用两面，一是大红旗上写着“土地革命”四大字，旁书“工农兵联合起来”，一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旗。此次暴动的目的有三：

一、发展土地革命的政治影响于北方农民群众之中。

二、发展工农及本党的工农势力，使北方工农暴动及本党经验一次伟大的热烈的革命斗争。在此斗争中提高战斗经验，并在伟大的斗争中发展工会及本党的组织，如五卅运动中我们在上海香港之组织势力的发展，如上海三次暴动中工会组织由六七万人发展至三十万以至六十万。

三、由暴动建立我们的军事势力和根据地，所以此次：

暴动的军事计划——系以三特区和京东四县为目的地，如天津、唐山暴动不能持久时，则一直冲出三特区保持热河北部与外蒙联络，如此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此种军事计划，能成功若何程度现不可知，故此尤须特别注意。

暴动中的组织工作——便是要极力在暴动中发展工会、农会、党团组织的势力，即令我们暴动队伍他去或至失败，务使我们的组织势力依然存在，并且是更伟大的更颠扑不破的存在如上海然。假令将来京津的主人是阎冯，我们便要在此次暴动中准备暴动中止后与阎冯继续斗争，和不可扑灭的组织势力。党是指导暴动的，工会农会是要发动群众去参加暴动的，但党团工会农会的本身不就是暴动的组织，暴动有暴动的组织，各级党部的军委就是暴动的参谋部，党经过军委和暴动的特殊组

织去指导暴动。暴动是群众的（尽可能的），一部分同志专去号召与组织此暴动，而不是把党团、工会、农会中的一切职员都去参加暴动，所以暴动中应注意工作人才的分配，应注意党团、工、农会本身的组织和秋暴的工作。暴动中应使党团组织更加严密，秘密工作更加周到，使之能适应暴动中及暴动后之需要，这是顶要紧的，切记勿忘暴动完了或我们的组织也完了，那是绝对不行的。暴动中不仅继续组织，尤其要发展组织，发展组织是我们暴动的目的物之一。此次：

暴动的领导——是工人阶级及本党，各铁路、各纱厂、各矿山以及各城市的工人于这次暴动中完全组织起来，只有这些工人在暴动中，有好的组织的发展，才能使暴动持久、胜利，以及暴动以后能制胜冯阎等一切的恶敌，这是应特别注意的。所以在暴动未爆发以前，即应从事引起群众斗争情绪的各种各色的小斗争，因此，便要注意：暴动前的工作——像长辛店等处不要立即开始杀工贼，像京奉路等处便应立即提出经济要求及反对裁工减薪，像战地工农便反对拉夫、强征人力车马、强占民房，像各城市便反对因战争而起之生活恐慌和物价昂贵等等。再：

暴动的组织——应在军部指导之下建立一总指导机关，其中应有总副司令及参谋各一人，在此之下成立一敢死队、侦探队、破坏扰乱队、宣传鼓动队、交通队、特务队（政治侦探及暗杀内外奸细首领等等），各队人数多少按需要规定，敢死队需要人数多，其他人数皆不可过多。暴动队伍的编制：以十人为一组，组长一人；三组为一小队，队长一人；三小队为一中队，队长一人；三中队为一大队，队长一人，大队长兼该路总司令。至于：

暴动的时机——应正确的估计，比如此次战争如奉不能持久而将溃败退却时，这便是发动的时机；如奉军能与晋军持久

战争时，应使其战急发动；当两败俱伤时，能于双方发动更佳。暴动既经发动，便一往直前的进攻，万不宜取守势，万不宜停滞，必须一鼓作气的把暴动发展下去，比如占领一处之后，便须不停止向第二处进攻。总之，暴动是艺术，对于时期的选择，作战的计划，队伍的编制，机关的布置，皆该敏捷精进。

各级党部于接此通告后，便应火速进行暴动的组织和布置，山东、山西亦应于接此通告后准备动作，以资策应。是为至要！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冀晋绥地区、陕甘地区·文献》刊印。

注　释

〔1〕指当时的绥远、察哈尔、热河特别区。
〔2〕指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

PDG

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于武汉）

彭　公　达

一、省委改组之经过

中央紧急会议完毕，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关于各地工作，曾有一个大略的讨论。对湖南省委因有下列两个原则：

（一）国际对中国党过去机会主义的批评没有勇敢的接受。辩护中国党错误虽然有，但国际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二）对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书记易[1]同志曾不主张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只主张没收大地主的，甚至还只是政治的没收。

新的中央政治局认为以上两个主张，根本与中央的政策相冲突。于是决定改组湖南省委。重要的意义是要征取一些从群众斗争中出来的人，领导湖南的党，坚决地执行党的中央的新政策。改组的办法有三条：

1. 指定彭公达同志为书记。

2. 新省委九人，三人是工农分子，三人是工农的领袖，三人要是真能争斗的人。

3. 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召集旧省委及各负责人，宣传中央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

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组省委。公达十一日回湖南，泽东十二日在汉动身，约定十三日到长沙，十五日召集会议。后因泽东同志十三日没有到长沙，会议的时期改为十六日。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都齐全，惟泽东一人未到。当天本想停止开会，俟泽东到再开，因为时局紧张，召集一次会十分困难，到会的人均主张即日开会。改选的结果报告泽东，征求他的同意之后，再报告中央，当日除报告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及讨论后，遂改组省委。省委的人选：（略）

这是省委改组后，新省委的名单。在十八日召集第一次省委会议，选举常委，及讨论秋收暴动问题，详细情形下节再述。

二、省委委员中几个不同的意见

（一）农民问题（土地问题）

甲、泽东的意见：

1. 没收土地必有没收的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

2. 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革命委员会（我们的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将全部办法，要农协或革命委员会执行。

3. 这个没收土地的政纲，如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因此主张在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及老弱的地主，应由农协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此等分子。

4. 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征收农业税。

乙、礼容的意见：

1. 中国小地主占中国土地的多数。在此时没收小地主，小地主必定与大地主团结，站在反革命方面去，并且小地主在此时似不应该没收。

2. 对土地问题，此时还只能取政治的没收，如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交给农民。

3. 要有一个适合农民的政纲，宣布给农民，使农民在此政纲之下一齐行动，这样才能安人心，否则引起农村的大纷扰。

4. 农民分了土地之后，农民是否怠耕，使农产物减少，倒也是一个问题。

丙、明翰[2]的意见：

1. 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部没收土地，土地归国有的时期。现在我们必须全部没收土地，确定土地国有原则。

2. 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不没收自耕的土地，农民将不满足，在革命的发展，实际还要没收到自耕农身上来，所以主张全部没收。

3. 没收的方法由农协宣布。

丁、贺尔康、毛复宣等的意见：

与泽东意见相同。

（二）暴动问题

甲、泽东和礼容的意见：

1. 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

2. 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

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乙、明翰的意见：

1. 湖南的暴动可以起来，但成功必须看在是否有军事力量上面，农民做暴动的附和者，因为农民斗争的勇气和工人不同。他们只是希望一个好政府，或军事力量来帮助，很少自己想建立政府。

2. 湖南此次暴动的力量，应有两个，一个是军事的，一个是农民的，军事和农民的工作须同时并进。

在以上对土地问题和暴动问题的几个不同意见之下，可得一个简单的结论。

1. 土地问题，不是在鼓动农民起来，作夺取土地的暴动，要农民取得土地。而是要农民起来暴动，在暴动胜利之后由农民宣布没收土地。这可说是革命的法律没收的方法，不是革命的方法。

2. 在讨论土地问题的时候，都拟出怎样地安插地主中的老弱及工作能力不足的分子，以安人心，以取得群众。

3. 农村暴动要相信农民群众的力量。农民暴动的起来，至少有一千支枪，要发动此次暴动，农民力量与军事力量要占一个同样的地位。

上面的三条，根本精神是一个革命的和平主义。一方面要革命，一方面只恐惧革命发动之后，破坏太大，人心不安，所以要安人心。其方法是从上至下，从军事到群众，不是从下至上，不是从工农群众中建设工农的武装势力。

三、省委和中央不同的意见

（甲）国民党问题——湖南省委根据以下几个理由认为，

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并且不要国民党了。

（一）湖南五月二十一日事变，武汉国民党中央没有能力去镇压许克祥的暴行，国民党的权力不能出武汉一步，甚至不能出中央党部，纯以几个投机的军阀的意见为国民党的意见，国民党自己的立场已失。这时国民党已经死了，到七月十五汪精卫等伪革命派的叛变，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从唐生智、蒋介石、汪精卫，甚至到张作霖都可以拿了这块招牌来作他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国民党变成军阀党了。

（二）国民党的死的臭，不单是死在唐、汪之手，是死在民众之手，国民党从前法律上承认民众很多利益，但是民众要他要实现，则转眼相向来压迫民众，民众均认识国民党是骗人的党，现在不要受骗了，这一般民众唾弃国民党的普遍心理，他们不要国民党了。

（三）或者国民党虽死，但还有一部分左派，可以继承国民党的工作。所谓左派是甚么？大抵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对于革命只是同情，决不会自己开步走，且他们的行动是要看风转舵，无产阶级领导力量大，他可以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附和革命，在资产阶级方面也是一样。取消国民党只要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左派小资产阶级仍然可以来革命。取消国民党并不成什么问题，因此湖南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 C. P. 名义来号召，国民党不过站 C. P. 后而摇旗呐喊，将来听其自消。

（乙）政权问题

根据以上不要国民党的一般原则，对于政权有下列意见：

（一）中国的革命现在已经到俄国的一九一七年十月，但在这中间，重要的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农的，不是纯

粹无产阶级，现在应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

（二）在我们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

（三）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也已臭了（吴佩孚、赵恒惕都说是民选），所以现在不能用这个口号，现在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丙）农民问题

扩大会议对农民的决议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在革命势力发展的地方，农民有自动没收小地主的土地，我们可以不干涉。湖南省委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对地主阶级不是在没收他们的土地的时候让步，应在土地没收之后去救济土地已被没收的普通平民，并且只要他们能耕种，仍须拿与农民同等之土地给他们耕种，以消灭地主阶级。

四、湖南暴动计划

（一）暴动的区域——湖南的秋收暴动计划，在开始是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暴动势力的发展，实行党的土地政策及夺取政权。暴动区域的划分为：1. 湘中以长沙为中心；2. 湘南以衡阳为中心；3. 湘西以常德为中心；4. 在西南之间的要冲是宝庆。宝庆也是中心地点。四个区域虽然已经划分，但是要实行发动便困难，如人力、财力等。以后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

源、岳州七县。

附注：

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其时仅公达一人主张湖南全省暴动，并要泽东即去湘南，当时因想在长沙即刻举行一个暴动，于是没有坚持下去。

（二）暴动的日期——在决定第一次长沙暴动经中央批准之后，随即准备湘中的暴动，湘中暴动在原则上是要与鄂南暴动同时发动。当在决定湘中暴动的区域的时候是八月三十日，常委委员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资琛[3]到岳州指挥湖北工作，同时与鄂南指挥委员会接商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公达一日动身到汉，五日回长沙，立即召集了一次常委会议，各部部长均参加讨论暴动的日期问题，当日泽东从安源来一封信——（安行伟有封同样的信）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来信说长沙的暴动要与前方的军队□□，否则□□。公达在常委的提议是九日破坏铁路，十日各县暴动，十三日长沙暴动。理由是一个暴动的发展不能等待，而各处暴动时间太长，则敌人可以有机会准备，来消灭暴动的力量。这个提议经过约一小时的讨论，各部不赞同，遂作如下之决定：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此议决定之后，随即通告各地执行。

（三）暴动中所必须做的各事件

省委认为在暴动开始之前及暴动发展之后，我们必须鼓动农民一致下决心，做下列的各事件及诸工作：

1. 平分土地；
2. 恢复农民协会，乡村政权归农协；
3. 杀土豪劣绅反动派；
4. 没收土豪劣绅反动派及大地主的财产；

5. 烧毁土豪劣绅大地主的村庄；
6. 抗租及不缴租，已缴者收回来公分之；
7. 抗税捣毁政府的各种征收机关；
8. 组织革命委员会；
9. 毁坏交通机关。

（四）暴动的口号

1. 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
2. 暴动打倒省政府！
3. 暴动打倒国民政府！
4. 暴动杀尽土豪劣绅！
5. 暴动农民夺取土地！
6. 暴动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
7. 暴动实行农协专权！
8. 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
9. 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10. 暴动胜利万岁等等口号。

（五）暴动中的宣传

暴动中准备的宣传，有对农民宣传大纲，主要的是说明过去农协的行动是对的，现在土豪劣绅所做的都是不对，及现在暴动的意义，共产党的主张等，并由宣传部出每日煽动的小传单及歌谣、标语等。

五、湖南暴动的经过

（一）湖南的暴动九号开始，如破坏铁路，九日破坏铁路的共十余人。分途从长岳、长株路线发动，原则是要尽量破坏，达到长期间的不能行车，因为技术没有做好，九日出发的六十人，仅破坏几个小地方，随即为其修复。到十一日才在捞

力河地方陷车一次，倒箱之火车头仍折回长沙。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日均继续破坏的工作，用炸药炸桥，执行三次均无效。到十五日长岳路通车，十二日下午长株路的车已通矣。

（二）安源十日发动，发动之后，工农军即开始向萍乡县城攻击。五时许到萍乡，萍城已有准备，遂折回安源。十二日又往攻，工人炸弹队已攻入，后往之军队去得过迟，敌人得乘暇准备，工农到县城又不径入。于是放弃萍乡攻老关，缴枪十余支。十二日下午到醴陵，折回浏阳。十五日夺浏阳城，十七日失败。工农军有七百上下，此次损失约有百余。仅留王新亚部二百余支，往铜鼓集合。安源军到醴陵时仅出了几张布告，宣布没收土地及恢复农民协会等事，农民群众并没有起来响应。此次的行动，所以在醴陵不能站住。到浏阳，浏阳农民将起来，旋失败。没收土地的事，在此一种广大的力量之下，都没有做过，这是须特别注意。

（三）驻在铜鼓修水一带之浏阳及平江农民军，于十一日分三路进攻平江的长寿街，预计有得胜之可能。后因收编的邱[4]团反戈，腹部受敌，遂遭失败。计损失快枪百余支，死百余人，余贲民部几不能成军，退往湘赣边界，准备反攻。据说此项军队于十四日反攻浏阳之东门市一次，又遭失败，现在仍屯留在湘赣边境界，积极力图反攻。省委并已去信指导该项工农军势力范围之内，积极做民众运动，没收土地交给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政策，在我们势力所在的地方，必须坚决执行，不得有误，想该处领导者当能遵照省委政策实行。

（四）长沙乡村的农民暴动于十一日暴动，分河西、河东两方进行。关于河东方面由长沙县委书记殷××同志指挥。共解散团防局五处，杀土豪劣绅二三人。但杀土豪劣绅平分地主的土地的革命等事，殷同志不敢坚决的执行。河西方面为长县农民部长余××同志领导。解散团防局二处，没收厘金局一

处，杀土豪劣绅五人。长沙河东、河西两方共解散了七个团防局，但是农民并没有起来，其原因并不是农民不需要革命。不要土地，实际是领导的人没有决心，没有坚决的在党的政策之下拼命去干。结果只做得片面的解散团防局的军事行动，军事势力一消失，农民政治上影响简直没有，党的组织亦随之消灭了。

（五）省会近郊农民的组织的基础，比各县均好，近郊农民在去年做了一次减租的斗争。他们大部分都认识农协，知道为他们谋利益的机关，对农协十分的信仰，此次长沙的暴动开始，近郊农民被鼓动能来参加暴动者有万人上下。长沙暴动这是一支主力军，后因图解决九峰的团防失败，农民争斗的勇气几乎消灭，号称近郊农民领袖的滕××同志，在农民中亦拒绝其居住，长沙暴动的力量去了五分之三。工人的力量虽然没有消灭，因反动政府严厉执行屠杀工农镇压的政策之故，大部分工人领袖，均在要捕之列，工人运动亦因之受许多摧折，暴动的勇气也消灭了许多。铁路工作的失败，致暴动的发展以巨大的打击，长沙暴动不得不停止了。

（六）长沙的暴动十三日确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十三日反动政府方面及社会方面，起了绝大的恐慌。浏、平亦在发展很广大的争斗中。长沙在此起来一个暴动，长沙虽然不敢说可以拿下，亦可以与浏、平及鄂南一个帮助，浏、平、鄂南的暴动不致于失败。到十六日反动政府方面及社会方面的恐慌，已经很少了。并且反动的军事布置亦趋完备，要起来暴动一下是可以。但结果是一个完全的血海运动，省委因此将其停止了。

六、结论——暴动失败的批评

我认为省委停止长沙十六日的暴动，不是绝大的错误，省

委绝大的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下面几个。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是要发动农民的土地革命。暴动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党去制造和鼓动重要的工作，是在全党动员到农民中去，湖南党在领导此暴动中，对于农民的力量没有充分准备，党根本没有注重农民运动，因此各地的暴动起来，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这是此次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秋收暴动的真实意义及其目的，党的领导机关——省委及县委——没有充分了解，就是说对党的政策没有了解，暴动的意识没有在全党党员群众中占一个坚决的中心意识。暴动的意识没有普遍到党员群众中去。党的指导机关及党员全体，对暴动缺少一个坚决的心理，没有很坚决地到农民中去执行暴动政策。这里充分表现了党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集团，不是一个无产阶级争斗的党。

（三）湖南暴动在客观环境上，本可以全省起来，但是党的主观见解只重湘中数县，在湘中数县暴动，湘南湘北少去注意。因此湘中暴动的发展成为孤立的形式，湘南湘西不能与敌人以重大的牵制和攻击，这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

七、今后工作的意见——湖南暴动的草案

（一）湖南秋收暴动，虽然已经因党的领导不力而失败，但是湖南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热潮还是继续在高涨和奋发。湖南革命经过了这次秋收暴动的失败，更激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的具体意义是完成土地革命，建设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二）在湖南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热潮高涨的环境之中，

我们须很好的运用此时机，鼓动第二次暴动，在这次暴动我们必须记取秋收暴动宝贵经验。偏于军事，忽略了农民力量的宝贵的经验，作这次争斗的方剂。湖南第二次暴动必须以农民为中心。全党动员到农民中去，鼓动农民自动起来作夺取土地的争斗以实现土地革命。

（三）在秋收暴动经过中，湖南的无产阶级——安源工人、铁路工人等——的奋斗精神，特别表现得十分坚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第二次暴动，湖南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力量，因此安源、水口山、锡矿山等矿山工人，粤汉、株萍两路的铁路工人以及长沙的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电车工人、铁工厂工人、纱厂工人、衡阳兵工厂工人，须特别加紧工作，鼓动其暴动。

（四）在准备暴动及暴动开始的地方，必须用种种方法，宣传暴动的意义及暴动的目的，以激起广大的工农群众对暴动的决心。

（五）暴动时间的军事工作，我们不要依靠它是暴动的主要力量，只是暴动中的一个力量。军事工作主要的意义是破坏敌人的军事组织，因此我们对敌人军队中的兵士运动须特别加紧，在此敌人军队中发展党的支部，组织兵士支部，拿了这个组织，从中破坏敌人的军队，以前接头还犯旧式的军事工作的毛病，须彻底改正。

（六）暴动的区域为：

1. 长沙、湘潭、湘乡、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州、湘阴、安源，以长沙为中心。

2. 衡州、耒阳、衡山、郴州、宜章、常宁、水口山、汝城、资兴等处，以衡州为中心。

3. 常德、桃源、慈利、石门、醴县、临澧、汉寿、沅陵，以常德为中心。

4. 宝庆、武冈、新宁、城步、新化、镇北山，以宝庆为中心。

在以上四个区域各设特别委员会指挥之，惟长沙区归省委直接指挥。

（七）暴动发展之前及发展之后，须鼓动农民自动召集大会，自动的起来执行下列诸工作：

1. 分土地；

2. 没收土豪劣绅、反动派、大地主的财产；

3. 杀土豪劣绅、大地主及城市富豪；

4. 夺取团防枪支，组织工农革命军；

5. 烧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村庄；

6. 抗税抗租，捣毁反动政府的各种征收机关；

7. 尽量破坏反动政府的交通机关；

8. 恢复农民协会，农协专政；

9. 组织革命委员会。

（八）暴动的口号：

1. 暴动打倒湖南劣政府！

2. 暴动打倒唐生智！

3. 暴动打倒国民政府！

4. 暴动杀土豪劣绅及反动派！

5. 暴动没收土地！

6. 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

7. 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

8. 暴动没收资本家及银行的财产！

9. 暴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0. 农民革命才是真正革命！

11. 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

12. 暴动胜利万岁！

13. 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万岁！

湖南暴动中所得的经验及对于党的几个意见：

湖南暴动我是实际参加其工作的一个，湖南暴动的失败，我负有严重的责任，我不愿不把我在湖南暴动中所做出来的错误向党内公开，取得党及党员群众对我的评判，我认为将湖南工作的错误赤裸裸的公开，引起党内及党员群众严格的批评，纠正其错误，这倒是于革命的党的前途一件很有益的事。

湖南暴动失败，是不是停止长沙十六日的暴动有个很大的关键，我觉得十分地觉得停止十六日长沙暴动不过是表示党懦弱心理的一个，根本的错误却还是不在此呢？

（一）中国革命的环境，现在已经是经过了剧烈变化而迅速发展的问题，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公开背叛革命，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反对工农民主解放的要求，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与其政治的代表者转而屠杀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斗争，企图保障其统治的寿命。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在革命中作为叛变，并没有损失革命的丝毫，不过在革命的队伍中，洗去了一些糟粕，反促成中国革命进到了一个新的途径。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宣布不能完成其责任。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亲密起来的联盟，来推翻反动的统治，完成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并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这个革命的阶段中，土地革命占了一个重要的过程，党在此时的战略，是确定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封建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实现此斗争、此方针的战术，是爆发农村暴动。农民暴动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小地主至大地主——夺取乡村政权，建立农民的政权，乡村由农协专政，城市工人的暴动与乡村农民暴动势力的汇合，夺取城市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政权、工农专政的政府。因此，城市工人的暴动和乡村农民的暴动，不过是一

个争斗的两方面，并不是离开两个单独的争斗。湖南暴动的失败的第一教训是工人暴动起来得太快，农民运动起来较迟，两种暴动势力没有很好的、很巧妙的汇合起来，结成一种伟大的力量。敌人利用这个弱点，分别向暴动势力进攻，于是两种暴动力量渐次失败。

（二）湖南秋收暴动是发展并实现土地革命，是无产阶级拉拢全体农民，作全体农民的利益。推翻地主阶级，整个的取消地租制度的土地革命，在此种取消地租制度，农民起来夺地主土地的暴动争斗中，农民已是一个唯一主要的力量。暴动的胜利和失败，是看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对于农民力量的估量及其征取农民程度的高低而决定。相信并估量农民力量在暴动中是个主要的力量，其余军事不过是一个暴动的发动次要力，征取鼓动广大的农民起来参加此暴动，这样的群众暴动必能够达到胜利。至少也不至于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暴动的意义必能在群众发酵和留着思念第二次暴动，这样的暴动失败，终要算是成功。湖南此次农民暴动恰正相反，对于农民运动鼓动农民暴动的工作做得很少，结果是军事的行动，不是一个群众的暴动，至少可以是这样说——这是失败的第二个原因。

（三）湖南暴动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暴动意识的浅入，关于此点可以分两方面来说：

1. 党及党员群众对于中央暴动的政策没有深切的了解，不懂暴动到底是为的一回什么事？这又表现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希望不经激烈的暴动，可以解决土地问题，夺取政权。长沙县委书记怕暴动得太利害扰乱了乡村，得罪了自己乡里的人——暴动的意识没有在此革命阶级中成为党的中心意识。

2. 为什么要爆发此次暴动？暴动到底是做什么？暴动到底为什么？这样几个意识没有普遍到工农群众宣传，工农群众不明了暴动的真意识，暴动没有在工农群众成一个兴趣。加以

党没有决心，领导的能力薄弱，不能坚决的取得农民群众起来暴动，这是失败的第三个原因。

（四）湖南暴动在客观环境上，本是全省可以起来，然而党自己画了一个圈，只决定集中精力注意湘中的暴动，放弃湘南、湘西的暴动，暴动没有开始，自己就画一个圈以自限。决定暴动虽有湘中能够起来，并没有想到湘西、湘南暴动是湘中胜利的一个主要条件，因此暴动开始，全省除湘中外，均在稳定的状况中。敌人得以全力注意湘中的暴动，湘中暴动孤立，遂归于失败。

（五）暴动是个艺术，是说每个暴动的制造者对于暴动必须如艺术家对于艺术一样，要很细心的赏鉴，去组织，去发挥，然后才做出一幅很好的艺术作品。湖南党领导的此暴动，在暴动是艺术的一语上说，可说是暴动没有开始，就违背了暴动的条件。湖南暴动中的组织，单就交通一事来说，是够失败暴动，其余如农民、工人种种方面是一样，这是失败的第五个原因。

（六）选择暴动的时间和地点，必须在反动统治及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恐慌和摇动之中爆发暴动，暴动才能取得胜利。湖南此次暴动的时间的选择相距太远，在敌人十分恐慌之中，党没有提早暴动的日期，这是失败的第六个原因。

（七）在暴动中宣布退守，或者停止暴动，这是自杀暴动，湖南党在环境困难的中间，到最后五分钟，正犯了此种错误，断送了暴动。最后五分钟的宝贵经验我们须绝对记取。

上面七件是湖南党此次秋收暴动中的错误，党及党员群众能自己取此次的错误的经验改正过来，坚决地去奋斗，党的前途还是很可乐观的呢！但是我们细心考察致此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一个党的发育未完成的具体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党缺点是：

1. 组织上的缺点：我们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在中国已有五年余的历史，斗争的经验，亦复不少，尤其是经过上海工人的暴动。湖南农民的暴动，记取这些暴动的经验，应当创造得出一个很健全而能争斗的党，然而在事实上则证明党的组织十分懦弱，不能经受激烈的斗争。到了斗争的临头或在斗争中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丑态，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十分充足，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这样的丑态的病根，是党的组织建立在各个私人感情的结合上面，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结合上面。党员在党的工作中只有私人的感情，没有阶级的感情，党的感情，争斗的感情，所以到了一个争斗的发生，或发现党员可以离开党的立场，阶级的立场，抛弃党所决定的战略和战术，无意的走到反革命路上去。我们应当洗刷这种耻辱，坚决的改组各级党部，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2. 思想上的缺点：我们的党在组织上表现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集团。就是在党及每个党员的思想，都充分表现出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左翼的思想，党内思想没有统一。因此，对于一个革命的阶级所决定的战略及在此阶级中，随战略而决定的战术，因党的思想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主要的战略和战术，不能正确的决定，这是我们党的第二个基本缺点。

现在中国革命已进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要适应此环境，党在此新的环境能够造出新的很正确的革命战略与战术。定出来的战略与战术能够很畅快的坚决的执行，就是要把这个没有发育完成的党，根本打毁一下，从新改造，造成能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毁党造党的基本理由是：

打毁只有私人感情，没有党的感情、阶级感情、争斗感情的小资产阶级化的党，创造以无产阶级为基础，能坚决争斗的党。

洗刷腐化消极的党员，征取吸收无产阶级、农民中新的勇敢争斗分子充实党的下层组织，建立党的下层中坚领导。

改造党及党员的思想，党的思想无产阶级化，训练党的意识成为整个无产阶级的意识，争斗的意识，暴动的意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释

〔1〕指易礼容。
〔2〕即夏明翰。
〔3〕即何资琛。
〔4〕指邱国轩。

PDG

中共中央给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信*

——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

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

日内迭接各方报告，知道前敌溃败的情形。中央对于叶贺[1]军队这次的失败，尚须经过详细的调查，方能予以确定的批评。今但对于叶贺溃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办法有以下的决定。

（一）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反而要矫正从前以农民为副力等待叶贺军队到来的错误观念（见中央前次各信），相信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坚决的领导他们继续不断的暴动，夺取县政权，杀土豪劣绅政府官吏，抗租抗税，分配土地，一直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夺取全省政权。叶贺之残余部队应积极拥护农民暴动，剩余之枪支尽数武装农民，不可靠之部队以农民改编。就叶贺军队本身讲，亦只有极力拥护农民暴动，才免被敌人消灭而可找寻最后的出路。

（二）叶贺军队失败的原因，中央虽未能完全明了，然以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七期。

现在已有的材料推断，则由南昌起义一开始即没有坚决的处置敌人，一直到夺取潮汕，处处予敌人以聚集军力合而谋我的机会，实为失败的主因。现时叶贺残部无论退到何地，必须紧守二个宗旨：第一，不投降敌人；第二，尽力帮助农民暴动。不得已时图向湘南发展，最后失败始上山。此时退往海陆丰之部队，亦不能作就地休养保守的想头，这不仅在地理上不能，即在给养上亦无办法，勉强取之则必与农民冲突。此时只有帮助农民猛烈的发展暴动才是出路。

（三）于全省发展暴动外，应特别注意海南岛之继续占领，并要立即派一人前往侦察其是否可以成为广东暴动的一根据地，调查结果报告中央。

（四）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但据报纸所载，张发奎到广州后，颇欲实行对工人的欺骗政策，如要筹八十万给罢工工人，如打电总工会、机器工会等，意在以欺骗手段取得工人的拥护。此时我们的策略应迅速地领导工人起来做大示威运动，要求真正工会的集会、言论、出版、身体、罢工之自由（工人自己选举的工会，工人生命之保障等），要求工厂改善经济的条件（减时加薪等），省港罢工工人要求给工做等等。争自由和改善经济的斗争应实际的举行。同时于经济的口号之外，还应加上政治的口号，如反对投降蒋介石等等。必须在张发奎收编政策还未能影响群众之先，迅速领导工人如上述起来斗争，才能揭破张之假面具。

（五）关于从前溃散之同志，南局应即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一招待处招待他们，用费由各国际代表给予你们的款中支用。招待的详细办法由昌颐[2]兄面商，大要是可以留在广东的工作同志，或可以就近归家之同志，须尽量留在广东或暂时回家，不能留者则令其回沪。现尚在前敌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必要留在前敌时，须一律设法回沪。

（六）整个的广东工作以后交南局及广东省委指挥。

（七）右面各点须立即执行，并派人通知前敌。各地农民暴动及前敌情形须作详细报告来。

中　央

十月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2〕即颜昌颐。

PDG

中共中央关于工农运动的路线和策略给江苏省委的指示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九日）

江苏省委：

一、中央看了《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江苏农民暴动计划》、《土匪流氓运动工作大纲》后，有以下几点的指示：

（一）江苏农运的政治路线应该是直线的，即由抗租抗税发展到实行乡村中的红色恐怖，杀豪绅官吏及一切反革命派，建设乡村的革命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必要经过减租减税或其他改良的口号。对小地主的政策，你们原是根据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定的。惟八七会议对小地主的政策事实上中央已经改变，即是对小地主的土地也一样要没收，更无所谓减租不减租，根本就不交租，实行“耕者有其田”，耕种的人才有田。政权问题可由农民代表会议选出农民委员会。在江苏农民协会既不甚适用尽可不用。各省名义也不必勉强相同，总以适合农民要求为标准。如“革命委员会”江苏不适用即可不用。

（二）你们认为江苏农民暴动特别注意在江北发动，在事实上是对的，但在江北暴动的条件中说：“江北各地交通不方便，离反动政治中心较远，如有举动，军队进攻较难。”又说：“江北现在两派军队相持，各欲利用土匪农民以为己用，谁均不愿轻以生力去对付农匪。”而对江南则说：“因为江南交通的便利，反动军队容易进攻，资本家地主豪绅的组织也较严密，

所以如有动作，较易失败。”这种政治方面的条件，很可给江苏农民暴动以极坏的影响——机会主义的影响，如果不改正过来，江苏农暴可以在这种倾向之下失败的。

（三）你们一方面在江北立即举行农民暴动，另一方面则认在江南还要经过减租的运动以发展土地革命的宣传，也不是正确的。“减租”的口号已经不是革命的了，这个口号甚至可以帮助南京政府。所以在江南也不应提出减租，一开始就是抗租抗税，反对当地的政府，由此而发展到暴动。虽然减租减税的运动也要发动，但减租不应是我们党的口号，我们必须从各种斗争中领导群众进到抗租抗税。目前最好利用反抗“增加漕税”的运动来开始暴动的工作，因为反抗“增加漕税”必然引起与政府及大地主的冲突和斗争。

（四）土匪是失业的农民，有些还是未失业的农民，我们要领导他们来参加土地革命是对的，而且他们的问题也只有在土地革命成功之下才能解决。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土匪运动是农民运动的一部分，要使土匪农会化。这个意义就是说我们要以农运或者农暴去领导土匪，土匪运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使他原有的组织系统分化崩溃，而在农民组织（农会……）指挥之下改编成为农暴的副力。如果离开农运或农暴去做土匪运动或者误认土匪为主力，利用他们的组织成为一种单独的力量，则仍然是国民党利用土匪的老把戏，结果必定成为一种很坏的军事投机。你们的土匪运动工作大纲十五条虽曾说要使土匪运动成为农民斗争的一种副力，不可只是单纯的土匪运动。但通篇的精神则仍是利用有枪土匪以发动农民暴动，这在十三、十四、十五三条很显明的可以看出。这样便仍旧是以匪军为主力、农民为副力的军事投机，中央认为这个观念必须要改正。同时土匪运动的策略可包括在农运计划中，不必专定一计划。

对杂色军队，他们已经是军阀的爪牙或别动队，比起未受

编的土匪是差得远的。他们对农暴的中立，不过是一时的利害关系，我们的策略，应当在农暴未爆发前可以利用他们的中立，农暴一经爆发起来，便应立刻去解决他，丝豪不许犹豫，这是湘鄂农暴的苦教训，希望你们特别注意而改正你们对杂色军队的策略。

（五）中央认为你们的农运计划应根据以上的指示改做过，把土匪运动包括在内。关于农民客观的情形，农运的政治路线，农运中各方的策略（农民组织、政权、土匪等），我们如何下手去做，都要切实的扼要的简明的说明，尤其是对于下手做农运要切实的规定。原来的计划上有许多是根本可以不要的（如各区农运的特点的指出没有什么必要）。

关于暴动计划亦须修改一遍。

二、中央对于你们《十月份职工运动的策略和计划》亦有下面几点的意见：

（一）"反统"[1]恢复上总[2]的威权是对的。但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反统"运动不要太单纯了，要从经济斗争中来发展"反统"运动，从经济斗争中使工人群众实际上认识工统会之卖阶级的行为。在组织上则提出工人自己选举工会，反对由工统派人组织工会的口号以鼓动工人实际反抗工统。同时在经济斗争中应提出"劳动待遇平等"运动，根据最高的待遇原则来规定一个条例，中外各产业下之工人均应一律提出。

（二）在组织上，工会与党的组织应划分清楚，各有其系统，同时要建立由下而上的工会系统，各工厂应由群众自己选出自己的工厂委员会，并须普遍的宣传工厂委员会，同工人群众解释工厂委员会即是工人自己选举出委员来组织的工会。工会既是群众选举出来的，自然不能将工厂委员会秘密起来，连哪几个人是工厂委员会的委员工人都不知道。过去的工会完全是秘密的，变成了第二党，致与群众隔离，这是很不好的。现

在要使上总以至于各个工厂委员会与工人群众接触起来，使群众认识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而巩固工会之威权。

（三）上海有一部分同志因为近来对个人的暗杀，收了一点效果，便迷信这是万能，这种倾向有变为无政府党人的个人暗杀主义的危险，结果必至放弃群众斗争，这是一种极危险的倾向，应当向同志解释红色恐怖的主要的意义是群众的红色恐怖，即是由群众起来对反革命派公开的施以严厉的惩戒。……

此外还应通知你们的：中央因实际工作的便利起见，已决定取消安徽临时省委，将安徽划归江苏省委指挥，在安庆芜湖一带（范围由江苏省委决定）可设一特委在江苏省委指挥之下指导工作。现已通知安徽临委与你们接洽改组及其他事宜矣，特此通知。

中　央

十月十九日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八期刊印。

注　释

〔1〕即反对上海的黄色工会“工统会”。

〔2〕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

PDG

中央通告第十一号*

——关于出版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兹决定出版中央机关报，定名“布尔塞维克”。

（一）《布尔塞维克》报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之机关，当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布尔塞维克》报并且要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他应当做工农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

（二）中央常委暂决定秋白、亦农、仲夏、若飞、超麟[1]为编辑委员会，秋白为主任。

（三）编辑委员会在中央常委指导监督之下。

（四）中央各委员都有参加编辑工作投稿《布尔塞维克》之义务。

（五）南、北、长江各局及各省委必须定期寄通讯（地方政治工农通讯）于《布尔塞维克》。

（六）《布尔塞维克》先分下列各栏：（各栏虽不必每期具备，但是收集投稿可以下列各栏为标准）

一、社论。二、国内政治。三、外交问题。四、国际状况。五、职工运动。六、农民运动。七、国民党。八、中国革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八期。

命问题。九、党内问题。十、理论问题。十一、经济与财政。十二、寸铁。十三、妇女问题。十四、青年问题。十五、地方通讯。十六、读者之声。

（七）《布尔塞维克》暂定为周刊。

（八）《布尔塞维克》之发行，由交通处负责传递。各省委务使每一支部都能按期收到阅读。各支部的同志都应负责推销，介绍读者，收集读者之声的稿子。

（九）每一省委当指定当地若干学生同志特别责成他们推销到党外去。

（十）每一省委应于月底报告所销份数，并说明下月能销的数目。

十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

PDG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反对军阀战争宣言*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国的工农兵士及一切劳动平民！

南京政府和唐生智开战了。又是贫苦的兵士流血，贫苦的人民受痛苦了。他们已经攻城夺地，调兵遣将，拉夫派饷了。这些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冲突，不论是南京、武汉，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都是祸国殃民，剥削和压迫工农贫民的。冯阎和张作霖早已开战，今南京和武汉又打仗了。不久，孙传芳、张宗昌又要打南京和上海。全国大混乱的军阀战争——奸淫掳掠的屠杀战争开始了！就是广东，也在酝酿着李济深、黄绍竑和张发奎的战争。全中国都是万恶的新旧军阀争权夺地的战争。

工农兵士及一切贫民，以至于小商人，都尝够了军阀战争的痛苦。农民被剥削到一粒米也不剩，被军阀拉夫、派捐、封船、扣车、派粮、派草……兵灾所到，田亩荒芜，整个的村庄遭到烧杀蹂躏，奸淫掳掠，无所不至。这些新旧军阀拼命压榨贫民的膏血，苛捐杂税无奇不有——农民一年劳动所得，差不多有四分之三要拿出来付租税。如果农民反抗这种强盗似的禽兽似的蛮横压榨，那么，他们便大施屠杀，几十个村庄一批一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二期。

批的烧毁，老弱妇女也不能免。这些军阀还要拉夫——强逼工人苦力到战场上去送死，强迫他们搬运几百斤的重担，牛马似的鞭打他们。被拉去的伕子，不但一个钱也得不着，而且常要打死、饿死、做死。伕子做不动了，军阀便不顾他们死活，把他们丢了，甚至于还要把他们枪毙。军阀封农民的船，抢农民的车，船夫车夫都得替他们当差。战争一起，纸币更加要滥发了，什么国库券、金库券、二五库券又要大批的发出了。工农小商须得使用这种不值钱的纸币。还要强迫人民担负公债。上海方面已经榨取了四千万元的公债；现在为着战争——又要发行二千四百万元。因战争的关系，米盐油等日用必需品，运输都日益停顿，价钱一天天的飞涨。因战争的关系，交通断绝，商业停滞，棉丝等等原料不能运到市场上来，工厂要关门，工人的失业更加一天天的增多。资本家只顾要自己不亏本，成批的开除工人，或者简直关厂，帝国主义遇见中国这种混战，更加可以乘机取利。这些万恶的禽兽似的新旧军阀互相吞噬的时候，帝国主义便可以更加来进攻中国——满蒙协定呀，中日商约展期半年呀，汉口英租界交还英国呀。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又抢夺几条新的铁路去，又霸占了几个满蒙矿山去，他们还想更多占领中国的领土，侵入内蒙古。英国帝国主义已经利用军阀的互斗和国民党的妥协屈服，又将汉口租界抢去。汉口英租界是工人贫民群众夺回来的呵！如今卖国的国民党却将他让还英国。今年一月间工人贫民赤手空拳将这租界夺了回来。而现在——十月间，还不满一年，国民党的军阀，有着全副武装的军队，却拱手交还英国！

中国一般劳动民众，穷苦得饭也没有吃，受着非常之大的痛苦、压迫、抢掠、奸淫，而这些军阀还要打仗！

谁在这里破坏长江流域，谁在这里延长战祸荼毒民生？

就是国民党。唐生智是国民党。他这个军阀、地主、银行

家、荒淫骄奢的重利盘剥者，他在湖北、湖南、安徽成千成万的屠杀工人和农民，屠杀共产党员，摧残两湖的农民运动，残暴到极点的镇压两湖的农民暴动。唐生智说，他不满意南京政府的政策，不承认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这完全是鬼话。他自己的政策和南京政府的完全一样。他为什么打仗？不过为着争地盘，他抢着了安徽，还想抢南京上海，占领整个的长江流域，他要他来杀江苏、浙江的工人农民——南京派的国民党杀了还不算！他是张作霖、张宗昌的同盟者，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现在已经受日本帝国主义军械子弹以及汉阳兵工厂材料的供给。他是杀工人农民的刽子手。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以及一切工农的责任，就是要反对唐生智，推翻唐生智！

现在南京政府打唐生智。难道南京政府比唐生智好些么？南京政府之下的将军也是国民党的军阀，也和唐生智一样，是清党反共的所谓忠实同志。这些军阀和唐生智是一样的——一样的刽子手！南京派的将军李宗仁、白崇禧、程潜、何应钦，也是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大资产阶级以及买办的代表，和武汉的唐生智、何键、刘兴一样，和冯玉祥、阎锡山一样，和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一样，和汪精卫、张发奎、李济深也是一样。

何应钦在福建、浙江，到处屠杀工农共产党。他现在明的暗的听英国帝国主义的驱策。他是蒋介石的走狗。白崇禧就是四月间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他最近还在天天杀共产党，天天杀无产阶级勇敢的战士，他逮捕了几千几百的革命党员，关在龙华。李宗仁、程潜等类的东西，也是军阀，也是工农贫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他们打什么仗，为什么打唐生智？他们的目的，也和唐生智一样。他们是想抢地盘，争权利，抢夺剥削工农的权位。这次战争的“意义”，就是——究竟哪一个能

够有全权搜括长江流域剥削劳动民众：是唐生智呢，还是南京派的一班狗强盗？

张发奎、汪精卫、陈公博等等，现在正想利用长江流域的混战，从容霸占广东的政权。但是李济深、黄绍竑又要同他们战争。这些革命叛徒，这些无耻的地主豪绅资本家的走狗，他们帮着杀了成千成万的工农，还在那里说工农政策，实行减租等等……人民被他们欺骗得长久了；他们自己的屠杀政策早已揭穿他们的假面具，现在再骗不了人的了。他们是劳动民众最可恶的仇敌，因为他们用那些欺人的“革命”口号，掩饰他们的真面目，还想用国民党的臭招牌骗人呢。他们和李济深、黄绍竑的战争，也是军阀的战争，和南京武汉的战争是一样的。

工友们，农友们，城乡的贫民！在这种全国大混战的军阀战争之中，我们拥谁呢？我们应当使这种战争得甚么样的结局呢？

我们应当反对一切军阀的战争！我们应当推翻一切军阀：北方的，南方的，武汉的，南京的，山西的，河南的，广东的或广西的。我们对于现今互相搏噬的军阀，都要打倒。我们知道：无论哪方面战胜，对于劳动民众都是非常之大的祸害。所以我们现在，和欧战时候欧洲俄国的革命工人一样，应当积极的行动，使各派各系的军阀统统都失败。我们应当使这种军阀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一切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变成反对一切压迫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要一下子消灭一切军阀的战争。然而要肃清这些新旧军阀，消灭一切战争，只有推翻军阀政权之一法。要消灭军阀的政权，就必须工农兵士起来反对军阀。应当使军阀的战争变成一切劳动民众反对压迫剥削及帝国主义的伟大的战争。只有这样，我们将地主阶级的土地夺回来给农民，没收一切大工厂、大银行、大企业，消灭重利盘剥，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彻底的改良工人及

一般劳动者生活，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中国。国民党的欺人口号，革命叛徒的反动政策，决不能救中国；只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剥削者的伟大的武装暴动，才能开始新中国将来的光明之路，肃清中国之内的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几万万工农民众不再受残暴的剥削和压迫。

中国共产党知道：这种反对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要经过极大的阶级战斗，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是一切劳动民众的领袖，我们知道：必须在斗争之中组织群众，走向这个伟大的革命战争。

革命战争是实行着：一年以来光荣的上海工人的暴动，广东农民的暴动，两湖农民的暴动，叶挺、贺龙军队的战斗，都只是这一极大的斗争之中的片段。我们应当利用这几次英勇的战斗之中的经验和教训，准备更大更新的爆发。我们应当将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组织得更好，扩大到工农群众之中去，吸收一切优秀的革命分子。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更加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努力的反对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反对这些民众的和革命的叛贼。我们更加努力的反对一切军阀战争，反对一切军阀及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一切工农兵士贫民实行伟大的武装暴动。

工友农友兵士贫民同志们！准备着作战，经过日常斗争，一直到推翻劳动民众的一切仇敌！

前进！前进！

反对军阀战争——反对一切租税，反对无价值的纸币库券，反对强逼公债！

反对南京的军阀，反对唐生智，反对张作霖，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反对张发奎，反对汪精卫……

PDG

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

力争中国的统一解放！

推翻一切寄生虫压迫者的政权！

一切政权归劳动平民！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

一、太雷[1]已到此，省委的工作计划亦已收到，惟此计划仍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中央已决定另行起草一个寄给你们。

二、革命委员会本是一很好的工具，惟其如此，这个工具不可滥用。此次前敌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政治上也同样的失败。“中华革委”在广东工农群众中没有什么信仰，不能成为群众拥护的目标，因此无继续使用这个工具——“中华革命委员会”之必要。如果用它来号召土匪，委任杂色部队，那么这是“孙中山主义”的老把戏，我们从中不应再抄袭这种无意义的勾当。以后工人武装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武装称农民革命军，合称工农革命军，用工农的红旗，就是现在叶[2]军残部也要改名易旗。至于政权机关，在乡村则为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在城市则为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所有从革委的组织即应取消。

三、以后由港派来的前敌同志，省委务必附一意见表，说明该同志履历及其能力如何，过去作的什么工作，以后能作何种工作及应作何种工作等等。来沪后，方好对该同志确定办法。

四、中央决定取消南方局，广西划归广东省委指挥，福建已决定南北合并改组成一临委，直接由中央指挥，惟二十五师则设一特委归广东省委指挥，但特委所到地方，应与该地党部发生密切关系，共同领导该地工农暴动工作。

五、中央定十一月八日召集紧急会议，省委即由太雷代表出席，不必另派人来，彭湃既已派往闽南即可不出席，并请你们通知恩来[3]务于七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

中　央

十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张太雷。
〔2〕指叶挺。
〔3〕即周恩来。

PDG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

——为叶贺失败事件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南昌暴动与南征的意义

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从国民党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始终是扩大些在所谓“青天白日”之下的军事势力，全然不肯发动民众，使民众自己起来取得政权，取得土地，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恰恰相反，当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时候，工人贫民自己起来民众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时候，这些国民党旗帜之下的“革命军官”立刻便攻击农民工人，大施屠杀，蒋介石四月中的上海屠杀，广东屠杀……是如此；湖南唐生智等的马夜政变及清乡，以及冯玉祥在陕豫的屠杀政策，也是如此。就此证明国民党的一切新军阀都是代表豪绅资产阶级而反对工农压迫工农的[1]。所以中央在宣布与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破裂之后，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粤赣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而叶挺军队的南昌暴动，便是这一民众暴动，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之总政策中的一个计划。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七期。

叶贺南昌暴动，在一般的民众武装时期之中，占有何等重大的地位，这是非常明显的。民众自己的发动，以及真正革命军队的暴动，以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为目的，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这历史的事实，是中国革命中空前的事件。所以现在叶贺虽然是失败，而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不但如此，我党以前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其错误的主要点，便是无产阶级政党抛弃独立的政治行动，侧重小资产阶级领袖妥协让步。只有决定四省民众武装暴动，以及率领叶贺军队暴动反抗武汉反动政府之政策，是算党抛弃机会主义而走上布尔塞维克道路的新纪元。

因此，凡在南昌暴动之中，有倾向于犹豫摇动，如等待张发奎态度之表现等等的，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南昌暴动之后，只抱着军事投机的心理，而不信任群众，不认识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的工农政权之倾向，甚至于暴动开始之后，仍旧抛弃土地革命之旗帜，那就更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叶贺军事上的失败，不是我党真正的失败；只有南昌暴动中之指导不能完全脱离机会主义的遗毒，所使南昌暴动减少其历史上应有之意义——这可是我党政治上的失败。

（二）叶贺南征的经过及其失败

南昌暴动后，叶贺军队从南昌经过抚州、瑞金、会昌，遇见钱大钧的及一部分黄绍竑的军队，与他们大战，结果，南昌暴动军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打了很大的胜仗。会昌之后叶贺便未照预定计划直下寻乌，到梅县，竟改变途程折回汀州、上杭一带，再经大埔一直往潮汕去。但是等到叶贺军

队到潮汕，敌人方面陈济棠、王俊，黄绍竑已从四面合围来攻击。

叶贺军队虽然在九月二十四日先锋即刻到汕头，汕头工农军也起来暴动，然而到九月三十日即被反动军队所逼，不得不抛弃汕头，而竭全力到汤坑去御战。这最后一次战斗，敌人方面有一万五千，我军只有五千，巷战苦战一昼夜而我军竟完全解体。现在的情形是：二十五师一千余兵因到汕头时尚留驻三河坝，不久即被敌军隔断，现在退向闽边。汤坑之战败后，叶挺只余七八百人退甲子港而溃散。尚有贺龙二十军之第一二师二三千人奔往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竟要求李济深收编。

（三）叶贺暴动失败后之政策

南昌暴动军的失败，诚然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失败——工农武装暴动的开始时期，革命方面所有的这一些正式编制训练过的军队，不但不能征取广东发展土地革命，而竟溃散了一大部分，这诚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武府反动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更新的时期——工农民众暴动的时期，叶贺军队的革命战争，不过是全国民众暴动中的一个强大的副力。这新时期中，我们的主要政策是组织民众暴动，赞助民众暴动，叶贺的南征，不过是这总政策之中的部分问题。我党这个新的武装暴动政策，完全是合于革命发展到新阶段时客观上所要求的。只要看看九月初直到现在，湖北的通城、通山、崇阳、咸宁、蒲圻、公安、石首、松滋、江陵等县，农民甚至于徒手的暴动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占领县城，革命民众自己选出县政府，乡村之中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没收地主，杀戮豪绅……湖南、安源的工军和农军暴动进攻醴陵，株洲的农军以一支枪

夺取株洲、平江、浏阳的农军曾同时暴动占领县城，长沙四郊的农民也起来暴动，广州则自四月十四李济深反动后，四处暴动起来。但要看这种情形，但知道客观上革命的发展，的确已经到了一般工农暴动的时期；我党的责任，便是组织和准备以及赞助指导这民众武装暴动，在各地率领民众起来推翻新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在这种总暴动之下，叶贺军队自然有很重大的意义，但是，革命的基础力量始终并不是叶贺的部队，而是工农群众，现在叶贺军队固然失败了，工农民众的力量还却正开展，对于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之认识，正在与新旧军阀国民党的剧烈的斗争之中，日益广泛而深入于工农群众——不但在两湖广东是如此，现在江浙北方豫陕……差不多各省都有如此的现象。这种情形之下，难道叶贺军队一败，革命便了结了么，当然不是的。叶贺的失败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叶贺的军队可以给敌人打散，工农民众的力量并没有打散。我党准备组织发展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仍旧应当积极的进行。

因此，现在广东虽然已经没有立刻以大军攻取广州夺得全省政权的可能，然而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仍旧在发动，叶贺所剩余的势力应走“到农民中去”帮助当地农民摧毁豪绅的政权，建设农民群众的政权，引起农民群众自动的起来没收土地……武装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叶贺所余军队自身要改组变成工农革命军。

（四）叶贺南征中我们主观的错误

叶贺军队的南征，何以竟至失败呢？固然，客观上敌人的军力比我军强大，全中国的报纸交通整个儿的权力都在敌人手中。然而失败的原因之中属于我们主观上的错误的亦是很大：

一、前敌委员会政纲的错误——主持叶贺南征的我党指挥机关，前敌委员会决定政纲之中，关于土地问题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广东一个农民听见这一主张便说道：“这叫做耕者无其田”！这句批评是再正确也没有。

二、策略上的错误——叶贺南征军所到的地方，对于豪绅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策略，并不是猛力摧毁他们的组织和政权，却大半偏于犹豫妥协的策略，并未猛力歼灭土豪乡绅，并未完全解除他们的武装，摧毁他们的金融机关，摧毁他们的交通联络。不敢坚决的实行没收征发的政策，却用军阀筹饷的老办法，和他们和平磋商。对于豪绅是如此，然而一到汕头，对于乘机稍稍抢掠的贫民，却立刻枪毙了三个人，“为的是维持秩序”——那时还是维持的豪绅资产阶级的秩序！广东有一个工人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这就是说：这次来的军队还非工农贫民的军队，并没有大大杀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叶贺军队之中“不扰民”的口号几乎高于一切）。

三、政权认识上错误——“耕者无其田”的“蒋介石第三的军队”到广东做甚么呢？要创造甚么样的政权呢？当然，带着这种政纲和策略的军队，对于政权不会有明了的认识。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没有深切觉着自己应当代表工农贫民去行使权力，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没有信仰群众的力量——群众的革命独裁的力量。没有在群众之中去创造真正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力量，而是想象着自己是一种军队的力量，类似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力量。因此：（一）可以乱发委任状，联络杂色军队土匪首领；（二）可以派人与张发奎谈判，弄些纵横捭阖之术……

四、宣传工作上的错误——叶贺军队行军的时候，兵士之

中并没有做充分的宣传及政治工作，所过地方的民众之中也没有宣传。同时，敌人的宣传却非常之厉害，军队行过抚州之南，差不多十几天不见一个人，这是因为朱培德等反宣传的恐吓当地居民的缘故，我军却没有先行派遣宣传员，说明“八一革命”南昌暴动及南征的意义。

五、军事上的错误——军事上的错误，更是很多，不能详细叙述，简单些说：南昌暴动没有采取直下赣州、吉安，一则可以打散朱培德、钱大钧，隔绝张发奎，使他们不能与李济深、黄绍竑连成一片，而如现在之从容布置，围攻我们；二则这条是大路，沿途农民运动有些基础，可以随处摧毁豪绅政权，引起农民群众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逐步交农民防守。南征的路线是取得抚州、会昌、寻乌等闽赣边境荒微之地，农民简直尚未起来的地方，这已经是一个失着。然而这还可以说，仅仅是一种可能，最明显的是：一开始便有与张发奎妥协之等待犹豫的倾向；对于不稳的部队，如蔡廷锴部，采取非常软弱的摇动的政策，致使蔡廷锴得以诈术损坏我军很多很好的部队。再则，现在瑞金、会昌打了胜仗之后，又不追踪南下，直到梅县，汇合当地已经奋起的农军，发动当地农民暴动，击散黄绍竑等敌军，直取兴宁、五华，占领全东江区域却又折回走上杭、汀州，与敌人避道而行，使敌人得以腾出十多天的工夫从容布置。

总之——前敌的指导，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既没有明显的土地革命及工农贫民政权的政纲，又没有坚决摧毁豪绅政权的策略——工农说是“耕者无其田”、“蒋介石第三的军队”。这种机会主义的指导之下的军队，如何能责备农民群众不起来援助，农民对于这种军队自然是不会出力赞助。事实是叶贺军队根本不去发动农民群众——前敌指导，只知道军队是主力，“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根本上不信任群众

的力量，不去发动农民创立真正的民众政权，因此将富有历史和伟大的意义之“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总之，此次失败，并非农民未赞助军队而失败，而是军队未发动工农群众，甚至反而阻滞民众革命斗争而失败的（例如普宁农民群众数万围城攻豪绅的巢穴，军队去帮助，打进了城竟反而不准农民进城，不准农民大杀土豪乡绅，说是维持秩序）。

六、南方局指导广东农民暴动的错误——南方局指导广东农民暴动的政纲战术上的错误，中央早有信去指正（见《中央通讯》第六期）。叶贺军队与广东农民接触之后，尤其见得出：（一）政纲和口号上拘泥规定五十亩以下不没收，另提减租至百分之三十的口号；（二）战术上农军只取侧面攻击——仅仅作帮助叶贺，牵制敌人之计，而没有号召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夺取政权和土地，因而没有猛力搏击的战术；（三）根本上没有发动农民群众，所谓暴动，大半是，或是完全靠已经组织好的农军势力行动——或为纯粹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农民群众的暴动；（四）地域上海南及高雷虽起，而无关大局，西江方面简直只接洽有枪的零星部队（农军或土匪），没有到群众中去号召，因此这地方始终没有暴动，黄绍竑部队遂得安然渡过；（五）既没有把广东农民运动做主力，又根本没发动群众，所以使群众之中发生等待叶贺的心理。自然，一般工农自己没有深切知道要自己起来夺取政权——这是政治宣传之大错误，就是我各地党部也没有详细考察反动势力，作种种夺取政权的准备——这是技术工作上的缺点。

（五）叶贺失败所得的教训

前敌委员会及南方局的政治上的错误，虽然最后改正了

些——例如土地问题、政权问题等等，但是已经太迟了，那时军事上已经近于失败了。叶贺南征中我们所得的教训是非常之大的：

一、政权问题——今后革命的任务，应当明显的确定是要创工农贫民的革命独裁的政权——苏维埃的政权。国民党已经死灭，他的旗帜最多不过是“蒋介石第三”的旗帜。必须是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必须是群众选举的剥夺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政权。

二、土地问题——今后应当切切实实明了“农民群众下层自动手没收土地”之意义。土地问题决非某一政权（自蒋介石第一到蒋介石第三的一切政权）所能出一布告法令，限制几亩以上不准没收的，农民暴动即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分配田地”；农民自动手的干，我党应当竭全力以赞助，并且要领导他们去干。耕者有其田及分配土地普遍群众斗争，客观上是土地国有的实行，因为只有群众如此行动起来才能创造出工农民众的国家，只有工农民众的国家才能实行土地国有——宣布耕者有其田是全国人民的，宣布一切人不得买卖土地。

三、劳动问题——我党在武装暴动创立工农贫民政权的要总政策之下，自然有最彻底的：（一）“八小时工作制……等”的工人问题政纲；（二）工农政权要没收中外大企业及银行，要实行国有银行大工业及一切交通事业；对小企业手工工场等厉行彻底的劳动法，对于不遵劳动法的店东厂主严厉的处置，一直到没收。

四、策略问题——对于买办豪绅资产阶级，必须极严厉的实行歼灭政策，不能稍有犹豫动摇的态度，并须勇敢的摧毁他们一切权力机关，武装的，金融的，交通的，一切种种反革命工具。对于小资产阶级不可以存着怕他们反动而迁就他们的心理；我们猛烈的摧毁现在有的豪绅资产阶级的秩序，小资产阶

级是要动摇甚至反动的。但是工农政权的确立，实际上也是解放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他们客观上只有赞助工农是他们的出路。

五、军事问题——辛亥革命直到现在，都只有“将变”——冯玉祥、郭松龄、唐生智、周凤歧等等的倒戈，“民军”、“游击队”等等土匪首领的受编。现时我党的军事行动，必须是“兵变”——兵士群众，土匪群众在我们政治口号之下移转他们的武器来反抗长官，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总之，既名为民众武装暴动，那就必须是民众的。工农群众奋起抢夺敌人的武装，兵士土匪群众举起武器来干——打倒一切“上等人”的权力。如此之军事行动，才是民众的武装暴动，这种暴动里才能产生真正的工农革命军。这种主力的创造和发动之中，才能偶尔利用“杂色军队”和“土匪首领”“中立”；否则便是国民党（“上等人”的党）老方法——纯粹利用军官及土匪首领，结果，是无穷的造成豪绅资产阶级的武装势力而已，他们始终是要杀工农的。

六、党的问题——在这总的武装暴动工农革命政策之下，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必须有党的指导，政策上，如这次委任杂色军队，及与张发奎接洽等，都是前敌各个人的任意行动。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再则工农革命军中，必须有党代表的制度。三则各地党部必须深深建筑于群众的基础上，在日常斗争中一步不放松的宣传夺取政权的必要。四则各地党部必须详密的探察敌人武力上，财政上……的情形，总之，党要在政治上技术上真真实实的做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好准备。

叶贺失败之中，如上述之许多错误，显然机会主义的遗毒，我党必须深切的认明：下极大的决心，重造我们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造成真正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然后才能担负起现

时所负的重大使命。

十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本文在《陕西省委通讯》第四期刊载时，此句之后还有："直到今年八月一日，叶贺军队因此而暴动，反抗武汉政府——反抗这摧残土地革命压迫工农屠杀共产党的所谓国民政府。叶贺军队，是中国革命之中第一个真要站到工农贫民方面来，真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及军阀政权的军队。八一暴动主要的是在此。"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农民起义等问题给浙江省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今年秋季以来，浙江农民在浙东、浙西、浙中等处自然的发生多次减租斗争，然因领导的人物多是党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中途变节，所以没有能完全胜利，实在可惜。目前浙江农民因生活的困难，仍在继续不断的斗争中，同时又届缴纳租、钱粮及还债的时候，农民又有起来抗租、抗粮、抗债的趋势，在政治上则所谓“北伐”战争和“讨唐[1]”战争均在日益扩展混战中，浙江的地位虽不像两湖那样动摇，然而反动的统治仍然极不稳定，内部冲突实无法解决，更给我们在浙江（江苏另有决议）一个发动土地革命的机会。因此，浙江省委应马上准备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在浙江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尚未达到暴动夺取整个政权的时候，因此，此次暴动的主要意义在提高工农群众对于土地政权的意识，广大的发展土地革命的潮流，暴动的区域为：以□□□等处为中心的各个区域。暴动的口号应该是抗税抗捐抗粮，不缴租，不还债，杀豪绅官吏，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武装工农，打倒国民党，推翻军阀统治，建设工农兵的苏维埃，乡村中一切政权归农民委员会等。暴动一开始就要坚决的实行这些口号，夺取武装占据县城，在暴动区域要坚决肃清一切反动势力，毫不顾惜的施行红色恐怖。暴动的主力要建筑在农民群众的身上，

切忌走入军事投机的陷坑中。在暴动之先，尤应注意政治的鼓动和宣传，以发动群众的工作，特别要根据中央对宁汉战争的宣言和党报，全党动员立刻做一个广大的普遍的宣传和鼓动，如此才能发动工农的暴动情绪。浙江省委应马上派人去到几个暴动区域详细考察一番，然后做一计划，于两礼拜内派负责人送来中央批核。

（二）浙江农民对农民协会既不大信仰，则可用“农民委员会”的名义叫出“一切政权归农民委员会”的口号，农民委员会应由农民自己选举代表组织（当然我们的同志可以被选），党派去的人做秘书即可。土匪流氓的工作，亦应该是整个农民运动之一部分，我们切不可整个的收编土匪或委任几个土匪的领袖，干军阀的老把戏，我们要使他们在农民组织和农民暴动的影响之下，促成其分化和崩溃其个人的系统而成为土地革命之副力。对杂色军队的策略，是在未暴动之先可利用他们的中立，但暴动一经发动必须要立刻解决他们，丝毫不该犹豫，犹豫必反遭他们所解决。

（三）在农民暴动中绝对不许忽略城市的工人斗争，在根本上我们必须在城市上站得住，农民暴动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何况浙江工运过去完全在我党许多工运同志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阶级意识已经陷于麻木的状态，浙江的省委应坚决从机会主义下解放工人阶级的意识，领导他们作经济政治的斗争。现在浙江工人运动的策略为：1. 应立即退出反动的总工会，并且要更进一步的打倒反动派的总工会，组织我们的秘密工会。2. 实行并扩大经济斗争，提高工人斗争的情绪。3. 提出“工人自己选举工会”、“反对派人组织工会”的口号，以增加群众对反动工会的认识。4. 在工人群众中努力做政治的宣传，做暴露国民党罪恶的宣传，并指明工人之出路，是要实行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统治，自己拿到政权管理生产，然后工人

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5. 工人运动应特别注意几个重要的地方，集中工作力量在这几个重要的地方。

（四）浙江的党部从省委以至各级干部和工农中党的负责人，大多数走入极坏的机会主义的路中，当此发动工农斗争的时际，尤应坚决的从组织上改造党，其办法如下：1. 实行清党，将不好的分子洗刷出去；2. 改组省委以下各级党部和党团，负责人倾向不好的取消其领导的地位，坚决的提拔新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工农分子，担任各级指导工作；3. 普及党的政策和主义的教育宣传于党员群众，从思想上积聚党员于党的路线上；4. 各级党部应采取巡视的办法，派人到下级党部去巡视，实际考察和指导该党的工作，下级党部亦可派人到上级党部讨论工作及出席上级党部会议旁听；5. 省委即行改组，名单中央指定。（名单略）

中　央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各地武装起义·浙江地区·文献》刊印。

注　释

〔1〕指唐生智。

PDG

中共中央关于对暴动计划的意见给北方局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中央看了你们的暴动计划后，有下面的意见：

（一）在你们的暴动计划中看不出群众的力量，你们对于群众的力量，既没有一个详细的估计，而对于如何发动群众，更看不出有什么准备。你们所定的暴动区域如南口、京东等处似乎没有可以暴动的广大群众，而只是一种军事区域，同时你们的暴动计划亦只是军事的。不仅如此，你们的计划中还看出两点很不好的倾向：第一，是你们不许暴动区域内整个的党和工农团体参加暴动，为的是怕失败后站不住；第二，你们预先指出失败，而只有军事的退步，如何能发动群众的暴动，只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而没有坚决的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工农群众的身上。近来有许多地方负责同志，对于工农暴动有一种错误的倾向——新的军事投机的倾向，这是很危险的。假使你们也犯着这个毛病，应立刻改正过来。因此中央要你们照上面的指示重新改正你们的暴动计划。此外，你们忽略了山东是一农民暴动区域，是很错误的。望照中央致山东的信办理。（已另抄一份给你们）

（二）你们暴动的口号还仅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反对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八期。

苛捐杂税”、“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暴动的旗帜还用“青天白日”，这是不对的。暴动的口号，对于土地应该是：“抗税抗租”、“耕者有其田”。无论他是否苛捐杂税，都应一律抗不缴纳；应该是“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无所谓大中小，皆一律没收。至于暴动的旗帜，国民党已为民众所唾弃了，早已是反动的工具了，中央亦有不要国民党的决议，暴动的旗帜应该是工农自己的红旗，国民党的名义应即取消。暴动后的政权绝不是人民代表会，而是在乡村“一切政权交农会”，在城市“一切政权交工农兵士和穷苦民众的代表会议——工农兵苏维埃”。望即更正。

北方局应根据上述两点，正确的改正你们的暴动计划。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冀晋绥地区、陕甘地区·文献》刊印。

PDG

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工作给山东省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山东省委：

丁××[1]同志来，中央得了他的报告后，对于山东的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在目前奉晋豫战争中，山东暂时虽尚未处于重要地位，然而山东年多以来，内面战乱不绝，反动统治异常不能稳定，同时，在张宗昌种种严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山东农民的革命斗争已日益发展，如鲁南之曹州、济宁及鲁北之阳谷、朝城、范县，农民群众先后发生暴动，至今尚在斗争中，可惜我党没有去领导。此外，鲁北农民现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饭吃，饥民遍野，在这些客观情况之下，中央认为山东省委应立即准备在鲁南、鲁西、鲁北举行农民暴动，以发动全鲁人民的土地革命，从抗税抗粮抗捐抗租，杀豪绅官吏，夺取武装，没收土地，一直发展到推翻整个的张宗昌统治，建设工农政权。暴动的主力要建筑在农民群众的身上，要绝对相信群众的力量，切不可以军队为主力或单纯的农军暴动，干成军事投机的把戏。我党当然要尽可能的积极工农武装以为暴动用，但暴动的主力绝对是农民群众自身的，所以在暴动前要在组织上、宣传鼓动上，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造成一种群众情绪跃跃欲试的状态。

山东省委应马上作一暴动计划，在此暴动计划中，对于暴动的区域，暴动的口号和旗帜，暴动的宣传（包括政治的宣传）和组织（包括人力的分配及怎样发展组织群众），以及自己和敌人武装和力量的估计，都应有详明的规定。计划作成后，一面马上照此计划派人到几个暴动区域去做准备工作，一方面派人将计划送中央批核。这个计划在两星期内送到中央。至于派下乡工作之同志，要尽可能的选择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就是非同志的工人亦可。

二、农民运动，你们特别注意鲁南、西、北是对的，但对鲁东不可忽略。据近日报载，鲁东亦有红枪会领导的抗租运动。我党应积极去领导这些运动。据丁同志说：山东农民尤其是鲁北、西、南，对于地主不甚仇视，但对土劣非常痛恨。其实，土劣即是地主之爪牙，与土劣的斗争即是间接对地主的斗争，我们应向农民详细解释：如果不根本消灭地主制度，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不根本从豪绅军阀手中夺取政权，农民仍然是没有饭吃的，仍然是要被剥削的，以引起他们进一步向前斗争。山东农民对农民协会很信任，而农民协会又是政权的组织；鲁北“饥民团”仅是一个临时的组织，不是一个政权的机关，所以山东应普遍宣传农民协会，叫出“一切权力属农民协会”的口号。提高农协的信仰；“饥民团”也应在农协影响之下来工作，使农民对饥民团有一样的信仰。据说你们决定要引导鲁北饥民团到济南及鲁东作求食及骚扰的工作。这是不对的。须知农民一离开了本地，其作用即非常之小；目前既然我们要在鲁北鲁西鲁南发展暴动，所有饥民当然不能调开本地，要使他们在本地暴动起来夺地主的米、麦、钱、财，解决饥荒问题。

我们对红枪会的工作，绝不收编他们，或仅接洽几个领袖，尤不是单独的运动，而是农民运动之一部分，最主要的是

我们要领导他们来实行土地革命，从斗争中夺取红枪会的群众，同时要引导红枪会的群众加入农民协会，做同化红枪会的工作。自然，机械的命令红枪会的群众加入农协是难能的，主要的办法要使我们党的和农协的政治宣传影响深入枪会群众，使他们认识农协，同时在每个斗争中提出共同奋斗的政纲，在此共同奋斗的政纲之下，使他们去到农协的旗帜和口号之下来加入农协。

历来中国对土匪的策略，只有一个孙中山收买委任土匪领袖的传统策略，这个策略直到贺叶[2]军南征都没有改变，事实上这是军阀的老办法，于革命是没有益处的。这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土匪运动，我们很坚决的要做土匪运动，但我们的土匪运动，应该是一反孙中山的传统策略：第一，我们不应将土匪运动看作一种单独军事运动，而把他看作农民运动之一部分，要引导土匪参加土地革命，作为土地革命之副力，我们知道他们的问题也只有在土地革命之后才能解决。第二，我们对于土匪尤应作分化或崩溃其个人系统的工作，最好的方法是将他们组织在农协的指导之下，使之农会化。历史上的委任领袖整个收编的办法，是不适合于现在革命的需要的。整个的收编土匪，把他们看作一种军事运动，利用之为革命斗争的主力，只是一种新的军事机会主义，我们应坚决的肃清这种倾向。

三、工人运动要在下面两个方针之下进行：（一）要提高工会的权威，要使工会成为真正群众的组织，工会领导机关由工人自己选举，如此工人群众对工会才有信仰，工会才能引导工人斗争，因此党派到工会的人只作秘书亦可。（二）目前山东工运应尽量发展经济斗争，由经济斗争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再进到政治斗争，进到暴动。（三）在每次斗争中立刻取消旧的机会主义的领袖，提出新的积极分子来作领袖，我们亦应在斗争中吸收积极的分子入党。

四、组织方面，中央亦有以下的意见：（一）过去的党，上而中央下而至支部，普遍的机会主义化。八七会议后，中央虽已纠正过来，而各级党部仍多未改，因此各级党部应遵照中央新的策略和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央通信第二号）实行改组。现山东省委虽已改组，各县、市支部尚未实行，应即进行此工作，尽量洗去旧的机会主义的分子，吸收新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工农分子。一句话，根本要将过去机会主义非工农的党变为真正领导工农斗争的党，工农团体亦照此实行改组。（二）各级党部应采取巡视的办法，派人到下级党部去实地考察指导该地工作。下级党部亦可定期派人到上级党部讨论工作并参加上级党部会议旁听。（三）过去在山东工作有经验的同志，应尽量留在山东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不可派到外省。（下略）

中　央

十月二十八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山东地区、河南地区·文献》刊印。

注　释

〔1〕指丁君羊。

〔2〕指贺龙、叶挺。

PDG

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

一、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与两湖广东的农民暴动

蒋介石四月十二上海屠杀之后，继以武汉汪精卫政府的逐步反动，一直到七月十五日的排共，在此之后，革命的分化已经完成：豪绅资产阶级已经完完全全立到反革命的地位；此后的情形是——一方面工农贫民（兵士）的革命营垒，别方面买办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营垒。虽然买办军阀资产阶级的内部还有许多冲突，虽然所谓国民党的政治是代表各地豪绅资产阶级的，他们会利用工农抵制一下帝国主义或买办的权势，然而根本上说起来，这些豪绅资产阶级不过是想排斥纯买办的北洋军阀，夺取他们手中的政权（卖国权），他们的国民党招牌和种种假民众团体（如改组工会、工会统一会、农民协会等）的运动，不过是反共的工具，压迫真正工农的革命斗争的工具，所以北方军阀及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同样是反革命的统治。这是武汉背叛革命后很明显的情形。所以现在对于南京政府与冯阎[1]等所谓一致北伐，我们很确定的明了的规定出上述的口号，我们认这种北伐是纯粹军阀的战争，没有丝毫革命意义的战争，是反革命的各派势力之间的混战，我们应当号召工农民众起来武装暴动，实行民众反军阀的战争。工农贫民武装暴动的新政策，实在是武汉反动后我们立刻便决定的。

但是，以前呢？在武汉反动以前革命营垒的分化还没有现在这样清楚。自从今年一月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之后，革命营垒中已经开始的分化（三月二十），便分外急剧起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很猛烈的行向土地革命——彻底肃清封建式的统治与剥削的革命。那时两湖，尤其是湖南的农民已经自己动手没收地主的土地，镇压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变成第二政府。城市中工人手工业者店员等的革命组织——总工会，也奋起行使自己的革命独裁（逮捕反动派罚款等等）。上海的无产阶级更能立接武装暴动，建立真正民权的市民代表会议政府。这一阶段之中，国民党内当时的左派——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便开始摇动了。那时正是两个主要力量在革命营垒之中从隐藏的局部的斗争，进于公开的整个的剧烈斗争的时候。这两个主要力量便是：一、工农贫民的革命力量；二、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力量。当时的局势还在胜负未分之际，那小资产阶级徘徊于两大力量之间。如果国民党要能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那么，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如汪精卫等，便应当站到工农方面来。无产阶级的政党更应当坚决的领导已经自己起来斗争的工农民众积极的进攻，既然推翻吴佩孚、赵恒惕式的军阀豪绅政权，便应当急转直下的进而剥夺唐生智、谭延闿式的军阀豪绅的政权。当时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应当从各派军力的结合转变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结合。事实上呢？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尤其是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犹豫摇动得很久，他们虽与蒋介石破裂，但是蒋介石勾结江浙资产阶级猛烈而坚决的向上海工人进攻，居然能暂时战胜工农民众的力量，而吸收当地小资产阶级在他的影响之下；这种情形，一方面使武汉小资产阶级领袖害怕，别方面使潜伏在武汉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之内的豪绅资产阶级代表欣羡（对于李济深也是如此）。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是全国农民的先锋，土地革命的进展，其势力不得不侵

犯到小地主以及城市的中产阶级——中国城市商人往往有几十亩田的；同时工人店员的斗争是直接摇动中国商业资本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制度。因此种种，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等）动摇犹豫的结果，是抛弃工农民众而加入反革命营垒。汪精卫等的转入反革命，和上海小资产阶级商人始终赞成蒋介石的过程是差不多的。当这四个月（今年四月至七月）的过程里，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机关，没有能坚决的自动的实行进攻的政策，反而随着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动摇而动摇，没有发展土地革命，没有发展工农贫民已在实行的民权独裁（帝国主义报纸及国民党中央异口同声所称谓武汉之下的第二政府之总工会、农民协会），反而只想叫民众让步以保存联合战线。

这四个月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之中，我们指导机关的政策，确实是机会主义的。这过程时期里客观情形是：东南两广已完全在豪绅资产阶级之手，两湖江西却仍在工农贫民与豪绅资产阶级相斗争的局势中，要消灭歼除东南两广蒋介石、李济深的政权，要使武汉真正成为革命的中心，以为扑灭东南两广反动的主力，当然首先便要使武汉之内的工农贫民能战胜武汉政府之内的豪绅资产阶级，而实现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但是当时我们的政策却是抑制工农运动以保持与左派领袖的联合战线；左派领袖又在与豪绅资产阶级（内有唐生智，外有蒋介石）妥协。这岂非机会主义吗？

武汉反动并非七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决议排共所开始的，从五月底湖南许克祥政变起，两湖江西的反动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工农贫民与豪绅资产阶级争革命的领导权，并且争夺政权，争夺土地和限制资本剥削的权力。这种斗争之中，工农贫民一失败于东南，再失败于武汉。工农贫民这种失败，尤其是在武汉，大半的原因可以说是机会主义。固然，客观的力量，豪绅资产阶级或许确实胜过工农民众，但是机会主义之下，革

命的领导机关不去创造工农民众的力量，反而是去减弱他们的力量；不去自己当主力向豪绅资产阶级进攻，使小资产阶级来赞助工农，反而抑制工农民众，使他们去适应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妥协政策。

如今呢？国民党中央已经在最右的西山会议派之手，一般蒋介石派汪精卫派，在政策上社会意义上，却在最右派的领导之下。“左派”领袖已经完全暴露自己的反革命性。就是一般国民党员也不能团结起来，反对反动的领袖。国民党的革命威信，在民众之中差不多已经完全消灭。民众所看见的是：滥发纸币库券，重征苛捐杂税的是国民党的政府，解散真正工农团体的是国民党的政府，屠杀工农民众的是国民党的政府，屈伏于帝国主义的也是国民党的政府！而国民党的一般党员都视为当然的。国民党已经完全被豪绅资产阶级的军阀所霸占。在此时期，武汉的资本家大大的进攻工人，悔弃旧日罢工条件，大批的开除工人；上海自从四月十二以来，每次罢工都被认为共产党捣乱，罢工工人惨遭逮捕虐杀，最近蒋介石下野之后，工人的经济斗争，虽然因为统治者自身之间冲突剧烈，而比较容易得到胜利，但是屡次受工统会的欺骗出卖。各地的农民自然更受土豪乡绅的残杀，尤其是两湖广东。于是工农的奋起斗争，便成为客观上必不能免的事实。而革命的胜利，也就只有工农武装暴动成功，建立工农民权独裁制，彻底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现在所谓国民党的政权）。

我们的任务便是领导工农贫民的斗争，扩大他们的力量。如今只有工农自己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是真正革命的主力，而客观上这种武装暴动，民众反对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已经开始。

湖北：八月底湖北南边通城县的农民便暴动起来，不久暴动发展到通山、崇阳两县。这些暴动的农民军，汇合临县、蒲

圻、咸宁的农民于九月九日袭击从武昌到长沙的火车，进攻咸宁县城，至今武汉政府的军队不能消灭这种暴动势力。通城、通山、崇阳的县政权在农民之手，蒲圻、咸宁的四乡也在农民之手。农民自己举出代表会议，成立县乡政权；他们组织并扩大农民军；他们歼灭土豪劣绅，他们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并且分配土地。九月二十鄂西的公安、石首、松滋、沙市等县农民也是如此起来暴动，占领公安县城，这种运动还要发展到全省呢。

湖南：九月初安源的工人武装队及农民取醴陵，同时浏阳、平江的农民也起来暴动，共同进攻长沙。九月十二三日的时候，长沙的反动政府已经非常恐慌。不过因为湖南这次的暴动，太偏重于军事的行动，没有引起农民极广泛的群众参加，所以暂时失败；但是现时湖南各县的农民正在骚动；他们之间亦须有一时的悲观失望，可是湖南一年多的斗争经验和客观环境，都使他们不能不准备着继续的爆发。

广东：广东农民是中国农民最早起来奋斗的，他们与民团已经血战多年，所以李济深公开反动之后（四月十四日），东江各县的农民立刻武装暴动反抗李济深，其他各地也有起落的斗争，四月至八月五个月之间，广东各县农民的苦斗是非常之困难的，东江各县曾经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但是到八月底，叶贺[2]的军队接近广东，农民又起来奋斗，海陆丰的农军占领县城（海丰城后被反动派夺去，然而四邻仍是农民的），梅县、兴宁、松口等处据报载也有农民暴动的兴起。广东南路高雷一带农民暴动占领许多县份，海南岛的农民军已经占领全岛，所剩只有港口一隅还在反动军队之手。全省农民仍在跃跃欲试。

其他如安徽的旌德，河南的彰德，江苏的崇明……农民暴动也正在兴起。北方直隶三河县的联庄会，山东河南、陕西、鄂北的红枪会等，都带着农民原始暴动的性质。尤其可注意的

是河南久年的红枪会运动，以前都在豪绅的领导之下，如今经过冯玉祥、靳云鹗的蹂躏，虽然红枪会的首领都想投机改编军队，而红枪会的群众却已经觉悟；他们反对愿受军阀改编的首领，他们知道只有自己拿着武器拿着政权是靠得住的，从前国民二军、奉军、吴佩孚、冯玉祥屡次的欺骗他们，他们觉悟了！

总之，从四月到十月，全中国差不多都在农民暴动的过程中。我们的政策，自从七月十三日宣告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之后，便决然的反对反革命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反对蒋介石、李济深一样。不久，我们便更进一步，抛弃以前的机会主义，决定坚固领导民众起来武装暴动，发展工农的革命斗争——这是今后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

以前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在于阻滞工农的直接斗争，而迁就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妥协反动政策。此后的政策，却是以工农贫民兵士群众为主力，领导他们起来，武装暴动。中国工农的革命斗争，是唯一能解放全中国于帝国主义和军阀之下的力量，因此，工农斗争的胜利，客观上是解放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到了相当时机，也许能从旁赞助工农的革命以推翻其共同的敌人，然而今后工农的斗争，只是联合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决不能再去迁就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成分之利益，而自己限制自己的革命斗争。同样对于一切雇佣军队也是如此；只有某一军队能完全接受土地革命及彻底的民众政权之政纲，方是革命的同道者，而且必须这种军队能放任他们的兵士参加革命的政治活动，使兵士自觉的参加革命战争，才是真正革命的武力；决不能因为迁就这些军队的恶习而减低自己的政治口号。

中央自八七会议之后，竭全力来指导组织农民暴动，主要的意义是：中国革命只有由无产阶级联合农民群众起来推翻封建军阀豪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统治；而革命的斗争方式，也

只有以工农群众的武装暴动为主力——夺取敌人武装，武装工农，吸引兵士土匪群众，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凡是以前利用军事领袖，或土匪（红枪会）首领的方法，都不免要使我们重陷于机会主义；同时即使组织农军暴动，如果仍是不信任群众，只信任组织好的武力，一切政策都以武力充分与否来决定，这也无异乎想在工农之外另靠一种武力，来代替工农革命（即使所靠的武力自己是农军，也是如此的；因为必须将武力与群众结合在一起，不可使武力单独的运用，仿佛革命可以自某一军队，农军也好，叶贺也好，打胜了政府军队，然后张贴布告，颁布土地法劳动法）。不幸，两湖广东的暴动中，我们的党部仍旧不免有些上述的毛病。例如：一、湖南省委暴动的计划，只注意借某某两团兵力来打长沙，不注意去发展全省的农民暴动，直到安源、醴陵的农军行动起来，尚且不领导农民自动手进行土地革命，而使所过诸地农民群众有客军过境之感。二、湖北西部张兆丰的部队原定要他帮助农民暴动，而当地的指导者只想着张兆丰应当联络樊钟秀倒方振武，以恢复实力，然后再可以打出政治口号（土地革命），因此，不顾农民自己已经提倒樊的口号，不注意农民群众的取得。三、鄂南农军劫车之后，农民已经集合两三万人，要扑蒲圻县城，但是当地指导者认为农民武装不够，不会打仗，竟命令退却。四、广东南海南路各处，虽然农民暴动起来了，东江海陆丰也已起来暴动，但西江各县，有五百枪，有二三百枪，竟不曾指导他们起来；各地农民始终存着等待叶贺军队的心理；西江的不起来，使黄绍竑得以从容集中来打叶贺。五、前敌（叶贺军队中的）指导者所定的土地革命政纲，竟只说没收二百亩以上之地主的土地。凡此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余波和遗毒。

二、叶贺入粤后的失败

南昌八月一日叶贺军队起义，反抗武汉的反革命政府，这一武装斗争的革命意义，便是这些军队能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上为民众作战。叶贺军队实在只是民众的革命战争中的一支队，他比起湖北、湖南的农民暴动军来，不过是较有正式军队的编制训练以及整齐的新式的武器罢了。

革命的新政策之下，工农民众自己的武装暴动应当是主力军，而叶贺军队只是赞助这种暴动的副力，中国共产党最近两次告民众书上指得非常明白的。

自然，叶贺军队的力量，较之普通零碎的农民军，要强得多，这民众暴动的副力可以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叶贺军队的本身仍旧是旧式的雇佣军队，不加入工农分子使之改组，是不能担负革命任务到底的。

所以武装暴动政策之下：一方面发展两湖广东的农民暴动，立刻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歼灭土豪劣绅，建立各地农民工人贫民的政权，组织工农革命军；别方面叶贺军队打进广东去，与农民军汇合，同时改造成工农革命军，从东江海陆丰直接打进广州夺取广东的政权，由各地从事革命斗争的工农团体选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在广东恢复革命的根据地。两湖以及其他各地的工农暴动仍旧要自动的起来，一直发展到全国范围。只有如此，才能推翻各省的新旧军阀统治，实现土地革命，完成全国革命。如果认为叶贺军队占据广东，再出来实行北伐，中国革命便全靠这一叶贺的新北伐，那便是很错误的思想。固然，叶贺如果现在已占领广东，已经在广东彻底实现革命的政纲（耕地农有等等），那么当然要扩大革命军队，而与广东以外的反革命势力搏战，实行真正革命的北伐。但是单靠

这种军事行动来革命，在广东以外采取等待政策，甚至于为军事行动便利起见，想和张发奎妥协——那就仍旧回复到以前的机会主义。

如今说一说叶贺失败的大概情形（我们只能从报纸上及零星的报告上知道的大概情形）。

叶贺南昌起义之后，不曾采取猛攻吉安、赣州的战略，以歼灭朱培德、钱大钧的反动势力，直入广东，而迂回绕道抚州及闽赣边境，沿途避免战斗，这已经是失着。事实上，叶贺走过瑞金会昌的地方，仍旧遇见战斗——钱大钧的军队，这一战役虽然是叶贺胜了，但是损失很多。叶贺既到广东境内，只顾直下潮汕，却没防备敌人的奸计：敌人也不来迎面堵击，却故意使叶贺孤军深入潮汕，他们从容集中，四面包围。等叶贺到了潮汕，则潮汕以北以西的地方，敌人已经团团围住。再则广东农民暴动的指导，也偏重于等待叶贺军队到达，西江方面不曾积极引起暴动。黄绍竑的军队得以从容开调到东江。于是叶贺入汕之后，立刻受着背面的围攻，而致于失败，失败后的正确的详情虽然不能知道，但是据所得消息，则叶挺有两团被敌军隔断在福建边境，其余的在汤坑、留隍、潮安被围击而有所损失。这一部要冲入海陆丰与农民结合。现在还不知四面包围之中能否战胜而保存大部的实力。照现在这种情形，已经不能实现立刻以大军夺取广东政权的计划。现实的政策，应当是叶贺所剩军队沿途扑击各县豪绅的政权，帮助当地的农民组织农民军队，给他们以武器，使他们自己起来实行土地革命；这种沿途帮助农民暴动发展的政策，可以使广东农民得着一个推动力，自己起来斗争，从各地汇合起来。

*　　　*　　　*

总之，现在的政局是：北方有冯阎奉张[3]的军阀战争，南方有叶贺攻袭李济深、张发奎的革命战争。军阀战争固然还要

日益发展起来，加重对于民众的剥削。叶贺固然失败，但是，一则叶贺的军力不是立刻便能完全消灭的，他们还是广东农民暴动的一个很大的推动力，二则即使叶贺完全失败以至消灭，亦不过是军事上的失败。全国各省反动的新旧军阀统治不能巩固，他们内部的冲突战争兼并吞噬，正在促进这种统治的崩溃。同时全国的工人处于极端的压迫之下，一般贫民受着苛捐杂税、纸币库券物价高涨、金融紊乱的压榨，尤其是农民所受的压迫剥削残杀更是达到极点。他们必然要起来反抗，广东两湖的农民已经在暴动之中。这种民众的革命战争还只是开始，他们始终是要更大的爆发起来，在革命的、非机会主义的坚决的指导之下，战胜一切反动势力。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七——一九三三）》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
〔2〕指叶挺、贺龙。
〔3〕指张作霖。

PDG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

——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

一、现在的政局，已经是全国的军阀大混战：北方阎锡山、冯玉祥、张作霖、张宗昌的战争，南京政府参加津浦线上的战争，南京和武汉又已开始战争，广东也派范石生、方鼎英、许克祥等与唐生智开战，广东内部李济深与张发奎之间又酝酿着战争。其他各省，如福建等，内部还有许多小战争和冲突——总之，可以说实实在在的全国军阀混战的局面。这种混战，无论他的名义是甚么，北伐也好，讨伐党贼也好，实际上都只是反映买办豪绅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各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反革命的军阀的战争。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完全变成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党，他的内部仍旧是不能一致，仍旧是互相冲突；国民党的各派，所谓西山派、蒋介石派、汪精卫派、唐生智派等等，都只是各系新军阀的代表，他们之间互争甚么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威信或者第四次执监会议的正统，都只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实际上只是各系军阀争夺地盘的招牌而已。军阀之间的这种混战，国民党内的这种纷争，证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

二、中国革命因为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暂时胜利，而受着很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九期。

大的挫折。今年四月间蒋介石、李济深的东南反动，摧残上海广东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势力。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的政变起直到七月十五武汉的排共会议止，完成这种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胜利于两湖江西。最近九十月间两湖暴动的挫折及八一革命的叶贺[1]暴动军失败于潮汕，使全国反动势力庆祝自己反革命的“最终”胜利。但是反动政权的不能统一不能稳定，立刻在他们自己之间的纷争和战争之中表现出来。中国革命虽然受着三次的摧残，但是反革命的势力并不能完全将他消灭，这是很显然的事实。

三、广东、湖南、湖北的农民暴动没有能胜利，并非农民群众的力量已经爆发而被反革命的强力的力量所扑灭，乃是我党当地指导机关，中着很深的机会主义的余毒，不曾去发动群众，大半变成军事投机而致于失败（参看上次中央政治报告及关于叶贺失败的通告）。现在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下，国民党军阀屠杀压迫民众的局面之下，广东、湖北、湖南、江西、江浙、山东、北方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仍然急遽的革命化，工农的经济状况因战争及经济恐慌而愈加困苦。只要看广州工人在叶贺已失败之后（十月十四日），仍旧群众的起来示威，□夺取工贼的工会机关，苏州工人群众反对总商会及厂主而示威游行，逮捕总商会会长及商团团长，上海工人群众起来捣毁工统会的各区机关；广东琼崖高雷的农民暴动仍旧占领着许多县城，海陆丰的乡村中仍是农军的势力，湖北、湖南的农民暴动势力仍旧存在着，江浙的抗租运动日益爆发，江北的农民都有武器，时时有反抗的趋势，河南、陕西的红枪会、天门会群众往往夺得到乡村中甚至县城中的政权；最近山东阳谷、范县一带亦有农民暴动，鲁北饥民更将普遍骚动起来。工农民众的革命力量，在这军阀混战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不能稳定的局面之下，客观上有一触即发，起来推翻一切豪绅军阀政权的趋势。

四、我党的职任，便是指示工农群众以正确的革命的路线：

（1）工农贫民兵士群众武装暴动，反对国民党及军阀的祸国殃民的战争，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中央辛亥革命纪念告民众书、最近中央反对军阀战争宣言已经指示得很明白）。如果在这种军阀混战中，要说民众应当赞助国民党北伐，或者赞助南京讨伐党贼唐生智，或者说武汉政治分会较好，要赞助他反南京，或者勾结张发奎倒李济深……这种策略便是卖阶级卖革命的策略。民众在这种军阀战争中不应当想望某一方面胜利，而应当努力使交战的双方面都失败，这就是民众起来反对战争，一直到暴动推翻双方的军阀国民党政权。

（2）工农民众暴动，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暴动之中要完全以发动群众为主要的革命力量，要广大的民众自己起来，自己感觉到非夺取政权不可，要在暴动期中及暴动胜利之后立刻能组成当地工农代表会议，为革命的权力机关。如果早就存着“继承国民党正统”的心理，或者采取国民党的办法，例如随便派定几个军事领袖的人，委任各机关的官吏，便算夺取了政权——这便是非常错误的政策。同样，这种暴动之中用不着任何“中国革命委员会”等类似国民党式的大元帅府或国民政府的空名义，拿他来委任军长师长。这种悬空的“中央政府”的名义，只足以勾结土匪首领杂色军队的小军阀，使土匪及兵士群众认为自己的参加暴动，完全是为着首领或长官受着了高高在上的某政府的委任，而不是参加工农群众的暴动。总之，暴动的权力机关，应当是革命群众自己的机关：暴动之前，由当地工农秘密团体组织临时革命委员会，指挥暴动；暴动之后，立刻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举出当地的革命政权（乡村中是某村农民委员会，县城中便是某县工农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会）。

（3）工农民众暴动的武力，应当从民众之中创造出来。当地的民众如果能够发动，他们群众的猛烈的搏击反动的政权机

关，他们之中虽然只有很少的武器，也必定能够夺得反动派的武装，广东历年来的农民斗争，上海最后两次的工人暴动，以及最近九十月间湖北的农民暴动，都有极显著的经验。如果，一说起暴动，便只想着军事行动，想某地有杂色军队几团，有土匪几股，可以勾结运动起事。这种对于“暴动”的国民党式的旧观念是机会主义的余毒。工农暴动的武力必须是群众中创造出来，即使联络土匪军队，也必须由工农民众和兵士群众的结合。应从民众的直接行动，夺取武装，编成工农革命军。

（4）工农民众的暴动必须实行群众的革命独裁制——这就是说必须无可顾惜歼灭一切豪绅，摧毁豪绅资产阶级的种种权力机关——政府官吏军事长官，都要无情的歼灭他们，不可以存着妥协观望的心理，尤其不可以借着“治安”、“秩序”的名义抑遏群众的这种革命行动；我党只应当领导群众，在这种风暴的革命行动中逐渐建立革命的权力机关，领导群众，使成为更有组织更有战略的行动。

（5）现时的暴动前途，农村之中比城市之中更加多些客观上的可能。土地革命的怒潮，将要在农民的群众暴动中发展开来。农村之中的农民自发的减租减税运动，必须领导到抗租抗税的直接斗争，杀戮征收人员，发展到杀戮一切豪绅，夺取武装；立刻便应指导这种斗争到群众自动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征发豪绅地主的财产——农民自动手实行耕者有其田，是现时暴动的主要内容。应当在一切日常琐屑的斗争中，使一般农民群众明了感觉到夺取政权土地的必要：“或者是农民有政权而得着土地，或者是豪绅（国民党）有政权而减租也减不成！”

（6）城市工人中的经济斗争亦是如此。虽然极小的劳资纠纷问题，如今在国民党的政权之下，解决起来总是工人受损失，或者受欺骗。我党在城市中的准备暴动工作，所以决不是单在于准备武器，练习战术等（这些事固然是万分必要的），

而主要的是在政治上准备工人群众以及贫民群众的革命认识，使广泛的群众感觉到：非自己起来取得政权不能得着解放，甚至于不能得到生活状况的丝毫改良。工人在这种经济斗争中必须建立秘密的广大群众的工会——阶级的工会；如果在通常的经济斗争中，尚且不能团结一般非党的群众，那么，城市中的暴动，便不能有群众的基础。总之，城市工人的斗争，现时应当集中全力于武装暴动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这种准备工作是不能和经济斗争分割开来的。

（7）这种暴动政策之下，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应当是非常坚决的：固然这于暴动没收地主大资本家的财产时，对于小商人，并不须没收，但是群众的斗争剧烈，切忌顾忌破坏“秩序安宁”，会失去小资产阶级同情的摇动态度。我们对于店东小资本家厉行彻底的劳动法，反对者便没收。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小贩，贫民……），应当吸引他们参加革命。

（8）关于这一总政策的宣传，应当避免过去机会主义的倾向，根据中央最近宣言的精神，号召群众自己起来，相信自己的力量，要求自己握得政权。这种宣传应当从党内开始，使个个党员懂得，个个党员能成为群众中的宣传者。

五、总之，我党现时的政策是号召工农民众反对军阀的战争，工农民众武装暴动推翻一切种种的统治军阀；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以发动群众，实行群众的革命独裁，创造群众的工农革命军，来实行暴动；从抗租抗税的斗争中领导农民自动手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杀戮豪绅，一直到暴动；从工人日常经济斗争中扩大阶级的工会组织，直接的群众行动反对资本家，一直到武装暴动。

六、客观的中国革命发展之阶段及群众的革命力量，不但确有这种武装暴动的可能，而且急迫的要求这种暴动。不过主观上，群众的革命力量没有能充分的团聚和发动，这是因为我

党党的力量薄弱，各地党部机会主义的余毒很深：如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只想着练几军的正式军队才是革命的力量，群众已经爆发而我党指导者临阵脱逃；有着强大的军队力量（如叶贺），不使之工农化，反而在政纲上策略上使之国民党化；有爆发的可能而不发动群众，只进行土匪首领的或农军的军事行动……（参看中央最近政治报告及关于贺叶失败的通告）。所以现在的形势之中，只有坚决的抛弃机会主义的思想，坚决的去发动群众，在各地尽可能的实行武装暴动。只有在这种积极的斗争中，能够团聚发动群众中的革命力量，也只有在这种积极的斗争中，能够改造我党。锻炼提拔出各级党部工农分子的干部，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

七、在这种总政策之下，中央已经决定各地应当实行领导工农民众起来暴动——广东的农民暴动应当积极领导群众起来，叶贺的残部已经编成工农革命军，还要与农民群众中的农军合组起来，受当地农民政权的指挥，实行土地革命，摧灭豪绅政权；广州的工人虽然又受李济深、张发奎的压迫，但是他们已经进到夺取政权的认识，应当领导他们准备暴动起来。两湖的农民也应当发动起来，尽所有的武装力量继续奋起，同时一般农民群众起来解决当地驻军，推翻唐生智等的政权。江浙的农民与工人也要领导起来暴动，以推翻南京政府为目的，至少是扩大土地革命的潮流于农民群众之中，摇动南京政府的政权。张作霖与冯阎之下的工农民众也是如此，尤其是山东——那里的农民群众部分的已经起来。这种暴动政策之下，完全要靠发动群众的广大与否，来决定暴动胜利的程度：各地自动的尽可能的发动，至少可以使国民党军阀的政权不能达到乡村之中，不能收着丝毫税捐饷粮草谷车船，至少可以使一般地主不能收着丝毫租钱租米债息，不能自由运输军队饷械，不能任意压迫剥削工人；或者发动范围能够扩大，联合好几县而成立某

省临时革命政府……或夺得着省城，根本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如此汇合而成全国，或某几省的暴动军联合的局面。

八、各地党部必须坚决的执行这一政策，各在当地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如果：（1）存着互相等待的等待政策，心上想着别的地方应当先动，应当占领如何广大的区域，然后本地方能发动，或者，为要便利发动起见，虚张声势说某地某军（如以前说东征，最近说叶贺）已经革命成功，因而使本地群众不信任自己的力量，而有依赖别地方或军队势力的心理；或者（2）预先有着恐惧失败的心理，因而认为不可“轻举盲动”，少些斗争，多“保存着”党的组织；如果有这两种心理，那就又是机会主义毒发作，势必至于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应当知道只有各地自己努力的发动群众，方能造成汇合而为全国总暴动的局面；只有积极的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能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在斗争中扫除机会主义的分子，提出新的革命的工农的新的干部。各地党部（湖南、北方、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的特殊工作，中央已经有信去指导，都应当赶紧积极的计划，定出更具体的工作步骤，来实行这一总政策，宣传这一总政策。尤其要注意的是：派遣工作同志到农村中去发动暴动及农民斗争的时候，必须注意选择工人同志去（智识分子则必须确实坚决革命没有机会主义的倾向的）；否则每每智识同志，因为本身或戚属是小地主绅士，而自己根本妥协犹豫，以至出卖农民的革命。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中共北方局关于北方政局及党的任务的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一）南方革命失败后，北方旧军阀也如南方新军阀一样，愈益入于混战状况。此次奉晋之战，第一证明张、阎[1]、冯三派军阀绝对不能统一北方，也不能消灭其对手之一方，结果，军阀混战将永远继续——除非工农革命胜利；第二经过此次大战后，北方农民将愈益土匪化，暴动，因为他们不仅在混战中破坏了乡村经济，加重了负担，而战后军阀政府（无论战胜者与战败者）对于他们的掠夺将更严重，革命化以外没有出路。

（二）军阀混战之继续不停，便是军阀统治之不能稳定，这乃是军阀制度必然崩溃的过程。这个反面便是证明工农革命势力，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北方局初来直隶之时，便向各级党部宣布北方也如南方一样，已直接到了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应准备工农势力为北方政局变动之主力。一扫前此利用军阀，与希望冯玉祥或北伐军北来转变北方政局之机会主义。

（三）此次战争爆发之初，北局即决定准备北方整个的土地革命大暴动，在第五号通告中，不仅指明此暴动之性质与目的，尤其指明于暴动前之准备工作，即工农利益日常的部分的斗争工作，只有这些工作纷纷的有组织的发展起来，大暴动才能成熟与胜利。

（四）迄到现今，这些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呢？可说还非常之弱，各处地方大都正在准备。另一方面，奉晋的军阀虽然皆在危机之中，但其程度还未到极点，而奉方地位且较初战时为优，所以现在决不是整个大暴动爆发时期。因此本党目前任务不是立即大暴动，而是继续准备大暴动，复兴工人运动，发展农民运动，同时领导各地农民的小暴动。使之发展向我们的路线和大暴动的计划上来。

（五）铁路矿山纱厂及城市四种工人是北方工人运动的主力，各铁路之未发欠薪者（如津浦）应立即要求发欠薪，其已发清者（如京绥、京奉）应立即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应激烈的反对监工反对裁员，唐山矿工应立即反对包工制，反对借资生息，要求每星期发薪一次，要求增资减时。山东矿工目前尤应要求保障生命危险和抚恤淹死工人之家属，抚顺、本溪湖各处应特别要求改良待遇，反抗日人之虐杀。山西阳泉为矿工最多之地，山西党部必须特别注意。天津、青岛、唐山等处的纱厂工人，应立即反对停工，要求改良饭食宿舍，反抗打骂虐待。这些斗争必须在各地切实鼓动与组织起来，开始口号不必过高，必须首先获得几个小胜利，去兴奋群众斗争的情趣。这是复兴北方工人运动的最要紧的关头。

（六）反抗一切战争的负担，抗租抗税，肃清土劣地主民团在乡村的势力，普遍组织与发展农会在乡村中的最高权，同时，深入没收土地及农工兵革命政权的鼓动，这是目前农运一般的方针。山东农运占很重要的地位，山东党部必须充分注意此项工作，已有三千多农民同志应使之为农会组织人，切实领导此最贫苦的广大群众去斗争，就是对于广大的移民运动也须注意。山西与东三省现应立即发动农民反抗一切战事的担负，坚决拒绝纳租纳税反对征兵。热河、京东应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不纳租与地主”、“不缴一文与官厅”的口号。同时应

积极领导小暴动，和土匪群众向大暴动方面发展。

（七）京东特委目前主要任务，一面是领导与发展小暴动，一面是巩固与发展各县农会组织势力和农军，不容情的彻底的肃清地主民团警察的一切势力，确立农会在乡村中的最高权。关于小暴动应充分注意下列四事：一、应选择适应的时机，既不应失时，也不应盲动，总要知己知彼，计划利害；二、要明了小暴动的目的在发展组织雄厚并集中自己的势力，绝对不可离开“群众”和“组织”的观念，去干那英雄冒险的把戏，尤要尽可能避免自己势力之巨大的损失；三、对于阎、冯别动队绝对不应存幻想，尤其不要被其利用，我们只有利用他们与奉军相持的机会，去尽情的打倒乡村中土劣地主民团的势力，发展农会农军的势力，可能时我们应去夺取这些别动队的武装，与对于奉军之夺去没有不同；四、势力未充分时，不要轻易进攻驻有重兵之城市，但一经进攻之城市，首先夺取一切应得之物（如枪械、钱财、敌人等）可守则守之，不能守时也应凭城作战节节抵抗，切不可自溃自散。

玉田县委及特委同志，于旬日内犯了两次重大的错误：第一次是自溃自散，第二次是离开组织与群众去干那英雄式的冒险尝试，这样错误，以后绝对不许再演。

（八）在工农群众中应同时宣传阎冯反工农的罪恶，打破一切幻想。此次奉军退出张家口时，该地同志立即恢复总工会工作是很对的，但同时又欢迎晋军，这是很大的错误，全未知道我党的新政策，仍然继续过去机会主义的表现。

（九）西北特别委员会目前主要的任务，在发展广大的没收土地的农民运动和农军的势力，以及发展党与团的组织，在最近期间农会应发展到二十万以上，农军四五万以上，党员二方以上。京东亦然。同时西北特委应尽可能的使土匪群众隶属于农会指导之下，成为保卫农会发展和没收土地之武力。其不

能由农会改编，企图与军阀勾结之领袖，应随时解决之。土匪群众可加入农会为会员，过去之几千农工兵大同盟会员皆应使之成为农会之组织者，现在应尽可能的指导夺取武装的工作，奉军疲弱的时候，可相机暴动。晋军不能掌绥远的时候，也应夺取晋军的武器，占领绥远。

（十）对于土匪工作的态度是：尽可能的获得土匪群众之领导权，使之脱离不忠实之首领，隶属于农会之中而改编之。农会是主力，土匪是助力。改编时应加以正式军事教育和土地革命的政治教育。

（十一）唐山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提出矿工最低要求去组织他们，发展党和工会秘密小组，很好的准备罢工斗争，此处罢工须有充分的小心的准备，因为此地是帝国主义与军阀最戒备的地方。

（十二）山西现在是农运的最好时机，我们党部必须积极的普遍的发动与组织乡村的阶级争斗，严厉的打倒地主土劣的势力，解除民团武装，成立并发展农军的组织，确立农会在乡村中的最高权，推翻阎氏在乡村中的统治——所谓村长治，抗租抗税，以至耕者有其田，这种工作做得好，发展得好，便可由此领导起山西暴动。

（十三）满蒙交涉仍在进行，张作霖在这个战争危机中，完成出卖满蒙于帝国主义是毫无疑义的，这亦是现在鼓动群众工作之一。此工作在东三省尤特别重要，东三省应使此运动发展起来，激烈起来，使之与反抗战争的抗租抗税的农民运动相衔接。

（十四）山东在最近期中，须充分准备恢复铁路矿工纱厂的工作，至相当程度，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会组织，领导土匪群众和各地小暴动向我们的道路走。抗租抗税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工作是山东能否暴动之前提。

（十五）关于口号与国民党政策，中央现在已有所改变，前此所谓仍然要国民党招牌的政策，现在已决绝的抛弃了。前此之民选革命政府（北方局通告第五号，誊写人误写人民革命政府）口号，现在改为“农工兵平民政府”，革命委员会即名“工农革命委员会”，工农军总名为“工农革命军”，各处皆须照此更正。

（十六）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与斗争之下，职工运动仍然是极秘密的，工会机关之设立与工会小组之发展，皆应注意秘密工作的技术。工会宣传品除工人群众外，现在无关所谓城市市民公开之必要，这次北京总工会与铁总机关之严重破坏，便是因为宣传在城市中太公开以及秘密工作未做好的结果。

（十七）在此严重状况之下，党的秘密工作和组织非常之重要。在此严重状况之下，党内生活不能容许极端“民主化”。北局来此之后，将北方过去流行的机械的纪律铲除，同时北京几个少数知识分子便发生极端民主化和不守纪律的恶倾向，这便是此次北京市委被破坏的主因。北局现在严重警告各级党部同志，以后如有上项倾向的同志胡闹时，决不宽容的执行纪律。

（十八）铁总北来后最好的成绩是京绥路工作之恢复，可是这次忽遭破坏。铁总目前任务不仅是恢复铁总工作，尤其要充分注意京奉、津浦二路工作，迅速的恢复起来。东三省铁路工作异常重要，铁总即须指派一特派员前去负指导工作之责。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冀晋绥地区、陕甘地区·文献》刊印。

注　释

〔1〕指阎锡山。

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农民暴动和改组党组织给陕西省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陕西省委：

久未得你们的报告，不知你们的工作情形如何，挂念实深。近陈家珍同志来，作了一书面报告，然内容毫无，只能说是一点很零碎的消息。惟从这些零碎的消息中，中央亦可提出数点希望你们注意：

一、陕西民众素来非常痛苦，加以最近冯玉祥在陕大派其捐，更增加了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痛苦。农民之要求从地主封建军阀豪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是无可疑义的。可惜过去因为党的机会主义，没有去发动和领导农民斗争，所以过去农村中的阶级冲突尚不十分明显而剧烈。目前你们应马上注意到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从抗捐、抗税、抗租、抗粮的口号之下，引导农民群众发展到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大杀豪绅地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一切乡村政权交农民协会，一直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拿到政权。对重要城市的手工业工人，亦应注意领导其斗争。

二、过去我们的党从中央一直到支部整个的机会主义化，实在不能担负中国目前的重大任务。因此改造各级（即支部也应改组）党部是全国党部的重要工作。陕西省委应特别注意此工作，立即开始实行改组各级党部。对于工作不积极，观点不

正确的人，要坚决的取消其领导地位，甚至清洗出党，提拔在斗争中表现得积极的分子——特别是贫农分子来参加党和群众中的领导工作。党的基础应建筑在工农的身上，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党成为斗争的党，才能担负目前土地革命的任务。同时省委应采取巡视的方法，派专人到下级党部去巡视，实地指导工作。

三、陕西同志多对于右任存有多少幻想，这自然还是过去机会主义的遗毒。实则于右任早已离开革命的阵线，早已为土地革命的高潮惊退，现在甚至在那里咒骂土地革命，我们对于这种分子，还有何幻想之可能！我们坚决的认为：谁能站在土地革命的浪涛中，谁便是革命的同志，陕西省委不但本身而且要向一般同志纠正对于的幻想，指出我们的出路不是在于右任身上找，而是去领导工农贫民实行暴动夺取政权中去找。

四、史可轩的队伍留在冯子明的部下是没有好的结果的，无论冯子明的态度如何，其结果必被冯玉祥或冯子明所解决，目前这部分队伍的出路是要在党的农民暴动政策之下来帮助发动发展土地革命，成为农民暴动之副力。如果这部分力量仅仅以很灰色的态度存在于冯子明部下，与普通军队丝毫没有差别，则又有何用处？望你们善用这部分力量。

五、中央特训令陕西省委于接此信后，马上作各种工作的详细的报告和工作计划，交来中央讨论，以便指示。如再延不交报告，中央则停止发给经费，请勿忽视！

十一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一、中央最近的策略及客观的革命形势

本年八月里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已经考察武汉七月反动之后中国的一般政治状况，断定那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稳定，在现时中国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那时指明：一般政治军事经济的大危机，因资产阶级军阀反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大大的扩大发展起来，这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实。中央曾经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受着两次巨大的失败：四月间沪粤的反动，七月间武汉的反动，然而中国革命决不会就此长期的消沉，所以中央认为这种悲观的观念是绝对不正确的。中央那时认为必须继续扩大深入革命的斗争，并且要坚决的采取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以后的政局，完全证明中央这种考察是正确的，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对的，固然南昌暴动及南征广东的革命军队失败于潮汕，固然广东两湖的农民暴动一处也没得确定的大规模的胜利，但是革命虽然又遇着了这几处部分的新失败，然而三个月来一般的斗争经验，更证明了本党的策略完全是对的。最近的一期，各地工农民众的斗争又重新猛烈的爆发，一般政治状况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经过了很严重的变更。

* 这个文件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十三期。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考察现时的新时机而决定适应这种客观时机的策略。

二、中国社会的总危机与农业经济

中国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虽然胜利，然而那些产生伟大的中国革命之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仍旧存着。沪粤武汉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解决那些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加使这些矛盾剧烈起来，增多起来，更加使这些矛盾的爆发急遽起来。这就是因为得着胜利的反动势力，竭力在那里巩固中国的旧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是陈旧腐朽落后野蛮的制度。于是这种情形的背景里，那一般的总危机便尽量的大大开展起来。这就必然要引起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尤其是农民的广大群众之革命斗争的高潮。

农民经济的衰落破败，一天天的更加带着天崩地陷的爆裂性质。今年（一九二七年）是相当的“丰年”（除直隶、山东两省已经完全被战祸天灾所破灭之外，其他各省的天时，照例应当使农业经济相当的改善，但是事实上差不多全国都因过去的灾荒与战祸，同样是成千累万的人饿死杀死，不过是比灾歉的直鲁略好些），可是这所谓“丰年”，不但没有阻止些农民经济的崩败，而且更加增进农民经济崩败的过程。因为“丰年”的结果，人民反而要多出些钱米租费给地主和政府（例如浙江今年借口丰年追缴历年欠赋），地主和重利盘剥者要追取农民的旧欠，买办和商人要抑低农产品的价钱，军阀更借口增加税捐至两倍三倍（江苏今年增收田漕的亩捐）。所以所谓“丰年”即使不比荒年更加使农民破产，至少也和荒年一样。地主的剥削农民，商人重利盘剥者的剥削农民，军阀的掠夺农民，豪绅官僚等等的压迫农民，现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弄得农民

不但不能恢复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于不能保存自己的性命。各省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已经被这些有产阶级剥削到不能一日忍受的地步，农业经济的“重复生产”，即使在极隘小的范围内也简直是不可能的了。除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直接剥削外，军阀还要掠夺农民，他们不但征发粮食牲口，并且要拉夫，再则因为战祸连年的关系，水利灌溉防旱防水的工作，都大受妨害，国家秩序混乱分崩，天灾日益频数（这些天灾亦大半由于中国社会制度而来的），还有财政金融的紊乱，使乡村中多量的出产品流入城市而不能得着相等的报酬，商业和市场的停滞纷扰，使农业经济上技术方面的准备也日益破毁，乡村中土匪蜂起等等——凡此种种，都使农业经济崩败衰落。农业经济的危机是一天天的增加，而有天崩地陷似的暴落的趋势，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工农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剧烈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三、工商业的危机

中国工商业及金融中的危机，尤其有明显的表演。中国革命客观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造成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一革命任务，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中就应当解决的。但是国民党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走近解决这一任务的一步，而且更加使这一任务的解决远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但增加中国的分裂离析，而且发生许多新的混战，各省之间有战争，每省之内也有战争，现在全中国都是混战。商业交通在各省之间固然是时常断绝，就是在一省之内也往往东阻西隔，各省都是紊乱的金融状况，原料机器燃料的运输减少了不少，有些地方简直断绝了。反革命的屡次政变之后，外国资本家的

竞争势力又增加了好几倍。再则中国农民的家庭工业、手艺等类的事业，更加破产停滞。国内国外的贸易都是日益衰落（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输入减少百分之五十）。外国资本利用银价的低落，财政的紊乱及国民党的屈服，更加在中国多量搜括金钱财货。全国的破产穷困，经济的衰落，都在一日千丈的堕落下去。几百万农民，几十万工人店员，都在失业，都从商业及一般生产过程之中排斥出来。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的反动，就是如此的“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四、帝国主义侵略之急进

资产阶级军阀的反革命，在国际关系上，便是完全降伏于外国资本主义，而增加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国帝国主义已经实际上夺回了汉口的英租界，而且完完全全统治了上海。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得着了绝大的胜利，满洲内蒙正在变成完全的日本殖民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收回租界的问题；关税自主的问题，他竟无耻的完全屈服。他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现时国民党的所谓“反帝国主义”宣传，一忽而反英，一忽而反日，都不过掩饰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种无耻的奴性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只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矛盾，而实在则替其中最强的当工具。从革命开始到现在，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统治力，从没有现在这样强大的。伟大的中国之被压迫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虽然以前一向是治者阶级向帝国主义做买卖的“投机事业”的对象，但是从没有像现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国民党）治下这样厉害的。

五、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

国内政策方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便是只能采取法西斯蒂主义及亚洲式的野蛮专制之凶恶手段。白色恐怖，穷凶极恶的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劳动民众；这种反革命政策，在国民党治下，达到了空前的野蛮程度。中国旧式的野蛮毒刑，对于革命党人的非刑拷打，还要加上建立黄色工会的把戏和警察包探所组织的工贼性的“工会”，渗入工人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日益增长，同时他自身之内的分化崩溃的过程却也在急转直下的前进。中国资产阶级，固然绝对没有能力实行反抗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反动的革命使命，而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最初期，便背叛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能力做稳定团结反动势力的动力。对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他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国家，或者就在资产阶级地主联合的基础上统一中国，都简直是他没有丝毫能力去实行的事。这是他历史上的运命。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地主的联盟，其结果是使中国更加分崩离析，使割据互争的局面更加纠纷，自然要造成继续不断循环不息的军阀混乱的屠杀战争，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各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一切建立巩固的国家政权之尝试，就算在一个小小省县的范围里罢，都是完完全全破产。无间断的屠杀混战及空前的贪婪淫佚腐化——便是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国家机关之致命伤。国民党曾经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今很快的腐化堕落，完完全全变成无主义无目的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狗窠，屠杀工农的刽子手的党，贪赃舞弊杀人凶犯投机奸商的官僚党，这事实很明显的反映着资产阶级反动的全部腐化崩败的景象。中国共

产党中央在八月间便预言：国民党要变成一个像样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党，尚且是不可能的事，这是很对的。本次会议完全赞同中央九月间关于取消组织左派国民党之计划及提出苏维埃口号之决议。本党认为国民党左派组织失败之经验，证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完全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本党不但要号召一切革命分子退出国民党，而且要努力揭发国民党的欺骗压迫民众的罪恶，要领导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

中国资产阶级是历史上的流产，甚至于连造成自己政党的能力都没有。他们不能造出一个有一定政纲的党，更不用说要他造出一个真有政治意识的政纲了。

六、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特别的作用，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完全没有稳定的可能。经过革命的三次失败，仿佛反动稳定是件可能的事。但是必须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及政治制度能够由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一些，同时，必须在现时国际国内之中，有渐进的，作算是非常迟缓痛苦的改变社会制度之可能，可是实际上现时在中国没有这些条件。中国没有这样一个阶级，能够负起责任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不过是夺取革命领导权、蒙蔽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领导权到手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刻便不得不将他转交给豪绅地主阶级，就是完成反革命势力的复辟，结果是反革命的领导权仍旧在豪绅地主阶级手里，而不在资产阶级手里。如汪精卫等类的政客，想“改良”土地关系（如应允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等），可是这种政策在几天之内便完全破产，单是这一例子便证明改良政策不过是公开的欺骗。再

则全世界客观的形势是革命的，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又在急进的施行，这种情形也就是使中国没有由改良主义得着外国资本家的帮助，而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要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使中国完全永久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二）帝国主义战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战胜苏联。此外中国不能由改良主义的方法去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革命虽然受着屡次很大的失败，而中国劳动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不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用尽，而且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

最近几月的经验，铁一般的证明这件事。中国伟大的革命已经唤起如此广大的工农苦力群众，他们都起来实行独立的政治斗争；民众激愤的革命力量，决非几个月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所能完全扑灭的。

所有这一些情形，都使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一观察，并不带着“革命在最短期间必定完全胜利”的幻想。中国的客观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一）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二）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

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继续不断的革命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总之，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七、革命的高涨与低落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无间断的性质，只要看最近各重要省份里农民暴动的高涨，就可以证明。九月间农民暴动普遍广东湖南。虽然这种互相隔绝的群众自发的暴动，遭着屡次失败，然而农民运动的爆发仍旧继续着，有些地方（如湖北）甚至于更加厉害起来。十月间农民暴动又在江苏、直隶、热河、山东开始了。同时几个主要的无产阶级区域，如上海、广州、武汉，经过一期退落情形之后，工人运动又带起比较猛烈的革命性质。农民运动的潮流，已经引起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爆发，不过暂时还比较的弱罢了。南京与武汉军阀争夺地盘的屠杀战争强盗战争开始之后，劳动平民更加受着痛苦，广大的工农群众更加愤激。虽然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非常之严重的压迫屠杀搜捕，然而群众的革命斗争，却正在刚经失败损伤的地方，陆续的继起。群众正在自己失败的经验上，学习革命的斗争。

固然，过分估量革命的高涨及群众的革命力量组织力量，因而认为可以有大范围内立刻的胜利，这是错误的；然而经过革命三次大败之后，在现今这种反动局面之下，群众的革命斗争终于重新爆发；如果对于这种情形估量太少，那就是不可救药不能轻恕的错误。

因为革命潮流的低落条件，至少是：（一）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二）改良主义的渐次实行；（三）革命群众之溃散与消沉。单是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散，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才使敌人惊惶失措而拼命的严厉镇压。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布尔塞维克的党，不去积极发动群众，领导革命潮流的发展，而以为自然革命高潮的到来，自会胜利，那也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八、现时的总策略

现时形势中之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便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中国共产党应当避免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的发动，那是会变成拼命的“孤注”的，然而党应当去领袖一切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发动。所以共产主义者应当做一切农民暴动的指导者。如果农民暴动的发动，事实上不能有多分准备起见而推迟，如果这种暴动事实上不能估量到较大范围内的胜利，那么，党应当使这种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不去占领县城或巨大的地域，长久的时期，不去费力建立大规模的军队等等，而以人数虽少却是团结巩固的暴动军，经常不断的袭击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这种游击战争，随后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固然，游击战争开始之后，攻袭城市，尤其是小县城，是农民群众常有的倾向，本党尤当领导这种斗争，使适合于战术上的目的，袭其不备，夺其武装，杀戮豪绅，摧毁其各种权力机关。但是，农民暴动之后，如果专意占据县城而忽略乡村中

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发动更多更广的群众，不使群众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权（苏维埃），那么，这便是军事的机会主义。

至于城市之中，则游击战争的策略，比较起来要难实行得多，所以往往在城市之中有不适宜采用这种策略的时候。要到城市之中已经最终决定举行暴动，巷战已经开始，那时，党才可以运用这种游击战争的策略。然而现在在一切工业区域，已经要建立工人的武装队自卫队，训练战术，利用他们在日常的反抗黄色工会的斗争之中；这已经是工业城市之中现时所不可迟缓的任务之一了。城市暴动的必须条件是：（一）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涨及革命情绪——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加紧与扩大，形成总的政治斗争；（二）治者阶级统治之动摇崩溃的形势；（三）一般市民（中层阶级）的慌乱犹豫摇动，对于治者阶级厌恶而反对，甚至于同情于治者阶级之颠覆；（四）工人阶级之革命力量之组织，技术上的准备。因此，党不但不应当在城市之中只注意到所谓军事工作之准备，而忽略各市以及各县工人手工工人店员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之指导与发动，而且应当更加加紧这种斗争；每一次极小的斗争之中，也要引导工人群众去了解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及与农民暴动联合推翻统治阶级之必要；这样，才是切实的在政治上准备城市之中暴动。关于工人暴动与农民暴动的联络关系，是党的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赞助，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但是，这种联络，只有经过党的组织与规定计划。群众的暴动，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要适合当地的环境与时机，既不能互相等待，亦不能在明明没有立即暴动的形势中，而以军事投机的方式做军事上的互相影响。

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

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再则，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下，可以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军事投机主义。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发动，固然是军事投机主义，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不以发动群众为根本政策，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而只相信军事的力量，只知道军事上的布置准备攻守进退的规划；因此，暴动之中只见军事的行动，并不充分发展群众斗争的根本工作。二是借口准备的不充分或者采取等待政策，而不发动当地的群众，甚至群众已经多数的起来暴动，尚且对于领导这种暴动仍旧是怠工或动摇犹豫；这种倾向的不信任群众力量，不发动群众的政策，甚至阻止群众自发的斗争，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丧失政治生命。党对于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应预先指出他们的危险性而努力扫除之。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众暴动的责任，固然是使他尽可能的有最大限度的组织性，但是，一切群众自发的斗争，即使是党所认为过早的，党也有起而领导之责任。

最后，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对于一般贫民苦力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应当尽力吸引他们参加工农的斗争；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恐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

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党不但要努力去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而且要去领导贫苦农民，领导起潜伏

待发的暴动，发动游击斗争；应当发动工人的阶级斗争，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领导他们汇合而成总暴动，获得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胜利。

九、苏维埃的口号与工农政纲

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党应当在文字口头的宣传上，对于最广泛的群众解释："为建立工农兵手工工人城市贫民代表会议政府，而实行革命斗争的必要"（"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但是，只有确实无疑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巨大高潮的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方才可以并且应当组织苏维埃，以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这所谓"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是说暴动在一定区域内已经有固守较长时间的可能；只要有这种可能，便应当建立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只要暴动真正是发动群众的，那么，暴动胜利时，这便是事实上不能不执行的任务。至于游击的农民暴动，还只有袭击移动的时候，当然，那组织暴动的当地革命委员会，继续以临时政权的性质为暴动之指导机关。总之各地农民暴动的发动，应当以当地农民的秘密团体（农民协会等）所推出的革命委员会来指导（城市暴动便是工会等推举的革命委员会），应当尽量发动群众，引进更多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实行自动手（"民众式"）的没收土地，杀戮豪绅、工贼，摧毁中国一切旧社会关系，实行游击式的战斗——解除敌人的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这种暴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而有固守的规划之可能，便应当建立苏维埃（农民代表会议）；如果已能占据城市一县或数县，以至于一省，工农暴动已经联合起来而获得胜

利，那便有建立苏维埃之必要。城市中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之建立，尤其要吸引广大的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群众；城市暴动一开始，甚至尚未开始之前，已经要有群众斗争组织的雏形，如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等，要积极领导这种群众斗争的组织，使成为革命的暴动的中心机关，实行革命暴动独裁的机关。暴动胜利一有巩固的可能，这类的群众组织便要变成苏维埃，而为革命的政权机关。暴动的胜利，只有在建立苏维埃的过程中，能使工农群众真正自己获得政权，而更加尽量的来发展革命巩固革命的胜利——所以苏维埃的组织既不能在胜利绝未巩固之时开始，因为这可以陷于忽略军事战斗而专事选举，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成见，因而减弱革命的独裁制以至党的领导权之危险；苏维埃的组织也更不能借口于军事尚未了结，基础尚未稳固，而延迟推宕，因为这便更加要增长暴动中的军事投机主义，这便将工农暴动完全变为军事行动，只去攻城夺地，只知道军事上的规划。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城市贫民应当包括工匠手工业者及一般非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

党应当在斗争的过程中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依各地的情形群众的信仰而定）。这种农民组织必须是贫苦农民群众（破产贫困之自耕农、佃农、雇农、失业农民）之阶级斗争的组织，且是暴动的组织（决不能视为类似工会的经济的组织）。然而党应当确定方针：暴动胜利之时，要农民协会变为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现时就应当宣传苏维埃的口号及农民协会的过渡作用。所以苏维埃口号并不与组织农民协会相冲突，可是“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应当取消。苏维埃口号之外，还要团结农民于土

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农民暴动未发动的地方，秘密的农民团体是有需要的，本党应当引导他们到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没收土地。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总方针，已经载在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之中。党应当坚决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分子犹豫圆滑的修改或谬解土地问题上的党的主张。土地革命的主要口号应当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盟抗租抗税，取消一切苛约，重利债务，没收豪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党坚决的反对用减租、没收大地主、打倒劣绅恶地主等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替代上述的革命口号。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城市之中，除苏维埃口号以外，还有劳动问题党纲：八小时工作制，绝对的增加工资，规定休息日，社会保险，要求监督生产等。再则，应当对于工人群众及城市贫民解释，并且要在暴动胜利之时实行下列的事：例如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厉行劳动法，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如建筑工人贫民住宅等。只有在这种革命的口号之下，本党才能组织被压迫群众的暴动，而得到胜利。

十、反对军阀战争与军事问题

反对一切军阀战争的问题，是中国现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赞成中央最近所

发反对军阀战争的宣言，认为对于军阀战争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是非常之对的。“失败主义”便是要使交战的双方军阀都失败，因为军阀的失败崩溃，就可以开展群众革命运动的环境，而使工农暴动容易得胜。本次扩大会议更特别的指明：“失败主义”的革命策略，在南北新旧军阀战争的时候，对于本党是天经地义。对于劳动民众，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统治，与白崇禧、唐生智、汪精卫的统治是一样的。北方军阀大半自身便是很大的地主和重利盘剥者，是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的代表（商业资本与重利资本及官僚大地主的政权）；南方军阀是豪绅地主（重利盘剥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他们双方虽然现在还是反动之中互相不同之种类，可是工人阶级及农民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本党的任务，便是在一切军阀战争之中，努力将这种军阀战争变成革命战争，将这种屠杀掠夺的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富豪军阀的国内战争。本党应当向劳动工农民众解释的，对付军阀屠杀战争之唯一方法，便是各地工农兵士群众起来实行推翻自己当地的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革命暴动。本党应当组织群众以备暴动，在优越的时候发动群众而指导他们暴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夺取这些混战殃民的军队的枪支武器。

中央认为必须更加加紧在一般广泛的平民群众之中做反对军阀的宣传。“反对战争”的口号，中央认为是对的。但是宣传这一口号的时候，必须解释，要能永久消灭这种军阀的掠夺战争，只有劳动贫民的革命的胜利，而建立苏维埃的政权。

军队之中的革命工作，因为战争的关系，更加重要而更加要加紧破坏这些军阀军队的工作。中央现时特别指明：虽然中央政治局屡次提及这一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到处受摧残，或者简直没有做。农民暴动屡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认为就是这一工作没有丝毫成绩的缘故。本次会议现时特别命令各级

党部立即开始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的秘密工作。除主要的革命口号之外，军队中的宣传，可以加上下列的要求：例如，增加兵士饷项，要求发清欠饷，给士兵好衣服好住所，废除肉刑，反对军官侮辱士兵，兵士监督军官的财政收支等等。本党应当号召兵士参加工农暴动，没收军阀财产，兵士派选代表参加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

同时，中央认为必须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总经验，尤其是屡次失败的教训，都证明要使中国现在的雇佣军队，变成革命斗争靠得住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组织上的主要原则，便是志愿兵制度，工农革命军的主要成分，应当是阶级觉悟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应当在新军队的各级组织之中建立起来。新军队中应当有集权的军需供给机关。新军队的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

十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八七紧急会议以来的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期，这种情形自然的结果，竟使本党以全力去指导无产阶级农民的斗争；在这种艰苦困难的条件之下，本党所以没有能分一部分注意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上来。同时，正在这一时期之中，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保镖的军阀（国民党）逐步屈服，实行其卖国的亲帝国主义的使命。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工人苦力群众赤手空拳夺回来的英租界，国民党竟归还了英帝国主义者，这是何等的耻辱。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也竟取消了。南京政府曾经企图使盐务署的外国督办服从自己，但是英国领事几声抗议便把国民党吓退了。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蒙满，而国民党政府一句硬话也不敢说。所有这些事实都更加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是彻底的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引起极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应当领袖中国劳动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严格的揭发治者阶级的卖国行为，以及国民党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口头禅。本党应当号召无产阶级及广泛的被剥削民众起来奋斗：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立刻撤退外国海陆军，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企业、银行——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中国人民所有，取消一切外债——满清政府及军阀政府零趸出卖中国所借的外债。

同时，本党应当经常不断的对工人及一般劳动民众解释：中国人民要完全战胜帝国主义，只有推翻治者阶级，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真正的平民政权——苏维埃政权，同时，也只有得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赞助。

十二、机会主义的遗毒

八七紧急会议虽然严厉的反对以前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半孟雪维克主义的政治方针，中央临时政治局虽然屡次纠正地方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然而党内仍旧有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之遗毒。叶贺[1]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昌暴动政治上意义的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前敌指挥者不是实行革命的策略，而是在各种主要问题上采取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方针（只提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之土地，主张减租到收获百分之三十，不注意农民群众的革命宣传，不准工农自动的独立的实行杀戮豪绅地主反革命派，抛弃征发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之政策等等）。军事上很坏的策略，也表现前敌党的指导，

没有革命的建议力，没有果断的意志和方针。许多次的农民暴动之中，指导者犹豫动摇，没有革命的坚决的意志，都是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机会主义的特点，便是不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不去依据工农民众，而总想依靠靠不住的军队力量，总只想做勾结杂色军队的把戏。中央这次会议认为必须以全党的力量，来排除这种危险的致命的机会主义之遗毒，这种机会主义遗毒犹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党的指导干部是非无产阶级的成分，本次会议命令各级党部立刻用最坚决的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肃清其中的机会主义的分子。要知道最近两湖广东及叶贺南征的失败，其原因由于主观上的错误的占极大部分，没有强固健全的非机会主义的党的指导，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再则，本会议认为还要预防党内别一种危险倾向发生之可能——这种倾向便是对于工人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部分要求的斗争，职工运动的工作，估量太少。其实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不但和指导部分要求的斗争的工作不相冲突，而且更加要党积极的去领导工人阶级要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日常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发展成为群众的革命的组织。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组织任务之重要

最近的革命的斗争之中，组织问题更加占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之革命化，都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在于他的组织，全在于他有革命的阶级的组织，尤其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共产党应当有布尔塞维克的组织。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成为群众的力量，决不能尽他在工农革命里的领袖及领导者的历史使命。最近劳动民众革命运动所受的历次失败，就是我们本党所受的历次失败，很明显的暴露出革命营垒里组织上的弱点和缺点，这许多弱点和缺点，不仅是表现本党在组织上不能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奋斗，而且党员的本身在有些地方（如湖北），当反动势力比较严重的时候，便公开的脱党以至为敌人当侦探；有些地方整个的党的组织甚至根本瓦解。同时本党自从放弃机会主义之后，虽然在极反动的政局之下屡次遭着失败，但是工农群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大增，尤其工人同志的积

* 这个文件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十四日经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的，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十三期。

极，大增长起来，提拔工人同志负指导职任的工作，虽然还很不充分，可是已经使党日益健全起来，可见本党组织的健全与发展，只有在反机会主义的政策及组织原则之下更加努力，更加切实执行新的方针，战胜这些缺点和弱点，便是中国共产党现时第一等主要的任务。

（二）党的组织之大弱点

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一、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一个政治派别，形成一个政党，还在中国无产阶级没有自觉的成为一个阶级的时候，还在工农阶级运动初具雏形的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资产阶级曾占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智识界，这种情形影响到中国被压迫民众之阶级自觉，及阶级斗争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去时期之中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主要的、最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渗入了我们的党。这种成分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干部。工人贫农群众的加入共产党固然随着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日益众多，但这已经是比较迟的一时期里的现象。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作用，竟留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当时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这种组织成分，

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1]的策源地——这种机会主义一直影响到叶贺[2]军队中党的领导机关的行动。

最近许多正确的彻底革命的党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八七紧急会议及其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议），往往在各地并不执行，谬解而成机会主义的实际行动，这是因为实行这些决议的分子，仍旧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代表的旧干部。八七紧急会议就已经指出：党的下层群众是行动的革命的，党的指导干部却是机会主义的，这种情形便是党内有两种不同的社会成分，因而有两种不同的阶级政策之反映。只有小部分党的干部，团结在党的中央之下的，能够坚决的抛弃小资产阶级式的观点，抛弃机会主义的方法及犹豫动摇的政策，以及其他种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特性——必须全党都经过如此的改造，才能锻炼出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布尔塞维克的党。

过去各省委在组织上更加犯了不集体化的毛病，各部处理各部的事务不是太专门化了，但是干预到党的整个行动，如工农部不经过党的组织系统而直接派人往各工会各县担任党的工作，军事部因有其离开组织部一贯的组织系统，致使各地党部时有工党、农党、军党之称，今后这种组织上的错误，中央必须负责纠正！务使这种各省党的各部的分裂的活动完全打消，并建立党的民主集权制，使一切工作都集体化于省委委员会及其常委中。

（三）党的改造之重任

因此而得的结论，自然便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

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一切非工农的分子完全不给工作，或者完全开除出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不如此主张，这是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分占最大多数。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分，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员的成分，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员的成分，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工会机关的干部，则须全部换成工人。这一改造工作，当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做成功，但是必须愈快愈好。应当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去切实这一改造工作。同时从最低支部起，提出工农分子，使担负实际指导的工作。各省在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以前，要开各省党部代表大会，或者省委扩大会议，在这个过程中，彻底新造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尤其重要的是：各地群众党部的工作，譬如组织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军事部，要由最靠得住最坚决的工人同志担负，在乡村中呢——由贫农同志担负。工会中的指导干部，也要立刻换工人分子。总之，最主要的要使党成为斗争的组织，要使一切斗争都变成为党的集体指导，以消灭个人的英雄式的领袖和指导之弊病。至于一般党员的思想与行动，党的组织的责任便是要监督与训练他们，团结与熔化在八七紧急会议以来中央的政策指导之下，洗刷一切旧有的机会主义的遗毒。

（四）党的基本组织与民主主义化

党的组织上的第二个弱点，便是许多大工厂大商店尤其是乡村和军队之中，至今几没有党的支部。乡村之中，严格的说起来简直没有党的组织，各地乡村中，至多只有特派员或者隘少的知识分子的党部委员会，他们之下并无支部，甚至并无党

员。农民运动的经验中，已经可以看出：没有先进的贫民分子所团结而成的党的组织，本党便很难指导农民斗争，或者简直没有指导的可能，至于农民暴动便成了完全自然爆发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最近各地农民暴动军比较的抗御力很弱，农民暴动的持久性比较的少，大半就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能在农民之中实行“群众之组织者”的作用。而农民广泛的群众组织，完全要靠党在乡村之中有广大的支部组织，网罗全境，结合乡村贫民及苦力中最坚决最革命的分子。再则在军队之中没有支部（兵士党员），也就是军阀能够很容易的调动军队镇压屠杀工农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党对于拆散军阀军队的工作，如果没有在军队中的支部去团结革命的兵士和下级官长，那么，简直是不可能的。当然，主要的还有在大工厂大商店之中建立并巩固党的支部的工作。学校中的支部当然也要注意。总之，支部工作在党的组织现状之下，占极重要的位置，过去因为支部工作不好，以至本党不能在群众中起广大的作用，而党员之散漫，党的政策不能深入群众，甚至不能深入党内群众，都由此而生。今后须特别注重支部工作，经过支部起群众的作用，至于支部的经常组织工作如按期开会等要严格的执行，这些都是树立党的基本组织的工作。再则全党党员应严格的执行交纳党费的义务，党费以有收入者为标准，各级党部都要按月计算党员的实数，要做到依党费核算党员的数目。

现在很严重的秘密时期固然不能实现完完全全的党内民主主义（党部机关自下至上全属选举，重要问题由全党党员讨论等等），但是就是在这种严重条件之下，引进党的下层群众，使他们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与政策的决定，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比以前更加百倍的努力去实行。并且要使尽可能的支部书记由党员群众选举的办法，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支

部，此等区域更须进一步尽可能的实行区委由各支部选举的办法。

（五）工会的组织问题

组织广大的无党工人群众于革命的阶级的工会之中的工作，也有非常之大的缺点。革命的工会现在只有很不健全的很薄弱的革命的机关，而没有工会会员。只在很少的几个工厂之中，有些工会现在的下层组织，如半公开或秘密的工厂委员会，至于一般而论，差不多完全没有工会会员的群众。其实组织工人，尤其是无党工人，却是工会的主要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工作的党员，应当认清自己的主要任务便是吸引各个工人到工会里去，组织工人群众，使各厂都有工会的组织，使工会成为群众的组织，必须使极广大的先进的工人，党外的工人，各个的加入工会做会员，必需每月的统计工会会员的实数，按时收工会的会费（宁可定到极少的会费），必须在各工会中实行发给会证，必须在下级工会机关（工厂委员会）除共产党员以外加入无党的工人，绝对要避免党代工会的形式，因而不发展工会会员的流弊，党应当建立工会独立的组织系统，使支部在工人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吸引广大的非党的群众加入工会。

（六）农民的组织问题

乡村之中党的支部应当是很秘密的，除党的支部以外，必须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于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组织之中，这些农民协会在革命的高潮时，劳动者夺得政权，就要变成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

（七）党与青年团的关系

党与青年团差不多完全不发生关系，这亦是组织上非常之大的缺点，必须在最近期间改正。党与团的支部、区委、县委或市委、省委……必须互相发生密切的关系，互派代表。党部的各级委员会必须定期的听团的工作报告，而给他们以指示。党应当对于团给以经常的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

（八）党与反动团体

从前党曾经派遣党员到我们阶级仇敌的组织之中（如黄色工会、工贼工会、国民党党部等等）去做侦探的工作，但是经验上所得的结果，大半是很坏的。因此，如今在一般的通例上决定抛弃这种政策，除非有非常之大的必要和意义，才可以偶尔使用这种方法，而且所派遣的党员必须是确实可靠而忠实于共产主义的同志。

（九）党的组织与纪律

严格的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实在是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须的条件之一，对于违背组织上政治上的纪律的分子，必定要严厉的处分。秘密组织的规律，不容任何轻忽而破坏，秘密机关的地址，绝对只准在工作上必须知道的党员知道。保存秘密文件的数量应当减到最少限度，绝对不容保存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单。通信上必须用密码的方法。各级党部的常务委员会不得超过五人至七人。五人以上及两点钟以上的集会，非极端的必需不得举行，凡是稍稍破坏党的秘密组织纪律的，立刻应当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简直开除党籍。

（十）发展党员的数量问题

党员的数量自从国民党反动以后有极大的减少，从五万余党员减至万余党员，这虽然一方面证明过去吸收党员与训练党员的方法错误，但欲使本党新的策略深入群众，党的组织重要责任之一便是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入党，必须多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扩大党的力量，然后本党才能担负新的使命。

十一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原文如此，应有误。
〔2〕指叶挺、贺龙。

PDG

政治纪律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本党第五次大会对于党内政治纪律的整顿，非常主观，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这是每一个共产党所必具的最低条件。

（二）自从今年七月事变公开宣言退出国民政府之后，决定抛弃以前迁就资产阶级领袖的妥协政策，坚决的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武装暴动，八七会议更加详细的指出：一、以前本党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今后应当毫不犹豫的信赖群众的力量，彻底实现土地革命的政纲。并且决定于秋收时间于湘鄂赣粤四省领导农民举行暴动，去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

（三）这一政策的执行，不应有丝毫犹豫的余地，但是在各省暴动过程中本党的指导机关与负责同志做出许多违背策略的严重错误：

一、八一事变中前委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决定南昌暴动是四省暴动的一部分，应以农民主力发展土地革命的斗争，绝不是希望单纯军事上的行动与胜利，但是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而做成了极大的错误，仍然是继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属于政治上的错误，就是没有明显的土地革命及工农贫民

---

* 这个文件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十四日经中央常委会议修改审定的，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十三期。

政权的政纲，不坚决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而徘徊于没收二百亩、五十亩土地主张之间，实际上只是实行了“耕者无其田”的政策。属于策略上的就是军行所到之地，对于豪绅资产阶级没有采取屠杀并摧毁其一切政治社会组织完全没收其武装的策略，及沿用军阀“不扰民”的观念，枪毙了乘机抢掠的贫民，再则没有实行没收豪绅财产以解决财政问题，却想用旧式军阀经过豪绅筹款的办法以剥削贫民和劳动民众。属于军事上的就是拘泥于原在武汉预定的军事保守政策，不走农民运动较有基础的赣西直入广东的路，而只顾避免敌人攻击，采取农民运动完全没有起来的赣东荒凉道路；在瑞金会昌战胜敌军之后，复不直往南下进攻梅县，唯恐伤兵辎重运输之困难而折回走上杭、汀州绕道取潮汕，使敌人从容布置以致完全失败！再则从暴动开始一直到潮汕失败始终幻想与张发奎妥洽，甚至写信与张发奎联络，委任小军阀的杂色军队，在南昌暴动的后路而对于不稳的蔡廷锴部队不敢采取非常手段，以致中途叛变，使我们军队受很大的影响与打击，这种指导上的错误徒使我们军人同志在南昌、瑞金、会昌、汤坑、三河坝诸役很勇敢而决无退却的牺牲了三百多，兵士群众亦极其勇敢的蒙了很大的损失，而结果仍不免于失败。此种错误的根本原因乃在前委因袭着军事投机的遗毒，不信赖群众力量，没有发动农民创造真正工农民众政权的决心，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违背中央政策的行动。

二、南方局广东省委对于农民暴动指导也做成了严重的错误。当南昌暴动军队向广东发动的时候，广东党部应即鼓动农民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起来暴动，实行夺取政权，不容有丝毫的犹豫与等待。但是广东省委的指导仍然是动摇不坚定，表示不信赖群众能作暴动的主力，重要错误就是：(1) 政纲口号上拘泥规定五十亩以下不没收，另提减租百分之三十的口号；

(2) 战术上农军只取侧面攻击——仅仅作帮助贺叶[1]牵制敌人之计，而没有号召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夺取政权和土地，因而没有猛烈搏击的战术；(3) 根本上没有发动农民群众，完全靠已组织好的农军势力行动——或为纯粹军事行动，而不是农民群众的暴动，南方局反而只注意介绍小军阀的杂色部队与前委，只注重于军事上的牵制；(4) 地域上海南、高雷虽起，而无关大局，西江方面简直只接洽有枪的零星部队农军或土匪，没有到群众中去号召，因此这地始终没有暴动，黄绍竑部队遂得安然渡过，东江农运除普宁、五华、海陆丰外都极其涣散无组织，党更失其指导作用，以致叶贺军队到达潮属后，农民暴动转反停顿而不能扩大；(5) 既没有把广东农民运动做主力，又根本没有发动群众，所以使群众之中发生等待叶贺的心理，自然一般农民自己没有深切知道自己起来夺取政权——这是政治宣传之大错误。

三、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更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中央屡次指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并且向省委书记彭公达同志当面警告其军事投机的错误，要省委改正此错误，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群众上面，遵照中央两湖秋暴计划切实准备，当时经过反复辩论，结果彭公达同志虽勉强接受，但省委的指导仍然没有改变旧的军事投机的错误：(1) 公达违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动看做一种单纯的军事行动，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以致暴动开始除安源的工人很勇敢的参加斗争外，各地农民群众实在没有一点行动；(2) 在暴动区域以内完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权的具体政纲，以致农民只以为是共产党的捣乱，甚至省委怀疑农民应需要土地，反对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3) 在工农军所经区域以内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以致农民视若客军过境，因这些指导上的错误与怀疑的结果，湖

南农民暴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

四、鄂北暴动中央在八七会议后便指定特别委员会前往发动指导，孰意特委至鄂北对于农民群众反抗赋税钱粮、反抗军阀情绪不加重视作发动之指导，反转轻视民众力量，坐待张兆丰军队之到来。及张军被解决，又拟令张往联络农民反对樊钟秀以图军事投机之尝试，这都是根本上与中央的策略和付托的使命相反。鄂南暴动已经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行动，湖北省委与鄂南行动委员会，决定会攻蒲圻城的战略，但行委恐农民武装缺少，战斗力量薄弱，而临时决定停止攻城，以至溃散，这也是充分表现不信赖群众力量临阵退却的错误！

（四）除上列暴动区域党部指导机关犯了严重的错误以外，王若飞同志未经过省委指导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以内工作同志组织革命同志会，欢迎来沪投降蒋介石的汪精卫，亦属组织上与政治上的极大错误。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同志在汉口时因为怕环境险恶，不执行中央分配之工作，私自逃出汉口，显然违反党纪。

（五）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上列执行错误政策之党部执行机关及负责同志，决定下列的处罚。

一、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最著者如当今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 C. P. 而另组织第三党，并向智识分子同志中作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之宣传；同时忽视党的决议，不得中央许可私向汪精卫请假，在请假呈请书内复大骂农运之棘手；与汪精卫代表陈春圃谈话，更大骂本党中央及农运；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莫，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发展其个人行动，在九江因为他和贺龙谈话之投机和贺可反张[2]，便在负责

同志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央不管党而自干的反党空气，至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在同志中在国民党员中；其后在革命委员会中更多先做而后通知或径不通知前委的举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

二、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三、这次前委指导做出极大的错误，前委全体同志应予以警告。

四、徐光英同志在汕任公安局长时，取缔工人[3]擅自逮捕并杀乘机抢劫贫民三人，应处以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

五、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土地问题策略的口号，不发动群众而只有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

六、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消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七、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应予以全体警告，陆沉为特委书记，其主张更多军事投机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工作，应开除中央委员资格。

八、鄂南行动委员会符定一同志，应留党察看半年。

九、王若飞同志因指导党团工作的错误应予警告。

十、杨匏安同志应开除中央监察委员资格。

十一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贺龙、叶挺。

〔2〕指张发奎。

〔3〕原文如此，应有漏字。

PDG

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一）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

（二）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中央常委应只通知各省被选的代表。

（三）第六次大会的代表选举法如下：

一、各省党部得选举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应由各省党部代表大会选出，如因秘密组织的环境关系，不能开代表大会，则由各省委全体会议派出代表，然而应当尽可能由扩大的省委全体会议选派。

二、各省党部派选代表以五百党员选出一代表为标准，五百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权的代表；无表决权的代表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

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如果没有被某一省党部选为代表，因而无表决权，则可以无表决权的参加大会。

四、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得派五人出席大会。

五、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

（四）第六次大会的议事程序现在大致相定如下：

---

* 这个文件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十三期。

PDG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国际状况与共产国际的任务及策略。

二、中央的政治与党务报告。

三、中国革命过去的分析及将来之前途与党的任务及策略。

四、土地问题党纲。

五、革命的工会之任务。

六、党的组织任务。

七、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八、选举中央委员及出席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代表团。

（五）各省党部代表会议的日期及议事程序，由各省省委决定之，函知中央。但是各省党部会议，至迟当在第六次全党大会两星期以前。各省党部会议时，应当将大会议事程序中的议案，择要先行讨论，中央当在全党大会以前一个月将大会议决案的重要草案送到各省。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公布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各级党部及一般同志都可以：一、参加讨论这一草案；二、搜集当地的土地问题材料；三、提出书面的增改意见；四、以及一切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或分析的意见。这些意见和材料应当临时寄来中央，在党报上公开讨论。这一草案及增改的意见，应当提出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作最终之决定。

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本草案为立夫[1]同志所拟，要大家公开讨论，以待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作最后的决定。同志等如有意见，修改或增补，理论分析之改正，或者自己另提一整个草案，都可以在本报刊布。）

* 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十三期。

PDG

绪　　言

中国共产党认清：中国乡村之中地主豪绅富农的成分不在少数，他们依据自己的暴力机关（民团、团防、商团、军阀的军队，以及他们所勾结收买的土匪），他们依据帝国主义的助力，对于土地制度之革命的变革，竭全力以抗御。

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农民最剧烈的阶级斗争能够消灭劳动民众敌人的经济政治上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用最“民众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完成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实行革命的变革土地制度，组织乡村中的农民代表会议政权，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府。

在这一斗争之中，苦力和雇农将要有很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坚决的反对并驳斥一切蔑视雇农苦力之反革命的理论（如谓农民运动不应是“流氓地痞”的运动等等），而且要努力去组织苦力雇农于阶级的组织之中，引进他们的代表参加革命政权之指导机关。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尽力吸引乡村中的中农分子，使他们站到贫民方面来，这些中农也是要推翻旧制度的。

中国共产党认清这一斗争是非常之艰巨的，但是，同时要指出：广东、湖北、湖南的农民已经在本党指导之下实行许多次英勇的武装暴动，这种情形证明在好些省份之中，已经形成了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战斗的组织之中，竭全力以赞助农民的一切斗争，宣传以城乡劳动民众武装暴动而建立苏维埃政府之主张，并且在群众运动相当的阶段上进而组织苏维埃。中国共产党认明：农民之中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地消灭，国民党欺骗民众的甚么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减低利息到年利百分之二十等的主张，无论甚么地

方也不能实行，即使实行也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欺骗民众的政策。

各省红枪会等类农民组织的发现，以及这种组织的奋起斗争，也就证明农民了解武装斗争之必要。中国共产党要努力去肃清这些组织之中的反动分子，肃清农民意识里的反动遗毒，努力去改变这种组织，使成为真正阶级的组织，能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共产党员应当到这种组织之中去进行适当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实行同盟抗租罢税不还债，拒用无价纸币和军用票等类的纸券，并且要竭全力去赞助这种斗争。

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群众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并且赞助农民自发的这种斗争，反对军阀的征发拉夫派粮等等。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这种斗争之中，宣传农民武装暴动以反抗农民之阶级仇敌的必要。

（一）

中国的农业经济与土地关系，不但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欧美不同，并且和欧洲中世纪时代（资本主义前期）的土地关系也不同。这种差异的最重要的前提，实在就是中国生产之自然界的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之特殊条件。中国农业生产的方法上，有许多特点，使农村经济呈特殊的状态，这些特点就是：自觉的整顿水利之重要（必须人工灌溉），多量的调剂水旱器械与建筑之必需，中国本部之主要区域没有畜牧事业，农村经济中用以耕种的牲畜比较的少，多量的肥料之需要，绝对没有停耕若干时间以与地休闲之办法，必须耗费多量的徒手劳动。如此的农业生产方法，再加上商业重利资本的早期发展，防御游牧民族侵犯及水灾必须巨大的工程（如长城、运河、黄河河工、堤工等），应付天灾又须有种种救济组织，对于游牧民族要能

征服他们，强迫他们变成农业民族：这些情形综合起来，便造成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列宁所称为“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制度。中国如此之多的小农经济，实际上不相关连，可是中国很早便有貌似统一的国家政权，这种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之一，便是人工灌溉。中国官僚制度的作用向来非常之大，这个原因便在于此。中国的官僚不但是地主和商业重利资本利益之政治上的代表，他们并且就是直接实行重利盘剥和大商业的本人。诸侯制度的采邑以及阀阅专有土地的制度（如贵族阀专有土地之制度）之在中国已经很早就根本崩坏了（秦始皇之后，约当基督纪元前三世纪）。此后经过很长期的无政府状态，经过非常残酷的阶级战斗，然后最终的形成所谓亚洲式的生产方法。中国的国家便从细小的许多诸侯采邑变成亚洲式的专制政权，有极发达的官僚制度。农业与农民的家庭工业（纺织等）相联结，又使亚洲式的生产方法有很大的内部稳定的状态。商业重利资本，对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地方市场，互相关联很薄弱的地方市场，有极大的威权。诸侯采邑阀阅式的土地制度崩坏之后，中国的土地关系经过许多种的变更，都是由于种种历史形势而来的，或者征服其他民族，或者受外来的影响，或者经过很大的民众运动，各地市场关系之扩大或缩小等等。可是农业劳动的方法，根本是没有变更的。中国农村生活的特点是：人工灌溉有能决定一切的重要意义，官僚的作用非常之大，官僚和土地私有制及商业重利资本有密切的关联，欧洲中世纪所未有的地主与商业重利资本大规模的剥削农民，土地使用时分割得非常之琐碎细小（同时，并不妨害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资本主义前期式的地方市场对于农民经济有相当巨大的威权。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发展全国的生产力，农业技术的进于更高的阶段，在现时都阻碍于这旧社会制度的遗毒。

（二）

中国各省的土地关系并非一致相同的。本党各地党部应当细心研究各该省的土地关系，必须估计到各地的特殊情形，要收集各地的经验，适应各该区域特别的情形，而实行党纲及政治命令。南方各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绝无疑义的是佃农及半佃农（粤、桂、鄂、湘、闽、浙等）。北方有几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都是自耕农（晋、直）。殖民地域的土地关系又有特殊的情形（吉林、黑龙江等）。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宣言承认内蒙古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一直到分立国家，并且要极力赞助内蒙国民革命党力争自决的斗争。对于回族地域，本党也应估计当地特殊的土地关系。中国有几省还有土著的苗黎等等。本党应当努力奋斗，消灭对于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种种方式的剥削，而赞助他们进于更高的文化程度。

（三）

农民分做三种：一、佃农，二、自耕农，三、半佃农。三种农民之中，都有贫农、小农、中农与富裕农民的区别。分辨农民中的这些种类，在农业生产方法的条件上，必须不仅以生产范围（耕地亩数之多寡）为标准。水田旱田，田地之肥瘠，每年收获次数等，都要估计到。各种农民之中，在中国本部最大多数是贫农和小农，贫农和小农都是每年收入不够维持最小限度的一家生活的（这些农民在各省之中有的占百分之五十，有的占到百分之八十，以省份而不同的）。富裕的农民只是农村中的一小部分，可是重利盘剥，剥削雇佣劳动，出租耕牛及农具，强租贫民田地，或者将自耕所余田亩出租，兼营农业，

商业或农村副业，与乡绅及官署有交往联络；这些事情，富裕些的农民都可以做的；因此，富农虽然少，而他们在农村之中却比较的有些势力，当然他们的势力比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势力要小得多。

中国阀阅制度（贵族）很早就消灭，族长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地主家族里的分家，使田地分割，现时更有地价高涨的情形，农村中的资本流入城市商业，变成重利盘剥的资本；这些情形使地主阶级之中的中心人物并非大地主，却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的贪狠，他们对于佃农剥削的残酷，并不让于大地主，甚至于有过之无不及。表面上宗法社会的旧俗，不能使佃农的地位比较好些，反而更加坏些。除地主、商贾、一部分富农、重利盘剥者之外，中国农村中的剥削者，还有土豪乡绅也有同等的重要。乡绅虽然常是有田地的，兼营商业和重利盘剥的，或者做官的，但是一般而论，他们是多余的知识分子，专靠农民的余剩生产品而生存，他们用租税课捐的方法，有时简直用强迫贡献的方法，榨取农民的余剩生产品。他们是官署与农民生产者的中介人。土豪和民团一样，亦是压迫农村劳动平民的寄生虫的暴力机关，这些寄生虫是反动势力在乡村中最靠得住的根基。

荒地沙田等官产，都被治者阶级所霸占。祠田族田庙田等的收入，都是乡绅所榨取。地主商贾乡绅所办的公司，或者各个军阀乡绅重利盘剥者，都能以极贱的价钱收买屯垦的官地。治者阶级霸占官地，以及侵吞祠族庙宇田产的收入，更加增加他们的权力。

（四）

中国的租佃制度有特殊的情形：分租大半是用谷物，并且

大半的习俗是佃农有永佃权的。租佃制度，一般而论，都没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主的对手方，极大多数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因投资于农业有承租地亩的；地主的对手方，都是穷饿的农民，租田耕种以求生的。只有沿海几省（粤、苏、浙）接近大都市的地方，有极少数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地主对于佃农无限制的剥削，一般而论，都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地主不但将"绝对地租"与"收益地租"以及水田灌溉设备中所放资本的利息都拿了去，并且连佃农所耗费于田地的成本上的利息也拿了去（此处所有名词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名称），不但如此，甚至于将佃农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一部分，也拿了去；如此情形，自然使佃农的收入，往往低于他们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数目。但是，除出这种习惯上旧式的剥削方式以外，新式的租佃关系也在发展起来。地主竭力在设法使永佃权变成定期的租佃制度，而且力求其为短期的租佃。旧式以谷物交租的方法，以及每年看收成交租的习惯，都渐渐的变成新的方法。铁租（每年不论丰歉，佃农须交一定的租额）的办法已经很广泛。押租（佃农预先交纳一定的押金方得租种田地）的办法，也在实行起来。这些新方法之外，旧时的剥削方法仍旧保存着。佃农一定要替地主做工，所得报酬非常之少，佃农一定要替地主送礼，有种种奇怪的名目，还需请地主或收租人吃喝等等。佃农欠债之后，便要替地主当奴隶（广东、山东），卖男卖女还欠租，不能还租的佃农须要坐监牢（广东、浙江等省），土豪民团可以任意毒刑拷打佃农，或者是因为不能交租，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如此之类的剥削方法非常之多。

尤其在中国中部各省（江、浙、皖、赣等），租佃关系之中有所谓"共有田地"：地主有田底，佃农有田面。这种情形大半由重利盘剥而来的，或者是由于佃农代垦地主荒地

而来的。中国永佃权的存在以及“共有田地”的制度，很明显的证明中国农村之中并非资产阶级式的私有制度占优势。直到最近，地主方才开始用全力夺取那种“共有田地”的所有权，要想使旧式的“共有田地”，变成完全地主所有的田地。

地主竭力要想取消有碍于剥削的旧式的永佃权及收租时的旧习惯（荒年照例减租，每年只收一次收获的租，贫民可以自由捡拾稻场上遗落的稻梗等等）；地主要想变更旧式的亚洲式的土地所有制度，使成为比较现代式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然而农民的倾向，却是要使地主的土地，变成农民所有。

（五）

贫农小农甚至中农所有的土地，仅仅是形式上的所有权罢了，形式上享有这些田地的生产资料罢了；其实治者阶级用课税贸易诳骗种种方法，不但将“佃租”收去，并且收地价的利益之极大部分，甚至于将农民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极大部分都收取了去。自耕农占多数的省份，现在也在自耕农迅速的变成佃农的过程之中（山西、河南）。赋税的压迫，经常不断的军用征收，根本破毁农民的经济。军阀的战争，匪乱的蔓延，商业交通的停滞，往往造成地价暂时低落的局面。地主军阀官僚商贾豪绅得以大批的收买田地，使自耕农变成佃农。时常不断的灾荒（直隶、山西、山东），预征钱粮，每年勒捐数次，更使重利盘剥的现象加增。重利盘剥者强逼农民将田地零星的抵押，农村中的治者阶级用种种方法掠夺农民的所有权。自耕的农民变成佃农。

（六）

水利的使用上，也有极剧烈的阶级斗争。地主竭力抢夺灌溉水利的支配权。商人的公司或豪绅地主的公司往往掠取河流溪沼，而使农民付钱买水。农民方面，自己也知道各个小农经济没有能力改良水利，开辟水源，甚至于不能保存原有的天然水利（水利是农民生产的最重要的前提），于是他们总是想望国家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可以深切的明了：只有劳动者的政府能够实行改良人工灌溉的方法，应用新发明的技术。

农村之中金钱货币的势力日益增加，于是重利盘剥者的威权也就扩大。农民之中最贫苦的分子（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以各省而不同），甚至于连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资财也没有。天灾战祸，因而不断的破产失业，还要履行种种旧习惯中靡费的礼节（婚丧赶节等等），都使农民不得不向重利盘剥者借钱。借钱的利息，从月利二分到十分。重利盘剥之中还有一种借贷谷物的办法，这种办法的残酷更是无以复加，简直是公开的掠夺农民。收获前借一石谷，收获后便须还一石半，甚至二石谷。收获前几个月借的债，收获后即须照全年付利还本。荒年天灾的时候，重利盘剥甚至于可以剥削到几个几十个的村庄，剥削到全体的农民。

军阀的统治根本破坏农民的经济：他们的重税杂捐、军事征用、派车封船、派粮、拉夫、拉马匹等等，完全是破坏农民经济的。地主还要转嫁一部分赋税杂捐到佃农身上，以及一般农民身上，这种税捐一年之中收到两三次，甚至于六次。厘金杂捐式的关卡无限的增加，商人所受的榨取，也转嫁到农民身上：输出时，商人因为估计所负捐税，而更加抑低收买原料的价钱，如此转嫁税捐到生产者身上；输入时，又如此的转嫁到

消费者身上。军阀制度之下，以前征收赋税的旧习惯与相当的限度，完全消灭了；中国贫苦农民所负租税，远过于普鲁士或美国的农民。巨商地主与官署勾结，并且有些权势，反而可以比贫民少担负些。地方税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日益增多。再则，农村的破产使匪乱日甚，匪乱的蔓延又使农村破产更甚。

帝国主义对于农民经济市场的权威，也更加厉害更加深入。外国工厂生产品的输入，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式的手工工场及家庭工业的发展，都使帝国主义侵入的地方农民旧式的家庭工业（纺织、豆油等）受着非常之大的打击。同时，农业与家庭工业相联合的中国旧经济基础，根本破坏，其崩坏的速度，比工业的发展快得多。农村中多余的劳动者因此没有地方可以吸收，所以极大多数的失业群众的到城里当苦力，变成土匪，流入军阀的军队，南方各省的人便到安南、暹罗、南洋群岛，北方各省的人便到满洲、蒙古去。

帝国主义的侵入，使农业中各种种植的分配，大有变动。例如茶的出产，因为印度、爪哇资本主义式的茶叶大农场竞争的力量很大，日本茶叶生产的组织也比较的好，中国自身则厘金杂捐日多，所以中国茶叶生产大受破败的影响。种蔗的生产也是如此，爪哇、台湾等处蔗业大农场之竞争，外国糖的输入，都使中国蔗业生产衰落。

欧洲化学工业的发展，破坏了中国土靛的生产。帝国主义的侵凌，以及中国本国纱厂丝厂的发达，使国内植棉种桑的地亩大增，然而欧战之后，中国棉业受着美棉印棉的竞争，小农的棉场自然抵敌不过——中国小农还受着重利盘剥者的压迫呢。中国重利盘剥的资本家本来正在努力侵入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业之中来。制油植物的种植也大大的发展；但是与植物油（豆油、菜油、桐油、花生油等）及豆类菜类同时输出的本来还有一种肥田用的重要物品——豆饼。满洲方面输出于日本

的，就有大批豆饼。同时，种植鸦片及烟叶的地方也多起来。英国帝国主义用枪炮强迫输入鸦片于中国，完全是为着赚钱。现在军阀便强逼农民种鸦片，以便他们抽收鸦片税。福田多变成鸦片烟叶等的田。水利不整顿，灌溉的设备破坏，于是农民往往不能不将稻田改种番薯（马铃薯）。贫民的食料一天一天变得更坏了。

商业却日益扩大起来，但是尽在旧式的商业方法的范围之内。贫农和小农不得不在收获之后立刻出卖谷物，简直不暇顾及市价如何，他们只能照村中最低的价格出售，因为急于要付田租，赋税，债息。等到第二次收获以前，他们早已完全用尽了，只得出很高的价钱去买米、借米吃。商业重利资本将与工业有关系的农产品（丝、棉、茶、豆、烟、靛等）完全握入自己掌握之中，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向农民生产者收买这些农产品。农民中最贫苦的分子受着市场的一切痛苦，而不能得着市场的丝毫好处，至多也只能得着很少很少的好处。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产品之极大部分的利益，是国外贸易的输出商（外商洋行）所得的，是中国商业重利资本所得的。乡村中的货物流入城市不能得相等的代价，中国的货物流出国外，又不能得相等的代价。

这一过程，因为帝国主义霸占铁路内河及沿海的航路，造成扩大商业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于是更加厉害。外国财政资本引起中国的采取工业（煤、铁等矿），后来又发生几种制消费用品的工业（如纱织、烟厂、榨油、食物制造、酿酒等）。农村中剥削所榨取出来的资本，投入运输业商业，亦有些投入工业。

但是，同时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协定关税，国内市场容量的有限，军阀统治，货币制度的不统一，财政机关的混乱，商业重利资本的优势等等，都阻碍工业的发展；频数的经

济恐慌使资本溢出生产范围而停滞，甚至于商业之中也不周转，于是这些资本及城市中一般积蓄的钱财转而购买田地及经营重利盘剥，于是小地主的数量增多而农民之佃农化的过程更加急。

帝国主义利用银价的低落掠夺全中国。中国的银行家巨商及重利盘剥者受着了这种损失，便转嫁给农民生产者。同时，在欧战之前便开始一种过程：农村中及城市贫民中最流通的货币（铜元）之价格，日益低落，欧战之后这一过程继续的厉害起来。铜元的购买力，因为军阀政府的滥铸，而日益低落。再则，军阀政府发出许多纸币、军用票、国库券等等，这种东西过不了几天便不值钱了，使农民及城市贫民受巨大的损失。银行公司及单个的商贾，也各自发出纸币剥削农民。中国经济日益成为货币经济，然而乡村城市中流行的货币，仍旧带着资本主义前期的货币之种种特质。

中国农村中绝无田地的农民有极重要的意义：苦力、雇工、船夫、渔夫等。做搬运夫的苦力有好几百万，土木作及其他农业工作的苦力也不少。这一阶级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始祖，恩格斯所称谓“前无产阶级”的。他们受着最残酷的剥削。他们往往几星期几个月找不着工作做，所以他们的境遇更加苦。

农民的失地和农民家庭工业的崩败，尤其主要的是田地的零星分割（贫农小农所耕田地非常之琐小），都使苦力农场工人的数量增加。中国条件之中，播种灌溉插秧等工作时，甚至于小农都不能不添请别人帮助。富农等便可以雇用长工。有些地方，地主给农具种籽牲畜，叫雇农替他耕种，收获之后雇农只得极小的一部分，或者很少的工资。这种农民，中国亦称谓佃农，其实已经是雇农。他们的地位很像半奴隶的农奴，却不像现代的农业无产阶级。按日计算的雇农，或者按期雇定的雇

农，一到田忙过了之后，便无从找着工作。

对于农村的剥削，最近还有些新的方式发生。旧式的家庭工业，如缫丝等，现在固然已经崩败澌灭；同时，却发生新式的家庭工业，为领取资本家的原料而在家织布、制花边、绣花、制草缏、制帽、制扇、制伞、制中国旧货的估衣等……这些新式家庭工业，大概有商店定制包销，对于农民，尤其是农妇的剥削非常之厉害，他们所得工资简直不能养活。

中国卷入国际贸易的漩涡之中，帝国主义攫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中国劳动民众受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地主官僚商业重利资本联合的统治，交通与工业之中资本主义的原素增加，旧国家的崩坏，军阀制度的发展，凡此一切对于旧式生产方法给了非常之巨大的打击，根本上使他崩毁。然而同时要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却有许多困难与阻碍：一方面帝国主义阻碍中国的发展，别方面地主及商业重利资本依靠着帝国主义及旧官僚机关与军阀军队的权力也阻碍中国的发展。帝国主义利用剥削中国劳动民众的旧方法去剥削全中国，中国的治者阶级又在竭力巩固剥削民众的旧方法，还要运用剥削民众的新方法，以稳固自己的威权和地位。

所有这些情形结合起来，便形成中国农业的一般的衰落，收获减少，旧时的水利设备破坏，天灾频数，水旱饥荒相继，农村破产，土匪蜂起已成一般的现象，重利盘剥的加重与扩大。阶级斗争便在如此的背景上急遽起来。

旧社会制度崩溃下来，澌灭下来，而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便只有两条路：资本主义的与非资本主义的。

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中造成巨大的生产机关，应用极新的技术，列强竭全力以互争世界市场，互争销售货物与搜取原料的场所，财政资本运用极新式极巨大的军事技术机关及海陆军以争夺市场，以征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如此的

时期之中帝国主义剥削与新旧军阀压迫之下的中国，只能够非常痛苦迟滞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且必须外国资本输入中国的速度大大的加增。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于中国，就是几千百万农民苦力之死亡，几百万女工童工在工厂之中磨折惨死，流血的掠夺的战争（如此的混战局面之下，军事上简直不用甚么技术器械相斗，而只是用几千几万人的性命为牺牲，以相搏战），极巨大的天灾水旱，极残酷的剥削工人，陆续相继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更加侵略，更加要攫取矿山铁路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或者简直是默契的瓜分，很快的几辈工人相继死灭，一般劳动农民的死亡，全国人口的大减少。从崩溃的旧中国社会非常迟滞痛苦的转入新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道路，便有这些不可免的结果。

第二条路——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便是劳动民众反抗中国治者阶级与帝国主义之联盟统治的极艰苦的斗争，以群众的武装斗争统一中国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除尽一切种种的剥削者，将劳动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从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与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经过第一期艰苦的斗争之后，运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之辅助，而进于新式技术的生产方法，工业农业大大发展，造成新的习俗，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程度，行向劳动平民解放后之光明的将来，自由的劳动，一直到进于自由世界，没有一切阶级的世界——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联合农民及城市贫民，组织并准备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以推翻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及其代表之军阀官僚的政权，而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以实现第二条道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彻底变革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肃清一切崩溃混乱的旧社会关系，所以主张为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起见，必须实行下列的办法：

一、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

二、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租田制度与押田制度完全废除，耕者有其田。

三、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乡村中的革命政权机关，他要按照土地之肥瘠水旱位置而分配土地，使旧时佃农中的富裕者不能变成富农，并使革命军队的战士及无地的农民能够分到土地耕种。同时，共产党要努力实行革命的土地改良。

四、寺院教会的土地，皇族旗地官地公产等类的土地，一概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此等土地的租田制度，亦一律取消。

五、祠产旗产的土地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共产党要赞助农民去根本消灭这一种陈腐恶化的土地制度。

六、官荒沙田湖田等的土地，亦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并且要努力设法，使实行垦殖政策时得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以及工农军的兵士。

七、一切豪绅反革命派的财产完全没收。

八、农民代表会议要措筹基金，保证无产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废等）的生活。

九、一切森林矿产完全归苏维埃国家所有，苏维埃国家之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当设法保护森林种植森林，并开采矿产。

十、整顿水利改良灌溉方法之工程，由农民代表会议执行，井泉溪沼等完全归农民使用，农民经过农民代表会议而行使这种权利。

共产党并认改良水利扩大灌溉源流，采用新式技术机器电力等，为自己的重要职任之一。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改良

灌溉的合作社运动。

十一、共产党要努力设法实行防止水旱的工程，建堤导河、填筑淤地、筑造牧场等等；并实行预防饥荒的设备。

十二、一切苛约重债一概取消。共产党要组织低息的农业借贷，设立农业银行及农民之借贷合作社。

十三、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合作社运动：销售农产品及农民之家庭手艺产品，贩买农民日常的必需品及家庭手艺的原料等。共产党要发展工业而使农民得着廉价的现代新式的农具，禁止贩售肥料的私人垄断——贩买肥料归农民的合作社办理。共产党还要实行乡村中筑路修道的建设事业。

十四、军阀政府的一切赋税，完全废除，厘金废除，包捐包税的制度废除。革命政权重定单一的统一税制，税收的一部分应当用作乡村的公费。一年只在收获后收一次税。确定统一的货币及度量衡的制度。

十五、颁布保护雇农苦力的法律。政府当以发展工业而开办公共事业的种种工程，修筑道路，奖励农村手艺，以保障苦力失业者的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即瞿秋白。

PDG

职工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在初期北伐的过程中，仅只两湖的工人斗争得到短期的进展。但因为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终于中途受了阻碍。至于河南的工人，在帮助北伐军得到胜利后，不但没有得着丝毫解放，反而更加遭受压迫和剥削（铁路工人欠饷多至十二个月少六七月，卫辉纱厂工人在经济斗争中被冯玉祥惨杀三百余人）。从蒋介石四月十二在上海向工人阶级开刀始，继而四月十五李济深在广东的屠杀及长沙的马夜事变，江西朱培德、河南冯玉祥的反叛，一直到七月十五汪精卫公开反动，照理，在这些省份的工人阶级应当对反动派严重的反攻。可是因为党的机会主义的政策影响已深，不但没有反攻，反而在职工运动中表现两种极坏的事实：一是根本屈服于敌人，放弃职工运动，如河南、湖南、江西等；一是进一步投降加入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如上海、安徽等。至于北方各省如直隶、山东、山西，则自“五卅”高潮低落以后即无形放弃职工运动，北伐军兴而后更专一等待北伐解放，停止了一切活动。如此种种，全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经过一度国民革命的斗争，并且他们曾经参加此一斗争而受了莫大的牺牲，然而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并没有得着丝毫解放，他们的阶级意识反而一时陷在模糊的状态，他

* 这个文件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

们的革命情绪，反而表现一时的消沉，“二七”、“五卅”的悲壮的斗争不能复起于国民党背叛的过程中，这是什么原故？主要的是我党的机会主义整个的运用于职工运动中的结果。

八七会议，适当国民党左派背叛，社会阶级激剧变化的时候。会议主要的目的是改进党的政治路线，决定新的工农斗争的策略及改造党的组织。当时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的主要点是：激剧的发动工人经济斗争，发展秘密工会，反对黄色工会，提拔新的领袖。这样的决定无疑的是很正确的。但是，实际，这些决议并未能有相当的实现。本来党的组织上的改造就没有相当的完成，“八七”精神仅仅走到几个省委，没有到下面去，自然这些决定，还大部分只是白纸黑字的留着，我们只要看下面的事实就可以明白：在四省秋收暴动的期中，没有看见工人起来。尤其是在许多农暴区域中的城市常常不能成为农暴的中心指导者，事实上反而等待农暴，甚至乡村农暴已大大起来，城市一点也不能予以帮助。同时党在工人中关于农民暴动事实的宣传亦异常缺乏，广州武汉的工人斗争一直到两湖秋暴及叶贺[1]失败以后才起来，湖南、江西、河南现在才开始有计划的工人运动。直隶、山东农民暴动已经起来，工人斗争则依旧寂然无闻。上海一直在湘鄂粤失败了之后才开始反统运动，至今工人斗争尚不能有广大的有组织的发动。就全中国说一般的成为农民激进工人落后的现象。不仅没有激烈的斗争，就是秘密工会的组织亦没有进步。各地党部对于农民斗争虽做了不少的军事投机的错误，还算是有意的不断的在那里领导。而对于工人斗争则确不免有忽略的倾向，至少也是无意的或顾此失彼的忽略了。这是“八七”以后职工运动主要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发展下去，无疑的要使工人阶级在土地革命中失掉领导地位。此后在策略上亦表现两种极严重的坏的倾向：一种是旧的机会主义的余毒，不敢领导工人向前斗争，而想与

政府国民党工会妥协，保存一点与工人群众的关系，最显明的如浙江工运负责同志不愿坚决的退出反动工会，上海一部分下层同志留恋“统一委员会”及最近安徽省委同志决定加入西山会议派的芜湖市总工会等等。至于“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就是在很重要的城市和工人区域也很迟的才提出，公开的反国民党运动除上海广州市外也没有什么工作。另一种倾向便是军事投机，不坚决的去发动群众，而靠一种偶然的机会，强迫工人起来，工人因为不明了斗争的意义，一旦失败，则情绪消沉，不易复起，如蒋介石下野时沪西纱厂之罢工及最近沪东纱厂之罢工是；或则根本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此不深入群众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而迷信暗杀万能（非群众的红色恐怖），不暗杀几个工贼和反动派，则不敢到群众中去（浙江省委、山东省委中的一部分同志以及上海的一部分同志很明显的表示这种倾向）。上面这两种倾向，虽然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所取的手段不同，根本上则同是机会主义的余毒的爆发。不把这两种倾向肃清，则我们党终久不能深入群众而要被群众唾弃。至于工会的组织工作亦异常缺乏，在白色恐怖严重的进攻以来，到处工会组织都无形消灭，而以党的支部替代了工会，或则虽有工会，亦只是一个变相的支部组织，底下并没有非党工人群众（如上海），而事实上，党员群众又每多退缩不前，不能领导群众。因此工人根本没有自己的团结，一切斗争更加难得起来。

右面所述是八七会议后职工运动中主观方面主要的缺点。但是，虽然我们主观上做了不少的错误，全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却确在逐渐的往上发展。新旧军阀不断的战争使中国工商业愈趋衰落，中外各厂大多关厂或缩减生产，失业工人日益增多，在业工人因为工钱缩减，纸币低落，厂家欠饷，待遇苛刻，一般生活程度的增高，生活愈加陷于痛苦。南方各省屡次反革命的政变，和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不仅不能改

良这些现象，反而使之变本加厉，对于工人群众的屠杀较之北方军队还要凶残。无论政府国民党部或蒋记、唐记、冯记、阎记、李记[2]所委任的黄色工会，无不是公然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而不能对于工人群众维持其暂时的欺骗。全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已逐渐开始，武汉、上海、广州已经有激烈的发动，特别是广州工人十月十四以来八次大的罢工示威，已经足使反动阶级骇惧万分。“国民党”三字无论在南方北方一般工人群众对之一点没有信仰，黄色工会成了工人群众眼中的蜂刺，武汉、上海、广州的工人群众已经公开的枪杀国民党的工会改组委员和工会特派员，广州工人已在高呼“撕毁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举起革命的红旗”。总之全国工人阶级已经逐渐认识国民党的反动，而开始凭仗自己的力量起来与资本家豪绅军阀和一切反动势力宣战了。依这种描述，证明党的中央“八七”以来的策略完全是正确的合于实际的。

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政治任务决议更加明白指出要为争得工农政权（苏维埃）而奋斗。因此党的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便应转注于这一政治重心，使工人阶级在政治组织上真能负起为实现工农政权而战斗的领导者的任务。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央扩大会议对目前职工运动的策略和方法有以下的决议：

一、要把政治决议所指出的任务实现于职工运动方面，首先便应坚决的与有意或无意忽略职工运动的倾向奋斗，事实上使职工运动成为党在群众中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事实上使工人阶级能成为农民贫苦民众的领导者和先锋队。同时应坚决的肃清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的余毒，从同志和工人群众的脑海中洗去一切妥协、退缩和军事投机对国民党幻想等反革命思想。在组织上应当从工会指导机关和党内职工运动指导机关中彻底撤换一切投机腐化退缩消极的分子，代以积极勇敢的工人分子。

二、党的职工运动主要路线是从不断的领导工人作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从斗争中严密工人的组织，加紧工人的政治训练，扩大工人的武装组织和训练，一直发展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就是说我们在工人群众中一切组织宣传工作要经过实际斗争一直为达到这一目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前进。现时应立即开始全国工人的经济罢工和反军阀战争的争斗。对于经济罢工，党的各级党部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形提出各业各种工人的经济要求，以这种要求组织号召工人群众爆发罢工争斗。现时无论矿工、路工、海员、纺织工人以至种种苦力、手工业工人、店员都有极切迫的经济要求。现时经济罢工是开创新的职工运动的唯一道路，而且是如干柴着火一般极容易爆发的，我们党应当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站在工人群众前面勇敢的领导他们。党的中央应当以各地能否爆发经济罢工为考察各地改造职工运动之成绩的标准。同时党对于罢工的策略（尤其是在某种产业恐慌时）及罢工失败后如何继续发展争斗，以及现在一部落后工人之畏缩心理如何救正，须特别加以注意，求得适当的指导方法。

党在工人阶级中应作的政治工作应不仅限于宣传工作，应当利用机会实行政治的集会示威游行，以至于政治罢工，特别是当现在新旧大小军阀的混战时期，在战争的区域中应当发动反军阀战争的争斗，至少应当做到开会游行示威并在紧急的当中夺取武装的工作。在一般政治要求中应当提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和反对白色恐怖、逮捕工人及要求释放被捕者等等。同时应当知道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虽然由于其斗争的目标不同，但在事实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经济斗争必然进到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在未能最后夺取政权时每每归结于经济的斗争，在一切经济斗争中必须提出政治要求，在一切政治斗争中必须提出经济条件。如此才能使工人明白经济争斗

与政治争斗相互的关系而继续不断的奋斗，直至最后的胜利。

在一切争斗中须扩大而深入的宣传“苏维埃政权”，宣传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罪恶，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的口号，提出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及土地革命的口号，举出镰刀斧头的红色旗。

三、在宣传上必须特别注意向工人群众解释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的意义及其重要，尤其要利用每一个农民暴动的事实详细向工人群众宣传。党必须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缔结亲密的联盟而成为农民领导者，为达到此目的，不独应当在工人群众中作口头上与纸上的宣传，并应当从组织上和斗争中求其实现，各城市乡村的联合暴动，如矿工、铁路工人与附近农民的结合，如派遣失业工人到农村中去指挥暴动等等是。

四、最近重要城市所发生的罢工运动，实为八七会议以来新政策之下无产阶级继续不断的壮举，但是其中大部分终为资产阶级获得胜利，其原因不独在于黄色工会与官厅之掣肘及彼等与厂主联合一致向无产阶级反攻，同时更因为我们的工会组织薄弱，党的指导不力，运动之散漫无组织及罢工工人相互间缺少联系等等。因此各级党部应当坚决的做发展与巩固秘密工会的工作，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吸收广大的非党的积极工人群众加入工会，并且使他们参加秘密工会的工作，坚决的改正“党即工会”或整个的包办工会机关的积习和错误。在最短期间内，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必须完成所有最重要的工会委员会的组织，并须在保存党的势力之下，使新的非党积极工人干部人才参加其工作。

尤其要紧的是在大产业中进行从下而上的组织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产生必须经过群众的选举。工厂委员会的存在在原则上是公开的（在保持秘密工会正确的指导之下，尽量使广大的非党工人参加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为扩大工作范围

起见，必须做到组织公开的工厂委员会。因此，现在已经应当造成为将来争工会公开有所保证的一切必要条件。平时对于工人大会、工人代表大会须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的举行，要尽可能经过工人代表大会或工厂委员大会解决关于工会及日常斗争的重要问题，使工人群众自觉其组织上的责任并加重对于工会的责任，一方正所以改正几个领袖包办工会的积习[3]。

在工人运动高涨或白色恐怖稍微缓和之时，党必开始作公开选举工会机关的运动，并将国民党政府所委任的工会指导员一概驱逐撤去。中央对于全总、海总、铁总的工作须加以整顿使之起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矿工、邮务、纺织亦须促成其全国组织之产生。秘密工会与党的支部必须尽量的利用公开之可能性组织一切工人团体，如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公共寄宿舍、公共饭堂等等以团聚于工会之周围。

五、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与政府国民党委派的黄色工会，眼见共产党在工人群众势力很大，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对于罢工运动的政策而图谋于罢工工作之中把工人阶级夺为己有。他们有时也给罢工工人一点小利，如提出秘密工会所提出的要求再加上他们自己提出的欺骗工人及罢工救济等等。自然，在白色恐怖之下，他们的工会是唯一的公开工会，因此他们有把一部分工人从我们领导之下夺取之可能，但是他们的企图始终不过是暂时的，终究要归于失败；因为他们——反革命的政府绝对不能向工人稍事让步，更不愿抑制厂主们贪求无厌的欲望。党必须研究他们的政策之改变，与目前政府工人政纲之内容。党与秘密工会必须在日常斗争的事实中不断的向工人群众指出他们所以予工人以经济帮助或其他种种欺骗，其用意不过在于使工人放弃自己的要求和斗争，转而向资产阶级摇尾乞怜。

对于反对政府国民党或冯记、阎记……等所委派的黄色工

会，除开右面所述我们勇敢的站在工人前线领导他们作经济政治斗争，从不断的日常斗争中宣传揭破黄色工会之罪恶，使工人阶级脱离开他们的影响而外，在组织上我们应当提出“工人自己选举工会，反对任何机关委派工会”的口号，并实行工人选举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使各工厂工人共同议决实行反对政府国民党以工人部之职权改组工会并指派工会指导员，抵制他们的机关，拒绝缴纳会费。同时厉行红色恐怖去对付右派工会的委员也是可以的，在能有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如此种斗争的时候，更有必要（如广州工人之反工总会运动）。

六、为帮助罢工工人，必须筹备罢工救济费，我们应当提出“不要给右派工会一个铜板，大家共同筹备罢工救济费”的口号，并指导工人实现这一个口号，哪怕每个工人每月只能蓄储三五个铜板，也是有异常重要意义的，同时全国总工会必须向国际无产阶级不独要求政治上的帮助，并当要求他们在经济上帮助中国无产阶级。

七、因为关厂缩减生产、休业及开除工人等所引起的失业与饥饿，使一部分工人起工团主义的妄想，以为夺取工厂自行生产或毁坏机器可以挽救工人失业与饥饿的危机。党与秘密工会的任务在于指出这种倾向对于工人阶级之不利，同时应当提出“工人管理生产”的要求。说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实际冲突起来，资本家便使成千累万的工人失业之事实，只有进攻资产阶级是政治斗争最有力的武器。

八、党对于失业工人，须使之团结于下列口号之下：

（一）向商人与工厂主征税救济失业工人。

（二）政府开发社会工作给失业工人做。

（三）开办公共饭堂与公共寄宿舍。

（四）发给失业工人经常的津贴。

（五）失业工人津贴费由失业工人自己管理。

为使失业工人为这些口号而奋斗，必须组织示威游行，向政府商会要求上列条件或以捣毁政府国民党工会、捣毁政府管理发给津贴费之机关相威吓。

失业工人必须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于秘密工会指导之下。党必须注意组织失业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并设法派遣失业工人到农村中去作农民运动的工作。

九、海员铁路工人矿工为中国主要产业工人，亦即中国无产阶级的重镇，现时党在这些工人中的工作非常之微弱，党的高级指导机关应根据下列之原则规定各个的工作计划，督促各级党部执行，并尽可能直接指挥监督其工作。

（一）海员曾经有名的斗争，至今还成为广东工人斗争的重心，可是除开广东一隅外，别的地方极少工作甚至于完全没有。党应当有计划的发展海员工作，在邮船和大轮船上发展海员工会支部和党的支部，在重要的商埠成立海员工会分会，于最短期间于已有基础的工会中发动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从这样的斗争以加强他们的工会组织和政治觉悟。党应当分派一批人才去担任海员工作。

（二）铁路工作自“二七”失败后，即渐渐消沉和腐化。除开极少的铁路如广东如株萍外，党的支部和工会机关多落在工人贵族手里，成了不战斗的机关。同时因为过去铁总党团组织系统的错误，铁路党团另改一系统，不受相当的当地党部之指挥，铁总特派员亦多离开党的指导，铁总又无法给以灵敏的监督指导，于是铁路工作愈益离开群众，许多铁路的工人群众反对工会反对 C. P.，因为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原故。八七会议以后铁总虽努力企图改造，然因人力关系，亦仅限于京绥、京津铁路有部分的改进。在此反对军阀战争和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时期，铁路工人的作用尤其异常的重要，党应当派人在几条重要的干路如京汉、津浦、京绥、陇海、京奉、粤

汉、沪宁、沪杭、正太等重新开始工作，恢复并改造工会，发展下层组织，改造并发展党部，恢复党的威信，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同时改正党团组织上的关系，上级党团绝对不直接指挥下级党团，各级党团完全受相当党部的指挥管理。铁总特派员同时受相当党部之指导监督。

（三）“五卅”前后全国矿工中，我们党有相当工作的将近二十万人，“五卅”高潮低落后，至今一方因为产业恐慌而致部分的或全部停业，如汉冶萍三公司及枣庄之煤矿，一方则因党的自动的停止工作，如鲁晋豫各矿省，因此，此二十万的矿工工人中仍旧留有基础而尚在继续不断奋斗百折不挫的仅只有安源之数千工人（湖南秋收暴动安源二千余工人为先锋攻萍乡、醴陵、浏阳）。北方各省不仅工作停顿，连党的组织亦形瓦解（唐山只剩二十几个同志，工人根本不信任 C. P.，下级同志要杀区委负责人）。这是何等可耻可痛的事情！现在党应当重新建立矿工运动的基础，尤其是对于直隶之开滦五矿（五万人），门头沟（二千人），山西之阳泉（三万人），井陉（数千），山东之淄博（五万人），枣庄（一万余，尚余一部分未歇业），河南之六河沟，焦作，江西之安源（尚有五千人），湖南之锡矿山（约二万），水口山（三千），炭塘子，湖北之大冶，奉天之本溪湖须派专人去进行秘密工会发动斗争，发展党的组织。

十、同时党的中央对于大的工人区域，上海、武汉、广州、天津、青岛、香港等处以及其他重要城市的职工运动工作，须特别注意加以指导和监督，目前尤须注意工作上和组织上的改造，尤其是在这些城市中的市政工人运动须特别加以努力。这些工人的厂家不是帝国主义者便是当地的军阀政府，斗争一起来即是直接的与当地统治阶级的冲突，特别在工农暴动的当中，足以制统治阶级的死命。各地党部须战胜一切困难，

开始并发展这种工作。

为要使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指导者，那么各级党部对于各县城市工人运动便应当加紧工作，不仅要发展工人的工会组织和经济斗争，而且要充分给以政治的训练（如反对国民党夺取政权，武装联合农民，土地革命等等），使之不断的为夺取政权追求根本解放而奋斗。

一切城市的工人运动中，党须坚决的领导店员、手工业者对于店东、手工业主的经济斗争，必须如此我们才能取得广大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的拥护，才能在各县城市造成暴动的主要力量（当然还不是中心力量）。

十一、工人秘密的武装训练已成为中国工人斗争中迫切的工作。重要的工人区域须派专人担任训练工作，同时党应当尽可能帮助先进的工人得到武装，尤其是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应当有组织的领导工人夺取武装。关于工人武装训练和工军的组织，武装暴动的技术，中央须另制详细的计划和规定。

十二、根据党一般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在工人群众中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和运动，要更加积极的做起来。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之下和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中更应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融成一气，利用每一个机会激烈的发动起来。

十三、女工工作与童工工作必须较前加紧，必须吸收女工及青年工人到工会中工作。尤其是在纺织业工厂中，资本家每每利用童工女工以抵制成年男工，在一切斗争中辄大抵开除成年男工代以女工童工，以逐渐消灭工人队伍中中心的力量。党的策略就是要使成年男工了解提高女工童工特别的经济要求之必要，如帮助童工女工改良待遇，增加工资运动，提出童工女工工资与成年男工平等等，以激发女工童工的斗争，使之与成年男工结成亲密的战线，以抵制资本家挑拨离间的阴谋。

十四、训练工作在目前有很重大的意义和需要，在训练工

作中，必须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罢工争斗胜利之条件及反对黄色工会等工作详为解释，使工人都能了解才算尽事，在各重要工人区域中，必须出版像《上海工人》一样的印刷品。

党必须在纸上或口头宣传上猛烈的批驳右派工会领袖高谈阔论之阶级调和政策，并尽量的批评他们在《劳工日报》或其他反动报纸上发表之文章及他们在工人会议席上之演说报告等。

十五、为使本决议案能切实的实现，党的中央须注意以下几点工作：（一）派遣积极的能干的同志到重要工人区域和重要产业工人中去工作。（二）改换旧的工人领袖和工运指导者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代以新的积极的分子。（三）党的职工运动经费须直接指定分配于各重要产业工人，重要工人区域和重要城市，不交由各省党部自由支配。帮助各种总工会党团及各省党部制定所属范围内工人运动总计划。

各级党部对于所属范围内各种各业的职工运动，须随时制定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工作计划，以尽领导或创造的责任，不可限于零碎的应付的状态。各省委必须每月对中央作职工运动报告，尤其是单独受补助费的区域，或产业，每月必须有一专门报告。如一个半月不作报告，中央应停止其补助费，两个月不做报告，便撤换工作人员。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2〕指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各派系。
〔3〕原文如此。

PDG

中共中央给湖南、湖北省委的信*

——两湖军阀混战形势下党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湘鄂省委：

唐生智系军阀已日趋败溃，据沪报载唐已出亡，武汉交何键，湖南交刘兴，八军亦退湖南。这虽不足证明唐系军阀纯全溃败，亦不足证明南京系军阀程潜、李宗仁等之大胜利。但两湖大小新军阀从此混战的局面将益趋激烈而不可收拾。现在两湖的局面，不是南京系军阀程潜等可以平定，亦不是唐走后何键、刘兴等可以长久维持。新军阀与老军阀不同之点，在于冒革命的招牌，做他个人的企图，至于抢夺地盘则一。两湖地盘为程潜、谭延闿、鲁涤平并李宗仁、胡宗铎等所欲得，同时何键、刘兴、李品仙等亦不至因唐走而双手送交程谭，他们之间将有更激烈的冲突，何况唐走的消息尚未纯全证实，而他的亲信力量可都集中于武长铁路与湖南，这显然是以武汉交何键作为缓冲，湖南则用全力保守。唐之力量一时并不至根本消灭。此外在湖北之方振武、贺国光、刘佐龙、李燊，湖南之方鼎英、许克祥、范石生、周西成等又各盘据数县，跃跃欲试（有些已经动作），唐之失败，将更引起他们积极抢夺地盘的行动。总之，两湖大小军阀混

* 本文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

战的局面将益趋激烈而带较长时的性质。两湖的财政工商业因此而更要走入纯全破产的地步。凡此都是促成两湖土地革命发展之最好条件。两湖在现状之下在极短的时期内有造成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之可能。中央特命令两湖省委注意两湖革命最近发展之前途，同时命令两湖省委利用唐生智系军阀崩溃与大小军阀混战，工商业财政破产的局面更积极的发动两湖的革命，创造部分的暴动，汇合而成为总的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的暴动，乡村与城市都应一致的动作与准备。至于目前急须进行的工作，中央特命令坚决的勇敢的执行下列各项，同时两湖省委接到此项命令后应更具体的定出工作计划即刻执行。

（一）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的败溃时应：一、有组织的领导广大的群众捣毁反动派的总工会以及改组委员会，即刻当着群众宣布恢复老总工会、老工会，但同时须注意保存秘密工会之组织，最好开始建立工厂委员会；二、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三、尽量发动工人的经济罢工以至总同盟政治罢工；四、组织工人群众夺取溃兵与警察的武装，在未实行这种行动前即应组织工人革命军或工人武装自卫队；五、领导失业工人捣毁失业救济局、劳工部、警察局，以至抢米、抢银行；六、在汉口、长沙如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

（二）在乡村中大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东西，分配土地，捣毁与抢劫所有政府的征收机关，停止缴纳一切田租捐税，停止缴还一切借债，集中力量割据某县或数县。鄂省委应当在极短的时间内领导农民割据公安、石首、当阳向极西发展，并与湘西联合，割据天门、沔阳向四周发展，割据麻城、黄安向鄂东

与京汉路发展，恢复鄂南的工作成为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与湘北联合，恢复鄂东的工作；湘省委，应当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割据湘西、湘南、湘北各数县与鄂西、鄂南联合。应当恢复长沙附近数县的农民运动，以至与长沙工人联合扑城。在割据的县份应根本肃清乡村一切反动势力，改变所有乡村的旧关系，按照中央最近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充分执行。为执行上面的工作，两省委应很迅速的各派二百至三百同志到乡村中工作。

（三）两省委均应发表宣言，反对军阀战争，提出争斗的政纲，各省总工会亦应发表宣言，提出争斗的政纲。

（四）应特别注意敌人兵士的宣传与破坏敌人军队的工作，两省委之下应设立一特别反革命军队运动委员会；其主要方面为煽动兵士暴动，杀戮高级反动长官，参加工农暴动，改编工农革命军。关于这项工作，两省委应有一详细而即刻可执行的计划。

（五）目前主要口号，应当是：工农兵士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代表会议，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没收地主的土地，耕地农有，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工农政权万岁，土地革命胜利万岁，打倒欺骗民众的国民党，打倒新旧军阀，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资随物价高涨，抗租，抗税，抗粮，抗捐，停止一切借债，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绝对自由，工人监督生产，革命的兵士暴动枪毙反动的军官，革命的兵士参加工农暴动，工农兵士联络起来建立工农革命军，分配土地与退伍兵士。

十一月十五日

附：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两湖秋收暴动以及广东的失败，土地革命的发展虽然受了一些打击，但整个的革命潮流仍然是要愈益高涨的，这是由于下列的情形决定：

（一）沿海以及长江流域一带新军阀豪绅与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不因我们在两湖与广东的失败而比较的稳定，他们本身不可调和的利益的冲突，且日渐酝酿而纯全爆发，最近唐生智系军阀与所谓南京派军阀的武装冲突（同时亦是英日的冲突）便是一显明的事实，这个冲突的范围，将要继续发展而扩大，且将有发展成为新旧军阀混战的局面之可能。这个冲突之继续发展与扩大，无论某系军阀之胜利都是新军阀豪绅与资产阶级的政权稳定之大破坏，即是客观推翻革命潮流益愈高涨的动力。

（二）因为新旧军阀战争之爆发与扩大，战争区域，城市与乡村直接受战事之破坏与痛苦（如军用捐、拉夫、封船等），战争的影响的区域，间接亦要受苛捐杂税，预征钱粮，特别捐等等的恩赐。工农以及一般的劳苦群众反军阀战争以及谋解放争斗的意志与觉悟必益愈坚决而发展，换言之他们的阶级意识与争斗必益愈扩大与剧烈。在工商业方面因战争的影响，交通的断绝与阻碍，货物生产金融都要受重大的打击，势必减少停顿以至破产，这些情形又要引起城市与乡村中暂时或长期的恐慌，而益愈促工农以及一般劳苦群众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冲突，最近武汉工厂倒闭，资产阶级整个的向工人阶级进攻，失业的工人日日加多，工资减少，工人的待遇上愈益恶劣便是具体的事实，由这些事实发生出来的工农群众日常争斗的总和，

便是整个的阶级争斗之发展，即是革命潮流的益愈高涨。

（三）两湖秋收暴动与广东的失败，因为本党土地革命的策略未能深入群众，下级党部未坚决的执行以至未能唤起广大的（广东与湖北有几处不在此例）群众的行动，在群众的本身方面除了少数地方，并未受如何的打击，他们的观念至多不过是大势改变，还须等待新的时期，即此便武断革命的潮流不能发展是绝端的错误，这种错误的观念纯全由于不懂得本党正确的策略深入与坚决的领导广大的群众奋斗的作用。

（四）因为工农群众之一致崛起，劣绅地主与资产阶级之阶级意识亦益愈发扬，他们对于工农群众之残忍非人的压迫亦益愈奇特，如鄂南地主对待鄂南农民之“宁肯误杀一千不肯走掉一个”之坚决行动等等事实，将要引起工农以及一般劳苦群众之反攻，加以两湖大部分的地方土地革命之进展，正在开始，这些情形都是革命潮流将要高涨的象征。

总之目前的革命潮流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它虽然受了相当的打击，暂时不能有总的爆发，但他将因新军阀战争之开始而益愈高涨。长江局认为目前本党策略上主要的责任是继续广东未失败以前中央政策的精神，积极领导工农以及一般的劳苦群众反新军阀战争，聚集与扩大工农群众的阶级力量，加紧一般的劳苦群众的政治的宣传，加紧乡村中土地革命之发展，创造一新的革命的大潮，准备一夺取政权的总的暴动，但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

在这一总的策略之下应即执行下列各项具体的工作：

一、长江局所管辖之下的八省，在最近的时期各省均须特别举行一总的全省动员的反新军阀战争的宣传周。在这一宣传周中指明新军阀战争之内幕，国民党之反动，工农以及一般劳苦群众必须靠本身的力量发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才能铲除新旧军阀，才能解除压迫。在这宣传周中各省委均宜用

本党某省委名义发表宣言，这一宣言必须罗举新旧军阀统治下工农群众被压迫的事实。

二、在宣传方面除反对新军阀战争鼓动土地革命外，须加紧苏维埃政权意义之宣传。

三、积极发展土地革命，目前主要的争斗方法为实行与扩大游击战争，各省并须依照各省农民组织力量与敌人空虚的情形，划成若干区域，动员大批党与团的同志前往指导，占据县城或割占数县以为各地土地革命发展之村镇。

四、加紧大的城市如长沙、武汉等工人的经济争斗，秘密工会的组成，并开始工厂作坊委员会之建立，反对与消灭反革命的改组委员会等工作。

五、开始兵士中的宣传，其方法为个人谈话、拜把、发通俗的小传单、联络伤兵并开始注意敌人军队中重要部分（如手枪队、炸弹队、机关枪队）的破坏。

六、准备在战争区域内夺取敌人的武装。

七、发展党员与团员的数量与质量，吸收大批新的工农革命分子入党。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瞿 秋 白

（一）革命是低落吗?

中国革命经过了三次失败：一、四月十二日蒋介石的反动，二、七月间汪精卫的反动，三、十月初叶贺[1]南征广东的失败。但是，中国革命是否因此而完全失败，完全消沉呢?固然，中国国民革命战线之中，资产阶级几次陆续的退出革命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豪绅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势力扩大起来，小资产阶级的上层由动摇犹豫而终归走入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因此，整个儿的国民党，从革命的各阶级联盟变成反革命的官僚政客军阀工贼土豪乡绅的党，所谓清党反共，便是从这革命联盟之中将最革命的力量排除出去，将工农阶级摈弃，所剩的只是一切种种的反革命势力，自然，国民党变成完全反革命的政党。固然，如今是这个反革命党攫取了政权和北方旧军阀分治中国，他们共同一致的屠杀工农摧抑革命，但是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何以呢?革命潮流的低落与消沉，在现时的中国必须有三个条件：一、反革命的统治能相当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严重问题（如土地问题、劳资问题等）；二、反革命的统治能够逐渐稳定；三、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五期。

革命的群众溃散而消沉。如今事实上中国绝对没有这些条件。再则帝国主义虽然利用国民党的反动而逐步进击中国，但是他自身并不能在世界范围之内战胜社会主义的革命——苏联的国家日益巩固，而且他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日益发达。帝国主义自相冲突没有能力协助中国反革命的势力稳定他的统治。

如今反革命的统治绝对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与民族解放的问题：土地问题上，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及减低债息至百分之二十，算是国民党的改良政策，实际上丝毫不能实现——豪绅地主正在当权，他们根本不许农民少交一粒米，少得一个利钱，他们遇见减租运动便动手屠杀农民，至少，他们也要退佃，使佃户根本失业，他们遇见减息运动，至少也要拒绝放债，使贫民根本没有法子度日。劳动问题上，就是极端改良主义的劳动法也不能实现，工人的工作时间正在延长，工资正在减少，生活程度日益低落，全国的财政金融大紊乱，全国极大多数的工农贫民的革命需要只有更加剧烈起来，阶级斗争已经走到最剧烈的程度，成为公开的武装的斗争。民族解放问题上，关税不能自主，租界不能收回，外国资本的竞争不能遏止——这都是显然的事实。

如今北方从直隶山东起一直到南方的广东广西止，不论是国民党也好，非国民党也好，是蒋介石派也好，非蒋介石派也好，都在军阀的纠纷冲突混战之中。每省都有若干派别互相争夺，互相战争。豪绅资产阶级的内部纷争，而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也是显然的事实。

再则，七月间武汉反动之后：武汉的总罢工立刻便起来，九十月间鄂南湘东农民暴动，广东各县的农民暴动，山东、直隶、河南、陕西、安徽，无处没有农民暴动；最近，叶贺失败之后，广州工人还是直接起来奋斗，十一月初江苏的农民也暴动起来。暴动的民众一动手便是杀戮豪绅没收土地，他们彻底

的感觉到非自己拿着政权不能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一丝一毫，非举起武器来不能取得政权！斗争形式的剧烈到了极点，并不因为受着屡次的大损伤而消沉。这更是很明显的事实。

可见国民党虽然偷取政权而背叛革命，但是他并不能消灭革命。革命仍旧陆续的爆发，革命仍旧继续着。最近半年以来革命虽然受历次的打击，而已是很严重的打击，然而革命的发展仍旧是继续着。事实已经表示得很明白：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

（二）国民革命完了吗？

国民党偷取政权而变成反革命的政党，中国工农民众的革命潮流立刻便向着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道路。这是不是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完结了，从此开始了第二次的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呢？不是的。国民党是背叛革命，并未完成国民革命，而且还是取消国民革命已得的胜利，帮助着统治势力的复辟。“第一次”革命并没有完成而是中断，根本上无所谓“第二次”的革命。国民革命的任务，至少应当是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推翻封建式的剥削。如今事实上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立刻投降帝国主义，不但一条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废除，反而将工人所夺回来汉口九江租界都要交还英国，他们立刻造成千百军阀分裂宰割中国的局面，军阀的大混战的局面。中国不但没有统一，而且比以前更加混乱，财政交通不但没有统一整顿，而且比以前更加紊乱——绝对没有发展自国工业的可能；资本家地主对于工农的剥削更是日益加重，生产状况显然退化，尤其因为豪绅资本家的榨取利钱不能在发展工业方面去图

谋，于是他们都只在竭力加重对于土地的剥削，买田买地，加租加税——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不但不能废除，反而更加厉害。中国革命中民族解放及民权主义的任务，丝毫都没有解决，没有实现。因此，可以断然的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并没有完。中国的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且必须工人阶级负起全副的责任，联合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农民，来实行。中国的资产阶级根本是懦弱妥协的，他一遇着民众的革命高潮，立刻便转入反革命的营垒。固然，他们想着以为可以用改良的方法，稍稍和缓工农的革命情绪，稍稍哀求帝国主义放松些侵略政策，这样可以避免工农的社会革命，同时还可以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但是这始终是幻想。中国资产阶级自己本身非常之薄弱，他们对于工人的待遇根本不能实行丝毫的改良，更不能劝豪绅地主改良土地关系，帝国主义也无论如何不能放松侵略政策。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工业的不发展，自己大半和土地的剥削相关联，自己大半就剥削农民的重利资本，自身大半要倚靠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与民权主义的任务。只有工人阶级能勇猛的彻底的推翻中国的旧社会关系，彻底的领导农民消灭地主阶级，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

所以中国革命虽然现在已经是要革国民党的命，已经是工农的革命，然而他的任务仍旧首先便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彻底的土地革命，本来是民权主义的性质；只有彻底的革命——铲除中国的半封建的土地关系，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几万万农民的一切种种走狗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

（三）中国革命只是民权主义的吗?

中国革命中民权主义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中，方能实现。可是，即使为着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着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何况工人阶级自身既是革命的领袖阶级，他便不能不在革命斗争之中，力争自身利益的保障，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最近一年来工人店员力争改善生活状况的斗争，其势不能不一直要求到监督工厂管理，参加管理店务之事实，便是证明；城市之中这种工人的斗争不能胜利，乡村中农民的斗争始终不能超出游击战争的限度而得到巩固的胜利，乃因为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中国革命要彻底推翻旧社会关系（半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何况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胜利了已经十年，全世界是资本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相对峙的形势。中国革命势必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结，而在中国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所称为由民权主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最明显的实行。中国革命根本上不能在民权主义的阶段上再成一个段落，像法国大革命似的；中国只有一个革命：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

总之，中国革命，不论是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质上，都是无间断性的革命，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的革命，仿佛革命之后，只开辟些“民治气象”得着纯粹资本主义的，更是不对。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PDG

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

一、目前的政治任务

广东的政局最近又发生了一个变化，表面是两广实力派彼此争夺广东地盘的军阀之争，但实际上仍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影响，动摇了统治阶级两广派在广东的政权。工农革命高涨的事实，只要看叶贺[1]军队来到广东前，广州、汕头、海陆丰、南路各地工农在城市乡村自发的暴动，以及叶贺军失败后，广州市工人犹英勇地自揭反政府的旗帜为流血的斗争，海陆丰农军与叶贺残余的力量会合而为工农革命军，扩大农民暴动，进占了海丰县城及汕尾、碣石等海口，便知广东工农群众之自发的暴动正在继长增高的向前发展，走向会合各地暴动成为总暴动的途径。因为工农在各地暴动日益摇动广西派的统治权威，于是广东实力派张发奎、黄琪翔、薛岳等，便挂着左派的头衔，想乘机推翻李济深、黄绍竑，以骗得革命群众的同情。其实，这一个企图已经事实证明其为空想。广州公安局长朱晖日对于革命工人的捉拿屠杀，张发奎系军队在东江对于农民的压迫，革命的工农早就承认国民党现已无什么左右派之分，只不过是些个人利益不同的派别，而张发奎系的广东实力派更与李济深、黄绍竑刽子手没有分别。并且李济深、黄绍竑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

之被排挤，张黄等是利用广东军人反对广西军人的观念做成的，这种省界的观念特别在广东买办商人豪绅中发达。而李黄等最近在广东的剥削，也实有许多与广东商人利益冲突的，故李黄等广西买办地主阶级与广州银行资产阶级间之利益冲突，更是张黄等广东军阀此次倒李运动的经济依据。又此次政变与沪宁路上浙江、广西两实力派之冲突亦不无线索。因此，中央很肯定地指出：广东实力派若果掌握了全广东的统治权，则其对工农的屠杀压迫决不亚于李黄时代。广东工农群众尤其是本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若有丝毫依赖张黄等实力恢复工会、农会的心理，或在不知不觉中犯了赞助此次政变的毛病，其影响都是发展机会主义的遗毒和阻碍工农暴动的进行。广东工农群众在此次政变中唯一出路，只有利用这一政变的继续战争机会，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央更提议下列具体办法，训令广东省委迅速施行：

（一）广东省委应发表宣言，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以反对两广军阀的私人战争。

（二）广州市工人应站在阶级的利益上，自主地公开各地革命工会组织，召集产业的、职业的、地域的工人代表会议（苏维埃制度之开始），开始一切斗争，实现各项要求，捣毁反动工会，杀死反动领袖，直到形成全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以夺取政权。但当争斗期中，各工会原有之秘密组织仍须严格保存，并在罢工期中利用罢工机会，建立工厂、作坊委员会之雏形。

（三）海陆丰之工农革命军应号召农民群众尽量扩充志愿兵额，利用陈济棠、黄琪翔军队在东江的战争，或因陈、黄军

队集中东江作进攻惠州、扑得广州之计划。但此项计划实施时，必须使工农革命军沿途号召农民，杀死豪绅，分配土地，以扩大土地革命。

（四）广州三条铁路的反动机工领袖，须在此政变中号召革命工人自动铲除并夺取铁路管理，以响应广州市工人罢工运动。

（五）广州市郊及中路各县农运，须注意各地暴动向广州方面之会合及水陆交通之破坏，与各乡村暴动之蔓延相并而行。

（六）广东南路海南的农暴已在各地蜂起，目前所最注意的是怎样使这些暴动能获得农民群众之广大参加，形成割据一隅的工农政权，破坏统治阶级的统一局面，同时须积极根本改变乡村中之一切应有关系。

（七）广东的北路、西路两广实力派目前战争的所在之地，这两处农暴应使之发动为破坏军阀之主干，不当拉夫，不卖米粮，破坏铁路河运，截留两方谍探，煽动两方军心，夺取军队武装，并引导兵士离开队伍而加入农民革命军，以扩大并巩固农暴在这一个区域的胜利。

（八）退在江西信丰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即二十五师），宜迅速使之开往老隆、兴宁、五华一带，与当地农军会合，以开展五华、紫金等县的农暴。

（九）在全省各县工农暴动中，各主要城市的工运以及各县的手工业工人，都须同时兼顾到，并宜使之为自动的发动，由经济斗争或是全部分的政治斗争，发展到全城暴动。

（十）依据本党军事运动的新方面，广东省委应训令所有军事同志，极力向军队下层活动，并设法煽动士兵使之在战争中哗变反抗，散入农民群众中，成为农民革命军。当其战争溃败时，宜领导农民夺取武装，武装自己。

（十一）总之，目前广东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极好机会。广东省委应全体动员进行这个运动，并且于每一个策略的决定，都要注意到此次扩大会议各项条文，务使之能得到充分的实施。

二、宣传教育方面

（甲）把此次中央决议案切实训练同志，务使根本扫除旧有机会主义军事投机等倾向，确定其新的观念。

（乙）广大的普遍的宣传土地革命及苏维埃政权，以煽动工农群众起来，实现土地革命及夺取政权。

（丙）反帝、反军阀、反汪[2]、反国民党的宣传，要深入群众，要揭破汪及国民党的假伪的反帝运动。

（丁）为实现以上三项宣传煽动教育工作，应有：

（1）党内训练刊物及训练大纲，解释中央政策与决议及省委之决议。

（2）翻印及传播中央的刊物——《布尔塞维克》。

（3）省委须有一定期对外刊物，以发表其政治主张，号召群众到共产党旗子之下来。

（4）适合工农群众之标语，务须普遍张贴。

（5）各县市区委、支部、小组，须开会讨论中央政策及省委议决，派往各地工作同志须受短期训练，使明了新政策之真义，各地须派负责同志前往解释。

三、组 织 方 面

（甲）巡视员制度须切实督促、实行，其工作如下：

（1）审查各地党员，重新登记。

（2）调查各地党部，改组或加强之。

（3）发展党员及建立新党部。

（4）召集会议解释政策，使各地党部明了及议决拥护。

（5）巡视员同时为省农民协会之特派员，担任恢复加强及发展各地农会。

（乙）省委组织广州、香港市委组织部委员及各区巡视员，组织省委，组织会议，讨论批定一切关于组织事宜。

（丙）党员重新登记，党员除失业者外，一律须交党费，并举行增加党员运动。

（丁）支部书记及小组组长，逐渐一律行选举制。

（戊）中央及省委之政策，必须使各县、市、区委、支部小组开会讨论。

（己）提拔工农分子实际参加指导工作。

（庚）建立乡村支部指挥农民运动，须改正以前个人指导之办法。

（辛）加强工厂支部。

（壬）建立军队中之支部。

（癸）派一部分罢工工人，分配到各地做农民军队及党的工作，派出以前须给以相当训练。

四、工运方面

（甲）对于目前政府压迫罢工工人或工代会工人，必须以全力反抗。

（乙）依照中央会议决议，制定工人要求大纲，提出广东工人之总要求（惟须对工人说明只有工人得政权后才能实现）。

（丙）职工运动须有其独立的工作，与党的工作分开。

（丁）需有秘密工会之组织，会员有会证及须交会费。

（戊）在斗争中及可能时，必须设法使工会有公开组织，但同时须保存原有之秘密组织。

（己）各地工运亦须有巡视员派去指导与审查。

（庚）筹备在两个月内召集全省工人代表会，组织全省工代会。

（辛）注重机器工会工作，煽动其群众做经济斗争，反抗其反动领袖。

（壬）工人宣传品应改良，使适用于工人群众。

五、农运方面

（甲）恢复、加强及发展农会，使农民都组织在农会之下。

（乙）省农会应派特派员（即党的巡视员）赴各地指导，但各地农民运动务使完全受当地支部及县、市委之指导，免除过去个人指挥之弊。

（丙）即刻筹备在二月内召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重新选举省农民协会执委。

（丁）做农民运动的同志应多派工人去。

（戊）党的巡视员应为农委委员，农委委员须有多数农民同志。

六、军队工作

（甲）反动军队中应做广大的反军阀工作。

（乙）派遣同志及工农分子到反动军队中向兵士及下级干部工作，以破坏其军队，须根本改正以前上层勾结军官之军事行动。

（丙）应提出兵士要求，如改良生活，发欠饷，组织监督

军饷兵士委员会等。

（丁）取消广州暴动委员会，统一于市委，市委指定军事同志一人或三人专做对工农军事训练之工作。

（戊）省委下设一军委，以熟悉军事同志组织之，为省委之下之军事计划机关，改正以前独立工作之弊。另于省委下设一反动军队运动委员会，专门行理破坏反动军队、组织士兵群众之工作。

（己）对自己的军队必须设法完全改为志愿兵制度；停止薪饷制度，改为公有分配办法；军队编制须依照红军的编制，自上至下设党代表。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2〕指汪精卫。

PDG

中央通告第十六号*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此次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召集的时期，正是九月两湖农民暴动失败及叶贺[1]军队与广东农民暴动失败之后。武汉反动、本党八七会议以来，革命力量在三省（湘鄂粤）农民暴动及叶贺南征之中的继续兴起，又受着挫折。这种挫折的原因，主观上大半是由于我党各级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的遗毒。此次中央会议的主要任务，因此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此次大会的主要精神可以说是继续完成八七会议扫除机会主义的任务，彻底重造我们的党，并更加确定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的路线。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如下：

（一）考察中国的现状，指出国民党新旧军阀之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根本不能稳定，根本不能经过任何改良政策而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本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民权主义与民族解放的任务。所以中国革命客观上必要是继续发展，要由工人阶级领导极广大的农民群众，实行平民式的彻底的土地革命（完成革命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十三期。

中国革命是无间断性质的革命。

（二）因此，本次会议所以定出土地问题的党纲草案，确定的指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歼灭一切豪绅的权力及中国旧社会关系。指出工业国有的党纲上的要求，指出工人要求实行完全的监督生产，工厂归工人管的口号。指出暴动的工农民众应当建立自己的军队，破坏军阀的雇佣军队，吸收一般兵士群众加入工农暴动，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指出工人阶级今后更须努力领导一般反帝国主义斗争；提出取消一切外债，收回一切帝国主义攫取的特权、租界、海关、税务等等。综合起来，便是指出中国现时革命的发展，已经直接的要求我党提出“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口号，明显的定出推翻新旧军阀国民党政权，而建立中国“劳农政府”之目标，必须由我党率领工人阶级与农民夺得政权，建立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府，才能解放工农民众，才能统一中国，而使他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

（三）客观上工农民众虽经最近历次的失败（叶贺之败及两湖广东农民暴动的不能胜利），然而各省反动军阀自相混战，同时工农的斗争仍是日益爆发（直隶、山东的农民暴动，最近江苏宜兴、无锡、江阴、苏州的农民暴动，上海、广州工人斗争的兴起，两湖工农的艰苦斗争……），显然证明革命并未低落，而正在高涨，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在速度上，也是有无间断的性质。现在虽还不是全国工农总暴动立时爆发而有必然胜利之形势，但已经是工农民众四处自发的奋斗起来，有汇合而成较大范围内的工农总暴动夺取政权之趋势。

（四）于是我们党的总策略，便是：一、发动农民间潜伏待发的暴动，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努力使农民自发的暴动有最大的限度的组织性；二、发动扩大产业工人、手工工人店员之日常经济斗争，引导这种斗争使发展而成广大的城市劳动民

众的革命高潮，一直到武装暴动；三、联合工农暴动的力量，汇合各处自发的工农暴动，夺取政权——一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

（五）因此，必须坚决的率领民众实行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坚决率领农民实行耕地农有——自动手（平民式的）夺取土地，坚决率领工人力争改善日常生活，从减时加资改良待遇，一直到要求监督生产。这些日常斗争必须切实的领导，发展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一直到夺取政权之清楚的认识，鼓动他们自己起来武装暴动，建立劳动民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

（六）关于日常的革命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则根据过去之经验及机会主义遗毒之教训有详细的说明，要知道在如此革命暴动无间断的爆发过程中，能否汇合而有较大范围之胜利，全靠本党的指导是否完全脱离机会主义而言，是否本党各地党部全力去发动当地群众，创造群众力量，不存依靠某某军队等机会主义心理而定，所以特别指出并纠正策略上可能的错误倾向：一、忽视城市工人店员等的经济斗争及城市的暴动，或者等待农军来解放工人，或者仅只视城市为军事上响应农民暴动之力量；二、农民暴动中专靠武装的力量（农军），甚至专靠杂色军队土匪首领的力量，而不发动群众，不执行土地革命的根本任务（杀戮豪绅，分配土地等等）——这是军事机会主义之第一种；三、对于农民自发的暴动，认为过早而不去领导，甚至阻止群众的革命行动，只想着有组织的“自己”军队的力量的发动与行动，根本不顾群众；或者群众方面很少去注意发动，只想一面军事上的发动，因而在群众中暴动情绪尚未成熟之时过早的发动，徒然做孤注一掷的牺牲——这是军事机会主义的第二种；四、农民暴动之中只注意领着武装势力去扑城，甚至完全不考察敌我军力方面的战术，以夺得县城，

固守县城，为暴动之唯一目的，以取得县政权，发布告没收土地为土地革命之唯一方法，同时却忽视乡村中的土地革命工作，不去更多更广的发动乡村群众，不去率领他们肃清暴动沿途乡间的一切豪绅反动势力，不去率领群众自动手的解决土地问题，这当然亦是军事机会主义（上述关于乡村的几点，自然同样的关系到城市暴动）；五、城乡暴动之时，对于小资产阶级多所顾忌，惟恐惹起反感而想保存安宁秩序，其结果，可以对于豪绅工贼反革命，采取犹豫动摇不坚决之政策，同时对于一般工人贫民群众反而远离，反而要限制或禁止其革命行动；六、因为对于武装暴动有一般的军事机会主义的错误观念，而只注意军事技术的工作，或只是等待暴动时机之降临，对于工人的职工运动部分斗争渐加忽视，对于农民自发的部分要求不加领导，总之，这是不知道本党只有努力去领导这种日常斗争，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上去，亦是很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倾向，此次会议的决议已经明白指出，应努力的纠正避免。

（七）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则指明：农民暴动的游击战争应尽量的发动，以秘密的农民团体所组织的革命委员会指挥之，尽可能的摧毁一切豪绅的权力，一有固定的革命地域，即须建立农民代表会议的革命政权。城市之中则须于革命委员会或其他暴动的指导机关发动之时，即尽量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机关，使能在暴动爆发的胜利之后，很快的变成苏维埃。农村与县市之间的暴动必须努力团结势力而联合起来，从游击的暴动进于建立革命政权并向外发展的局面。

（八）关于军事运动有更新的决定：应将极大部分的力量，用到兵士方面，从提出兵士切身要求，运动兵士反抗反革命军官，一直到参加暴动，令极下层的兵士群众发动起来，并且派代表出来参加暴动的指导机关，以至于加入苏维埃。其他的军

事工作完全更以这一方针为目标。

（九）至于组织方面，则认定本党目前主要的任务是造成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党，没有如此的党，客观的革命潮流无论如何伟大是不能胜利的，即使胜利也不能真正巩固革命的胜利而自发展。本党目前急迫的任务便是：一、建立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上的健全干部与下层基础（党部组织之集体化、工人化，巡视制度自中央至地方的实行，工人、农民、兵士等支部之确实建立等等）；二、建立布尔塞维克的中心思想，各地负责同志参加中央党报（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各地地方党部对中央党报定期通讯的责任，依照新的方针，在党的群众中公开讨论党的一切政策，并于中央党报上讨论。

（十）关于职工运动则特别组织一委员会，有专门的决议案，尤其特别指明的，便是建立广大群众的革命工会的系统，注意恢复发展全国的海员铁路工作。

（十一）最后，此次会议实行整饬政治纪律，对于不坚决的执行布尔塞维克的策略，甚至故意违背中央命令，以及显然有叛党行为的党员，都有明显的批评与分别的处罚。

总之，此次会议所给的总路线，是非常之重要，与八七会议同样是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关键，各级党部接到此次会议的议决案，应当本着这次会议的精神，切实执行党的策略和组织上的整顿工作。

中　央

十一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广东通信）

——海陆丰工农兵的大暴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张　闻　天

自国民党公开的背叛革命以来，到处屠杀成千累万的工农劳动民众，而一切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亦更穷凶极恶的加紧其剥削压迫，使中国所有劳苦民众，完全的处在惨淡哀号的痛苦之中。但是这种屠杀剥削的结果，并不能丝毫的镇压工农劳动民众革命情绪的高潮，反而使一切工农劳苦民众更明确的彻底的认识国民党是屠杀工农贫民的刽子手，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是工农贫民的唯一的大敌。工农劳苦民众彻底的觉悟，尤其是广东的贫苦的民众，知道只有工农民众团结自己的力量，自动手的杀尽豪绅地主，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彻底的解决土地，组织自己的武装势力，建设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尤其是共同团结在共产党旗帜指导之下，才有解放的可能，才能获得工农民众的真正利益。

广东工农贫苦民众，经过长久的斗争，尤其久在代表工农民众的真正利益的共产党指导之下，对于中国工农革命的前途，有极明确的认识，彻底的了解，所以当国民党开始叛变之时，即首先喊出“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我们的革命旗帜是工农的镰刀斧头红色旗”的口号，而继续不断的作极英勇之斗争。

广东的海陆丰，此次的伟大而普遍的农民暴动，英勇斗争，推翻了反动势力下的统治，杀尽了豪绅地主阶级，没收了一切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建设了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实开中国革命史上光荣记载的伟大革命前途的新纪元。兹将海陆丰农民之英勇斗争与暴动之经过，简述如次：

一、暴动的准备

海陆丰农民，并不因在反动势力严重压迫之下，而停止其斗争，尤其自四月十五之后，更无日不在积极反抗之中，如杀戮豪绅地主，破坏反动势力之一切交通行政，以至抗捐抗税等等的经常的斗争。固然这样使豪绅地主阶级更加加重的剥削和压迫，但是同时也使豪绅地主恐慌危惧。

一个重要的时机到来，真正革命者，是不肯放他空空的过去的。所谓抱住时机，是革命者极宝贵的信条。伟大的十月革命纪念到了，尤其适在这时，广东张（发奎）李（济深）的冲突已由暗斗而开始明争了。海陆丰的农民一面为纪念这伟大的革命纪念，同时为利用军阀冲突，亦即统治阶级崩溃的时机，遂准备和开始有计划的暴动。因为这时适当张发奎解决惠州胡谦的事件发生，很显明的是与李济深反脸的第一幕，驻防在海陆丰的李部陈学顺，决不能留在海陆丰以自取灭亡，同时农民的收藏时期已到，豪绅地主无理性的剥削，当然引起农民的反抗，于是遂有由经常的斗争，而变为伟大的暴动之准备。当时的暴动的准备是：

（一）全海陆丰所有武装农民都起来攻打反动的武力（民团保安队等）及占据城区。同时屠杀豪绅地主，并事前分别在各要道上分别截击搜捕。

（二）作战步骤先区乡，后县城。海丰方面，以梅陇、赤

石农军占领梅陇，公平农军进据公平圩，东南五区联合大队占据青坑区进迫汕尾；陆丰方面则以西北部农军据河口及大安，东南各区农军占据金厢，围攻碣石。

（三）武装军队（第四团）除留守部队外，均出而帮助农军作战，以缴反动武力的枪械，并歼灭其实力。

二、反动军队闻风先逃

农民暴动的准备正在计划，而反动军队已闻风立即逃遁。驻海陆丰的防军陈学顺部急于十月二十九、三十日两日内调集陆丰、公平、汕尾部队到海丰，很显然的预备退避。当时一班豪绅地主及商人见此情状恐惧万分，极力的挽留并电请李济深下令勿予调动，同时用种种谣言以冀反动军队之停止开动，以作为保护身家的工具；但是陈部终因恐惧自己的覆灭，终于不敢一息的停留，于十一月一日抱头鼠窜的由县城退梅陇而赤石而吉隆逃去。农军因特别关系，未曾将其截击缴械，实在是可惜的一回事。自陈部逃遁后，当地的保安队四百名，更形吓得屁尿直流，纷纷的乘间逃跑，其未逃跑，一部往海丰，一部往捷胜退避，以图保存实力。于此我们可以知道反动的武力之怯懦恐惧，与民众力量之足以屈服一切反动的势力了。

三、暴动的爆发

农军革命情绪的高涨，反动统治势力的动摇和崩溃，与豪绅地主阶级之危惧，都使暴动急剧的爆发。海陆丰广大的农民贫苦群众，即于十月三十日开始英勇的斗争，而形成空前的伟大的暴动。为便于叙述起见，特分别的记述如次：

（一）占领海丰之经过　自逆军陈部于二十九日调集部队

逃避，公平农军急联合第四团之一营即围攻最反动之乡广村，捕杀豪绅地主数十人，焚去逆产房屋十余间，并占领公平圩，于十一月一日长驱直进占领县城，捕杀反动派多人。同时梅陇农军亦即时分头围捕豪绅地主三四十人，当即就地枪决，大快人心。海丰东南五区联合大队于三十日晚上占领汕尾，反动派因得信较早，故多早已避去，只捕杀少数反动派。此外除捷胜外，其余海丰各处都给农军占领，并捕杀一切豪绅地主。农民贫苦群众，无不踊跃争先恐后的参加。

（二）占领陆丰之经过　陆丰方面，西北部农军三百余人，于逆军陈团未退出海丰以前，已占据了大安及河口之一部。当时河口有百余名保安队，陆丰县城亦有二百余名，与第四团之一营交战，一时未能击退，后农军冲入县城，保安队遂向碣石城溃退，于是陆丰县城遂入农军之手。

（三）围攻碣石的经过　在未占领陆丰县城以前，即决定东南各区农军集中起来占据金厢进攻甲子。所以第四团到时，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通通都到阵地上来，由领袖激昂的说了一番此次暴动的意义后，所有的农民更奋臂兴起，大声叫道“很好！”“很对！”杀气腾腾的奔向阵地，与反动势力作战，反动势力亦极力顽抗，经几次的肉搏，终将碣石占领了。

（四）攻打捷城的经过　捷城的农民于这次暴动，可以说通通的起来了。他们高呼杀尽豪绅地主，为平民复仇的口号。但因保安队的死守（因为他们无逃生的出路，所以不得不拼命的死战），所以双方支持了好久，一直至海丰县工农兵代表会开幕时，始决定由第四团派兵一营前往助战，决定十九日攻下捷城。当该军出发时，全体代表、军乐队及工农群众，均欢跃高呼欢送，兵士受工农之激昂慷慨的奖励欢送，竟连夜开到捷城，会同农军共同作战。十九日上午八时，遂分三面攻城，第四团派去的一营担负北门，公平、梅陇、捷胜的农军担负西

门，东南各区农民担负东门，仅二小时，北门部队遂先登城，西门亦同时爬城，捷城遂被攻下，入城后即缴械数十支，大捕豪绅以及反动派，处以死刑。同时农军即将捷城掘平，捷城既下，于是海丰全县，可说完全到农民手中，没有一个反动派了。

（五）其余河口、碣石各处的反动武力以及豪绅地主，亦均先后由工农贫苦民众铲除搜捕殆尽。农民伟大的暴动，虽然似乎告一段落，但是农民的英勇斗争，将更加高涨发展而未有艾的。

此次伟大的暴动，杀人更攻城，完全由工农自己为主力的斗争，第四团的武装，完全仅在协助之列，完全系工农民众自动手的斗争，而毫无军事投机的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

四、暴动后之种种

（一）搜杀豪绅地主及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有阶级觉悟的海陆丰的农民，有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的海陆丰农民，对于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势力之尽性搜捕杀戮，在此次暴动中及暴动后，更加显明的表演出他们彻底的阶级性了。自海陆丰先后克复后，工人农民及一切贫苦民众，第一视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自动手的铲除一切剥削阶级的势力。他们毫无顾惜的搜捕各处的豪绅地主及重利盘剥者。他们完全站在阶级观点上，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以为好恶生杀的标准。这种情景在海丰方面，尤为加倍的彻底。所以在海陆丰境内，可以说差不多没有一个豪绅地主的踪影了。

（二）土地农有的分配

没收豪绅地主的一切财产，没收豪绅地主的一切土地，土

地给耕种的农民等等，在八月间海陆丰第二次暴动时，已宣布得很普遍了。此次伟大而普遍的暴动，对于没收土地财产的工作，更进一步的解决。这次的没收土地，不仅仅是大中地主加以没收，即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没收之后完全分配给原佃农及自耕农。当然这样的办法，对于佃农是很圆满的得到十二分的利益，同时自耕农也没有若何的损失。至对于从前依靠田租为活的寄生虫，自然不客气的叫他滚蛋了。至土地的分配，则县苏维埃政府发出土地使用证给一切得地的农民。土地使用证的内容如下。

第一，注明某区某乡某人所佃耕或自耕之土地经由本政府没收，兹特给与该农耕种。

第二，注明有土地使用证，才能享受土地使用权，此证不得自由卖买及抵押，如该证遗失，即须报明县政府补发。

现在海陆丰土地，都是这样的由县苏维埃政府发给农民，并极力打破农民从前以为土地是应归地主所有的错误见解，而宣传：“土地是天生成的，并不是地主造出来的。地主之占有土地，完全由强夺掠占而来。农民应坚决的以自己的力量无条件的向地主夺回土地，土地一切之使用权、收获权、享受权，均应全部归耕者的完全享受。”因此海陆丰的农民，深信阶级的彻底争斗，只有根本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

（三）焚毁一切契约债务关系

封建社会的契约关系，是豪绅地主阶级，借此以强迫农民自己出卖自己，同时重利盘剥者的债务关系，亦同样的是豪绅地主加紧剥削一切劳苦贫民群众血汗的保障和工具，要彻底的推翻豪绅地主的凭借，就是要根本毁灭一切契约债务关系的遗毒。海陆丰农民在这次暴动的运动中，除了尽性的杀戮豪绅地主与没收其土地财产外，其次就是很彻底的勒令交出一切田地

契约债务文契，并限令于三日内送至县苏维埃政府汇齐登记当众焚毁，否则一经发觉，杀无赦。于是所有田主除已逃跑者外，莫不战战兢兢的将数百年的契约送到苏维埃政府，以求免罪。对于一切债务关系亦均消灭无遗，尤其关于所有当铺，更尽量没收，所有一切金器财物，都令持票认回，免于赎取。贫苦民众，闻之狂喜，凡当铺中所有当入的衣服器具，均于数日内认回。数千年封建社会里之剥削阶级所借作剥削的唯一利器，此次海陆丰可谓摧毁无遗，真是快事！

（四）组织各乡赤卫军，编练工农革命军

固然，海陆丰的伟大暴动，推毁了海陆丰一般地主豪绅统治势力。但是豪绅地主，时时有乘机反攻的可能，尤其在整个的反动势力没有完全摧倒之前，地主豪绅无时不有报复的机会和可能。所以海陆丰一克复后，东江革命委员会，为镇压反动势力之复活与巩固苏维埃政权起见，即开始招募志愿兵，先在海丰招足千名，入伍期为一年，农民可以携枪入伍，退伍后仍准带回。布告一出，应募者接踵而来，可见农民对革命委员会拥护和服从之热情。革命委员会以应募者之过多，于是遂决定各乡则组织赤卫军，为乡政府政治警戒之用，所有各乡武装农民，均编入赤卫军，轮流向乡政府服务。同时并由农军中挑选千余人，编成工农革命军，以作镇压一切反动势力及巩固政权之武力。

在叶贺[1]溃退时，所有枪械子弹，多分散在乡村中，为防反动派收买计，所以现在分向各乡村收买，一以裕军实，一以防落入反动派的手中。迄今收集者极多。

（五）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之成立

为求革命永久之胜利，为求工农贫苦民众政权之巩固，非

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是不可能的。所以苏维埃政权之建立，是海陆丰农民暴动后最重要的职务之一。苏维埃政府之组织，全县代表人数定三百余人，农民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工人代表占百分之三十，兵士占百分之十（但汕尾市苏维埃政府则工人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农民占百分之三十，兵士占百分之十）。代表产生之方法，是由农会按照各区人数多寡分配代表数额，由各区农民代表大会互选出来。工人则以职业种类及人数多寡分配代表数额，由会员直接选举出来。兵士是由集中驻防的农军和第四团分配代表人数，直接选举出来。海丰代表会于十八日开幕，陆丰代表会于十三日开幕，各开会三天，海丰各处农民工人以及贫苦民众在代表会开幕以前数天，都热闹异常，兴高采烈，如舞狮、歌唱、鼓乐……无处无鼓乐喧天，较之旧历新年的快乐，当更快乐得数百倍，人人喜形于色，欢呼欲狂。很明显的表现出他们以为既得土地耕种，又解脱一切债务契约的锁链，好像已至无上极乐之国场一般。到开代表会的那一天，更有一番特别的情景，自会场以至各马路以及各机关，都是红灯红旗红彩照耀满目，而各马路上的清洁齐整，均由民众自动的扫除得一尘不染，诚有天下升平万民乐业的景象。会场的布置，尤为庄严，中悬马克思、列宁的遗像，两旁则设军乐队及参观台，草地上铺满了席和松针，各处结满了红布的花结，到处都感觉到焕然一新的意义。

这个代表大会的意义：第一，使工农兵及一切贫苦的民众与各代表更明白的了解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第二，使一切代表，可以尽量的发表土地革命的意见，所以代表所说的话，就是只一句，也都把他记录下来，以作参考的材料。第三，使一切民众及代表明白此次没收土地，夺取政权，现在还不能说是胜利和永久的巩固，只有更积极的前进，更坚决的斗争，促各地农民的暴动一直到全广东全中国的工农兵起来没收

土地，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才有胜利的保障，才有巩固的基础。即使反动势力的反攻，我们绝不因之而恐惧而灰心，只有英勇的斗争，只有坚固的团结，只有死命的作战，终能得到最后的胜利。第四，使民众和代表更明白只有共产党才是彻头彻尾为工农贫苦而奋斗，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工农民众作英勇的斗争，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工农贫苦民众的利益，一切工农贫苦民众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才能得到永久的胜利和解除一切的锁链。

这次代表大会，除第四团兵士全体参加外，此外紫金、惠来、惠阳及陆丰农民，莫不踊跃来参加和庆祝，同时各地农民更能尽量的前来参与，并作热烈的庆祝。这个代表会确是中国空前的工农兵代表会，尤其空前的得到民众热烈的拥护，这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光荣历史！

在代表会的次日，并召集了全县工农兵大会，是日男女老幼，空巷而来，来拥护这真正工农民众苏维埃政权，到会者达数万余人，诚空前之盛会也！

（六）工农劳苦民众拥护革命委员会之热烈

农民此次暴动，受东江革命委员之指挥，得有空前的成功，工农贫苦民众，对于东江革命委员会拥护之热烈，真不可以言语形容。在海陆丰克复后，为拥护革命委员会热情所激动，都自动的努力筹款，不到十余日，海丰已解了二万元，陆丰亦达万元到东委去。同时为拥护工农革命的伙食起见，更成立了征收粮食委员会，每乡平均不过一担或二担，为数极微，农民在没收土地以后，对于此种征收办法，表示十二分的赞成和愿意，纷纷的争先恐后的输将，足见工农民众拥护之热烈了。

（七）工农贫苦民众的口号

工农贫苦民众，为促起更广大民众之争斗起见，对于宣传的工作，更努力的以求普遍。宣传口号大致如下：

“杀尽土豪劣绅地主”；“没收土地”；“一切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焚烧田契”；“拥护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革命的组织”；“一切武装农民加入工农革命军”；“一切工农加入共产党”；“打倒残害工农的国民党”；“拥护东江革命委员会征收粮食办法”；“拥护中国共产党”。

（八）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社会状况

苏维埃政府成立，确定了工农民众的自己政权，一切的剥削和压迫，都已解除无余，社会状况，自然进于较良好的现象。兹将民众各方情形，述之如左：

1. 工农方面：工农因得到土地取消债务，当然解除了他们铁的锁链，所以他们都是喜气洋洋的舞狮唱曲演剧以表示快乐和胜利，对于一切的工作，都很热烈的参加和拥护。

2. 商人方面：除了大商人的财产为工农没收不见踪迹外，其余中小商人的营业，反更兴盛起来，这是因为农民解除一切困苦和剥削，购买力当然的强大起来，自然很多很多的到市场来买东西了。

3. 小资产阶级的智识分子：阶级斗争的激烈高涨，一般智识分子如教员学生等，都感觉只有彻底革命和反革命两条路可走。这次海陆丰的斗争，一方因受事实上的教训，一方因受环境的支配，一般青年智识分子，都跑到工农革命的营垒内来了，有的请求加入共产党，有的要求到农会工会中工作，他们看见这种阶级剧烈的斗争，和对豪绅地主无情的杀戮，并不见以为骇怪，反而很表同情的说：“这是应该的。”

海陆丰工农贫苦民众的斗争，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生命，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尤其保障工农政权之永久胜利。这种阶级斗争的剧急爆发，工农贫苦民众之英勇奋发，证明了中国革命潮流之高涨。同时这种工农革命之高涨，残酷的杀戮豪绅地主，没收土地财产等，也就是红色恐怖对白色恐怖的酬答；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也就是工农政权，很快的消灭背叛革命的国民党的开始。从此青天白日旗是古董或是反革命的旗帜，而镰刀斧头红色旗帜将照耀于全球之上了。

这次东江农民大暴动后创立的苏维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埃，新的革命政权正由东江扩大至全广东，乃至全中国！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广州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的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八期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PDG

山东工作大纲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通告）

张宗昌两年来在山东的统治，完全建筑在对于工农穷苦群众极端剥削的上面。政府苛捐苛税的名目数十种，经过贪官污吏豪绅地主以取之于穷苦民众。张宗昌两年来剥削于穷苦民众的总数已达三万万元，实际加入经手人——豪绅官吏的敲诈，至少在六万万元以上。农民在这种敲骨吸髓的苛政下面日益穷苦破产，离开土地，或流落省外国外（从大连出口），或相率为土匪。土地从极廉的价格（每亩二元）集中到王占元、潘复……等军阀官僚大地主之手。城乡政权绝对被地主豪绅操纵，造成军阀豪绅结托的极端残酷的统治。山东农民两年以来对于这种残酷剥削的回答，除开一小部分流落外方外，最大部分农民则团结在抗捐抗税的口号之下，实行武装的反抗——自然爆发的武装暴动，红枪会、大刀会已经成了公开的武装组织，曹州、胶东、阳谷、范县及鲁北都经过极剧烈的反抗斗争，遭受了军阀极残酷的屠杀。鲁北西南旱灾达五十六县，饥民近二千万，成千成万的组织饥民团，现在到处乞食，同时胶东大刀会及阳、范农民的武装暴动尚在继续。全省农民对于新加的客军过境税，正亟亟图谋反抗——整个的山东农民已经可以直接的武装抗捐抗税发展到土地革命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的局面。

山东的工人阶级，在“五卅”前后经过英勇的斗争。青岛的纱厂工人在“五卅”中的斗争，不弱于上海，只因为山东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令之下，把他们残酷的压服下来了。现

在山东有产业工人十五万至十八万，其中主要的成分为四万到五万纱厂工人与四万矿工工人和万数铁路工人。纱厂工人最大部分在日本资本家的厂中备受工资刻薄与种种虐待的痛苦。矿工的工作时间在十二小时以上至十八小时，工资异常低微，还要受包工头的克扣，在牛马一般的待遇之下，一点也不许动颤，中兴的矿工则大部分因裁工而失业。一般的城市手工业工人，则和农民一样的受苛捐苛税的剥削不能生活。一般的厂主都利用工贼和军阀，以破坏工人组织、镇压工人的反抗。现在一般的工人革命情绪，虽比较农民落后，但工人的生活上身体上解放的要求则迫于眉睫。

纸币的低落（每元值二角）和工商业的凋零，影响到工农穷苦农民，一般的更加痛苦不堪，更加要走上革命的道路。

张宗昌的统治是否因此而稳定了呢？一点也没有，反而在日益崩溃的当中。连年的对内对外战争，财政上、政治上、军事上都到了极端紊乱的地步。特别是在孙传芳败退山东以后，屡次军事上的失利，直鲁军已成了强弩之末，直可以一跌而倒。

所以现在的山东，从工农力量的伟大高涨和军阀统治的动摇崩溃上说，是一个极利于革命——土地革命发展的地方。特别从农民斗争的剧烈进展上说，它在北方要居第一位。

可是我们的党，在这种利于革命发展的环境中，一点领导作用也没有过。党从“五卅”高潮低落后，即完全停顿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经过艰苦斗争的十数万产业工人，因为得不到党的领导，革命情绪曾经表现异常的低落。农民自发的武装暴动虽然彼仆此起的继续发展，也并没有得到我们党的领导。党的组织从今年以来虽然发展到一五〇〇人，而且工农分子占大多数。可是党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并没有因此有所改进。一直到最近在八七紧急会议的精神之下改组了省委，才开始一

点新的气象。但在政治上，工农斗争上，还没有得着比较正确的方针，党内的下层改造和工农群众中党的发动，也还没有有计划的开始。中央对于山东的工作，因为没有接到详细报告，不能详细规定，但大体有以下的指示：

（一）在组织上，第一要把“八七”以来中央反对机会主义的精神，和这次中央扩大会议的各种决议，立即传送到各级党部党员全体，使党员群众在这新的精神和策略之下回复其革命情绪。第二，要坚决的改造各级党部，提拔新的积极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撤换对于新政策游移、反对或消极怠工的分子。第三在此地革命斗争紧急的潮流中，要使每个党员成群众的组织者、领导者；这就是说要全体动员去领导工农斗争，一切游移不定的分子应毫不游移的开除出党。第四要从斗争中吸收党员，从农民暴动中吸收勇敢的贫农分子，从工人斗争中吸收勇敢的工人分子，特别是产业工人区域如矿山、纱厂、铁路要有计划的去发展党的支部。第五要严格的执行党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纪律。

（二）当此所谓北伐军向前进展、孙张军队向后溃退的时候，党在政治上应立即进行广大的政治鼓动，以向工农穷苦群众说明所谓“讨赤”、“北伐”只是军阀的混战，徒然加重人民的痛苦，说明国民党的反动和冯玉祥在河南的屠杀工农事实，民众不能对他们存丝毫幻想，只有工农自己起来反抗军阀战争，打倒一切军阀，实现工农暴动夺取政权，才是真正的出路。（参照中央对宁汉战争宣言）

因为如果国民政府及冯玉祥的势力到山东，一则他们将要同假工会假农民协会的欺骗压迫工农，二则他们的混战更加要破坏山东经济，形成更大的政治经济危机；所以党应当努力在现时便解释给工农群众，国民党的所谓北伐，只是发展混战，加重对于工农民众之压迫，只有工农群众自己立刻的发动起

来，解除这些杂旧军阀的武装（冯玉祥等的混战侵入山东境时，自然只有这种必要才可能），自己夺取政权，才能消灭混战，解放工农。

（三）在此“讨赤”、“北伐”的军阀混战的时候，山东工农群众整个暴动夺取全省政权，虽然因为党的领导力量的薄弱而没有可能，然山东省委必须认识目前山东的环境，是发动土地革命的极好机会，坚决的执行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所指示的策略，领导工农群众勇往直前的斗争。主要的办法：第一，有计划的领导自发的农民暴动，特别要集中力量在胶东、鲁北和东临几个区域，因为这些地方广大的农民或枪会群众正在起来斗争，同时我们的党也有相当的基础。对于鲁北近二千万的灾民，尤其要领导他们在当地实行把豪绅官吏杀个干净，并没收其财产救济饥荒。第二，山东农民自发的暴动以及红枪会、大刀会的组织，其起源都是为着反抗苛捐杂税而直接的反抗军阀的剥削，而把地主的压迫在农民的意识中反觉模糊。因此我们党的责任，不仅要去领导这种自发的暴动使成为较有组织的暴动，而且要向暴动的群众指明豪绅地主与军阀相互勾结的黑幕，说明豪绅地主为军阀政治的基础，使他们明白土地革命的意义，从自发的暴动抗税抗捐一直发展到实行没收土地夺取政权。第三，山东农民暴动在目前要采用游击战争的方式，防止农民暴动中的几种坏倾向（见扩大会政治任务的决议案）。第四，在城市上不能立足的工人同志以及中兴煤矿的失业工人，应当大批的到农民暴动区域中去领导暴动（如果真能领导暴动起来，失业工人的生活便可以解决）。第五，在暴动的区域要注意城市的准备，使成为暴动中心指导者。第六，要在最近期间制定最低限度工人经济要求的政纲，发展青岛、济南、四方山、枣庄及津浦、胶济两路的纱厂工人、矿工、铁路工人及重要手工业工人的经济斗争，建立工人阶级对于农民暴动的领导

能力。第七，立即分配积极的、勇敢的、有能力的同志到纱厂、矿山、铁路及其他重要工业中去组织秘密工会，建立党的支部。第八，省委应相信山东工人运动的复兴，应当从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经济斗争下手，反对少数同志不信任群众，要凭个人的恐怖手段去恢复工人运动的倾向。第九，反对客军过境捐，反对军用票，反对一切战争时的苛派勒捐，要求纸币兑现，反对拉夫封船等等口号，发动一般贫苦民众起来参加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

（四）山东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大部分的产业工人（纱厂、铁路）在日本资本家宰割之下，党应当抓住机会发动反帝国主义运动，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暴露新旧军阀卖国或方屈服于帝国主义之罪恶，以及国民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黑幕。

（五）关于军事工作，亦应遵照中央扩大会政治任务的决议案，创造新的军事基础。目前可以下手的：第一，继续派同志秘密打入军队警察中的工作，最好使工人农民有组织的并扩大投入军警队伍，去进行破坏分化反革命的工作；第二，乘军阀混战的时候，努力进行工农群众大规模夺取武装；第三，组织破坏反动军队委员会，其目的在破坏反动军阀而夺取其武装归为己有，或使其兵士起而杀其反动军队长官加入工农暴动。第四，对于红枪会、大刀会群众的工作，主要的是我们去勇敢的坚决的领导他们的抗税抗捐的暴动到底，使他们不信任他们的不彻底的、背叛群众的领袖而受我们的指挥，在我们的政纲策略之下成土地革命的武装力量。省委应坚决反对只联络红枪会、大刀会领袖，而不积极取得群众的机会主义的余毒；第五，尽可能秘密的进行工人武装组织。

（六）山东团的工作比党更坏，可以说等于没有，党应当帮助团之建立，特别在纱厂工人中童工占百分之六十，应当建

立极好的团的基础。

山东省委于接到这个工作大纲后，立即规定一个实行的具体计划，一面送中央批核。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刊印。

PDG

中共中央工作计划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决议）

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主要任务为严格的执行最近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使扩大会议决议的精神深入于党员群众中，坚决的改造各级党部，洗刷一切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党的成分，使党的核心建筑在工农的身上，如此才能使党成为一个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同时要特别注意恢复和发展各重要省份的工人运动，以及组织并发动各重要省份的农民暴动，创造新的军事工作的基础。而组织中央本身之强固的建立，以及引导各地党部走入组织之正轨，亦为中央目前之重要的工作。本此，特别决定出中央三月工作计划如次：

一、在总的方面中央在最近三月内应做到下列工作：

（一）严格执行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案。

（二）改选各级党部。

（三）特别注重重要省份的工作之发展与党的建设，并派人出去巡视和审查重要省份工作。

（四）注意各重要省份及海员、铁路、矿山的工人运动。

（五）领导与开展重要省份的农民暴动。

（六）创造新的军事工作的基础，建立各重要城市的工人纠察队，并扩大农民武装运动。

（七）扩大党的政治宣传的影响并铲除国民党在群众中的余毒。

（八）确定并创立各地对出版品的分配与翻印之计划。

（九）建立各重要产业中的党的支部并扩大其组织。

（十）党的通告决议等等要深入党员群众，使党的政策在非党群众中发生影响，并使党的支部要注意对党的政策的讨论。

（十一）严格督促各级党部提拔工农同志参加党的实际指导，并设法训练工农积极的分子。

（十二）严格淘汰对八七会议以后党的政策反对、怠工、消极游移的分子。

（十三）进行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调查与统计（第一步特别注意重要省份的调查和统计），建立党的政策之科学的根据。

（十四）负责的指导青年工作，密切党与团的关系。

（十五）改造妇女运动并确定工作计划。

（十六）制定各种报告及统计表与督促各地党部按期填交中央。

（十七）严令各省决算须按期报告中央。

二、总的方向之下，应分三期订出各期的具体的工作计划，在第一期（从十一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日）中央要派人巡视两湖江浙的工作，及中央组织本身之建立：

本期巡视两湖江浙的主要任务应该是：

在两湖：

（一）布置两湖总暴动的局面。

（二）整理武汉三镇的工人运动。

（三）恢复各级党部的关系。

（四）创造新的军事运动的局面。

（五）恢复湖南的工人运动——特别是长沙、安源、水口山、锡矿山、炭塘子、岳州及铁路上的工人运动。

在江苏：

(一) 详细考察江苏省党部的实际情形。

(二) 建立党的支部。

(三) 整理上海及各大城市与沿铁路线之职工运动。

(四) 布置江苏工农暴动的局面。

(五) 创造新的军事运动局面。

在浙江:

(一) 建立党的机关。

(二) 改造党部。

(三) 布置农民运动的规模。

(四) 督促浙江省委作海员工作。

(五) 详细调查各地情形。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

——关于党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

十一月九日中央扩大会议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严重的指出：我们党在武汉反动以前所以成为机会主义、半孟塞维克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一个政治派别，形成一个政党，还在中国无产阶级没有自觉的成为一个阶级的时候，还在工农阶级运动初具雏形的时期。当时正当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占重要作用的是最左翼的、最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因此这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首先渗入我们的党而形成我们党的最初干部；至于工人贫农群众的加入我们党，固然随着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日益众多，然而已经是比较迟的一时期里的现象。因此我们党的领导作用竟留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手中。但是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当时仅仅是受着最初一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农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

* 本文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

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气、成见、幻想……带到我们党里来。因为如此，所以在政治上造成武汉反动以前的机会主义、半孟塞维克主义，一直到现在，这种主义的余毒，还潜伏在各级领导机关中，不容易铲除。因为如此，所以党没有工农群众化，不能尽“群众的组织者”之职任，不能成为领导群众战斗的核心。因为如此，党不能成为铁一般的无产阶级战斗的党，而只是小资产阶级浪漫的集团，一切党内生活和日常工作都只是自由的浪漫的不规律的，反动势力的压迫一来，整个的党即完全瓦解：逃亡的逃亡，消极的消极，怠工的怠工，反叛的反叛。武汉反动至今，由五万而降至不及两万，不及两万的党员中，积极的分子至多不过五分之一，而且多半是在那里无计划的无组织的执行个人的英勇斗争。因为如此，“八七”以来，中央许多正确的彻底革命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往往达到各地，被旧的占据领导机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搁置不行，亦不传达到下级党部及党员群众中去，或者谬解而成为机会主义的实际行动。党的另一个主要缺点，就是各级党部指导之不集体化。从中央以至县委甚至于大的区委，都是分成几部几委，各部各委可以独立派人独立指导工作，部和委之主任自然而然成为分业的专门家，党的组织自然而然分裂成数多的独立系统，特别是军委、工部、农委，简直成了军党、工党、农党。本来中国的党是封建社会之产物，很容易流于首领个人的独裁形式，因为组织法的不完善，这种现象更容易发生，因此党的指导集体化亦为改造党的主要问题之一。总之，根据“八七”以来斗争的教训，组织问题已占了党中第一等重要地位。党的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之革命化，都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在于他的组织，全在于他有革命的阶级组织，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

共产党。共产党如果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组织，决不会成为群众的力量，决不能尽他在工农革命里的领袖及领导者的历史使命。中央今正式警告全党同志，只有自中央以至各级党部坚决的切实执行这次扩大会议的组织决议案，才能使我们党变成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组织而能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否则必然在此反革命势力与工农阶级革命高潮的冲突激荡中完全溃散而至于灭亡。如何执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呢？主要的是在扩大会议精神和基本原则之下进行下列的工作：

一、改正各级党部的组织法。

二、从斗争中改组各级党部，提选多数积极的工人贫农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

三、从斗争中洗刷一切游移、胆怯、消极、怠工、投机的分子。

四、从斗争中发展党员，特别努力在工人贫民军队中发展党的支部。

五、切实改造支部的工作，须健全支部的组织。

六、纠正职工运动中和农民斗争中组织上的错误。

七、改正各级党部日常工作的方式，并练习秘密工作的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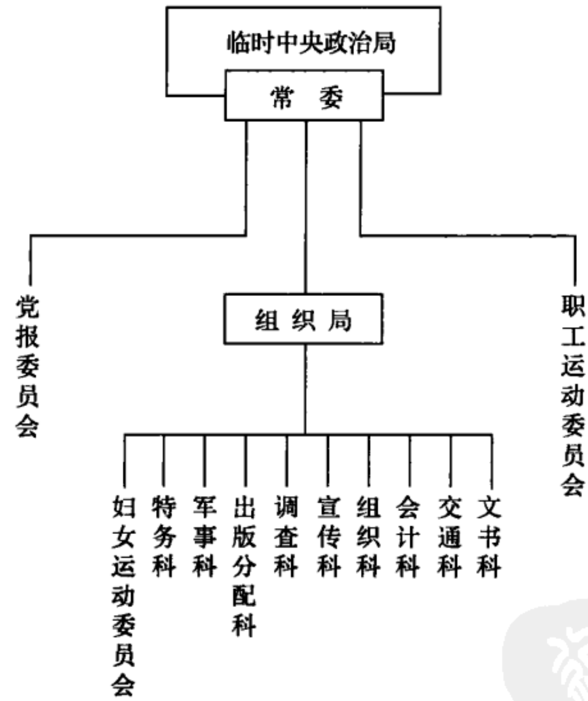
八、严格的执行党的纪律。

九、练习武装暴动的技术。

中央为实现上列的目的，除派人巡视各重要党部实地指导外，并准备分别讨论出具体的计划，训令各级党部执行。首先对于各级党部机关之组织上和成分上的改造有以下的规定：

一、中央、省委、县委、市委以至大区委，废止设部制度，集权于常委（小区集权于区委）。组织、宣传改为科，为纯粹技术机关，其他部分如军事等在工作有必要时可设科，科之主任无需执行委员兼任。大的省委或县委可以成立组织会议

（常委代表、C.Y.代表、工委主任及其他指定参加之人）讨论组织工作计划，工委必须组织（非工人区域的区委不须组织），工委主任必须为常务委员之一；农委取消，因为现在阶段党对农民斗争的指导根本是政治的策略的，无单独设立农委之必要；有劳动妇女群众的地方可以设立妇运委员会；有工农正式军队的省份可以设立军事委员会，此外可斟酌需要组织"破坏反革命军队委员会"。凡委员会对于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只是搜集整理材料和对于工作计划建议的机关。中央之组织现时如下表：



二、省委以下各级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人数及其成分应如下之规定：

（一）省委：

大省——执委十一人至十七人，工人贫农成分须占半数，常委五人至七人，至少须有工人贫农分子二人或三人。

小省——执委七人至十一人，至少须有工人贫农分子三分

之一，常委三人至五人，至少须有一工人分子或贫农分子。

（二）县委：

大县——执委七人至十一人，须有工人贫民分子占半数，常委五人，至少须有一贫农分子，工人区还须有一工人分子。

小县——执委五人至七人，至少须有工人贫农分子二人；常委三人。

（三）市委：

执委九人至十三人，工人分子须过半数，常委五人，至少须二个工人分子。

（四）区委：

大区——执委七人至十一人，城市须有工人过半数，乡村则须贫农分子过半数，常委五人，城市至少须工人分子占三人，乡村至少须贫农分子占三人。

小区——执委三人至五人，城市须工人分子占过半数，乡村须贫农分子占过半数。

（五）有支分部或有小组之支部，设干事会由三人至五人组织之，工农支部的书记及干事会应尽可能由工人贫农分子充当。

三、中央、省委、县委、市委必须经常的有一人巡视下级党部直至支部小组的工作。

四、党的基本单位为支部，支部之下可分支分部或小组，支分部之下可分小组。每一工厂成立一支部，工厂中之各部各间则为支分部，支分部超过十人以上则分成小组。街道支部有零星分子六人以上时得分小组，一街道中有同业或同商店同作坊之同志三人以上时得分组支分部，党的组织系统仍受街道支部管理。唯一街道中有大公司或大商店，其中同志满三人以上时须独立成立支部。各街道之同业支分部为职工运动便利起

见，得以其名单同时报告于该业总工会之党团。党团干事会得党部之许可，于必要时得召集同业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工会本身问题，但不得视为党的经常会议，与街道支部相混（从前有些地方每一手工业工会中同志成立一支部，这样支部的作用与党团相混，应解散编入到居住地的街道支部）。农村支部，在南方各省以乡农协范围为支部单位，北方各省以村为单位。农村区的范围以农村中直接于县政府的行政单位为范围。

五、省委所在地之城市党部，必须由省委兼（即分成若干区直辖于省委）。非大都会（如南京、北京、广州）及大工业区（如天津、上海）不能设市委。省委县委之下可以有特支特区。特委之组织是临时性质的，即为工作需要的临时组织，如为某几个区域或某几县份的工农联合暴动而组织的指挥机关，其权力当然可以指挥当地整个党的工作，但不是经常的党的系统。

六、党对群众的组织，只能经过党团去指导，绝对不可妨碍群众组织的独立性，如工会即党，党即工会。所有工农会纵然在秘密的时期，亦必须组织党团。并须吸引非党员的工农积极分子参加指导机关。另一方面上级党团绝对不许直接指挥下级党团，致破坏党的组织系统。全国各路各级铁路工会党团，须受当地相当党部指挥，不能由上级工会党团直接指挥命令下级工会党团，致有形成铁路党的危险。

七、各级党部必须按定期开会，区委、支部、支分部、小组、支部干事会必须每周开会一次，省市县区的常委至少每周须开会二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支部书记联席会议，活动分子大会，须斟酌环境尽可能时常召集。

八、严格征收月费必须视为改造我党的重要工作之一，除开失业、在狱者以外，党员的统计须于三个月内做到以月费的

实际征收为标准。

九、过去党与团的关系异常之坏，须迅速的改进，各级党部须切实的执行互派代表出席，党对团须尽其指导与帮助的责任。

十二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PDG

中共中央给闽北闽南两特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

闽北闽南两特委：

中央接到闽南十一月二日的报告和闽南十月二十六扩大会议的决议，知道前次由□□同志带回中央给你们的信中的重要意义，你们还未了解清楚。固然，那封信是在途中毁去了，但中央对□□当面的指示，□□亦未能传达尽当。现在将中央最近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给你们带去，决议的内容你们应切实研究计议实行，并须发给各级党部一直到支部小组开会讨论，使大家对于八七会议后党的新政策得到一个明了的观念的指示，更讨论如何实施这些新政策于闽南闽北。能如此，你们旧有错误当可改正不少，以至于完全去掉。同对，中央更有以下的几个重要意见指示你们：

一、目前福建新军阀和海军十一军的火并以至海军与十一军的内幕冲突，正是中国新旧军阀火并冲突的缩影。福建的党应在此种军阀混战中，号召工农贫民群众，煽动兵士，反对这种十六年来未尝改变的军阀战争，并主张以工农兵士贫民暴动，推翻现时军阀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

二、福建的国民党开始就是一个右派的党，清党屠杀后更变成一个豪绅买办的丛聚所和其剥削机关。福建的工农群众甚至城市的智识分子、小商人都久已厌恶这个组织。故我们党在福建应于民众方面，揭发国民党在全国尤其在福建的反动罪

状，攻击它体无完肤，使民众对这些统治阶级的国民党新军阀当季厚基、周荫人一般看待。

三、国民党的统治既为群众所厌恶，新的统治者——未来的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便应广大的在群众中间宣传。而起首更应在同志中加以正确的解释，使其知道苏维埃制度之在中国与在苏俄只是革命性质有差异（国民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故须将贫民包括在内，并不是真要联络小资产阶级建立民权政府。而所谓的贫民也只是非剥削阶级以至无业失业的流氓，并非要整个的小资产阶级。

四、过去福建的党部曾于国民革命军初入福建时，幻想倚赖那时的军队势力以发展民众运动，解放工农，或更投机地联络民军以图发展军事运动。这种错误的机会主义军事投机的想头和行动，中央曾予以屡次的纠正和阻止。现在福建的军阀战争又开始了。同志中或仍不免有幻想陈铭枢、蒋光鼐对待工农态度会好过谭曙卿或海军派者；或对于新军之退入闽南、散入乡村、散作土匪而存利用幻想者；这些，临时省委必须予以严厉的纠正和阻止。并且，对于新军运动，根本须打倒以军队为私有的反动领袖，然后才能接洽群众或一迳运动兵士推翻其反动官长，以建立工农兵联合的关系。

五、福建的产业工人成分固属极少，但厦门、福州的海员、市政码头船厂等工人运动，党亦始终未尝予以注意，只在厦门印务工人中发生一点党的组织，但斗争力量亦极薄弱；在各县手工业工人中更是毫无工作，以致党在工人群众中毫无基础。国民党反动派遂得因之以御用工会的办法在工人中活动，并收买一些工头工贼以胁迫群众。现在福建又一半落入陈铭枢新军阀的手中了，他的资产阶级气味要多一点，或者他将更要以黄色工会的面目欺骗群众。我们的党若不于此时奋起直追，在工人群众中开始工作以领导其斗争，则工人阶级必更陷于水

深火热中而延长其苦痛。党为特别重视此点，福建临委必须建立于厦门工商业发达及交通便利区域，漳州、福州皆不适宜。

六、福建农运只在闽南有些工作，但它的基础在过去几次运动中已证明树立错了。许多地方的农民协会从前是用国民党名义将牌子挂起来的，因为是官办农会，许多观念错误的同志竟依赖乡村族长的势力，下令全村的农民加入农协。本来福建乡村中的封建家族制度是极其根深蒂固的，以致农会办起，不仅无斗争可言，且常被地主族长利用之以作两族斗争的武器。于是此村此族一农会，彼村彼族亦一农会，结果徒成为变相的为害农民的乡村自治会，永远不能获得农民群众。故当叶贺[1]军攻入广东时，南方局令闽南举行农民暴动，闽南特委依据下令给各县，实际上除一二处农民运动较好的地方外，余均无法发动。这种严重的错误，根本是在我们同志多数是智识分子而其中更不少未洗去宗法社会思想，故一回本地做农运，便囿于家族观念而走入正相反的妨害农运道路。目前福建的党改正这种错误的农运方向，便首在严厉的打破同志间这种封建关系，并更须找得力党员深入贫农群众，吸收其激进分子入党，能找得工人同志去做农运，作正确的领导，尤可端正党在农运中的阶级基础。

七、党的组织必须使闽南闽北两特委年内合并成为一个临时省委，地点必须在厦门。党的代表会便可根据此训令召集。临委的常务以五人组织之，□□□等四人均可加入，但更须一工友同志加入。各级党的组织及支部分支部与分组的办法，可依照中央关于组织问题的通告办理。党员成分必须尽可能吸收工农分子，淘汰腐化胆怯封建思想很深的智识分子。

八、工农革命军的组织，中央将有通告解释，你们决议的办法不尽适用。

九、各地暴动时的临时政权——工农革命委员会与苏维埃

的建立问题，可细看扩大会议的政治任务决议案便可了解。你们所谓左派分子应改作工农中激进分子方无语病。否则国民党已整个反动了，其中剩余的不妥协激进分子，除掉同我们走入一条路线外，必别无出路。

十、你们的政治口号实太不妥，如“打倒国民党伪领袖的统治”、“拥护革命委员会”对国民党依仍有依恋。“铲除土豪劣绅”、“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对于土地革命的政策，更未彻底了解。“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也不妥当，“建立工农兵革命的广东”，更是莫名其妙。这些错误与不妥应立即照政治任务决议案改正，否则，机会主义的遗毒又将在福建党中蔓延起来。

中　央

十二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PDG

中共中央关于北方工作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通过）

（一）政治局听了北方局报告后，对于北方局存在三个月中的工作——如宣传八七紧急会议的新政策，发展党的讨论，改组顺直及山东各级党部，实行提拔工农分子于各级指导机关，铲除过去一切回避行动与斗争的机会主义而开始复活北方的工农运动，以至企图群众的大暴动等——皆尚能循着新政策的道路前进。

（二）从北方局的报告中，愈益证明此次扩大会议所通过党的一般任务的总议决案，不仅适用于南方，同时亦适用于北方。在客观上说，北方旧军阀也如南方新军阀一样，他们的统治是绝对不会稳定，军阀间的战争是永续不停的，且张作霖、张宗昌的统治更是朝不保夕的动摇。阎锡山、冯玉祥于是便是得了直隶，他们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和国民党其他军阀向北发展的欲望，必会有更大更复杂的战争爆发。农民的破产，工人的痛苦以及其他贫穷群众之生活恐慌也是永续不停，日甚一日的。在主观上讲，纵然北方工农始终处在旧军阀之下，不能如南方一样，曾经获得一个公开组织的时期，发展了伟大的组织势力和争斗经验，然只须在北方党部真能抛弃过去避免斗争的机会主义，深入群众中去工作，不放松一个日常斗争的时期，那末这种主观上的缺点不是难补救的。而且南方工农运动因为在国民党名义之下公开，倒反种了许多倚赖当权阶级和军事投机的坏影响，北方工农正可引赤裸裸地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免

去这种坏的流毒。

（三）北方工作的总方向也如南方一样，是要实行群众的土地革命大暴动，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北方党部目前的任务便是要发展工人的日常斗争，组织与领导农民的游击战争朝着以上所指示的总方向走。

（四）叛逆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的影响从来在北方没有发展，现在他正勾结冯阎军阀号召什么“北伐”以图欺骗群众，攫取全国政权。所以北方党部必须充分的在工农群众中宣传国民党以及冯阎各派新旧军阀背叛革命、残杀工农的罪恶，务必使国民党的影响和一切小资产阶级幻想，从工农中驱逐出去。务必使工农群众不信任国民党任何派别及冯阎的势力，而只相信自己（工农）的势力，来完成北方革命的任务。在严格的明显的阶级意识之下，组织北方工人阶级的势力，以为北方革命的领导，这是党的第一任务。

（五）日常的部门的工人经济斗争，在北方党部的主观上反抛弃了二年，而客观上亦已停止了一年。现在必须恢复与发展这种日常经济要求与斗争。在这些日常的斗争中去成立群众的秘密的工会组织。铁路工人、矿工及纱厂工人是北方工人运动的柱石，且过去已有斗争的历史。力图恢复此种产业工人的斗争和组织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城市工人及店员的争斗和组织亦应同时注意。天津是北方工运之中心，天津总工会之工作应极力使之发展强固，北京总工会工作应设法迅速恢复。唐山、张家口、南口、保定、长辛店、太原、石家庄等处皆应恢复总工会之工作。

（六）工人阶级是北方革命的领导，农民群众是北方革命之广大群众。发展农民组织势力与领导自发的游击战争，是北方党部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党应领导一切反抗苛捐杂税的自发

的农民运动，一直向没收一切土地的路线走。党应当领导农会成为乡村中的唯一组织势力，凡有农会的地方即应消灭一切地主豪绅民团以及官厅乡警的势力。农民的秘密结社如红枪会、天门会等，党应与之接近而领导其群众向我们的路线走，其首领之反动而与军阀豪绅勾结者应随时解决之。关于领导乡村农民的游击战争的态度，北方局对于北方政治任务决议案之所指是对的。以后尤应正确的运用此次扩大会中所定关于一般暴动的总策略，要紧的是要防止各种军事投机以及回避群众暴动等不正确的倾向。每一次游击战争总要使之群众化、组织化，使之深入乡村，不容易为敌人所消灭。偏重扑城，扑城之后一哄而散，这是农民原化的倾向，应纠正之。但这并不是说绝对不应攻城，在暴动发展和有利的情况之下，攻城是必要的。

（七）北方是军阀的老巢穴，破坏旧军队是非常重要的。党的组织必须打入兵士中去，必须用种种方法在兵士中做反对战争，要求改良待遇，破坏军纪，以至鼓起部分的兵变，这种兵变要是能与城乡的工农暴动联合起来更是好的，但不应依靠与等待兵变为主力。

（八）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战争的工作，在北方占很重要的地位。党必须在工农群众中，继续不断的宣传反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一切卖国殃民的行为，反对一切军阀战争。党必须发展此种运动为一种广大的群众运动，给军阀以实际的打击。借此种运动提高群众革命与暴动的情趣。

（九）要完成以上任务，党的组织之健全与发展是最重要的。工农分子仍应继续提拔于各指挥机关，党的基础确立在工农成分身上，党内讨论应继续发展，党内民主化应继续扩大，务使党员群众真能积极起来，管理党务，监督指导机关。另一方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知识分子的极端民主化的要求也

是不能容许的。如上次北京几个知识分子要求极端民主化，反对直隶省委及党部改组的胡闹，以致北京党部全被破坏。以后北方党部当从此种错误倾向上予以严重纠正。知识分子应尽可能的派到下层群众中去工作，以测验其革命性。京东及直南各县农民运动发展之处，应迅速强健与发展党的组织，天津、唐山更属重要。

（十）三特区目前的任务是要建立并发展党的组织，发展没有土地的农民运动，隶属土匪群众势力于农会指导之下，夺取军阀武装，抗纳一切税捐，由游击战争进至大暴动。

（十一）山西目前任务是即须派一中坚分子携带党的一切新精神前去改组党部，扩大民众运动，向阎锡山取进攻之势。尤其是要发展农民运动，抗租抗税，没收土地，解除一切乡团武装，打破阎锡山在乡村的统治（村长制），以至发展到完全推翻阎的统治。

（十二）东三省目前任务是急须恢复党的组织，在奉天、长春、大连及各铁路各矿山开始建立工会运动的工作及基础。农民运动亦应开始注意。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战争的工作，在东三省特别重要。

（十三）北方上下层干部人才都甚缺少，这是过去不斗争不行动的机会主义遗下来之困难。现在要制胜此困难，只有在不停的争斗中去锻炼出大批干部人才。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党部成为由本地争斗中锻炼出来的健全党部，而不是过去仅仅由高级机关委派之党部。

（十四）根据北方局和森[1]同志报告："彭述之同志有宣传第三党部的错误，反对北方局改组直隶省委的企图，最近对于玉田暴动的观点，又有军事投机的倾向，而北京几个反对省委市委改组的分子，又直接间接在彭述之同志影响之下……"中央特议决彭述之同志立即停职，由中央巡视员和森同志会同直

隶省委彻查此案并报告中央核办，领导北京少数知识分子同志胡闹的为首三同志，应予以留党察看一年之处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即蔡和森。

PDG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

——关于广州暴动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广东省委：

你们二十八日来信已接到。

（一）关于广州暴动的计划，中央赞成。应注意广州市及四郊工农群众之发动。广州市现状如何？如有可能，即当由群众自动的公开工代会，造成“第二政府”之局势——自然应当尽量扩大群众的斗争，以达此目的，工代会应当做成群众斗争之公开指导机关，做成发动暴动的机关。四郊农民斗争起来之后，即可加派代表进工代会；兵士的革命群众开始斗争以至发动反抗时，亦加派代表入工代会，使工代会如此变成工农兵代表会。

（二）广州以外的农民暴动，仍可用革命委员会（即你们通告中所称临时政府）。东江革命委员会，为陆丰一区的暂时指挥机关。各县则组织革命委员会为发动暴动之机关，直到苏维埃成立为止（中央以前所说取消的革委，是单指叶贺[1]军队的革委而言）。各县之上，如东江或将来的南路等，有暂时一区域的联络之必要时，则可以组织某区的高级革委（如现有之东江革委）。这种高级革委，应尽可能的由群众代表参加——如东江革委会中，即应由海陆丰等各县苏维埃加选代表进去——这是一种临时政府的性质。广东暴动胜利——广州工人

---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

PDG

暴动占领广州之后，这些分区的革命委员会就可以在广东省苏维埃成立之后取消。

（三）苏维埃之组织，依照此次会议决议进行。如今海陆丰的成立苏维埃是很对的。但应注意：使群众真切了解感觉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故苏维埃成立之后，在此紧张群众斗争之时，必须（1）多开苏维埃会议，一切重大政策办法都经过这种群众代表会议决定，一切执行政策，须在会议上报告——不要将实权尽归之于县苏维埃执委；（2）代表对选举人实行负责报告；（3）选举人应能实行撤换代表之权……；（4）县城中实行职业选举，工厂选举。苏维埃政权不可轻易忽视——如果海陆丰城市不守，县苏维埃政府不应轻易解散，必须仍为指挥作战之机关，退至可守地点，指导进攻。

（四）苏维埃（海陆丰）事实上选举后之社会成分、行动、状况等详情，速来报告，至要至要。

（五）关于失业农民的问题，应当（1）在群众中鼓动提倡分给土地与失业农民，尤其是农军；（2）苏维埃政权设法筹措基金给他们以资本（买耕具等）；（3）农民群众的意见之采纳——分配土地等办法，都须经群众中广泛的讨论，然后由革委或苏维埃颁布办法；（4）乡村中多余的人民自然要加入工农革命军，鼓动他们来当志愿兵——农民暴动的发展与新政权形成过程中，工农革命军的扩大（正式军队）是事实上部分解决这一问题的地方；（5）关于雇农问题，则海陆丰等处土地已在分配中之时，一部分雇农应当分给土地（与上述之失业农民同），主要的是要组织雇农工会，定出并实行改良他们劳动条件工资的法令与条例。这一进一步的分化是土地革命过程中不可免的，我们应当现在就做这种准备工作。

（六）海丰织造厂据报告是说："归工人"，这是不对的，应当宣布归县苏维埃所有，苏维埃政府派人做主任，而厂中工

厂委员会参加管理。要实行我们的劳动政纲（八小时……女工童工的优待等等）。报告中有“分给工人”字样是否是将织机分给工人领去？如果是如此，是不对的。

（七）广州以外各县之发动，须迅速。虽说以广州为集中的目标——夺取省政权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乡中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工作。

（八）工农暴动发动前发动中，土地革命（土地党纲草案）劳动政纲及政权目的的宣传应当竭力深入普遍，使群众知道暴动的目的。否则原始的农民暴动极易趋于一抢便跑的倾向（如陆丰群众手拿麻布袋的心理）。苏维埃的宣传须极普遍。

（九）省委反张黄[2]战争之宣言，虽然在反对张黄之一点说得彻底，然而在暴动的积极目标说得太笼统。二十八日信中说，“广州工人必须起来保卫广州”之“保卫”两字不可解，广州尚在张黄手中，尚是反革命的，何以要“保卫”呢？

（十）海陆丰等处，党应做极广大的公开宣传，应努力在群众中发展，广东全省的党务要尽可能的实行选举，由下层党的群众选择他们的指导者，不好的或不中用的同志应无情撤换，使同志群众公开的批评。

现在情形如何？宜速详报，并做文章来。

中　央

十二月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2〕指张发奎、黄绍竑。

中共中央给江苏省委的信*

——关于乡村暴动问题的答复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

江苏省委：

你们十二月份的农运计划，因为写得很具体，中央昨（六）日常委会不能冒然作答，但关于急需解决的数事经同志口头提出当场解答如下：

一、目前农暴可以发展的区域是无锡、常州、宜兴、苏州一带。这一带的客观情形，统治阶级蒋白[1]两派军阀久已箭在弦上，时时表现两方互相冲突的可能。最近的国民党中央会议有人从中竭力斡旋，主张牺牲西山派改组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广西派让出全部上海以换回广东，但这个协调终无多望，并且益发证明统治军阀两派的冲突益甚爆发益近就是了。统治军阀由摇动而冲突而战争，自然是乡村斗争由游击战争发展到暴动的一个极好时机，不过这个地带的乡村斗争虽曾经过宜兴、无锡、常州的先后暴动，然因为发动以后形成了军事投机局势，以致一经失败便溃散无余，土地革命始终未能深入。暴动失败后，各地负责同志又多避难来沪，现时省委所根据的乡村斗争生活还多是以前的事实，若于此冒昧地定了一个全省或无锡等地暴动的日子，于发展农暴有碍，便对统治军阀将生的

* 本文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八期。

混战也尚不能有此确切的估定。因为定期暴动的条件是应该在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群众斗争加紧时的必要根据上。现时我们在江苏乡村的工作方开始派人去加紧或仅开始去工作，而统治军阀的混战也正日近；在这样情形之下，不应是预定一个暴动日期，而应是预定一个发动暴动的期限，以催促各地加紧斗争、加紧游击战争之预备和发动，庶几军阀混战到来不致坐失时机，并且可避免我们工作同志因为有了定期而坐待而不发动日常斗争，不作游击战争的预备和发动之危险。譬如十二月内，各区域按照当地情形必须将乡村斗争做到如何地步——或是抗税抗债，或是发动游击战争，或是打杀豪绅地主及卡丁官吏……，将城市斗争做到经济罢工，组织秘密工会，公开群众集会……，更普遍地宣传暴动夺取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反是于暴动大有助力的，并且这也就是发动暴动时必要工作，而借此可以考察工作同志是否努力加紧此斗争工作以准备暴动。

二、乡村的暴动是可以从游击战开始以发展到暴动的，但不是派几个武装的游击队到乡下去便可以发展游击战争的。须知游击战争本不是单纯的武装行动，真如军队游击队之专门袭击敌人，而是应包含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武装的四方面意义。一个游击战争的发动，当然需要一点武装，当然需要些武装行动，但当打杀豪绅地主官吏一开始，便应使土地革命的意义在群众中愈为明了，分配土地即使不即实行焚地主房屋，毁契约债券，分配富室财产物与无产贫民实属必要。改变乡村封建关系固不是嗟咄间事，但打破族长的信仰绅士的秩序，这于江苏是最切要的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也必须在斗争中广大的宣传，而**这一斗争更必须是群众的**。（一）假使群众并未发动起来，遽以武装行动去开始去领导这一斗争，势必又是军事投机，并且有些斗争，没有群众便无法发动。本来

游击战争与暴动之不同点，只在暴动是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而立即要夺取政权的，游击战争是因夺取政权尚无可能而群众斗争尚未发展至最高点时，或因统治阶级的力量足以扑灭一个暴动局势于极短期间而群众又无退路可守时的另一个斗争方式。（二）游击战争扩大了发展了，自然会走到夺取政权的形势，而群众斗争更会发展到最高点无疑，故游击战争也可以转变为一个暴动或一径发展到一个暴动。但游击战争不是没有失败的，它比暴动实更易失败。因为暴动不应轻易玩耍的，而游击战争在可能时便须发动，应视为乡村日常斗争之带有武装性质的一个方式。所以乡村的日常斗争而不带有武装性质的便不得视为游击战争，不过这种非游击战争的乡村斗争在农暴运动发展的区域一定日益减少罢了。

现时江苏各县最切要的工作便是发展这游击战争，有些地方如无锡、常州、宜兴这一个区域，便可从游击战争发展到割据的暴动局面。但如果不在此等地方发展游击战争，并不从引导群众抗税抗债，打杀豪绅，宣传土地革命，暴动夺取武装夺取政权作起，则一个总暴动局面永远不会形成的。便是定了一个时期，也不过是几个游击队的军事投机而不是群众的武装暴动。

三、城市职工运动与乡村农运关联问题在扩大会议政治任务决议案中说得很明白，省委问无锡等处的农运既有可能，这几县城市工人是否需要响应，这一个问题的答案不应是预备响应或不预备响应，而应是在这几县中给职工运动同志一个同样的限期，告他们在此期中如何发展工人的日常生活斗争，如何组织工会，如何让工人懂得政治斗争的重要和扩大政治斗争，如何引起工人对工农革命的需要，如何使工人受得武装的秘密训练。这些工作如能依期做好了，自然是一个暴动的准备工作。时机好了，也许工人群众为暴动的发动者，也许为农暴的

响应。时机不好，农暴只能在乡村成一个割据的局面，则响应亦不需要或只需一个骚扰。在现时无锡等处的农民尚不能确定一个日子，则城市工人之响应与不响应自更不能先决。并且冒昧预决了，不响应固然要不得，响应也是使工人群众与职工运动者发生倚赖的观念，忽视工人本身力量，甚至不努力本身工作。（下略）

中　央

十二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白崇禧。

PDG

中共中央复陈独秀函*

——关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

独秀同志：

我们得到你寄来的信，非常之欣慰，兹答复如下：

（一）国民党的统治长久与否，全看民众暴动的力量能否汇合而成较大规模之胜利。国民党的统治巩固（稳定）与否的答案却不同了。现在民众暴动虽未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国民党自己已经不能巩固其统治。现在所谓国民党统治是冯阎[1]、广西派、蒋介石派、张发奎派军阀统治之总名而已。他们自己互相混战而任何人不能巩固统治，此其一。国民党党部之内，每省都有好几派，互相冲突，你倒我，我倒你，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此其二。国民党的各省政府，完全在当地军阀之手，其所谓长衫同志，省政府委员，财政官吏等等之内，又有许多派别，你造我舞弊，我告你贪赃，同在军阀之下，也是互相争宠互相倾轧，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此其三。党部与政府之间，最近如叶楚伧公开的承认亦是互相冲突："省政府与省党部，县政府与县党部，不相融洽……见面不说，背后批评"；这种现象，仍旧是当地某派豪绅倾轧别派豪绅，霸占党部的豪绅，总想推翻现任政府人员，而自己取得肥缺，足见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此其四。因此，一般的局面之下，现

* 本文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

在可以说工农的任务是发动一切武装暴动，组织群众自发暴动，汇合联络各方面的暴动，其目的便在夺政权。这种形势是无间断革命的形势，是比较长期的斗争，所以说中国革命可以由某地工农取暴动一击中以夺取政权的时机已到，固然是错的，但是简单的说，以群众力量扫荡国民党而夺取政权的时机还未到，则亦有语病。

（二）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以前湘鄂粤暴动中指导的错误，正在于只有军事的行动，而没有经济政治的行动。最近江苏暴动中的错误，亦是如此。然而说“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则我们不能同意了。群众反抗的目的，在于改善经济生活，同时，现在尤其在农民便不能不急转直下的以取得政权为目的，要取得政权，便不能不暴动。宜兴无锡事件的大弱点，正在于我们没有能深切指示群众，以他们自己取得政权之必要。因此群众没有广大的起来。现在的问题，在农民暴动中正是最迫切农民群众取得政权（苏维埃）的问题。现在的斗争，固然可以说共产党、国民党争政权，其实是工农群众与豪绅资产阶级争政权。共产党用不着在社会上避开争政权之嫌疑；重要的是共产党是否能率领起群众来争政权。如仅仅有军事行动（即使是农军），自然形成共产党徒（并非共产党），指使有枪杆子的人马来争取政权之形势。这当然是很错误的。宜锡暴动的错误，是偏重于军事，并非偏重于政治的错误。实际上忽略农民群众经济要求，自然就可以忽略政治，而偏重于军事行动。农民群众在现在的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为要在某地实行“四不”运动，便必须准备第二步的暴动，因为治者阶级

不遇着武器和群众的暴动是决不许你“四不”的！农工群众不拿武器暴动，也决不能“四不”，此其一。再则既然是“四不”，那就早已是不承认现存的政权。“四不”之后，谁的政权呢？所以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唯一的答案是：实行“四不”的群众自己拿政权，举代表会议（苏维埃），来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来歼灭豪绅，来分配土地，此其二。无产阶级政党指导农民暴动之任务，正在于指出这种事实上的暴动目的，原始的农民暴动，红枪会、天门会式的农民暴动，他们实际上取得某地某县的政权，而自己还不懂得怎么一回事，这种农民暴动的弱点，正是使他们永久不能胜利的原因。

（三）上海市暴动的问题，却是另一的问题，若飞[2]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江苏省委八号通告说：上海现在暴动时机的成熟，已远过于三月暴动之时。这也是错误的。中央早已和苏省委共同开会而纠正了。上海工人斗争的问题非常之严重。关于城市暴动的条件，已经写在此次扩大会议议决上。工人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例如总同盟罢工……形成一般的革命高潮，而后转入武装暴动的形势，使暴动的城市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此次江苏省委，因“吗啡针主义”发出这一“激刺性”的八号通告，其结果，使同志指导罢工时，只以强力打厂手段扩大罢工，他们的理论法是：罢工如此扩大，一直到总罢工，便已经可算暴动了。这可确是错误。应当去真正发动群众，从普通的群众的不满意，引导到群众的经济斗争，从部分的一两厂的罢工，引起同业或同区的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而扩大罢工，从经济斗争真正引起群众的政治斗争，引起群众取得政权之必要的认识，而走上武装暴动。苏省同志不是如此做，却只以极少数勇敢工人之恐怖行动去“扩大”斗争，其结果，可以使这些工人一部与其群众相离。这本是非常错误。这是一种变相的军事投机主义。总之，应当注意经济斗

争，应当以经济进于政治，不应当只注意军事行动，这说是非常之对的。至于说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

黄色的工会农会的力量，正在于他们的秉承国民党的命令，使工农不要政权，而只要经济上小小改良，但是如今经济上改良的可能非常之少，豪绅资产阶级正在积极进攻，黄色改良运动只是很公开的欺人面具。我党只有这样指出这种事实，告诉工农，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能得着改良，如此才能打倒黄色运动。

（至于宜锡事件“奉了唐生智命令”，那全是反动派的故意宣传。）

（四）关于中国革命性质，此次会议决议案已有说明，政纲虽无条文，然已大致在决议案上规定，并已公布于公开的布尔塞维克报上。

常　委

十二月九日

附一：陈独秀来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常委诸同志：

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因此，我以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当然不回避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与民族争斗对峙），以发展我们的实在力量。固然因经济

争斗而不避免暴动，尤其在农运非暴动恐难发展。问题是在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前在汉口，我对湘鄂运动，也把这样的意见告诉过亦农[3]。若飞对于江苏运动，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4]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我当时曾表示不赞成。略说了几句，他似乎还不大以我的意见为然。这如果是他自己的意见，望常委急需纠正！如是常委的意见，我提议要切实讨论估计，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上海。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宜兴无锡事件所表现的，也是偏于政治方面，经济的意味太少了，这样的暴动，使群众只看做C与国[5]的政权争斗，和国之北伐有什么不同（我们脑中的不同当然无用）？在各地的运动和暴动中，今后务要使经济的意味着实加浓，如此才能推动广大的群众，如此才能使一般民众了解C与国的显明的不同。现在一般人都觉得连我也承认是C与国的冲突，而不是农民革命，因为在宣传上在行动上都未曾表现农民的经济要求，与群众的骚动。我以为单是“耕者有其地”，这个口号还不够，因为太文雅了，不能使广大的农民了解，而且农民的痛苦不单是土地问题。我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单明了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我们此时若不用最彻底适合于农民自身经济利益的口号深入农民广大的群众，而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当然的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使国民党有组织黄色农民协会的可能。宜兴无锡事件报上说是奉了唐生智的命令而做的，不知是反动的宣传或是幼稚同志胡来，望注意！

独　秀

十一月十二日

附二：陈独秀来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央常委诸同志：

昨函[6]谅达。

顷阅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的政纲，且明言是“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而国际屡次议决案都说：“认为说民族革命已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革命已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彼此仍是大大的争质，不知最近国际已改正否？此问题不弄清楚，将来的政策，又会有异见发生。我以为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速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与国分离之后政纲尤十分紧要，现在若不宣布一明确的政纲，党内党外不明白我们究竟要做什么。诸同志意见如何？

独　秀

十一月十二日[7]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冯玉祥、阎锡山。

〔2〕即王若飞。

〔3〕即罗亦农。

〔4〕即毛泽东。

〔5〕指共产党与国民党。

〔6〕即附一来信。

〔7〕原文如此。

PDG

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关于党团关系通告第十九号*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最近C.Y.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现有些错误观念，这些错误观念的产生，多半由于党团关系不好而形成，极有迅速纠正之必要。

第一种观念，就是认为团在中国没有特殊工作，主张取消团的组织。在党的负责同志中也同样有同类的主张。这种情形完全是因为团的工作遇到恐慌，没有找到正式工作方针的表现。由于团的指导机关与一部分党的负责同志脱离青年工农生活，不明了青年工农要求与习惯，感觉青年工作困难的机会主义的表现，并不能真正代表团员群众与青年工农的意识，表示团的领导机关与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形成剪刀式的发展。

主张取消团的人，仿佛取消团的组织便可以加强党的力量，其实取消的结果必定是消灭党在青年工农中的影响，完全是犯了取消派主义的错误。

第二种观念，就是把团看成做文化运动的组织，以为一切工农政治斗争既有党来领导，团可以专心做文化工作和儿童运动，这种观念当是以前党对于青年运动指导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 本文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

的遗毒之表观。从前“工农运动有党负责，C. Y. 注重学生运动和文化工作”的观念，直到现在在党内恐还有，还没有完全去了。江苏崇明岛的党最近还说“C. Y. 替党做技术工作的，一切对外活动都由党员负责”，这种观念同样是犯了取消主义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充分表现没有明了团是青年工农无产阶级的群众的政治的组织之意义，是帮助党获得青年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组织。这次 C. Y. 中央局扩大会议指出，这观念必定把团变成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非政治的），是非常正确的批评，因为他的结果必定是引导青年工农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消灭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

第三种观念，就是以团代党的先锋主义的倾向，以为党的政策完全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团应领导一切斗争，变成整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主张更改团的名义为青年共产党，入团年限提高到二十五岁甚至二十八岁。这种观念产生的远因是由于 C. Y. 初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五）即为第二党倾向的影响；近因是：（一）有一部分下级党部没有脱离机会主义的余毒，表现畏缩退后，致使团轻视党的力量与作用；（二）党内民主主义成分之缺乏，团没有广泛讨论党内问题的机会，党不重视团的意见和提议，没有注意提拔青年党员及兼党的团员担负党内工作；（三）团在反动压迫之下没有找到做下层青年群众工作的方法，而着重没有深入群众的政治斗争，因此形成党的错误倾向。虽然现在还没有这事实，但是这种先锋主义倾向的结果，可以走到形成第二党的危险！

先锋主义的倾向，根本是由于反对机会主义的方法不正当，就是在团的机关中工作的党员，不站在党员方面努力去与机会主义奋斗，而无意之中要以“布尔塞维克的团”反对“整个儿机会主义的党”。这种倾向是非常是非常之不对的。在团之中工作的党员，应当站在党的新政策之上，一方面去指导

团的工作，别方面努力于站在党的观点上作积极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

这次C.Y.扩大会议对于这几种错误观念都有极严的批评，认为是青年运动中的危机，指出C.Y.今后应当加强团的政治任务，积极领导青年工农参加一班政治斗争。团应极广泛的讨论党内政治问题，并注意青年工农兵士中的下层群众工作，应注意在群众斗争中建立团的基础，改造团的指导机关的社会成分，使团真正布尔塞维克化，变成党在青年无产阶级中极有力量的政治组织。

党中央完全同意于C.Y.扩大会议的精神，并且严厉指出党内主张取消C.Y.、把C.Y.看成文化运动团体、不帮助C.Y.在青年农工群众中的发展与斗争，客观上使C.Y.走到没有出路等等，是非常错误，是机会主义的表现！须注意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与第二国际青年运动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青年工农无产阶级的政治的群众的组织，是要领导青年工农群众在斗争中去养成共产主义的精神，是输送党的影响到青年中的组织。团的组织是保有独立性的，只有第二国际改良派的青年运动，方才是只做文化工作的团体，是党的附庸机关。同时党与团严厉指出团的先锋主义倾向的危机，党团指导机关应在工作中去加以防止。但防止先锋主义，绝不是加团以绝不要的限制，反而妨碍了团的发展与工作的进行。

最近各地党团关系非常恶劣，主要的现象就是党对于团的工作缺少积极的指导与帮助，以致团员看不起党，骂党是机会主义组织而单独领导群众斗争，互派代表没有双方负责执行，多半只有团的代表出席党的会议，团的会议党则不派人参加（或派技术人出席），甚至弄成了党与团的斗争。假若党与团不能双方负责纠正，必定可以引起极严重的不好的结果。因此党

与团的中央特此指出这种现象的危机，并提出下列办法，各级党与团应认真执行：

（一）党与团各级会议应切实执行互派代表的办法，仅如此方能消灭党与团间主张上的冲突，使党能了解团的情形，使团能明了党的政策。

（二）党内重要问题与政策，应提到团内讨论，对于一切政策的决定，应注意团的意见与提议。

（三）各级党部应经常听团的工作报告，随时加以指导与帮助，在党的机关报及党员群众中，时常提出团的问题的讨论。在实际工作中，党应多给团以物质上的帮助。

（四）兼团员的党员应努力参加团的工作，负有领导团员群众的责任，团应经常介绍好的团员入党（但非满二十三岁者不能脱团），增加党在团内的成分的影响。

（五）团应注意提拔新的积极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的工作，并继续不断的输送一部分干部到党内工作，但党调团内负责同志时须得双方同意，以不妨碍团的工作开展为原则，如双方有争执时，须提到上级机关解决，党不得任意调去。

（六）团应继续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与政策上，进行反对党内与团内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党的组织弱小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而不改变，放弃工农运动的指导时，团可以并且应当站在党与团上级机关政策上联络党员群众，领导当地工农运动与斗争，但须注意在斗争中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且注意强健党的组织，消灭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

（七）团部机关对于当地的党的机关的政策和行动，认为不正当，甚至机会主义的时候，不应当单独的站在团的地位，而应当同时站在党员的地位，联合赞成他们的主张的党员，向上级党部机关呈诉意见，要求上级党部机关审查。

（八）党应注意帮助团的发展并强固组织，在没有团部或

是团的组织单弱时，党须指派得力同志担负团的工作，建立团的组织，尤其在乡村中，团的组织极少又薄弱时，党应命令乡村支部成立团的组织。

（九）党应注意加强团内的政治教育工作，时常派人到团内报告党的情形与政策，使团员能了解党的作用，使每个团员将来能变成很好的党员。

（十）今后党对上级机关报告中须叙述团的现状，团对上级机关报告中亦应叙述党的状况及团对党的意见。

总之，党与团的关系，最近所以发生不好的现象，发生团反对党的倾向，其原因在于党和机会主义奋斗以来，党的健全的干部还没有造成，一般党员群众有不满意于干部的情形，因此少数地方的团的机关便变成表现这种不满的机关，所以只有彻底实行党内民主主义，令一般党员群众（团部工作的党员当然在内），尤其是工农党员，都能对于党的组织及政策表示意见，使他们的意见能够战胜机会主义的倾向——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团与党之关系问题。

团应当在党最近扩大会议的总政策之下，在团最近扩大会议议决之下，开展真正的青年群众工作，肃清团内的机会主义，以及军事冒险玩视暴动的倾向。只有团真正成为群众的斗争的组织之时，方能与党同时实现布尔什维克化之任务。

以上所指各项现象与整理党团关系的具体办法，应在目前斗争紧张情况之下有极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团应认真切实执行，仅是这样才能加强党对于团的指导，使团能广大的发展，各级党与团部应当随时将执行情形报告上级机关。

C. P.
C. Y. 中央　同启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武装暴动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瞿　秋　白

（一）农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显然到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所以暴动的策略与一般斗争的方式，成了最紧迫严重的问题。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式方面，有极可注意的特点。中国的统治政权，现在已经由旧军阀买办阶级手中，大部分移转到新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豪绅资产阶级在各地都经过国民党而取得政权，力求巩固其统治及其剥削制度，引起工农不断的反抗。但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一个整个儿阶级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织成全国家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所以客观上革命斗争的形势，也就形成各省农民此起彼落，比较散乱而不相呼应的暴动。最近半年以来，广东农民从四月就有武装暴动，直到贺叶[1]入粤；湖南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政变之后，就有长沙扑城的暴动，武汉反动之后有鄂南鄂西的暴动，有醴陵平江的暴动；最近江苏宜锡江阴海门等处也有农民暴动；直隶京东各县以及山东范县阳谷，都有如此的暴动；此外，便是豫鲁各省红枪会天门会的武装斗争，也带着有农民暴动的性质，虽然他们的领导权往往落于豪绅小地主的手里。这种情形，很显然的表明中国农民普遍的武

装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实际生活之中，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这种战争是客观形势中必然发生的初期暴动的现象。湖北湖南广东的许多次经验之中，很明显的证明：一、如果武装斗争并非发自群众，而仅仅某一武装队（正式军队也好，土匪也好，甚至于工军农军也好）的游击战争，与群众脱离的武装队的游击，那么，这种斗争始终是要失败；二、如果游击战争是群众的，但是，不能从游击战争进于更高形式的斗争——政治的斗争与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扩大，那么，这种斗争也是不能胜利。因此，对于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应当有明确的认识：

第一，甚么是游击战争呢？列宁说："现在的军事技术，不是十九世纪中期时候的军事技术了。用一大群人去抵抗炮队，用几支手枪去守巷战时的屏障，自然是蠢事。……莫斯科暴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提出了'新的巷战策略'，这就是游击战争的策略，实行这种策略的组织，便是便于移动的很小的小队伍：十人队，三人队，甚至二人队。"列宁这里所说的游击战争，是指城市中的巷战而言。然而游击战争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了：当暴动初起，革命方面的武力还很少的时候，对于军事技术精良的敌人——反革命的大队人马，不用显然力不相敌的武装很不完备的甚至于徒手的群众大队，去硬冲硬打；而用分散细小的队伍，使敌人防不胜防出其不意的去袭击——这就是游击战争，而非正式战争。现在中国农村中的暴动，客观上正是形成这一种策略。农民暴动初起的时候，往往事实上只有小队伍袭击敌人军队（团防民团等）；他们对于没有武装的豪绅地主以及武装并不很大的敌人，固然仍旧是广大群众的斗争行动，可是，一般而论，农民暴动在未能形成较大的工农革命军以前，在未能采取与反革命军队作正式战争的策略以前，他还是在游击战争的阶段之中。

PDG

第二，游击战争应当是群众斗争发动出来的。游击战争只是暴动的初期现象，而且只是暴动中武装斗争方面的策略。并非农民暴动就等于游击战争；也并非暴动之中除游击战争以外，完全没有其他方式的斗争。恰好相反。农民暴动的主要方式是群众的斗争，而游击战争不过是这个总暴动中袭击敌人的武装斗争之一方面。整个农民暴动应当包括什么？暴动不是几个武装队袭击敌人便算的；暴动不是群众之外，另外有什么第三者的武力来解放群众的。现在中国各地农村中，所以发生如此之多的暴动，正是因为地主豪绅国民党的压迫和剥削，使农民不能忍受，而群起反抗，正是因为各县各乡地主豪绅的地方政权，受革命潮流的冲刷而动摇崩溃。因此中国农民群众起来暴动，起来斗争。斗争的方式，开始可以是很平常的：农民不肯交租或交税交捐，不肯还债，尤其是乡中苦力贫民穷困到极点而起来反抗，群众的革命情绪普遍的高涨，他们拒绝收租收税的豪绅走狗，他们杀戮这些豪绅走狗，他们群起围攻地主，吃大户，吃排家饭，他们焚毁债券田契要求土地以至分配土地，他们进而杀戮豪绅地主，没收富豪的财产。这些种种方式的革命斗争的爆发，甚至于有时客观上以改良主义运动为导火线；例如要求减租不遂，要求减免钱粮不成，因而进一步的趋于暴动——因为国民党统治之下，政府和所谓党部，往往想用这种改良政策来欺骗农民，但是事实上豪绅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做这些让步，而且这些政策决不满足农民的要求，国民党及新旧军阀，始终实际上是用强暴手段压榨。总之，农民运动的这些斗争方式，是暴动发动群众后必然的现象，有些斗争方式并且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上的经验，如吃大户，哄堂等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引导农民进一步的做有组织的自觉的暴动：从吃大户、抗租、抗税等的群众斗争进展起来，群众感觉武装斗争的必要，自然游击战争便要同时发生，自然群众之中

要求有游击战争的组织——有集中指挥的武装队之成立。游击战争只有在这种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斗争之中，才能成为有力的武装行动；农村中的游击战争是不能和农民群众斗争的发动相离的。农村中群众斗争的发动，同时也不能转入武装斗争而不从事于游击战争。

第三，游击战争至少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的。反动派如吴稚晖等，往往说共产党的革命方法是杀人放火。是的，农民暴动之中是有许多杀人放火的事，被压迫的反抗屠杀反抗豪绅地主国民党政府官吏，不能不是“杀杀人者的政策”；共产党对于农民的杀戮豪绅地主的运动，是努力赞助而领导的。但是，工农的武装暴动并不单是“杀人放火”，工农武装暴动是工农群众的斗争，是要积极建立工农的政权之斗争。所以，即使某地暴动的开始，并非群众的直接斗争，而是少数的武装革命党人或农民先动手杀戮豪绅袭击敌人武装，那么，这样开始的斗争也应当立刻引起极大的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单纯的武装队的游击与群众斗争不相混一的斗争，必然是军事投机主义。所以即使客观上有万不得已而从武装队的游击开始暴动的事实，这种暴动也必须立刻发动群众起来！

因为农民暴动的意义，是要用群众之中生长出来的武力，推翻治者阶级，而使群众自己取得政权取得土地，达到自己的要求。杀戮豪绅只是斗争的开始，只是肃清敌人势力的一步；要树立革命的群众的势力，便必须发动群众自觉的斗争，使他们得到政权和土地。

第四，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农民群众斗争发动而开始游击战争之后，革命势力必须要继续的进取而又进取，决不能保守的，所以决不能停滞在游击战争的一阶段上的。湖南、湖北、江苏各省以前的农民暴动，正因为不能从游击战争更进一步，而未得着胜利。最近（十一月初）广东海陆

丰的农民暴动，便从游击战争，进一步而创立革命的地域。海陆丰的农民，在叶贺入粤以前便暴动起来，随后叶贺虽然失败，但是农民暴动却从军事行动（游击战争）进而至于群众的斗争（尤其是海丰），由群众的斗争而创造更大的武力，并且有叶挺残部改编加入农军，增多武装的力量；于是他们努力发动陆丰、碣石、紫金等许多县农民的斗争；而且他们的作战，已经不须采取纯粹游击式的策略。海陆丰农民暴动的发展，便是超过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之范围，而进于建立革命地域的实例。

现在各地的农民暴动的斗争方式，必须确切的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和明显的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各省各区的农民暴动，将要运用这种斗争经验之中锻炼出来的策略，使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更加动摇削弱以至于各自推翻当地的反动政权；而使革命势力汇合起来，创造尽可能的大范围内工农政权胜利的局面。

（二）城市工人暴动的问题

农村中四处蜂起暴动的环境之中，城市工人暴动便成了革命胜利的关键。革命势力的发展，到了有几县、半省、甚至一二省内工农暴动胜利前途的时候，城市自然要成为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

现在客观的形势，虽然各大城市，如上海、汉口、天津等处，还没有工人暴动的事实，然而一般的政治经济条件，正在准备着这种暴动的爆发。如今大城市之中，如上海、汉口，尤其是广州，工人的斗争剧烈起来——广州当然不是特殊的状况，因为广东农民暴动的发展，与工人本身斗争的剧烈，已经直接提出广州暴动的问题。就是上海及其附近各县手工工人的

经济斗争，也是日益增多。豪绅资产阶级没有方法解决这些斗争，客观的经济状况，使他们只有更加残酷的压迫工人店员。主要的，只是工人阶级的群众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在日常经济斗争之中团结起来，引导更多更广大的群众，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之意识。尤其可以注意的，是城市暴动的严重意义，是在于城市中的暴动，必要使革命潮流，从自发的散乱的农村暴动，更进一步而搏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中心，使革命更进一步的到建立起有组织的中心势力。

列宁对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准备暴动的指示说；“暴动要能够胜利，必需不依据于军事投机，并不只依据于党，而要依据于先进的阶级。此其一。暴动要依据于民众的革命高潮。此其二。暴动要依据于日益生长的革命达到历史上的转变关头，就是革命敌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而且薄弱的骑墙的不坚决的革命友军也一天天的更加动摇。此其三。解决暴动问题的这三个条件，便是马克思主义与白朗吉主义不同的地方。”列宁这几句，是革命发展到决定胜负的斗争时期，所应当特别注意的。

现在每一区域之中，农民暴动的发展与城市暴动之关系，都有从发动斗争进于决定胜负的斗争之形势。现在中国城市之中，客观的条件多多少少都是足以造成群众的革命的高潮的，尤其是在农村暴动不断的爆发之环境中。城市工人以及各县手工工人店员的群众，应当尽量的发动；从客观上潜伏着的一切斗争问题，去发动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尽量的揭发国民党的欺骗政策。只有如此坚决发动群众的斗争，才能引导起更多更广大的群众，使他们深切的感觉到暴动与夺取政权的必要，决然进于武装的斗争——群众的武装斗争。如今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已经激起而武装袭击工贼，但是这还不够，必须一切革命的工人更勇猛的领导起广大群众的斗争，就是因此而要执行很

琐屑繁难的日常经济斗争也是非常之必要的。城市的暴动，将要在这种革命高潮的普及于广大群众的过程之中，生长出来，而成为工农暴动在大范围内胜利的中心和指导者。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的
《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期刊印。

注　释

〔1〕指贺龙、叶挺。

PDG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央：

兹有下列重要报告，请求指导：

一、张[1]、李战争与李、黄冲突：张、李战争爆发后，西江战争非常紧张，张等亦拼命调兵遣将以御战，黄琪翔任西路总指挥，惟江门第十三师陈章甫部并未与战，已退出江门，据报载陈部已退阳江，江门已被福军四十五团占领。黄琪翔在肇庆设总指挥部，因陈章甫部未歼灭，又未能深入攻梧州，故西江战事仍未有若何接触。这当系李济深部属，等待李济深返粤，在汕头建设政府，决定了整个计划，然后一举而三面反攻也。

在目前张、李战争当中，张内部又将发生变化，这就是朱晖日与黄琪翔由暗斗而至明争之酝酿，朱与黄冲突之事实显著者：

（一）朱之第十一军为李济深取消，合编为第四军，军长为黄琪翔夺取。

（二）在事变前，黄欲以军事厅易朱之公安局，朱不允，黄又自任卫戍司令替代朱之职权。

（三）朱是非常怀疑黄是共产分子，极恨黄，黄亦以朱晖日撕取其红纸白字之政治标语，几欲下手令捕朱。

（四）在学校中黄派人拿“树的”分子，从这些事件中，朱有倒黄而兴之势，同时，朱且有占优势之倾向。

二、张派在广州之军事及其对付我们之计划：张派军队在广州者约有六千武装，燕塘炮兵团约千余人，其余则为警察、宪兵营、特务队等，其比较利害者则为炮兵团；至福军则素不能战，警察等亦不过神主牌而已。此次陈璧君归粤，衔汪[2]命而来，汪要张等：

（一）不要释放政治犯；

（二）设法解决教导队，因教导队为我们的力量故也。

在本月一日张召集护党大会，我们准备了数百工人，当张、黄演讲时拿出了红旗包围了会场之四周，张命兵士拿工人，惟兵士颇有难色，卒由张卫队捕去数人，这足见张之凶狠面目，更在群众面前暴露。因此我们很可以看得到，张发奎一方面极力向农工群众进攻，不过一方面又因力弱而怯于工农群众之奋斗。

三、我们的力量及准备：我们决定广州之暴动，已详前函之报告，目前估计我们的力量，在工人群众方面，已经召集过各种代表大会，煽动他们起来总同盟罢工，作夺取政权之暴动，现在主要如海员、油业、手车夫等是有把握的（只江门轮船决定加薪口号并即准备罢工），不过渡船方面则较差耳。至武装方面，工人赤卫队已有三千人之组织，发展仍是可以，教导团差不多全数可以指挥，警卫团亦有二百余，工人赤卫队枪亦很少。至于敌人军队里之宣传工作，仍做得不尚好。市郊农民方面，已派得有同志去，如果广州暴动起来，是可以随之而起的。

省委认为广州暴动之时机已到，此时如不动作，教导团力量将被其解散，同时敌人更加紧的向我们进攻，故广州暴动即须很快的发动。但为要保卫广州之胜利，则须各地农民群众暴动起来，才有把握。特别是海陆丰暴动必须向惠州之南部平山、淡水发展，直趋广九路，与东莞、宝安之农民联合，以保

护广州之暴动胜利（保安队可起来，农民、土匪有二千余武装，县委已决定暴动）。因此，省委特别派张善鸣同志即回海陆丰主持工作，并派去广州工人代表团往海陆丰参观，以引起工农联合夺取政权的更热情绪，使海陆丰兵士更勇敢的奋斗，猛烈的向惠属方面发展。

四、暴动政策之决定及暴动后之准备工作：根据上述的情形，省委决定明日即行爆发广州之暴动。党提出来的口号：

（一）工农兵联合起来要饭吃，要衣穿，要太平；

（二）一切政权归工农兵政府；

（三）没收资本家财产，没收土地归农民、兵士；

（四）暴动开始即缴保安队、警察枪械，即继之以总同盟罢工。

暴动后，我们准备要做的主要如下，就是目前的行动政纲：

（一）建立苏维埃政府（以工人九、农民三、兵士三、党三人组织之）；

（二）消灭反革命派（杀工贼及缴敌人武装等）；

（三）革命治安由政治警察维持；

（四）没收阔佬房子给工人住；

（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六）没收大资本家财产；

（七）政府给养失业工人；

（八）维持罢工工人原有的权利；

（九）没收一切土地归农民；

（十）组织红军（预备教导团补充成一师，赤卫军一师，海陆丰一师，共三师）；

（十一）提高士兵月饷二十元（无论如何设法照二十元给他们，影响敌人军队）；

（十二）取消租捐附税及债务；

（十三）革命工会绝对自由；

（十四）组织革命裁判所以及军法处；

（十五）工业国有（银行、铁路、大工厂没收）。

以上这些无论政权能维持几久，甚至三天或一星期，我们都要作去。

五、我们的要求：

（一）中央对此事给我们以迅速而详细的指导。

（二）派恩来[3]同志来指导最近工作。

（三）即寄十二月份经费来。

广 东 省 委

十二月十一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刊印。

注　释

〔1〕指张发奎。

〔2〕指汪精卫。

〔3〕即周恩来。

PDG

广州苏维埃宣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切一切一切工农同志们：

在十二月十日夜至十一日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一切政权都拿在工农兵手里。赤卫队和教导团联合夺取了公安局及一切政府、军事、财政机关。在城里几处次要的地方尚在肃清中。红军用他在公安局夺取的铁甲车、机关枪、大炮解决各反革命的反抗。

同志们！你们的胜利在革命历史上是伟大的，在世界革命的关系上，是很重要的，很值得赞美的。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亚细亚洲也是第一次。工人群众夺取政权，组织了苏维埃政府。

你们的胜利，对于帝国主义是很大的打击。你们的胜利，为世界革命，为你们的领袖第三国际是很有意义的。

工人们、农民、兵士同志们！我们驱逐黄琪翔、张发奎，因为他们都是反革命，与李济深、黄绍竑一样。应该逮捕和枪毙一切反革命派及其走狗。这是我们在贪赃受贿的国民党指挥之下不能做的，只有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才能做的。

同志们！

广州苏维埃在他的第一次会议中有下列的决议：

一、广州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兵士。

二、苏维埃的武力，组织三军，第一军由赤卫队扩大组织而成，第二军是海陆丰的农民赤卫军，第三军是以教导团作中心，加上许多走到工农方面革命的军事组织而成。

三、为保护苏维埃政权，一切工人、农民、兵士及下级革命军官应该到红军中去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及反革命派。在最

近几天至少应该组织五万红军！我们所有的战胜品可以武装我们的红军。红军不是军阀的军队，是志愿的革命军队。红军不是为军阀的腰包奋斗的，是为给米与工人吃，给土地与农民耕，解放一切被压迫阶级及给帝国主义与一切反革命的死亡而奋斗的。广州工人们即刻来广州市各处红军征募处登记。

四、应该一点都不怜惜的消灭一切反革命，应该枪毙一切有一点反共产行动或宣传，或有反苏维埃的行动或宣传，及与帝国主义做反革命宣传的分子。

五、应该即刻给工人八小时工作制。

六、没收一切大资本家的公馆、洋楼做工人的寄宿舍。

七、苏维埃政府应该维持失业工人的生活，其需要若干，先由各自工会制定预算呈报苏维埃核发。

八、苏维埃宣言：维持并增加省港罢工工人原有的利益和特权。

九、只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他所属的工会才有一切自由的行动，什么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和什么国民党自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其实是反革命的工会），应该即刻封闭。他们这三个工会领袖不是工人，而是白色恐怖的走狗，应该扣留起来即刻枪毙，同李济深和张发奎的工会改组委员也应枪毙。至于在这三个会下面的简单工人，他们反对他们领袖的，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而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同我们一样做一样苦的工作，得同样子的工钱。因此，我们不追究这些工人，并且希望这些工人即刻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与他所属的工会。

十、禁止国民党的活动，他的一切组织应即取消，若是有为国民党宣传的，应该受革命的裁判。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合作的时候是革命党。以前工人倚重国民党，现在还有很大的敬重于国民党的创造者孙中山先生，他是帝国主义的仇敌，人民的朋友，虽然他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自蒋介石四月的政变和

汪精卫七月的政变以来，国民党完全变成了反革命，帝国主义的工具，枪毙工人农民，欺骗兵士，真是国民革命的叛徒。国民政府的军队是拿来保护资本家地主和富农利益的，他们的领袖南京派和张发奎派都是一群反革命的、强盗的、压迫的和杀人的反革命分子。因此，现在还在国民党内留着的工农兵应该即刻退出国民党，倚靠着唯一可靠的苏维埃政权。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我们在广州有伟大的胜利，但我们的工作尚未完成，而且到处还有很大的危险，我们应该用我们最后一点的热血，保障广州苏维埃的政权。我们应该解放全广东和全中国的被压迫民众，我们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帮我们。三千万农民开始全广东的暴动，一致与他们前进，倚靠广州英勇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我们的胜利将是不可估量的。

打倒蒋介石、汪精卫、张发奎、李济深、朱晖日！

杀死一切压迫人的人！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工人、农民革命万岁！

共产党、共产国际万岁！

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万岁！

广州苏维埃主席　苏兆征
人民军事委员　张太雷
人民内务委员　黄　平
工农红军总司令　叶　挺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江西工作计划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

江西自“八一”以后，反动势力日益加紧的向民众进攻，通令停止一切民众运动，捕杀工农领袖及革命分子，大施行其白色恐怖，尤其对于工农的压迫，为工农群众所不能忍受；厂主店东在反动的国民党及政府掩护之下，拼命向工人反攻，减少工资，增多工作时间，大批的开除工人，取消工人过去由斗争所取得的一切待遇条件，工人生活的痛苦，实较前过去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加倍惨酷，各地工会的组织更摧毁无余；同样豪绅地主也极力进攻农民，不但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不与执行，甚且连上年由农民协会所决定减去的租谷，还要追索，农民稍有反抗，即行拘捕惩办，同时借清党名义，到处敲诈农民，禁止农民一切行动。工农群众，至此已经深切认识所谓国民党及政府，完全是豪绅地主资本家的代表，是他们自己的敌人。新军阀战争爆发以后，拉伕封船，勒捐加税，发行金库券，民众更不堪其骚扰，于是不能不谋自救的出路，遂到处爆发了群众的斗争。

江西党的力量太薄弱，不能领导群众，甚至阻遏群众的斗争。如鄱阳群众要杀豪绅县长，要缴人民自卫团枪支，当地同志恐糜烂地方，力加阻止；修水农民要杀土豪劣绅，而当地负责同志说他们是体面人，不能过分处置；万安群众早有充分的力量要起来斗争，而党的负责同志因斗争破坏组织，亦

力为遏抑。

党所领导的斗争，亦陷于下述的两种错误：一、没有发动广大的群众，以群众为斗争的主力，只是凭借几支枪攻城，缴械、打反动派、杀土豪劣绅，使群众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养成依赖武装的心理；二、党的政治宣传不深入，使群众不能有很明确的政治意识和要求，所以一遇敌人的反攻，即表示畏怯甚至解体。如过去星子及近来吉安、万安、泰和等县的暴动，都失败于这种错误。如不力加纠正，让他继续下去，将来江西的暴动工作，必成为单纯的军事投机，而不是群众的革命斗争。

党对于工人运动，在主观上不免疏忽，至少不及农民运动那样重视。固然，江西工人不能及农民那样蓬勃的自发许多斗争，然就他们的生活状况，除了斗争，别无出路，如果我们努力的去领导，未始不能发动大的群众斗争，并且九江、南昌、吉安、景德镇等处的工人群众曾发生过斗争，因为得不到党的领导，致被敌人压迫下去，即是明证。

江西党过去中机会主义的毒太深，所以“八一”以后，反动的压迫一来，几乎全体瓦解，最近各地斗争中，一般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更表现了畏缩、投机，甚至反革命的倾向，这是江西党的致命伤。

江西的党此后应当极力注意城市工人运动，单纯的农民斗争，即会胜利，也不能成功一个真正的工农苏维埃政权。

江西工人运动，目前要普遍注意的是工农联合的宣传，进行秘密工会的组织，普遍发展经济斗争，健全党的工人支部，使其能够真正领导工人斗争。目前主要的口号应当是：“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恢复‘八一’以前的待遇，反对救济，反对屠杀工人的朱培德及反动政府，工人管理工厂，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等。

南浔铁路为江西最重要产业，应当马上恢复并发展各站党的支部，组织该路失业工人以影响在业工人，限期成立全路秘密总工会。

九江为江西最重要的工人区域，并有不少的产业工人，党应特别注意指导九江的职工运动，利用工人群众眷念旧工会的情绪，马上秘密恢复九江总工会及各分会，对纱厂、火柴厂等处产业工人尤其须注意，店员及码头工人在九江也是重要成分，不可忽视。

景德镇有广大的失业工人，党应领导他们作复业的斗争。工人对过去工会失掉信仰，党应当领导他们起来重新组织工会，宣布过去工会负责人的过错。

乐平应注重机械工人，土工自然亦不应忽略，党的支部亦须向机械工人中发展。

南昌、吉安以及其他城市，应根据上述总的原则进行秘密工会的组织，发展经济斗争，健全工人中党的支部。

赣州有广大的工人群众，且经过多次斗争，此后斗争的方式，应当由经济斗争很迅速的转变为政治暴动，尤须在行动上与农民联合一致，建立一工农政权。

农民运动在一般工人中应注意秘密农协的组织，尤其要在斗争中健全发展他的组织，作深入的土地革命的宣传，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实行抗租抗捐抗粮不还债等运动，实行屠杀土豪劣绅政府官吏，自动手没收地主土地及反革命派财产，一直达到总暴动的局面。此外因各地情形不同，亦应分别注意。

在东北各县如鄱阳、余干、东平、弋阳等地，反动派因宗法关系，也领导了一部分群众，并且有不少的武装，我们应当以阶级利害关系使群众离开他们，收缴他们的武装，发展广大的深入的群众游击斗争。目前因为群众的组织上政治意识均不十分坚强，还未能成就割据的企图，临川挨户团的工作应特别

注意，应在团中发展党的组织。

西北修水一带，党与群众都是开始建立基础，要努力发展游击战争。同时须与湘西、鄂南农民发生密切关系，互相声援。

南浔路各县如九江、星子、德支、永修等处农民须与南浔路工亲密联合，继续不断的举行游击战争，破坏铁路，断绝交通。

西南农民过去基础较好，且经过多次斗争，莲花、宁冈已被农民占领，万安、泰和亦迭被占据，不久可以合莲花、宁冈、遂川、万安、永新、安福等县，创造一个暴动割据的局面，深入政治宣传，更加强群众对于政权与土地的要求与决心。结合赣州工人与赣南农民扩大割据局面，同时与湘西茶陵、攸县、桂东等处亦须发生密切的关系。

江西有好些党员现尚存在国民党内，并且有些党员是因为北伐胜利经过国民党的组织加入党的，以至许多豪绅官吏在本党与国民党合作时，亦就摇身化为共产主义者，其实他们是借着本党参加政权的机会而猎官而收得政治和社会地位。所以结果国民党反动了，我们党的政策虽已确定了退出国民党，反对整个国民党、号召工农群众为实现苏维埃政权而争斗而暴动，但这般党员却停留在国民党内，停留在政府机关中，做出许多凭借国民党政权压迫工农、停止工农争斗的反革命事实。固然停留在国民党中的党员未必尽是腐化的同志，或还有许多可以从国民党中奋斗出来作反国民党的广大宣传，但许多反动事实昭彰的同志，江西党部必须予以严厉的处罚。同时对于反国民党的宣传也应尽量扩大，并须利用统治军阀对于农民群众之各种压迫，屠杀工农的新的事实继续不断的在工农民众面前揭露其罪状，务使工农群众深切了解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必趋崩坏和工农政权的前途日就成熟，以引起工农群众广大的参加暴动之

决心。同样亦可使一般被压迫民众引起对于国民党深厚的厌恶。这种工作在国民党并无深厚基础的江西，并非难事，尤其是急需做的事，只是党内和腐化分子的奋斗，负责的省委必须以全力促其进行。

因为有些同志未曾退出国民党，自然在反革命军队中同志的工作，亦就未能循着党的新军事政策前进。省委须负责指导反革命军队中同志，努力于兵士的宣传，秘密的组织创造破坏和分裂军队的机会，如借着索饷、改良待遇、发被服、反对肉刑、要求财政公开等问题，鼓动兵变，战至败兵逃入农村，变成农民的武装力量。如驻扎地点合适，更宜与县委或乡村支部在党的组织上有负责机关的极秘密的关系，以备于有群众发动的必要时，引导队伍助成暴动参加暴动。这时亦须使工农群众的意识深入军队，而军队与工农群众亦能在非党的组织上有群众团结和联络。如达到这些目的，党必须注意于军队中党的支部严密的组织和训练与兵士支部之发展。这种组织和当地党部的关系须极端秘密，军队中有些腐化同志不能执行党的新政策时，亦须不姑息的予以淘汰，省委之下更须组织破坏反革命军队委员会以计划全般工作，备省委执行。

江西的党应当重新创造，将过去腐烂的基础根本推翻，从工农同志中提拔新的积极分子作党的干部，参加各级党部的实际指挥工作。

过去负工农运动责任的同志，给了群众很坏的影响，党应严重的予以处分，并向群众公开宣布，以挽回党在群众中的信仰。

党的省委应马上执行清党及改组各级党部的计划，改组的方法必须是由下而上经党员群众详细的批评并讨论党的工作，实行用群众选举的方法改组各级党部。

党的省委须有工农同志——至少一人，参加常委日常的指

导工作。取消特委的组织，由省委经常派人分区巡视各地工作，并在最近期间须切实执行清党及改组各级党部的计划。

党与团的关系，若特别密切各级党部，对于各级党部的意见应尽量加以考虑与采纳，同时尤须注意指导党的工作，纠正团员盲动的错误。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六期刊印。

PDG

中国共产党为广东工农兵暴动建立苏维埃告民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同志！

广州的工人兵士已经暴动起来，将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张发奎、黄琪翔打倒了。广州四乡的农民也已经起来参加革命的暴动。广东各县的农民暴动正在发展，尤其是海丰陆丰等东江一带的农民暴动，早已得到胜利。如今全广东几千万的工农兵士都在剧烈的奋斗，要根本推翻土豪乡绅资本家国民党的政权。

这是工农兵士群众第一次革命暴动的胜利。这是工农兵士群众第一次自己起来取得政权——广东工农兵士群众已经自己遣派代表，组织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组织工农革命军，实行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没收反革命资本家的工厂公司，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真正保护工人利益的劳动法……，广东的工农兵士自己动手解放自己了！全国的工人农民兵士赶快起来，继续着广东工友农友斗争，争得我们自己的解放。只有这样，才能免除豪绅资产阶级的剥削，才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

自从国民党背叛中国革命之后，不但北方军阀更加凶暴的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九期。

压迫屠杀工农，不但国民党的新军阀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张发奎、黄琪翔、唐生智、何键、程潜等等，残杀我们工农，而且这些新旧军阀互相混战，驱遣我们兵士同志做炮灰，又使我们工农贫民的生活更加痛苦，又使豪绅资本家更加重的压迫我们。同时，国民党的各派，虽然各自依附军阀，互相争权夺利，然而他们一致的站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方面，来压迫工农。国民党军阀互相的混战，苛捐杂税，拉夫派粮，破坏全国的经济，使全国几万万的工农贫民兵士流离失所，冻死的冻死，饿死的饿死，杀死的杀死。国民党的政府还要定出法律来，帮着资本家，实行强制仲裁禁止工人的罢工，组织工贼走狗的所谓“工会”压迫真正工人的集会结社自由……国民党的政府，还要帮着豪绅地主，强迫农民交租纳税，勒收种种苛捐，满布贪官污吏，敲剥民脂民膏。国民党的政府，为要巩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权力，并且和帝国主义去勾结，将工人夺回来的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英国，禁止抵制日货；国民党的反动，英美日帝国主义者得以横行中国，动辄惨杀中国的人民和兵士。总之国民党背叛革命，使全中国都在白色恐怖之下，全中国都在军阀混战之中。

国民党以前说革命“唤起民众”，但是，他唤起了民众，却并不是甚么与之“去奋斗”，而是屠杀民众。民众是起来了。民众起来革命是要推翻豪绅地主，是要实行耕地农有，是要实行劳动保护，是要推翻一切剥削和压迫，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众政权，是要彻底解放中国，使中国真正成为几万万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中国。国民党却正反对这些事的实现。国民党看见民众要实现这些要求，他便立刻反动——所谓清党反共，便是排斥代表工农兵士群众利益的共产党，便是压迫工农的革命运动，国民党便由此而变成纯粹军阀官僚的党，变成豪绅资产阶级的党。现在国民党的各派，不论是蒋介石、汪精卫、李济

深、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何键、李品仙、冯玉祥、阎锡山，没有一个不是已经屠杀了成千成万的工农的，没有一个不是克扣军饷搜刮民脂民膏的。从今年四月蒋介石上海屠杀以来，经过两广浙闽的大屠杀，经过武汉汪精卫、唐生智等的反动，经过张发奎、黄琪翔、汪精卫回粤残杀示威的工人群众，国民党所杀的工农民众，至少总在三四万人以上了。这些屠杀表示甚么呢？这就是表示国民党要保护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而剥削工农，国民党成为工农民众和全中国的敌人，国民党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表和刽子手。中国的工农民众和兵士，实在不能再忍受这种残暴的剥削和压迫了。中国的工农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暴动起来，推翻这些军阀国民党的统治，推翻豪绅地主资本家！

中国的工农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屡次起来暴动反抗，日常不断的奋斗：湖南、湖北及最近江苏的农民暴动，武昌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叶贺[1]军队的南昌暴动和占领潮汕——虽然这些争斗都被反革命的国民党所摧残，但是群众的革命势力始终是存在着。如今广东的工农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起来暴动而得着胜利了。这一种革命力量是从工农群众自己的奋斗之中生长出来的；他们不是靠甚么军队来替他们革命，可是他们能够自己创造出真正革命的民众的武力——工农革命军：他们自己暴动起来夺取敌人的武装，他们和兵士群众联合，兵士群众自觉的参加暴动反对反革命的军阀长官，他们不想望任何官僚军阀政府的“法律政治”来解放他们，他们早已看出国民党的所谓农工政策完全是欺骗和屠杀压迫的政策，他们自己起来组织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苏维埃政府，自己来定出法律政治，真正保护工农的法律政治，真正打倒豪绅地主资本家势力的法律政治。这是全中国工农兵群众的革命先锋。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我们的胜利，已经

在广东开始了；我们大家要一致起来拥护这一胜利，扩大这一胜利。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我们敌人的势力还有很多很多没有铲除，他们一定勾结起来，一定勾结帝国主义，来进攻革命的广东，他们正在各地死命的压迫剥削我们的工农、兵士、贫民。我们应当以全力来进攻反革命的势力——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势力；我们应当拥护革命的广东工农，我们要一致拥护广州的工农兵代表会政府——苏维埃政府，中国第一个真正民众的革命政府。我们并且应当团结起来，打倒当地的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势力，我们大家都要像广东的工友农友一样，起来组织自己的政府：赶快准备我们的力量，赶快团结起来，赶快武装起来；只有这样，我们工农兵士民众革命的斗争和暴动，在各地打倒一切反动势力，才能真正统一中国，创造真正民众的独立中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才能真正解放中国的工农，铲除一切豪绅工贼，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实行耕地农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实行工业、银行、矿山、铁路、航轮国有，与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和苏俄社会主义的国家联合起来。

全中国的工人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扩大巩固我们阶级的组织，造成群众的工会，反对资本家的进攻，准备武装暴动。不要替反革命军阀运兵去打广东的工农兵代表会政府。

全国的农民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群众一致的抗捐抗税抗租不还债，武装暴动起来，铲除豪绅地主，没收土地。不要给反革命军阀的粮饷，解除他们的武装；不要让他们的军队通过去打广东的工农兵代表会政府。

全中国的兵士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杀死你们反革命的军阀长官，不要听他们的命令去杀工农弟兄们。你们原都是贫苦的工农，你们应当赶紧和工农联合起来暴动。你们都

是穷得没有田地才当兵，你们即使有田也不能耕，你们即使要做工也不能做，这都是因为军阀混战扰乱全国，使你们穷困失业，这都是因为军阀豪绅地主霸占了你们的田地，还要教你们去做炮灰。你们的出路只有和工农联合暴动起来，夺回田来耕种。你们应当和广州的兵士同志一样，自觉的起来参加革命。

中国工农兵代表会政府万岁！

苏维埃的革命万岁！

拥护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政府！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一切军阀！

打倒国民党政府！

中国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铲除豪绅地主资本家的一切权力！

解除豪绅地主资本家军阀的武装！

工农兵武装暴动胜利！

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土地国有！

一切土地归农民耕种！

没收中外大资本家，实行工业国有！

工人监督生产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颁发土地给兵士和贫民！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

国家救济失业工人和贫民！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PDG

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发动武装起义给湖南省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湖南省委诸同志：

两个月来，未接到你们一个字的工作报告，这次专人来要钱，亦不带报告，在此决战紧急的当中，中央竟与你们断绝了关系，殊为可惜！扩大会议的文件谅已接到。自所谓“西征”以来，中央对你们有两次书面指导（致两湖合信），第一次是在“西征”刚发生时候，认为“西征”战争中，两湖有实现总暴动的可能，要你们实际的准备实现这一可能，并报告中央。第二次是在扩大会议后，唐生智刚刚出走的时候，中央看见两湖特别是湖北在唐军溃退时，没有能够暴动起来，连大的骚动也没有，认为两湖省委未能遵照中央之指示在事前有所准备，所以又写第二次信，指明“西征”不会暂时结束，军阀的混战将继续延长，因此其统治必然比从前更不能稳定，两湖省委应于最短期间布置出来一个总暴动局面，以便适当时期爆发起来。这些信谅你们已经接到了，你们是否接受了中央的指导？接受了是否切实在那边执行？中央丝毫无从知道！你们这样脱离中央的指导是一件很大的错误，中央训令你们立即改正！

在客观的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中央所指示的正确。军阀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一期。

战争固然尚在继续发展，而工农群众方面亦正因受了这种到处不息的军阀战祸所给予的痛苦，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就是中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对于国民党统治的信仰亦表示动摇。武汉工人在失过暴动的时期（唐军溃退）以后，还能成千成万的起来，以群众的力量宰杀国民党改组委员，可见我们湖北的党如果事前有积极的准备，不坐视着机会一天一天过去，则在唐军溃退时，武汉实现工人群众斗争的极大发展是有可能的，而各县农民暴动更是必然可以爆发的。在广东方面，他们在叶贺[1]失败以后的工作，可以说遵照了中央的指导，在叶贺失败时，中央立即告诉广东同志，这只是军事的失败，广东的工农暴动，并不会因叶贺失败而消灭，须改变从前等待的错误，更加努力领导工农自己暴动起来。海陆丰在这个策略之下做了很好的成绩，到现在我们的势力已经占据了海陆丰、紫金、惠来等县，田也分了，地主也杀了，田契、借单概行烧毁了，农民差不多全部动员了，苏维埃的政权已经正式成立了。海陆丰的暴动不过是广东总暴动计划的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客观的条件与主观指导的力量都较强，所以格外有成绩。广东的总暴动一直到十一月十七日张黄[2]为主的广州政变发生，中央认为实现的时期已到，要广东省委作更具体的准备。十二月十一日广州的暴动，在时机上和准备上说，尚不是合于预定的，然因为有汪精卫的青电，先发制人是万分必要的，况且在事实上，已经有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并且有一部分革命兵士从敌军中响应暴动，在条件上说，也是有了相当的成熟。由上面的叙述，可见工农群众虽在我们党屡次领导错误之后和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只要我们党真能有决心去领导他们往正确的战线上走，他们是很勇敢的前进的，而且胜利是有把握的。

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已说明白，广州暴动不仅是广东总暴动的开始，并且是全国暴动的一个信号，又肯定的说明广州一

城纵会遭受一时的挫折，但广东的总暴动必定是从此向前扩大，因此在广东境内当然要立即发动各地工农暴动，来决定广州暴动的最后胜利，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工农群众要从自己的斗争来援助响应广东的暴动。特别是两湖，在中央预定的计划之下，应该最勇敢最坚决的实现自己的任务。

在湖南，前次秋收暴动，只是一次非群众的工农军的军事投机，这一次的失败至多亦只能说是工农军暴动的失败，不能因此推断湖南工农会受秋暴失败的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的省委在马夜事变后，根本放弃了工农群众及党的组织上的工作，下面的党部极少部分参加了秋暴工作，因此秋暴失败的影响在组织上亦不会大。在事实上据一些零碎报告，醴陵农民在秋暴失败之后仍然大批加入党，而且自动的缴团防枪支，长沙锦绣镇某乡当秋暴后，长沙县寻去恢复党部，农民有五六十人闻信要求加入。又一般的农民群众听说仍然要杀土豪劣绅，大家高兴的了不得。据□□□同志说，工人群众虽然长期的脱离了我们党的领导，然而革命情绪并没有完全低落，至于党员团员的下级群众，则一般的还不会落在工农的后面，只可惜我们省委自马夜事变以至上次的改组，根本放弃了工农斗争和党的组织工作。根据右面这些零碎的报告，中央相信湖南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依然是高涨的，是在无组织的暴动的路上。同时相信湖南的党员群众依旧可以尽其为工农暴动的领导者的使命。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省委对于湖南的工农暴动的实现有无信心？有无决心和勇气去领导？是否开始着手有计划的准备工作？党员群众是否和工农群众在一块？工农群众中暴动的政治工作是否有了相当程度？各地特别是重要区域党的组织是否有了相当的恢复和改造？中央新的政策是否达到了重要区域的党员群众中去？一般的工作同志对暴动的认识是否有了相当的明确？工农暴动的武装技术是否有了相当的准备？对于这些实际

情形因为你们两个月没有给中央只字报告，所以对于湖南暴动的发动时期和步骤无法具体的指导你们。但是中央坚决的相信中央前此两次指导，绝对无疑的是正确的！

中央现在可以具体指出的有下面七点：

（一）湖南总暴动的中心，在政治上说当然是长沙，同时在以长沙为中心的附近十余县，工农斗争的力量和组织都很有基础，党的组织上的基础与广东比较起来，亦足以担任暴动的领导者的责任。因此省委总暴动的布置应当以长沙为中心，包括岳阳、平、浏、醴陵、安源、湘潭、湘乡、衡阳、衡山（这两县亦可不包括在内，可斟酌决定）、宁乡、安化、益阳、湘阴各县，党与团以最大的力量集中在这一区域工作，当然为指挥便利起见，便在一总区域中还可划成几个小区域。所谓准备就是按照上面一段所提出的问题的方法做去。

（二）湘南党的组织和工农的力量为湖南第二个有基础的地方，而目前的情形，我们有毛泽东部农军及叶挺第二十五师残部在那边，同时敌人的势力在这些地方又很弱，假使“西征”混战继续下去，两广战争一时不能结束，则湖南甚至完全空虚，那便是更好的暴动环境。在广东暴动的一方面说，湖南继续起来是更有必要的。因此，中央要你们立即派人去指导湘南建立一个非单纯凭靠军队而是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的局面，这个局面的中心还是在郴桂，抑在衡阳，则要看事实决定，这一工作要立刻能够实现。

（三）在湘西，党的力量和工农的力量虽然比较薄弱，然而常桃以上，沅澧一带，客观的环境——统治者之复杂和内部的冲突——比较别地方好。贺龙在那一带颇有历史关系，他还有好多流氓式的旧部可以发生关系（中央曾介绍这些线索由湖北省委转给你们），你们应派人去利用这些条件（当然不能幻想这些条件可靠）。在暴动的立场上发动当地的工农斗争和党

的组织，尽可能形成一个割据局面，并且在澧水一带要与湖北的石首、公安联络，在这点上须与鄂省委确定组织上的关系。

（四）赣西、赣南的工农力量和党的组织，在江西算是最有基础的地方，而且有些零碎的武装，农民们至今还有不断的零碎爆发的游击战争。湖南省委在湘东、湘南的工作应与赣西、赣南联络一气，中央除通知江西省委外，要你们迅速确定行动和组织上的关系。

（五）兵士中的工作在湖南特别重要，而且比较容易，因为唐程[3]军队全是湘籍，并且大部分是北伐期间湖南工农运动大发展的当中招募进去的，其中还有不少的同志。据报告唐军退到徐家棚时，工人向他们宣传，他们异常感动，可见这种工作在湖南是容易收效的。近来各地对于兵士工作差不多完全放弃了，广东有点工作，已经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在湖南全省暴动的准备工作中要设种种方法运动“兵变”，这个工作不仅经过党的组织秘密的去做，尤其要由革命的工农群众自动的去做（亦飞[4]同志当然可以提出许多工作的技术）。省委要把这个工作看成主要工作的一部分，与工农武装工作一样的重要。

（六）城市要成为暴动的中心指导者，尤其是工人阶级要在暴动中真能领导农民暴动才能成功。这无论在理论上与事实上都是应该如此的。秋暴的事实已告诉我们，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几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就是素有训练的安源工人。最近广州暴动的胜利亦是广大的工人为领导者。湖南重要的工人区域和重要城市的手工业工人都经过几年的斗争历史，比较是有斗争的经验和政治训练的。可是秋暴期间，因为党的整个忽略群众的原故，仅仅只有安源工人起来，可以说秋暴颇具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据间接的报告，湖南省委自马夜事变后，以至上次改组省委时止，对于职工运动完全放弃了。最近据□□□同志说，新省委已经开始职工运动工作，中

央认为这是对的，中央并且要湖南省委更进一步的不仅要把职工运动做成党的经常的基本工作之一，尤其在现时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阶段中，要站在工人阶级为暴动中心力量的观点上，去更加发动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加紧政治宣传、改进组织工人武装训练等工作，一直到工农联合暴动夺取政权。

（七）在党的组织方面，自从马夜事变后，受很大的损失，同时省委亦放弃了恢复改造的工作，不知新省委成立后情形如何？中央认为党的组织上的恢复和改造与否为决定暴动胜利与否的条件，在暴动准备工作中，要根据中央扩大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案及扩大会后中央二次组织通告，切实恢复并改造各级党部，特别是以长沙为中心的主要区域，应当在极短期间内完成。中央现在只能有以上的指导，兹特专人携函前来，望你们接信后三日内做一个极详细的报告，用药水写成交来人带转。这个报告应包括：（1）政治状况；（2）一般工作状况；（3）党的组织状况；（4）对于中央前次二次指导的执行情形；（5）对暴动的估量和准备工作；（6）军运和湘南我们军队的情形；（7）接到中央这次信后省委讨论的记录和决议。

中　央

十二月十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2〕指张发奎、黄琪翔。
〔3〕指唐生智、程潜。
〔4〕即王一飞。

PDG

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全国民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们！
全国劳动群众们！
全国亲爱的同志们！

十二月十一号是我们每一个都应当深记着的日子！我们将永远记忆着这个日子，因为这一天在广州高揭起了苏维埃政权鲜红的旗帜，因为在这一天广州英勇的无产阶级与广州近郊的农民联合一致推翻资产阶级军阀反革命的政府，建设了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

在这一天我们精悍的兄弟们，勇敢的同志们磨拳擦掌同向资产阶级反动底炮垒进攻，终于占据了一切政府行政机关！暴动的无产阶级，成千成万由广州近郊奋勇入城的农民以及投向革命的兵士们，大家都随手的武装起来，异常英勇的实行争斗，虽然军阀竭力反对，而广州终被劳动群众占据了，军官们都被从司令部中驱逐出去，警察都被从他们的警署之内赶出，银行电局一概被占，监狱概被开放，两千多被监禁的工农也全被解放了。

拥集在成千累万的群众大会之上的劳动群众在李福林军队

* 本文原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期。

底枪林弹雨之下，而意志始终坚决，终于将李福林的军队击退河南[1]，在广州建设了工农兵代表会的政权与广东革命政府，政府委员大多为工农分子。

农民与工人，苦力与水手，铁路工人与海员，人力车夫与手工业者，共同宣告：他们不能在豪绅地主资本家买办阶级商董及军阀们底政权之下再忍受下去了，他们不甘愿使自己的家庭再继续着被掠夺遭破产，使自己的婴儿再在工厂中消失其几尽的血液，他们不愿再交出用自己的血汗积聚起来的最后一粒米，去养活军阀豪绅。

劳农革命政府在成立的第一天便宣布革命政府之成立正为执行民众的意志：一切土地概交给用尽自己的力量耕种他的农民，立即除消使农民破产之杂税苛租等农民不能担负的重荷，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劳动与保障失业者……等等。这些都订为革命政府的法律，这些法律都是劳动群众亲自拟订的，这些法律都是劳动群众的名义颁布出来的。为保障这些法律，全广州的工人群众坚决的决定以保障这些法律的名义号召成千累万的农军奋勇入城，使广州的劳动群众与工人联合一致，号召革命的兵士都投向民众方面来。

为保障自己的政权，劳农政府使全广州的劳动群众联合一致，在战争之中立即组织起新的工农革命军，兵士大部均为工农分子而非旧的兵士，他们随手武装起来，从商店中夺取了长剑短刀斧头，一直杀到城中杀出城外，占据了广州兵工厂复换用枪械。

工农兵代表会联合了所有劳动群众成为整个铁的团体，在两天的短期之内组织了这个政权，震动了全中国任何一隅的劳动群众，燃起了每个工农的心房对于胜利的新希望，确信与决心……

工农兵代表会实现的第一秒钟已经引起所有的民众刽子手

之痛恨，仇视与莫大的惊吓与恐慌。他们一致在扑灭劳农政权的目标之下联合起来，企图使这个政权化为血污之海。

在劳农政权实现的第一秒钟已经使一切民主派、自由派、国民党以及其他资产阶级的杂种，王八蛋们忘记了自己口口声声高呼的“爱民”等甘言蜜语，同他们昨天还认为是自己的仇敌的杂种们一致来扑灭第一个工农政府。李福林、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在仇视图谋解放自己的工农群众之下，一致联合起来，由各方面进攻革命的广州，把广州铁桶也似的包围着。我们同志们的英勇终难于匡救自己……

工人与农民经过了三天的血战，至本月十三日，才被迫不能不放弃广州以冲出重围。

四千英勇战士的尸首纵横于广州街上。成千成万的工人冲出了广州，为保留自己手中的武器，以继续在广东已经开始的事业。

十二月十三日失陷了广州，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只存在了两天，但是同志们，我们在任何一刻能忘记了这两天吗?

残酷的反动不以屠杀四千英勇战士为足。新被逮捕的二千同志严遭拷问，嘲弄，而后尽被斩决，烧死。在广州被诬为共产党员者不知有几千百万，所有粗掌巨臂的工人和农民都被诬为“民众的公敌”，而胜利的军阀，张着血污的口残笑着假借民众的名义。他们的凶残在历史上只有法国资产阶级扑灭巴黎公社及白党反对苏联两事可比，他们的凶残掀动了残酷血潮扑入广州。新的所谓“讨伐”之师正向广东开拔，他们的目的在于扑灭广东一切民众运动，军阀们正在庆祝欢迎。

同志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十一、十二两日。存在两天的苏维埃政权——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可为我们的团结一致继续争斗直到博得胜利的标帜。

我们不能忘记，在狂烈仇视无产阶级之下不独军阀、资产阶级、地主及买办阶级互相联合起来了，而且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也锁在一起地携手起来，他们忘记了前仇，现在成为至亲好友。

美国与日本的船舰载运着兵士前往广州。英国帝国主义者正在煽动鼓吹军阀从事此举。将来由广东的讨伐必定是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共同压迫。现在他们——蒋介石、李济深、程潜、胡宗铎为此事都联合一致了。

现在他们唯一的敌人是工人与农民及苏维埃共和国。打倒帝国主义本是国民革命开始举起的旗帜，为什么现在把“反对帝国主义”这几个字样都忘掉了呢？为什么全世界劳动群众的至友，存在十年工农得安适生活的唯一无二的苏维埃联邦偏是中国政府唯一的仇敌？为什么在他们夺回广州之次日全中国各地的苏联领事馆都被封闭并被撤消承认呢？为什么把广州苏联领事署的办事员整个的捕去，斩决，而且污辱呢！为什么汉口苏联领事署署员也都被捕？为什么包围上海苏联领事署驱逐领事出境，而每一个从领事署出来的人都被检察呢？

为什么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的代表，没有一个西欧列强的代表提出反对已经确实的广州惨案？

同志们！这是因为一切资产阶级，一切地主，一切军阀与一切帝国主义者，现在结起了联合战线反对中国劳动群众及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他们把女工们活活的烧死，诬她们为共产党。军阀们亲自枪决劳农国家——苏联的领事，原不过因为他们是工农共和国的代表。

同志们，我们应当知道苏联的代表也同我们一块儿死难了，我们应当记忆着苏联领事署署员之被斩决死难，原因为苏

联领事署内高悬的镰刀斧头红色旗已经招展了十年之久，正是全世界资本家怒目仇视的标帜。英国与苏联断绝了国交，他们也望中国资产阶级照他们一样动作。

中国资产阶级重复博得胜利，其实正是他们的失败，一切被压迫民族唯一的至友被逐出中国之境，中国资产阶级便完全依靠着帝国主义。中国资产阶级消失了他最近的独立性，现在中国一切资产阶级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者掌上的玩物，驯服的奴隶。

反动重复庆祝胜利，白色恐怖的潮流掩没了整个的中国，但是是否能持久呢？就在他们胜利的第二天，他们又重新互相争斗起来。重复分占地盘割据中国依旧是他们目前的问题。我们敢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各派的纷争与互斗必将重新加厉起来。资产阶级现在虽然在广州得到了胜利，但是他始终不独无力满足工农群众的欲望，并且自顾不暇。

他们虽然在反对苏联与中国劳动群众的目标上结成了联合战线，但是怎样分占地盘，怎样剥削中国，及怎样分据中国富庶省区等问题依旧是他们纷争的焦点。

同志们，我们不要灰心丧气，我们必须知道，资产阶级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我们必须使他们这次胜利成为最后的一次。我们必须知道，从广州退出的革命工农兵士的争斗仍然是继续下去，我们必须用全力去帮助他们。我们反对反革命政权的争斗不应一刻放松。

我们要记忆着死难同志底鲜红血液正是争斗中的旗帜，我们必须高举着这个旗帜勇往前进，坚决我们的意志誓死争斗，不达到胜利不止。

今后，我们必须使一切劳动群众团集于工人阶级的周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作更有组织更团结一致的争斗，如此方能胜利。我们必须准备自己的力量作坚决的斗争，但可不是

立即总暴动起来。现在立即总暴动，将必败于残酷的反动之手。他们正希望全中国的工人以及上海工人现在就手持枪械出作巷战，以造成新的血海，使一切革命争斗长期沉没于血海之中。

同志们，我们不能作如此的盲目争斗。我们必须继续着我们勇往直前的工作，以推翻军阀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我们必须百倍的加紧这种争斗。我们同志们为坚决的目的而流的血正浸润我们，工人和农民。我们全副的精力必须注重于建设我们秘密的组织，我们继续作农民游击战争，我们必须推翻一切反动的统治，努力以博得胜利。

同我们携手前进，帮助我们的，有全世界的工人。同我一气的，还有苏联劳农共和国。我们的队伍不会有一分钟的分裂，我们有铁的决心去博得胜利。且让他们在今日庆祝胜利，我们以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一致的力量回报他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你们——全国的工人，举行定期示威罢工，以反对发生于广州，普遍于全国的兽类行动，向他们表示全中国工人阶级的愤怒，这种愤怒刺入全中国劳动群众的血管。

全世界的工人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正在不断的争斗，广州的工人与农民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已经争斗起来，而领导广州工农革命军作争斗的共产党，号召全体工人同志作定期示威罢工。共产党号召全体农民继续着反对豪绅地主的游击战争。共产党号召你们——全国的工农与劳动群众立即起来巩固自己的组织，准备着作新的斗争。共产党号召全体同志一致起来讨伐广州。共产党特别转告兵士们，你们不当为军阀之玩物，你们不当甘为民众之敌，你们自己都是工农底子弟，为什么任军阀们的指使去屠杀工人和农民？为什么以自己兄弟们的血污染自己的手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共产党确知在广州事件之中已经使

许多兵士醒悟过来，深信兵士们将必与工农群众联合一致在鲜红的革命旗帜之下共同奋斗。

最后我们高叫：

（一）打倒一切工人阶级及农民的刽子手！

（二）打倒资产阶级军阀的政权！

（三）推翻帝国主义者的统治！

（四）广州被压迫工农兵代表会政府万岁！

（五）全中国工农兵代表会的政府万岁！

（六）一切被压迫民族及全世界劳动者的朋友——苏联万岁！

（七）记念着苏联代表者的血液，一致拥护苏维埃劳农共和国！

（八）在红旗之下，严紧我们的队伍，锻炼我们自己武器以备新的争斗与胜利！

（一）[2]我们热烈的请求全世界的工人援助我们的争斗，共同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压迫！

（二）全中国的工友们我们要表示我们队伍的一致，一齐举行定期罢工！

（一）海员们及铁路工友们，农友们及兵士们不要让一粒弹丸一个兵士去打革命的广东！

（二）农友们继续的和地主豪绅争斗，夺取土地，与工人联合起来！

（三）兵士们转过枪头打人民的刽子手，打军阀官僚，一枪也不打工友们及农友们！

（四）中国的劳动者，广州之暴动是我们争斗的旗帜！

（五）全中国劳动者胜利万岁！

（六）全世界劳动政权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PDG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指广州市珠江以南、白鹅潭以东地区。旧称河南街。

〔2〕此处及以下的序号为原文所有。

PDG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广东省委：

省委十号报告及□□十二日来信均悉。你们的信到时，广州已告失陷。在报告中我们知道广州先发动的原因是由于迫不及待，必须我们先下手，这一点中央在未得你们报告前也同样料到，并且也认为非此不可。不过当时所过虑的即在各县农民暴动，尤其是近省县村农暴不及提前爆发，会合省城，结果将使广州城市工兵孤单，而尚未与桂军开战的粤军亦得从容开回到广州，围攻工农赤军，屠杀我们。不幸这一着果被我们料中了，现在屠杀的实况及赤军和工农群众退守而发展农暴的方向，虽还不甚明了，但超过巴黎公社的屠杀一幕，确已在广州开始了。

在中央的认识上，深信这次广州暴动是广东总暴动的开始，是全国各地工农暴动的信号。广州虽不幸失陷了，城市苏维埃政权虽仅仅建立了三日，敌人凶残的屠杀，虽给广东党部以莫大的巨创，但广东暴动的局面，必仍将在各县各乡村深入扩大，广东的农民过去未曾因叶贺[1]两万军队的失败而稍灰其心，且更在叶贺失败不久，便在海陆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所以，这次广州失陷，中央深信只要我们党努力领导已经爆发的农民革命的高潮，领导他作不断的发动，全省的暴动局面是必然成就的。尤其是东莞、宝安、和平山、三多祝的暴动联络与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稳固，是有极大关系的。北江、花县、英

德、曲江之继起，东伸是与紫金、沙河取远道的联络。南路的割据，中路近省城的骚扰，琼州暴动的深入和加紧割据的局面，这全是目前对敌人最迫切的反攻。总之，广东群众是久已起来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目标，在工农群众中也已认清了，军阀统治的纷争以至于开火，在广州失陷的第一天便重复开始了，目前发动群众推翻他们的责任便在我们。

为此，中央特派□□、□□同志赴粤工作，同时也负着在极迅速期间恢复省港工作的责任。

（下略）

中　央

十二月十八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PDG

中共中央关于武装起义计划等问题给浙江省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浙江省委：

前次中央派人和你们谈话后本拟再补去一信，信尚未及补而你们复从实地调查中增加许多新的材料，且杭州市委被获，□□□同志又复被捕，浙北浙西的领导机关和人才均都成了问题，因此中央增加了许多新的意见，会合以前的意见，分别指示于下：

一、在省委的常委会议席上关于暴动的论战，你们中间曾表示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以为浙省暴动必定要有扑攻省城夺取全省政权——也即是总暴动的计划；另一种倾向以为统治阶级的力量尚须各县暴动，宜找一省防军未曾驻扎地近偏僻的区域作一退路。这两种倾向虽在省委会议上否决了，但你们起草的暴动计划中仍隐隐约约含有这两种倾向。中央现时为你们指出这两种倾向的最大危险终结是军事投机。因为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做不好了或者还不如宜兴暴动。至不求土地革命在本乡本县本村之深入而先说这一退守区域，暴动发动后必很容易的离开群众或者不发动群众而成一单纯军事行动。结果不仅退守的合成一流寇式的退守，或竟成一无群众的溃败如

无锡事件而一无可退。这两种倾向在现时浙江实际工作上或已打消，但若由扑攻省城的范围缩小到专门扑攻的倾向，退守的观念化为上山的计划，则结果的危险也将如上面所述。省委于指导各县农民暴动或游击战争时不可不特加注意。

二、你们上次的暴动计划因为太不切实，故中央未予核准，现在你们从实际中过来也觉到上次计划之不切实。但中央非取消了浙江暴动，虽然暴动计划不切实，虽然目前的事实也无总暴动之可能，并且中央仍然可以坚定地说，浙江的农暴如能在各地从游击战争到暴动地不断发动起来，必会汇合成唯一的正确指导深入和扩大，所以浙江省委当明了自己的责任，一方须努力于党和工会及农民间组织的迅速恢复或建立，一方须指导这些已建立或将建立的组织，发展广大的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这一种斗争必须是群众的，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如浙西只要有可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的。浙东一带有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之可能，常山更可由乡村斗争转移到反抗国民党统治农民的局面。但这种局面必须加紧或建立党的指导而更发动群众来干，然后才有深入和扩大的可能，否则急于求成必致走到军事投机的错误之途。

三、土地革命在乡村在城市的最大目的是在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根本是与国民党统治不两立的。在发动暴动之前，不能广大的向群众作反国民党宣传，则这个暴动的政治意义必会湮没不彰，群众也必会无反国民党的决心。现在浙江有些地方我们尚有留在国民党工作者，省委必须依照扩大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案即速令其退出，在退出前后更宜利用机会作反国民党的宣传和破坏国民党的工作。

四、组织上省委遭受屡次的破获打击，组织人员自感到非常缺乏，中央也将尽可能的给你们帮助，但就根本的意义讲，

省委仍应从各种斗争中增加新的党员，提拔激进努力的工农分子到党的指导机关中来，省委常委除□□、□□、□□、□□四同志外，应加一农民同志使他学习。□□便望留在宁波工作，奉化则由本地找一得力同志指挥。□□能至浙北各县巡视，仍须使之前往以竟前功。自省委以下，各级组织都应依中央通告关于组织系统编制变更的决议改组，并须将详情报告中央。

五、□□带来信件，你们意见大致是对的，只是不可抛弃割据暴动和广大的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之决心。

职工运动费十二月份五十元交□□兄带回，工运亟须向宁波码头工人中求发展，铁路工人以及杭余、杭临、杭富各线的汽车工人，杭州城市工人亦须努力建立工作。没有工人斗争，便永远建立不起一个暴动局面。不过就目前事实讲，浙西本可以兰溪为中心发动割据式的农暴，但□□被捕浙西失了指导，如无得力人去，客观上可以发动的暴动，不是停顿下去便会盲动起来。浙北自然是统治阶级军事政治压迫的中心，我们党部经过几次摧残破获，不仅杭州工作受了很大影响，急需恢复，便是附近各县除富阳外也多似有若无、非加整顿不能谈到暴动的领导，甚至游击战争的领导。浙东南台温的情状，从前暴动虽有客观的可能，但自□□□同志被难后，即已消息隔绝，剩下的浙东有宁波、奉化做中心的指导，比较还算有党的力量。但就全局看来，省委现在当前的任务，首先便须恢复各地组织上的指导机关，然后方能提到工作计划。没有秘密工会的组织，说不到工人日常生活斗争的工作，没有农民中间的发动斗争组织，说不到游击战争在广大群众中发动，没有党的指导机关，更说不上暴动，没有工人阶级参加指导的暴动永不会汇合成为总暴动的。

中　央

根据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七期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在柏文蔚部队中筹办学兵团问题给安徽临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硕夫[1]兄并转各同志：

接到安徽临委十二月十一日来信，洗了好久终于没有洗清楚，不过大意我们是懂得了。

在军运新的政策指导下，你们来信所提各点，原没有什么大错，但我们有几个不了解的问题须你们切实答复：

1. 柏文蔚要我们同志去办学兵团，是明知这几个同志为C.P.，还是只知他们为得力的左派？

2. 假使柏已知他们为C.P.，他之用他们是否仅因安徽C.P.无力量不足惧，还是因为这几个C.P.是他的亲信同乡而可靠？

3. 柏办此学兵团，是否以用人招兵全权付给我们同志？

4. 学兵团一开办，是否即刻发枪？

5. 学兵团开办地址在寿县，寿县的驻防军有几多，其思想派别及下层兵士成分又如何？

6. 广州暴动的教训是不是会给柏以反悔？

假使柏不知我们几个同志是C.P.，一旦发现了，他必立即解决他们。反之，柏知道他们是C.P.，而又信任他们，但

* 这封信是周恩来起草的。

经过广州暴动的教训，恐要立即反悔，万一不驱逐他们，恐也要防备他们。如果这些都不成问题，自然我们要接办起来，但中央仍有以下的话要说：

1. 我们同志既公开地为柏所知，则学兵团的团长必须为我们同志，否则难以相处。

2. 学兵团一开办即须发枪。

3. 学兵团的用人权须要在团长手中。

4. 学兵团的成分，须由我们秘密负责介绍，最好多介绍些识字的工农分子及贫苦的知识分子。

5. 学兵团的训练计划，团长须有全权规定。

6. 三十三军的军官对学兵团之设办须要谅解。

为要实现上述的条件，我们同志对外态度开始工作可灰色点，以求握得实权而不致立即为人所忌，遭人排挤。学兵团果使能办成了，中央可派遣一些军事人才给你们。党与团的组织在学兵团中须绝对秘密，并须严分组织，以连（同队）为支部单位，彼此间须严禁来往，甚至连支部下之各小组亦无须彼此知道。仅小组长与支部书记来往。小组多时，支部书记宜分成几个小组长会议以直接联络之。团以下有两个同营之连支部，便应设一营特派员以指导之。团以下有两个不同营之连支部，便应设团委员会直接指导之。团委员会、营特派员、连支部之彼此关联均须绝对秘密，并均须以一人为限。连支部设书记一人、副书记一人，书记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副书记即应立起代理之。小组长外亦应有一副小组长备承其乏。团委员会不得超过三人，直接受省委指挥，其组织系统须经过军事科而到组织科，但政策之决定和指示，必须由省委组织破坏反革命军队委员会计划施行。在现在省委未成立前，此工作如一开始，应由中央巡视员直接予以指导。

且此工作如一开始，即宜认清这一运动是破坏反革命军队

的线索，实现土地革命的副力。故这一工作的政策决定和方向指导必须依照安徽工农暴动的方针定夺。尤其是寿县区域的农运更宜与此工作为密切的关联，以便农暴与军运到相当成熟时可一举而汇合成广大的农暴，广州、海陆丰近事便是明证。但这仅是说指导机关在未爆发前的密切关联，至下层群众在事前须断绝党的系统形迹上的联络，而改为群众公开的联络以影响学兵。又柏部士兵多寿州、合肥籍贯，更可因此学兵团而影响军队。

万一学兵团计划不成，而柏仍需要我们同志作军官时，只要能秘密达到以上的目的，我们仍可进去工作。

为磋商这件工作，中兄[2]特派史书元兄来，望宽[3]兄与之接谈为要。

又高桂滋、杨虎城部有胡伦为介亦可引进些同志进去做下级军官，进行上述工作，详情另见伦兄的报告。中央派去的人经芜湖时亦将与兄等接洽，以便受兄等指导。

沈　保　和[4]

十二月二十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即尹宽。
〔2〕中共中央的代号。
〔3〕即尹宽。
〔4〕中共中央的代号。

PDG

中共中央给陈独秀的复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独秀同志：

接到你的信，正想答复的时侯，失败的消息已经来了。大概的形势，现在还只知道报上的消息，但是太雷[1]被杀的消息，差不多已经完全证实了。巴黎公社的惨剧复演于广州……

广东暴动计划，中央前有决定，附上一阅。

来信所述诸点，谨答复如下：

第一点，看广东暴动计划可以知道。原定的计划是大规模的发动农民群众的暴动，解决其经济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参看海陆丰农民暴动的情形，布报第八期）。但是，据报上消息推测起来，这次广州的暴动，大概是敌方（汪精卫的青电）所逼出来的——适得我们不早些动作的，因为农民协会的大会还没有能开，四郊农民暴动的发动还没有起来。然而准备是确有的。此次广州虽失败，或不致一无所得，而且各乡仍可继续起来。（海陆丰，据历来所得的消息，所以不致遽失，广东同志云敌方非有五万以上兵力不能打下海陆丰来，因食粮子弹甚充足，而形势险要而能守也。）如此，则其他各乡之暴动，可以趁军阀混战而形成多部分之割据与再行汇合的局面，不过广州市内的损伤于我们实在很大。

第二点，“工农代表会”是广州所提口号——海陆丰已经实行，小商人及穷苦知识阶级对于政权已经不反对，而且赞成。

"苏维埃"则是这种政权的实质，我们即使避忌，敌人也是要宣传反对的。独裁则是这种政权的内容，现在固然事实上不是社会主义的独裁，但是确乎是民权主义的独裁（即无产阶级与农民分政权的政府）。独裁是任何革命中都需要的，这种解释，我们只有公开的对一切人宣传。无论如何避忌是无用的，也是不应该的。而中国实质上的"民权独裁"，其势非以共产党一党政权表现之。因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客观上不能形成甚么"第三党"。海陆丰工农兵代表会初选出来的时候，只有四分之一是同志，后其余人差不多四分之三加入我党了。至于关于"平民"的意见，请你详细告诉我们。

第三点，既然除反革命的国民党及革命的共产党以外，没有"半革命"的第三党（如左派社会革命党），则两党联席会议恐是不能实现的事实。

第四点，我们同意。

第五点，现在事实已经变更，自然已成另一问题。

中 央 常 委

附：陈独秀来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央常委诸同志：

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我有几个意见贡献于同志们参考：

一、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暴动时要立刻解

决农民的经济问题，这还不够，并要解决农村中一般的病苦事件，如此方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

二、“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我殊不以为然。政权的中心当然是工农，而不可用独裁口号。“苏维埃”本来只是会议意义，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别意义，我以为用“工农兵平民（贫民亦不妥）代表会议政府”似较妥当。（关于此点，我有较详的意见，兹不具陈。）（平民即被压迫中被剥削之意。）

三、关于国民党问题，我自七月以来，即以为我们不能再留在国民党，即不必再附属在国民党左派旗帜之下，亦即应独立行动；然同时亦以为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我现在仍旧是这样的意见。汪精卫在汉口时，我已察知其漠视农民利益，现在更加反动，广西老宣传广州共产政府仍举汪为主席，自然是极滑稽的造谣作用，惟广东方面，如尚赞成土地革命的国民党员，无论是团体或个人，我们应该与之公开的党外合作，不必强之加入我党。在民众工作上，在政府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在军事工作上只有我们的力量超过他们便无妨），都应如此。国民党各级党部如有赞成土地革命者，可许其存在，可与之开两党联席会议。即谭平山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们也不可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

四、广东离香港太近，易为帝国主义者所袭击，我们为保护新政权起见，反帝行动要十分谨慎。

五、苏俄同志，此时最好绝对不赴粤参加工作，他们最好

选择有革命经验者数人，在上海组织一委员会，帮助中国党的中央。由他们的委员会派一得力同志驻香港察看广州情形，及中国同志在粤工作有无错误。

独　秀

十二月十三日午前

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刊印。

注　释

〔1〕即张太雷。

PDG

中共中央关于第二十五师去湘南发动农民起义给朱德等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德兄并转军中全体同志：

自从三河坝与潮州的交通被敌人切断后，党的指导机关即与二十五师全体同志失了联络。潮州失守后，粤省委曾两次派人追赶你们，及你们退武平，转入江西信丰时，江西省委又派人前往接洽，最后知道你们已越大庾岭而入湖南，中央乃命湖南省委派人与你们接洽。但一切都是徒劳，始终未得赶着你们。现时你们的踪迹，仅从报纸上的记载和辗转传来的消息，似乎正驻扎在桂东和桂阳一带，惟仍未能证实，并且据江西省委报告，你们入湖南时，曾与范石生有一度之联络。此事如果属实，在广东暴动失败后，能否不为范石生所解决，很有疑问，因此中央特派李鸣珂同志经江西入湘专与你们接头。除了中央一切重要的决议和关于军事运动的新政策以及最近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情形和统治军阀崩溃的趋势，已令鸣珂同志口头向你们详细报告外，中央更有以下的话要说：

一、叶贺[1]军队在潮汕的失败，一方面固由于军事战术布置的不当（如入粤时不以主力攻梅县而直下潮汕，主力既集潮汕与东江敌人对峙，而又留二十五师在三河坝失其作用），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革命政策的执行有许多未脱旧时机会主义和军事投机的遗毒，以致入粤后，未能发动群众使军队化为

工农的武装力量，而造成土地革命在潮梅深入的局面，无广大工农群众拥护的军队便是侥幸战胜黄绍竑、陈济棠，结果也还是军事孤立，不能使土地革命深入，甚至于客观上还会阻止工农运动。因为革命的军队，假使不能与工农打成一片，则仍是一个雇佣武力听少数领袖的指挥，不能表示群众的意识，即是说，不能以工农群众的意识影响此军事行动。固然这种错误，当时前敌的军队不能负什么责任，因为前敌的指挥机关，在八一革命前，既未能得到中央完全的指导，而本身的指导又犯了很多错误。而广东省委以及南方局，对于前敌的军队到潮汕时可号召的工农暴动，亦未能有充分的发动准备；不过军中所有同志，应深切的了解这种错误，务使这种错误不再在我们同志所组织的任何军队中发生。

二、军事运动新政策的主要条件，是在党的新政策以工农的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由土地革命向社会革命的原则之上建立的。为了在反动军阀统治之下秘密的增长工农武装的力量，我们必须在工厂里农村中组织秘密的工农军；必须秘密的给工农群众和党员以武装的训练；必须组织群众的红色恐怖队，反抗白色恐怖的压迫；必须很技术的有计划的布置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需条件；必须在工农武装秘密的组织中，避免个人的英雄的无组织的指导。要充满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的斗争形势，更必须的是对于敌人——统治军阀——的武力，施以无姑息的破坏和分裂；在分裂和破坏的工作中，我们应一变从前巩固所谓国民革命军的态度，改成做侦探、做间谍、鼓动兵变、破坏军纪、勾引队伍逃走、引诱兵士卖枪、煽动兵士反抗官长、谋害官长以至全体瓦解的种种工作。自然这种工作是一个时候一个部队里所未能做到的，但我们作军事运动的人，有了这种计划，便不应丝毫放过。所以我们一方面反对国民党所属的一切军队，一方面仍应想种种方法秘密进去，做下级军官，

做兵士，进行这种破坏和分裂的工作。假使我们所鼓动的兵变和勾引的兵士能够成为一种力量，我们当然立即组织在工农的武装组织之内，进行斗争和暴动的工作。但是这种力量，我们必须认清是工农暴动的副力，工农暴动的主力必须是工农群众自动起来的武装，没有工农群众广大的参加，专靠着一部分的变兵，或已拿着几杆枪的武装队伍，工农暴动不会发动起来的。便是这种无广大群众参加的武装力量，杀了很多的豪绅官吏工贼，烧了地主的房子，分了资本家财主的财产，烧了借主的借契，充其量不过是梁山泊上英雄侠义的行为。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这样不但不能使土地革命深入，并且一旦统治阶级的军队以全力攻来，到了不能抵抗的时候，好则上山，坏则崩坏，群众中是无法藏身的，自然更说不到扩大群众的参加，蔓延暴动的区域，以抵抗反动的势力。所以我们分裂军队来助成工农暴动只能当做工农武装的副力看，切忌变成流寇式的队伍，来阻止暴动。现时你们队伍所处的境地和所负的使命，便应是这种工农暴动的副力。

三、关于工农暴动的范围，你们或已知道，你们队伍在暴动前后的责任，你们或已讨论过。不过我们要慎重指出的，你们用这种副力参加暴动或发动暴动时，必须避免军队投机的错误动作。大概军中同志，在这个新旧政策交替的时候，最容易把武力包办一切的观念移植到工农暴动上面来。譬如农民暴动一开始，必须是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然后才能使暴动中一切行动有意义而深印在农民心里。但军事同志则常易于初发动时便代替农民执行一切暴动动作，而忘了发动群众，或是专注意军事行动，企图固守一个阵地，或是扑攻一个城市，而忘了执行暴动中政治经济的、社会的、土地革命的各项条件。殊不知群众的暴动和军队的对垒有迥然不同的广狭意义，军队打仗是专门比赛技术，人的条件，是要在一定的技术范围内比赛

谁的勇敢，而群众暴动是要在广大的热狂的反抗的情绪中，趁着统治阶级的动摇的机会，武装了自己，推翻当地统治阶级的权位，夺取政权，同时并会扩大这种反抗及于周围的群众，以至于摇动敌人所雇佣的武装群众。技术条件在这里虽也成为暴动条件之一，但它却不能比暴动扩大群众、摇动敌人所奴隶的群众更占重要。认清了这一点，则我们以军队式的武力来参加暴动，便不会首末颠倒，否则我们不是因为群众尚未起来便代替群众单纯发动暴动，即是不信仰群众的创造力量，借口于几件技术条件之未完备便阻止暴动。前者是军事投机，后者是机会主义，你们带领队伍在城市、在乡村参加这一暴动任务时，必须防止这些容易陷入的错误，时时注意群众的发动，群众的扩大，以至敌人所奴隶的群众的勾引或煽动。

四、你们的军队如已确实到达湖南的桂东、桂阳地方，你们工作的对象，便应从这几个县份计划起。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系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各部分农军从前也有不发动群众，专门代替群众从这县打到那一县执行英雄式的暴动的错误，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在现时的湖南敌人势力空虚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既是那部分农军已经远走无法联络，你们在桂东、桂阳一带应该单独的做起来。当地如有我们的党部，自然应该与他们计议发动群众，采取适当机会举行暴动，假使没有党部，你们亦应由军中挑选得力同志，派入乡村做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的暴动预备工作，同时并派人与湖南省委作切实的党的联络。

五、暴动的局面须看当地的环境，如便利在乡村发动，便应在乡村中力求深入和扩大，而不急于攻城；如攻城确有把握

而影响又大，群众或更因此而扩大，则攻城亦所必需，便是守不住几天，仍为敌人攻下，亦值得去做。乡村与城市的暴动固然是最好的是能汇合一起，但决不要彼此等待，尤其是乡村能发动时便发动，只要注意群众深入与扩大，农暴总是可以在乡村支持而扩大的。我们以队伍参加农暴，也须着眼于此点。

暴动的内容，自然应依照中央各号通告所指示的去做，但口号必须依照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原则，指定各种切实的口号，以合乎当地的需要。

六、万一你们所去的地方客观条件不容许一个农暴实现，即所谓统治军阀力量的强大，工农群众反抗情绪的微弱，党的指导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们的队伍便应向农运发达的区域移动，去发动群众，做成农暴的助力。这次同鸣珂同志同去江西省委代表，便在这个条件之下同你们磋商，将军队移往江西农运发达区域，如万安、莲花、赣州一带，去做农暴的助力。你们如认定湖南无发动农暴的希望，便可接受江西省委的提议。

七、假使你们已经与范石生发生了组织的关系，你们便应很坚决根据上述的使命，从他的军队中分化出来。这就是说，不但将我们的军队抽回来，还将范石生的队伍拉出一部分来，这一工作自然是很艰难而且很秘密的，但我们必须很谨慎的努力去做，至少要将我们原有的队伍抽回来，指导机关应切实讨论迅快执行。

八、我们队伍中或者已经发生一些摇动分子，不愿意过这种无希望于升官发财的流浪生活，你们应坚决的淘汰这些分子。假使他们不但自己摇动，同时还鼓动别人，你们便应很坚决的执行军纪，斩断恶根。士兵中如有厌倦军队的生活而愿归家者，你们就应以土地革命后士兵家庭可分得土地耕种，工农革命军队待遇改良生活平等的希望去鼓动他们，更应时常引导他们与农民打成一片，引起他们参加农暴的兴趣，以巩固我们

的军队。假使士兵有受敌人宣传的影响，图谋反叛或逃走者，便应立即予以监禁式的劝诫，并将解除武装，武装热心农暴的农军。

九、你们队伍一切的给养，均应从豪绅官吏财主地主身上着想，千万不要空想党会来帮助，这不但事实不可能，而且原则所不许。旧二十四师在海陆丰参加农暴，不但自筹给养提高了兵士生活，并赞助农民分配了土地，分配了地主的财产给贫苦无业的农民，这一工作你们应首先注意。

十、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你们必须依照从前的组织系统——团成立支部，下分小组；师成立委员会——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

过去二十五师的同志的许多行动多有可批评处，尤其是三河坝退后，直至现在许多同志的行动多应该拿到师委员会里讨论出一个大纲，交给全体同志公开的讨论给判断，谁是谁非，报告中央核办。没有党纪便没有军纪，党员不能受严格的军纪，就无以处罚非党的群众，故你们对过去的工作的审查千万不要马虎一些。

一切党的政策均须拿到支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中讨论，使每个党员都表示意见，有些并可向非党的群众宣布，使他们认识 C. P. 的真面目和这部分军队正当的出路——工农革命军。师委会的组织以五人为合适，除指定朱德同志为书记外，余四人可由全体选举，但必须有个士兵同志被选。

十一、你们这一部分队伍的组织形式，广东革命委员会已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你们现在已到湖南，如果暴动占据了一个地方，即可由当地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任命为某某地工农革命军第几师。在这师中的一切训练，除了军事的正式操练外，必须有严格的政治训练，在非同志或不得力的同志中必须有党代表的派遣，严厉的执行监督任务。

十二、你们过去一切的情形均须做一详细的报告，一给中央，一给湖南省委。你们向中央要求只要人才问题，中央可以供给。只要你们有信来，你们应派人与湖南省委联络，对中央□□同志的任务完毕，即须回来报告，万一你们需要□□在那边工作，他可参加师委并任军队中一部分指挥工作。

一切一切都由□□面达，此次就不详写了。最后中央对于你们这一师死难的同志，特致最诚恳的哀忱和永不能忘记的心意，同时并祝你们后死的同志努力！

中 央

十二月二十一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文献》刊印。

注 释

〔1〕指叶挺、贺龙。

PDG

中共中央关于直隶工作的教训和方针给蔡和森转直隶省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和森兄转直隶省委：

你们的报告及各种文件都已收到。中央斟酌目前政治情形及北方过去工作，对直隶省委有以下的指示：

前北方局在奉晋战事发生时关于北方“大暴动”决议和通告，中央当日即已去信，指明其军事投机的危险，而命令其改正。此信去后，虽未见北方局正式答复，但依据两个月来，直隶的工作情形和直隶省委这次来信所报告的热河情形，实足证明北方局所谓“大暴动”的决定，不仅是军事投机，而且是玩弄暴动。因为那时在热河，我们的党已完全消灭（据直隶这次报告），在天津、唐山仅有上级党部的一次改组，停止了二年的工人运动，还没有重新开始工作，在直南仅有几处不工作的党部，如此而决定直南、热河、京津大暴动，不是开玩笑是什么？至于京东的玉田，亦是当日决定四大暴动区域之一，然而在北局与直隶省委直接指挥之下，我们的党连数千自发的农民暴动尚且不能尽其领导责任，而只干了一些退缩不前或个人冒险的军事投机的把戏，可见我们的党在北方之软弱，如何能凭主观的空想，发动直隶大暴动。

中央认为北方局这次所作的错误，可以给直隶省委一个极严重的教训，这个教训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现时直隶的工作，

只有艰苦的按照下列的方针进行：第一，要把党的力量的百分之六十，艰苦去发动工人群众的秘密工会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宣传，从斗争中扩大党的组织和党的影响，从斗争中建立工人群众组织上、政治上和武装的基础——暴动的基础。直隶省委自改组以后，因为空忙于不可能的“大暴动”，致使职工运动至今没有切实工作，实是可惜。须知工农暴动，必须是工人阶级能尽其中心领导者的责任，然后始能成功，如果自去干农民暴动而忽略城市工人运动，则仍然是极坏的机会主义。所以直隶省委于接到此信后，遵照扩大会职工决议案更切实有计划的发动职工运动，并详细做一报告连同工作计划寄来中央。第二，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的斗争，从游击战争（中央对于农民暴动和游击战争，另有通告）一直发展到群众的暴动，特别在政治中心和产业中心的地带要以更多的力量去发动。要坚决的在中央的政策之下，从农民暴动中洗去军事投机及其他的错误倾向，如不发动群众和等待、退缩等等。第三，北方局对于直隶党部的改造，还是改组了几个上级党部（省委市委），还不能算真正的改造了直隶党部，现在应遵照中央在扩大会议后，关于改造组织的两个通告，实行一次从下而上的改组，并且在平常的时候要注意经过斗争发展党的组织，改造党的指导机关。直鲁省委的改组须在下级党部改造之后召集全省代表大会举行之。和森也应依据在上海的决定帮助直隶省委，在一月十八以前经过自己的巡视，改造重要工人区域和农民区域的下级党部（县委或支部）。第四，要开始新的军事工作（中央另有通告）。中央断定直隶省委必须忠实的按照右面的指示去进行工作，然后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前途，才能希望在直隶实现。现在北方战争，因直鲁军的失败将有更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可以帮助我们工作的发展，但依直隶现在的工作情形看，最近仍然没有实行暴动的可能，党的工作应该是一点机会不放

过的，尽力去发动广大的工农斗争，建立暴动的基础。此外关于述之[1]同志的问题，希望直隶省委和述之同志即日做一个详细报告寄来中央解决，述之同志仍暂时停止省委中的工作。和森须于一月十八日以前往来巡视工作回沪，中央希望□□同志于一月间来沪一转。

中　央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六期刊印。

注　释

〔1〕即彭述之。

PDG

中共中央关于第二十五师立即脱离范石生退往北江参加农民起义给朱德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德兄并转全体同志：

广东省委来信，有你们部队已随范石生到韶关的消息，如果属实，则中央前信的指示，又有以下的变更：

一、广州的暴动，不曾严重的警告了范石生，但其对你们部队的注意的防范，并且前信所说："广州暴动失败后你们是否不为范石生所解决，尚是问题。"目前范石生恐将实际的回答这一问题。为避免消灭的危险，你们只有坚决的脱离范石生，联络北江的农军及广州暴动后退往北江的队伍，参加北江区域的农民暴动，扩大和深入北江的土地革命，做成北江农暴的主要副力，造成海陆丰农暴割据东江的同样的局面，这是你们队伍存在和发展的唯一途径，并且对于广东全省总暴动的前途更有深切的关系，认清此点，你们必须迅速的执行。

二、你们在脱离范石生时，必须扩大这个"叛变"的影响到他的军中去，尽可能的带去他的队伍，拆散或消灭他的军队，即是保障和增厚我们的力量，这一良好的而又危险的时机，你们也须谨慎的利用。

三、立即与广东省委接洽，直接受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大约在韶关）的指导，完成你们对北江农暴应尽的责任，其

余一切可参照前信斟酌实行。

四、假如同志中有怀疑脱离以及拆散范军的政策的人，必须无顾忌的予以开除，万一主持军队的同志领导着队伍反对这个决定，中央特命北江特委及□□同志行使非常手段，领导服从党命的同志消灭这一个反抗。

中　央

十二月二十七日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文献》刊印。

PDG

李立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中央：

（一）现在各方的情形

1. 从广州退出之赤军赤卫队，约一千人之谱。到花县后，农民群众勃然兴起，不期而集者数千，攻民团，杀地主豪绅。第一日赤军等极力帮助农民暴动，并要农民组织苏维埃。第二日便变更计划，向从化方面退走，农民百方苦留，均不允，并将当地负责同志带去，群众大失所望，无形溃散，反动势力又复高涨。现在已经退到何处，全不知道。省委派几次人去追，尚未觅到踪迹，因军队退走时，当时广州并未派一负责人跟去。昨日花县来人报告，又有另一批赤卫队退到该处，农民又纷纷起来，但北江特委负责同志□□□至今不知现在何处。

2. 海陆丰尚在我们手中，并且紫金、普宁均已起来组织苏维埃。不过陈济棠的军队已向甲子、汕尾等处开动，其目的是经过海陆丰到广州，或者抵御向东江开拔的第四军，同时第四军亦决定以二十五师（李汉魂）经海陆丰取潮汕，现在已集中惠州。潮汕等处的骚动，均被反动军队压服，惠州、平山、淡水一带的暴动均已失败，并且全是一种旧的军事投机，命令

---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九期。

农军去打，群众全未起来。

3. 西江的暴动全未起来，虽然广宁、高要等处的群众基础很好，但是各地负责同志全不认识群众力量，只看见枪支和土匪，天天只计划勾通土匪。

4. 南路情形亦如西路一样。昨日□□□来了一份南路暴动计划，全是军事的，只见攻某城打某地，勾结某匪，全篇找不出“如何发动群众”的字眼。

5. 琼崖情形比较进步，因为他们还在拥护武汉政府，现在已开始宣传土地革命。不过发动群众直接干起来的工作还没有做。据说纯粹党员有一万二千人，反革命的军队只有千余武装，我们的武装亦有七八百。

6. 江门的暴动未发动已被军队破获，简直是笑话。江门市委以前全未对群众有如何的政治煽动，更没有好的组织，并且连军事计划都没有。九点市委开会决定当日下午四点暴动，下一命令要各支部暴动，各支部书记便首先忙把自己的行李捡好，遂被侦探注意了。下午三点半，当地军队便大戒严，搜捕了二百余工人，同志却很少，负责同志都逃来香港或澳门了。

7. 现在全省各地指挥机关（除海陆丰外）仍是旧的机会主义观念，说暴动只知征调农军，勾结土匪，土地革命有些连宣传都不敢做（如花县所谓民团村，自地主至雇农都是民团，共产村自雇农到地主都赞成我们，简直是旧的部落式的械斗，来的同志我们和他说到土地革命，马上伸出舌头来）。普宁有些地方还在做减租运动，最近农民代表到海陆丰去参观，以后才改正过来，已进行到抗租了。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在许多地方简直没有。

8. 广州党部暴动失败，机关仍少破获，这几日渐次恢复支部和秘密工会及秘密赤卫队等的组织。群众虽受了很大的摧残（被惨杀及战死者将近四千人，同志不到二百），但是还未

完全瓦解。这几日还有许多自发的经济斗争，如粪夫、三鸟业工人等。

9. 香港的党部很好，市委中除□□同志外都是工人，支部工作亦好，都能开会，缴党费，在群众中活动等（共十三支部，只有两个手工业工人的支部差一点），尤其是海员支部很好，许多同志对党的政策都能了解，并且能发表意见（最近的工人斗争很多）。

10. 全省党员据各方报告的统计，在三万人以上，但能有几成可靠，到现在还不能有正确的估量。各地党部指导机关大多数还是旧的知识分子，七个巡视员没有一个是工人同志，因此省委的政策，各地几乎完全不能执行或者执行起来便仍是旧的机会主义的方法，这是各地暴动失败或简直不能起来暴动的原因。

11. 在反革命军队中剩下来的潜伏势力，仅某师还有三个连长，表同情于我们的有几个连长，不过现在第四军的下级干部都很动摇，很多倾向我们，因为第四军极力排斥新的分子，尤其是黄埔生，所以我们在里面还很可以进行下级干部和兵士的运动。

12. 现在政治情形，第四军系薛岳、黄镇球等已完全退出广州集中惠州向东江开拔，同时通电欢迎陈铭枢入广州，其目的在让出广州取得东江，让蒋[1]系与桂系直接冲突，好收渔人之利。桂系已到三水，大约一二日内即可到广州，李福林极为恐慌，昨日电陈章甫，要他即带兵来，从陆路来，水路还恐不及。他自己已准备退回河南老巢，目的在团结广东系抵制桂系。桂系到时必将首先解决李，因李过去极明显的反桂，驱李济深之役亦极出力。所以这两日广州极为空虚，人心恐慌到了极点，许多大商店从暴动到现在未开门，跑来香港的人数以千计，中央纸币已跌到四折，将要一钱不值了。在报纸上反对战争的空

气很高，在东江陈济棠、钱大钧等的军队，已向海陆丰、惠州等处前进，将与第四军开火，因陈等已得不到广州，决不愿意让出潮汕，区区惠州，决不能供给第四军这样大的部队，又非取潮汕不可，因此第四军与陈等的战争必不可免（除非第四军一直退出广东到福建、江西去，这又是第四军所不愿意的）。

（二）现在决定的策略和已执行的工作

1. 现在广东客观的情形，革命仍是高涨，所以决定继续暴动之策略。第一步，在西北江、南路均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在东江虽尽量暴动，以海陆丰、普宁、紫金等做基础，尽可能的完成全东江的割据。在琼崖须在最短期间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完成全岛的割据并极力深入土地革命。

2. 从广州退出之赤军和赤卫队，须在花县、清远、英德等处帮助农民暴动，造成一割据的局面，并与西江的广宁密切联合，同时命令□□即刻脱离范石生，到花县与这部联合。现已派□□□去发动此项工作，并已派人到龙门、河源，从广州退出的军队，昨日又派□□□同志到军队中去工作。并决定组织一北江特委，以□□□为书记，现因□不知踪迹，已改定□□□为书记。

3. 在东江，在军阀战争爆发，即普遍的在各县暴动并围缴过境军队的枪械，如系大部队不能抵御时，即采用坚壁清野的策略，不当伕，不供给食物……运动下级干部和兵士哗变并与工农革命军联合。并已派□□到海陆丰去参加指导。

4. 已分别通令各地，所有暴动必须是群众的，须用种种的口号去煽动群众起来。同时夺取了一乡，即组织一乡的苏维埃，夺取了一县，即组织一县的苏维埃，马上没收一切地主豪

绅财产，实行分配土地。

5. 尽可能的扩充工农革命军第一二师的组织，一县的暴动完毕即征集一切农民武装与原有军队混合编制起来。

6. 积极恢复广州工作，恢复支部和秘密工会、赤卫队的组织，领导群众作经济斗争，做政治破坏工作，加紧在兵士中的工作等，并已派□□（海员）、□□参加市委指导。

7. 一月一日在海陆丰开全东江的农民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中以便各代表充分认识群众暴动、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的真意义，回到各县马上干起来，完成全东江的割据为主要任务。

8. 已召集全省委会议，在一月一号开会，讨论一切工作（议事日程的计划见上次省委报告），我已将“目前任务及工作方针”的决议案草案起草好，将提出省委会议讨论，特抄一份寄上（该草案与上月省委会议工作方针决案无甚出入，故从略），请中央讨论，并望即刻予以指导。

9. 除□□同志，其余负责同志都无损失，□□、□□将即来港参加省委会议，并决定长驻港做省委工作。□□同志此时此间无工作，可否即来沪转赴莫？

10. 从广州逃到港之同志已二百余人，除已分发到各县工作外，还留百七十余人要俟退出广州的军队到花县后，始能领到花县去，一切救济费等极为困难，万望中央即汇款来。□□至今未到，何故？

11. 上次省委报告已经说过的现在组织和工作情形，不再赘述。

（三）广州暴动问题

1. 关于广州暴动之经过，尚未得到当时负责同志的报告，因此省委尚未讨论。现在决定一月一日省委会议时作一详细报

告并讨论。

2. 从许多参加暴动的同志的报告，似犯有以下的错误：

A. 爆动时不但未尽力发动群众，并且阻止煽动群众的工作，因恐加紧军事当局的注意，破坏暴动的计划。因此，可以看出这次还是单以军队做中心，还不是真正群众的暴动。暴动时或暴动后除去几千赤卫队外，群众全未起来。第一次群众大会流会，第二次群众大会仅到三四百人。所谓苏维埃就是在这次会议中产生的。

B. 全未执行镇压反革命派的工作，占据广州三日，杀人不到一百，捉了的人，都需经过惩治反动派委员会，审过后才肯杀，因此退走时，还关有七八十个反动派在牢里。失败后，便出来引导军队大杀我们了。在暴动时，一切当时的军事、政治领袖都在东山（除李福林外），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当时指挥机关不肯发兵去东山，以为抓到政权便够了。

C. 全未执行没收一切政府及反动派财产的政策。抓住广州政权，但总指挥机关几乎没有买菜钱，中央银行关了几百万现洋都没有没收，其他银行商店等更丝毫未动。

D. 退走时极为慌乱，全未通知各处（除教导团外），许多负责同志都不知道，工人更不用说，所以反革命军队到了，赤卫队才退出街市，因此被杀至数千人之多。

三、此次暴动的经验很重要，省委预备经过讨论后出一专册，发到各级党部去。（下略）

立　三

十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给福建临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福建临委：

□□同志携来一切报告收到。他并于日前出席中央常委会报告一切，当决议应答你们的要点如下：

一、你们这次负责同志联席会议的精神，已较前大有进步。惟仍有缺憾的是代表中工人同志只有两个，农民同志一个俱无，可见福建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还未能提拔工农分子来充当。其次，会议中的各项决议案，多是说些原则上抽象的话，很少提到全闽以及各县市的实际情形。譬如工运决议案并无厦门、福州以及各县城市工人生活的叙述，斗争利否或是无斗争的批评和各地怎样建立秘密工会，怎样指导工人斗争的方法。

二、决议案中的政治观念已较前次扩大会议为进步。从前福建党部同志尚多对于民军的幻想。现在这一观念已打消无余。对于军阀的混战也较认识清楚。只是尚有两件要事还没弄得明白：一件是对国民党的观念；一件是对暴动的认识。这两件事弄不清，福建党的指导仍不能走上正轨。

三、会议中对于国民党的观念，一方既承认“我们对于整个反动的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国民党，应毫不妥协地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打倒他”，而另一方却又容许我们同志在国民党中工作。虽然你们的解释是“目前只能暂时占着这个机关和利用他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七期。

的经，把所有同志及进步分子送到工农中去，同时绝对不可用国民党名义”，但实际上你们是取消了“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因为据□□同志的口头报告和决议案的精神，同志主张留在国民党的不外这几种观念：一、我们同志主持的国民党对于工农运动不致压迫；二、我们如让出国民党，豪绅将去把持；三、我们利用他的经济办我们的事。照第一说，我们简直不但不能打倒国民党，还要替国民党行改良政策，去麻醉工农群众，阻止工农自动的斗争呢。照第二说，则我们是变护国民党而非打倒国民党了。第三，则筹款的办法，何必非占着国民党机关不可，定无他道？总之，这种保存国民党利用国民党的办法，仍然是机会主义作祟，福建党部必须彻底地肃清。须知想利用国民党的地位来发展农运，实际上便是取消了土地革命。只要我们同志能领导工农群众作不断的斗争，则统治阶级的国民党机关必落在豪绅买办官僚之手，我们同志必被撵出。所以工农的斗争愈烈，国民党的反动愈甚，尤其是国民党向为豪绅买办官僚占据的福建更是如此。反之，我们同志能占据国民党机关，不是我们同志没领着群众斗争，便是同志已腐化而投降了敌人。

四、暴动的正确意义，中央已另有通告解释。现在要简单告诉你们的，暴动这一个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至若城市工人带有武装性的斗争，或是乡村农民非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都不得谓之暴动，只仍然说他是斗争骚动。乡村中如在发动群众时而有一种武装组织的行动以扩大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则这种斗争，便叫做游击战争。你们所谓“在乡村方面只有领导农民会匪散军向暴动的路上走，由抗捐抗租一直到实行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夺取政权”和“在城市方面如厦门、福州、漳州、泉州、建瓯等处组织秘密的或半公开的工人的工会，经常作经济

的政治的斗争，以团结和巩固工人的力量为武装暴动巷战的准备”，意义大体是对的。只是战略方面，必须弄清由和平式的抗租、抗捐、抗税、抗粮、抗债发展到乡村暴动的过程中，还有个游击战争而非暴动的武装争斗，即是群众还未广大发动起来，武装准备还未充足，政权夺取的情绪还未成熟的武装争斗。城市暴动更须由和平的政治或经济斗争，发展到激烈的以至全市全城的工人罢工，再加上客观的统治阶级的动摇和崩溃，乡村农民暴动的兴起，以及主观的党的指导力量足以担负这一个使命，然后才能发动。并且城市工人暴动是领导土地革命的枢纽，决不是什么“响应乡村农民暴动”，这一意义也必须十分弄清。不然工人运动便要成了农暴的尾巴，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权旁落了，农暴永世也不得成功！

现时福建各县的乡村斗争，方开始由和平的抗捐、抗租、抗饷运动转变到渐次激烈的斗争。城市工人连斗争还没有起来。这个时候你们便拟在闽南方面……“乘着这个机会起来暴动夺取政权”，不是你们对于暴动的认识不清，便是想凭着一些武装组织起来暴动。这样单纯的武装行动而不发动群众的军事投机危险，福建党部也须立即予以纠正。

五、暴动是我们争斗的前途，但在现时福建，乡村中必须由和平的斗争，倚赖国民党的恩惠，急剧地转变到农民自动手的激烈行动——抗捐、抗税、抗租（有些地方租还没交清）、抗债，杀豪绅地主，烧富户，焚契约债券，打下乡官吏皂隶，然后农暴前途才能有望，闽北闽西的农暴割据局面也才能出现。城市的职工运动，更是须要一个经常而刻苦的工作，组织秘密工会，引导工人政治的经济的斗争，鼓起工人政治的兴趣，宣传统治阶级国民党军阀的罪恶，引起工农群众夺取政权的决心，发展红色恐怖，阻止反动分子在工人群众中的一切影响。这种经常工作如做得不好，不仅暴动的前途无望，便连带

武装性的斗争也发动不起。

六、总起来，因为你们决议案中具了这样的三种缺点：1. 对国民党和暴动的观念错误；2. 对福建目前政治任务估计得不切实。3. 缺乏各地实际工作的指导而仅说了些抽象的原则，所以中央不便加以批准，只命你们根据上述的原则指示加以纠正，并须急速由省委拟一具体的工作大纲发往各地执行。

七、你们在扩大会议决议关于党团分化问题决定二十三岁以下的皆属团员，这样的规定太死板，应该是凡十八岁以上的团员中之积极的分子，亦可以介绍入党，成为党兼团员，自然在工作上有必要时仍可留团工作。

八、此外，中央还训令你们两点，临委务要切实做到：1. 临委委员可加二人，此二人必须是工人同志中之最积极最勇敢的分子，且须有一工人同志（由此二工人同志委员中选一人）加入临委常委；2. 临委接此信后必须马上实行改组各级党部的工作，先从支部改组起，支部改组好后，即改组县委一直到改组省委。这个工作必须在两月内告结束，在两月内必须召集福建省的代表大会改组正式省委。在改组各级党部的当中，必须注意提拔积极的、勇敢的工农同志到指导机关中来，并须很有方法的发展党内的讨论，提高党员对党的生活的兴趣。

中　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PDG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

——对国民党的工作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九月十九日《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对国民党工作有以下的决定："……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可见土地革命的急剧的发展，已经使一切动摇犹豫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的战线。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假设在国民党中有这些单独的、革命的、'对抗派'的成分发现时，我们应赞成他，推动他到继续革命斗争的道路，使他完全与国民党的反革命上层分子断绝关系，但同时应当知道，这种工作比起党的主要任务（组织暴动）是占次要的意义。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即使以后在自然的群众运动基础上，或许另有发现国民党组织之可能（现在还不是这种现象），则我们应当知道这种力量不是主要的决定成败的力量，而是革命之临时的、不可靠的、不坚决的同道者罢了……"[1]自此之后客观的事实愈加证明国民党只

---

* 本文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六期。

是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工具，是空前未有的压迫和屠杀的象征，其本身更反映豪绅资产阶级新军阀的内部冲突而分裂互斗日趋于消灭死亡。因此中央不断的在对各地工作的指导中和《布尔塞维克》上暴露国民党的罪恶，指示反国民党的必要和我党领导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的任务和策略。但是最近以来，各地党部如江西、安徽、陕西、福建、云南等仍然不明了中央决议，而对国民党保持政治上的幻想，甚至仍然保留一部分同志于国民党内想借其名义以发展工农斗争。其实，国民党部既已纯粹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极残酷的屠杀工农共产党，则利用国民党名义以发展工农斗争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恰恰是代表旧的机会主义的余毒。因此严重命令各级党部对国民党执行下列的工作：

一、命令同志一律退出国民党，并绝对实行反国民党的工作，如有对此犹疑的分子，即断然开除其党籍。

二、绝对退出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如有犹疑不退出的开除党籍。

三、对国民党军队和对一切反革命军队一样，须设法派遣同志进去充当兵士和下级军官，在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和纪律之下，做破坏反革命军队的工作（遵照中央军事工作计划）。

四、经过党部的决议，得派遣一二个极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的工作。但必须限于有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

五、在每一个斗争和运动中，向群众提出反国民党的口号。并且告诉群众撕毁青天白日旗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根据国民党屠杀工农共产党勾结帝国主义的种种反革命事实，不断的向群众宣传国民党的罪恶和死刑——在暴动的地域绝对禁止国民党的存在。

六、根据中央的策略和布报的文章在理论上批评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驳斥国民党一切反革命的决议和宣传。

七、对于国民党御用的黄色工会和假农会，须利用种种事实向工农群众宣传其罪恶，使群众退出，来组织自己的真正工会和农会。绝对不许幻想利用国民党工会和农会去做工农运动。

八、在群众的斗争和游行示威的运动中，须利用种种事实鼓动群众捣毁国民党的反动机关（如党部、工会、农会……等等），殴杀反动领袖，特别是在暴动的时候须毫不容情的去做。

九、在党的组织上，党员中如有国民党反动领袖的子侄和戚友，如党部认为工作有不便时，须令其退出党籍（十二月十日的长沙暴动事前被市党部反动分子之儿子 C. Y. 同志向其父亲泄露了）。

中　央

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刊印。

注　释

〔1〕这段引文和原文有出入。

PDG

中共中央关于长沙暴动未实现原因和当前任务给湖南省委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湖南省委：

□□同志来听到各种报告，中央认为省委自紧急会议后对于各方面工作，确具有积极的反机会主义的精神。同时从这些报告中，证明了中央自宁汉战争发生以来三次（一次在十月二十九，一次在十一月十三四，都是给两湖公信，一在十二月半间）对湖南省委所指示的“湖南应在新军阀混战中实现全省总暴动夺取政权”是正确。湖南省委虽然因交通关系很迟才接到中央的指示，而二个月以来的工作都是向总暴动推进，并且举行了十二月十日的长沙暴动。十二月十日的暴动虽则未能如预定计划实现，但当时在长沙附近客观的暴动条件确已相当的具备。如统治阶级异常动摇而空虚，有极能服从命令的工农群众，这些群众都在党员领导之下，一般的社会表示了恐惶和动摇。所以这次暴动在时期的估量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这次暴动终于没有能够实现，其原因，中央认为是由于省委对于总暴动的布置中的策略和工作，仍然不免有许多重要的缺点，对于这些缺点，中央不能不严重的为省委指出如下：

一、在策略上重要的缺点，便是没有能够很明白的看清工人阶级在工农暴动中应居中心的领导地位，特别是长沙的暴动，如果工人群众不能自觉的——对于暴动夺取政权——实际

起来站在主动地位，是不会成功的。在十二月十日的暴动中，很明显的看出长沙市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虽然很高，并且能够很好的服从我们的命令跑到街上来，但在暴动前工人的情绪并没有经过我们党的领导，从经济政治的特别是经济的斗争发动一个革命高潮，暴露在极广大的群众行动之中，使群众斗争的意识和目标迫紧到暴动夺政权。所以在十号的晚上，人力车夫、码头工人虽然拿着东西跑到了街上，但只是机械的等待信号，不晓得自己要怎样干，结果信号没有能够报出，群众也就寂然无声的散去了。经过这次教训，湖南省委必须明白，城市工人阶级如果不能成为暴动的中心领导者和主动力，暴动必难得到胜利，因此在暴动前应尽量发动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斗争，从斗争中充实其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准备以达到暴动。

二、在工作上重要的缺点，便是对于农村中的土地革命没有能够深入。这一缺点表现有三：（1）游击战争不免成为黑夜杀人的暗杀队，而没有能够成为在暴动前发动群众的公开斗争（游击战争的意义和方式，另有通告），所以敌人称 C. P. 为“黑夜党”。（2）农民的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土豪劣绅——地主阶级甚至公开表示没有办法，说；“个人仇可结，C. P. 的仇不可结”，而只想与 C. P. 分子妥协。在这样好的情形之下，我们在乡村中只做了些杀土豪劣绅的工作，没有引起群众的斗争，实行分配土地，取消债务，烧田契债券，肃清一切封建关系的工作。近郊可杀至十四五豪绅，醴陵乡村完全在农民手里，同志可以公开活动，可以吓退吴尚，而我们只博得一个“暗夜党”的头衔，岂不异常可惜！（3）因为游击战争成了黑夜暗杀，虽有很好的环境和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而我们没有公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所以农民群众中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没有能经过公开的群众的斗争充实起来，而成熟总暴动的局面。只要看十日晚上长沙暴动时，近郊农民群众可以

在农会领袖的命令之下，调集五百人一队的三队农民到城边，然而因为城中暴动没有起来，便露宿一宵，寂然散去。特别是在这一晚上，近郊农村中一点动作也没有，就可以知道农民群众尚只有黑夜暗杀的习惯——军事投机，而没有懂得土地革命和暴动是什么。中央敢断言，就是在醴陵和近郊这样的局面，如果不能迅速的深入群众土地革命的斗争，肃清封建关系，则军阀统治一旦得到相当的稳定，一定要如浏平一样，受很大的摧残而一时被镇压下去。省委必须毅然的改变这一缺点，从公开的群众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领导农民的革命情绪发展到总暴动的局面。否则，群众既然没有广大发动，一到暴动的时候，便只能有几个队伍的动作，如十日晚之现象便是事实上作成了军事投机，这次暴动就有这样的毛病。

三、策略上的第一个缺点，便是对于“合拍主义”的矫枉过正。秋收暴动中，因为省委负责同志之合拍主义而取消了九月十二三日的长沙暴动，固然是做了历史上的罪恶。每个同志都要为反对这种“合拍主义”而奋斗，因为事实上的“合拍主义”，便是等于取消暴动。但是总暴动的爆发，在重要区域必须互相呼应，这是战略上异常之必要的。省委近来在反对“合拍主义”中，确一时不免忽略了“互相呼应”，显然的例子，便是十号的暴动，只准备长沙、醴陵、安源发动，事实上安源的总罢工，反在十号前结束了，醴陵则并未起来。湖南总暴动，当然不能希望全省同时总爆发，而只能计划几个中心区域的发动。但是这些中心区域，特别是以长江为中心的这一区域，因为交通的便利，政治上、军事上都需要尽可能形成一个联合的动作，如果只是各个的单独发动（指暴动），势必被敌人各个的击破，这是省委应当特别注意的。

四、在总暴动的布置上，省委似乎取的普遍平均发展的策略，而没有特别集中力量于以长沙为中心的十余县，也是重要

缺点之一。湖南总暴动当然要以长沙及其附近十余县为中心区域，如果这一中心区域不能广大的起来，则总暴动便是笑话。如果要这一主要的中心区域能够广大的爆发，则很显然的，省委应当把人力的分配和工作的布置集中于这一区域，而不可取平均支配的原则。湘西湘南的割据固然是布置总暴动的一件重要工作，但是比较长沙这一中心区域就居于次要的地位了。所以中央认为省委对人力的分配和工作的布置，须依据这一原则，更加注意长沙为中心的这一区域。

五、反革命军队兵士的倒戈是决定暴动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这次广州暴动中四军教导团的响应，尽了极重要的作用，而其他反革命军队兵士群众很坚决为反革命尽力，也是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湖南省委在总暴动布置中，能够注意对兵士的宣传，是很好的。但整个的兵士工作，仍然是太不充分，所以在十号暴动中未能收到效果。事实上，在湖南兵士工作的条件，因为兵士都是本省的工农群众，而且大部分是从工农运动高潮中跑出来的群众，其中还有不少的工农会领袖和我们同志被马夜事变逼到军队中来的……等等，做起来比别省更容易收效。军事工作的技术，中央将有详细规定。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就是这种运动，不仅经过我们同志去做，更要公开的告诉工农群众自己去做。省委及重要县委应当组织“破坏反革命军队委员会”，专门的有系统的指挥这种工作。

六、在组织上的改造，省委固然可以遵照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和扩大会组织通告彻底改造，但中央在这里仍须严重指出，省委在总暴动的布置中，对于工作人员的支配，未注意洗刷机会主义的和游移动摇的分子，提拔新的积极勇敢的分子。从秋暴以至十日的暴动，有许多犯了极严重错误的分子，省委没有执行政治纪律加以处罚，而且依然付以重要责任，这样中央敢断言会使总暴动受极坏的影响。今后省委必须不断的从斗

争的过程中做组织上洗刷提拔的工作，现在工作人员中表现不好的分子须断然的撤换。

省委常委须扩大到五人至七人，除现在常务委员外，加入几个积极的工农领袖实际负责。

总之，湖南革命的环境，在主观上、客观上很显然的是到了迫近总暴动的建立湖南全省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政权的时期。在全国的环境看来，除了广东之外，最近期内要算湖南最有总暴动夺取政权的希望，因为新军阀混战局面之爆发与民众主观力量的基础，形成了湖南目前特殊的局面，省委应当把湖南造成更有胜利希望的广东第二。根据中央的指示深入工农群众的斗争和兵士的工作，并在日常工人群众的争斗中准备总同盟政治罢工（在暴动时举行），产生新的政权与新的组织形式（建立真正群众的自下而上能开各级代表会的秘密工会，如工人在罢工时，组织罢工工人代表会议为最高机关，最后汇合成为总的组织，即为未来苏维埃的政权机关等）。在农民广大的群众的爆发区域即组织农民代表会议，在兵士运动中要努力建立党的兵士支部，经过他们去组织反动军队中的革命兵士委员会，如遇有机会时即要使之与工农联合，开短时的工农兵士代表会议。此等组织与工作的方式，开始实行虽然不免有许多困难，但必须战胜这些困难，才能爆发与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才能建立真正群众的政权机关——苏维埃政权。至于改造党的组织与总暴动技术的准备，应与发动群众与在总暴动前群众的政治准备有同样的重要。为实现这个责任，省委须定出更详细的计划，一面执行，一面报告中央。至于湘南应造成割据的局面，大概已详前信，湘西割据局面的创造，则另有计划交由□□带来，湘鄂赣的关系可由中央介绍有关各省商定，报告中央批准。

此外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

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依中央的意思，该部应在湘赣边境或湘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海陆丰第二，这才算是尽了该部的革命的职任。

又，省委须在明年二月间召集全省代表大会，改组省委。在全省代表大会前，按照中央组织通告实行各级党部和省委本身的改造工作。

这个信要转到各级党部。

中　央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